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目录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

。。。。。。。。。。。。。。。。。。。。。。。。。。。。。。。。

。。。。。。。。。。。。。。。。。。。。。。。。。。。。。。。。

。。。。。。。。。。。。。。。。。。。。。。。。。。。。。。。。

。。。。。。。。。。。。。。。。。。。。。。。。。。。。。。。。

。。。。。。。。。。。。。。。。。。。。。。。。。。。。。。。。

。。。。。。。。。。。。。。。。。。。。。。。。。。。。。。。。

。。。。。。。。。。。。。。。。。。。。。。。。。。。。。。。。

。。。。。。。。。。。。。。。。。。。。。。。。。。。。。。。。

。。。。。。。。。。。。。。。。。。。。。。。。。。。。。。。。

。。。。。。。。。。。。。。。。。。。。。。。。。。。。。。。。

。。。。。。。。。。。。。。。。。。。。。。。。。

第三章

1900年-1911年

——

义和团以及1900年的政治动乱

+++

+++

+++

+++

+++

+++

+++

+++

+++

+++

+++

+++

+++

+++++++++++++++++++++++++++++++++++

【引述《荆棘冠冕》；原著：BRYSON；原著出版日期：1904年】

第一章

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本书，曾经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本书没有很精致的封皮，也没有很好看的插图-----更不像今天年轻人常常看的书那么色彩亮丽。书的封面是很暗淡的颜色，书里面的图画也一点都不精美。

那本书的名字叫《殉道史》，作者是福克斯。书的质量虽然很简朴，但是讲述了许多奇妙而令人震撼的故事，是关于人们-----男人、女人、甚至儿童-----为了我们主基督而甘愿牺牲生命的故事。那些人，即使是死，也不愿意否认基督，更不愿意离弃他。

小时候，我常常蜷缩在爸爸的摇椅里面，不知疲倦地阅读那本书，心中充满了仰慕和震撼。在那些逝去的古老的年代里，有那么多良善而伟大的人们，为了耶稣基督而甘受苦难，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开始，是基督自己的门徒们-----就是那些耶稣基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曾经朝夕相处、最亲近的人们。其中，有些人记述了耶稣奇妙的生平，成为圣经中福音书的作者。这些门徒们中间，几乎每一个人，后来都殉道牺牲了。这就像是，他们用血在福音之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这些第一批门徒之后，共有数百年的时间，从尼禄时代，直到君士坦丁时代，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为主而殉道。而且，他们不仅是死；更是在受尽逼迫者丧心病狂的、极其残酷的折磨和痛苦后，才死去。

我曾经读到过，一个学龄期间的聪明的男孩子PANCRATICUS为主殉道；也读到过一个在罗马的甜美的女孩AGNES-----她在死亡面前无畏地说，为了救主而死是一件多么纯洁而喜乐的事情。

我还读到了LATIMER和RIDLEY的殉道故事-----靠着神的恩典，他们像蜡烛一样，用福音点亮了整个英格兰。

在我的那些童年日子里，殉道者的故事，好像都是在历史里面，而离我的现实生活非常远。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自己的最亲爱的朋友们，也真地会经历那样的火一般的试炼。然而，在这英格兰的绿草如茵的环境里，我有时问自己，如果我也经历了那样的试炼和苦难，我会怎样呢？我是否也应该像他们那样，显明自己对主的信实呢？或者，我应该选择一个懦夫的生活，苟延残喘，而不是光荣地死去呢？

多少个世纪以来，殉道者的故事一直延续着，直到我后来在一本杂志中看到，当代一些基督徒们所遭受苦难的故事。那本杂志中的记述，虽然很简单粗略，但是在我记忆中深深刻下了烙印。在遥远的马达加斯加，一群基督徒们被捆绑着站在悬崖的边上。他们每一个人都拒绝放弃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于是，一个一个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逼迫者推下悬崖，摔得粉碎。

从那以后，又有很多年过去了。主呼召我来到中国。在一个晴朗的一月的日子里，我们的船经过美丽可爱的日本海，并经过PEPPENBERG；在那里的陡峭悬崖上，也曾经有大量的基督徒受害、被推入海中。这些事情，都让我想到了在小时候曾经读过的那本书和故事；只是，那些古老的、或是遥远的故事在我自己的生命中开始变得触手可及。

当我到达中国以后，我和丈夫在一个中国的大城市安顿下来，并很快发现，对于中国的基督徒们来说，信仰的道路一点也不是充满着鲜花，而是充满了逼迫-----因为他们不再愿意向偶像假神敬拜。

在我们居住的城市，城外有一片长草的坟，传说里面掩埋着很多年前传教士的遗体，那些传教士是当年因殉道而死的。我们以为那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尽管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会时而听到有暴乱和用石头打传教士的事情发生。有几次，我们自己也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十年以后，我们从那个扬子江畔的城市搬迁到了渤海湾。每个人都听说了大约十二年前的天津屠杀的事件。当年，在天津城里面，人们由于一些广泛传播的谣言而极其愤怒；那些谣言说天主教的修女们把儿童绑架到她们的孤儿院里，用那些儿童的心和眼睛来制作一些外国药物。愤怒的人群起来，用刀杀死了每一个修女，以及其中的很多住户。

我曾经去过那个屠杀场地几次。那里是一片很大很安静的区域；需要从一个

繁忙的街道走进去。在那里，现在为每个死去的修女建了一个碑。不过，我认为那样的屠杀与迫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有时在城中仍然流传着关于基督徒们的恶言，比如，说他们激怒了本地的神灵，阻挠了降雨，打乱了人的生死次序，并导致有些人猝死。另外，还有一些传说，说基督徒们绑架儿童，把他们的尸体放在火车铁轨的枕木下面，或是火车桥梁的横梁里，或是用来制作新鲜的药物。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开始与许多中国基督徒熟悉起来，并且，非常热爱他们。他们中有些人给我的心带来了很多喜乐-----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真心的、爱主的、辛勤的人。

另外有些中国基督徒，则有时让我怀疑，他们是否真地明白，作一个主的跟随者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的这种信心上的缺乏，受到了主的责备。因为，后来，在这些人中，他们即使面临极其痛苦和死亡的威胁，仍然忠心、信实地持守着对主的爱。

在这些殉道者中，接下来我会谈到其中一些人的故事；其中有的人是学龄的女童-----她们的明亮的面庞让我多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还有很多妇女，她们每个礼拜都到我的“母亲课堂”里来；这些人生的故事，常常唤起我的思念与情感。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常来参加一周数次的英语课-----我教授这些课程，好使他们帮助神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们或是工作者们。

在那些殉道的外国传教士中，也有很多是我的最亲爱的朋友。其中有DIXON先生和太太，他们和其他的传教士们曾连续数个礼拜被追杀，不得不躲在地洞之中。他们在忍受了饥饿、疼痛、劳累之后，由于被虚假许诺而欺骗，被引诱出来，并最终在城门口被杀害。DIXON先生在最后的时刻说，"我们要是死了，以后肯定会有很多人来填补我们的位置的"。

还有HORACE PITKIN，他最后的遗言是由一位中国基督徒转告的。在他死去的几个小时之前，他举手在祷告中说："请告诉我的妻子，让她等我们的儿子二十五岁的时候，把他送到中国，来继承我被主呼召而舍命从事的工作"。

还有COOMBS小姐；她是中学里的勇敢校花-----她冲进被火燃烧的校舍中，抢救了一个瘸腿的同学。她被暴民残酷地击打，直到最后在火中被烧死。

还有PIGGOTT先生和太太，以及他们十三岁的儿子。PIGGOT先生一直在讲道，直到最后一刻，被太原府的清朝官员杀害。PIGGOTT太太紧紧握着儿子的手，二人的身体同时被剑刺穿。

还有JOSEPH STONEHOUSE，在去外地运送捐献物资的路上，被子弹射击而身亡。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所爱的人民。

这些殉道者的故事，已经被很多很多人讲述了。在这本书中，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些关于不死之信仰的故事-----就像我的中国弟兄姐妹们所说的，"胜过死亡"。

有一些人曾把中国基督徒们称之为"大米基督徒"-----因为那些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些中国基督徒。这个词语的意思是说，那些中国基督徒们加入一种宗教，只是为了有粮食、有大米可吃，并从中得到好处和利益。但是，我希望，接下来的故事能够让我的读者们看见，中国基督徒们，就像多少个世纪以前的那些基督徒殉道者们一样-----神给了他百姓同样的大能，使他们能够为了主而活，为了主而死。

我在这里讲述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和事；这些同样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很多很多地方，发生在很多很多人的生命之中-----因为义和团的刀剑，曾经流了成千上万基督徒的血。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是一句古老的话，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了极大而丰富的收获。我真诚地期望，读了这本书的人们，能够来到主在中国的禾场，一同作工。

愿你们许多人会发自内心地，对主祷告说-----

"求主基督差遣我们，去你的葡萄园作工；使我们愿意背上担子，承担劳累。当你召唤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我们不求什么，但求能够因着我们的苦难，你的恩典国度降临。"

。。。。。。。。。。。。。。。。。。。。。。。。。。。。。。。。。

。。。。。。。。。。。。。。。。。。。。。。。。。。。。。。。。。

。。。。。。

第二章

义和团是谁？

当人们听说那些中国基督徒殉道者的故事的时候，会很自然地问：“义和团是谁？为什么他们要起来反对外国人以及那些中国基督徒呢？”

他们是一个群体，自称为“义和拳”，因此被外国人称为“拳击手”。在英国从来没人听说过他们的名号-----直到1900年发生屠杀流血事件的时候。其实，到那个时候，他们在中国内陆已经活跃至少一年多了。池州的传教士REES说：“从1899年的春季他们就已经开始活跃了；他们从山东省出发，到了我们这里，一路上杀人和劫掠。他们好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铲除传教士，一直要杀到首都北京；据说他们在首都的高层有支持者，他们暗中遵循京中高官的命令”。

在我们这里，曾经有三次义和团经过；每次来的时候，都是我们女士和儿童们一起躲藏在一个屋子里，而男士们同时做一些日常事务工作；本地的中国基督徒们则和他们一起持守着手中的工作。每次，义和团如同风暴呼啸而过，但是我们的安全还好，没有受到侵害。

到了1899年秋季，义和团的运动又一次以更加剧烈和愤怒的形式卷土重来。有四百个基督徒的家庭受到了劫掠和罚款。清帝国的士兵被派来保护我们，他们与义和团曾经有过几次遭遇。

但是，自从1900年初期开始，中国的政府开始与义和团运动联合起来。所以，那些被派来保护我们的清军也撤走了。皇朝的慈禧太后以及她的顾问们决定要把那些“外国的蛮族”赶出中国。最终，慈禧太后发布了一道致命的旨意，命令所有朝廷官员要消灭一切外国人，以及所有与他们相关联的中国人；并且说，如果这些人逃跑，就要追杀他们。

年轻的皇帝反对这个旨意。他向太后跪求，恳请慈禧太后不要发布这个命令；但是，慈禧对之报以嘲笑的态度。在北京的两个朝廷高官，要比其他人更智慧一些，他们看见此事之中巨大的危险，于是冒险把旨意中的“消灭”一词改成了“保护”的意思。

这个词语的改动，后来很快被发现了。但是在改动被发现之前，很多人的性命因此得救。有大量的人都逃到了海岸线一带。然而，那两个私自改动圣旨的官员们，自己也受到了朝廷的残酷惩罚-----死刑。

这以后，那个可怕的圣旨就传遍了整个帝国，据说导致了5000基督徒和20000罗马天主教徒丧命。在我们这个省，就有1150基督徒被屠杀。

在被杀的人中，除了本地的中国基督徒以外，共有188位传教士及其家人和

孩子们被杀害。这些数字本来可能会更加高得多；但是，由于中国各地的一些开明官员们的暗中保护，许多人性命得以保存。那些官员们急迫地催促传教士们赶快离开这个国家；因此而救护了他们。这些官员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以及冒着失去未来升迁机会危险的。

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在中国北方，有超过一年的时间里，很多人处于一种不满的情绪之中。无疑，义和团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民众中这样一种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在那以前，有好几个欧洲国家从清帝国的手中夺取了一些地方。而中国的官员们则不断地阅读着译自外国报刊的文章，其中讨论着"中国的崩溃"，并讨论着，把中国的各个地方分配给欧洲的几个强权国家管理。因此，自然地，那些事情使很多即使对外国友好的清朝官员们也极度焦虑不安。

民众中的这种不安，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人极其重视对于死者的安葬，以及墓地的清净；并认为这对于他们在世后人的兴旺顺利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他们对于在清帝国中到处修建的铁路工程抱着很大的敌意。另外，他们还认为那些开矿和采矿的工程打扰了土地之中的神灵。对于那些到处架设的电报线路网络，他们自然也认为打扰了空中的神灵。

在连续几年的时间里，清帝国的很大部分土地，都在经历着干旱。很多人相信，由于许多中国人成了基督徒而不再敬拜他们原来的神龛，从而惹怒了那些掌管下雨的神灵，使得到处都受到干旱的惩罚。这样的想法，在一些偶然的事件中得到确认和加深-----在有的地方，传教士被赶走以后，很快就突然下雨了。

不过，义和团中最多的成员们是那些习惯于靠打家劫舍为生的人们。在很多地方，法律和秩序都被这些义和团们破坏了；甚至，那些普通的劳动者，如果有较强的意愿，也开始用铁棍来领导大家了。

在这些义和团的操练和训练之中，夹杂着很多迷信的事情。人们相信这些义和团是被祖先的灵魂和神灵附体。他们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他们的身体可以变得僵硬，甚至不怕开水烫或是针扎。

他们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有义和团成员死了，他们就说是因为那些死去的义和团成员不够强壮和虔诚。年轻的妇女和女孩们通常在中国是被严加看管的，被约束在自己的家里；但是，她们很多人也加入了义和团运动，并被称之为"红灯照"。人们相信她们有能力发现那些外国人的藏身之处，并用灯笼和火烛把那些房子点燃烧着。

从整体来说，民众就像是听了鬼故事的孩童们被惊吓到了一般。他们会凝视夕阳，然后，当转过眼睛的时候，会自然地看见云的背景上有一层亮圈；他们会把这看作神迹的迹象，并受到激发，而变得更加暴力。

那些主要的义和团领导人的总部，一般都在寺庙里。他们敬拜狐狸，猪，鼠，以及其它动物。战神，关公，以及当代的爱国圣人，也都受到敬拜。就是在这些神龛之处，他们常常把基督徒的心脏用来敬献为祭物，献给他们的

神灵。

那些呆在家中的人们，对于这些酷刑折磨以及残酷杀人的事件，都会感到震惊和震撼。大量的中国基督徒们会被带到那些寺庙受审；如果他们拒绝向偶像神龛烧香，就会被审判惩罚。

在那些寺庙的墙上，到处都有雕像，表达佛教地狱中的酷刑和折磨。有很多雕像是用泥土做成的，但是涂上很亮丽的色彩。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像，被各种恶魔包围着，正在受尽折磨。这些可怕的雕像和画面，如此恐怖，以至于让人很难描述。不过，我可以试着描述一点点。有一个地方，是一个人被扔到刀山上；另有一个人被锯子锯成很多片；还有一个人的舌头或是心脏被拔出来。还有一个人被绑在铜柱上，烫得发红；或是放在油锅里炸；或是放在一个巨大的容器里捣碎。

这些景象和雕塑，我常常在中国各地的寺庙中看见。但是，当我有一天在一个寺庙那里走动的时候-----有许多燕山的中国基督徒就是曾经在那里被折磨和杀害-----我突然意识到，并且开始有点理解，为什么那些可怕的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寺庙中，任由、唆使义和团们，对于被抓到的基督徒们采取许多可怕的酷刑与折磨。

。。

+++
+++
+++
+++
+++
+++
+++
+++
+++
+++
++++++++++++++++++++++++++++++++++

【引述《中国生命册——1900年中国基督徒殉道者的故事》】

原著 Luella Miner

出版日期： 1903年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本书不能完全讲述全部的1900年中国基督徒殉道者的故事。如果要详尽地讲述那些殉道者的故事，讲述他们的坚贞、勇气、执着、热爱、见证，那么，

可能需要出版很多很多卷书才行。本书没有收录很多动人的故事，不是因为那些事迹不值得记录，而实在是因为篇幅有限，无法收纳所有的那些内容。本书中收录的事迹都是非常典型而有代表性的。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来自许多当事者本人的亲身经历的叙述；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作者本人在北京居住时所亲耳听到、亲身经历的事情。

。。。。。。。。。。。。。。。。。。。。。。。。。。。。。。。。。
。。。。。。。。。。。。。。。。。。。。。。。。。。。。。。。。。
。。。。。。。。。。。。。。。。。。。。。。。。。。。。。。。。。
。。。。。。。。。。。。。。。。。。。。。。。。。。。。。。。。。
。。。。。。。。。。。。。

介绍

当二十世纪刚刚到来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却是“基督徒殉道者的故事”-----这是多么不合时宜！在教会的早期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基督徒受到大规模迫害的时期。那时，曾经血流遍地，残暴横行。我们曾在历史书中读到过那些殉道者的英雄事迹，以及坚贞的信仰；并且，深深受到那些殉道者们精神的激励和感动。我们以为，那样的时代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现今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人们不再迫害属神的先知，也不会再用石头打那些传道者。

我们以为，那样的历史黑暗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我们今天的时代，神不会再用那些苦难与患难来试炼他的百姓。我们常常会觉得，那些一千多年前、历

史上早期的基督徒们，或者，那些五百年前、宗教改革历史中的圣徒们，是比我们今天基督徒更坚强的材料作成的；而现代的教会和基督徒们，没有能力再忍受早期基督徒所曾经受到的那些野蛮的、残忍的、血腥的、如烈火一般的迫害了。

在当代，我们曾经听说过一些传教士到一些偏远的土著部落那里去，在那里被杀害。原因常常是，那里的人们不理解这些传教士是出于无私的爱，是被神无私的大爱带到那里去的；相反，那里的人们总是怀疑，这些传教士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想要陷害他们。或者，那里的人们不喜欢这些传教士们所作的圣洁生活的榜样，以及，这些传教士所宣讲的道理。传教士们常常殷切地劝告他们要放弃愚昧的敬拜偶像行为，放弃迷信和罪恶的事情。对于传教士们的殉道，差传的教会是有思想准备的。我们都知道，那些传教士去，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抱着宁可死也不怕的决心去传教的。

在基督教传教的整个历史中，我们会偶尔看见那些逼迫与殉道的事情。其中，有的人用自己的生命点亮了整个国家。他们的性命被自己的同胞残杀，然而，最终，福音的信仰却在整个国家传播开来，比如英国、法国、德国、北欧，乃至当年的整个罗马帝国。但是，像1900年这样的、发生在中国的、对基督徒的极大规模的迫害和残杀，却是整个历史中不常见的。因此，每一个为神的国度而关切、热忱的人，应当好好记念这件事情；我们的心里会被那些殉道者的勇气和忠贞所感动，并且，为他们爱的见证而衷心地赞美神。

说实在的，在西方社会，人们通常对那些东方人在信仰上的专诚和敬虔的程度是很有怀疑的。即使在西方的教会里，也普遍地对东方的人们流行着很多偏见。人们常常认为，东方的基督徒们，除了个别的例外情况，大多是不能

给教会增添什么美好见证的。尽管，从救恩的角度来说，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信仰，能够使他们的灵魂得救；但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还没有能够活出基督徒道德的原则，还不能够过一个诚实而热忱的生活，在各项事务上还不能够非常值得人信任。的确，就像最近一位积极活跃的基督徒妇女，说到中国人的时候，她用了一种非常贬低人的说法："唯一良善诚实的中国佬，是一个死了的中国佬！"

由于这种观念非常流行，于是，就不奇怪，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西方人把那些海外地区的基督徒们，包括中国的、印度的、日本的、非洲的、等等地方的基督徒们，称为"大米基督徒"。这个词语的意思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们，他们的信仰，其实只是一个手段；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得到比较好的工作职位，赚到更多的钱；而实际上，在他们的内心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悔改罪，没有什么生命的变化，也没有圣洁的情感。

这种泛泛的、以偏概全的定论，虽然是一种很不好的偏见，但是，与其他类似的偏见一样，并非毫无根据。在东方的那些国家里，由于商业和贸易来往，外国商人的聚居区里常常接触到东方当地人口中一些最狡猾和鄙陋的成分。这些当地人，常常为了得到稳定的买办工作，或是外企职位，而系统性地欺骗他们的外国雇主。在多次欺骗以后，那些外国雇主们就对此产生了很坏的印象，并推而广之，认为这样的行为就是东方基督徒们的典型行为。于是，这样的风言风语传到了西方本土的教会，人们就产生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就是说，向那些地方传教是不值得的，因为，在东方人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良善的基督徒。

在那些东方的国家里，在那些当地的基督徒中，如果，人们不能在现实生活

里，从罪与恶的事情中悔改、过良善的生活，那么，这个新的信仰就肯定不能在当地深深扎根。

“对于一个东方基督徒来说，如果他能继续拥有财富、赚取财富，那么，他的基督徒信仰就能持续。但是，如果，针对信仰的逼迫来临、苦难来临，那么，东方基督徒的面具就会脱落下来、露出他们的本色和心灵之中的真实光景。”

这就是流行于今日世界的观点。这种观点和偏见，在有的地方如此盛行，以至于几乎就像是《约伯记》第一章里，撒旦在至高神的面前控告约伯：“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正如《约伯记》里所记载的，神出于无限智慧和圣洁的旨意与目的，在约伯的日子里，允许试炼暂时临到了约伯的身上；-----同样地，在中国，神也允许试炼暂时临到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们身上-----他们遭受了极大的痛楚、苦难，经受了各种各样的刑罚与残酷迫害，失去亲人儿女，遭受残害，失去自己的性命-----他们忠贞和真挚的信仰被试炼和试验；并且，这些渺小、谦卑、卑微、伟大的中国千千万万基督徒们，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见证了他们信仰的忠贞，见证了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永久地平息了那个虚假的、残忍的诬告，让世人看见，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大米基督徒”。

撒旦说："人 情 愿 舍 弃 一 切 所 有 的 ， 保 全 性 命"。这句话，对于撒旦自己来说，对于那些撒旦的跟随者们来说，对于离弃神的大多数世人来说，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对于一个真正地认识了神之爱的人来说，-----耶稣基督的救恩，胜过这世上的一切珍宝，胜过这世上的一切。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愿意忍受这世上的一切损失；这世上的一切在我们眼中看为粪土。（腓立比书3：8）不 但 如 此 ， 我 也 将 万 事 当 作 有 损 的 ， 因 我 以 认 识 我 主 基 督 耶 稣 为 至 宝 。 我 为 他 已 经 丢 弃 万 事 ， 看 作 粪 土 ， 为 要 得 着 基 督 。

在1900年的早春到盛夏，在义和团风暴之中，那些中国基督徒们不仅在心里面持守信仰，而且，愿意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受苦。无论是天主教徒们，还是基督教徒们，都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并且，总共有三万名中国基督徒殉道者被杀害。其中有很多人在被抓住以后，被直接地、不由分说地杀害了。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被抓住以后，经受审讯、酷刑、迫害、威逼、利诱，然而他们至死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还有许多许多的中国基督徒被抓住以后，被强迫给庙里的偶像上香。暴徒们对他们说，只要同意上香，就可以饶他们不死。但是，这些基督徒宁可死，也不愿离弃那位宇宙天地造物的主。他们宁可丧失性命，也不愿向那些庙里的、虚无的偶像假神敬拜。

当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出版的书籍，讲述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们的生命、苦难、殉道。其中的感人至深的事迹，以及很多幸存下来的传教士们在逃亡过程中的神迹奇事，都在很多出版的书籍中能够看到。在当代的岁月中，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从未曾被如此激烈地震撼过。并且，我们听见了更多的来自于神的呼召，要我们以辛勤的汗水和努力，以热忱的、敬奉的心，去救赎那片以鲜血和苦难所赎买来的土地。

在这里，我们为那些已有的美好记述和书籍，添加上新的记录。本书专门地、详尽地、细致地讲述，中国本土基督徒在1900年期间的苦难和拯救，讲述他们的英雄般的气质和坚贞，讲述他们身上所显出的、所见证的神的大能与救赎。这些事迹大多都从来没有被发表过；它们是荣耀的见证，显明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有着何等的大能，使人心翻转，使人的生命发生彻底的改变。这些事迹也充分地显明了，那些传教士们的成功与价值。他们的鲜血、汗水、苦难、甚至生命的代价，没有白费。

在本书中，囿于篇幅，我们不能详细地讲述义和团运动本身的起源与过程；但是，那方面的书籍在过去的两年里已经出版了很多很多了。因而，我们在这里，对1900年的义和团风暴以及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只是简单地、总结性地介绍一下。

1900年的义和团风暴运动，无疑地，与其说是一场因宗教信仰而激发起来的运动，不如说是一场因复杂政治原因而导致的运动。这场风暴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要排外-----排斥外国人的势力和影响；其次，才是反对基督教，反对传教士。如果，外国人带到中国来的，仅仅是传教士和基督教；又或者，如果，外国人带到中国的影响、产生改变的对象，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迷信传统；那么，也许就没有1900年那样惨烈的局面与暴行。虽然我们不否认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带来社会生活的深刻改变，甚至有时，这信仰使得基督徒们不得不面对家人以及邻舍的仇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在义和团风暴中，那些义和团的目标和口号，都主要是针对政治性目标、而不是出于宗教

性动机的。比如，他们常常喊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他们把那些本土基督徒们称为"外国狗腿子"。他们称外国人为"洋鬼子"，或"洋毛子"，而称中国基督徒为"二毛子"。他们常喊的暴力口号是"杀二毛子！"。这听上去至少并不等价于"杀基督徒！"

这里所说的"二毛子"，可能包括了给外国人熨烫衣服的人，包括了帮助外国人勘察、修建铁路的人，或是教外国人中文的人。在这些人中，可能包括信佛的，包括道教人士，包括信儒教的，等等。而那些对外国人表示一点点友好的仆人或是底层官员们，则被称为"三毛子"。

在义和团的各种指控中，从未提及过有什么基督教传教士曾经不正当地干预、破坏或是影响中国司法系统。偶尔，会有一些天主教人士利用外国的影响力，在某些涉及教徒的司法官司中，发挥了不是很恰当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事情，与义和团所表达的愤怒之事相比，都不过是沧海一粟。相比之下，义和团们针对的，更主要是外国的国家势力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侵入和影响。这种影响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很多中国家庭的传统职业、生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改变，经济的运作发生了很多重组和变革。中国人的眼睛，还没有看见西方科技革命的好处，因而，还没有预备好接受如潮水一般涌入的各种革新、发明和技术。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又已经开始不情愿地接受科技所带来的益处与丰盛。中国的皇帝和少数几个大臣，认识到革新对国家带来的好处，因而花费了很多努力，来引导和使用各种各样革新的理念。但是，他们面对的保守派的反抗势力，非常巨大。皇帝及其所代表的革新派失败了，保守派的势力重新掌握了权力。保守派的目的，并非是简单地要使国家得到正义和独立，而是，要使国家重新回到从前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去。

义和团运动，包括了已经有一些历史的“义和拳”组织，以及“大刀会”组织。这些组织，大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起初，他们是源自于一百多年前、十八世纪期间，在山东省南部的一些地方组织。当初，成立这些组织的原始目的，是村民互助，以对抗在地方上猖獗的盗贼和劫匪。后来，受到佛教人士的影响，这些组织开始具有宗教色彩。这些组织的首领们宣称，自己有超能力，可以与灵界相通，并能使自己、以及义和团成员们刀枪不入。在1898年，当慈禧太后领导的保守派势力占上风以后，以慈禧为首的朝廷皇室和大臣们，在这个迅速蓬勃发展起来的义和团组织中，看到了可以加以利用、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此时，朝廷亟需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保守立场，进一步坚定地排外、消除外国影响，并使国家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中央帝国时代。

义和团的狂热而狭隘的爱国主义，以及，他们所宣称的超自然的能力-----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满足朝廷的需要呢？现在，朝廷亟需把大量民众的狂热的热情煽动起来，使政府的力量与民间的力量强烈地结合在一起，这样，他们才能把外国势力赶出去，把外国人的影响从中国驱除出去。

因而，在1899年期间，在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明里暗里的支持和怂恿下，在山东省的西部，以及直隶省的南部，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开始变得更加迅猛；并且，他们开始越来越大胆地攻击外国人，以及中国基督徒们。

这样的官民之间的暗中合作，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山东省，政府的省长一方面名义上镇压义和团，另一方面却暗中用尽所有的权力和机会来鼓励这些义和团组织。外国使团不断地向中国中央政府抗议此类事件，而北京中央

政府也不断下达命令，名义上要镇压义和团，禁止对外国人的攻击。但是，这些政府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地发布以后，却都泥牛入海，毫无效果。不但如此，政府官员们还暗中告诉义和团们，不要理睬那些政府命令。

义和团们的发展如此迅猛，以致于他们已经公然占领了首都北京，以及中国北方的所有省份。义和团的成员们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上，公开地操练。而城市里的警察力量，或是清帝国的军事部队，则袖手旁观，丝毫不作任何阻止。在北京城里的大街小巷上，外国人、以及中国基督徒们，公然受到羞辱、唾骂和威胁。而那些从北京南边市镇逃难过来的人，则讲述着在当地发生的可怕的屠杀以及大规模纵火的事情。北京与天津、保定之间的铁路被毁坏了，因为那些铁路代表着外国人的恶劣影响。而北京城里也开始发生很多屠杀与纵火的事情。在北京的传教士们，以及中国基督徒们，都不得不聚居在美国卫理公会的北京营地。

从1900年6月13日开始，义和团运动如同彻底脱缰的野马，在清帝国军队的帮助下，大规模地劫掠了城市中所有的中国基督徒们，以及一切为外国人工作的中国雇员们，把这些人杀掉，用刀砍成碎片，把他们的尸体扔到北京的大街上，或是在他们的家中把他们烧死。从那一夜开始，仅在北京城就有数百名信实的基督徒们被屠杀了。只有很少的一些中国基督徒，因为躲到了卫理公会营地，才没有死亡。在卫理公会营地那里，由于人们拿起了武器守卫，使得义和团的暴徒们暂时无法攻入。

义和团在北京城的成功与暴行，使得他们更加嗜血。而由于不能攻入那些自卫着的传教士营地，则使得暴民们更加怒不可遏。义和团们从城里向郊外进发，向四面八方的村庄和市镇冲去，到那里抓捕那些在农村市镇里的、和平

的中国基督徒们，屠杀他们。有许多基督徒家庭，他们的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就这样被屠杀了。而那些侥幸地逃脱了火与剑的人，则不得不到逃深山里去躲藏；许多人在颠沛流离中因饥饿而死，许多人则被追捕而杀死。因为卫理公会在北京城南，所以，先逃到那里去的人侥幸存活下来。但是后来，那里完全被包围了，外面的人再不能进去，因而，在北京城的其他方向，比如北面和东面，都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国基督徒们殉难。

保定的基督徒数量要比北京少很多。那里只有两个传教士团体，而其中的一个仅仅是最近刚去不久。但是，在那里所发生的屠杀却是极其可怕的。那里的所有传教士们都被杀了，本地基督徒们无处躲避；即使少量侥幸逃避的，也经历了难以计数的、难言的磨难。

看起来，北京，通州，保定是风暴的中心。尽管在天津、东北、以及华北的很多其它市镇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事件，但是，在比例上，那些接近首都和省会城市的地区是屠杀事件最严重的。在山西省，传教士被杀的数量超过了所有其它地区的传教士被杀数量的总和。而在有的地区，中国基督徒们被杀的事件则尤其严重。

义和团几乎要蔓延到整个中国；甚至，在西南地区，比如四川省，也有义和团运动的迹象。但是，由于南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官员们没有完全执行中央政府关于纵容义和团的政策方针，所以，在那些省份没有出现像北方的那么严重的血与火的惨案。在那些地区，相对而言，没有很多人被杀，也没有很多财产被毁。

很多人在海外听到义和团事件的情况以后，会问："那些中国基督徒们有没有权利拿起武器来反抗自己的政府？或者，他们有没有权利，去做外国人的奸细？他们爱国吗？"

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在中国，那些真正的爱国者，正是这些中国基督徒们。在这个中央帝国里，没有任何人，比这些在传教士开办的神学院里念书的中国本土基督徒们，对于欧洲列强的侵入更加忧烦、忿怒的了。这些中国基督徒们对此的感情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一次在某一间神学院里，教师们不得不限制大家讨论这一类政治话题。在1898年，当清朝皇帝准备开始推行改革（戊戌变法）的时候，在神学院的每一个学生的心中，都燃起了极大的希望。当时，他们以从未有过的热忱，为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领袖们迫切祷告。

有一位在通州神学院上学的学生，名叫"恩仆"，写了一首赞美诗歌。在诗词中，热切地呼求神，怜悯中国，在列邦中把她高举；把中国人带到神的面前，作神的儿女和子民。经常地，有一大批中国基督徒学生们集合在一起，用极深、极深的感情，合唱这首诗歌。

但是，1898年下半年的时候，戊戌变法失败了，保守派重新占据了权力的核心，义和团运动开始迅速崛起。在这些中国基督徒心中的伤痛，难以想象。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虽然，我们不愿意过于细节性地描述那些1900年屠杀惨案中的残酷与血腥；但是，我们也不应在任何程度上，掩饰那曾经发生的、大范围内的残暴行径。感谢神，在那段时间内，没有大规模地发生像在土耳

其所曾经发生过的奸淫事件。

如果，有人在看了这本书以后，说："我以后再也不愿意跟像中国人这样的残忍民族打交道了。以后，谁要是想去那里传福音，谁就去吧，反正我是不想去了"；那么，我们想推荐这样的人去读一读以下这些曾经发生在罗马、西班牙、法国、英国历史上的类似事件：

"RICHARD BYFIELD被扔到了监狱里，在那里饱受鞭打，因为他仍然坚持马丁路德的教义。这个人所受的苦难，可能要有很多卷书才能写完。有的时候，他被关在水牢里，忍受让人昏厥的臭气，几乎窒息。有的时候，他被捆绑起来，直到所有的关节都脱臼。他被鞭打，以至于后背上没有完整的肉。他被锁链捆住脖子，拴在墙上，每天被红衣主教的仆人痛打一次。最终，他被审判、定罪、焚烧在SMITHFIELD"。

"1557年，有十五个人被关在CANTERBURY的监狱里，其中有五个活活饿死"。

....

上面这些残忍的行径，不是发生在几千年前、没有基督教影响的黑暗时代，而是发生在十六世纪的英国！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许某些读者会问，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否是因为一些“超自然”的影响力量导致的？是否是有“黑暗世界的统治力量”？是否是因为有“罪恶的灵界力量”？在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很多中国的官员们也会把义和团的疯狂行动归罪为、归咎为“邪灵”的运动和影响。

在义和团的风暴中，有很多中国本土基督徒们被暴徒们残忍地杀害，而且，他们被砍成很多细小的碎块，并用火焚烧。他们的焚烧后的骨灰，在有些情况下，还要用磨石研磨成碎末，抛撒在风中。暴徒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人们广泛地相信，这些基督徒的尸体必须要被完全地毁灭掉，否则，他们在死后三天就要复活。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于那位宇宙天地的造物主、全能之上帝来说，若他要使人复活，无论是人的尸体骨灰被抛洒在世界最遥远的角落，还是撒播在不同的大陆，其实根本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真正应当问的问题，并非是这些中国基督徒们受到了怎样的、什么样的苦难，而是-----他们怎样经受、忍耐了那些苦难和试炼。他们在那些苦难日子里的行为，与他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行为相比较，有着什么本质性的、深刻的不同？如果他们没有信主，那么，当他们临到同样的、类似的患难与磨难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他们的基督徒信仰，在他们的生命之中，带来了怎样深刻的变化？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来说，为了信仰而忍受痛苦或死亡，是一件很不常见的事情。对于一个非基督徒的中国人来说，暂时性地撒一个小谎，否认自己相信某件事情，或者保证自己以后与教会组织脱离关系-----只要这样能免死，或者甚至只要这样能避免财产损失，那么，这种暂时让步和撒谎就是一件最恰当不过、最自然的事情了。那些中国基督徒的亲人和朋友们，都觉得这些是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而，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当中国基督徒们被抓的时候，他们的亲人们和朋友们就都极力劝说这些基督徒暂时让步："只要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就可以了"。

然而，这些劝说的人们没有认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基督教-----植根于心灵、生命深处的信仰，与中国人自己的诸多传统宗教-----植根于人头脑、形式的诸多信仰，之间，有着一种根本性的不同。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对于那些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殉道者来说，无论是义和团们的威胁和咒诅，还是亲人朋友们的苦苦相劝，都不能改变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宁可面对那最惨烈残忍的死亡，也不愿说哪怕是一句话、甚至一个词，来否认他们对那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的这些英雄主义，在中国人中间如此非同寻常，以至于，那些屠杀者们常常要挖出他们的心脏来看一看、研究一番，究竟是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大的勇气。

我们并不是说，没有一个中国基督徒在那些极大的痛苦和患难中，退缩胆怯；也不是说，每一个中国基督徒，都宁肯死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这世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所有基督徒们能够全部显出这样的视死如归的勇气来。中国的基督徒们也不能。我们可以说，正如基督教会在第一世纪时的历史中那样，在逼迫和残害面前，（1）有的基督徒把自己的性命看得比自己的信仰重要；（2）有的基督徒愿意放弃信仰，是为了挽救家庭和朋友；（3）还有的基督徒则认为，在这些疯狂的迫害行径面前，说违心的话、暂时说谎放弃

信仰，并以此为自卫的手段，是正当的。

最近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中，只有很少的人属于以上第一类人，稍微多一点的人属于以上第二类人，更多一点的人属于以上第三类人。然而，即使这三类人总和加在一起，也远远要少于那些真正视死如归的中国基督徒们-----他们无论怎样也不肯放弃信仰、或是说出放弃信仰的话来-----哪怕是面临惨烈的死亡。在1900年，有极多、极多的基督徒殉道者们，他们的数量，远远超过前面的这三类人。

在以上的那三类人中，他们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

第一类的那些极少数人，就是"大米基督徒"。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人的数量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大米基督徒加入基督教只是为了获得属世的好处。当那些属世的好处不再有的时候，他们就会完全放弃教会，完全放弃耶稣基督，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当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这些人没有再返回到教会来，而是又回到了传统的偶像敬拜之中去了。

第二类人要比第一类人多一些。这些人在患难与威逼面前没有丝毫的动摇。他们坚决地拒绝否认耶稣基督，也坚决地拒绝敬拜偶像。但是，在他们被抓捕的时候，会有朋友家人来劝说。暴徒的威逼利诱不能影响他们，但是，这些朋友和家人们则苦劝他们要为自己的妻子、孩子、父母考虑。那些朋友、家人会说："我们已经为你向义和团求情了；你不需要用什么言辞来否认自己的信仰；你不需要给偶像献祭；你甚至不需要烧香；你要做的，就仅仅是走到村子里的庙门口，在那里稍微站一会，就可以了。这样，你的命就有救

了，你们全家人的命也都有救了。这样，我们村子里就不会有流血的事。你就不能为自己所爱的家人做这一点小小的事吗？你要是连这件小事都不愿意，那就实在没法子帮你了。你就彻底完蛋了，我们也没办法救你了"。

有的时候，教会里的那些牧者被抓以后，会被告知，只要他们愿意在一张纸上签名，表示以后不再与外国人发生关系、不再与教会发生关系，那么，就不会拷问他们关于教会成员的事；他们也不必正式宣布放弃信仰。事后，不少这样做的人，没有试图为自己辩解，而是诚实地承认自己的软弱，并来寻求神的饶恕赦免。

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教会中的成员们，当面临这样的患难和试炼的时候，是否能显出比这些中国基督徒们更好的见证和勇气。让我们假设，当一位美国基督徒也面临同样类似的情境的时候，如果他们在威逼下，只需要在偶像面前站一小会，或是在一张纸上签名、表示不再跟随"鬼子的信仰"，就可以挽救自己的全家人免于死亡；而否则的话，他必须要眼睁睁地看着一群暴民（因迷信而变得非常疯狂）在他的面前焚烧他的家园，杀死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最后，他也要面临惨烈的死亡、被烧成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能够想象这样的场面与选择的情境，那么，请你祷告神不要使你面临这样的凶恶与试探，并且，让我们用爱心，对待那些少数在这样的情境下作出让步的中国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不但如此，我们更应当赞美神，因为更有那么多的中国基督徒们，即使在这样的情境下，也谨守着忠贞的立场。他们在主的面前信实到底，不仅不畏自己的死亡，而且，即使面临自己所至爱、甚至超过自己生命之亲人的死亡，仍然不愿意离弃信仰，不愿意在主的面前不认主。

第三类人，是在义和团威逼利诱的面前、放弃信仰的人数中最多的一类。我们不想为这些人辩解、说他们这样做是对的。然而，对于他们，我们也仍然要以爱心对待。如果，我们考虑他们的传统习惯、以及所受的教育背景的话，那么，他们所做的事情，很可能比圣徒彼得不认主的事情而更可原谅。他们从来没有在内心里，真地想过，要放弃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即使在义和团风暴期间，也仍然在家里祷告，并秘密地聚会敬拜主；但是，他们把自己暂时在义和团面前否认参与外国人的宗教信仰时所说的话，看作是情有可原的。他们的根据是，那些义和团的威逼迫害主要是政治性质的；他们的撒谎，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是可以的。在很多地区，政府的官员们命令他们放弃信仰，让中国基督徒们在一张纸上签名、作为权宜之计，以避免麻烦。这种政治性的命令，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他们爱国主义的责任-----要求他们在中外的冲突立场之中，站在自己国家的一边。

我们要记得，在中国，即使是在那些最高的道德哲学中，以及在伟大的孔子所建立起来的理念系统中，为了家人安危和名誉的原因而说谎、掩盖的行为，不仅是可以原谅的，而且是应当受到称赞的；在今天中国的佛教或是道教中，也没有任何理念，去谴责那些“权宜之计的谎言”。在普通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在公共事务中，还是在私人情境下，精明、巧计、变通的行为、方法、言辞，都被看作是合情合理的。在整个中国，普遍地存在着对诚实无谎之品质的轻视（除了在一些生意场合下，诚信非常受到重视），因此，非常难于劝说、让中国人深信，说谎是一个罪。-----如果，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在基督教信仰中初信不久的人们，会把在威逼迫害面前暂时否认自己的信仰看作是正当之事的了。

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当传教士们被允许返回以后，这些传教士们发现，很

难让上面所述的这些人们承认、相信，那样的权宜之计的撒谎是一种罪。这些人们，仍然相信着耶稣基督，仍然愿意事奉他、跟随他。在他们的心中，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耶稣基督；但是他们觉得，那些传教士们对他们太苛刻了。然而，传教士们坚定地、也充满爱心地，向他们陈明整件事情的是非之理，终于，使他们认识到了这样撒谎是不对的，是出于罪，从而，他们真诚地承认己罪、悔改己罪。无疑地，中国本土教会在患难之中的可怕经历，也使他们更加深刻地明白了，诚实和信实的品格是何等重要而宝贵-----只有那永生的、信实的真神，才这样要求他的百姓也应当如此。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那些在传教士们举办的神学院中曾经长期上课、接受培训的中国基督徒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义和团风暴中都拒绝撒谎。他们几乎每一个人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在是与非的选择面前，都勇敢地选择了诚实的态度，哪怕是为主殉道。在那些任职于教会、作牧师或是教师职位工作的人们中，凡是经过神学院训练毕业的人们，没有一个人在威逼迫害下放弃信仰。他们都为主殉道了。而那些在威逼迫害下放弃信仰的人，往往是那些在年轻的时候受孔子文化或是佛道文化熏陶、在生命后期信主的人们。他们在基督徒信仰方面的训练，往往是很初浅的一些经历。

一个看似奇怪、但实际上不难解释的现象是，在那些杀戮最严重泛滥的地区，基督徒们在威逼迫害下放弃信仰的比例极低。这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义和团们在那些地区的杀戮非常凶狠和迅速，以至于那些基督徒（甚至那些被怀疑为基督徒的人们）中的很多人被不由分说地杀害了，根本没有放弃信仰、刀下留人的机会。在那些地区，甚至很多被怀疑与外国人有关联

的中国人都被杀害、焚烧。

但是，上面这个现象（即：在那些地区里放弃信仰的人数的比例极低），很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在现实情况中，针对基督徒最有效的逼迫方式，不是蜂拥而来的暴民与刽子手，不是疾速的屠杀和带血的刀剑；而是，家人和朋友们的没完没了的苦苦相劝，以及敌人的缓缓的威胁与恐吓。这一点，再次验证了那个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同样常见的事实，就是-----为基督死，是容易的；然而，为基督而活，并承受患难，是不容易的。有很多中国基督徒们，当面临立即死亡的威胁时，他们都没有丝毫的动摇和退缩；但是，后来，当他们面对朋友们和家人们的没完没了的苦苦相劝的时候，当他们面对敌人的屡次三番的不断恐吓与威胁的时候，他们都作了某种程度的让步和妥协。同时，另一方面，有一些平时在教会里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基督徒们，当面对刀剑与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却都勇敢地站立住了；他们都宁可牺牲也不愿放弃信仰。

总的来说，在北京、保定及其周边地区，当那些中国基督徒们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们中间放弃信仰、苟且偷生的比例非常非常低。除了上述的两个原因之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如此勇敢、舍生忘死。那就是，在1900年的春季，在北京、保定和周边地区的基督徒教会中间，发生了极大的属灵复兴------正是在这次伟大的复兴运动中，神极好地预备了这些中国基督徒们，使他们在1900年能够面对如烈火一般的苦难和试炼。

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讲述那次伟大的属灵复兴运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中英文维基百科相关信息，有编辑删节）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xer_Rebellion

义和团运动是发生于清朝末年1899至1901年间的，一场反西方、仇外、反基督教信仰的暴乱运动。义和团的前身叫做义和拳，因为其中的很多成员都习练武术；所以他们在西方也常被称为“拳击手”。在中国北方的一些农村里，流行着一股对于西方传教士的敌意情绪。1895年的清日战争（甲午战争），也使得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影响力不再增长，而是骤然停滞下来。1900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在中国北方一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干旱灾荒。1900年6月以前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在山东以及华北平原的、义和团严重屠杀和暴力事件发生之后，义和团开始变得愈加非常凶蛮。这些义和团成员们相信，他们自己在外国武器的面前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们来到北京聚集，高呼“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北京，那些位于北京的外国人以及一些中国本土基督徒们只有逃到北京的外国使馆区才能暂时保存性命。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颁布了向所有外国宣战的命令。北京使馆区的外交官们，外国公民们，数量相对很少的、保卫使馆的士兵们，以及中国本土基督徒们，在北京的外国使馆区被清帝国军队以及义和团围攻了55天。

如果前来解救的八国联军晚到几天，那么，1900年在北京的所有外国人就很可能会全部被杀死。

中国政府官员们的立场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与西方各国搞好关系。另一派则主张明里暗里地支持义和团并与西方各国开战。显然，自从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在慈禧太后领导的朝廷中，保守派占据了绝对上风。清帝国军队的统帅是荣禄。义和团事变中，中国东南各地区的省份中的官员们，互相之间签署了一份以互相保护为目的的、所谓“东南互保协定”；他们无视慈禧太后朝廷的命令，没有进攻当地的外国人。

八国联军部队共有20000人到京。他们在从天津登陆进攻的一开始过程中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后来，战胜了清帝国数十万人的大军。1900年8月14日，他们进入北京，解救了被围困在北京外国使馆区的那些命悬一线的人们。

庚子事变之后，八国联军与清朝政府签订了协议，其中包括清朝政府赔款、以及惩办战犯（包括山西知府毓贤等人）等内容。赔款金额为4亿5千万两白银；这些赔款金额超过了当时清朝政府一年的税收总额；协议规定，在接下来的39年内，中国政府要每年分期付款偿还那些赔款金额。后来，数年之后，美国等国家主动取消了那些赔款要求，并使用庚子赔款的款项在中国建立了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而且资助了大量优异中国学生赴美留学。那些中国留学生后来回到中国，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杰出而巨大的贡献。

。。。。

义和拳组织发源于山东省的内陆地区。在那片区域，社会环境中常常有很多纷乱之事，盛行许多宗教性质的民间社团组织，以及很多民间武术团体。义和拳的典型作为是，——他们的自我声称的、具有灵性的、神灵附体的表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会舞动刀剑、动作暴戾，并且同时，他们的口中会向着众神灵们念念有词地说唱着一些话语。

这种神灵附体、并且号称刀枪不入的传统，在那些山东地区具有数百年以上的历史。不过，在1890年代，这种传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因为他们的"刀枪不入"与"神灵附体"的特征，据说可以有效地对抗西方人的洋枪洋炮。义和团们手中拿着刀剑，站在西方人的枪支与炮弹的面前；他们声称自己具有超自然的能力。更有甚者，这些义和团们信誓旦旦地宣称，将要有数百万的天兵天将，会从天上降下来，以清除、净化西方人在中国的影响。

1895年，时任山东曹州长官、满族人毓贤【他后来成为山东知府，并直接鼓励了义和团的壮大与发展；1900年以前，他去山西省担任知府；这使得山西省成为义和团运动中最暴戾、惨烈的地区；有许多西方传教士以及中国本土基督徒们在山西省殉道】，与当地的大刀会合作。大刀会也是在山东的一个类似于义和拳的、半宗教性质的民间社团组织。大刀会组织的成立初衷，是为了保护当地百姓，对抗当地的一些土匪。

在这片区域，来自德国的宣教士开始传播基督福音。然而，一些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涉入到当地的一些法律纷争之事、以及当地人之间的相互争斗

中。作为回应，大刀会组织袭击、焚毁了天主教会的一些物业。在外交压力下，毓贤惩办了几名大刀会首领，但是，毓贤并没有进一步向大刀会施压或惩罚。此事之后，有更多的秘密民间武术团体在当地兴起。

起初，在山东那些地区的农村中，有各种各样的武术团体或是半宗教性质民间社团；但是，它们的目的并不统一，也没有什么整齐划一的组织或行动。在义和拳以前，起源于更早时代之前的、例如起源于明朝十七世纪的山东地区的“八卦道”（或称为“八卦教”）这样的民间武术宗教团体，——为义和团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一开始，山东各地的武术团体人士们只是更加看重传统社会价值、传统道德价值、例如弟兄义气、等等，而不是很关注外国影响力。不过，这种局面开始发生改变。有的民间武术团体或是社团组织的领导人开始明确地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他们认为，——外国的影响，都是来自于魔鬼；而西方传教士更是最基本的魔鬼；而那些跟随西方传教士的中国本土基督徒们则都是“二毛子”；——这些洋人都要被赶出中国、或是被统统杀掉；而中国本土基督徒则必须放弃基督教信仰，否则就必须也都被杀掉。

。。。。。。。。。。。。。。。。。。。。。。。。。。。。。。。。

。。。。。。。。。。。。。。。。。。。。。。。。。。。。。。。。

。。。。。。。。。。。。。。。。。。。。。。。。。。

（引述部分中文维基百科相关文字，有编辑删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89%E5%92%8C%E5%9B%A2%E8%BF%90%E5%8A%A8

1900年春季发展为武装排外；直隶成千上万习练义和拳并号称“义和团”的当地居民动用私刑处死了大量基督宗教中原信徒与外来的西人，并纵火烧毁了教堂和教徒房屋。整个运动并无严密的组织或统一的领袖，而是一场喧嚣暴戾的群众行动，行为矛盾和混乱，慈禧太后对这事的态度也多次反复，至同年6月，慈禧太后暂时决定利用并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义和团又先于清军进攻天津租界。最终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和英国八国组建八国联军远征天津和北京，引发八国联军之役。

名称与起源

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国变、庚子事变、庚子之乱、庚子拳乱、义和团之乱、义和团事件等，西方则多称之为拳乱（英语：Boxer Rebellion；德语：Boxeraufstand）。义和团原称义和拳，1899年毓贤改称义和团，义和团参与者被称为“拳民”（西方亦多以对应的“Boxer”称呼他们）、“拳匪”，义和团参与者称中原基督徒为“教民”、“直眼”、“奉教的”、“二毛子”。

宗旨与口号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不伦，女行奸，鬼子皆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神也怒，仙也烦，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独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煙，请来各洞众真仙。
神出洞，仙下山，附着人体把拳玩。兵法艺，都学全，平定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萧然。
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大刀会

清代民间武术团体。又称金钟罩，光绪20年（1894年）前后，与六壬神功活跃的时期吻合。大刀会兴起于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因此，它又被称为“曹、单大刀会”。
主要活动于鲁西南地区，以其成员练武时携带大刀而得名，练武时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主要习练排刀、排枪、排砖石等“金钟罩”硬气功。具有吞符念咒等迷信色彩，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起初大刀会是除灭当地土匪，维护地方治安，受到官方的有条件的默许。但后来在民教冲突中，大刀会开始反对基督宗教，与教会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冲突，劫掠了教民财产，烧毁多家教民的房子。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抗议下，山东巡抚李秉衡决定对大刀会进行弹压。在1896年7月斩杀了大刀会的会首刘士瑞和曹得礼。大刀会的公开活动在刘士端和曹得礼伏诛之后即沈寂。

巨野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
就在大刀会的事件已经风平浪静的时候，山东西南突然又发生了一件大教案。1897年11月1日山东省曹州府钜野县（今菏泽市巨野县麒麟镇）张家庄天主教堂的两名德国圣言会神父能方济和韩理加略在深夜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杀死，史称“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由于此地的天主教圣言会受德国庇护，因此，在11月6日，德国出兵山东，并于11月14日占领中国山东省胶州湾（今青岛）。李秉衡因而被光绪帝革职，由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到1899年3月卸任，由毓贤取代。

。。。。

山东当局对义和团的政策
在义和拳兴起之初，山东当局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拳民的积极性，在主观上有利用拳民的力量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为义和团的

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当局希望将这一民间的力量官方化，采取将拳民编入乡团的政策。

拳会是民间私立的非法结社，与清政府官办的乡团自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两者的关系在历史上基本上是势同水火。

于是山东巡抚张汝梅于1898年6月30日上奏清廷，建议清廷充分考虑“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对于匪徒，他采取杀一儆百的手段来防止群体失控，所以他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政策。他在给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中明确地表示：“（拳民）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赎、抢掠无忌等情事，亦即派队查拿”。1899年8月下旬，山东兖沂曹济道彭虞孙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拳会）阳谓自卫身家，实则寻教构衅。……时奉文举办团练，当轴（即巡抚）韪其义举，不加深察，一视同仁，意谓寓兵于农，正可备御侮之选。故有练习技勇保卫身家例所不禁之示。小人得逞其志，何所惮而不为”。此外毓贤还采取了“惩首解从”的政策，就是当拳民滋事之时查拿首要，而将随从人员解散。由于官府采取了这些特殊政策，尤其是在毓贤治下，义和团在山东得到了很大发展。【后来毓贤从山东卸任，袁世凯担任山东长官。由于袁世凯对于义和团的镇压政策，所以，在1900年义和团暴乱期间，山东省本地反而没有什么动乱。同时，另一方面，1900年前毓贤赴任山西政府长官，并在那里大力支持和挑唆义和团暴乱，从而导致1900年期间山西省成为义和团灾祸最严重之地。1900年义和团暴乱事变之后，在西方国家政府的压力下，慈禧太后的清朝政府把毓贤惩办处死。】

。。。。

从神拳到义和拳

在山东西南地区的大刀会和直隶山东交界的赵三多义和拳被镇压下去后，山东西北地区的茌平、平原、高唐、恩县、禹城、长清等县突然兴起了一

种新的拳场，当地人称之为“神拳”。最开始的时候它也被人称为“金钟罩神拳”，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借用了鲁西南地区大刀会的金钟罩武术和“刀枪不入”的观念。神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降神附体”，仪式简易，人人可参与。大刀会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入会需要交香火费。但神拳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谁都可以参加。另外大刀会的金钟罩武术属于一种硬气功，需要较长时间的练习。但神拳不一样，他们不是通过练习达到，而是在各种拳术的基础上，通过“降神”来完成。

练习神拳的人中逐渐出现了两个著名的人，那就是朱红灯和心诚和尚。1899年朱红灯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名声，附近贫苦民众纷纷拜朱红灯为师学习神拳。后来，神拳也改名为义和拳。但从大刀会到赵三多的义和拳，再到朱红灯的义和拳，之间并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系。朱红灯所领导的义和拳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和拳，具备了1900年义和拳的所有特征。从大刀会中借用了金钟罩和“刀枪不入”的观念，从赵三多的义和拳借用了名称、扶清灭洋的口号等，然后加上了降神附体的巫术。

。。。。

己亥建储

【本书作者注：1898年的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软禁光绪，推翻了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中所颁布和实施的一系列维新变法、改革的法规政策，并宣布自己亲自训政】。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中南海瀛台。而康有为在逃亡海外时对外宣称，握有光绪帝密诏。慈禧太后担忧“密诏事件”扯出光绪帝涉入，恐动摇自己训政的正当性。慈禧太后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收继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儁为义子，称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本书作者注：慈禧太后推出的这个立储君的措施，是为了试探天下群臣与民意、尝

试为废除光绪帝位作准备。这样，将来如果真的能够成功废除光绪帝位，那么，慈禧太后就可以再次名正言顺地垂帘听政】。【本书作者注：端郡王载漪是清朝皇室中著名的保守派强硬分子；他一直强硬地主张排外，甚至不惜与外国开战。后来，在1900年义和团暴乱事变中，满清皇室朝廷中的端王爷是对义和团最得力的高层支持者之一。正是由于在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满清皇室多人以及朝中一些保守派重臣的明里暗里的强力支持和挑唆下，——义和团才得以大批进京，并掀起了向北京外国人进攻的巨大攻势、武装攻击；这些义和团在北京等地得以大行杀戮，杀人放火无数，屠杀外国人以及那些中国本土基督徒、和那些接近外国人的各种行业的中国人。】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经元善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端郡王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更为仇恨。

清朝皇室中的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名同族兄弟，以及满足大臣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如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和打击洋人势力。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儁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

晚清时翰林院编修恽毓鼎曾指出："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适义和拳起，诡言能避火器，以仇教为名，载漪等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

靴搔痒之谈也。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

。。。。

山东和直隶的自然灾害

义和团并未从山东扩展到河南、安徽等地，而蔓延到直隶，是与当地的频繁天灾有直接关系。1898年黄河洪水水灾；但1898年洪灾之后，1899年、1900年山东、河北又连遭大旱；同时，山东又遭虫灾。迷信的百姓遂迁怒基督教徒和教会，以为是他们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的反教揭帖就说“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26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

。。。。

1899年末山东和直隶的冲突

于清水、朱红灯、心诚和尚

关于于清水、朱红灯、心诚和尚，清政府档案比较丰富。1899年秋天，在鲁西北，于清水、朱红灯，心诚和尚带领的反教运动开始登上舞台。9月17日，在鲁西北的平原县发生民教冲突，平原知县蒋楷前去弹压。10月9日，

朱红灯率高唐、茌平、长清等地义和拳众二三百人开赴平原县。朱红灯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1日，知县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往弹压。朱红灯指挥拳民击败蒋楷。蒋楷向上级要求派兵。16日，济南知府卢昌饴、统领袁世敦带兵前来，一开始劝谕朱红灯解散。朱红灯抢劫之后转移，于17日晚，率两千多团民移驻森罗殿，准备攻打恩县城西的刘王庄和庞庄的教堂。18日，朱红灯率团民在森罗殿与前来弹压的清军七百人交战，激战数小时，击毙击伤清军十余人。在此次战斗中，拳民第一次自称“义和团”，而且此后这个称谓的频率越来越高。森罗殿之战后，朱红灯趁机转移，退回茌平。

毓贤认为蒋楷处事不妥，弹压实属不当，将蒋楷革职，永不叙用，袁世敦受到了撤去统领之职的处分。镇压义和团的人受到了惩处，使得许多人认为毓贤在支持义和团，自以为受到了毓贤的嘉许。11月初，茌平义和团竖起了“毓”字黄旗及山东巡抚部院“保清灭洋”大旗进行活动。

11月，朱红灯、心诚、于清水率人开始对禹城、茌平、长清、博平各县的天主教教堂和教民频繁发起袭击。4日，他们袭击禹城县苗家林的四户教民。8日在刘家集袭击教民，又袭击长清县李家庄李公堂家，夺取银钱，拐走其父，要求赎金二十千文。9日，掠夺王香老庄的教民；袭击长清县的郑家营和朱庄的教民；当夜，入茌平张官屯，掠夺教民之家并放火焚烧，又将教民王观杰杀害；向马沙窝的教民父子三人勒索赎金。9日、10日、11日，连续抢劫梁庄、姚家庄、吴官屯、小张庄、八里庄、焦庄的教民。11日，来到博平县，抢夺和绑架教民，要求赎金。14日，烧毁博平县玉皇庙庄教堂与十九户教民房屋。15日，烧打茌平县大张庄教堂，其后强制教民背教，要他们请戏班唱戏作为赔偿。17日，朱红灯、心诚袭击了吴庄、杨庄，得银七百两，接着又袭击了博平县的教民。

在17日，拳民因分这七百两银子起了内讧。21日，朱红灯被拘捕；同日，

赵官镇李继浩率十余人袭击了长清县辛店屯的教民王鸿庆等六户人家，胁迫他们用银子赎“跟从洋教罪”，请戏班子演戏三天，去县城申请退出教会；然后又去南水坡庄，要挟三户教民拿出罚钱和酒席钱，更让教民写下“背教文约”。23日，心诚和尚被抓捕。24日，李连江、李开木等人袭击了马官屯的教民。25日，于清水到禹城县抓了教民作为人质，26日袭击了禹城的房家庄。此时禹城当局接到毓贤命令后贴出告示：“汝（义和拳）原为良民，因受教民欺侮始聚集以图报复。然，仇怨宜解，且抚宪已既往不咎，受此莫大之恩，故应速速解散。谨勿再啸聚。此乃至要。”

朱红灯在鲁西北开展一系列反教运动之后，山东的德国天主教会产生了危机感，陆续与驻北京公使联系，诉说自己极其危险的境况。各国公使、领事的抗议不断增加，并将矛头直指山东巡抚毓贤。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说毓贤将弹压匪徒的官兵以“擅杀之罪”论处，指责毓贤对保护教会和教民的要求置若罔闻。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终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袁世凯接替。12月6日，上谕下达，吩咐毓贤“来京陛见”。7日，毓贤答复：“俟袁中丞接印，遵即北上。”

12月4日，李继浩、官东岭、王成章在仁里集附近的辛店屯向教民勒索钱财。6日，李继浩胁迫教民办迎神赛会，逼迫教民背教。8日，李继浩、官西岭、汪昌沅、朱启明在辛庄勒索。20日，官东岭、朱启明等人袭击燕家窑孔家。21日，袭击柴家洼教民，索取赎金。24日，袭击三官庙平民魏家，南乡的封家庄、李家庄教民。 24日，毓贤在离任前处死朱红灯、心诚。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

26日，袁世凯抵达济南。26日白天，有一支拳民队伍到平阴县毛家铺抢劫教堂和数户教民；当晚，有约两百拳民袭击了平阴县的白云浴天主教堂。

28日，拳民袭击翟家庄教民。30日，拳民袭击薛庄教民；同日，甲士卫等人火烧了袁儿庄的教堂，烧死一名妇女；这日，赶往平阴的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在路上遇到三十名拳民，被抓。晚上，卜克斯趁机逃跑，后被追上打死，头也被斩掉。1月2日和3日，拳民袭击南方寺头庄。

衡水沧州

直隶东南毗邻鲁西北，所以在这一带的故城县、景州、吴桥县、阜城县、东光县、献县、河间、深州、枣强县，反教活动在1899年末也渐渐兴起。10月30日，景州宋门镇大集之日，拳民在很多人面前表演拳术。大师兄称可避枪炮，降神之后，令徒弟持枪射击，岂料枪子一发，即中胸，流血倒地而亡。之后拳民诬赖教民，说教民用物厌胜，故神术不灵，非将教民杀害补偿不可。11月1日，上千名拳民来到宋门镇，试图以教民的血来偿还。知州王兆骐派军官前去说服，在一千人以上的拳民面前，一连劝说了好几天。11月13日，拳民退出宋门镇，但附带提出如下条件：第一、官府出钱举办筵席，第二、出三百贯铜钱请戏班唱酬神戏，第三、官兵在义和拳的神位前磕头。知州王兆骐因手下兵力不足，最后只好妥协。

11月初，武修和尚在阜城县林镇村竖起“神助灭洋义和团”旗帜。24日，拳民抢劫阜城县林镇村教堂和教民。27日，拳民袭击了景州两个有教民的村子。28日，袭击阜城县徐家铺教堂。30日，袭击东光县常庄教堂。12月初，直隶总督裕禄派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率军自天津向河间府进发，保护教堂。4日，拳民袭击阜城县耿家庄教堂。9日，绑架景州河渠镇两名教民。10日，拳民抢劫景州苏古庄教民，又破坏阜城县八里庄教堂，并袭击了武邑县小李村、石海坡教民，以及阜城县小营村教民和深州西河头村教民。10日左右，梅东益麾下三营开始分驻各州县，阜城县、故城县、吴桥县、东光县、景州各知州知县会于景州，商议对策。11日，拳民袭击了深州王乐寺村教民；放火焚烧苏古庄的教堂和教民房屋。12日，拳民烧毁景

州刘八庄教堂和教民房屋十余间。13日，景州谣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同日，拳民在枣强县邹街袭击教堂和教民。会于景州，商议对策。11日，拳民袭击了深州王乐寺村教民；放火焚烧苏古庄的教堂和教民房屋。12日，拳民烧毁景州刘八庄教堂和教民房屋十余间。13日，景州谣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同日，拳民在枣强县邹街袭击教堂和教民。

清军基本上采用了查拿首要、解散胁从的办法，只有在拳民抵抗官兵、拒绝解散时，他们才加以镇压。官员比较谨慎，不敢轻举妄动，12月14日，景州知州王兆骐及营官吴有珍和范天贵致电请示裕禄：“督宪钧鉴：真电谨悉。总堂已带队保护，如不服弹压，官军众寡悬殊，危急之际，应否击打？请示。兆骐、有珍、天贵。”裕禄回复：“拳民如不服弹压，胆敢抗官拒捕，该营官等自应督队奋力捕击。”

12月14日，在景州岔道口村，拳民焚烧教堂，抢劫教民。同日，安平县拳民摆出攻打教堂的架势。15日，袭击了德州恩县明恩溥所在的庞庄教堂，又袭击了枣强县三岔口教堂。16日，东大过村拳民和教民发生冲突。17日，拳民扬言要在当日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18日，武修和尚率人袭击朱家河天主教堂（此处在1900年夏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惨案），与范天贵带领的官军发生冲突。武修被拘捕。19日，王庆一策划的梆子戏“火烧望海楼”在故城县上演。20日，东大过村再次被拳民包围。同日，拳民抢夺了萧张镇教民数十家，带走数十人；袭击了河渠镇附近的羊牧教堂。22日，保定府束鹿县拳民绑架教民索取赎金。24日，二三千拳民聚集在武强县小范镇。31日，山东德州拳民聚集于吴桥县的孙公庙，烧了庞家桥教堂和六家教民房屋。1月9日，拳民火烧清河县大寨庄教堂。15日，宁晋县南孟村数百拳民掠夺并打伤教民。但因官军已驻扎在各州县，也因为农历新年就要来到，拳民忙着过年，故此后骚乱减少很多。

。。。。

1900年的冲突

直隶当局对义和团的政策

袁世凯来到山东之后，采取了与毓贤不同的作法，他认降神附体为邪术、拳会为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下令张贴解散拳会的告示，要“于各府州县村庄通行张贴，以期家喻户晓”；还大量刊刻劳乃宣所著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宣传义和团即白莲教；采用行政手段调动各级地方官、乡绅的力量来实行查禁，责令“各村首事庄长出具不得设厂习拳甘结”，要求各村庄的庄长劝导乡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对各处拳厂，认真查封；把大部兵力分布在交通要道驻扎，将各地义和团分割隔离，阻止其流动和聚集，用小部巡查、晓谕、弹压。如此，袁世凯使得山东的义和拳活动渐渐沈寂。山东的义和团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

直隶总督裕禄在1899年12月答复袁世凯时说：“近日查该拳匪情形，并无大技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他对滋事的拳民极力镇压，但对拳会的态度则较为模糊，直到5月清军统领杨福同在涞水被杀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1900年1月11日，慈禧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承认拳会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

慈禧的这一举动代表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结社，把集会结社看做是谋反的潜在因素。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恢复了禁止结社的政令，以取缔在百日维新期间十分兴盛的各种学会。现在，慈禧的这一政策是在告诉义和团，它是一个合法的组织。

但袁世凯事实上并未理会朝廷，仍然积极取缔各地拳会。裕禄没有主见，一心想遵循谕旨，因此义和拳会在直隶继续蔓延，义和团的活动有增无减，加入义和团的人数也在日益攀升。

1月11日慈禧太后的上谕让各国公使感到担忧和不安，于是在1月27日，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第一次联合照会，要求慈禧取缔拳会。但公使们选择的日期非常不妥，三日前的己亥建储，公使们都拒绝入宫朝贺，明显反对慈禧废掉光绪帝，让太后大为不悦；如今（当日为农历腊月二十七），他们又来要求禁止拳会，慈禧的愤怒可想而知，这为1900年的冲突买下了伏笔。

2月19日，慈禧采用内部廷寄的方式指示直隶、山东督抚，责成他们张贴布告，取缔义和拳："著直隶山东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严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廷寄的方法，既没有公开否定1月11日的上谕，又能给外国公使们一个说法。但各国公使们并不接受慈禧的做法。3月2日，英、美、德、法、意第二次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京报》上发布禁止拳会的上谕。慈禧予以拒绝，并解释说已寄发廷寄，没有必要在《京报》发布上谕。

3月中旬，一位从霸州赶往北京的美国传教士见证说："行程有数百华里，不过见有两处张贴北洋大臣之（禁止拳会）谕示……地方官虽已接奉此告示数日，犹不愿张贴"。到此时，直隶的地方官员仍然没有危机感，连谕示都不张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所以义和团一直向四面扩展。

3月14日，毓贤调任山西巡抚。山西本没有义和团，但是在毓贤的鼓励下，义和团也在山西兴起。这年夏天，毓贤纵容义和团滥杀教民，其卫队数十人都是义和团团民（参见太原教案）。

4月初，各国公使又一次联合照会，而且有海军示威。4月16日，京报上发表了直隶总督裕禄要求禁拳的上奏。但4月17日，京报上又颁发上谕，重申不禁拳的精神。4月21日，慈禧太后又颁布上谕，重申"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与1月11日的上谕精神一致。慈禧政策的反复性和随意性，让各国公使失去了对它的信任，觉得再在此事上纠缠也没有多大意义，遂放弃在此事上的要求。义和拳会继续蔓延。

5月初，慈禧就能否将拳会编为团练征求袁世凯和裕禄的意见，裕禄在5月17日（当时涞水事件已经发生）上奏否定了团练的建议，但接着说："如查有学习拳技之处，谨遵前奉谕旨，只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分别妥为办理。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

5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这是在1900年颁发的有关义和团的诏谕中第一次使用"剿"这个词，之前均是但论匪不匪，不论会不会，拿办首要，解散胁从。

但外国公使并不信任清廷，而且丰台车站的被焚让他们特别紧张，所以5月30日，公使团通知清廷，要调遣使馆卫队进京保护。
6月3日，因御史许佑身弹劾涞水县令祝芾“怂恿带兵官杨福同诱杀十余人”，清廷颁布上谕，命令裕禄“确切查明，从严参办”，并严行申诫带兵员弁“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不可操切从事”，并警告荣禄对义和团“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

6月6日，裕禄电告总理衙门，称团民自焚毁铁路电杆之后愈加猖獗，明目张胆，不服劝谕，也在天津焚杀教民；虽芦保、津芦铁路有兵分守，仍肆意焚毁，在各处拆毁教堂，各国洋人已甚忧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感惊恐，屡以中国办理太松，欲派兵助剿为言，此时我军自行剿办，尚可操纵自如，若至外人干预，则事更难措手”，目睹现在情况，拳民断非劝导所能解散，“趁此匪势初起，必须剿抚并用，尚可克期而定”。

从6月1日直到宣战前，清廷因为与列强还没有撕破脸，还维护表面的友善，为了堵住洋人的嘴，仍然颁布上谕喊着“查拿”、“严禁”、“解散”；6月13日的上谕仍然说：“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迭经明降谕旨，晓谕解散，并饬令京营及近畿各军，分投妥为弹压”，但实际都徒具形式而不起实际作用，喊叫愈甚，义和团之涌入、滋扰也愈甚。

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说：“谨案五月（阳历6月）以来，有禁团民滋扰禁城谕旨七道，严饬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及派出之统兵大员，缉拿首要，解散胁从，撤坛拆棚，至矣尽矣。乃禁者禁而为者为……，虽明

诏煌煌，不特团民蔑视无关，即地方官吏亦视若弁髦（无用之物），是则诏谕直等于官样文章耳”。当各县令去向顺天府尹王培佑“请示机宜”，询问应如何执行“拿办”义和团的上谕时，王培佑答复说：“近日拿匪明文，非政府之意，特以西人哓哓不已，故发此旨。汝等奉行故事，即属尽职”，意谓敷衍一下就可以，根本不必认真执行，“否则定遭参办”，各县令始恍然而退。

。。。。

北京

6月1日，义和团一部占据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杀英国传教士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及孟鹤龄（H. V. Nerman）二人。
6月4日，义和团在京津线上的黄村火车站放火，聂士成派兵弹压，团民抗拒，官兵寡不敌众，死伤多人。后团民焚烧车站一所，旱桥一座。
6月5日，奏请发给义和团口粮的王培佑由鸿胪寺卿升为顺天府尹。
6月6日，义和团焚毁落垡车站，聂士成前往弹压，双方激战。

6月7日，在慈禧太后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

6月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并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永定门内。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兄弟。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拳民陆续进入北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

6月10日，慈禧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受到载漪的嘉许。

6月12日，义和团开始在内城焚烧教堂。
6月13日，义和团在内城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13日，天津武清义和团焚毁了马家场、范家庄、洪家坟、牛房、龙庄、韩庄各处教堂，静海全县被义和团占领。

6月14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又焚烧西城根拴马桩、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之房屋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同日，天津拳民焚烧鼓楼东仓门口教堂，蔓延到附近二十家，又焚烧鼓楼西的伦敦会教堂。

6月15日，义和团围攻北京西什库教堂，又"焚烧绒线胡同教堂"。同日，天津的义和团焚烧了马家口及望海楼等地的教堂，拆毁东门外天后宫北教堂，砸毁藏有教民的釉店街怀庆会馆；拳民又与防卫紫竹林租界的外国士兵发生战斗，死伤四百人。

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商铺因老德记洋货铺及屈臣氏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二毛子而烧死戮死。同日，天津数百名义和团展开了第二次进攻紫竹林租界的行动，但被一阵齐射挡了回去。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街头被清军杀死。

6月22日，慈禧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并悬赏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

。。。。

联军从威海卫出发第一次远征

先是在5月底，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人员在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时，向外发出求援，于是一支432人，由八国海军人员组成的联合部队（法国75人，俄罗斯79人，英国79人，美国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水兵51人、奥匈士兵32人），在得到慈禧默许后，于6月1日从大沽经铁路抵达120公里左右的北京城，协助使馆人员防守。

不过随着局势不断恶化，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透过电报向西摩尔

称，北京城内局势每小时正在恶化，要求西摩尔为进军北京作好预先安排。6月10日，北京使馆区与外界的电讯联络中断。因此各国急商，增派一支由2157名各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英军916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义军40人、奥匈军25人）组成的援军入京，决定由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任联军司令，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司令、俄国上校沃嗄克任参谋长，从天津搭火车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6月10日，西摩尔军经过聂士成军防区，根据上司荣禄的命令，聂士成容许联军先遣队火车通过天津，旗下武卫军士兵对联军的态度亦显得友善，并没有意图攻击联军的举措。

不过西摩尔向北京行军的举动惹怒慈禧，因此支持义和团的端王载漪迅即取代庆王奕劻，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命令武卫军聂士成、董福祥甘军攻击联军。另一方面，清廷又透过招募义和团成员入军，以保卫首都，阻止西摩尔的行军。

联军火车通过天津后，义和团阻击联军，将铁路破坏，使联军无法前行。在6月11日至14日的几次战斗中，义和团每次出动几百到上千人，都被联军击退。由于前面的铁路被破坏，西摩尔军只得边修路边前进。到廊坊之后，前面的铁路被破坏得更加严重，联军无法乘车前行。16日，联军放弃由铁路进京计划，决定改走水路由白河前往北京，先返回杨村，然后在该处组织乘船进京。

6月18日，正当西摩尔军由廊坊回撤之时，大批义和团向滞留廊坊的联军发起进攻，奉太后之命阻截联军的董福祥甘军开到廊坊，投入战斗。双方激战数小时，联军伤亡严重，西摩尔认为联军已不可能突破重围进入北京，于是决定撤回天津。清政府称此役为廊坊大捷。

由于杨村至天津的铁路已被破坏，联军只得沿白河撤回，期间征用4艘中国渔船，沿着河岸牵着绳索，载上所有伤员及剩余的食物、弹药及医疗用品前往天津。6月19日至20日在由杨村至北仓的撤退途中，联军不时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6月21日联军与聂士成军在北仓进行了数小时激战，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占领北仓。6月22日联军占领清军的西沽武库，发现除了有德国克虏伯野战炮外，还有大量步枪与数以百万计的子弹，连同数百万斤大米和充足的医疗用品。得到充足的军事物资后，西摩尔决定坚守待援，并派人向各国公使告知联军的困境。联军在待援期间遭到清军、民团日夜不断的攻击，处于崩溃的边缘。直到6月25日，一支1800人组成的援军（其中俄国900人，英国500人）解西摩尔之围，终于在6月26日清晨成功接应西摩尔联军撤退，西摩尔行军北京期间总计损失62人，有225人受伤。

当时被困在北京使馆区的外国人对西摩尔充满信心，认为西摩尔军队离自己很近，他们很快就会安全，并未得知西摩尔的军队拯救失败的事实。

。。。。

紫禁城内的斗争与宣战

1900年5月30日，赵舒翘、何乃莹上奏慈禧，建议招抚义和团：“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

进入6月之后，义和团拆毁铁路、焚烧车站、攻击教堂、杀死教民、威胁在华外国人生命安全，局势越来越危急。张之洞、刘坤一及其他主和派大臣

频繁提醒，一味姑息拳民不加剿灭必然导致列强以保护传教士为由而出兵中国。虽然慈禧也知道不剿办义和团意味着严重的国际介入，但她仍坚持之前对义和团的怀柔政策。

6月4日，招抚义和团的何乃莹由顺天府尹升为督察院左副都御史。

6月5日，太后派刑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的赵舒翘，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

反对戊戌变法、力主废黜光绪帝、主张招抚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吏部尚书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也紧随其后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全是假的，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

6月6日，慈禧召集大臣讨论清廷的政策，“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

恽毓鼎在6月6日记载：“五月初十日，知太后圣意，颇右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之计。”

同日，清廷颁布上谕说：“饬令各地方官妥为弹压，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昨已简派顺天府兼尹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宣布晓谕。”

6月10日，慈禧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一决定让外国公使格外不安。

6月13日，义和团从崇文门进入北京内城。

6月14日，刚毅上奏：

义和团其幼稚者，年不过十岁上下。奴才在马上讯其练拳意欲何为？供称原为保护身家。讯其聚众欲作何事？供称近被教民欺压，是以集团报复。但一言及洋人，则怒目切齿，愿得肝心。凡此之类，闻直隶、山东各州县，无处无之，蚩蚩之众，诛不胜诛。因聂士成派队在高碑店驻扎，拳民等误为洋兵，遂相抗拒，经该军饬人晓谕，该民等跪迎，聂军出其不意，轰毙拳民一二百名，自此结仇甚深。该军进剿，殊形孟浪。

6月16日，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刚回京不久的刚毅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6月18日，【主张理性对待西方国家、压制义和团暴民的】袁昶奏折说：臣于上年十月十三日（1899年11月15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教为名兹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十余巨股，东省晏然。……不意东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省督臣观望迁延，养痈贻患，听其蔓延，始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迹昭著，乃电奏力请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处。

6月19日，在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下定决心向各国开战，命令清军准备攻打使馆区。光绪帝拉着许景澄之手说：“兵端一开，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君臣涕泣。太后大喊“许景澄无礼”。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廷设计刺杀。

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号召全国军民抵抗

攻击者。

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要杀死光绪帝，被慈禧太后阻止。

。。。。

东南互保

1900年5月3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报："叠接北路电，拳匪因闹教滋事，势甚猖獗，定兴至卢沟铁路机厂车辆料厂尽毁，实堪骇异……此等匪徒，抗拒官兵，戕杀武职大员，毁坏国家所设铁路，法所当诛。至于动手拆路焚屋之徒，按律亦当格杀勿论，应准官军开枪轰击。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涉，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若滋闹不已……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民为词，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

几日之后，张之洞致电许竹筠说："辅清灭洋旗号，乃会匪故智。前年川、楚闹教，乱匪皆是此旗。若因此姑息，大误矣，能避枪弹更是谣言。"

6月8日，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总理衙门："惟匪势如此猖獗，毁路踞涿，种种不法，名为忠义，实为叛逆，即使宣布解散，亦难保不散而复聚，蔓延日久，收拾益难。现闻大沽已有洋舰二十余号，万一出而干预，大局何以支持？畿辅重地，关系匪轻，似应一意主剿，通剿二股，则余股自灭；辟以止辟，正所以保全民命也"。

6月15日，张之洞、刘坤一联衔致电总理衙门，请即速剿办义和团。电文谓："……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乱，悔不可追。"

6月20日，张之洞、刘坤一联络几省巡抚联衔电奏慈禧："各国洋电，皆以拳匪妄杀生衅，我不速剿，致动众怒，日本电谓，若肯剿匪，尚有转机，京城危机，北望焦灼。……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满布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仰恳皇太后、皇上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

慈禧太后宣战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湘军江忠源旧将）、两广总督李鸿章（淮军领导人）、铁路大臣盛宣怀（父亲盛康是湘军胡林翼的军需官）、山东巡抚袁世凯（淮军吴长庆的旧部）、闽浙总督许应骙（族叔许祥光曾与湘军江忠源一起镇压太平天国）等大臣们，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

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袁世凯等，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

大臣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命令，除灭义和团。

另外，同时密议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与太后不测，他们将改建共和，选举李鸿章为总统。

。。。。

清军进攻北京使馆区

6月20日前，义和团对使馆的唯一进攻性行动发生于6月14日。据窦纳乐记载，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显然，这只是少数义和团的零星活动，并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6月20日之后，义和团对使馆的围攻也只是辅助性的，围攻使馆的主力一直是清军。

6月20日下午四点，清军开始攻打使馆，遂展开了55天的围攻。6月20日至24日，攻势比较猛烈。6月25日短暂停火，之后很快开始了更加猛烈的进攻。窦纳乐报告说，6月25日夜半重新开始的射击，是“迄今所遭受的最猛烈的炮火”。6月25日至7月13日，几乎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7月13日，清军发动空前猛烈的全线进攻。7月14日，进攻减弱，更大的变化发生于7月16日，即天津陷落两天之后。此后，对使馆的进攻暂时停止。

。。。。

清帝国与美国的外交

美国于7月3日经驻外使馆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匈、比利时、日本、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发出照会，再度申明门户开放政策。

1900年7月3日通告，美国的政策与目的说明（发往驻华列国使团。通告电报送交美国驻柏林、巴黎、伦敦、罗马、圣彼得堡大使馆以及美国驻维也纳、布鲁塞尔、马德里、东京、海牙、里斯本使馆，华盛顿，国务院，1900年7月3日）：——

在这一中国事务的危机态势中，在现有情况的准许下，我们认为说明美国的态度是适当的。我们坚持1857年制定的对华和平政策。这项政策坚持和中国友好相处，并在治外法权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国家法律之下，促进合法商业贸易，以所有手段保护我们公民的生命财产。……迄至今日，美国总统的目的是与其他国家协同行动：首先，与北京对话并营救美国官员、传教士和危难中的其他美国人；其次，努力尽一切可能保护中国各地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第三，保卫所有美国正当的利益；第四，帮助防止动乱扩展到这个帝国的其他省份，出现同样的灾难。当然，现在预计以什么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为时尚早；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种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的目的是能够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保护一切友好国家在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下一切权利；维护世界各国与中华帝国各地（之间）的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

清帝国派驻美国的公使伍廷芳得知了美国的政策之后，分别向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通报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以及坚持保护中国领土以及行政管理完整的立场。

为了收拾慈禧因信任保守派大臣而制造的危局，光绪帝恳切地请求外援，在7月19日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麦金利，在信中表达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和友好之情，表示对中国目前局势的严重担忧，要求美国为中国维持和平作出努力。

以下是英文的译文：

中国长久以来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且深深意识到，美国的目的是从事国际贸易。中美双方对彼此均无怀疑和不信任。最近爆发的中国人与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相互的憎恨，引起了列强对朝廷立场的怀疑，认为清政府赞成人民歧视传教，此怀疑并无根据。但是这种怀疑引起了大沽炮台被攻占，并由此引发了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军事冲突。情势日益严峻危机。我们刚刚收到我们使节伍廷芳的电报，我们十分欣慰地得知，美国政府一直期待两国的友好往来，对目前状况十分关注。目前的中国被不可抗拒的进程所驱动，不幸招致国际上几乎普遍一致的愤慨。为了解决目前的困境，中国对美国寄予特别的信赖。我们诚垦率直地致信于您，希望阁下想方设法，采取行动，协调各国一致为恢复秩序与和平作出努力。恳请您，并万分焦虑地期待您的回复。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900年7月19日）。

经过三天对中国政治局势、权力结构以及北京暴乱情况的分析判断，美国总统在7月23日作出回应。他没有拒绝光绪帝的请求，但前提是：清政府保护公使馆人员的安全，保证使馆与各国联络畅通，配合各国的军事援救行

动。

美国总统回信说道：——

我收到了您7月19日的信，我欣慰地获悉您了解，除了希望正义与公平之外，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别无他求。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解救我们处于危难中的公使馆，保护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依据国际法和协约，这些是美国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所有其他派军队抵达贵国的国家也公开表达了他们派兵出于同样目的。从您的来信中我推断，那些搅乱中国和平、谋杀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人员，而且目前围攻幸存的北京外交人员的罪犯，不仅没有从圣上您这里得到赞同和鼓励，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反抗陛下帝国的权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十分郑重地敦促您的政府，向公众确证：一、是否外国领事们还活着，如果活着，他们目前状态如何；二、立即让各国的外交代表与其国家自由联络，解除威胁他们生命与自由的所有危险；三、由帝国当局与远征军联络沟通，以便他们之间开展解救公使馆、保护外国人和恢复秩序而进行的合作。如果这些目标都能达到，本政府相信，在西方各国这方面，妥善解决最近的麻烦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将不会存在任何障碍。为达此目的，在其他各国的赞同下，本政府各友好部门将愉快地接受陛下的部署安排。
——威廉麦金利1900年7月23日国务卿约翰海复述

但是光绪皇帝无力主导时势发展，也无法改变清廷的政策，原因在于慈禧太后已宣布训政，朝廷大政由慈禧主导。不过他的的善意、努力，体现了作为一个君主的负责任的态度。

。。。。

8月1日起，清军恢复对使馆的炮击，但猛烈程度远不如7月13日以前。

8月11日起，清军重新对使馆发动猛攻，直到北京陷落为止。

8月4日，联军开始进军北京。8月12日，占领通州。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

。。。。

占领北京

联军占领津京后，当地排洋、仇洋的风气大变，街头一改人人包红布、穿红衣义和团打扮，天津百姓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时人记载：“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娟敌，载道口碑，京师及各省都会，其翻译通事之人，声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中之人，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举者，今皆改而从事于此途。”

在北京，始于6月20日止于8月14日、对使馆五十多天的围攻终于结束，此时使馆里的人员已经狼狈不堪。

以樊国梁为首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发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18日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夺生活必需品，规定抢夺不满白银50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两的，应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樊国梁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否认下令抢劫，而是因为当时无店有人，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才自行搬走，但他下令要登记拿走多少，事后依记录付了款。

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发生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决意报复中国，瓦德西于8月7日被任为德军总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军在联军攻进北京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

威廉二世7月2日发布命令说："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

八国联军中，德俄两军被普遍认为在镇压义和团中最为野蛮凶悍，而且军纪较差，德军因其凶悍被冠以绰号为"匈奴"。而美日军队被认为"严守纪律，不扰居民"。

。。。。

庚子俄难

1900年7月17日至21日，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俄罗斯帝国以义和团破坏东清铁路为借口，对海兰泡和清朝管辖下的江东六十四屯两地中国居民进行大屠杀，共造成约7000名中国无辜居民死亡。

庚子俄难的称呼来源自周继功的《庚子俄难》一文，该文被收录于《瑷珲县志·第八卷》。因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所以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被合称为庚子俄难。

庚子俄难中，海兰泡惨案的目睹者，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

一位参与大屠杀的人对屠杀场景有如下描述：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牲。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连俄国的一位将军也在日记中写道：黑龙江悲剧是俄国人避而不谈的话题。

。。。。

各方历史记载

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原称为八国联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且改以前主流舆论对义和团的批评为颂扬。

不过，台湾史学界不存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命题。

。。。。

辛丑条约

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9月7日，慈禧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同时，慈禧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向八个占领国展开谈判。当中俄国志在另约取得中国的东北；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此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

慈禧太后一直被视为义和团事件的罪魁祸首，因此李鸿章在“惩办祸首”的问题上与列强多番据理力争，最后得到保证，列强在“惩办祸首”的条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变相不再追究慈禧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主要责任。

此外，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作为战败国的中国，不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世凯就从他武卫右军挑了3000人，换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务，变相收回了京津沿线主权，这支三千人的部队就是中国最

早的警察队伍。仅用了半年时间，天津就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需要向各国给予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分39年偿还，史称“庚子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这个数目的意味着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对此申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过于要挟也。”

赔款的总值按当时银价，约为3亿330万美元。这笔赔款金额过于庞大，后来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美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的交涉下，美国退还了部分赔款。

应付赔款2444万，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基础。

其他收款各国也都陆续模仿这一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退款来进行指定用途的在华文化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停止向这两国赔付庚子赔款。一战后到1924年中国政府先后与德奥匈俄达成了停付的协定。

其他各国也都先后达成了全部或部分庚款退款协定规定将此后收到的庚款用于指定在华事业，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起停付日本款，1939年停付法国庚款，1943年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从此彻底停付。

。。。。。。。。。。。。。。。。。。。。。。

殉道人员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华人基督徒死亡（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及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教职人员及中外信徒皆有死伤。

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统计，共有两万多名中国教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此外还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死亡。单在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工作的新教传教士中，就有五十八人殉难，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儿童遭害。但戴德生后来拒绝了清政府为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作出的赔偿，借此向中国人民彰显“基督的柔和谦卑”。

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山西巡抚衙门前，山西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

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1900年时任山西巡抚为毓贤。

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直隶（今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在清初与清末传教士的影响下，直隶有相当数量信仰天主教的农村，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抵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任德芬、汤爱玲两神父，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隶东南代牧区，共有50575名教徒，在庚子事变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几乎全部被毁，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得以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父。7月3日，义和团联合清军摧毁奉天小南门外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纪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余名信徒全部烧死在堂内。

此外，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未有统计（单北京死

于义和团手下的民众有数万人）。

。。。。

影响与后果

对清末政治

义和团运动的结果：慈禧打消了废除光绪帝皇位的念头，但持续训政；另一方面则延续戊戌变法的思潮，启动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政府倒台。

在汉族仕绅阶级看来，满人的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督抚在事件中擅自违令行动，事后反而得到褒奖（即东南互保）。

各地的封疆大吏开始出现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统一集权的态势开始解体。

十年后，南方革命党反政府的活动激进化，团结各省新军于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违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独立或观望。

最终袁世凯进逼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导致民国军阀混战的政局。

对清末经济

义和团对清末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不仅倾力破坏华北大地上所有现代化设施，而且导致北方商贸活动迅猛凋敝，负面影响覆盖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国际贸易活动。上海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因拳乱缘故，为免中途意外，举凡天津商人及货物都停滞上海。

从外商定购的各类日用洋货如纱、布、药等均堆积如山，无人提取。天津一地的商业阻滞，受影响更严重的是中国北方省份。天津枢纽不运转，则行销于东北乃至北京直隶一带的通货只能囤积上海港口，而且日积月累，越来越多。

义和团运动也导致国家税收锐减，银行（钱庄）倒闭。各处钱庄连本金都收不回，倒闭势所难免。北京的钱庄，则有相当数量被烧被毁。

。。。。

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领土。

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

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

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

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可以在中国一部分地区驻军，保护侨民和交通路线，这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隐患，并最终引发了1937年的七七事变以及日本全面侵华、中国抗战、等等。

。。。。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6月23日，位于英国使馆北邻的翰林院遭纵火，清朝初年就所剩无几的《永乐大典》几乎全部遭到义和团焚毁，所余无几。翰林院内仅存六十四册被陆润庠运回府中。（有说永乐大典为八国联军烧毁，但此时八国联军刚刚登陆大沽，尚未进入北京）。

。。。。

科举停考

1901年6月11日，慈禧太后下诏，停止外国人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个城镇文武考试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河南省南阳府、河内县、郑州、光州、陈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隶省北京顺天府、保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滦平县；东三省盛京、甲子厂、连山、于庆街、北林子、呼兰城；陕西省宁羌州；江西省鄱阳县；湖南省衡州府。

。。。。。。。。。。

时间轴

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收继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儁为义子，称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外国公使们都拒绝入宫朝贺，明显反对慈禧废掉光绪帝，让太后大为不悦。
1月27日（当日为农历腊月二十七），英、美、德、法等在华公使第一次联合照会，要求慈禧取缔义和团。
4月20日，保定清苑义和团与教民大规模械斗，“拳民与天主教民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势甚凶猛”。
5月12日，保定涞水义和团与天主教民大规模械斗。
5月22日，义和团戕杀前来平定械斗的清军将领杨福同。
5月27日，数万义和团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涿州，之后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
5月29日，义和团焚烧北京近郊的丰台车站。车站、车厢、商店、皇室专列全部被烧。
5月31日，在慈禧太后同意下，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一说6月1日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
6月5日，太后派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的赵舒翘，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吏部尚书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于6月6日也赶往涿州。其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全是假的，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

6月6日，晚，在荣禄的再三恳求下，慈禧太后召集各王公大臣，讨论当时的紧急形势。在这个会议上，端王载漪、刚毅、启秀等人声称义和团是忠心于国的义民，可以用来抵御洋人。

6月7日，在慈禧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
6月8日，义和团在北京外城举行大示威，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外喊声冲天。
6月9日，董福祥率甘军进入北京，驻守永定门。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透过电报向西摩尔称，北京城内局势每小时正在恶化，要求西摩尔为进军北京作好预先安排。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拳民陆续进入北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各国急商，增派一支由2157名各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英军916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义军40人、奥匈军25人）组成的援军入京，由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任联军司令，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司令、俄国上校沃嗄克任参谋长。
6月11日，联军从塘沽搭火车出发，经天津前往北京保卫使馆。火车开至杨村，开始遭到清军聂士诚部和义和团的抵抗。同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北京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

6月12日，联军边修路边缓缓前进。至14日在廊坊车站遭到聂士成之武卫前军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16日，联军放弃由铁路进京计划，决定改走水路由白河前往北京，先返回杨村，然后在该处组织乘船进京。18日，联军撤回天津紫竹林租界。清政府称此役为廊坊大捷。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护）

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义和团在意大利、奥地利使馆附近焚烧教堂，使馆洋兵到使馆外向义和团开枪。

6月14日，曹福田率领义和团数千人，从西门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率领百官亲自出迎。义和团在天津城西吕祖堂内设总坛口，又在老爷庙、老母庙、玉皇庙等处设立分坛。义和团焚烧鼓楼东仓门口教堂，蔓延到附近二十家，又焚烧鼓楼西的伦敦会教堂。6月27日，张德成率领"天下第一团"5000人开进天津。

6月14日，北京方面，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又焚烧西城根拴马桩、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之房屋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据窦纳乐记载，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

6月15日，慈禧太后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6月16日，义和团烧毁前门老德记西药房，而附近约千家商铺受波及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

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縶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

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

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

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

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

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

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

是日慈禧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山西义和团焚烧教堂，山西巡抚毓贤登高望到火光称"天意也"并禁止清军救火，有英国教士逃出，对群众说"昔晋省大（旱），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被清军杀害。一英国妇女抱着儿子跪下，说她施医每年救活数百人，请求饶过她和儿子。被士兵击倒，和儿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烧死。

7月，毓贤派士兵守太原城门，禁止教士出入，又将教士老幼囚禁在铁路公所。7月9日，毓贤将这几十名教士及其家属妇孺押至抚署，杀害英国教士及家属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及仆役二十余名，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赶法国天主堂修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毓贤下令斩为首二人，令修女饮两人的血，有十六人将血饮下。毓贤下令将这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他人背教，皆不从。清军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几十名，但都不屈，最后全被杀害。

6月17日，天津大沽炮台失守。京城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荣禄递交的外国使团勒令慈禧还政于光绪皇帝的照会（系端郡王载漪伪造），让慈禧太后愤怒至极，完全否决了皇帝主和主张。慈禧做战前动员，令载勋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载勋、刚毅、载濂、载漪、载澜统率义和团。光绪帝焦急地走下龙椅拉着许景澄的手说："你做驻外使节多年，对西方比较了解，说实话大清国能否战胜列强？"许景澄流着眼泪说："皇上要我说实话，我不敢欺骗皇上，据臣所知，其任何一国的实力都在大清国之上，对八国用兵须格外审慎。"慈禧听后勃然大怒。

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讨论是否攻打使馆，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对外宣战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涨。

6月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发最后通牒，限外国人24小时离开北京，会议不再给官员们讨论的机会，而强行作出了对外宣战的决定。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点锺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当晚，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以路途安全无保障为由，要求延缓离京日期。

6月20日上午，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去总理衙门问询，途中被清兵开枪击毙，酿成战争的导火线。第五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决定开战，数千名义和团和清军随即包围东交民巷使馆区。下午4点，清军首先向奥地利使馆开火。

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为寻求保护之华人；还有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彼等”（并未列出“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实际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达一份谴责洋人和表达决心的诏书，而该诏书未曾按现代外交惯例，交予外国使节。慈禧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6月23日，翰林院遇火。
6月25日，在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的率领下，义和团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弒光绪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反抗拳乱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将军尼古拉·连纳维奇。

6月27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联衔上奏，请杀主战派，而再后杀两人以谢主战派。
7月8日，李鸿章被朝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求他上京履新，7月17日李鸿章从广州乘船北上，10月10日抵京。
7月9日，联军进攻天津城南八里台，聂士成阵亡。
7月13日，联军向天津城发动总攻。
7月14日，联军攻克天津城；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7月27日，刚毅李秉衡联名参劾许景澄和袁昶与外官私信，妄议慈禧受愚，慈禧下令逮捕二人。

7月28日，许景澄及袁昶被慈禧处死。

7月30日，八国联军在天津成立天津都统衙门。

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8月11日，慈禧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此三人与之前被杀的许景澄、袁昶号称庚子被祸五大臣。

8月14日凌晨，联军自通州攻打北京，董福祥率军在广渠门与英国军队作战，下午2时，广渠门被攻占，董后撤至东便门、朝阳门、正阳门一带继续抵抗，禁军溃败。董福祥从彰仪门撤走，撤走时纵兵抢掠。

8月15日，第六次御前会议：讨论是留是走的办法，来的只有三个人。慈禧携光绪帝等皇室仓皇西逃，10月26日抵达西安。载漪溥儁父子、刚毅随驾从行。

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其实只有七国，德军10月17日才抵达北京）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

8月17日，西逃的慈禧太后诏命荣禄留京办事。10月6日诏离京西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D%BD%E6%BC%AA

端郡王载漪（1856年8月26日－1922年11月24日），爱新觉罗氏，隶满洲镶白旗，嘉庆帝四子惇亲王绵恺嗣孙，道光皇五子惇亲王奕誴子，生母侧福晋赫舍里氏。后过继瑞敏郡王奕志（嘉庆帝四子瑞亲王绵忻子）为嗣，1893年三十七岁为御前大臣，三十八岁袭封端郡王。义和团事变祸首之一。

生平

载漪是光绪帝的堂兄弟。嫡福晋伊尔根觉罗氏是员外郎绍昌之女，生长子溥僎；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为阿拉善亲王贡桑朱尔默特之女，生次子溥儁。庶福晋赵佳氏，赵延之女。

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如何处置光绪帝是当时政治生活的焦点。1900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下旨，收继其次子溥儁为同治帝嗣子。外界认为，慈禧太后其实是计划废黜光绪帝，史称己亥建储，但溥儁不获外界认可，种种因素下，慈禧被迫停止废立计划。1900年义和团庚子拳乱，他掌管负责京师安全的神机营，后来还一度接管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支持义和团。后八国联军入京，载漪被列在战犯名单上，排名祸首。1902年，在多方折冲、营救之下，朝廷抢下了载漪、溥儁父子的性命，仅仅发配新疆。1917年，借张勋辫军复辟之机，载漪才重获自由，直至1922年去世。（维基百科）

https://www.sohu.com/a/152030396_798186

义和团事变祸首，妄图自己做太上皇却被流放新疆的爱新觉罗•载漪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发动变法的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中南海瀛台，从此成为了无枷之囚。为了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慈禧太后需要一个比光绪帝更加听话的人来做皇帝。在考察对比了各宗室子弟后，慈禧太后选定了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

的爱新觉罗•溥儁为大阿哥，计划废黜光绪帝。这样天降的喜讯让载漪幸喜不已，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成为“太上皇”的那一天。

爱新觉罗•载漪，满清宗室，咸丰帝弟弟惇亲王奕誴之子，后过继给瑞敏郡王奕志为嗣，三十八岁袭封端郡王。他和光绪帝是堂兄弟，其妻子是慈禧太后的侄女。 载漪在清室众多的王公中算不上优秀的一个，他的真正受到重用也是在戊戌变法之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慈禧太后懿旨，溥儁入继穆宗同治帝为嗣，赏头品顶戴，号“大阿哥”。随后大阿哥在弘德殿读书，师傅为同治帝的岳父、承恩公、尚书崇绮和大学士徐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初一日，溥儁恭代光绪帝到大高殿、奉先殿行礼。眼看着自己的儿子离登上皇位越来越近，载漪也开始更加肆意妄为起来。

慈禧太后原本预定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冬举行光绪禅位典礼，并改年号为“保庆”。但此时义和团开始进入京津地区，载漪与庄亲王载勋等希望利用义和团排外，并力主慈禧对外宣战。除此之外，载漪还在其所统率的虎神营练习义和拳术，并在王府设置神坛，朝夕必拜，成为了义和团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早日继位，载漪及其党羽彼此配合，于1900年4月取得了管理总理衙门的大权，慈禧又下懿旨：“ 载漪、奕劻、徐桐、崇绮主兵事，有请无不从”。一时间，载漪几乎集军权、政务和外交权于一身，权势赫赫，恣意行事（为让儿子早登皇位，还伪造一份列强要求慈禧归政光绪帝的照会，致使慈禧向列强宣战）。

但这样的好日子载漪也只享受了几个月。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及部分王公西逃，载漪也在其中。不久后战败的清廷与联军议和，载漪被指为要求严惩的祸首之一。十二月，以载漪包藏祸心，凯翩非望，反复狡诈为由，夺爵位，戍新疆。1901年，因列强的一致反对，慈禧太后宣布废除溥儁“大阿哥”名号，并流放新疆。被流放的载漪父子辗转

逃到了蒙古并依靠阿拉善王居住。辛亥革命以后，载漪贫窘更甚,幸得袁世凯每月接济。直到1917年载漪才得以返回北京，之后靠亲友接济度日，并于五年后死去。

+++

https://www.chinaqw.com/news/200908/12/175578.shtml

大阿哥溥儁其人其事

文／ 王学信

晚清末代皇太子，即大阿哥溥儁早已消逝于历史的烟云，近年虽有人提及，或语焉不详，或传闻有误，或浮想臆测，早失其本来面目。为正视听，笔者不揣浅陋，特将个人研习心得，撰一拙文，以就教于方家。

爱新觉罗•溥儁系道光帝之曾孙，惇慎亲王之孙，端郡王载漪之子。1900年1月24日，溥儁被立为大阿哥时，仅为15岁之顽劣少年，而当时光绪帝年方29岁，正当春秋鼎盛，尚不急于立嗣，而即使立嗣，近支宗亲中恭亲王溥伟、贝子溥伦比溥携更有资格，那么，慈禧为何偏偏选中溥儁为储君呢？原来，这里面蕴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立大阿哥系慈禧的阴毒之招

慈禧太后自从串通慈安太后勾结恭亲王、醇郡王发动辛酉政变，诛杀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肃顺，垂帘听政，将最高权力掌控在手中，继而鸩杀慈安皇太后，三次罢黜议政王，致使国事日非，内外交困，大清江山，岌岌可危。然而，心黑手辣、阴险狡诈的慈禧只知奢华糜费，倒行逆施，独断朝纲，见光绪帝“戊戌变法”有可能使自己大权旁落，政非己出，遂发动政变，幽光绪帝，杀谭嗣同、杨锐等6君子，将十九世纪中华民族振兴的最后一次机遇扼杀在襁褓之中。

戊戌政变之后，光绪帝被幽于瀛台，政无巨细，全由慈禧自操其柄，但这不过是其欲立新君的步骤之一，最终目的仍是要废掉光绪帝。然而，此举并非像她所设想得那般顺利。清季学者王照在《方家园杂咏记事诗》中记载：“戊戌八月变后，太后即拟废立，宣言上病不起，令太医捏造脉案，遍示内外官署，并送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各使馆侦知其意，会议荐西医入诊，拒之不可。荣禄兼掌外务，自知弄巧成拙。又尝以私意阴示刘忠诚公(两江总督刘坤一)，忠诚复书曰：‘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荣禄悚然变计，于是密谏太后，得暂不动。”

胡思敬《国闻备乘》亦有记述：“及已亥谋废立，英公使私探其情于李鸿章。鸿章力辩其诬，因留之饮酒，徐试之曰：‘顷所言，仆实毫无所闻。设不幸而中国果有此事，亦内政耳，岂有邻好而肯干人内政乎？’英使曰：‘邻国固无干与之权，然遇有交涉，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鸿章以告荣禄，为太后所知，益恨之次骨。”

而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亦云：“候选知府经元善在上海联合海外侨民，公电西朝，请保护圣躬。虽奉严旨名捕元善，而非常之谋竟寝。”当时，经元善闻知，预先避居澳门，得以幸免。

慈禧欲废光绪帝，招致各国列强反对，李鸿章、刘坤一等督抚大臣亦持异议，海外侨民更是一片反对声浪。慈禧废立之事未能成功，但这个权力欲几至疯狂、有吕后、武则天般蛇蝎心肠的女人决不会就此罢手，她筹划着更阴毒的一着，立端郡王之子溥儁为储君——大阿哥，再择机置光绪帝于死地，以溥儁继之，而自己仍可掌控最高权力。那么，慈禧为何选中溥携为大阿哥呢？

端郡王载漪与慈禧间的政治交易

其实，溥儁的祖父惇亲王作为道光帝皇五子，与恭亲王、醇郡王(同治十一年晋封亲王)，还是亲兄弟，在辛酉政变前夕，他与恭亲王、醇郡王不同，反对"太后垂帘"，对恪守祖宗家法的肃顺、载垣、端华等人很是同情。当惇亲王听到恭亲王与慈禧密谋除掉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后，在同肃顺等一起聚餐时，当着恭亲王、醇郡王的面，用手提着肃顺的辫子大声说："人家要杀你哪！"肃顺当时对即将临头的大祸并未察觉，以为不过是开玩笑，只是低着头连声说："请杀，请杀！"

肃顺等人被诛杀后，醇郡王向慈禧密奏惇亲王泄露机密一事，慈禧从此恨透了惇亲王，始终不让他参与军国大事，使其老死于宗人府宗令任上。其子载濂按例应降袭郡王，慈禧衔恨特命降袭贝勒。恭亲王看不过去，据理力争，慈禧才勉强给加上郡王衔，但仍命降袭贝勒。

端郡王载漪系惇亲王第二子，慈禧见他自幼好武，在率领由八旗子弟组成的神机营时，亦显示出一定的才干，不像一般亲贵那样一心钻营文职。为培养一个能领兵的亲贵成为自己的心腹，她相中了载漪，并想尽快将其封为王爵。但是，载漪生父惇亲王当时仍在世，一个王府不能同时册封两个王爵，碰巧的是，瑞怀亲王之子瑞敏郡王奕志殁后无嗣，慈禧遂降

旨让载漪过继给瑞敏郡王为子，以后册封端郡王。本为瑞郡王，为何却成了端郡王？《清史稿》载，“更名端者，述旨误，遂因之”，原来是下旨时将“瑞”误为“端”，亦只得将错就错矣！

在慈禧立溥儁之前，承恩公崇绮(同治后之父)久废在私邸，静极思动，与大学士徐桐、尚书启秀日夕密谋，欲迎合慈禧废光绪之意以邀功，拟密具奏章请荣禄共同署名。荣禄佯允其请。《崇陵传信录》称：“次日朝罢，荣禄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有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于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于仪鸾殿。上下惊传将废立，内庭苏拉且昌言曰：‘今日换皇上矣！’迨诏下，乃立溥儁为大阿哥也。”理由是光绪“痼疾在躬，艰于诞育”。

显然，慈禧选定溥携，一是载漪平日甚得己之欢心，二是溥儁乃为15岁未更事之少年，便于掌控。于是，溥儁迁出端郡王府，入居阿哥所，辟弘德殿。崇绮受命为师傅，大学士徐桐受命照料弘德殿，另召陕安道道台高庆恩与翰林侍读宝丰、崇寿同为溥儁之师，大阿哥之班底遂初具规模。

载漪本人虽然尚武，但当时在京城已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声色犬马，吹拉弹唱，无一不好，名声并不佳。但他的福晋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八面玲珑，让人处处满意。她常进宫伺候慈禧，很是得宠，夫以妻贵，载漪确实也沾了她不少光。据宫中知情人讲，端郡王载漪曾亲自向太后禀奏，说奴才的孩子可以当大阿哥。这自然也促使慈禧最后决意立溥携为大阿哥，以便取代光绪帝。

慈禧“豪赌”：对列强宣战

溥儁自小就是“不知稼穑之艰难”的八旗纨绔子弟，顽劣异常，最不喜读书，只知道提笼架鸟，吃喝玩乐，被立为大阿哥，他都不清楚这是要干什么。进宫后，虽有蒙古族状元崇绮做他的师傅，却也“朽木不可雕也”，并无起色。

慈禧贴身宫女荣儿回忆说：“大阿哥溥携，提起他来，咳，真没法说他，说他傻吧，不，他绝顶明，学谭鑫培、汪大头，一张口，学谁像谁，打武场面，腕子一甩，把单皮打得又爆又脆。对精巧的玩具，能拆能卸能装，手艺十分精巧。说他机灵吧，不，人情上的事他一点儿不通。在宫里，一不如意，就会对着天长嚎，谁哄也不听。”

看来，溥儁只是一个被宠坏了的顽童，把他立为大阿哥，只是慈禧的一招“毒棋”，决非真心实意要他继承大统，成为大清朝的“九五之尊”。

果然，慈禧“豪赌”的又一招抛了出来，她要借义和团之手，打压洋人，以解心头之恨。慈禧之恨有二，一为各国列强除沙俄外，一律支持戊戌变法维新；二是各国列强均奉光绪为合法之皇帝，反对慈禧将其废黜。慈禧的如意算盘是，洋人若被打服，她即可除掉光绪，让溥儁暂时充任傀儡皇帝，自己再次垂帘临政，确保最高权力牢牢攥在手中。

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论及此事，称：“义和团之为邪教，即八卦，白莲之支与流裔，劳玉初京卿考证最详。顾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别有所在——邵陵(即司马帅所废之曹芳、高贵(即司马昭所杀之曹髦)之举，两年中未尝稍释，特忌东西邻责言，未敢仓卒行。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义和团适起，诡言能避火器，以仇

教为名，载漪等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虽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

慈禧因谋废立不成而迁怒洋人，因迁怒洋人而欲借义和团神拳之力尽杀洋人以报复，并“阴令拳匪预识宫中部位路径”，以便假义和团之手乘机谋杀光绪帝。载漪、载澜兄弟因有私心而力挺义和团，称义和团“有诸神保护，不畏枪炮”，可以杀尽洋人。而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赵舒翘、协办大学士刚毅、大学士徐桐及启秀、溥良、何乃莹等深知慈禧之意以迎合固宠，皆力主招抚义和团，剿除列强。当时，虽有庆亲王奕劻、大学士荣禄、大学士王文韶、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李秉衡、袁世凯、袁昶等反对招抚义和团，反对向列国宣战，然慈禧此意已决，声称要“大加挞伐，一决雌雄”，公然发布宣战诏书，并悬赏杀一洋小孩、洋女人、洋男人各赏银若干。

一时间，京津等地战火纷飞，血流成河，黎民涂炭，惨不可言，而义和团屠戮教民易，而抵御列强难，竟至一败涂地，清军亦兵败如山倒。慈禧无奈之下，装扮成民间老妇，穿上李莲英姐姐事先准备好的汉民妇裤褂鞋袜，挟持光绪帝，连同隆裕皇后、瑾妃、大阿哥、贝子溥伦等，于8月15日凌晨，出神武门、地安门仓皇向西逃去。此前一日，更命二总管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毙。

西行路上的大阿哥

西行路上，慈禧一行狼狈不堪，自毋庸赘言，而大阿哥溥儁闷在驮轿里，更是寂寞难耐。

过了怀来，忽然从溥儁的驮轿里飘出清脆的二胡声音，演奏手法很是熟练。接着又飘出几句唱词：“头通鼓，战饭造；二通鼓，紧战袍；三通

鼓，把锋交；上前个个俱有赏，退后……”那鲜明的节奏，行腔吐字的一收一放，很有谭叫天的味道。这是大阿哥在西途寂寞中第一次发出的声音。

在接下来的路途中，大阿哥的驮轿里不断增添着各种玩意儿，有唢呐，还有西北很流行的手鼓。他拿着手鼓边敲边唱：“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这是《击鼓骂曹》中祢衡的一段唱腔，唱得有板有眼，很有一股豪气、傲气在。

一天早上，车队正缓慢前行，阵阵西北风吹来，颇有些初秋的意味。突然，一阵嘹亮的唢呐声从大阿哥的驮轿里传出，随侍慈禧的宫女小娟子很机灵，马上让车夫停车，找到专侍太监，叫他启禀大阿哥千万不要再吹。试想，慈禧在前边坐着轿走，后面跟着个唱唢呐的，那不成送殡的了嘛，慈禧非震怒不可。亏得小娟子有心眼，这才免去了一场大麻烦。大阿哥平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挨老太后的鞭子。从此，大阿哥对小娟子和荣儿都很有好感。

后来，大阿哥驮轿后又添了一辆给他装玩物的车子，车子的笼子里装着两只黄棕色的野兔，溺的尿很骚，此外，还养了两条很普通的笨狗。一路上，大阿哥买了几十只蝈蝈，其中有十几只母蝈蝈。他想让它们繁衍后代，特地买了个大方盒子，垫上沙土，四周罩上纱布，把它们放在里面。没想到，卵没产成，母蝈蝈自相残杀，非死即伤，大阿哥为此非常伤心。

可巧，京里来人了，给大阿哥送来两只十三陵的“油葫芦”，令他十分高兴。十三陵的“油葫芦”又叫山油葫芦，这种昆虫最善叫，彻夜不停，且快慢缓急，抑扬顿挫，命也长，能活到大寒时节，是清宫中的宠物。

此次送来的“油葫芦”装在特制的油葫芦罐里，那是专供宫里和各王府的“范子货”，这种葫芦在生长时装进精雕细刻的“范模”里，成熟后抛光上

油，便成了精美的工艺品。太监特地将装有油葫芦的罐放在怀里带来给大阿哥，可见此物之珍贵，而大阿哥亦极兴奋，偷偷让小太监拿给荣儿和小娟子看，表示对她们的好感。

荣儿回忆说："最让大阿哥高兴的是在雁北的一次驻跸。那天，天时还早，小太监从外面买进几只鸽子来。大阿哥起初不太注意，后来仔细一看，竟然是乌头黑翅，这可是'铁翅乌'大阿哥分外惊喜，因为北京当时还没有这个品种。后来，他又让小太监挎着篮子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说：'这种鸽子飞起来好看，但并不善飞。'后来在北京曾流传一句话：'十个鸟，九个赖，有了一个就不坏。'这也是大阿哥在西行路上为这种鸽子唱的，他有个嗜好，见什么，唱什么，足见大阿哥的聪明。"

丧失利用价值的溥儁被"废黜出宫"

慈禧一行在太原歇息近一个月，再上西途，于10月26日到达西安，两宫住进陕甘总督衙门，内有房屋数百间，大阿哥亦随住其内。此刻，慈禧一方面谕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庆亲王奕劻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早日与八国缔结和约；另一方面不顾各省天灾频仍，兵连祸结，仍穷奢极欲，一味敲骨吸髓，满足一己之享受。

与此同时，慈禧将庚子事变之责推得一干二净，只以"前无主见"与"误信端王"之辞推托，实属厚颜无耻。继而她以"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祸首"为由，除南逃保定自缢于莲池书院之崇绮、西行途中病死之刚毅及在京病故之徐桐不问外，革去庄亲王载勋爵位，并降旨赐帛令其自尽，革去刑部尚书赵舒翘之职，着岑春煊监视自尽，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永煜则革职正法，在北京菜市口斩首示众。对大阿哥之父、端郡王载漪及其弟辅国公载澜降旨革去爵位，载漪更发往新疆军台效力，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实际到后来，载漪在慈禧的默许下，并未前往新疆，一直逍遥于

西北、内蒙，依然过着锦衣玉食的奢糜生活。

1901年9月7日，慈禧令奕劻、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德、日、俄、英、法、意、奥、美八国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是年10月6日，慈禧自西安行宫启程，取道河南、直隶回京，在开封度过了她的67岁生日。期间，慈禧忽降旨将大阿哥溥儁“废黜出宫”，改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衔。

公爵为清制“显爵”之最末一等，位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之后，而公爵亦有镇国公、辅国公之分，辅国公还有八分、不入八分之别。所谓“八分”就是八样标志性用品，即朱轮、紫缰、红宝石顶、双眼花翎、牛角灯、茶搭子、马坐褥和铜门钉。溥儁被改封的新爵位乃公爵中之最末一等，上述八种用品不得使用，若擅用则将因“僭越违制”而获罪。

溥儁在西安行宫时，因系大阿哥身份，管束很严，不准出宫。有稗官野史称大阿哥在西安市井看戏与人打架，显系传闻有误，不确。溥儁被“废黜出宫”时，年仅17岁，虽获个人自由，无人管束，但地位一落千丈，加之平日人缘亦不好，回京路上连乘轿资格也没有了。

大阿哥认祖归宗回惇亲王府

回京后，溥儁及端郡王一系居然无家可归，原来，慈禧挟持光绪西逃当天，即8月15日下午，一直被拳民和清兵围困在西什库教堂的洋人和天主教民一起冲了出来，直奔护国寺，涌进了宝禅寺街，冲进西面的端郡王府，先抢后砸，最后一把火，把端郡王府烧个精光，大火直延烧至深夜。

慈禧见状，遂又下诏让端王一系“认祖归宗”，重归惇亲王府本支，溥儁便迁回了位于东四北小街的惇亲王府。当时惇亲王已病故，而其长子载

濂、次子载漪、三子载澜均以庚子之变革爵，慈禧便让其四子载瀛降袭贝勒承继了惇亲王府，占有了府内八大殿堂及绝大部分地产。

溥儁迁回后，载瀛未按端王一系平均分给他财产，只拨了王府东跨院二、三十间房屋让他居住，而且未给办理契税手续。王府的地租收入每年也只给他几百两银子，比其它兄弟要少几十倍。载瀛对亲友说，大阿哥“最懒于攻读”，大阿哥的师傅崇绮向他说过，溥儁每日总是与小太监们玩耍，常用泥捏成小人儿，起名李鸿章、庆亲王奕劻等等，再命太监用绳子绑起泥人，再砍去头颅。

大阿哥在惇亲王府住了一段时间，忽然接到父亲载漪从内蒙阿拉善旗罗王府差人送来的信，说经慈禧默许，自己已投亲住进妹夫罗王府，生活很安定，希望大阿哥来看看自己。溥儁因在惇亲王府生活得并不愉快，便带上两个家人到罗王府省亲。

大阿哥到了罗王府，端王、罗王都非常高兴，大摆筵宴，为他洗尘。席间，大阿哥见到了罗王的女儿，人长得十分漂亮，穿着也与北京王府的格格完全一样，顿生好感。端王知道后，便托来罗王府作客的甘军统领董福祥向罗王夫妇提亲。罗王的福晋与女儿因见大阿哥相貌平常，都不十分满意，但罗王与端王一向感情很好，便一口应承了下来，并很快给他们完了婚。

端王对溥儁一直非常关心，被立为大阿哥后更是百般呵护。端王不仅不准家里人再以家中名分对待他，就是自己提到他也总称呼大阿哥，且态度庄重，俨然有君臣之分。端王在西北听说溥儁被废，已迁居惇亲王府，便决定自己一系回去所分财产全由大阿哥使用，不让长孙溥亻巽继承，自己也分文不取。

大阿哥完婚后，端王很想让他在罗王府常住，但大阿哥不习惯草原的苍凉寂寞，又考虑回惇亲王府可分得相当一部分祖产，日子会过得很安逸，便不顾端王、罗王的一再劝阻，决意携妻回京。端王、罗王见他主意已定，不再勉强，临行前，便分别给了他一大笔钱，并派专人送其回京。

大阿哥挥霍无度，自甘堕落

溥儁夫妇返京后，先住在三座桥的罗王府，受到隆重接待，几个月后，又搬回了惇亲王府。

辛亥革命后，逊帝宣统退位，溥儁以自己曾为大阿哥的身份，当上了总统府参议，虽为挂名，但每月可领到500大洋的薪俸，这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比当时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月薪整整高出200元，按当时的购买力计算，约合现在5万元人民币。如果再加上他从惇亲王府分到的地租，以及从内蒙古带回的款项，生活变得相当富裕。

然而，遗憾的是，大阿哥夫妇婚后感情并不好，因琐事经常吵架，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大阿哥在社会上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酒肉朋友，常到后门桥附近的戏园、酒楼鬼混，后来又捧上了几个唱大鼓的女艺人，常常不惜一掷千金。载瀛说，自从大阿当上总统府参议，更是任意吃唱玩乐，挥霍无度。他还订制了一辆相当漂亮的洋包车，每天吃完晚饭，便坐上车到前门外看戏、听大鼓。后来，又抽上了鸦片，甚至雇了一个绰号叫“小媳妇”的女人，专门伺候他抽大烟。

近亲婚姻给大阿哥带来始料未及的灾难性后果，他育有二子，长子毓兰峰生性愚钝，系先天弱智，二子虽然自幼聪慧，为他所万分疼爱，却因免疫机能低下，五岁时突患暴病死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给他以极大刺激，他守在亡儿身旁，不吃不喝，整整哭了三四天。

1921年，政局动荡，大阿哥的总统府参议被取消，每月收入锐减。1924年，得到苏联暗中支持的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中将逊帝宣统赶出紫禁城，同时也把清室王公的土地以“缴价升课”方式“变旗地为民地”，也就是由佃农按较低地价分期偿付后，该地即属佃农所有，几年下来，各王府之地租来源便告断绝。这是大阿哥遭致的第二个财务困境，从此，他坐吃山空，逐渐达至破产境地。

1927年，端郡王载漪在其后定居的宁夏去世，不久，他的长孙毓运交卸甘肃省景泰税务局局长职务，回北京看望母亲，见到四叔载瀛和大阿哥。载瀛因端王和毓运之父溥亻巽相继去世，便将分给端王一系的惇亲王府东跨院那部分房产交给了毓运，并正式办理了契税手续。毓运见大阿哥已穷困得不成样子，随即将房契交给了他。当时，大阿哥很激动，一定要留毓运在家吃饭。叔侄俩边吃边谈，毓运问他何以出宫，他只简单说，自端王被发配新疆后，李鸿章、奕劻等极力在西太后面前反对他为皇子，说“罪人之子怎能继承大统”？不久，西太后就下诏把他废黜了。当然，大阿哥可能至死也不明白，当他这枚“政治棋子”已丧失利用价值，甚至成了某种障碍时，被慈禧抛弃那只是早晚的事。

穷困潦倒的大阿哥淡出人们视线

几个月后，大阿哥忽然来到毓运家，说是生活上很困难，想和他商量卖房产一事。毓运同意他的意见，把那部分房产卖了几千块大洋，绝大部分都给了他。谁知，大阿哥钱一到手不知节俭度日，依然大吃大喝吸鸦片，很快便又挥霍一空。

端王去世后，他的七侧福晋带着端王留下的十几箱古董来到北京，打算卖掉后置些产业安度晚年。她找到大阿哥商量办法，正值大阿哥穷极无

路，便吵闹着要和她平分。七侧福晋见此非常不安，拿出其中一小部分给了大阿哥，其余的也没卖，便又带回了宁夏。

丧失经济来源的大阿哥无力谋生，后来只得让妻子向罗王的儿子塔王求借。塔王塔旺布里贾拉当时正担任蒙藏院总裁，见大阿哥和妹妹生活窘困，立即派人按月送钱接济，后来还把夫妇俩接进塔王府居住。其后不久，塔王因病去世，大阿哥夫妇失去了最后的依靠。

塔王的侧福晋对大阿哥平时就看不上眼，对这位姑奶奶也不满意，暗中吩咐手下的人，对大阿哥夫妇不要以亲戚相待，还找了个借口，把他们搬到马号附近的几间小房子去住。大阿哥遭此冷遇，郁闷不舒，情绪沮丧，可又没有能力搬出府自谋生活，只能勉强赖在府里不走。在这种心绪下，大阿哥积忧成疾，竟至一病不起，不久便死在塔王府里。他死后于嘉兴寺殡仪馆举行了简单的殡葬仪式，被埋在该寺后院的空地里。大阿哥溥儁就这样结束了他人生的悲、喜剧，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8%B1%E6%99%AF%E6%BE%84
许景澄 （维基百科）

许景澄（1845年－1900年7月28日），原名癸身，字竹筼，一作竹篔，浙江嘉兴人，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庚子被祸五大臣之一。

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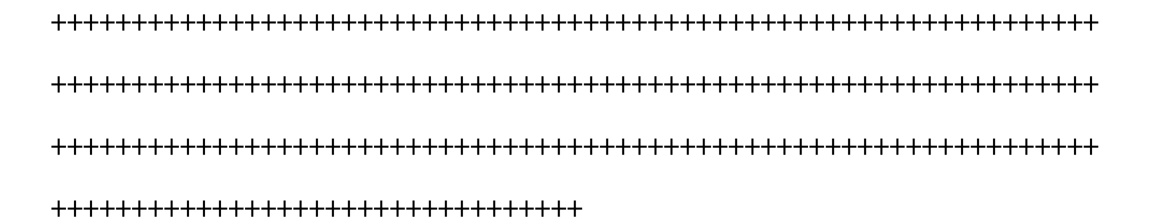
许景澄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景澄深谙时事，经由大学士文祥以其才可任使节，向上推荐。光绪六年（1880年），召命其出使日本，因父丧丁忧，未能成行。守丧结束后，补授侍讲。光绪十年（1884年），许景澄出使法、德、意、荷、奥五国。次年，兼任驻比利时公使。出使期间，负责勘验、接收“定远”等舰，并亲赴造船厂调查，撰成《外国师船表》，疏清朝廷，建议加强海防。

光绪十六年（1890年），再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十八年（1892年），任光禄寺卿，十九年调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俄国出兵占据帕米尔地区萨雷阔勒岭以西二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许被清政府派为谈判代表，驳斥俄国侵略行径，不得要领。二十一年(1895年)任工部左侍郎。二十三年（1897年），许任德国使臣时，奉清政府命，力阻俄国西伯利亚铁道经中国领土向南延伸。二十四年（1898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兼任中东铁路公司督办；二十五年改吏部右侍郎旋迁左侍郎，又充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总教习，管学大臣。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兴起，许力阻义和团驻京。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后，清政府利用义和团力量，并派出官兵攻打外国使馆，许与徐用仪、袁昶等反对依仗拳民神功对外宣战，力谏剿拳民，诛纵匪祸首，以退洋兵。许冒死上书慈禧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慈禧大怒，许景澄被定“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罪名；7月28日，与袁昶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宣统元年，追谥文肃。

纪念

许景澄与袁昶、徐用仪并称“三忠”，在杭州西湖建有三忠祠。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2%81%E6%98%B6
袁昶 （引述维基百科）

袁昶（1846年－1900年7月28日），原名振蟾，字爽秋，号重黎，浙江桐庐人。清朝官员，官至太常寺卿。庚子事变时，因主和直谏被慈禧斩杀，后得平反，追谥忠节，与徐用仪、许景澄、联元、立山合称“庚子被祸五大臣”。袁昶也是同光体浙派诗人的代表。

生平
袁昶家境贫寒，先师从闽县高伯年，后进入上海龙门书院，师从刘熙载。
同治六年（1867年），以廪生参加浙江省乡试，中举人，光绪二年（1876年），恩科进士，殿试二甲，授户部主事。光绪四年兼袭云骑尉世职。光绪九年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十二年（1886年）充会典馆纂修官、补户部江西司员外郎。
光绪十八年（1892年），以员外郎出任徽宁池太广道道台，在任上他严约僚属，痛抑胥吏，进行了多项变革：
兴建教育--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扩办芜湖中江书院，在中江书院原舍之外，设“经义”、“治事”两斋。增设经史、性理、舆算、格致（物理）等实用学科。购书数万卷在中江书院建立藏书楼--尊经阁。
增加税收--清厘关税，汰常关耗费岁万八千金，悉还诸公。还设立谷米出口税，由于每年出口谷米数千万石，所以收入可观。

兴修水利--捐银五千两，并亲自督修了芜湖西南自大关亭至鲁港十二里的滨江圩堤，还新建三百七十丈大堤。从此可以蓄水，可以泄洪，天地村舍不再受洪水的威胁。
此外还进行了芜湖设立邮局，加强武装等多项措施。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袁昶升迁为陕西按察使，还没到任，又被提拔为江宁布政使，后被调到直隶。不久，被召回朝廷，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同年授二品衔，后又授光禄寺卿、太常寺卿。
当时朝廷财政匮乏，朝廷讨论增加厘税弥补不足，袁昶表示反对，认为"增厘税，名病商，实病民，不可增议"。

庚子事变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因曹州天主教教案，德国趁机出兵强占胶州湾，光绪帝下诏求言。袁昶向朝廷条陈了时政二万言书，提出：
德突据胶湾，其祸急而小；俄自西北至东北，与我壤地相错，蒙喀四十八部将折入异域，其祸纡而大。宜及今预练劲旅，痛革吉、奉华靡风习。自顷兵力不能议战，要不可不议守。我朝八旗初制，文武不分途，京外不分途，人皆兵，官皆将，故人才盛，国势强。承平日久，文法繁密，诸臣救过之不暇，于是相率为乡愿，而举国之人才靡矣！金田洪、杨之乱，其始一小民耳，犹穷全国之力仅而克之，况诸国互肆蚕食之心，有不乘吾敝而攻吾之短者哉？夫敌国外患，为殷忧启圣之资。苟得其人，毋拘以文法，则理财、练兵、防海、交邻之策，可次第就理。
光绪帝亲自将其纲要书写在册子中，下发大臣们议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山东兴起义和团，杀戮外国教士。慈禧太后和端王载漪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对付列强，准备攻打各国公使馆。袁昶向朝廷上了一道二千五百余言的奏疏。 五月十二日（6月8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御前会议，袁昶慷慨陈词，与袁昶关系较好的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和内阁学士联元都支持袁昶的意见，光绪帝握住许景澄的手

而哭泣。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八国联军攻战大沽炮台。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 袁昶于上《急救目前危局折》。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

袁昶又上一奏疏，力言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但没有结果。后袁昶又和许景澄一起写了第三道奏疏《请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严劾酿乱大臣，但这道奏折尚未来及奏报，载漪等人已采取了行动，令刑部尚书赵舒翘将袁昶等人下狱。7月27日，袁昶在被骗出家门后被关押，七月初三（7月28日），袁昶与许景澄在菜市口被处死。第二天，慈禧太后发出上谕说"太常卿袁昶、礼部侍郎许景澄，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多语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袁昶、许景澄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身后

1900年12月，八国联军退出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光绪发布上谕，宣布为袁昶等人平反，"开复原官"。平反后，芜湖人把江中书院改建为袁太常祠祭祀袁昶。宣统元年（1909年）又追谥忠节，五月，宣统下诏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敕建三忠祠。奉祀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宣统二年(1910年)，芜湖人建怀爽楼纪念袁昶。

女儿袁季兰（1889-1967），嫁浙江东阳吴家，生子女六人，小儿子叫吴维僔，教名"以巴弗"，是一个执著的基督徒。

著作

袁昶一生著作很多，已刊行的有《渐西村人初集》13卷，《安般簃诗续

钞》10卷，《春闹杂咏》1卷，《水明楼集》1卷，《于湖小集》7卷，《参军蛮语止斋杂著》若干卷。袁昶还将农桑、兵、医、舆地、治术、掌故等书编成一部《浙西村舍丛刻》。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中国的以巴弗

（以下引述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4%E7%BB%B4%E5%B0%8A

吴维僔（1926年4月－2002年12月2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清末名臣、庚子被祸五大臣之一袁昶的外孙。出生时母亲为他取名“以巴弗”（主后第一世纪与保罗同坐牢的一位基督徒）。吴维尊著述不多，但坚守信仰，其“为主做监”的事在基督徒中传达开来，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

1941年信基督耶稣。1946年秋入上海中华神学院，1949年初毕业。然后在上海守真堂作实习传道。1949年10月起至1957年，任上海守真中学、同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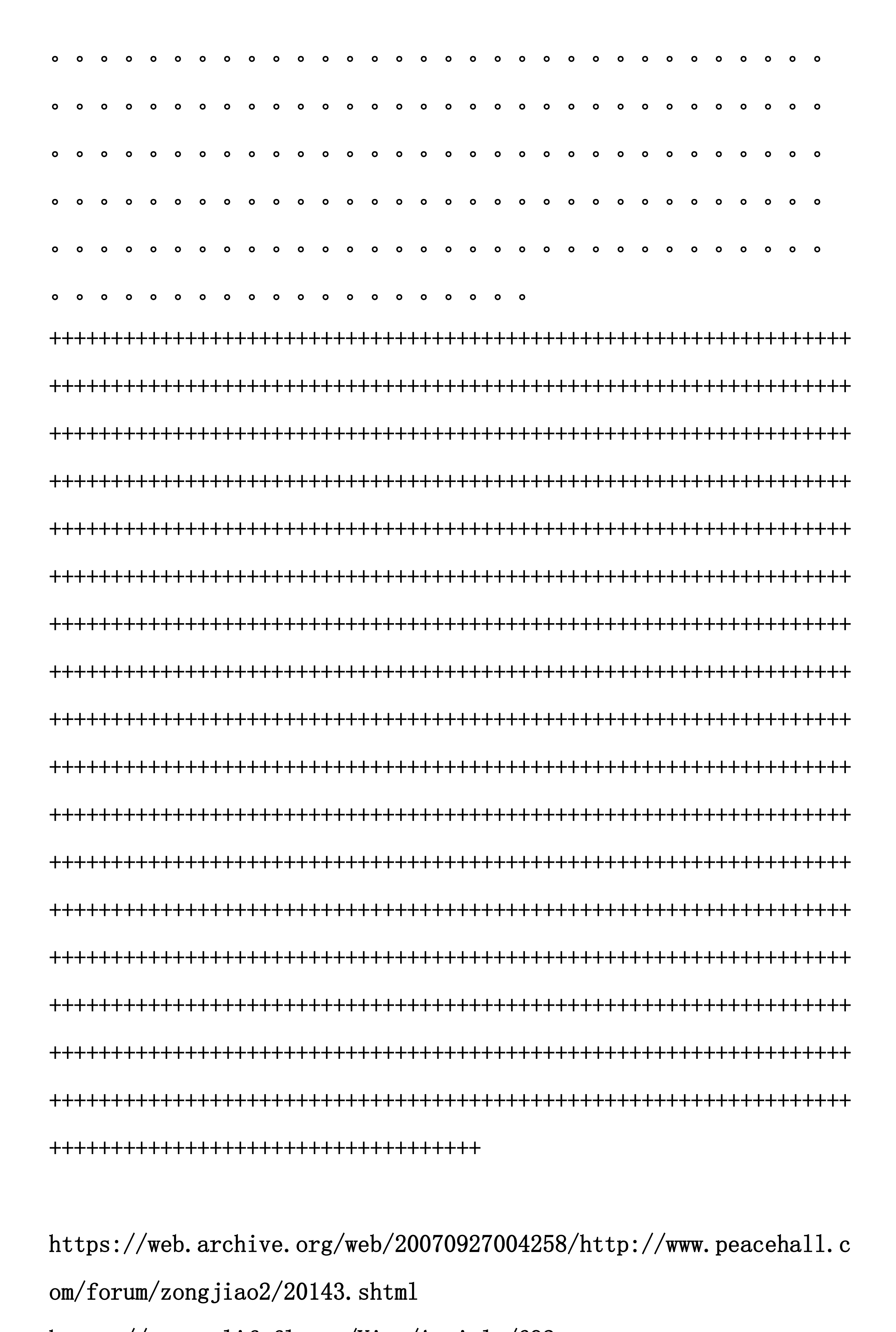
中学教师。1957年与一个天津女基督徒结婚，调到天津46中学任物理教师。因坚持阅读圣经，被认为搞宗教迷信，被下放郊区劳动。1961年回校，不允许讲课，任实验室试验员。

因为他用复写纸写《主内交通》文字，寄往各地，引起公安局的注意。1964年7月30日，吴维僔被传讯、抄家，因在审讯中拒不开口而被收押入看守所。此后在一个月内一连八次被提审，但皆"拒绝交代案情"。此后，不管监狱当局如何软硬兼施，他都抱定"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只一心仰望、交托给主"。在看守所关押期间，由于他坚持"饭前谢恩"和定期禁食，饱受饿饭、灌食、毒打、重铐和批斗等种种折磨，吃尽了苦头，但他终未屈服。

1967年2月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押往宁夏劳动改造。妻子也被迫离婚。在服刑期间，吴维僔始终坚持信仰，拒绝思想改造。坚持不读毛语录，不唱革命歌曲，不高喊"万岁"，不向毛像敬礼，以及仍然坚持饭前谢恩等，被视为"反改造份子"，多次遭受毒打和各种非人的折磨。

1981年春季，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重新裁定，认为吴维僔"确已悔改"，放弃原来立场，遂将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20年（1967年-1987年）。吴维僔拒绝承认自己"悔改"。1987年5月28日被强迫出狱。当日，他写了《出监日呈文》，致信给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郑重申明自己没有"悔改"的事实。后在监狱附近住下，坚持做一个"监狱墙外的无期犯人"。2002年12月21日上午，在监狱附近的住所内独自安祥离世。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927004258/http://www.peacehall.com/forum/zongjiao2/20143.shtml

https://www.cclifefl.org/View/Article/692

主题：中国的以巴弗--主仆吴维尊见证

（注："尊"原为"人"字边加"尊"，读三声。因字体无法显示，本文中均用"尊"字代替）

萧若枝

。。。。

序

1900年的北京。义和团事起。慈禧太后及端王载漪唆使其攻打各国使馆，并召甘督董福祥助攻。太常寺卿袁昶（浙江桐庐人）接连两次上疏，力主不要攻打使馆，以免挑起外衅。在御前会上，袁昶又力言"拳术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公使，悖公法"，局面将不可收拾。他侃侃陈言，声震殿宇，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皆附议。慈禧太后不悦而退。不久，八国联军攻下天津炮台，又向北京进犯，他与许景澄又拜伏于宫殿下上疏，泣请速斩祸首，以挽大局。载漪大怒，逮捕了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等人。七月四日，袁昶、许景澄被处死于菜市口。

形势的发展后来果如袁昶等所言。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北京；七

月二十二日，慈禧、光绪西遁长安。当年十二月，八国联军退出北京，朝廷下诏复袁昶原官。宣统元年（1909），又追谥袁昶为“忠节公”，并于西湖孤山南麓敕建“三忠祠”，奉礼袁昶、许景澄、徐用仪3人。

百余年后，2002年的宁夏。12月21日，一位名叫“以巴弗”的圣徒在宁夏银川监狱大墙外一间陋室中，安然去世。

这位中国的以巴弗便是“忠臣袁昶”（王明道语）的外孙。

。。。。

恩典与呼召

袁昶遇难后，其家人匆匆自北京南下，在上海附近的松江定居下来。是时，几位美国卫理公会的女宣教士已在松江，以办学的方式传主的福音。袁昶的女儿袁季兰（1889-1967）12岁时，便进了这所小型女校（慕卫女校的前身）读书。神的救恩也从此临到了袁昶的后裔。

据悉，袁昶被杀前，曾几次暗中通知京中外国侨民（主要是宣教士）提前撤离，使其减少了许多伤亡、损失。许多宣教士十分感激袁昶，也知道这个少女袁季兰就是袁昶的女儿。宣教士们在这些女生身上花了极大的精力，一方面教她们明白圣经真理、认识真神、信靠救主，一方面也培养她们，使其具有良好的品德和知识。青少年时期的季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耶稣基督为自己的主和救主。

季兰19岁时，嫁至浙江东阳的吴家，育六个儿女（三个夭折的除外）。1926

年4月，小儿子吴维尊出生时，季兰也给他另取一圣经人物的名字“以巴弗”。

维尊从小在教会环境中长大，自然明白圣经的许多真理，熟悉圣经故事，会唱许多圣诗。老师在课堂上问：“谁是信耶稣的？”小维尊高举右手答道：“我是信耶稣的！”但幼时并没有重生。进入五年级后，小维尊开始反叛，对神有疑问，乃在心中积了数百个问题。时值抗战时期，小维尊随家人流亡，初尝人生之苦，便埋怨神：“为什么要造人？造了又允许人犯罪，还要惩罚我们！”后来母亲给他买了一本刚出版的《荒漠甘泉》，让他每晨读一段圣经，并一篇“甘泉”。

1941年5月的一日，圣灵借着《荒漠甘泉》开启了他的心，他不再骄傲，跪在床前祷告：“神啊，饶恕我的骄傲和愚昧，我错了。这几百个问题我再也不问了，都交在你手中；不是我不要明白，而是要看你要我何时能明白什么，你就一步一步光照我，使我明白。现在我先信靠你，你不会有错，你的话—圣经不会有错。神啊，从今以后，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孩子，我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主用宝血洗净我的一切罪。”吴维尊从此在主里重生。

维尊重生后，神在各方面修炼他。他初三毕业要进高中时，神让他学习了不撒谎的功课；学习坚持圣经真理的功课。这些操练为他后来一生的服事打下了基础。

1945年1月，维尊在浙西山区读高中。放寒假时，他在学校后边的小山上读书、灵修、默想。他想到主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却为救自己的缘故，“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7-8）。

他想到自己从小学五六年级时，便喜爱自然科学，自己已决意进大学读理工科，将来作工程师或科学家。而那天，他问自己："主已为我降卑，我为主降了什么？主为我流血舍命，我为主舍了什么？"他再次默想主在十字架上的大爱，心被恩感，便俯伏跪下，对主说："主啊，我把自己献给你，我不再想作什么工程师或科学家了，大学不考也行，你要我作什么，我就作什么；你若要我作原来我最不想作的传道人，我也情愿了。"祷告完毕后，他深知主已悦纳他。

高中毕业考之前，维尊决定，既然已经奉献给主，便不打算再考大学了。那时，他爱主的心越来越热切，晚上的祷告也越来越长，似乎主就在旁边，亲密极了，心中有说不尽的话向主倾吐。最初他祷告到晚10点，后来祷告至半夜甚至后半夜，鸡叫以后才躺下睡一会儿，但精神很好、不疲倦，白天仍照常上课或复习。再后来他就通宵祷告，直到天亮（6月天亮得早）。

同学们还都在沉睡，他却脑子非常清醒，便悄悄起来，拿了小圣经到窗口下，坐在凳上，打开圣经，主便用经文向他说话：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7-38）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9:23）

他清楚知道主在呼召他舍弃自己，一生一世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否则，就不配作主的门徒。这是主对他一生的呼召。他对主说："主啊，我愿意。"

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作了更冷静地思考：假如主要我去边疆传道呢？假如主让我传道，而没有人肯听，没有人理睬呢？假如穷到吃不到饭，穿不上衣呢？假如主让我被多人看不起，或遭误会，或受冤枉，或被毁谤呢？假如主让我生重病、长期痛苦、或是死亡呢？------凡他所能设想到，有可能遇到的，他都一一认真考虑，掂掂份量，然后重新向主说："主啊，我愿意付上这一切代价，跟主跟到底。"

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按主的话去执行，必会遭多人反对，必有一场属灵争战。果然，没有几天，全校几乎都轰动起来："吴维尊发神经病啦！""吴维尊信耶稣信迷啦！考试也不考，饭也不吃啦！"甚至有人说："他失恋啦！"他的许多同学和老师劝他好好考大学，而他反而向他们传福音，劝他们信耶稣。

总务主任很爱他，就格外苦口婆心地劝他。因劝不动他，总务主任就急了："你过去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现在，你是一个废物！你还劝我信耶稣？我就是下了地狱，也不要信耶稣！"他当时没有话可以回答这位爱他的老师。但感谢主，五年以后，维尊在上海又遇见了这位老师，主自己拯救了他。

。。。。

平信徒的岗位

1946年秋至1949年初，维尊在“中华神学院”学习。1949年初，他开始在上海守真堂作实习传道。

那是一个动荡、剧变的时代。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一举渡江，上海5月份解放。解放后的上海，外边热闹极了，经常有各种游行，人们扭秧歌，打腰鼓，喊口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一阵阵从游行的队伍中传进矗立在街旁的教堂里------

空空的教堂中，维尊独自一人，俯伏在神的面前祈祷。上海的各家各户，都已做了准备，买足粮食、咸鱼，以度过两个时代交接的时期。守真堂也因此有两个礼拜暂停聚会。维尊则正好用这段时间，潜心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他说：“主啊，求你保守我，至死也要作个传道人，决不离开传道的岗位，决不改行干别的。”然而，主给他的回答正好相反。主当时并不差遣他作传道人，而是要他作一份别的工作，等候主。他听到主对他的回答是：等待，到我需要时，我会把工作托付给你的，派你作的。

维尊清楚了，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中，主要他作一名平信徒（即普通基督徒，而不是传道人）。他说：主不是叫我去贪恋世界，而是给我换了一个战斗岗位。他要我在一个普通教师的岗位上，讨主的喜悦，为主作见证。

1949年10月起至1957年，维尊在上海作了8年中学教师。这8年中，维尊恪守神给他的“战斗规则”：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也牢记自己的两种身份。一个是教师的身份，一个是基督徒的身份。既是教师的身

份，他便尽力作一个好教师。但他清楚，教师身份是暂时的，次要的，基督徒的身份则是永远的，首要的。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教师的身份就要服从基督徒的身份。

。。。。

"社会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

解放后，他为神打的第一仗就是，虹口区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学习完毕时，每一个人都要写总结报告，要写自己对"社会发展史"是怎么认识，怎么看待的。

维尊经过祷告，在这一点上写了一句话：

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

政治教师便组织大家"帮助"他。感谢主，因为维尊是在教会中学教书，同事们大多是基督徒，大家心中也赞成维尊的观点，所以无人发言。政治老师只好自己发言批判维尊，这反而给了维尊机会。政治老师说："你们所信的神，是反对科学的！"维尊就回答说："池老师啊，科学，科学规律是哪来的？是人定的吗？不是，没有人能制定科学规律，科学家也不能制定，只是发现和证实了一部分科学规律而已。真正的科学规律是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

前，就制定妥当的，天地万物也都是按照神定好的规律运行。既然科学规律是神早已定妥的，为什么神要反对自己所定的科学规律呢？”有的老师听了笑了，有的点了点头，有的什么表情也没有。维尊又说：“池老师啊，今天的问题，不是神反对科学；而是人们想利用科学来反对神。”

许多老师听着维尊的辩论，为他担心，维尊自己也只有把后果交托给主。可能是因为解放初期，学校后来也没有再追查。“平信徒”的第一仗，靠主的怜悯结束。

。。。。

有争议的一件事

1949年6月起，维尊参加了南阳路教会（倪柝声弟兄的聚会处）的聚会。但不久，他痛心地发现，聚会处当时的立场是，教会要取得合法地位，就非得走三自道路；因此，50年代初开始，聚会处作出一系列决定：参加党领导的节日游行，邀请“三自”的领袖人物吴耀宗来聚会处讲道，并且要在教会内搞“控诉运动”。1951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展基督教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的文章，要求全国基督教团体“广泛地展开对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控诉”。聚会处决定响应这个“控诉”的号召。倪柝声自己亲自动员大家，说他强调一个“立场”问题，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可控诉的事就多了。在虬江路进一步动员的时候，全体肢体都参加了。当时维尊尚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压抑不住灵里的愤怒，反对在教会中搞“控诉”活动。然而，他的意见根本没有人理会。维尊只有自己痛哭、祷

告。据他自己后来亲自写的见证说，在祷告中主对他说话：“既然倪弟兄要你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你就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去。”

1951年6月10日，上海南阳路的控诉会上，吴维尊发言，用故意夸大了的尖锐的词句来“控诉”，结果全场大乱，许多人大发“嘘”声，控诉会完全失控。一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南阳路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会众根据不同的地区分成十几个“家”，每“家”约100多人，由“家负责弟兄或姊妹”带领，后增至二十多“家”。“家”下又分成组。—编者）发言，问主持人刘良模（三自代表）：我们传主的福音，到底可以不可以？政府许可不许可？结果整个控诉会无法继续。刘良模只好安抚大家，说一些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类的话，然后散会。

两个月后，聚会处一位长老通知维尊“停止你擘饼”，因为大家认为维尊已经“放弃了信仰”。

直到1964年，维尊才有机会与南阳路聚会处的两位肢体恢复交通。当时维尊去北京为一位年轻人施洗，得知这位年轻人的父亲就是当年南阳路聚会处的家负责弟兄之一。这位老弟兄一直误以为维尊“放弃了信仰”，维尊写信给他说：“当年我的控诉，根本没有背弃主，放弃信仰；反而是照着主的吩咐，演了反面角色而已。”这位老弟兄非常高兴，又转告了另一位长老杜忠臣弟兄。他们十分为此喜悦。

这是维尊的见证中颇有争议的一件事。50年后，维尊自己回忆起来，仍感到自己是作了反面角色，拦阻了控诉会，心中颇为平安。

。。。。

"配"的预备

1955年，维尊的三嫂给他介绍了一位在天津工作的姊妹。开始通信时，维尊清楚地问对方：你是否愿意在我所走的十字架的窄路上，作我的伴侣？对方同意后，他们才确定了婚姻关系。1957年夏天，吴维尊因为婚姻的关系，从上海调至天津工作。神把他带到了一个新的战场。

1957年的中国，革命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烈，校园中进行着无情的"反右"运动。维尊来到新的环境中，仍然一如既往，每吃饭必谢恩祷告，中午休息时，还要拿出圣经来默读。星期天，全校教师要到附近农村劳动，他却要请半天假，理由是"要聚会敬拜神"。学校里的同事们觉得他很奇怪："这个从上海来的老师，怎么宗教迷信这么深！哪能当老师呢？"不久，他便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去了。

本来，学校下放他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他的思想，结果他在乡下两年，反而把劳动场所当作传福音的禾场。那个年代，正是全中国范围内听不到基督福音，没有大光照亮的黑暗时期。维尊再次思想神的恩典和神对他的托付。他想到：神没有托付我作传道人、布道家，他让我作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难道连这一点本份也不能尽吗？他决心要在这最小的事上忠心，并忠心到底。所以，不管是谁，只要有人问及主真理的事，他就毫无保留地把福音传出去。

在下放小组学习时，他看到下放劳动的目的是“促使干部改造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便公开在小组内发言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且永远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能，也不打算改造和转变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没法响应党中央对我的号召。”小组长为他可惜，公开在组里说：“要是光按着你的生活艰苦方面、劳动积极方面来衡量，你能够上一个好共产党员，但你的思想改造方面就过不了关啦。不过，即使你思想改造过不了关，还可以算作‘宗教信仰’而勉强放你过去；但你散布宗教迷信的传道的东西，事情就严重了，过不去了，砸了锅了。”

那些日子里，吴维尊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一天中午，他去一里外的水井挑水回来。天上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向他逼近，眼看一场倾盆大雨马上要倒下来。脚下是泥土路，如大雨下来就成了泥泞路，无法行走了。他望着满天的乌云雷电，突然凭着从神而来的感动，伸出右手，对着已经从天降下的大雨，大喊一声：“打住！”结果，好像主当年斥责风和雨一样，雷电很快停了，雨滴止住了，乌云也渐渐退去了！这是维尊第一次见到神迹，他知道在他处于威胁压力之下时，神在借着这个神迹安慰他，坚固他的信心，他确实知道：我的神活着，他掌管着天地万物！

两年农村劳动之后，他又被调进天津东北郊一个区办的棉毛加工厂继续劳动改造。两年后，他被调回原校，但因思想没有改造好，不能作人民教师，他只能作实验室的物理实验员。

1957年至1964年7年中，形势越来越紧张，属灵争战也越来越激烈。神开始更严格地修剪维尊，为他自己的托付预备他的心志。

自50年代后期，吴维尊开始以复写纸写“主内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增强各地主内肢体们的灵里交往。60年代初，他开始操练禁食祷告。64年春天，神让他做好“配”的准备。那时，他在与上海原守真堂的一位弟兄通信交往中得知，一位他所熟悉，主所特选，受过贾玉铭灵修院造就，与他一同作过守真堂教会执事，后来又成为主所用的忠心仆人，因着主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所托付给他传福音的负担和工作的缘故，被守真堂负责人姜蒙光所出卖、告密，因而被捕下了监。看完这封信，维尊心中深受感动，为这位下监的年轻弟兄感恩，羡慕他，因为这位弟兄听主的话、配为主的名而受此凌辱、磨难。他为下监的年轻弟兄切切祈祷。在祷告中，维尊听到主在问他说：“他配，你配不配？”他立刻含着泪水向主说：“主啊，我也要配，我也要配！”从这天起，他就更加儆醒，随时做好了“配”的准备。

。。。。

十字架的道路

两个月后，1964年7月30日，吴维尊被捕。当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拿出“传讯证”和“搜查证”的时候，靠着主恩，他一点没有慌张。他与妻子握了握手，说了最重要的两个字：“靠主。”便上了吉普车。上午十点左右，车向公安局开去，窗外之物向后移去，吴维尊抬头望天，心中充满了平安。他知道神又把他调到了一个新的战场，一个更为险恶也更为重要的战场。配得在那个战场上为主作见证，实在是他的荣耀！既然早在1945年他已经决定要一生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现在更是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了。

维尊被捕的原因当然纯粹是为了信仰。64年正是全国搞“四清运动”的时候。他学校的校长已经公开批评他说：“在我们学校里，宗教迷信活动是很明显的。”另外，维尊也曾为人施洗，写“主内交通”文字寄往各地。他曾写信给一位年轻人，鼓励他：“你既然已经信了主，作了基督徒，就应该公开承认主的名，退出共青团，走主的路。”因为这个年轻人的退团事件，也引起了公安局对维尊更加注意：他在“与共产党争夺下一代”。

其实，最初的时候，维尊并没有被“逮捕”，而是被“传讯”。从世人的角度看，他被捕入监完全是由于他“不识时务”造成的。维尊心中确信：进监，不是他自己喜欢进的，也不是公安局要他进的，而是主带领他进的监。神要他在犯人这个岗位上，作好一个基督徒，以犯人的身份来听从主的话，遵行神的旨意。因此，一进监，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在属灵争战中的战斗原则：在被审讯时，“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

入狱一个多月时间，他八次被审问，一直持定了这个四不原则。第七次审讯时，他被要求用书面形式回答五个问题。他便一面祷告，一面写出了自己的答卷。其中第四个问题是：“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是如何得到了正确贯彻执行的？”他直率答道：正是在这种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全国许多教会被取缔、受打击，许多神的仆人和基督徒因不接受党对神教会和神仆人的领导而被捕、下监、判刑等等；而我的被捕下监，则是一个新的证明。

最后第五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你对全国基督教界所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是如何认识的？”他本来想从正面好好回答这个问题，突然觉得不平安，圣

灵光照他，他就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正预备把我从圣经真理而来，对"三自"运动的认识写成回答时，圣灵突然拦阻了我，不让我写，并且光照我一节圣经。这段经文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将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因此，我就不从正面回答下去了。注：主耶稣所说的"狗"、"猪"，不是指真的狗和猪，而是指"不把圣物当作圣物"的人，指"不把珍珠当宝贝"的人说的。

他的答案当然引起了轩然大波。第八次审讯时，预审员恼怒地说："在我的手心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大牧师，大传道，还没有见过你这么猖狂的！"第八次审讯之后，预审员给他一张逮捕证，说他是"自食其果"。他坦然签了字。主又一次光照他，他对自己说："我虽不是大牧师，大传道，但只要紧紧倚靠主，仰赖主的怜悯，忠心跟随主，不躲避应该背起来的十字架，就照样可以得胜，在世人面前，作好见证。

。。。。

判决之后、跟主到底

1967年2月，法院下达了对他的判决：无期徒刑。他收到判决书后，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立刻想到："仆人决不能大过主人。我的主耶稣，从父手中领受并喝尽的苦杯，是死刑，而不是无期，而且是钉十字架，是最耻辱、最残酷、最痛苦（连父神都离弃他）的死刑；父神给我喝的杯，不知轻了多少倍，还存留我一条命，身体至今还健康------主受十字架死刑时，尚且是心悦诚服地领受，我才是无期徒刑，为什么不能也同主一样心悦诚服、从

父领受呢？主说过：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浸你们也要受（马可福音10:39），今天父神既然怜悯了我，给了我这个杯，我就应当把父所给的杯喝尽，无期到底。”

判决后的犯人，一般都可以与自己的家人见面了。他也立即写信给他妻子，告诉她已接受判决，请她来见面。他请她再带一个脸盆来，因为原来的脸盆已经漏了一个洞。他盼望能见到妻子，多说一些话。信发出以后，到了预定接见之日，队长（劳改队的管教干部）送来一个家中的脸盆，妻子却没有来。维尊再次写信，并写了一些主内勉励的话，队长就斥责他写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给他寄出。

过了一段时间，法院来了一个干部，告诉维尊，妻子要与他离婚。这完全出于维尊的意料之外，立刻为此祷告。当时正是文革的高潮，在那个空前险恶的时代环境中，妻子在外面孤单一人，无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体谅她的软弱，便同意离婚，他们没有孩子，维尊也不要求什么财产，于是签字就完了。

维尊从不后悔与姊妹结婚，因为当初已经确定是二人同走十字架的窄路的。现在姊妹软弱了，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后退了，维尊只有替她惋惜，为她祷告了。

据说，后来她又与一老工人结了婚，但并没有摆脱她在文革中受逼迫的处境。而离婚后，维尊更无牵挂了，他想：我虽只剩一个人，也要终生把十字架背到底，跟主到底。

。。。。

守住红豆田

“其次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沙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撒母耳记下23:11-12

维尊入狱后，记不清楚这段经文的章节，但却记住了这两节经文的内容。大卫的勇士沙玛，站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面对众多的非利士人，坚守住那一块红豆田，不退却一步，结果挽回了整个战局，使以色列人全面反败为胜。守住红豆田，成了全面战争胜利的关键。主光照维尊，使他清楚知道，坚持饭前谢恩，是他在监内属灵争战中的“红豆田”，必须守住它。

他一进监狱，便在饭前谢恩，不避讳，不怕人看见，因为这是一个见证。监内的指导员向他宣布：“你要吃饭，就不许念（谢恩），你若念（谢恩）就不许吃。”维尊便把自己的碗筷还给管理员，不再吃饭。四、五天后，预审员厉声斥责他：“不吃饭，绝食，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而维尊坚持说：我决没有绝食求死的意思，我只要谢恩吃饭。这样，狱方只好换了一个预审员，做些微让步。让维尊有时可以吃，有时又不能吃—因为不准谢饭。

半年后，维尊的苦难更加重了。他被戴上一副重手铐，这副手铐又重又冰冷，使他痛苦万分，夜里无法入睡，但主与他同在，亲自引领他争战。他又一次声明：不谢饭就不吃饭，从今天起，不再自己主动拿政府不许谢恩的饭菜吃。两天后，看守所去掉了他的手铐，同时组织了七、八个犯人“帮助”他。看守人员站在门外观看。一个犯人一拳打在维尊的下巴上，顿时他满口是血，滴在身上、地上。这个犯人一面吼他：起来！立正！一面喊着口令：“向前两步—走！向后—转！-----”一面要维尊回答他挑衅性的问题，他不答，这个犯人就“啪！啪！”------左右开弓，两手狠打他的脸颊。

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中，主的话一直响在维尊的耳中，萦绕在他心里：“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马太福音5:38-41）“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53:7）感谢主，主的话成了他争战时手中的锐利武器。面对那恶者的口令，维尊就顺服、照办，对他那些挑衅性的问题，他就学主的样式，默默无言。听主的话、照着主的意思去作，就能立足于不败之地，就能把仗打赢。

反复的殴打、折磨两个钟头之后，那个犯人打累了，就宣布“批判会”结束。所长问他：“大家帮助你，你感到怎么样？服不服呀？”他回答所长说：“报告所长，无论政府对我作什么，或是犯人对我作了什么，我都没有怨言，甘心乐意。”所长一听，以为他屈服了，很高兴，说：“唉，这就对了，你早就应该这么个转变了！何苦呢？------”

维尊一听不对，赶紧补充着对所长说：“报告所长，您误会了。我甘心乐意没有怨言，并不是说今后我不听主耶稣了。我作为基督徒，听主耶稣的话，总是要放在第一位的，继续要听主耶稣，一直听下去。”这下子所长真没想到，气得不得了：“好，好。你坚持反动立场，顽固到底。那好办！咱们今

后就走着瞧呗！”

维尊又回到大囚室，坚持禁食七天后，他被带到一个空室，几个管理员反拧了他的手臂，后面一个人按着他的头，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强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他的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维尊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 他在所长和众人面前，作了感恩的见证。后来，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时，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1966年7月，检察院对他的起诉书中这样记录着："该犯长期在监内，借口'饭前谢恩'搞非法活动，破坏监狱纪律，甚至多次长时间以绝食行动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维尊被正式判无期徒刑后，便从天津看守所转至天津劳改处，一个月后又调往宁夏的平罗玛钢厂劳改队。那时正是文化革命的高潮时期，他仍然持定自己的信仰，坚决"反改造"，他宁可为此付上代价。维尊坚持不念毛主席语录，不答问题，不唱革命歌，不喊毛主席万岁。组长和同组人命令他向毛主席像磕头，他拒绝。于是十多个人对他又踢又打，他乾脆躺在泥土地上，任凭大家踢打。这是他第一次在劳改队挨打。此后，他无数次挨打，有人用皮腰带抽他，有人用鞋底狠打他的双颊，有人用木棒打他的头顶；还有一个队长用燃着的烟头多次烫他的鼻孔------所有这些非人的折磨，维尊都认为"既是主所允许的，都是于我有益的"。

在这里与在看守所一样，队长向他宣布："你要吃饭，就不准祷告，你祷告就不准吃饭。"维尊知道，"守住红豆田"的战役进入了更为艰巨的阶段，因为当时正是文革高潮，全劳改队要六个月停产进行文革学习。但他深信，那位差遣他的主会使他"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争战开始了，他不再吃不能谢恩的饭。一天，两天------在他四、五天未吃饭、极度虚弱时，又被迫受罚跑步。第七天未吃饭时，天黑之后，他被带到一间空室，他遭遇许多谩骂，又有四个人开始打他，直到把他打昏为止。他后来回忆说：感谢主，昏过去真好，一昏过去什么痛苦都没有了。他被反复折磨毒打，强行灌食，灌食后，因为他身体被折磨得太厉害，就呕吐了出来；劳改队的队长就命令他把自己吐到地上的稀糊舔乾净，他就趴在地上，把呕出的稀糊舔净了。打到后半夜，队长又叫犯人用水泼他身上。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几天，他被打的创伤一、二年后才痊愈。

中国的史书上，总是记载着狱中各种各样的酷刑，也记载着许许多多一代又一代受尽酷刑而不屈服的刚强硬汉。而不同的是，吴维尊尽管忍受了酷刑、没有屈服，他却不是刚强硬汉，他是柔弱的。那些殴打折磨他的人，打累了，问他：你恨我们不恨？ 维尊说：一点也不恨，也不埋怨谁。因为他自己的主在十字架上还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呢。

最后，狱中虽然还是坚持不准他谢恩，但每三天就有一顿饭例外。吃饭的时候，他被带到一个单独的空屋里，一个组长看着他吃饭，他便可以吃到名义上不准谢恩而实际上许可谢恩的饭。后来监狱政委（最高领导人）对他说：你要饭前谢恩，我们许可你心中默默祷告。若要表现出来影响别的犯人我们就不许可。维尊听了，立刻警觉起来，主光照他：这一步也不能让！他回答说："报告政委，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信心与行动表现紧密相联的。没有行动表现的信心，不是真信心，而是死的信心，假的信心。真信心必然有与

之相应的行动表现。我无法满足政委所说的条件。”谈判失败了，达不成协议。每三天吃一顿饭的争战，只好继续打下去，一直到六个月停产集中文革学习和运动结束时为止。

。。。。

犯人中的犯人

两年后，1970年9月10月间，他被调到一中队一组。这是最严厉的一个组，再难改造的犯人，到那里后也都会被改造过来。他到那里后，大组长开始对他正式提出初步要求，很简单，只两个：1. 吃饭前不祷告谢恩。2. 念毛主席语录。不要求两个都做到，只要求做到任意一个就行，随他挑选。他立刻很明确地告诉组长说：这两个要求，任何哪一个，他都做不到。矛盾激化了。倾刻之间，他成了全组犯人的斗争对象、射击中心。原先对别人的矛盾和批评，一律搁置起来。组长和全组犯人集中火力，想尽各种办法来刁难他，折磨他。

有一次，他们说：只要吴维尊能念（朗读或背诵）一句毛主席语录，或是说一句毛主席“万岁”或“万寿无疆”，就可以让他谢恩而吃。他就在主面前思考：想到圣经教导中有“敬畏神，尊敬君王”（彼2:17）和“我劝你首先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政治领袖）和一切在位的，也当如此”的话，他就在小组众人面前说：“我祝愿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他们都欢呼起来：“有门，有门！”虽也有二三个人不满意，因为他说的不是“万岁”或“万寿无疆”；但有人说：“别忙，慢慢来，有希望！”

那一天，他们对维尊好得不得了，三顿饭给他吃得饱饱的。第二天，组长和大家对他说：今天，你要进一步了，不要说你昨天说的那句话，要说："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这么说。岂料，劝了半天，等了半天，维尊还是不肯改口，不管他们给吃不给吃。他们气极了，不给维尊吃饭。

有人在私下问他：你为什么肯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而不肯喊"毛主席万岁"和"万寿无疆"呢？

维尊回答说：前者是向至高神祷告，为政治领袖代求，神是喜悦的，因为是把至高神放在第一位。后者却有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的本质意味。神厌恶，不喜悦。而"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100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的，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话？

在一中队是守住红豆田的最后一次、也是最艰难的一次争战。靠着主的恩典，维尊守住了。从此后，劳改队的干部没有再干涉他吃饭谢恩的事，虽然谢恩仍然是违法的事情。

在狱中，吴维尊是"犯人中的犯人"，但他说："感谢主，我也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他坚持"不"的原则，坚持"反改造"，那些"被改造"的种种规矩就丝毫不能束缚、捆绑他。

。。。。

三次软弱

然而，他明白，他的刚强和自由完全是靠主的恩典托住他的。若离开了主，他早就倒下去了。他记录了自己曾经有的三次软弱。第一次是解放初期，他作中学教员时，思想改造运动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竟然得到了上级的奖励；他就不知不觉地便想努力在世界的道路上奔跑，与主的关系疏远起来，爱主的心也不如以前了。但感谢神，两个星期后，圣灵光照他，他看到了自己在属灵道路上的危机，靠主的力量，他又重新恢复了与主的亲密关系。

第二次是1956年，他在上海同济中学当教师时，有外单位的人找到他外调，拿出一张年轻人的照片，问他认识不认识这个人。他认出这个年轻人就是51年他在"控诉运动"中发言时，夺走他的发言稿的那位爱主的弟兄。他就如实说了。事后，维尊心里极不平安，他推测，当时这位弟兄可能正在受审查，不知他自己的确认（虽然是事实）会不会带来更坏的效果。维尊当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后来他明白了，自己不应该说任何话，他那样作就是"交代"，因为他的"交代"，弟兄就可能受苦。所以，后来，他为自己立下了"不说话、不交代"的原则，免得自己得罪神。

第三次是他被捕后，66年的时候，有一次预审员让他看了一张纸，上面画着中国地图，其中心是天津市，从中心发出不少射线至全国各地，表明他与各

地主内肢体的联系。预审员说：你看如果这个图不错的话，你就在下面签个字。维尊此时警惕性不高，竟然糊里糊涂地把名字签上了。一回到监室，圣灵就光照他：为什么签字呢？签名不就等于认罪了吗？结果，那天小组长威胁要把他的饭拿走时，他竟害怕起来，赶紧吃掉，生怕被夺走了。结果当晚他就拉肚子，过了放风时间，他没法去厕所，只好用大尿罐，被同室人大骂。第二天他立刻声明，前天的签名错了，要求作废。他求神赦免自己的软弱失败，修复他，重新领他打前面的仗。他从此更认识到：自己并不比别人好，不比别人强。若无主的怜悯，他也照样会犯罪、会失败，甚至比别人败得更惨。他从这种失败中知道自己毫无可夸之处，他只有更加倚靠主。

。。。。

大墙外的无期犯人

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的风吹边了中国大地，也吹进了银川的"宁夏区监狱"，即银川风机厂。

天津系统在宁夏服刑的200多个无期徒刑犯人中，已经陆续减刑释放。70年代中期，还有6名"没有改造好"的人。到78年时，只剩下2个，79年，这两个犯人中的一个重新申诉，当年被释放了，至此，200多个无期犯人中只剩下一个人，就是吴维尊。

当时，写申诉，要求平反的风大起，许多人劝他去申诉，要求平反，他却非

常清楚地表明：自己坚决不去申诉。81年春季，全狱召开每年一次的奖惩大会上，狱方宣布他也在减刑名单之中。宁夏高等法院的减刑裁定书上写着他的无期徒刑已被改为有期徒刑6年，就是说，过6年后他即将被释放。高等法院的裁定书认为，他劳动积极，教学认真，遵守监规纪律，就是他有悔改表现，证实他“确已悔改”，因此给他减刑。而他却认为：这个减刑和6年后的自由不是白送的，是要以“确实悔改”来换取的。“悔改”就意味着自己要把主过去交托他要他作的事当作“罪行”，那是污辱主，抵挡神。他想，如果他认同了这个“悔改”，这么多年的仗岂不是白打了吗？苦不是白吃了吗？这个肮脏的“自由”就这么值得他羡慕吗？主在这事上所给他的十字架他能扔下不背吗？因此他宁可 选择“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希伯来书11:35）的道路，拒绝出狱。

1987年5月28日，他被迫出狱之日，写了“出监日呈文”，致信区高级人民法院，呈文中再次申明自己没有“悔改”的事实。他说：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

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当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由此逐步升级：由传讯到拘留、到逮捕、到提起公诉、到判无期徒刑。）在这种始终不交代罪行一句话的情况下关押了一年半后，主预审员曾对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挑选了我罪行中的几件事主动地向我摊开、谈明、指出错处，叫我回监号后考虑；次日，我给他的答覆是：“昨天您说的那几件事，我没有后悔”。再半年后，在中级法院审判庭上，我除了姓名等，及回答了一个提问（问：你是基督徒吗？答：我是基督徒。）以外，其他询问仍然一概未作回答。

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

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他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长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至于裁定书上所提到的，我"服从管教"这一点，我并不是一概如此的，而是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情况而不同对待的。第一类，例如上面所说到，监狱对我所进行的数不清的改造与管教措施，我是一点儿也没有服从，通通拒绝，而且顽固地坚持了二十几年一直到今天。

第二类，只有与我"犯罪思想与犯罪本质改造"无关的其他规章、命令、布置------则我主观上可说都是认真遵守和服从的（当然也不能说绝对没有缺点和失误）。但后面第二类的"服从管教"行动，是否是我从悔改出发的"悔改表现"呢？恰恰相反，不是我的"悔改表现"，没有一点点是从悔改得到的效果；而正是我的"不悔改表现"，因为入监以前，对同类性质的事，也向来都是这样做的。这里面能找出哪一点是我的悔改呢？

裁定书上还提到我"工作主动"，即生产劳动上或以后的教学工作上等等工作比较认真踏实一些吧，即使不列举我不免有的缺点和错误，而算是有点可取之处的话，那也同样都没有一点点是我的悔改表现，而恰恰是我坚持过去入监前一贯所行的不悔改表现。

把以上种种我服刑期间的一切表现都综合起来，有没有一件大事，或小到如一句语，一个举动那样的小事，是真正从我悔改出发说的、写的、或做的呢？若是有，我愿意承认我"确有悔改表现"，因受到减刑或许也算当之无愧

吧。若是连一件小事都找不到，那么，一个十足的、死不悔改的犯人—我，为什么一定要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硬加上一个虚假的“悔改”名义，给以减刑并到期释放呢？何况，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更不应该趁这个错误裁定之机钻空子，作出将错就错，冒“名”预替的恶事。我非但不是“确有悔改表现”，而恰恰是“确无有悔改表现”，全部是不悔改表现，根本上不具备可以获得减刑的最起码条件，而只能仍是个无期徒刑犯人。

既然这六年来，法院没有收回这个不实事求是的、名不符实的错误裁定；而且我作为被专政的犯人，又根本没有资格硬要法院如何作。在这种两难情况下，“逼”得我没有别的正常方式方法，只能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我这样作，是让法院有充分的足够时间，进行调查了解和重新考虑。如果有哪一天，那个错误裁定被收回、撤消了，也即取消了我的“悔改”之名，当然也意味着恢复了我所原有的无期徒刑犯人的地位，则我将立即欣然结束这个禁食行动，该干什么干什么。

另外，我附带申明一下。从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形势的大大好转，政策上大幅度放宽，犯人待遇及处置上的日益改善，这是有目共睹，无可否认的。监狱从领导上到管理干部们对我这个无期徒刑犯人许许多多关心、照顾、优待等，都是我所身受并平时从内心感激的。在此

谨向监狱领导、科长及其他干部们致谢。（当然，这个方面与上述的那件大事是不相牵连的另一方面的事）。专此禀告。并致敬礼。

。。。。

监狱墙外的无期犯人吴维尊

1987年5月28日他在狱中最后6年时，便清楚神所交托给他的最后一阶段的见证任务，即执行神给他的两个限制。一、定期禁食，以此行动来见证他毫不改变的基督徒内心。自出狱起，他每周一、四吃饭，其他时间禁食。二、不离开银川市一步，不离开风机厂（监狱）单位，站好“墙外无期犯人”的地位和身份。他出狱后就住在神透过监狱为他预备的一间14.6平方米的陋室中，从不离开银川一步。

吴维尊在执行这两个限制时，常常受到许多“劝阻”。狱方领导作他的工作，要他放弃禁食，正常吃饭，甚至带来了“三自教会”的人一同来劝他。还有他的亲人并许多主内肢体也劝他离开银川去别处传道服事神，但他一一谢绝了众人的劝导，不敢擅自取消定期禁食，也不敢离开银川去外地。因为他清楚神已经用列王记上13章所记述的神人的例子对他发出的警戒。神已经告诉神人“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神人却误听了老先知的话，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丧命。

。。。。

中国的以巴弗

1900年的庚子教难中，数以万计的西国宣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殉道；而同时，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等一批二十世纪神要重用的仆人均在1900年前后出生。约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吴维尊、林献羔、李慕圣等一代神要特别呼召的人出生。掌管宇宙、时空、历史的主兴起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归向他，他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呼召、拣选、磨练、使用他所喜悦的人。1920年代出生的吴维尊的同代人们，无疑是神借着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出来的特殊一代。

这批人出生于动荡不安的20年代，自幼便品尝了贫困、战乱之苦，而神的恩典却临到了他们。坎坷的流亡之路，反而把他们引进了永生之门；在沦陷的国土上，他们成了天国的子民。神又借着1900年代出生的王明道一代的传道人在真理上栽培他们，造就他们，并特别在四十年代赐给他们一个大复兴，因为那时“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那是大黑暗、大争战的前夕，神为自己的名预备、造就、坚固了一批将要在黑暗中发光的人。

1949年后，吴维尊和他的同代人们都经历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熬炼。旷日持久的逼迫、批斗、检查、控诉、侮辱、毒打、监禁------这漫长的、看似永无终止之日的苦难在无情地检查着每个人的信心。有人为主殉道了，还有许多人跌倒了、软弱了、退去了。然而，神还是奇妙地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今天，这“七千”忍耐到底的人，虽已逾古稀之年，而他们还是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心志，竭力、忠心地站好最后一班岗。他

们无疑是中国教会的宝贵财富。

而神对他们中每一个人的带领和使用也是不一样的。有人已经在大患难中殉道，安息主怀，有人则经过20多年的监禁后，立刻恢复自己原来的事奉，出狱后不久便恢复了自己的家庭教会（如袁相忱、林献羔），或者是四处奔波来建造、教导各地的教会（如李慕圣）。而神却给了吴维尊一个特殊使命。

1926年，吴维尊出生的时候，母亲为他另取一圣经人物的名字：以巴弗。

查圣经，可看到有关以巴弗的记载共有三处：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作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作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歌罗西书1:7-8）

有你们那里的人，作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嘉并希拉波立的弟兄，多多地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作见证的。（歌罗西书4:12-13）

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腓利门书1:23）

我们看到，圣经中的以巴弗：（1）是基督忠心的执事，（2）他常常为众教会祷告，竭力地祈求，（3）他是与保罗同坐监的。

1949年夏，中华神学院院长毕路得（美国人）离开上海回美时，吴维尊给她写了一个英文卡片告别："亲爱的母亲，请您放心，我一直跟从着我的主。"署名是"以巴弗"。1964年他入监后，就更加喜爱使用"以巴弗"这个名字，因为这可表明他的犯人身份，他盼望自己能作好"中国的以巴弗"。

1955年，王明道写了那篇著名的战斗檄文"我们是为了信仰"之后，于8月10日被捕，他所创办并亲自撰稿的《灵食季刊》便从此关闭。《灵食季刊》1927年正式创刊，28年来担负着以圣经真理造就信徒，以圣经真理指导中国教会道路的重任。至1955年，《灵食季刊》被关闭后，真理的声音消失了，中国教会进入了万马齐喑的黑暗时期。

然而，吴维尊在《灵食季刊》停刊后的50年代后期起，便开始写"主内交通"的书信和短文，寄给全国各地的肢体，鼓励散在各地的弟兄姐妹，坚持自己的信仰。开始的时候，他是用手抄写，后经他三嫂建议，他就用复写纸复写好几份寄出。他被捕的罪状之一就是写信鼓励一位重生得救的青年人退出共青团。

64年入狱后，他开始了"守住红豆田"的争战，至80年春，他的三哥三嫂（不仅是他血缘上的亲人，也更是主内肢体），在辗转找到他的地址后，开始与他联系，并自千里之外看望他。他逐渐与许多主内肢体取得了联系。

80年代初，由于全国大形势的变化，狱中也相对宽松多了。维尊寄出信件时狱方不怎么检查就让他寄出去。所以，自82年开始，维尊开始以“以巴弗”的名义，寄出一封封的狱中书简，题目均为“主内交通”。82年到87年，因为在狱中，他只能一遍又一遍的抄写“主内交通”各文，或者是用复写纸复写。1987年出狱后，写的“主内交通”则是在街上复印多份后寄出的。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80年代初期，经历了多年的大逼迫后，中国家庭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弟兄姐妹渴慕神的话语，家庭教会需要属灵的引导。恰在此时，以巴弗以他清秀端正的笔迹所写出来的“主内交通”自狱中寄出，立刻在弟兄姐妹中流传起来。一篇篇“主内交通”文章，经过无数次复印，无数次地转寄之后，从西北高原的狱中，传到广袤的中原，传到秀丽的江南水乡，传到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甚至穿洋越海，传到海外。

《灵食季刊》之后，神预备了“主内交通”继续服事中国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预备了中国的以巴弗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写“主内交通”。吴维尊在母腹中时，已被神选定为中国的以巴弗。他被神呼召后，读了神学，却没有做传道人，神有他更高的意念。他开始了一种奇特的文字事工，这文字事工导致他进了监狱，而他在狱中又重拾起这文字事工，神借着这些文字鼓励了许多当代信徒。神的作为大哉，奇哉！

“主内交通”每篇页数不等，作者以巴弗每次都是凭圣灵感动而写，所交通的内容，正是当代家庭教会所面临的难题。有许多是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所提的问题和他的回答。这些问题包括：“都软弱、冷淡怎么办？”“神为什么没

有听祷告？”“教会遇到逼迫怎么办？”“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入党？”“三自错在哪里？”面对这些尖锐的问题，以巴弗总是毫不妥协，清楚地写出自己以圣经真理为原则的答案。他鼓励那些软弱冷淡的肢体，指出的出路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不断儆醒、祷告、祈求”；他斥责“假师傅”，告诫教会要“防酵”；他对在逼迫中的弟兄姐妹指出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出路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唯有十字架！他自己是背着十字架、靠着十字架的能力打胜了“守住红豆田”的争战，靠着十字架的能力胜过了漫长岁月的逼迫与苦难，他也鼓励弟兄姐妹背起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他用马太福音5:10-11鼓励弟兄姐妹受逼迫时“应当欢喜快乐”，因为这是主的教导。

以巴弗半个世纪的信仰经历，坚实的神学基础，特别重要的是神把他放在火窑中熬炼多年的生命经历，以及这丰盛的生命所带来的犀利敏锐的属灵眼光，这些条件使他也能像王明道一样，来回答中国家庭教会的问题。

。。。。

主仆荣归

1999年12月12日，他以笔来从事特殊的文字事奉17年后，也把自己的见证记录了下来，题为：“以巴弗—在中国大陆上的一个普通基督徒—吴维他自述一生蒙主恩的见证”，全文结束时，他写道：

现在，我虽然年龄已老，却尚未走到标竿。道路尚未走完，见证尚未作好，争战尚未最后胜利，尚未到达可以唱凯歌的时候。我重新退后的可能性，偏

离主道的可能性，受骗上当的可能性，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前功尽弃的可能性，都还现实地存在着。绝对没有可以放松警惕，躺在蒙恩典之上，去睡大觉的理由。一个一个可悲的鉴戒和惨痛的教训，已经看到不少。求主怜悯保守我，施恩拯救我到底，使我能儆醒的等候，走好尚未走完的每一步，不致辜负主已为我舍身流血的大恩典，得以最终无羞愧地见到主的荣脸。

2002年2月，他写了最后一篇“主内交通”，题目是：“中国教会的毒疮，越烂越大！”他在文中斥责以《哈哈文集》为代表的所谓“神学思想建设运动”实质上就是“改造信仰（圣经真理、神的话）”的运动。之后，他便沉默了。他向弟兄说：“主在近来再没有感动我写什么，没有主的感动，我什么也写不出来。主感动我把过去所写的交通文章找全整理一下作一次系统复印。”

2002年8月，他整理出过去20年来所写的“主内交通”166篇，总字数在100万以上。他分类整理好，编好号码，分装进5个大信袋里，特别托弟兄辗转带给总部在美国的生命季刊出版社一整套。

2002年11月27日至30日，他写了最后的一封信给自己的亲人，在信中他已清楚交待了自己回天家以后的事宜：

我从在监最后六年起（无期减成有期那六年），就越来越清楚父神和主耶稣所交给我、尚未完成的最后一阶段的见证任务—也就是从我1987年出狱之日起，一直到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或主耶稣荣耀降临，我们众圣徒复活见主，穿上与主相似、永不朽坏的灵体，与主一同进入他荣耀国度的那个大日为止的两个限制：（一）执行每周一、四两天吃饭的定期禁食；这个行动是对宁夏法院弄虚作假，说我确以悔改，因而换给我减刑和释放，公民权力和自由

的抗议，表明我自1964年7月天津入狱起，至今一直是死不悔改，没有资格依法给我减刑和释放，应该无期徒刑到底。（二）执行不离银川市一步，不离监狱单位，继续作好一个"大墙外的无期犯人"，也就是相当于政府所说的"养起来的人"。神之所以给我这两个限制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既要我顺服和接受监狱（政府机关）的执法（与我悔改或否无关），出到大墙之外，又要我坚决拒绝和抵制法院的弄虚作假（把我的死不悔改说成是"确实悔改"了）。这两个神给我的限制、或见证任务，在出狱后15近16年来，我丝毫也没有忘记过、忽略过。因此，我才不得已地，无情地拒绝了三哥三姊家和再勉王珍家的爱心和照顾。正由于这个主要原因，所以，不管我衰老到什么程度，请你们各家各人都不要来银川看望我（即使有方便，有可能，也不要来，谢谢，千万不要来）。我始终是监狱（风机厂）的人；若死了，火化，骨灰入土，骨灰葬在南窑，都是最正常的事。什么都挡不住我在末日与众圣徒一同复活。监狱单位只是我在世上长住又暂住的家，直到复活后穿上与主相似、永不朽坏的灵体，与主一同进入永远的家。因为必朽坏的肉体只能仍归土，而不朽坏的灵体才能与主同进不朽坏之神永远的国。十多年来，监狱一直待我好，照顾我；这一点，我在神面前也一直非常感谢政府，特别是感谢监狱单位。暂不多写。主若许可，我每年写一封简信给你们各家；何时死了，我请多年经常与我交往密切的刘万新老弟兄，打电话告诉三哥家，并请三哥转告你们各家。

愿父神和主基督的大恩，常与你们各家同在。

以巴弗

2002年11月27-30日

20天以后，2002年12月21日上午，一对年轻夫妇，前往宁夏银川监狱范围内的吴维尊住所，探望耶稣基督的忠心见证人以巴弗。敲门时，无人应声；他们觉得蹊跷，翻越矮墙入内，见以巴弗服装整齐，带着眼镜，面貌安祥，倒

在地上，已经被爱他的主接去了。

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哥林多前书4:9）

中国教会20世纪的大舞台上，许许多多的圣徒用鲜血和生命演出了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戏剧。以巴弗的生命和见证，无疑堪称为这个舞台上的奇观。

他自被神呼召，就持定了要一生一世背十字架的决心。他被试炼，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被扔进了火窑。被熬炼后出来，却没有烧焦的苦味。他清瘦、慈祥的脸上，总是充满了喜乐的笑容。去探访他的弟兄姐妹很难相信眼前这位谦卑、随和的老人，就是那位笔锋犀利怒斥假师傅的勇士，就是那位为主争战、守住红豆田的战士。

他一生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曾有引起争议的历史。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要奇奇怪怪地“禁食”呢？为什么他要坚持作大墙外的无期犯人呢？
然而，主都知道。他在主面前领受的，他都守住了，而且持守到底了。现在，爱他的主已经把他接去，让他息了地上的劳苦。他能像保罗一样坦然无愧地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后4:7-8）

神在20世纪赐给了我们“中国的但以理”（王明道），给了我们“中国的以巴弗”（吴维尊）。神的作为，大哉，奇哉！

21世纪，神会赐给中国教会什么呢？
我们祈祷，我们等候，看神那奇妙的作为------

萧若枝 中国大陆基督徒。

++

圣经希伯来书11章

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
因着这信心，古人得到了称许。
因着信，我们就明白宇宙（“宇宙”或译：“诸世界”或“众世代”）是因着 神的话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就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
因着信，亚伯比该隐献上更美的祭品给 神；借着这信心，他被 神称许为义人，这是 神指着他的礼物所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借着信仍然说话。
因着信，以诺被迁去了，使他不至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 神把他迁去了。原来在迁去以前，他已经得了 神喜悦他的明证。
没有信，就不能得到 神的喜悦；因为来到 神面前的人，必须信 神存在，并且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因着信，挪亚在还没有看见的事上，得了　神的警告，就动了敬畏的心，做了一艘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着这信心，他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

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寄居，好像是在异乡，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棚里。

因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　神所设计所建造的。

因着信，甚至撒拉，她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能够怀孕，因为她认为那应许她的是信实的。

所以从一个好像已死的人，竟然生出许多子孙来，仿佛天上的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沙那么无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了的，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不过是从远处看见，就表示欢迎，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

因为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他们在寻求一个家乡。

如果他们怀念已经离开了的地方，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但是现在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所以，　神不以他们称他为　神而觉得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因着信，亚伯拉罕在受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就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

论到这个儿子，曾经有话说："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

亚伯拉罕认定，　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因此，就喻意说，他的确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

因着信，以撒给雅各和以扫祝福，论到将来的事。

因着信，雅各临死的时候，分别为约瑟的儿子祝福，又倚着杖头敬拜　神。

因着信，约瑟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事，并且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言。

因着信，摩西的父母在摩西生下来以后，因为看见孩子俊美，就把他藏了三

个月，不怕王的命令。

因着信，摩西长大了以后，就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

他宁愿选择和　神的子民一同受苦，也不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

在他看来，为着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注视将来的赏赐。

因着信，他离开了埃及，不怕王的忿怒；因为他坚定不移，就像看见了人不能看见的　神。

因着信，他立了逾越节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命的侵犯以色列人的长子。

因着信，他们走过了红海，好像走过旱地一样；埃及人也试着要过去，就被淹没了。

因着信，耶利哥的城墙被围绕了七天，就倒塌了。

因着信，妓女喇合和和平平接待了侦察的人，就没有和那些不顺从的人一起灭亡。

我还要再说什么呢？如果再要述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间就不够了。

他们借着信，就战胜了敌国，伸张了正义，得到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消灭了烈火的威力，逃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成刚强，在战争中显出大能，把外国的军队击退。

有些妇女得回从死里复活的亲人；但也有些人忍受了酷刑，不肯接受释放，为的是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又有些人遭受了戏弄、鞭打，甚至捆锁、监禁；

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后期抄本在此加上“受试探”）被刀杀死。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受穷乏、遭患难、被虐待；

原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飘流无定，在旷野、山岭、石洞和地穴栖身。

所有这些人都借着信得了称许，却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使他们若不跟我们在一起，就不能完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

1900年的中国基督徒殉道者

在1900年的义和团风暴中，共有数百名西方在华宣教士及其家属，以及大约23000至25000名中国本土基督徒为主殉道。关于他们事迹的书籍和相关信息，在二十世纪初的英语文献中有非常详实的史料；同一时期（清末与民国初年）的中文文献中也有一定数量的记载。一百年后，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在中文文献中，也开始出现了许多对于英语文献的整理、翻译、综述等等。以下引述本书编者所译的《荆棘冠冕》《中国生命册》中的相关文字。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荆棘冠冕——1900年中国基督徒殉道者的故事》】

。。。。。。。。。。。。。。。。。。。。。。。。。。。。。。。。。
。。。。。。。。。。。。。。。。。。。。。。。。。。。。。。。。。
。。。

十四章

风暴之后

联军进入北京以后，城里的混乱开始平息，和平与安宁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这时，在英国的很多基督徒们，会认为，经过了如此动荡和可怕的事情以后，经过了如此沉重的义和团运动的打击以后，基督教在中国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兴旺的状态了。但是，他们忘记了，基督徒殉道者的血，正是教会的种子。这一点，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在欧洲，或是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都是如此。今日，在中国也是如此。

在北京，当混乱与战事过去以后，老百姓很快就发现，正是那些传教士们，

是他们真正的朋友。SMITH小姐（现在是BIGGIN太太）在北京做了大量的工作，保护百姓，使他们避免受到士兵们的骚扰。她主持了许多基督徒们的工作，也促使了商业区的正常运行。很多百姓从中得到了饮食和生活所需的物品。中国的官员们和百姓们，都很稀奇于这位基督徒小姐的井井有条的组织和管理能力。作为一个很大的荣誉和嘉奖的方式，有八十四个民间商铺，联合起来，制作了一个很大的"万民伞"（这常常是老百姓们联合起来送给官府的礼物，表示感谢），送给她。在那个万民伞上，用金子刻下了每一个捐赠者的名字。还有很多其他的百姓，也都送来许多感谢的礼物。

在天津，虽然有两个建筑非常精美的伦敦传教士团体的教会被彻底焚毁了，但是，BRYSON牧师又开始率领大家，在新的临时场所，继续进行教会的聚会和敬拜活动。在那里，赞美上帝的歌声仍然传扬着。

中国人常常被外国人看作是一个不怎么知道感恩的民族。但是，如果有人认识这些中国基督徒，那么，他们的看法一定会有深刻的改变。那些中国基督徒在历经了磨难和痛苦的逼迫之后，决定制作一个感谢的牌匾，赠送给COUSINS先生，以表彰他在危难时刻，对中国基督徒的极大保护。这些中国基督徒的领导人和牧者觉得，现在，在患难之后，很多基督徒们都非常贫困，应该把制作牌匾的钱节省下来。但是，教会的执事，王先生（他是一位非常热心帮助穷人的人，正如圣经里的巴拿巴一样）说："牧师啊，我们中间总是会有穷人，但是，现在是一个极特别的情况。我们必须对我们在危难中的朋友表达深刻的感谢-----这就是我们的真拿达香膏啊！"

那个美丽的牌匾，被挂在了COUSINS先生家的门口上，上面刻着四个中文大字："信徒保障"。在他的家里面，也有着很多类似的牌匾和卷轴。当时，基

督徒们去赠送牌匾的时候，排成长长的队伍，走在北京的街道上，一起喜乐地唱诵着赞美的诗歌，比如“我们一直向前行”，或是“他带领我”。这些赞美诗，正是前一段时间，许多殉道者在临死前所唱的赞美诗歌。

当他们到达COUSINS先生的住地的时候，COUSINS先生用中国人的礼仪接待了他们，并邀请他们聚集在院子里一个临时搭起的帐棚中。这些中国基督徒的领导人和牧者们发表了讲话。刘峰康先生，是一位口才流利的演讲者。他说到，COUSINS先生在最危难的时候，照顾和收留了他们；那时候，即使是他们自己的骨肉同胞和亲戚，也不愿收留他们，不愿让他们进家门。他说，COUSINS先生所做的，甚至超过一位父母对儿女所作的事情。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COUSINS先生的友善，并且，他相信，即使到天上与主同聚的时候，COUSINS先生所作的，也应当称赞，并得到主的荣耀。这一切事情，正是由于主耶稣基督的原因。

在距离天津十里地的董家庄地区，那里的一位领袖，三十个村子的首领，被义和团残忍地杀害了。在那里，许多基督徒的财产，也都被破坏。后来，那里的基督徒们自己重新建立其一间教会，其中，有一个教室，一个讲道的房间，还有一个牧者居住的房间。这些，都是他们完全自发地，自费建成的。崔先生是那里的牧者，在那里带领着那些热忱的基督徒。有一天，我和那位去世的领袖的太太一起，到那间教会所在地观看。我发现，尽管教会的建筑是崭新的，但是，在那间教会建筑附近，他们基督徒的家庭的房屋却还根本没有修缮，仍然是大片废墟和残缺的墙桓。那位太太回答我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资源，能够同时修建教会建筑，并修缮我们自己家庭的房屋。所以，我们决定，先把教会的建筑盖好再说”。

在沧州，1901年的时候，当MURRARY牧师和PEILL医生回到旧地的时候，沧州的中国基督徒们以及百姓们热烈地欢迎了他们。特别是，当年保护他们、帮助他们逃走的当地官员，梅将军和刘知庭大人，热切地欢迎了他们。

这些官员们非常惊讶、高兴地知道，MURRARY牧师和PEILL医生奇妙而成功顺利逃命。梅将军说："如果要不是你们的耶稣，你们真是不可能逃命了。不要灰心气馁。你们一定会兴旺的。愿你们的耶稣与你们同在！"

此时，这些传教士们也才知道，当初，刘知庭大人是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挽救了他们的。当初，在他们逃离沧州的那一天，刘知庭大人亲自借给他们五头骡子，拉着他们的车。当他们离开以后，刘知庭大人被义和团抓了起来，押去审问。那些义和团的首领，坐在高位上审问他，就像皇帝一样。而刘知庭大人，虽然官衔很高，但是，却被强迫跪下来，向义和团解释为什么要帮助那些"外国鬼子"逃跑。刘先生问他们，是否有任何人能够说出，这些外国人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任何的伤害。刘先生对他们说："那些外国传教士们所作的每件事情，都是对沧州城有利的事情。所有人都尊敬他们"。

最后，经过很长时间以后，他们逼着刘先生交了很多罚款后，才把他释放。释放以后，刘大人连夜逃向远方。在路上，要不是刘大人的卫兵的勇敢护卫，刘大人几乎被路上的义和团暴徒杀死。刘大人逃向南面的方向，在那里躲避，直到梅将军率领的官府部队打败了义和团的队伍。有三千义和团成员在战斗中被打死。义和团的进攻被阻截。这避免了大批义和团队伍进入山东省。

现在，当风暴过去以后，沧州城地区的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对传教士们非常友善。到1903年的时候，在沧州已经建立起了崭新的医院。近处远处的很多官员和民众都来这里参观。

MURRAY牧师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在义和团风暴期间发生了那么多骇人听闻的迫害事件，令我惊奇的是，虽然当风暴过去以后，中国基督徒可以有很多机会，对那些在风暴中行杀害之事的暴徒，采取激烈的报复行动；但是，我们没有听闻过哪怕一次报复的事例。没有任何中国基督徒，作出任何暴力的事情，来找那些凶手算账。对于这一点，梅将军自己可以作出一个强烈的见证。他说，中国基督徒的坚忍与善良，将会在今后的很多年中，收获许多果实。"

PEILL医生告诉我，他曾遇到过一个中国老人，这位老人是一个基督徒，在义和团风暴中曾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遭受到极大的迫害与磨难。尽管这位老基督徒其实对于基督教的信仰，还并不是完全地特别清楚了解，但是，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最喜欢基督教的什么内容，可是，我知道，基督教是一个能够使你面对迫害与冤枉的信仰。耶稣自己忍受的苦难与迫害，要远远超过我们所受的苦难与迫害，而且，他教导他的门徒，也要跟随他的脚步"。

自从1900年以来，有很多在那年殉道的人们的亲戚，本来是不信主的，自1900年以后都开始渐渐地来到教会，想要明白这个"耶稣教"到底是信仰什么的。在所有的地方，有许多新的教会建立起来，也有很多热切地问问题的人，于是-----在教会里，急需牧者和教师们-----因为在义和团风暴中，教会中的许许多多牧者和教师们都在1900年殉道了。

有上百、上百的人们，急切地等待着受洗，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牧者，来给他们施洗，也没有足够的教师，来教导他们圣经。

来自池州地区的消息，也是同样。在那里，有三百个村庄中都有中国基督徒。有上千的人，等着想要受洗，但是，却缺少足够的牧者和教师。

没有什么，比我最近的一次经历，更让我感动和心碎。我和MURRAY牧师，以及我的儿子，一起去访问杨家寨的教会。在那里，有一位年老的牧者，姓王。他是他们一家八口中仅存的一个人。其他人都在义和团风暴中被义和团杀死，为主殉道了。他们一家的男女老少，都曾经是非常热忱地学习圣经的学生。以前，每当传教士来到他们村子的时候，他们总是和村里的其他基督徒们一起，围着来客们说："你们好不容易又来了，千万别休息。我们有那么多事情想要向你们询问"。

在义和团风暴期间，当王先生的家人们准备逃到远方的时候，他们被义和团堵截、抓住。在义和团的刀剑之下，他们都作出勇敢的见证，并被义和团残忍地杀害了。其中，包括王先生的老母亲，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妇人。

后来，当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有一个从前的义和团的成员，讥诮地问王先生说："你们到底有什么证据，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是真的？为什么，你们的耶稣不救你的家人，却使他们被义和团杀死呢！"

这位王先生平静地反问说：“证据？你是问证据吗？你看，证据不就在你眼前吗？你们杀害了我的所有亲人，毁灭了我的骨肉，但是，我却没有向你寻仇。难道你还需要别的什么证据，证明我们的信仰是来自上帝的吗？”

有一位村长也是对MURRAY先生说同样类似的话。他对MURRARY牧师说：“我看你们的信仰一定是来自上帝的，是来自天上的。否则，经过了1900年那么可怕、惨绝人寰的事情以后，你们这些外国人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这里来传福音？我看，与其说是上帝的能力使中国的教会仍然存在，不如说，是他的爱，使你们仍然愿意给人传福音，挽救人的灵魂-----尤其是，在你们经过了那所有的苦难以后！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爱。”

当我们离开那里之前，教会里的会众们为送别我们，唱着这样的诗歌：“我们同受苦难和痛苦，我们天各一方，但是，我们要在天上相聚，永远也不分离.....”

这歌声，在我的耳中从未如此甜美，因为唱歌的人们，自己就曾经亲身经历过那些苦难和痛苦。

MURRAY牧师的温柔，也非常令我感动。他对基督徒们耐心的鼓励和安慰，使他们从伤痛的心情中走出来。他告诉他们，那些为耶稣而死去的弟兄姐妹们，是何等地荣耀。MURRAY告诉我，当他在灾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曾看见一位老基督徒，伏在桌子上痛痛地哭泣。这位老基督徒的老母亲，和所有的儿子们，都被义和团像对待罪犯一样，残忍地杀害了。那被杀时的惨景，令这位老基督徒恐怖而羞耻。现在，这位老基督徒逐渐认识到，在那悲

惨的日子里，有这么多基督徒殉道者的见证，他们为了主而死，这是何等大的荣誉和荣耀。

这正如燕山地区教会的一位基督徒，孙女士，对那里的一些年轻妇女们所说的话。当时，这些妇女们正在被义和团关押着。而在关押监狱的墙外，当时，正在开始燃起熊熊的大火。这些妇女们正在为将要临到的死亡而惊恐万分地哭泣着。孙女士说："如果我们心里有着真正的信仰，并且，为基督而死，那么，这就是一件极其伟大的荣耀。无论是任何人，都早晚有一天要死的。我们就像是野地里的草。如果我们反正是要死，那么，就让我们为了义的缘故而死吧。"

然后，孙女士接着说："我相信，在这次患难之后，今后一百年内，中国再也不会有像今天这样为主而死的机会了！"

我们一行人，告别了杨家寨。这是我们在华北地区的最后一站。在那广大的中国北方地区，有很多是中国基督徒殉道的地方。

我们临行前，有很多基督徒来送行。其中有教会的执事，王先生。他站在他们一家七位死者的墓碑前，我儿子给他照了一张相片。他，以及许多其他像他这样的人们，为了基督教的原因，失去了他们在这个世上最宝贵的亲人和财富；如今，他在这个世上仅仅是孤身一人。他们在村子里，已经建起了新的教会。福音的工作，传播得更加普及而迅速。他们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牧者和教师。送行的人们总是反复地问我们："为什么你们不能留下来呢？还有更多的老师来到我们这里吗？"

哦，是啊，愿每一位读到这本书的人，听见主的呼召！在这里，有着极大的需要，来服事我们主的工作！我也盼望着，所有那些不能亲自来到这些中国基督徒殉道者墓碑前的人们，正在为了基督在中国的教会而迫切祷告，并献上他们的礼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中国生命册——1900年中国基督徒殉道者》】

。。。。。。。。。。。。。。。。。。。。。。。。。。。。。。。。。

。。。。。。。。。。。。。。。。。。。。。。。。。。。。。。。。。

。。。。。。。。。。。。。。。。。。。。。。。。。。。。。。。。。

。。。。。。。。。。。。。。。。。。。。。。。。。。。。。。。。。

。。。。。。。。。。。。。。。。。。。。。。。。。。。。。。。。。

。。。

十一章

记念

===

这 些 人 是 从 大 患 难 中 出 来 的 ， 曾 用 羔 羊 的 血 ， 把 衣 裳 洗 白 净 了 。所 以 他 们 在 神 宝 座 前 ， 昼 夜 在 他 殿 中 事 奉 他 。

===

1901年的夏雨，浇灌在数以千计的无名坟墓上。一年前，义和团们、以及清军士兵们手里拿着刀剑，四处搜索，追杀每一个逃脱的人。外国使馆区被包围、攻打、炮击。许多人死了。使馆区几乎被攻陷；里面的成千上万的人，几乎全部被彻底屠杀。后来，外国军队来了，也带来严厉的报复。义和团们开始逃亡了；而那些曾经亡命于天涯的难民们，则从山区与荒漠之中，回到了家园。他们试图挖出地里或是路边的那些遗骨，放在棺材里礼葬。很多时候，很多逝去的人，他们的遗骨再也找不到了。

很多个月份过去了。在教会的代表和政府官员、以及村庄的长老之间，开了很多次协商的会议。他们决定，召开纪念与追思的聚会，来记念那些殉道的传教士们和基督徒们。他们的服事与奉献，让所有听见的、真正明白的人都极其感动。对于官府来说，这样的追思会是对那些殉道者、被迫害者的一种补偿；因此，他们想大张旗鼓地操办追思会。而对于那些还活着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来说，这样的追思会是对传教士、基督徒殉道者的生命所寄托的友爱、思念之情。

不到1901年1月，许多传教士们的珍贵遗骨已经被收在棺里；不过那时只是普通而草率的埋葬。1月，德国士兵进驻山西。

1901年7月，一队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士兵的护卫下，进入山西这个曾经残暴遍地的省份。一年前，仅在太原，就有四十五名传教士以及许多中国基督徒被杀。现在，短短一年以后，这些来到山西的新一批传教士们得到山西省最高官员们的热情接待。在太原，官府接待的仪式极尽荣耀和华丽。
ATWOOD博士记述到：-----

“一年前的今天，传教士们与中国基督徒们的遗体就躺在这个官府衙门外的路边，没有人管；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只有几百米。......而我们现在所得到的这种欢迎仪式，虽然盛大，但却是空洞的。并无助于那些曾逝去者们的荣耀。如果那些逝者们能看见、并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那么，他们或许会满意地明白，我们现在这样忍受官府仪式的繁文缛节，是为了神的国度在中国的益处与希望......”

ATWOOD博士在描述他于1901年7月23日来到太谷城时所受到的接待时，写道：-----

当我们到达裴村（在太谷城北五公里）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许多人站在村外、路边，也有很多士兵、以及二十四面旗帜；其中的两面旗帜上写着"荣耀"。我从车上下来，向村镇里的乡绅们致礼。这些乡绅们，都穿着正式的礼服，聚集在一起。有一个很大的主席台，上面包裹着许多彩布；礼炮声中，我在这里向太古城的所有大小官员们、乡绅们致礼问候。然后，在茶点会上，我们再次互相致礼。这时，一队士兵前来，在我们面前单腿跪地，致以皇室般的礼仪；我登上官府为我准备的大轿。我们一行就这样向太谷城内前行。进城的时候，又是一轮礼炮的齐鸣声音；欢迎的队伍走在前面，那个引领的旗帜上，仍然写着"荣耀"。

当我们经过乌马河的岸边时，我们遇见更多的、成群成群的普通百姓。在垂柳荫下、青草地上，有一群大人和孩子；他们的脸庞比别人更明亮、衣服更清洁。从很远的地方，我就立刻猜出了他们是谁。他们就是我们可怜的太谷教会中仍存活的人们。当经过他们的时候，我从轿子上向他们挥手行礼；他们的忧伤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我们的队伍经过了太古城的主要大街，经过了城中的衙门，来到一个辉煌的宫殿般的住所。在我们到来之前，为了迎接和款待我们，官府专门为我们精心安排了这个地点；孔祥熙花了很多心思帮助官府在其中布置。

我们安顿下来以后，太谷教会的成员们很快就来访问我们。我的心，我的双手，都已经情感满溢。刘华诚（他是刘执事、刘凤池的孙子）进来了，我一把就把他搂在怀中；我们抱头痛哭……

太古城的官员们决定，在城东一公里的一个地方，修建殉道者陵园。1900年，在太谷屠杀悲剧的三天之后，当时，传教士们的遗体、以及与他们同死的中国基督徒们的遗体，被放在车里、拉到城南的一个地点，被草率地掩埋在那里。1901年1月，这些遗骨被掩埋在南城门外的一个地方。

1901年8月9日，有一个特别的典礼。在南城门外的墓地那里，建起了三个阁楼，其中，在鲜花与锦绣之中，是一些贵重的棺材，装着殉道者的宝贵遗骨。在中间的阁楼里，是六位太谷传教士殉难者；右边的阁楼里是十位在汾州遇难者的遗骨；左边是十四位太谷教会与传教士们同死的中国基督徒-----刘凤池执事，路德，尚医生，以及其他的人。

在这里的纪念仪式结束以后，一个长长的队伍出发了。队伍中，有三十个非常大、非常精美的木质牌匾；每一个牌匾由二十个人抬着；另外，有几十个举旗的人，以及举着荣誉徽章的人们；队伍中间是抬着六位传教士遗骨的人们。城里所有的官员们、乡绅们，也都在队伍之中。还有按着中国传统、很多穿着白衣、哭丧的人们，也在队伍之中。队伍缓缓地经过太谷城拥挤的、人头攒动的街道，来到太古城教会的旧址废墟处。在那里进行了短暂的纪念活动以后，典礼、扶棺的队伍向城东外的、新建的殉道者陵园走去。在城外的大道上，人群的队伍的长度，绵延了大约两公里。

在那个美丽的陵园里，在纪念的活动中，中国官员们、以及乡绅们，对那些

曾被他们害死的（或是被他们前任害死的）传教士们、基督徒们，致以最大的敬意。然后，他们退到后面。在一些简单的基督徒仪式之后，那些死者的棺材，被隆重地埋葬在坟墓里，-----在高大的榆树下，在美丽的鲜花中。在传教士们的墓旁，是十四位中国基督徒们的墓，围成半圆形。

在殉道者陵园的门外，树立着一个美丽的纪念碑。在纪念碑的中央，是一个黑色的大理石，上面刻着三十位殉道者的名字。碑上还刻着一行话：

“他们为了真理而死；那真理，必将传遍地极”。

愿神使这件事情成就！

1901年9月、10月，在太谷城方圆十五公里之内，九个村庄里面，分别举行了基督徒殉道者的追思会。在太谷地区，共有八十名基督徒殉道，进入主的安息之中。

===

通州的周边地区的追思会

下面讲述的事情，是通州城周围的五个村镇中，为八十三名基督徒殉道者所

举行的追思会。

1901年3月，有一个奇怪的队伍，在北京与通州之间的光秃秃的褐色田地之间行进着。在队伍的前方，是一个六人的骑兵行列；紧接着的，是两个很大的军车，军车中装载着很多士兵；再接着，是一个三人的骑兵行列。随后跟着的，是一个三十六辆马车的队伍。首先的两辆马车上，坐着的是传教士夫人们；其余的马车上，则坐着中国男人、妇女与孩童。还有一个白色轿椅，上面坐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妇女。队伍的后面，是两名骑在马上的外国传教士。在队伍中，有些马车上，按着中国传统，覆盖着一些白布，表示哀伤。

这个队伍转了一个弯，沿着街道，来到富河村的村口。走在前面的骑兵，他们的军装上的黄布带在风中呼喇喇地作响；走在后面的是军车与马车，鱼贯而行。有一个约五十米长的长廊，其中，一个挨着一个地摆放着一长排棺材。这些棺材上都写着逝者的名字。有六个孤儿，上前站在他们的父亲或是母亲的棺旁。高鑫，脸色苍白而平静，带领着我们走过那些摆放着的棺材。中间的一个棺材里面是他的母亲。高鑫在他母亲的棺上放了两束白花。在他母亲旁边，还有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岳母、以及其他亲人的棺木。接下来，还有教会学校曹老师、曹太太、以及曹老师两个女儿的棺木。曹老师一家中，只有他十岁的儿子幸存下来；他用双手遮住自己的脸，轻轻啜泣。在队伍中，所有基督徒的眼中，几乎都是噙满了泪水。

而在那些旁观者的人群中-----其中很多人都是村镇中的首领，也是组织这次葬礼的人们；还有更多的那些旁观者，只是来看热闹的-----所有的人都保持

着绝对的安静。他们或许是因为忌惮这场面的伤感，而极其静默；也或许是由于，为了一年前他们所参与的暴行而在心中反省、悔罪。

有时，我们会在人群中看到那种曾经非常熟悉的眼神和表情，就是那种在义和团风暴以前就有的，对“外国鬼子”非常厌恶与嘲讽的眼神、表情。然而，或许是因为人们极度悲伤的气氛，又或许是因为军队士兵在场，-----使得围观的数以百计的人群，非常安静而静默。

葬礼正式于第二天早晨举行。我们所去的每个地方，都挤满了人。穿白衣的哭丧的人们，站在每个棺材旁；所有在场的人，都带上一个白色的肩带，表示对死者的哀悼。葬礼的主持者，以及首领们，站在停放棺材的长廊的对面；在这一侧，是另一个长廊，上面挂着许多卷轴，上面写着许多话：“为真理而死”“舍身取义”“安息天国”，等等。

在葬礼上，大家朗读了《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其中的话语，极其适合于对这些殉道者的描述。他们是受磨难、不肯苟且得释放的人；是经受羞辱和鞭打的人；是被石头打，被刀杀的人；是在旷野和山间流浪、在山洞中居住的人。

我们在那个新建的墓地前，站了很长时间。那些棺材被放在坟墓中。这是神的土地，是永远圣洁的地点。我们在那里举行了极其感人的追思仪式。

在曹方村，有十一口棺材摆放在路边的遮阳布下；其中只放着来自基督徒家庭房屋废墟中很少的一点遗物。当时，义和团暴民在凌晨的时候，点燃了房屋，杀死了其中两位老妇人，和一个四岁的孩童。有两个十一岁的女孩（其中一个是李铁贵的女儿）趁着黑夜逃走；后来，经过无数的患难与曲折，她们逃到了我们在北京的避难所。今天，这两个女孩与我们同行，来到这里。

这个村子提供的棺材，与我们在别处所进行的葬礼中的棺材质量相比，要差很多；而且，在葬礼中，那些参加的村民们，也比别处的人群要显得冷漠一些。那些来葬礼中哀悼逝去亲人的人们感受到了这一点。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妇女，挨近一个棺材；其中是她的孩子。稍远处的一个棺材里，是这个妇女的岳母。当追思会开始的时候，这个妇女在发言中说："我不哭。那样只会让你们称心满意"。她的倔犟而自尊的眼中，果然没有滴下一滴泪。她用清楚的声音，大声地唱着那些熟悉的赞美诗中的每一句歌词。追思会结束以后，她岳母的棺材被打开了。这位妇女看着棺材里面，然后，抬起头来，眼睛里好像要冒火。她面向人群，大声地说："看看你们所做的事！这里只剩下一两根可怜的骨头放在棺材里！她在这个村子里，从来没有害过一个人；连一只狗，她都没有伤害过。我可以站在这里，看着那些杀她的凶手！"

礼拜五的一大清早，我们启程向南，去往一片最大的田地。当我们走在那些熟悉的道路上的时候，回忆，仿佛像洪水一样，冲到我们的脑海里面。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走近牛牧屯。这里是我们通州地区的第一批殉道者死亡的地方。他们是在1900年6月6日被害的。

我们看见，一公里之外，已经有很多人群在等待着我们。有一些镇子里的乡绅们来迎接我们。

在我们一行人当中，有位传道人，是李先生。在义和团风暴期间，他曾经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和新婚妻子被残酷地杀害；他自己也奄奄一息地倒在燃烧的房屋废墟之中；他的肚子被扎破，脸上和手上都被严重烧伤。

此时，在牛牧屯的棺材中，躺着十三位基督徒的遗体。其中有几位，是他们在逃到别处以后被杀的。

从牛牧屯走到永乐田，共有十公里的路程。那里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站点。昔日，我们的同工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女子学校，都在永乐田镇的外围地区。

这里曾经是我们基督徒最幸福的一个地方；在其中曾有许多友爱人们、和互助的氛围。在这里，无私的父亲，在一天的工作之后，曾经热忱地教导孩子们关于圣经的事情。在这里，那些患病的、悲伤的、受苦的人们，曾经总能找到帮助和关怀。在这里，传教士们曾经得到大家最热烈的欢迎。在这里，李铁贵曾经是我们最亲爱的弟兄。

我们走过那一片曾经是幸福家园的地方。如今，那些地方已成为一片废墟。就在不远处、靠近路边，有一个临时搭建的亭子，其中停放着一些棺材。那些棺材中，是李铁贵、他的妻子、他的三名幼子，以及一些其他基督徒们的遗体或遗骨。

在街道的两边，人头攒动。我们的车队停了下来。李先生的长子和两个女儿，缓缓地走向那些棺材。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几天前，在富河镇、以及曹方村，他们刚刚告别他们的祖母、以及其他的至亲、至爱的人们。现在，他们依偎在棺材旁，在整个追思会的过程中，一直在伤心地、默默地啜泣！李先生的妻子是高鑫先生的唯一妹妹。在富河，高鑫刚刚埋葬了那么多亲爱的人们。现在，他的苍白而平静的脸庞，安静地望着那些棺材。

杨太太，在义和团风暴期间，在那个六月的盛夏恐怖天里，曾躺在路边的沟里，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被慢慢地刺死。现在，她站在长长的人群队伍中，静静地看着自己女儿的棺材。她仿佛仍然能够看见，女儿遗体的脸上的刀伤，正如她在去年六月天所看见的一样。

在所有的纪念活动和聚会中，下面这件事情最让我无法忘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们唱"我为基督而活"这首歌时的场面。当时，那些逝去亲人的人们，在努力压抑着哭泣的声音；而在人头攒动的围观人群中，一半是好奇，一半是害怕。当李先生的教会学院的一名同学，眼中噙满了泪，发言、追思逝者的时候，在围观人群中有一个新来的人，从后面笑嘻嘻地挤上来。这种轻佻的气氛引起了那位发言者的义愤。

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到这里是来看戏。你们应该羞愧地低下头来。你们应该和这些孩子们一起哭泣-----就是你们，使他们成为了孤儿”。

无论在哪里举办纪念和追思活动，我们都清楚地表明，“耶稣教”并非是要为殉道者的流血而报仇。“主说，复仇在我，伸冤也在我”。有一个基督徒对来参加追思会的围观群众说：“你们所能作的最好补偿，以及，对那些逝者所能作的最好纪念，-----就是，你们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归向那位救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些殉道者为之而死的救主”。

有一天晚上，时间已经太晚，我们得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去墓地。我们在城外临时住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天空非常清亮美丽，当我们走向殉道者墓地的时候，空气中有着一种极其清香、迷人的、春天的怡人气息。道路两旁的麦田，已经开始泛绿。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们的信心与盼望，就是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在这片鲜血与苦难的土地上，我们能够看见更多“果实”；-----这样的盼望，就是我们此时在伤心而黑暗的

时刻中所能得到的极大安慰。

在我们返回北京的四十公里的途中，有一首追思会中的赞美诗，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

播种之后，是庄稼
大雨过后，是丽日
困惑以后，是明晓
痛苦之后，是和平
哀愁以后，是喜乐
风暴之后，是安宁
疲乏以后，是安息
那是最甜美的安息

===

在通州城内的追思与纪念活动

在义和团风暴后，俄国、法国、日本的士兵们占据了通州。这些士兵们的罪恶与暴虐，给通州城带来双份的苦难。

1900年夏季6、7月份间，通州的两处教会驻地完全被摧毁。没有一块砖，还垒在另一块砖上。没有剩下一棵树、一株灌木、一团青草。那曾经的基督徒的房屋与学校，现在都变成了一片荒芜。

通州城里的邮局，电报站，外国人开办的工厂，等等等等，所有一切带着外国人痕迹的东西，都在义和团风暴期间被扫荡一空。

1900年8月，另一场风暴又来了。通州的妇女与儿童，挤在通州灰色城墙的角落里，睁着恐怖的眼睛，看着俄国士兵们残酷的疯狂报复，看着他们嗜血与奸淫的暴行。那些母亲们紧紧地抓着女儿们的手，从高处跳下，想要得到死亡的释放。通州的井里，堆满了自杀的尸体。一个疯狂的母亲，把她的小女儿举起来，扔到一个大水缸里。这样，她就不会看见女儿在刺刀之下的痛苦。

城中到处是火光与爆炸的声音；遍地是瘟疫与毁灭。通州城所经历的灾难，就像是巴比伦所面临的咒诅一样。在通州凄凉的街道上，在井水里、池塘中，那些无名的尸体在腐烂着；在这些死者中，谁知道哪些是死于义和团之手下，哪些又是死于那些疯狂报复的外国士兵之手下？

那些外国的军队，占领这座可怜的通州城已经一年多了。渐渐地，街道上又恢复了往常的气息、和热闹的景象。难民们回来了，一砖一瓦地盖起了临时的简易的家。通州的河流与运河中，又开始有熙熙攘攘来往的船只。火车的轰鸣声又开始传出来；那是轰隆隆地进出北京的火车。1901年秋天，外国军队开始撤离。这时候，传教士们和中国本土基督徒们，可以开始在通州城

里，为1900年殉道者们举办追思和纪念活动-----正如他们在三月时，在通州郊外乡村中所举行的追思纪念活动一样。

1901年12月的一天，在通州城的河岸边，建起了一个庄严而肃穆的红色纪念场地。在那里，停放着六十六口棺材。其中有的棺材是空的；但是在每口棺材上都刻着一个名字。那些名单中，包括了亲爱的李执事，耿先生，唐太太。在那里还有一些是专门为婴儿、孩童而制作的小棺材。

有两百人从北京来，向那些逝去的至爱者们，作最后的道别。美国的传教士，以及我们亲爱的CONGER上校，也来参加追思会和悼念会。CONGER上校曾经与我们在使馆区被围困期间，并肩战斗和自卫，与我们同呼吸、共患难、共伤悲。与CONGER上校同行的，还有中国的马将军。马将军率领的戎装整齐的部队，为葬礼的队伍增添了庄重与肃穆的气氛。

在那长长的送葬队伍中，有一千六百人，抬着牌匾，举着旗帜，以及其他的徽章。教会学院的学生们与朋友们，穿着白色的丧服。

送葬队伍从通州城的东门，穿城走到了南门。整个送葬队伍走过了城中教会旧址的一片废墟。队伍从头到尾，用了一个小时才走完那个教会旧址。在通州城外，已经建立起了崭新的、美丽的教会学院建筑。在那片地旁边，六十七口棺材在那里永久安葬。安葬坟墓的时候，教会学院的、穿着白衣的学生们唱着那些盼望、得胜与和平的赞美诗歌。

==

==

保定的追思悼念

在保定城北郊、大约距离城墙两公里处，在一片花园和农田之间，曾经是长老教会的地址。然而那个教会建筑物于1900年6月30日被烧毁了。那里曾经居住着SIMCOX先生与太太，还有他们的孩子PAUL，以及一岁的漂亮女孩，FRANCIS。那里也曾经居住着TAYLOR博士。他在整个保定城都很著名，因为他的医疗技艺精湛；他全身心都投入在照护病人的工作中。那里也曾经居住着HODGE博士和太太；他们是极有魅力的传教士夫妇。

在那个1900年6月的礼拜六的下午，这些传教士们，以及与他们同死的九名信实的中国基督徒们，有没有透过二楼的窗户，看见远方的平原上，那些义和团暴民们，手中拿着刀剑，从保定城冲出来？

我们后来知道，当义和团来到门前的时候，传教士们与中国基督徒们都聚在楼下建筑物中、SIMCOX的家里；而TAYLOR博士试图透过二楼的窗户，对义和团暴民说话。可能TALOR博士对风说话都更容易一些。这些义和团们，带着一种奇怪的疯狂和愤怒，根本不去想，TAYLOR医生曾经在平日里医治过他们中间的那么多人。SIMCOX太太为自己的婴儿求情；然而，在那些嗜血暴徒的眼中，母爱，根本算不上什么。

那些暴徒们大喊着："杀！杀！" 然后把带来的燃油堆放在门前；然后点燃整栋建筑。在那些暴民中参杂着的看热闹的村民们，后来讲述，他们看见儿童们在火中奔跑的样子。那种痛苦，一定让我们坐立不安。但是，我们确知，在那火中，有一位与他们同行，好像人子。

九个月以后，1901年3月的一个早晨，在保定的北郊，我们看见了葬礼与追思会的队伍。人头攒动着，涌出城门，涌向那曾经的长老教会的地址。在那里，只剩下了一些残垣断瓦。但是，那里搭建起了一个很大的纪念台；在一个鲜花簇拥的牌匾上，刻着每位殉道者的名字；那些人，现在都已经乘着火车火马升到了天上。在纪念台的四面八方，挂着许许多多的旗帜；旗帜上绣着描述死者的贞洁品德的字句。那些旗帜是由保定当地的乡绅们以及商人们所预备的。

在纪念台那里，站着十五位传教士；他们都是从北京来的。另外，站在前面的，还有VON KETELER将军，以及许多德国与法国的军官们。保定城的所有高级官员们，包括省里的最高长官们，财务官，律事官，市政官，各级大人们，等等，以及他们的随扈，也都在那里。

在德国军乐团的低沉而优美的音乐中，安静、肃穆的悼念会开始了。一个热爱那些逝者们的人说，这些逝者，就像是坚守战斗岗位、舍生忘死的士兵一样。他们有一位主、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对他们说："你们要走遍地极"。

有人发言，讲述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与话语；那些殉道者们，正是在跟随着他们的主的脚踪。

也有人讲述了那些烈火的试炼，那些短暂的痛苦，以及《圣经-启示录》中所讲述的，那些数不胜数的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的圣徒们。

德国乐队又演奏了《上帝是我们的大能堡垒》。这把我们带回到马丁路德的风暴时代；提醒我们，神有时使失败转为胜利，使死亡转为生命。

在一些其它仪式与活动之后，中国的官员们，按着他们的品阶，依次走上前去，在镌刻着殉道者名单的牌匾前，低头弯腰、以示尊敬。这些殉道者们，都是被那些官员们所害死的。

在中国官员之后，一队一队中国民众也走上前去，向殉道者们-----传教士们、以及所有其他死去的中国基督徒们-----表示尊敬。

在那一天，我们探访了三处墓地。一处是城外南郊的美国传教士协会旧址；那里将是PITKIN先生、杜太太、以及一些小孩的坟墓所在地。另一处也是城外，是MORRILL小姐、GOULD先生、以及四位中国内地会教会成员的坟墓所在地。他们在那里死于义和团的刀剑之下。还有一处是在城内的一个沟内。在

那里，孟牧师被折磨致死；并且，MORRILL小姐以及其他传教士们曾经在那里被关押。

又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晨曦照亮了保定南郊外那些旧址的废墟。就是在那里，九个月之前，1900年7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发生了屠杀悲剧。1901年3月的这个礼拜天的早晨，在那里，搭建起了一个很大的纪念长廊；里面停放着二十六口尊贵的棺材。在纪念长廊的外侧、正对面，有一杆大旗与横幅，上面绣着十字架与冠冕，还有一行话："以喜乐面对苦难"。在旗帜与横幅上，写着美国传教士协会三位传教士们的名字，还有四十三名中国基督徒殉道者的名字，以及四位英国传教士们的名单。

常青藤，以及鲜花锦簇，摆放在棺材上面。在那些棺材前面，也摆放着许多美丽的、一盆一盆的鲜花。在纪念长廊的两侧，有三十四个横幅，上面写着殉道者们的见证。在那些见证文字中，有很多"忠心至死""与主同活""十字架上的馨香之花"，等等这样的话语。

在那些见证文字中，有超过二十个横幅是关于孟牧师的。那些关于孟牧师的见证文字，很多都是出于非基督徒之手-----是那些乡绅们、官员们、以及商业协会的人士们写的。当我们阅读那些横幅上的文字时，我们意识到，孟牧师就是那种-----虽然死了、但却仍然在说话的人。

在追悼会的人群中，有一百个身穿白衣的哭丧的人。人群中还有提多；他是

孟牧师唯一存活着的家人。在经历了数个月的困苦患难与流浪以后，当义和团风暴过去以后，提多一直在北京学习，已经有几个月了。

人群中还有高牧师，以及妻子和女儿杰熙。有一个妇女身穿白衣，头上缠着白色的带子，正在为自己的丈夫而悲戚。义和团风暴期间，她和丈夫被关在监狱里，受尽痛苦；出狱后不久，丈夫就去世了。

在教会的得胜者名单的卷轴上，还有一个殉道者。不过，他的遗体已经找不到了。他曾隐藏在庄稼地中，死于饥饿与患难。所有其他的那些殉道者，都是死于义和团的刀剑之下。

在哀悼的人群中，最伤心的，是那些保定教会女子学校的十五位女生们。当初，在义和团灾祸来临前的、迫在眉睫的时期，MORRILL小姐和GOULD小姐成功地把学校的学生们送到她们各自在乡下的家中。后来，经过了极其可怕的困苦患难以后，经历了极其奇妙的拯救以后，如今，她们又重新相聚在保定。有一个年轻的妇女，是学校的助理教师。她对我们说，当义和团的危险来临前时，MORRILL小姐曾与她一起下跪祷告，然后，把她遣送走，并鼓励她说"要信靠，不要害怕"。

追悼会的形式，与长老教会的追悼会形式很相似。法国军乐队演奏的哀乐尤其凄美动人。在纪念长廊前，以及在广场中，哀悼的人群都一起有一个庄严肃穆的默哀的时间。来到棺材前行礼的德国和法国军官们都没有说一句话，而只是恭敬地在棺前致敬。中国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以及他们的随从们，也都依次进前来、在馆前，毕恭毕敬地行礼致敬、深深地鞠躬。

然后，中国本土的乐队开始演奏。三百名抬棺的人们，开始把棺材抬到墓地。悼念的队伍也随之前行。那些旗帜与横幅，也被高举着、随着悼念的队伍前行。

在队伍的前列，是中国乐队，以及三十四个见证的横幅-----都是写在洁白的丝绸布上。然后，是那些棺材。有的棺材上铺着极其富丽的、镶着美丽刺绣的绸布。在抬棺人群的旁边，是那些穿着白衣丧服的人们。随后，是二三十辆马车，上面坐着妇女们。

长长的悼念队伍，沿着保定郊外的大路，蜿蜒前行，向墓地走去。在道路的两旁，人山人海的群众们，在迎接着悼念队伍。这些人山人海的群众们，现在如此动情地看着那些被抬着的棺材；九个月前，是不是这些同样的脸庞，也以仇恨的目光，看着那些被迫害的基督徒们、传教士们呢？-----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城里，同样的人群喊着“和散那”，也会喊“钉他十字架！”

我们站在崭新的墓地边；这里就在PITKIN家的旧址废墟旁边。二十六个棺材都被埋在这里。我们唱着优美的中文赞美诗：-----

黑暗以后是光明

损失以后是收获

软弱之后是强壮

荆棘之后是冠冕

痛苦以后是甜蜜

恐惧以后是盼望

流浪以后是家乡
眼泪以后是赞美

遥远以后是亲近
昏暗以后是亮光
孤独以后是热爱
坟墓以后是生命
疼痛以后是幸福
公义之路通永恒

然后，在祷告与祝福以后，每人拿起一捧土，撒在棺材上，离开了那个永远圣洁的地点。

和平的百合花，遮盖了那曾经是可怕的屠杀场；在我们所有至亲之人的坟墓那里，已经长出美丽的花朵，那是世人所未曾明白的爱、和平、与美丽。

。。。

十二章

向前眺望，向上仰望

犹 大 家 所 逃 脱 余 剩 的 ， 仍 要 往 下 扎 根 ， 向 上 结 果 。

==

那些“逃脱余剩的民”-----我们曾经看见，他们躲避了那些可怕的风暴；我们曾经看见，他们站在其他殉道者的坟墓面前哀思。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们“修造荒废之处、重修路径”的工作。

那些外在的风暴、压力和苦难过去了；然而，在他们心里的痛苦和矛盾却没有过去。火与剑所带来的悲剧过去了；然而他们的内心生活中的悲剧，却仍然在千千万万个村镇中的基督徒生命之中。

你可以设想一下，当他们回到那个小村庄-----那里曾经是他们最幸福和温馨的家-----去在废墟之上重新修建房屋，在古树被拔出之地重新种植树木，去在那洒血之地、至亲死亡之地重新耕作-----却不在心中怀恶念、不报仇-----那是多么的难过、煎熬和痛苦吗？

那些邻居们又是谁呢？他们就是与那些义和团凶手们经常在一起的人们。

那些昔日的凶手们、首领们仍然执掌权力、威势张扬，就像是根深蒂茂的树木，肆无忌惮地四处伸出根茎和枝叶。而那些内心伤痕累累的基督徒们却要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恶人的路必不得兴旺"。

在义和团灾祸过去以后的一年里，这种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在那些中国基督徒们的心中成为一种更加酸苦的罪的引诱试探。-----因为这种痛苦的煎熬，不是在短时间内的身体上的折磨和心意上的摧残；而是，内心中一种极其漫长的、激烈的苦难。

有时，在这些幸存的基督徒们的生命中，属灵的光变得暗淡了；他们的心意本应勤勉地持守着生命之舵，然而，有时却会灰心疲倦地放开舵，在生命之海中随风飘荡。

而且，那些基督徒们，在外国军队的支持下，若想要寻求报复，他们会很容易做到；或者，当那些基督徒们看着外国士兵们在劫掠中得到财富，是否也会在心里想："我已经失去一切了。那些昔日的义和团首领逃跑了。他们的房屋空无一人。我是不是应该去那里，拿一些东西到我自己的家里？我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损失而私自寻求一点点补偿？反正，如果我不拿，别人也会拿的"。撒旦就是这样在千方百计地把人引向罪中。

的确，在义和团风暴之后，有一些中国基督徒们就是这样去做的，-----尽管，他们曾经勇敢地面对了死亡的试探；在对主的爱上，没有丝毫动摇；-----然而，却在义和团灾祸之后，落在了撒旦的那些诡计和引诱之中。他们寻

求报复，也私自去寻求财富上的补偿。

但是，感谢主！-----那些犯错的基督徒们，在人数上，非常、非常少。在义和团风暴之后，中国教会，在整体上，抵御了这第二波的属灵上的罪之引诱试探。

居逆境易，处顺境难！-----这正如在教会初期时代，那胜过了逼迫、灾难的很多教会与基督徒们，却在之后的和平时期、胜利时期，在罪之引诱试探面前，犯了错；他们的见证不是毫无斑点的、不是无可指责的。

===

现在，让我们在义和团风暴一年之后，向未来眺望。首先，让我们引用长老教会传教士协会的CUNNINGHAM先生所记述的，于1901年12月的一次为期十天的旅行。这次旅行，是去访问北京东北方向的一些乡村城镇中的教会。-----

----

这是自从1900年5月以来，我们第一次在没有美国士兵护卫的情况下出行。……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是去探访在义和团风暴中受损最严重的各个村庄中的基督徒们……在瓦卒（音译）镇的教会里，已经恢复了有三四十人

规模的聚会。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们，围绕着我们；在他们中间，弥漫着悲哀的气氛。我们一起进行了一个短暂的敬拜活动。

他们还没有从去年夏天的血腥经历和恐怖记忆中完全恢复回来。KILLIE先生告诉我，在院子的一个角落，有十一位殉道者曾经在那里被烧死。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三个人以同样的方式死去。在那里，灰烬和黑炭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还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被扔到油锅里烫死。

在这些地方生活，就像是生活在恐怖的场景和记忆之中。而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们，仍然逍遥地、大摇大摆地、在村中行走着。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徒们心里岂不会充满着报仇雪恨的心情吗？

一年半已经过去了；但是，仍然很难于同他们坐下来，一起虔诚地敬拜主……他们的境况，真地非常艰难……

礼拜六，我们访问了西马房（音译）。我们去探望已经成为了废墟的、张广顺的家。张广顺自己把他的父亲、母亲、妹妹被烧死的地方，指给我们看。他的兄长也被义和团杀害。现在，他是他们一家五口人中仅存的人。

礼拜天是忙碌的一天。大约三十位基督徒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有讲道和圣餐的活动。在这过去的一年半中，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悲哀与痛苦。然而在那一

天，人们的心里得到了极大的平安与安慰。

我们的祷告文是："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作的事"。这样的祷告，从未在我心里产生如此的震撼。有一位殉道者，窦唯城，在一年半前，当在他十公里以外的平谷被害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义和团说的："你们能够杀了我的身体，却不能杀了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将要回到神那里去。我将要在神的终极审判日见到你们。我劝你们赶快从罪中悔改"。然后，窦唯城为那些凶手们祷告；接着，他就被他们杀死了。

礼拜一早上，我们离开了马房（音译），来到三河镇（音译），去与那里的官员们商量，怎样处理那些被杀的、但却仍未妥善安葬的殉道者们的遗体或遗骨。在那个村镇附近，大约有八十位基督徒殉道者的遗骨。我们希望能为他们举行庄严肃穆的追思会，并以圣洁的仪式，安葬他们。

我们经过了窦唯城殉道的地方。那是在平谷城外的一个小山上，是一个"骷髅之地"。在那里，还有四位年轻人也曾为了主基督的名而被杀。他们这些人的死，似乎给当地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死者的遗骨仍然在那里。我们捡起了一些被烧黑的骨头碎块和一些灰烬，把它们包起来，随身带在身边。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些围观的人群。我对他们说，这些遗骨，并非是罪犯的遗骨；而是殉道者的遗骨-----我说，在中国，太缺少这样为了信念和真理而牺牲的人们了。在围观人群的脸上，显露出极其尊敬的眼神和表情。当我们离去的时候，还有很多人群三三两两地在那里，不愿走开。那一天，在我的心里，曾经很多次、很多次想起了伽略山的各各他、骷髅地。

==

==

======

WEBSTER先生记述了东北的辽阳教会的情况：-----

整体来说，教会的肢体们，现在开始比前一段时间在属灵的事情上，更加活跃，更加有平安与安慰。我们可以在他们的祷告中、在他们的和平谦让的行为中，看出来这一点。

他们没有提报仇伸冤，或是物质上的补偿。自从十二月中旬以来，他们就已经恢复了教会的敬拜与聚会-----直到三月份的时候，俄国士兵们来暂时打断了他们。

他们的聚会人数，得到了很大的增长，得到了神极大的祝福。在海城的教会聚会中，来参加的人数比义和团风暴之前的教会人数总数还要多一倍。然而，海城周边地区的教会仍然布满着阴云；人们的心情仍然是阴冷的。

==

==

=====

伦敦传教士协会的LIDDELL先生记述了天津基督徒们的情况：-----

在义和团风暴期间，每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房屋，都先是被抢劫一空，然后被用火烧毁。因此，当那些在旷野、山间逃难的基督徒们重新回到家园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住，没有衣服，没有食物，也没有钱。他们真的是处于非常可怜悲惨的境地。然而，在他们给我们捎来的信当中，却没有一丝想要向敌人报复、复仇的愿望；而只是期望，他们的传教士牧师们能够赶快返回、去帮助他们。

而那些殉道的基督徒们，已经在死亡面前作出了勇敢的见证，向那些残暴者显明，-----他们的灵魂已经在安稳之处；暴徒们再也不能伤害他们什么了。

==

英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们，记述了关于开平区基督徒们的情况：-----

在我们的眼中，那里的基督徒们，展现出对于神的极其敬虔的心，以及对于教会的极其眷恋。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得到了许多恩慈。他们在天父的臂膀下，经历了许多的神迹与恩典。在去年夏天那些恐怖的日子里，他们学习到在祷告中，敬虔地信靠神；而今天，他们告诉我们，神怎样恩典地垂听、回应了他们在困苦之中的祷告祈求。所有这些事情，都使得他们的信心更加

强壮，盼望更加热忱……

他们的无辜亲人-----父亲、母亲、妻子、儿女-----被义和团残忍杀害了。这些亲人们没有犯任何罪；他们仅仅因为是基督徒，就被杀死。然而，如今，这些幸存的基督徒们却真的能够祷告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作的事"。主的恩典之灵，丰丰富富地在这些基督徒们的心中-----我们应当为此何等喜乐！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何先生；他是我们在鹤昌（音译）教会的带领人。他曾与ROBINSON先生和我，一同站在两位清廷官员的面前。何先生对官府的那些官员们说，虽然，他知道杀害他十七岁女儿的凶手是谁，但是，他不愿意寻求报复，也不愿意寻求惩罚；因为伸冤报仇在神的手中；并且，他盼望那些昔日的义和团凶手们能够悔改，并看见、明白、接受神的救恩。

==

在义和团风暴中，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殉道者死去。

在义和团风暴之后，那些幸存的中国基督徒们，更以他们的信心、恩典、饶恕，-----显明了，中国基督徒们不但能为基督而死，更能为基督而活。

其实，甚至，在1900年义和团风暴之前，ISABELLA BIRD主教就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见证：-----

当我经历了在亚洲的各个民族、国家中间的八年半的旅行之后，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那些中国基督徒们中间，在他们的生命与灵魂之中，圣灵在大大地作工。在那些常常发生的中国基督徒殉道之事中，我们能看见，在亚洲基督徒中所作出的最美的见证。

===

许多木头、干草和秸秆都被烧毁了；然而，那属天的财宝，那基督在中国所建立起来的教会，仍然站立。那些如同金银宝石一般忠诚而坚定的、得胜的信心，那些虽经历困苦患难、却仍跟随主的真正基督徒们，仍然在主里面坚立。这，就是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心里所拥有的最大安慰。这，也正是我们在眺望未来时，心里所拥有的最大信念和激情。

政治的阴云，还没有从中国消失；各种各样的困难，仍然在持续。但是，我们相信，在将来，基督的教会，必将在中国得到最荣耀的得胜。而在那属天的胜利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出于，殉道者们的忠贞。

一位中国官员说道："在义和团期间，我们向这些基督徒要求的，就是如此

一件小事-----让他们在口中声明，放弃信仰；或者是，烧一柱香；可是，他们竟然宁愿为此事而死”。

在那些来参加追思会与悼念活动的成千上万的围观者心中，他们会忘记眼前所看见的景象吗？在那些将来世代的人们心中，当他们面对殉道者的纪念碑时，他们会思想，那些殉道者们用生命和鲜血所作出的见证吗？我们已经确知，无论殉道者的坟墓在哪里，在今后漫长的年日中，中国人一定不会忘记他们。

这正如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所作的讲话：-----

“但，于更大意义之上，吾等无法致力、无法奉上、无法成就此土之圣。这群勇者，无论生死，曾于斯持守到底，早已使其神圣，而远超过吾人卑微之力所能增 减。这世间不曾丝毫留意，也不长久记得吾等于斯所言，但永不忘怀彼人于此所为。吾等生者，理应当然，献身于此辈鞠躬尽瘁之未完大业。吾等在此责无旁贷献身于眼前之伟大使命：自光荣的亡者之处吾人肩起其终极之奉献-----吾等在此答应亡者之死当非徒然”。

难道，-----我们不应当放弃我们的财富，放下我们对儿女的牵挂，来完成这未竟的大业；-----并以此来向那些死去的殉难者们致敬、使他们不是死得徒然吗？请侧耳聆听，倾听中国千千万万百姓灵魂之中的呼唤；请听他们的呼求与需要；请思想，在这片大地上，那无尽的希望与前景。

回首望去，是苦难与悲剧，是圣洁的回忆；向未来眺望，是巨大的困难，是

光明的盼望；-----

诗人的以下诗句，不正恰恰描述了，在中国的福音禾场上辛勤作工的、主的仆人们吗：-----

一个永不回头的人，就是永远向前的人
他不会有片刻的犹疑，乌云终将散去
他不会有丝毫的担心，义，必将胜过罪恶与谬误

义必将得胜

我们虽会跌到，却仍要起来
虽软弱失败，却更要刚强、得胜
虽然有时沉睡，却必将醒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方传教士及其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贡献

【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新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807-1953）

十九世纪早期，英语圈发生了宗教大复兴（常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因此促进了海外的宣教，于是英美国家的不少传教士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去传播基督教的信仰。十九世纪被称为宣教的伟大世纪。

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进入中国，之后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传教士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来到中国。传教士刚入中国的时候，清朝采取的依然是闭关锁国的政策，所以他们只能逗留在澳门与广州十三行。1842年签

订条约之后，传教士们能够住在五个通商口岸。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得以进入内陆。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新教的传教事业发展很迅速。1860年只有60位新教传教士，到1900年已经有2500位传教士（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其中1400位来自英国，1000位来自美国，100位来自欧洲，主要是北欧国家。到1920年代，新教的传教事业达到顶峰，之后由于中国内部的战争和动荡，情况不如以前。到1953年，所有在华新教传教士被驱逐出境。

1807-1842年传教士活动

早年，马礼逊和其他几个在他之后来华的传教士只能留在澳门和广州十三行，传教的困难重重。马礼逊的主要工作是学习汉语，并将圣经翻译到中文，后来他出版了神天圣书。1826年，当时在位的道光皇帝将之前禁止巫术、妖术的法律修订后再次颁布，这新的法律禁止人传播基督教，违者判以死刑。入教的中国人，若不放弃他们的信仰，会被发配到新疆做奴隶。来华的第一位美国新教传教士是裨治文，他于1830年抵达中国广州，他编辑了《中国丛报》。第一位来华的新教医生是美国的伯驾，他在1835年来到广州。他建了一个诊所，医治了很多中国人。

1842-1900年传教范围扩大

1885年的戴德生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当时，既懂中文又懂外文的只有传教士，所以一些传教士参与了条约的翻译工作。根据南京条约，中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传教士得以进入这些通商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打败清军，签订北京条约，

允许传教士到内陆传教。1859年英国发生了宗教复兴，推动很多人到国外传教，不少英国传教士来到中国。1865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立了内地会。当时在华传教士人数很少，几乎是沧海一粟，因此戴德生和其他人呼吁更多传教士前往中国。英美的很多差会响应戴德生的呼吁，也有不少新的差会建立，征召很多人加入，包括很多大学生，成为海外传教士。当时美国的穆迪牧师影响了很多年轻人，促使他们献身宣教事业。此时最著名的差会机构是内地会、伦敦会、美部会。其他差会有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等等。在此期间来华的著名传教士是：丁韪良、狄考文、倪维思、明恩溥、理雅各、麦都思等人。剑桥七杰、欧柏林学生团（Oberlin Band）、学生志愿运动在当时的传教运动中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在华传教士生活状况

19世纪在华传教士的生活是艰辛的，很多人或因健康不佳或因压力过大而中途辞职，学习中文的过程是非常漫长而艰难的。在内地会派出的首批五十三个传教士当中，只有二十二位还留在宣教工作中，而在这些人中间，只有四五个男人和三四个女人身体状况还比较好[3]。虽然十九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数是健康的年轻人，但有一半人在十年之内就已经辞职或死亡。健康原因是他们辞职的主要原因。据估算，传教士所生儿女的死亡率是英国乡村家庭所生儿女死亡率的三倍。到十九世纪晚期，传教士更加了解中国的生活情况，而且来华医生也增加很多，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女传教士

起初，很多差会只派出结婚的夫妻或单身男子做传教士，不接受单身女子做传教士，因为觉得她们的安全无法保障，后来此种状况发生了变化。第一个来华的单身女传教士是英国的艾迪绥，1844年她在宁波创建了一所女

子学校，名为宁波女塾。后来，女传教士（单身和已婚）的数量超过了男传教士，到1919年，美国循道宗和公理会所差派的女传教士是男传教士的两倍多。当时，由于中国文化，男传教士无法与中国的女人接触，所以向她们传道就是女传教士的责任。此外，女传教士也管理女子学校，女传教士医生也为女人看病。在反对女子裹足的运动中，女传教士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翻译圣经

天主教虽然在明朝就来到了中国，但是他们并不重视圣经，所以一直没有翻译中文圣经，直到1968年才翻译了自己的思高本圣经。但是新教历来重视圣经，视之为绝对权威，所以新教传教士一进入中国，就开始翻译圣经。马礼逊在1807年来到中国之后不久，就着手翻译新约和旧约。

文言文圣经

19世纪初，浸信会的马士曼在印度塞兰坡翻译圣经，其同工是拉沙，1811年译毕新约，1822年旧约亦告成，并于同年出版《新旧遗诏全书》，这就是马士曼译本，是新教最早出版的中文圣经。同一时候，马礼逊和米怜亦在广州翻译圣经，1813年出版新约，1823年出版旧约，定名为《神天圣书》。

19世纪30年代，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及马礼逊儿子马儒翰修订马礼逊译本，麦都思负责新约，郭士立负责旧约。1835年新约译毕，1837年出版，名为《新遗诏书》，而旧约则在1838年出版。后来郭士立又多次修订麦都思的新约，改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浸信会的高德后来修订了马士曼的译本，与1853年出版新约，高德去世后，怜为仁译完了旧约，称为高德译本。

1843年传教士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委员会翻译圣经，此译本称为委办译本。1850年新约出版。期间，传教士就God译名当用“上帝”或是“神”起争论，委员会于是分裂。麦都思、等传教士以“上帝”为译名，继续翻译旧约，1853年完工，1854年出版，仍称委办译本。

禅治文与克陛存、文惠廉等美国传教士退出委办翻译委员会，主张用“神”为译名，另行翻译圣经，即禅治文文理译本，于1862年出版。
施约瑟在19世纪末独自一人将新旧约翻译成文理圣经，称为二指版圣经。包尔腾和白汉理也将新约翻译成文理圣经；杨格非也曾自行翻译文理新约。中国各地传教士，亦有从文理圣经翻译为当地方言。
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决定翻译一部各方接受的和合译本，包括文理版和官话版。1919年文理和合本问世。

白话文圣经

南京官话：麦都思、施敦力将文理委办译本的新约改为南京官话，1857年出版新约，是第一本、也是惟一的一本南京官话圣经。
北京官话：1872年，北京翻译委员会（施约瑟、丁韪良、白汉理、包约翰、艾约瑟）翻译和出版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1874年，施约瑟独自一人翻译并出版北京官话旧约全书。1978年，英国圣经公会将两者合在一起出版，即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
杨格非官话新约：1889年，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出版了自己翻译的官话新约。
官话和合本：1919年出版，是现今中国新教教会通行的圣经。

反对鸦片

19世纪，鸦片贸易为英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早期传教士中，发声谴责鸦片贸易的有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其他人的态度则不明确。也因着美国传教士的努力，所以在1844年中美签订的望厦条约禁止美国商人从事鸦片贸易。美国杜步西在中国目睹鸦片造成的灾难，与柏乐文等传教士和基督教医疗工作者成立中国禁烟会。杜步西担任首任会长。该禁烟会通过在华传教士医生收集了关于鸦片危害的大量数据；1899年，该禁烟会出版了影响深远的书籍《一百多医生对华人吸食鸦片的意见》(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该书阐述了禁烟会的宗旨，陈言鸦片的危害，最终影响了公众舆论反对这项贸易。终于，杜步西获得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美国国会和万国禁烟会的支持。1906年，中国禁烟会取得成功，英国国会声明鸦片贸易是“道德上没有辩护余地的”。杜步西征集了一份超过1000名在华传教士签名的请愿书，上书给光绪皇帝。皇帝下诏，禁止鸦片的贸易和吸食。

反裹足

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士大夫们却对与性欲相关的女人裹足大加推崇，以致盛行千年而不衰。然而，在华的传教士，特别是女传教士，积极推动反裹足运动。1860年代，美国长老会的Helen Nevius 及其他人就开始与裹足陋习斗争了，她们呼吁女基督徒不要裹足，并且为她们搭桥牵线，帮助她们寻找合适的男基督徒与她们成婚。1872年，在北京的循道宗女传教士Mary Porter禁止裹足女孩在她学校读书。1874年厦门成了一个反裹足组织。到1908年，大多数的中国精英已经发出了反对裹足的声音，在1911年裹足在法律上予以禁止。

报刊杂志、文学创作、文学翻译

传教士米怜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考》是中国新闻报刊史上第一份中文

期刊，于1815年创刊于马六甲，本刊物侧重宗教和道德。米怜在此刊物上连载了他自己创作的章回体小说《张远两友相论》。郭士立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期刊，创刊于1833年，与前者不同的是，此刊削减了宣教的篇幅，更多地介绍了新闻、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等内容。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有《遐迩贯珍》（香港）、《中外新报》（宁波）、《六合丛谈》（上海）。
《万国公报》是1868年9月5日在上海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创办的一份刊物，也是一份对中国近代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刊物。由于其广泛介绍西方，受到维新人士和地方要员的重视。从李鸿章、张之洞这些重要的政府官员到日本天皇都长期订阅这份杂志。孙中山所写“致李鸿章书”，“上李鸿章书”也都在《万国公报》上发表。

米怜原创了章回体小说《张远两友相论》，郭士立创作了小说《正邪比较》（1838年），杨格非创作了小说《引家当道》。杨格非的《引家当道》是传教士原创小说中最具文学性的一部。

英国传教士宾为霖（William Burns）翻译的文言文《天路历程》当时影响很大，多次再版。此外，杨格非也翻译了浅文言小说《红侏儒传》(The Terrible Red Dwarf)。

传教士也翻译或创作了很多面向儿童的福音小说。第一部由传教士翻译的儿童福音小说是《金屋型仪》(The Thirza, the Attractive Power of the Cross)。其后有《欠债寓言》、《焚船寓言》、《安乐家》、《两可寓言》、《除霸传》，其中《安乐家》的影响最大。狄考文的妻子狄文爱德翻译了《天路日程》(Stepping Heavenward)，是一部受《天路历程》影响而写作的日记体小说，此外她也翻译了《扣子记》。英国伦敦会的季理斐夫人翻译了不少福音小说，如《幼女遇难得救记》、《贫孩得胜》、《伶俐幼孩故事记》、《饥渴有福》、《幼女诞礼遗范传》、《惜畜新

编》、《牲畜罢工记》。费启鸿夫人翻译了四部福音童话，其中有《大皇帝的差役》。

传教士也翻译了西方的著名童话和寓言。丁韪良曾翻译《伊索寓言》的部分篇目，季理斐博士翻译了英国儿童文学女作家格铁夫人所著寓言故事《自然寓言集》的第二集《和声鸣盛》，他的妻子翻译了第一集，名为《喻言丛谈》。此外，传教士也翻译了《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话》、《鲁宾逊漂流记》、《格林童话》、《豪夫童话》，并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狄更斯、霍桑的名著改编为儿童文学。

美国的亮乐月创作和翻译了很多小说，如《东方一夕话》、《改良家政小史》、《各国童谈》、《儆世名言》、《客店无空房》、《乱世女豪》、《蒙养准绳》、《秘园》、《韦师母在包菜园》、《五更钟》、《小英雄》。

1875年中国启蒙儿童第一报《小孩月报》问世，对此后儿童报刊及中国本土的近代儿童报刊起到了示范作用。其后由教会创办的《花图新报》、《孩提画报》、《训蒙画报》、《成童画报》、《福幼报》等弥补了晚清儿童读物的匮乏。

引进西方思想和向西方介绍中国

丁韪良在1860年代翻译了《万国公法》，是介绍到中文的第一部国际法，对中国处理外交事务和维护主权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丁韪良也在此书中创造了很多新的中文词汇，如权利、主权、法院、人民、国体、自治、章程、政治、选举、司法、国会、制宪、领事等，使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下的中国人民开始了解西方世界，懂得诸如民主、平等、自由、权利、法治、选举等重要政治和法律制度、观念。李提摩太曾翻译了《泰西新史揽

要》，介绍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理念。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都对此书表示赞赏。梁启超认为，此书"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
裨治文撰写《美理哥国志略》，介绍了美国政治制度。《美理哥国志略》备受中国知识界推崇，王韬称该书"自创国至今，原本具备，于一邦之制度事实，有所考证，中国史册所必采也"。梁启超把它收入《西学书目表》，列为了解西方史地的必读书。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徐继畬编著《瀛环志略》，都曾大量征用和参考裨治文所写的《美理哥国志略》，也赞叹美国的民主制度。徐继畬曾称赞华盛顿："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此外，魏源也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征引了《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

裨治文编辑了《中国丛报》，它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英文期刊之一，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俗等很多方面的情况，为美国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中国丛报》也译介了中国的很多小说，从1833年到1850年，翻译介绍的小说有《香山宝卷》、《三国演义》、《平南后传》、《神仙通鉴》、《谢小娥传》、《正德皇游江南》、《搜神记》中部分故事、《聊斋》、《红楼梦》、《灌园叟晚逢仙女》。

米怜与鲍康宁都曾翻译了《圣谕广训》，向西方介绍了这一盛行于清朝的著作。李提摩太翻译了吴承恩的《西游记》，并且用英文撰写了介绍佛教的书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曾被美国许多大学使用，使美国人加深对中国的理解。

理雅各翻译了《大明正德皇游江南》，1843年在伦敦出版。从1841年开始，理雅各着手翻译中国经典。1861年-1872年相继出版《中国经书》五卷，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诗

经》及《春秋左传》。1879年-1891年相继出版《中国经典》六卷，包括《书经》、《诗经（与宗教有关的部分）》、《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等。

引入西方科学

创建医院

1834年，美国传教士伯驾来到中国，开设诊所，行医治病，帮助了不少中国百姓。玛高温1843年在宁波创办了第一所西式医院，1883年成为华美医院，在当时是一家具有较高水平的医院。在1900年之前，新教传教士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开设了四十多个诊所[14]，最著名的是广州博济医院，此外有上海济仁医院，福州柴井医院，汉口普爱医院，汕头益世医院，通州医院，保定戴德生纪念医院，上海同仁医院，南京鼓楼医院，等等。到1937年止，在华新教教会所办的医院有三百所，另有小型诊所六百所。传教士将西方的医学和医术介绍到中国，翻译了西医著作，创办了介绍西医的刊物，为中国培养出很多医生和护士。

兴办学校

1818年，马礼逊于马六甲（新加坡）创办了英华书院，后来于1843年迁到了香港，由理雅各负责。1844年，宁波女塾，由第一个来华的单身女传教士艾迪绥在宁波创建，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设一所男塾。其后又有多所学校在香港和五个通商口岸开设。到1875年，新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有三百五十所，以小学为主。其中狄考文在1864年于山东登州创办的蒙养学堂非常有名，1876年改为登州文会馆。圣公会创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循道宗创办了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大学，浸信会创办了沪江大学，长老会创建了之江大学和岭南大学，伦

敦会创建了协和医学堂；还有新教几个宗派合作创建了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到1914年为止，美国传教士开设的初等学校有近两千所，中高等学校共二百八十多所；英国传教士开始的初等学校有一千四百多所，中高等学校有二百四十所。

编写教科书

新教传教士在1877年召开了传教士大会，会上决定要成立教科书委员会，编写教材。到1890年，出版了三万册教科书，有近六十种，多是宗教教材，也有数理化、历史、地理的教材。教科书的编纂强调宗教的重要性，避免科学和宗教的对抗，将科学与宗教结合起来。

引入盲文

首开中国盲教学的是澳门女塾（附带招收男生），该校1835年9月30日由传教士郭士立夫妇创办，是外国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具近代范式的学校。中文盲文的缔造者是苏格兰圣经公会的威廉·穆瑞(William Hill Murray)牧师，他1870年来华，作为一名四处走动的派发圣经人，能够广泛地接触到中国的残疾人，他发现流浪乞丐中的很多都是盲人，所碰到的际遇给他以深深触动，从而萌生创制盲文拯救盲人的念头。他跟在北京的英国传教士道觉（Mina Dudgeon）学习盲文。又向所能接触到的中国人学习中文，后来还有美国传教士柯乐赛等人的参与。他们将北京官话与“布莱叶点字法”结合认读，经过不断的试验和改进，终于在1874年前后设计，在1879年前后最后定型了中文最早的盲字系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中文盲字系统，中文名曰“康熙盲字”，又称“瞽目通文”，西文称The Murray Numeral System。“康熙盲字”是中国最早使用的盲文，穆瑞此举为中国的盲界作了一件具启明灯意义的好事。“借助于康熙盲字，许多盲童和盲人们的指尖成了他们的眼睛，知识通过他们的指尖注入他们的头脑，流入他们的心田，

对这些盲人来说，光明的世界不再是难以祈求的梦想”。

“康熙盲字”以北京语言为基准设立，虽适用于广大的北方地区，但在南方的方言区，因语音语调和话本方言不同，当地盲人的认读还是有困难。继之出现的是“大卫·希尔法”，亦称“声母韵母法”，或“汉口法”，由循道会来华传教士大卫·希尔(David Hill)等创制，故以其名字命名。希尔的中文名字叫作李修善，是基督新教来华史上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圣人般人物，“李氏尤关心盲人，并创办训盲学校。……至今犹遗爱在人，令名孔彰。”“大卫·希尔法”大致在1888至1889年间形成。

香港巴陵会牧师哈特蒙(F. Hartmann)等将“布莱叶法”与广东方言结合，创制新盲文，巴陵会的传教士还编写过盲文广东话的识字课本和《路加福音》的片断。

1913年12月，“英国圣经公会”和“美国圣经公会”联合邀请有关方面在上海召开会议，一些代表各主要方言区的专家被特邀与会，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商讨制定一种标准的汉语盲文体系。按照中国官话的统一发音并和“布莱叶符号”组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盲文体系，体系因采纳了以往各种盲文体系的优点，将各盲文法的优长融于一炉，故名“和合布莱叶法”（Union Braile System），简称“和合法”；后来中国人最习惯的名称是“心目克明”。

印刷所引入先进的印刷技术

上海墨海书馆，是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在上海创建的书馆。墨海书馆是上海最早的一个现代出版社，为上海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墨海书馆培养了一批通晓西学的学者如王韬、李善兰，他们和艾约瑟、伟烈亚力等撰写、翻译了

许多介绍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

华花圣经书房，1844年2月23日初创于澳门，1845年7月19日迁至宁波。华指中国，花指花旗国，即美国。1860年搬迁到上海，更名为"美华书馆"。它曾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一家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出版社，并取代了第一家进入上海的新教出版机构，即墨海书馆的领头地位。商务印书馆在草创时期，其主要技术力量就来自美华书馆。其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都是美华书馆的工人，他们在创立时得到了长老会牧师费启鸿的帮助。

介绍西方音乐

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通过教会赞美诗将西方音乐介绍到中国。1858年出版的《圣山谐歌》，目前被音乐史界认定为新教印有五线谱赞美诗的最早年代。黄时鉴教授指出，1856年出版的《赞神乐章》可能是首次在中国出版的中文的五线谱课本。

慈幼事业和救济事业

新教慈幼事业包括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慈善机构。传教士在太原、长沙、广州、上海、宁波、福州、武昌设立了孤儿院，在汉口、福州、北京开设了盲童学校。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生了八次严重的灾荒，时间为1862年，1876-1879年，1898-1899年，1901年，1902年，1906年，1910-1911年，1911-1922年。传教士参与的赈灾有五次，分别是1876-1879年间，1902年，1907年，1910-1911年，1911-1922年。1876-1879年间，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发生了罕见的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

在丁戊奇荒中，传教士首先利用报纸来宣传灾情，《字林西报》、《晋源报》、《万国公报》都对灾情进行了报道，涵盖了各地灾情进展，受灾人口损失情况，物价变化，贩卖人口，杀人食肉等情况。然后，提出救灾措施，《字林西报》和《万国公报》刊登了讨论如何救灾的文章，对清廷赈灾不足提出针砭，此外刊登劝捐文告。他们在中国各地和海外国家设立救灾委员会，合理有序地接受和发放赈款。1877年，“山东赈灾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委员有传教士慕维廉等人，旨在游说在上海的西方人捐输。截止到1877年秋天山东委员会结束工作，总共募集了大约30362两白银。根据山东委员会的账目，李提摩太在此期间共发放了约19120两白银。李提摩太在此次赈灾中是主要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他在山东、山西积极投入了赈灾活动中，也向山东和山西的地方官提出了很多相关的措施和建议。1878年2月，一些传教士又成立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开始面向世界求助，成立当天，就在英国的报纸上刊登了请求启示。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捐款参与了赈灾。

教案

1900年义和团运动

1901-1945年的发展、挫折

1900-1925年被称为是基督教的“黄金时期”。1920年代中国兴起了非基督教运动，但此时期的圣经销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称：“1925年，圣经在华销量高达374万本，比1924年增加了100万本。”传教士在此阶段也创建了医院，如夏葛女子医学院，著名毕业生有周理信（1890–1979）和黄婉卿。此外，还建立了湖州医院，当时已有了化验室，X光室，和护士学校。柏格理在苗族当中做了很多宣教工作。在傈僳族中，英国传教士富能仁传道三十多年，对当地人产生了很大

影响。到1990年代，傈僳族有90% 是基督徒。

1934年，师达能夫妇在安徽遇害，之后却激励了新一代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日本侵华之后，内地会和其他很多传教组织将总部搬迁到了重庆。1941年日本与西方国家交战之后，日本拘禁了在华的很多外国人，其中包括一千名传教士，将他们关在了山东潍县集中营和香港的赤柱拘留营，直到1945年才释放。曾获得奥运金牌冠军的传教士，埃里克·利德尔，就关押在潍县集中营。日本方面曾向英美等国家提出用集中营里的侨民交换战俘，而埃里克亦名列第一批名单中。但是，他将这个逃生机会让给了其他人，继续留在集中营帮助别人。最后，由于被迫劳动过度和营养不良，埃里克于1945年在集中营中因脑肿瘤逝世。

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些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建立了3.88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担任安全区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约翰·马吉牧师担任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曾参与救助中国难民，并拍摄了日本军人屠杀中国人的纪录片。美国女传教士魏特琳也积极营救中国难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她从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在日本占领下南京的情形，并邮寄给该学院在美国纽约校董会的校友。

最后离开

截止1953年，在华传教士尽数被驱逐出中国大陆，最后一个离开大陆的差会是中国内地会。

评价

中国官方的评价一直都很低，在文革期间更是全盘否定，在长期的宣传中，一直批评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殖民主义分子，是文化侵略者。在此大环境下，早期的某些学者，如顾长声，对传教士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他们的赈灾和慈善也是为了“盗取中国人的心”。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主教、英国国教教会、耶稣会、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美国传教士团体、东正教、等等，都是谁；以及他们在华的影响

本书前文已经简单地讲述了基督教信仰的简史。以上所说的各种基督教信仰的组织团体，都是正确地以圣经为上帝的启示、话语和旨意【圣经的核

心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都是正确地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为信仰的中心和倚靠；他们都正确地一致同意并认信《使徒信经》：——“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括；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天主教是以罗马为中心的、以罗马教宗为最高领导的、传统的基督教会组织。天主教会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的使徒彼得时代。然而，天主教在历史上、甚至直至今天，在信仰实践方面，都存在着一些严重弊端，例如，不恰当地高举圣母玛利亚、向她祷告和祈求【这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以及向历代圣徒祷告、祈求护佑【圣经教导我们，应当单单地以天父上帝为我们的祷告祈求的对象，单单地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单单地信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历史上禁止翻译和传播圣经本身，而是片面地强调的教皇话语的权威；存在着偶像崇拜【用画像、雕像、等等来代替上帝、代替耶稣基督；圣经教导我们说，不应当以人手所作的这些偶像来代替上帝自己、以之为我们敬拜的对象】、迷信、为死人祷告、等严重问题；禁止神职人员嫁娶；政教不分、把基督教会组织当成是金字塔式多层级神职人员组织机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应当是上帝子民的集合；基督徒彼此应当是弟兄姐妹；在基督徒中间，为首的，应当作众人的仆人】；等等等等。

【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天主教（拉丁语：Catholicismus）是基督教整体以下的宗派之一，是对罗马公教会（天主教会）发展而来的一系列基督教之神学、哲学理论、礼仪传统、伦理纲常等信仰体系之总括，为基督教最大宗派。其拉丁文本意为“普世的”，因此又译为公教会。另一个经常并用的名称是“大公教会”，通常用来概括基督教会的普遍特征，以用来区别狭义的、与圣座共融的公教会，即天主教会。

天主教的中文名称源自明朝万历年间耶稣会将基督信仰传入中国，经当朝礼部尚书之徐光启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讨论，取儒家古话“至高莫若天，至尊莫若主”，称其信仰之独一神灵为“天主”，故称之。

。。。。

英格兰教会（英语：Church of England），或译为英格兰国教会、英国国教会、英格兰圣公会，是基督新教圣公宗的教会之一，16世纪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由英格兰君主亨利八世领导，由神学家托马斯·克兰麦、理查德·胡克等研究教义而开创的基督教会，至今作为英格兰的国教。教会的辖区是今天英国（联合王国）中的英格兰地区，不包括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后者分归苏格兰圣公会、威尔士教会与爱尔兰教会管理。英格兰教会的最高主教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副手是约克大主教。此外英国君主拥有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Supreme Governo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的头衔。现时英格兰教会有2500万名会员，但只有100—200万人会固定出席教会崇拜。

普世圣公宗（英语：Anglican Communion）的诞生是英国和爱尔兰的圣公会在世界各地传教的成果，所以这教会也可以称为圣公会（英语：Anglican Church）。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普世圣公宗的发展有两个阶段。十七世纪时圣公会开始在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地创立教会。从十八世纪起，由一批圣公宗传教士在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建立圣公教会。

圣公宗是世界大家庭，共有一亿一千万教友，分布在41个成员教会，是第三大基督信仰宗派。而38个成员教会共有160个国家和地区的圣公会教友；他们说不同语言，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

而在很多书籍上都认为圣公会是新教的分支，主要是因为同为宗教改革的产物。

普世圣公宗不像天主教会，并无上级对下级的神圣管理的教宗主义（papalism，贬义词）和天主教会圣统制，而是“各成员教会之间共融（communion）成一个教会”，所以所有圣公宗内的教会都在教会制度“均一（uniformity）”的前提下自治，地位无上下之分，英格兰教会也不充当总会的角色，因此体现出“自治共融”（Autonomy-in-Communion）原则。

每个地区的圣公宗教省都是独立自主的，但他们通过与普世圣公宗的精神领袖——英国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共融，建立成一个教会，称普世圣公宗。

普世圣公宗自1867年开始平均每十年举行一次全球圣公宗会议，名叫兰柏会议。自1978年开始，改在肯特大学坎特伯里校园举行，以方便主教们起居和祈祷。

。。。。

耶稣会（拉丁语：Societas Iesu，简写为S.J.或S.I.）是天主教会的主要男修会之一，1534年8月15日由依纳爵·罗耀拉与方济·沙勿略、伯铎·法

伯尔等人共同于巴黎成立，重视神学教育、对教会的忠诚度以及向青年传教，发愿守贞、神贫，并要求会士对修会及圣座的命令绝对服从。

耶稣会除了协助祈祷、从事社工慈善，拯救贫困之外，最大的特色是兴学，他们首先在欧洲兴办许多大学、高中，是现今世界最大的办学团体之一；培养出的学生除神职人员以外，也大多活跃于西方政界与知识分子阶级，著名者有笛卡儿等。现任教宗方济各即为耶稣会会士，为首位耶稣会出身的教宗。

目前耶稣会大约有两万名会士，在超过112个国家活动，加入耶稣会比加入其它修会困难，要受到更长时间的考验。申请入会者可选择成为神父或终身修士，但两者的培育过程相同，不但要取得神学学位，而且还要有另一项科目的大学学士毕业文凭。耶稣会特有的灵修方式称为“神操”，是罗耀拉所创。由于耶稣会重视教育事业，许多耶稣会会士拥有博士学位、甚至在大学执教。

耶稣会格言是“愈显主荣”（拉丁语：Ad Majorem Dei Gloriam），这句话往往被缩写为“AMDG”。会徽下方是纪念基督信仰中钉死耶稣的三根钉子，上方的IHS则是耶稣希腊文写法（**ΙΗΣΟΥΣ**）的前三个字母（**Σ**的写法往后演变成拉丁字母的S），亦有“耶稣是人类救主”之义（拉丁语：Jesus Hominum/Hierosolymae Salvator）。与其他历史较久的修会不同，耶稣会无会衣，一般只在会士姓名后面加上“SJ”的后缀，以表明其身份。

。。。。

长老宗（英语：Presbyterianism），其教会称长老教会（英语：Presbyterian church，简称长老会），是西方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一个流派，源自十六世纪的苏格兰改革。 长老教会持守加尔文主义，尤其是苏格兰长老会基本完全延续着加尔文及其门徒的教义，教会中也设牧师

（Pastor）、传道（Minister）、执事和信徒群众选出的长老，共同处理教会事务。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管理地区教会的制度。
20世纪，长老会对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有相当的参与。

起源
长老会的协会起源可以追踪到苏格兰宗教改革，长老教会于1560年由约翰·加尔文的学生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进行宗教改革时正式建立。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有时被认为是世界长老会的母会。

分布
长老教会主要分布于台湾、日本、韩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荷兰、法国、巴西、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印度等地。

历史背景
苏格兰人约翰·诺克斯（1505年—1572年）在日内瓦学习了加尔文主义，1560年返回到苏格兰后带领苏格兰教会接受改革。

教义
一些长老派的传统采取1647年英国通过的《韦斯敏斯德信仰宣言》为信条，作为本会牧师受训练的教条标准。

。。。。

浸礼宗（英语：Baptists），又称浸信宗，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起源时间有争议，一说起源于17世纪上半叶英国以及在荷兰的英国流亡者中。浸信会反对给婴儿行浸礼，主张得救的信徒方可受浸，且受浸者须全

身浸入水中，称为“浸礼”，故名。并主张独立自主、政教分离，反对英国国教和政府对地方教会的干涉。浸信会传入美国后，自1836年差派宣教士到中国。1845年，美国的浸信会分立为美南浸信会和美北浸礼会，尔后仍继续在世界各地宣教，美南浸信会国际传道部现在是基督教会最大的宣道差会。

在教会治理上，浸信会采用会众制，各地方的浸信会教会都是独立、自主和自治，这是浸信会的特色之一。各类型浸信教会联会（例如：世界浸信会联会、美加华人浸信会联会、美南浸信会联会、中华基督教浸信会联会、香港浸信会联会、马来西亚浸信会联会、新加坡浸信会联会、日本浸信会联会、德州华人浸信会联会、南加州浸信会联会等等），并不是管理各地方浸信会的组织，其目的在协调及推动共同事工，各地方浸信会教会自由加入。

浸信会信仰的特色可以用七个英语短句表达，而其每一句开头的字母拼起来刚好是“BAPTIST”，即“浸信会”的英文。浸信会以《圣经》作为信仰和实践的最高权威。

Biblical authority 认识和肯定《圣经》的权威
Autonomy of the local church 自主的地方教会
Priesthood of the believer 信徒皆祭司（信徒都是人人平等的）
Two ordinances - Believer's Baptism and Symbolic Communion 两种教会礼仪-信徒的浸礼与纪念性质的主餐
Individual soul liberty 人有自由按照自己的良心选择自己的信仰，他人无权强迫。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政教分离
Two offices of the church - Pastor and Deacon 牧师和执事作为教会仆人的职分

另一种版本：

Believer's baptism 信徒的浸礼

Autonomy of the local congregation within the associational framework 自治而互助的地方会众

Primacy of Scripture 《圣经》首要和卓越的地位

True believers only in the church 真信徒组成的教会

Individual competency and the believer's priesthood 在圣灵引导下人人都有能力认识上帝以及人人皆祭司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政教分离

Two ordinances 两种教会礼仪-浸礼与纪念性质的主餐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9-things-you-should-know-about-the-southern-baptist-convention

九个事实帮助你认识美南浸信会

第一，“美南浸信会”既指的是这一每年举行的两天大会，也是指这个去中心化的、由46,034个独立自治的地方教会所组成的宗派组织。把这些教会

的成员人数加起来，大约有一千五百多万。

第二，美南浸信会（SBC）是一个教会网络，这些教会自愿地在州、地区和全国层面联合，以参与宣教和其他旨在完成大使命（太28:19-20）的跨教会基督教事工。每一个美南浸信会教会都是由受洗信徒组成的独立地方教会，他们各自为自己的聘牧、预算、活动等事工做负责任的决定。

第三，1814年，美国的浸信会自发地联合起来开创了“浸信会宣教联会”（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 of the Baptist Denomination）这一组织。1845年，教会因为在奴隶制议题上观点不同而产生分裂。教会历史学家Miles Mullin回顾这一历史时认为，当时的南方浸信会教会认为奴隶制问题不是个大问题，而北方废奴主义者（和北方浸信会）则希望联会在废奴问题上有一个道德立场。第二年，南方教会的代表们退出联会，开始了新的宗派：美南浸信会。

第四，在1995年，美南浸信会的150周年大会上，大会通过了关于种族和解的动议。该动议为宗派种族主义的根源道歉，为自己曾经在个人和体制的层面参与种族主义而道歉，也为美南浸信会在教会和事工的各个层面曾经犯下的种族主义错误/罪行而道歉。在2012年的大会上，美南浸信会选出了弗雷德·鲁特（Fred Luter Jr）做宗派主席，这是美南浸信会历史上第一个黑人主席。

第五，美南浸信会的年度大会由来自各个教会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被称为“信使”（messenger）。他们每年开一次两天的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宗派的宣教与事工预算——这一预算被称为“协作计划分配预算”（Cooperative Program allocation budget），同时他们也要选出受托管理宗派各个事工项目的负责人，聆听各个事工项目的年度事工报告，以及处理其他的宗派事务。

第六，美南浸信会的首要教义文件叫做“浸信会信仰精义2000版”（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2000），该信仰告白按主题列出了浸信会所相信的十八个基本教义，包括圣经论、神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浸礼、教会论等。

第七，美南浸信会各个教会支持他们州联会、全国联会的事工、宣教和服事的主要方式，是透过一个叫做“协作计划”（Cooperative Program/CP）的管道。“协作计划”开始于1925年，该计划统筹安排所有给到联会且未指定用途的奉献和捐赠。透过这一统筹性的资金管理，“协作计划”帮助了上万个理念相同的教会建立合作事工，以期使福音达到广传、事工得到拓展。

第八，美南浸信会的下属机构包括：六个神学院，负责向全球差派和支持宣教士的国际宣教差会（IMB），对伦理问题提供资源与带领的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 Ethics and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做宗派财务计划、为教会和联会员工提供保险和养老金的“导引石财务资源” 事工（Guidestone Financial Resources），支持州联会开展宣教、福音、植堂、慈善（例如灾难救援）等事工的北美宣教差会（NAMB），起宣教动员辅助作用的姊妹宣教联盟（Women’s Missionary Union），美南浸信会的出版社“生命路基督徒资源”（LifeWay Christian Resources），以及负责联会日常运作的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

第九，1903年，曾有人提出要修改联会的名字，但未获通过。联会于2012年任命了一个任务小组来研究宗派改名，因为原先的名字没有反映出其实这是一个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宗派，看起来好像是仅仅“美国南方”的浸信会。任务小组建议联会在保持原先法定传统名字的同时采用一个非正式的名字：“大使命浸信会联会”（Great Commission Baptists）。（然而该动

议被通过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译注）

译/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9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

【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有编辑删节】

循道宗（英语：Methodism），又称卫斯理宗（Wesleyans）、监理宗，现代亦以卫理宗、卫理公会之名而著称。是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现传布于英国、美国、香港和世界各地。世界最大的循道宗教会是联合循道会。

历史

循道宗原为英国国教圣公会内的一派，后逐渐独立。1738年由英国人约翰・卫斯理（1703年－1791年）和其弟查理・卫斯理于伦敦创立，即英国循道会。

美国独立之后，美国卫斯理宗脱离圣公会而组成宗派，其后教会分为美以美会、监理会、美普会、循理会和圣教会等。1939年，美以美会、监理会和美普会合并成现今的卫理公会。该宗着重在下层群众中进行布道活动；主要分布于英美等国。

当时圣公会常去向上流社会布道，而长老会跟浸信会常向中产阶级与商人布道，而约翰·卫斯理，就专门向穷苦的工人阶级的人传福音。卫斯理兄弟以感情丰富的方式讲道，但其实在当时的教会文化中并不受欢迎，特别对当时讲求冷静的圣公会来说，是很大的极端，因此常被赶出教会外，不允许他们以这种热情的方式在会堂里讲道。于是他们只好着力在一些外面的基督徒小组（团契）里讲道，甚至举办露天的大布道会。他们最著名的露天讲道是发生在金斯伍德（Kingswood）的旷野，向众多矿工传福音，宣称"信靠耶稣"来获得"内心的平安喜乐"便是幸福。许多草根阶层的人深受他的布道所感动，纷纷归信基督教。

著名之全球性教会与慈善团体一体的组织救世军，乃是卫理公会旗下牧师卜威廉所创，但为独立于卫理公会的教会组织。

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是卫理宗的美以美会、监理会和美普会合并而成的基督新教会。现传布于英国、美国、中国，和世界各地。

卫理公会在中国的福音布道组织与历史

来自美国北方的称为美以美会，来自美国南方的称为监理会，1939年连同美普会，三会合一，合并成为卫理公会。1947年在卫理公会来华宣教百周年时，全国已成立了九个正式年议会：福州、兴化（福建莆田）、延平（福建南平）、江西、山东、华东（原监理会）、华中、华北及华西年议会。另外还有张家口临时年议会（原美普会）。总部设在福州天安堂。卫理公会在福建省约有10万信徒。

来自英国的包括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 Mission，UMC）、大英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WMMS）等许多分支，后来统称为循道公会，包括温州、宁波、西南（重庆、云南昭通和贵

州威宁石门坎一带）、华北（山东乐陵、惠民和天津一带）、湖北、湖南、华南（两广）七个教区，总部设在汉口。

来自于加拿大的称为英美会，后来改名美道会。分布在四川。

香港
1975年，在香港的循道公会与卫理公会合并成为循道卫理联合教会。

台湾
战前，日本美以美会来台湾传教，分别在台北和台南建立昭和町教会和寿町教会。目前台湾的卫理宗主要是在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来台后由原在中国的卫理公会传入，1953年在台北正式建立台北卫理堂；1963年召开首届临时年议会，建立南北两教区。1972年台湾教会自立，定名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

。。。。

正教会（Orthodox Church，正式名称叫做「正统大公教会」），也叫做东正教会（Eastern Orthodox Church）、正教（Orthodoxy）、东正教（Eastern Orthodoxy），是基督教一个主要宗派，与天主教、新教並列，是基督教三大宗派之一；不过，信徒总人数少于天主教和新教。主要信徒侪分布于巴尔干半岛、东欧以及西亚。

现在的东正教，是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在拜占庭帝国时代，由于皇帝与罗马为首的拉丁主教关系不好，两边相互攻击，终于后来11世纪中期分道扬镳。东方教会自称是正统教会。相比西方的天主教，东

正教保留更多古代基督教元素。强调个人修养，领悟，灵性等。不鼓励信徒参与俗世纷争。东正教与国家政权关系密切。从拜占庭到沙皇俄国，统治者对教会的影响就一直非常巨大。

东正教历史上头一次遭到回教的迫害，是在奥斯曼帝国（今天的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以后。大量东正教信徒被强制转变成穆斯林。他们还要缴纳特别税务、充当二等公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

动荡与复兴

东正教的发展一直与国家发展紧密相关。拜占庭帝国衰落后，东正教一度受到巨大影响。不过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以及之后莫斯科公国的崛起，让东正教开始广泛传播，成为一种跨越欧亚大陆的世界性宗教。

俄罗斯帝国建立后，东正教成为沙皇维护自己神圣性的工具，地位与拜占庭帝国时代几乎一样。对于俄罗斯来讲，东正教是他们使自己区别于西欧文化的重要工具。

苏联建政以后，东正教受到严厉打压；但在二战时期少有好转。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民众对东正教的态度开始迅速好转；而且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成为对抗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武器。

主要的东正教国家

东正教作为主流信仰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马其顿、格鲁吉亚、黑山。
东正教作为重要少数派信仰个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芬兰、阿尔巴尼亚、波黑、黎巴嫩、叙利亚。

。。。。

十九世纪早期，英语世界发生了基督教信仰的属灵大复兴（常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因此促进了海外的宣教，于是英美国家的不少传教士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去传播基督教的信仰。十九世纪被称为宣教的伟大世纪。

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进入中国，之后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传教士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来到中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新教的传教事业发展很迅速。1860年只有60位新教传教士，到1900年已经有2500位传教士（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其中1400位来自英国，1000位来自美国，100位来自欧洲，主要是北欧国家。到1920年代，新教的传教事业达到顶峰，之后由于中国内部的战争和动荡，情况不如以前。到1953年，所有在华新教传教士被驱逐出境。

在上文所述的天主教、英国国教教会、耶稣会、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美国传教士团体、东正教、等基督教会差传宣教组织中，都有相应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其中尤其以英美国家的宣教士人数最多、影响最大。

在来华的英美宣教士中（包括英国国教教会即圣公会、美国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等），许许多多的敬虔基督徒对于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的初始建设，公共卫生医疗事业的从无到有的艰辛开创，中国妇女缠足制度的取消，妇女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提高，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事业的推广，等等，都起到了伟大的贡献作用。

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主要是来自于耶稣会（十七世纪）、以及后来的一些法国与德国的天主教人士（十九世纪）。在十九世纪的晚清时期，那些来自法国与德国的天主教的来华人士，由于他们往往按照天主教的传统、与政治权力事务关系密切，因而在晚清的中国社会中，与当地的百姓、政府、甚至满清朝廷，在一些关乎司法、民事等事务方面，有时会产生一些冲突。为此，德国占领青岛（起因是德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害），法国在河北山西一带引起不少民怨。这些事情也成为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间接导因。

+++
+++
+++
+++++++++++++++++++++++++++++++++

【引述 《美国故事》 丁道尔的英语圣经翻译的历史与影响】

1517年马丁路德所掀起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开始以后，十六世纪上半叶的丁道尔的英语圣经翻译工作，在其后的一百五十年中，使得很多英国人、包括许多思想家，沐浴在圣经的光亮之下，受到圣经的深刻启发。限于篇幅，我们在本文仅简单地举几例。其中，比丁道尔晚大约七十年出生的弗朗西斯培根，就是一个例子。

培根写作了两本当时广泛传播的书籍《圣思录》和《新方法论》。在第一本书中，他反思了自己在新约圣经中所得到的许多领悟和启发。他在圣经中读到，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进神的国。"（见马太福音18章3节） 培根由此想到，我们对于这个自然世界的探索，也应当像小孩子一样，存着诚实、谦卑而单纯的心，而不应当以先入为主的想法观念，或是以自己头脑中既有的主观臆想的概念去看待外部世界的现实。他看见，基督在圣经中所行的神迹都是恩慈的，因此，他联想到，人类进行科学研究的最主要动机和目的，不是为了在自然中探寻终极真理（因为那终极的真理已经在圣经、上帝的启示中显明），而是为了出于恩慈的目的，帮助这世上一切穷苦的人。培根在圣经新约中还读到："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哥林多后书5章13节） 他由此想到，许多人与这句话所讲述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他们在神的面前，是冷静的、谨守的、甚至是冷淡的、冷漠的，但是，在人的面前，却往往表现出宗教信仰很狂热敬虔的样子。培根写道，如果我们真的热爱世人、待人恩慈，那么，我们就应当努力地、竭尽毕生精力来研究自然世界的规律，并以此来帮助世人。这样的工作虽然或许是枯燥而单调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真诚地热爱上帝，那么，就会愿意投身其中，倾尽一切的努力。

而关于科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则体现在培根的另一本书《新方法论》中。培根在圣经中看到，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要点，就是坚决地、毫不妥协地反对人为所作的偶像，反对把任何受造之物当作那造物主来敬拜。因此，他提出人类思想中的四大偶像，简言之，就是我们在科学思考过程中把一些人为的条条框框，比如名词、名义等等表面的称呼，或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说法，误以为是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律，而不去认真地、谦卑地考察其本来现象、定律，并诚实地加以总结。培根指出，这些客观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律，是在上帝的管理权柄之下，而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管家，不是主

人。并且，培根、以及许多与培根同时代的人都深刻认识到，自然世界之所以能够被人研究，正是因为它是被那位伟大的造物主、上帝所创造的。（事实上，现代科学的风起云涌，正是由那些笃信基督教信仰、或是深受基督教信仰影响的一大批思想家们，包括培根、开普勒、牛顿、波义耳、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等，所导致的）。当年，在出版《新方法论》的封面，培根特意让出版社印上了圣经《但以理书》12章4节中的那句著名预言："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 培根的这些现代科学启蒙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一大批人，其中就包括了比他大约晚七十年以后的牛顿。

以上的例子，只是丁道尔的圣经翻译工作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效果的例子。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囿于篇幅，我们就不一一列举。

丁道尔的圣经翻译工作，更为直接的影响是，圣经被普通人所广泛阅读，因此，许多人真正地、第一次地明白了福音的真谛。在丁道尔之后的五十年中，英国清教徒开始出现，并对整个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丁道尔死后的八十年，1620年的五月花号船，驶到了今天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南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与此同时，英国的政治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此前，被西方世界奉为民主制度重要起源的英国大宪章，虽然自1215年已经颁布了三百多年，但是，三百年中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安。从1216年的亨利三世，到1272年的爱德华一世，以及1308年的爱德华二世，在他们统治时期，一直有不少战乱。1326年，英王爱德华二世的妻子甚至跑到故乡法国，和她自己的情人联手，与英国开战。而自从丁道尔以后，英国清教徒运动崛起，社会道德风貌与政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甚至一时间监狱里面空空如也，没有犯人。

从1539年开始的三百年，是圣经被广泛普及、大大传播的三百年。在丁道尔之后的大约一百五十年，马太亨利开始写作圣经注释的鸿篇巨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把圣经旧约和新约从头到尾、逐章逐节地，仔仔细细地深刻习读，真正读懂，并从中得到了深刻理解，写成了近千万字的的注释和理解文字（在比马太亨利更早的一百多年前，加尔文也写作了长篇圣经注释，但主要是倾向于高屋建瓴的理论性工作，而没有对圣经的每一本书都进行完整注释，不是像马太亨利那样按着圣经各本书依次逐章节地进行注释）。在马太亨利去世的那一年，怀特菲尔德出生。深受马太亨利圣经注释著作影响的怀特菲尔德被称为保罗以后最伟大的传道人，因为他在英国和美国掀起了属灵大复兴。他一生奔走各地，进行了至少一万八千次以上的讲道。在那个没有扬声器、麦克风的年代，曾经亲耳听过怀特菲尔德讲道的人数达到一千万人。在马太亨利以后，又过了大约一百五十年，进入司布真的年代。司布真是另一位伟大的布道家；他把圣经与福音的真理，用普通百姓最直接、最能够理解的语言，清晰而准确地讲述出来。司布真的上千万字的讲道集，至今还令许多弟兄姐妹受益匪浅。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一些关于英美属灵大复兴历史的相关文字】

美国历史上的四次属灵复兴运动

————————

第一次属灵大复兴

从1730年代至1740年代的二十年间开始，在美国新英格兰、中部、南部，以及英国本土许多地区，都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属灵大复兴运动。这次伟大的属灵复兴运动，永久性地、深刻性地影响了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时代以来的宗教改革运动。许多敬虔的基督徒们以及牧者们、传道人们都大声呼

吁，应当更新我们的生命，应当以热忱、敬献、诚挚的心，来对待我们的信仰。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标志着在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跨越宗派的、普世性、福音派的基督徒运动的兴起。

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与一百年前、十七世纪的清教徒运动、敬虔主义、长老会教会运动等等有着直接的、深刻的关系。乔治·怀特菲尔德、约翰·卫斯理、约拿单·爱德华兹等著名的牧者们，深刻地、广泛地、清晰地、振聋发聩地向世人讲述，悔改、得救、复兴的福音。这样的直接来源于圣经、建基于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福音信息，是跨越基督教宗派的，是普世性的、救赎性的、福音性的；其中包含着上帝的伟大大能与慈爱恩典，彰显了上帝的公义与圣洁。

在属灵大复兴运动中，牧者们强调圣灵的伟大工作，清晰地指出人应当悔改自己的罪、倚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并要在世上过重生的、圣洁的、公义的生活。人的得救，不是仅仅在于头脑中的“知识”或是“教义”，而是在于心灵中、灵魂中、生命深处的彻底悔改与重生。那得到上帝救赎恩典的人，是真正有福的；这样的人，会确据地得到永生，进入上帝的圣洁美好、无限幸福的国度。

属灵大复兴运动在当时的美国南方，更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黑人人口。在黑人奴隶以及自由黑人的人口中，基督徒的数量极其大量地增加。

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导致了许多普世福音派、基督徒教会、福音传播组织的诞生，例如，1792年成立的浸信会布道会组织。

。。。。

在18世纪早期、美国十三个州前身的地区，教会组织形式很不一样。在新英格兰，主要是以清教徒们当年所建立起来的会众主义教会为主。在纽约州、宾西法尼亚州、新泽西州、马里兰州、等中部地区，则主要包括贵格教派、荷兰改革宗、英国国教教会、长老会、路德宗、会众主义教会、浸信会、等。在弗吉尼亚、南北卡莱罗纳州、乔治亚州等南部地区，则主要是英国国教教会、以及一些浸信会、贵格教派、长老会。在南方，教会成员数量相比于人口数量较少，欧洲传来的所谓理性人文主义把一些人引向了无神主义、自然神主义、等等。而在北方的新英格兰地区，教会敬拜有时落入了僵化与形式主义，很少有人真正地、切身地经历和体会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与奇妙恩典。

因此，受到新英格兰清教主义、苏格兰与爱尔兰长老会主义、以及欧洲敬虔主义影响的基督徒牧者们，开始呼吁广大的基督徒们，应当在信仰和敬虔上复兴。上述三种传统的混合影响，使得基督教改革运动中的普世福音派们更加强调属灵的复兴、圣灵的大能、悔改罪人对于上帝之爱的切身经历。在1710年代与1720年代，在新英格兰的会众主义教会中，属灵的复兴运动就已经非常频繁和明显。不过，这种早期的属灵复兴运动主要集中于各个当地的地区，而没有被印刷媒体所广泛报道记述。第一次被纸质媒体广泛记述报道的属灵复兴运动，是1727年发生地震以后的那一次。渐渐地，发自于新英格兰各地的属灵复兴运动，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区域中，甚至受到了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注意。

从1720年代、1730年代起，中部地区长老教会在WILLIAM TENNENT牧师的带领下，也开始出现了许多属灵复兴的聚会。他建立起了一间神学院，名为LOG学院，专门训练大约20多位长老教会的属灵牧者；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三个儿子以及SAMUEL BLAIR。GILBERT TENNENT牧师在新泽西讲道的时候，结识了荷兰改革宗的THEODORUS JACOBUS FRELINGHUYSEN 牧师。后者是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中的一位重要的晨星。FRELINGHUYSEN牧师是一位敬虔主义者；他相信，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当切身地经历悔改、认信、重生，并在这个世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在RARITAN VALLEY所领导的属灵复兴，是纽约、新泽西等地的伟大属灵运动的预演。在FRELINGHUYSEN牧师的影响下，TENNENT牧师相信，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应当真实地经历悔改与认信，并得到蒙恩得救的确据把握。

到1729年，TENNET牧师已经在NEW BRUNSWICK与曼哈顿旁的STATEN ISLAND长老教会中看到属灵复兴的迹象。大约同时期，TENNET牧师的两个兄弟，WILLIAM与JOHN在新泽西FREEHOLD牧会的时候，也都在那里看到了属灵复兴的迹象。

最具影响力的，是1734年-1735年发生在北安普敦的伟大属灵复兴运动。在这里，属灵复兴运动的领导者是会众主义教会的牧者约拿单·爱德华兹。1734年，爱德华兹牧师在这里进行了题为“唯独因信称义”的系列讲道。这系列的讲道，在当地的会众中激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尤其是，许多市镇中的年轻人中，反响尤其热烈。

爱德华兹给波士顿的牧师BENJAMIN COLMAN写信，讲述他在这属灵复兴运动

中的经历。他在信中对COLMAN牧师写道：“这些市镇中从未有过如此丰盛的爱，也从未有过如此为罪的忧伤痛悔....我迄今为止的一生中，从未像过去半年一样，见过如此多的基督徒们、以如此恩慈圣洁的心灵去爱仇敌。”

最终，爱德华兹所掀起的这场属灵复兴运动传播到了新英格兰地区麻萨诸塞西部的25个市镇，以及康涅狄格的中部，一直持续到1737年。

在那个时代，有许多会众主义教会牧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错误地秉承一些理性主义思想以及亚米念主义思想【即认为，人不能全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救，而是也需要自己的行为才能得到上帝的救赎】。但是，爱德华兹牧师坚定地秉持传统的加尔文主义教义【即，人只有单单地凭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够得到救赎】。爱德华兹深刻地明白，一个真正的、被上帝所拣选的基督徒、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必须应当真实地经历属灵中的悔改、重生，从灵魂的本当死亡状态，进入上帝所赐恩典的、属灵喜乐之中。基督徒们或许有多个、逐渐的、悔改重生的过程，但是爱德华兹深知，在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罪人心灵之中，一定有确据的、确定的、重生的时刻，尽管那个时刻本身，世人并不一定能够清楚地知道。

北安普敦的属灵复兴运动，表现出一些迹象，被有些批评者称为过分狂热，但被一些支持者称为是圣灵作工的记号。在教会敬拜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会变得非常情绪激动；一些人声称看见了异象，或是有一些神奇的经历。爱德华兹牧师非常谨慎小心地为这些事情辩护，——只要这些事情所指向的，是上帝自己的荣耀，是人们对于上帝的俯伏敬拜，而不是人们的自我荣耀。在整个十八世纪的许多属灵复兴运动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和经历出现。爱德华兹牧师书写了一本书，题目叫做《信实的讲述》，来记

录北安普敦的属灵复兴运动。著名的福音派基督徒JOUHN GUYSE与ISAAC WATTS在英国出版和发行了这本书籍。该书的出版，使得爱德华兹立刻在英国变得非常著名，并极大地增加了他在英国的影响力，也对于英国的属灵复兴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信实的讲述》这本书成为了许多牧者和基督徒们的榜样；在很多地方，属灵复兴运动都跟随着书中所记述的方式来进行。

乔治·怀特菲尔德于1738年首次从英国来到北美，在佐治亚布道。他在那里成立了“伯赛大”孤儿院。之后他又回到了英国。1739年11月，他返回北美。他的第一站是费城。他首先在位于费城的英国国教教会“基督教会”那里布道。后来，他就在费城法院大楼外的台阶上，在户外对着数量极多的听众们布道。然后，他去到许多当地的长老会教会中，对会众们讲道。

之后，他离开费城，来到纽约市；后来又去了中部，即今天的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宾西法尼亚州等地；后来又去到弗吉尼亚等南部地方。他不但在英国移民的教会中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而且，在许多荷兰移民与德国移民的教会中，也得到了热烈的反响与欢迎。路德会的一位牧者，HENRY MUHLENBERG讲述道，有一位德国移民妇女，听了怀特菲尔德的讲道以后说，虽然她听不懂怀特菲尔德所讲的英语，但是，在怀特菲尔德的布道会中，她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教导和造就。

1740年，怀特菲尔德开始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进行巡回讲道。他先是于1740年9月14日到达了罗德岛的NEWPORT，在当地的英国国教教会中进行了几场布道。然后，他来到了麻萨诸塞的波士顿，在那里待了一个礼拜。在波士顿，他在当时还是属于英国国教教会的国王教堂中，与会众一起进行

祷告；并在波士顿的几个教会中进行了讲道。9月20日，怀特菲尔德在波士顿第一教会中进行了布道；并在教会建筑外，对那些闻讯而来、但却由于教会建筑容纳空间不够、而不得不待在外面的、8000会众，进行了户外布道。第二天，他更在户外对15000会众进行了布道。礼拜二，他在波士顿第二教会进行了布道。礼拜三，他在哈佛大学进行了布道。

之后，他又去了新英格兰很多地区，甚至到了偏远的、新罕布什尔的PORTSMOUTH。10月12日，他返回波士顿，对那里的30000会众进行了布道，然后又继续在新英格兰地区进行巡回布道。

然后，在约拿单·爱德华兹牧师的邀请下，怀特菲尔德来到了北安普敦。他在那里进行了两场布道。旁听的爱德华兹牧师如此感动，以至于当场哭泣。

接下来，怀特菲尔德来到了康涅狄格的NEW HAVEN，在耶鲁大学进行布道。从那里，他沿着海岸线南下，沿途在各地布道。10月29日，他到达纽约市。在曼哈顿旁的STATEN ISLAND，怀特菲尔德遇到了GILBERT TENNENT牧师，并邀请他去波士顿讲道，把那里的属灵复兴运动持续下去。TENNENT牧师接受了邀请，于12月来到波士顿，并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巡回布道。他的足迹遍布了麻萨诸塞州、罗德岛、康涅狄格等地。如同怀特菲尔德一样，TENNENT牧师的讲道，吸引了极大数量的会众前来聆听。在这些布道会上，有许多人悔改、归主。

从1740年一直到1743年，新英格兰地区的众教会都经历了奇妙而伟大的属

灵复兴运动；会众们的宗教情感变得极为热忱，牧师的讲道常常得到极其热烈的回应；人们常常深刻地悔改己罪、禁食、祷告、甚至常常哭泣。人们开始非常重视和强调祷告，并且非常重视属灵书籍的阅读。清教徒们当年的清教主义的理想，又再一次在新英格兰众教会中成为现实、得到复兴。据估计，当时新英格兰地区的会众主义教会的众教会中，成员数量增加了20000人到50000人。

从1745年开始，属灵复兴运动开始从新英格兰地区向南方地区，包括南方的乡下、以及许许多多的黑人奴隶社区扩散，一直持续到1750年代、1760年代。

这次属灵复兴运动导致了许多教育机构的建立。1746年，长老会教会建立了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育机构。1754年，在ELEAZAR WHEELOCK的推动下，建立了后来成为达特茅斯学院的教育机构。在下一个世纪中，耶鲁大学在美国普世福音传播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在美国历史上的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并非是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的历史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属灵复兴。不过，这是第一次，人们具有了普世福音的共识；人们共同认识到救赎恩典的教义的重要性；人们在布道中，不断地强调着福音恩典与罪人悔改的重要性。在属灵复兴运动中，牧者们强调，得到救赎的道路；一个人只有真心地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并在生活中真诚而热忱地践行出这信仰，才显明了救赎恩典在人生命中的大能与真实性。

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中的著名牧者人物，包括乔治·怀特菲尔德、约拿单·爱德华兹、吉尔伯特·TENNENT、约拿单·狄更斯、SAMUEL·戴维斯等。他们都是温和派的普世福音牧者，教导加尔文主义的敬虔形式，深受一百年前的清教主义传统影响；对他们而言，宗教信仰绝非仅仅是头脑中的教义和知识，而更是心灵与生命中的真实光景。他们强调，——人应当悔改、认信、承认己罪，认识上帝的律法，明白恩典的道路；人应当悔改罪、离弃罪、进入圣灵的光照之中、进入对于耶稣基督救恩的信靠之中；并因此，人得到救赎恩典的确据。

在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中，许多妇女受到了深刻的感染和影响。HANNAH HEATON（1721-1794）是康涅狄格的NORTH HAVEN的一位农夫妻子。在她的日记与回忆录中，我们能够读到她的属灵经历、以及每日生活。PHILLIS WHEATLEY是第一位在北美发表著作的黑人女诗人。她在童年时期，被从非洲带到了北美。在这里，她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在她的著作中，处处显明了她深挚的基督徒信仰；在诗作中，她描述了自己从异教之地来到北美、在这里认识了基督教信仰的生命经历；她写作了一首长诗，名叫《从非洲到北美》。她受到了北美属灵大复兴运动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受到了怀特菲尔德牧师布道的深刻影响。当怀特菲尔德去世的时候，她专门写作了一首诗，纪念怀特菲尔德，称他为“没有偏见的救赎者”。

OSBORN是罗德岛的一位学校老师。从她的书作中，我们可以瞥见，在属灵大复兴运动的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事务所受到的巨大影响。她的书作包括，一本1743年回忆录，一些日记与书信，以及她匿名发表的一本书籍《真实基督教信仰的本质、确定性与证据》。

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导致北美人民深刻地改变了对于上帝的认知，对于自己生命与信仰的认知，以及对于周围世界和世人的认知。在弗吉尼亚、南卡莱罗纳、北卡莱罗纳、佐治亚等南方许多地区，那些来自纽约等地、以及北方新英格兰地区的浸信会牧者们，以及卫理公会的牧者们，使得许许多多的白人与黑人都成为悔改、认信、真挚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真诚基督徒们。其中很多黑人在悔改信主、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都是奴隶的身份。也有很多人是自由的身份。在许多白人教会，白人基督徒们开始——真心地欢迎黑人也加入他们的教会；并认真地看待黑人们的真诚基督教信仰。在很多教会中，黑人甚至被选举为执事、训导者、甚至牧者。

对于黑人奴隶来说，基督徒牧者们讲道信息中的、关于属灵上的平等的福音信息，尤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北美黑人的人口中，原来的来自非洲的传统偶像迷信风俗逐渐衰落，而数量巨大的黑人们开始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信仰、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在南方的福音派教会牧者与领袖们中间，他们不得不比北方的教会领袖们要更加频繁地面对奴隶制的棘手问题。【注：因为在北方并没有合法的奴隶制，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基本上没有任何奴隶；而在弗吉尼亚等南方，奴隶制却是合法的】。尽管如此，南方的福音派教会领袖们坚持劝导奴隶主们，要他们给自己的奴隶们提供应有的教育，使他们能够识字、能够阅读和学习圣经。因此，南方许多的黑人奴隶最终得到了少量的文化教育。

在怀特菲尔德的讲道中，他不断地强调，在福音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更强调地指出，这种平等性的属灵含义。他和许多属灵复兴运动中

的牧者们一样，都坚信，当一个黑人奴隶悔改、信主、成为真诚的基督徒以后，那么，在天国中，他就和任何其他基督徒一样，同为上帝的儿女、得救的子民。怀特菲尔德在黑人奴隶中有巨大的影响力，被许多黑人所深刻地记念。

SAMUEL·戴维斯是长老会教会的一位牧师，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第四任校长。他在黑人中也受到了巨大的欢迎；常常对数量极多的黑人布道，使许许多多的黑人悔改、信主、成为真挚的基督徒。在弗吉尼亚，他被称为是第一个使众多黑人成为基督徒的人。戴维斯牧师在1757年书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讲到了在旅途中所碰到的、一个成为了基督徒的黑人奴隶的敬虔情感。他记述到，那位黑人奴隶说："我是一个可怜的奴隶，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来；在这里，我从来没想到过自己可能会得到自由；当我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时候，我不知道任何关于耶稣的事情；我从来都是稀里糊涂地活着，从没有去想自己死后会怎么样；但是，我现在看到了一个永远也不会死亡的生命；先生，现在我想请你告诉我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以及我对于上帝的职分；因为我再也不想像以前那样稀里糊涂地生活了。"

戴维斯牧师在著作中写道，在这场伟大的属灵复兴运动中，他曾经遇见过许多这样的黑人，看见当他们悔改信主以后，心灵与生命中所表现出的巨大信仰与情感。戴维斯牧师相信，黑人如果得到足够的文化教育，就也能和白人一样，成为极其敬虔的基督徒。因此，他在南方大力地推动奴隶主们，要求他们给自己的奴隶们提供足够的文化教育，使他们也能够读书识字，这样，黑人奴隶们就能够明白圣经中的教导和话语。

在属灵大复兴运动中的敬虔深挚的敬拜活动，吸引了许许多多的黑人们。当这些黑人们悔改信主、成为真诚基督徒以后，在他们中间，就开始涌现出一些黑人领袖。这导致了，在北美南方首次开始出现了、主要由黑人会众所组成的黑人教会。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在南方的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已经成立了第一批黑人教会。仅在弗吉尼亚的PETERSBURG市，就有两间黑人教会成立了。

————————————

第二次属灵大复兴

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属灵复兴，持续的时间大约是从1790年至1840年。这次属灵复兴运动也与上次一样，因着牧者们大有能力的讲道、与教会中的会众们的属灵光景的复兴，引起了许多改革运动与社会变革。属灵复兴运动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进入教会，悔改信主、成为基督徒。卫理公会的众教会常常差派牧者们前往偏远的西部大开发前线，在各地巡回讲道。第二次属灵复兴运动，引致了很多社会变革以及对于救赎恩典的重视。首先，在1790年代的肯塔基州以及田纳西州，在长老会众教会中、卫理公会众教会中、以及浸信会的众教会中，人们的宗教情感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当时，人们处于极大的、快速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社会政治变动环境中；人们在教会中所经历的复兴运动，给他们的生命与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与幸福。这场属灵复兴运动，与以前一样，也导致了一些大学、学院、神学院、以及布道差传会的成立。

这场属灵复兴运动更深刻地改变了许多普通人的生活与心灵；它让人们在内心深处与上帝产生了紧密的联接关系。卫理公会、浸信会等教会团体的成员人数得到了巨大的增长。州与州之间、各地之间的纽带得到了显著的增强。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印第安纳州、以及俄亥俄州南部、等等、甚至加拿大等地，都掀起了强烈的属灵复兴运动。在很多地方，常常会举行户外的福音营会。这些福音布道活动，不分种族、不分阶级。在浸信会与卫理公会所组织的许多大型布道活动中，有很多农场主、普通百姓、以及黑人奴隶们，同时悔改信主、成为真挚的基督徒。在西部大开发前线，由于人口密度很稀疏，所以一个县里面的很多人都是在这样的户外大型福音营会中，彼此第一次见面、认识。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户外营会中第一次走进教会组织，参加敬虔地敬拜上帝的活动。这样的户外福音营会，常常会连续持续数天的时间，并由许多牧者们进行很多场的讲道。在这些营会中，常常会有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听众。人们在一起敬拜上帝、唱诵圣诗、聆听讲道。营会中的讲道，常常是以人的罪、悔改罪、归向基督为中心。当营会结束以后，人们返回到各自的居住地；这往往会导致各地的小规模的、许多地方教会的成立；教会的数量，在许多地方增长迅速。

1800年6月，肯塔基州的LOGAN县长老教会举办了第一次非正式福音营会。不久以后，JAMES MCGREADY牧师在三个地点都举行了类似的营会。又一年以后，1801年8月，在肯塔基州的BOURBON县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福音营会。领会牧师是BARTON STONE（1772-1844）。这次营会往往被看作是北美所举行的第一次大型福音营会活动。许多浸信会、卫理公会的牧者们也前来进行了讲道。该次福音营会连续举行了六天之久；共吸引了至少20000会众前来参加。在STONE牧师以及ALEXANDER CAMPBELL牧师（1788-1866）等人的推动下，这一类大型福音营会活动的模式很快就传遍了各地，并极大地促进了教会人数的大幅增加，尤其是促进了卫理公会与浸信会教会的增

长。1800年所开始的属灵复兴运动也促进了肯塔基州的长老教会以及其他非宗派教会数量的增加。这些属灵复兴运动也导致了许多妇女与许多年轻人都悔改、信主、成为基督徒、进入教会。

19世纪上半叶的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后来也导致了19世纪晚期的社会福音运动。牧者们在教会中教导人们，不仅应当悔改自己的罪，而且更要致力于社会道德光景的改善，尽力地除去各种各样形式的罪。很多人因此成为了社会福音运动的领袖。会众主义者们建立起许多布道协会；在西北方的开发前线，也进行了许多福音布道活动。他们深刻地影响了城市和乡村文化中的很多方面的内容。这些活动促进了社会网络的形成、媒体行业的建立、以及许多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成立。出版行业、教育行业等等，都以基督徒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核心。这其中包括了，1816年所成立的美国圣经协会，以及许多其他的基督徒协会组织。很多妇女自愿地参加到这些志愿服务活动中来。在纽约州西北部的开发前线地区，妇女福音协会与母亲协会成立起来，促进了很多人认识福音、悔改归主。许多人也投入到了社会慈善事业与公义事业的活动中。这导致了后来很多的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包括废奴运动、戒酒运动，以及监狱改造运动，还有照顾残疾人以及精神病人、等等。这些福音派人士们深信，——基督福音，应当使每一个人都为社会的公义与平等、福祉等等，尽力地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南方的浸信会与卫理公会的牧者们，对奴隶主们、也对奴隶们讲道。当FRANCIS ASBURY牧师在南方各地四处巡回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名叫HARRY的黑人自由人，是给ASBURY牧师驾驶马车的车夫。HARRY虽然不识字，但却能够熟练地、一字不差地背诵圣经中的绝大部分段落；他受到了许多白人听众们以及黑人听众们的如此热烈的欢迎和反响，以至于，ASBURY牧师安排

他在教会的讲台上，对会众们讲道。1784年，HARRY在特拉华州的CHAPELTOWN市，在托马斯教堂讲道；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位黑人站在教会的讲坛上，对白人听众们讲道。HERRY甚至被BENJAMIN RUSH牧师和THOMAS COKE主教称为是北美最伟大的演讲家。

十九世纪早期，独立的黑人教会组织团体开始相继成立。在南方的各个城市，以黑人会众为主的教会达到了数百个。从南卡莱罗纳州的CHARLSTON到弗吉尼亚的RICHMOND和PETERSBURG，都有许多黑人教会成立起来。在弗吉尼亚、肯塔基州等地，也都相继成立了相应的浸信会教会组织团体。在黑人教会中兴起的属灵复兴运动，也促进了黑人奴隶们对于人身自由的努力争取。黑人教会的浸信会组织团体，一直保持着相对于白人教会组织团体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在这场属灵复兴运动中，尤其是在南方，有数量极多的妇女们悔改归主。在美国南方各州的人口中，人们不是像北方的新英格兰地区等那样，是来自于清教徒们的后代以及所传承的文化传统；而是，他们中间很多人是来自于爱尔兰、苏格兰、等地的移民后代，或是来自于英国国教教会的文化传统背景。在南方的家庭中，丈夫、男人们经常会有大男子主义习惯；他们要求妻子们绝对服从自己，甚至，迫使妇女们要屈服于自己、胜过顺服于上帝。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与境况下，众教会中的属灵复兴运动，给妇女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支持和鼓励；使得她们走出家门，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彼此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提供情感方面与生活上的建议与支持和鼓励。这些妇女们在教会活动中积极参与、贡献绵薄之力，热忱真挚地作出信仰的见证与分享，并为他人提供热情无私的帮助。许多教会领袖，例如CHARLES FINNEY牧师，认识到，在众教会的属灵复兴布道活动开始之前，教会中的妇女成员们所参加的、热忱的、公共祷告聚会，常常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性作用。妇女们对于孩童们的信仰和精神状态，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属灵复兴、布道活动期间，母亲们常常是整个家庭中的道德与属灵基础，更是在教会中的教育儿童主日学等活动的重要师资力量。1830年代，在北方各州，广泛地成立了许多妇女们所组成的祷告协会、道德更新组织、等等。她们在很多事情上，体现出了基督教信仰中的谦卑与饶恕的精神。

这第二次属灵大复兴运动，对于十九世纪的美国政治也产生了许多广泛深远的正面影响。

——————————————————

第三次属灵复兴运动

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属灵大复兴运动，发生于大约1855年至1930年代。仅在1857年至1859年间，在纽约市，每天就有超过10000人聚集在一起祷告。在整个国家的许多其他大城市和小乡村中，也有许多这样的公共祷告聚会。

在此前不久所成立的基督教青年会，在这次属灵复兴运动中、尤其是在像费城或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地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督教青年会常年以来，一直专注于基督徒牧者的训练工作，并努力使年轻人、尤其是那些贫穷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们，能够在健康的环境下成长与发展，在大城市环

境中积极健康地生活与工作。

费城的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一个公共祷告聚会活动，每天都吸引至少300人前来参加祷告聚会。祷告会每天中午开始，但不到上午11点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前来。有时，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营会福音活动，需要搭建起能够容纳1200人的帐篷。

芝加哥的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面向普通民众的、重要的、训练性质的、学校组织。DWIGHT·穆迪先生曾经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福音事奉和讲道的机会。

1858年开始的大规模属灵复兴运动，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北美的所有大专院校。除了有许许多多人悔改归主以外，更有不计其数的、大专院校的大学生们，自告奋勇地踊跃报名，参加前赴世界各地的福音传播活动。

历史学家EDWIN ORR写道：

“属灵复兴运动的影响，在整个国家的各个角落都能够感受得到。它首先在全国的各大城市中广泛漫延，然后传播到许许多多的小城市、乡村、市镇。它充满了所有的大学、学院、中学；它影响了几乎所有的课堂。对许多人来说，它就像是五旬节初熟的果实被放大了成千上万倍一样；......悔改归主的人数，很快就增加到每个礼拜50000人以上.......”

第四次属灵复兴运动

美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属灵复兴运动，发生于1960年代至1980年代。不过，历史学家们往往对此没有统一的一致意见，而不是像前三次的属灵大复兴运动那样，比较有共识。

这里，我们专门记述一下在第四次属灵复兴运动中比较著名的葛培理先生。

威廉·富兰克林·葛培理先生，出生于北卡莱罗纳州的一户农家，是苏格兰人与爱尔兰人的后代。他生于1918年11月7日，逝世于2018年2月21日，是著名的美国福音派布道家，是美南浸信会的按立牧师。他的妻子路得，1920年生于中国江苏，并在中国长大，因为她的父母是在华的长老教会的传教士。

从1940年代，葛培理先生就开始享有国际声誉；他后来被称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领袖。1960-1980年代，他常常举办室内或室外的大型布道聚会活动，并通过电台与电视台的转播，把福音传播到千家万户；直到21世纪，他当年的许多讲道还在不断地被重播。在他六十多年的电视布道生涯中，他每年都会举行福音布道，从1947年一直到2005年退休。从1950

年至1954年，他也曾经主持一个基督徒福音电台节目。他强烈地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努力地促进种族融合；并曾经于1957年邀请马丁路德金在纽约市的一次奋兴聚会活动中一同讲道。他在一生中影响了许许多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无数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使人们认识到圣经与今日之世界之间的深刻关系。他在一生中，曾经在185个国家或地区中，对超过2亿1千万人讲道。从杜鲁门总统到奥巴马总统，他都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他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总统、以及约翰逊总统之间保持了亲密的关系。在他的大型布道活动中，有超过300万人悔改归主、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至2008年为止，聆听过葛培理的电视与电台布道广播的人，据估计超过了22亿人。仅在1996年的一次电视布道活动中，就有20亿人收听收看。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

1900年-1911年的政局发展

（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有删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是因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之乱引发八国联军战争后，慈禧太后为反省纵容义和团之乱引发八国联军战争，而展开的第三波的政治变革（之后中华民国称其为“遮羞变法”，香港称晚清改革，日本称光绪新政）。这是清朝末年的一场政治体制和经济改革运动，也是中国千年专制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

政治

1901年4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就全面改革作整体规划，任荣禄、庆亲王及李鸿章为主管，张之洞及刘坤一为协同办理；张刘二人联名三次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定出改革方向，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

五大臣出洋考察

1904年1月19日，云贵总督丁振铎与云南巡抚林绍年连电朝廷变法。7月初，两江总督周馥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

1905年7月2日，袁世凯联合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实行立宪政体，以12年为期；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7月，湖南巡抚端方入朝召见，领受闽浙总督一职时，又反复建议实行立宪。
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奉恩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在出团半途中遭受革命党人吴樾放炸弹行刺，被迫延期（ 由孙中山率领的革命党反对清政府"君主立宪"，认为清政府是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一旦立宪之后，君主世袭即成为宪法规范之中，则建立共和政体的计划将更艰难 ）。

11月25日，朝廷设立专门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研究各国宪政，提供宪政改革的咨询。12月7日，考察团第一组戴鸿慈和端方出发，第一站即美国，由美国总统狄奥多·罗斯福接见。

1906年1月14日，载泽率领考察团第二组出发，徐世昌、绍英伤情未愈，由李盛铎、尚其亨替代。1906年夏秋之际，考察团先后回国后进呈了一份主张"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及《欧美政治要

义》18章。该报告由随员熊希龄执笔，参考了流亡东京的梁启超和杨度所写的宪政研究资料。载泽和端方拥护宪政的态度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载泽于1908年夏出版《考察政治日记》。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下诏颁布预备仿行立宪。同年秋季，戴鸿慈发表了《出使九国日记》。1907年，奕劻奏请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并取得成功，奕劻兼任宪政编查馆大臣，馆员中有沈家本、杨度。奕劻对立法工作给予支持。同年成立资政院筹备处，命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

1907年，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各地立宪公会纷纷建立。

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及“臣民权利义务”、“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等三个附录，规定第二年即举行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选举，计划以九年时间筹备宪法。整份宪法大纲有浓厚君权色彩，但基本上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并规定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拥有财产、选举和被选举议员等的权利。同时清廷亦放宽了对报刊及政党的限制。 溥仪继位后， 加快立宪的进程。1909年（宣统元年），各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宣统二年九月初一日），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

庆亲王内阁的成员

1911年5月，载沣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筹组新内阁、即庆亲王内阁。新内阁部院首长共有13名成员，其中满人8名、汉人4名、蒙古人1名，8名满人当中有6人为宗室、1人为觉罗，被当时的革命党及立宪派讽刺称为“皇族内阁”。

中央行政改革

1906年，清政府宣示“仿行宪政”次日，即颁布改革官制的上谕，著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戴鸿慈及袁世凯共同制定中央官制方案。

1906年9月，朝廷下诏订定新中央官制，改六部为十一部；初仍保留内阁及军机处，改大理寺为大理院，又设立资政院及审计院。

地方行政改革

1902年，山西巡抚赵尔巽建议重整保甲制度等地方行政改革，包括成立警察及扩大地方组织职能。
1905年，朝廷谕令釐定县级以下行政官制。
1907年，颁布外官制，削减督抚财权及军权；民政部统领全国巡警道。

地方自治措施

1906年，袁世凯已于天津成立地方的“自治研究所”及天津县议事会。
1908年，清廷亦开始筹备，设立城镇乡以至厅州县各级自治研究所，并拟定《各省咨议局章程》，定于1914年完成。各省咨议局职能由初议的仅有向督抚提供意见、参与立法、评断下级自治会纠纷、接受民间请愿提升至有权质询督抚之施政，及议请更正；督抚如无异议必须施行咨议局议案、以及议员有言论免责权。咨议局选举主要由士绅参与，由选民选出选举人再选出议员，而选举权及被选权有财产、学历、资望出身及年龄等限制，有利士绅力量之集结，其民主性并不充分，不过，在1910年，各省咨议局联合十数省督抚向中央政府施压，迫使北京提早立宪及召开国会，是为速开国会请愿活动；咨议局亦有与中央政府就铁路国有化政策问题为民请命、进行抗争，是为保路运动。

新政时期历任军机大臣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礼亲王世铎、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庆亲王奕劻、荣庆
1904年光绪三十年： 庆亲王奕劻、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荣庆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庆亲王奕劻、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荣庆、徐世昌、铁良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庆亲王奕劻、鹿传霖、瞿鸿禨、荣庆、铁良、徐世昌、世续、林绍年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庆亲王奕劻、瞿鸿禨、林绍年、鹿传霖、醇亲王载沣、张之洞、袁世凯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那桐
1909年宣统元年：庆亲王奕劻、世续、张之洞、那桐、鹿传霖、戴鸿慈
1910年宣统二年：庆亲王奕劻、世续、那桐、鹿传霖、戴鸿慈、吴郁生、贝勒毓朗、徐世昌
1911年宣统三年： 废除军机处，成立内阁，史称皇族内阁。

督办政务处

为施行"新政"而设置的中央办事机构。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4月成立，担任督办政务大臣的有荣禄、奕劻、李鸿章、昆冈、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等人，下设提调二人，章京若干人。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为参预。
督办政务处负责接受各地官吏章疏，起草"新政"的各项改革措施，1906年后易名为会议政务处。1911年（宣统三年）后撤销。

建立司法、立法、责任内阁制

庆亲王内阁成立于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18日），结束于同年的九月十一（11月1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内阁，由庆亲王奕劻组阁。由于庆亲王内阁为中国历史上之始创，所以清政府宣称为慎重起见，未实行新内阁官制，仅是根据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成立。而军事上的所有问题也不由内阁总理大臣负责，而是由军谘府大臣载涛负责。

袁世凯内阁是大清帝国于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11月16日成立的以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的汉人为主的内阁。次年2月清帝逊位，内阁解散。

经济

财政整顿

1906年，度支部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

税制改革

由度支大臣载泽兼任督办盐政大臣，统理全国盐政行政用人之权履行，并在1902年之《中英商约》中商讨有关免厘加税之条款。而在现代财政预算的组成上，1907年福州道御史赵炳麟奏请中央制定全国预算。最终，清廷于1910年首次编制第一次全国预算。

币制改革

在1910年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划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但由于当时市面流通之旧币总值达十五亿以上，回收的财政费用已是政府难以承担，最终清廷需要于1911年4月15日向美英法德四国财团贷款一千万英镑，以推行有关币制改革。

铁路发展

1900-1905年间铁路总体发展为三千二百哩。唯除全长201公里的京张铁路为本国修建外，其余铁路均为外国持有部分股权下所修建。

鼓励工业

1906年，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来鼓励人民发展农业、工业。

司法

废除酷刑

重新制定了新的刑法，废除了一些生理上的酷刑，如凌迟、枭首。并取消了连坐法，推行了西方的个人责任制。

文教

改革科举

在1901年6月3日，张之洞请降旨改革科举，同年7月26日，张与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改革文科及罢废武科；并提倡兴办西学学校，以在十年内三科渐次取缔科举。于是在同年8月29日，清廷下诏自1902年开始，按张之洞于之建议改革文科及罢废武科。文科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及五经义一篇，且不准用八股文，亦不可以书法定高下。次年3月13日，袁世凯及张之洞再上奏请递减科举名额，以免阻碍学校发展，1904年1月13日，朝廷颁布按十年三科内减尽科举，以回应张之洞及袁世凯的建议。最终，在1905年9月2日，日俄战争结果促使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及湖南巡抚端方六人上奏废科举，朝廷从议，废除了实行千余年的科举制度。

兴办学校

科举制度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西方的学校制度。在五年的蒙养院（幼儿园）及八年的小学堂教育中，学生必修经史、文学、算术、地理、体操，选读手工、图画；而在五年中学堂教育中，则必修经史、文学、算术、地

理、体操、外文、物理、化学、图画，选读法制、理财；三年的高等学堂教育，分目则分作政科和艺科，政科科目有论理、经学、算学、地理、外文、物理、法学、理财，艺科科目则有伦理、中外历史、算学、物理、化学、动植学、地质、矿产、图画、体操。最后在大学教育中，学生则可分科主修政治、文学、商务、农业、格致（物理）、工艺、医术及经学。

留学生计划

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凡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普通中学5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辖之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当的各项实业学校3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在大学专科某科或数科，毕业后有选科或普通毕业文凭者，给予进士出身；在国立大学及程度相当的官立学堂中3年毕业，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5年毕业，得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这给予翰林升阶。最初，在洋务运动期间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英美法等国家，不过，由于庚子赔款后政府财政紧绌，结果清末改革中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日本。至1907年，留日学生总数达一万五千人。

军事

军官训练

清廷在1901年废除武举考试；1903年设中央练兵处统筹全国军队训练，禁止各省自练军队，并订定军官训练制度：由三年各省的初级军事学堂晋升至全国共有四所的国立陆军中学堂进修两年，再前往部队见习半年，最后晋升至陆军高等学堂；学堂的教习以日人为主。

结果

改革初期只有三项得到贯彻，即废除旧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以及派遣学生出国留学。这是由于戊戌政变之后，许多致力于改革的人或被处决，

或被迫逃亡国外，能留下来进行改革的人很少。而许多执行改革的人又无诚意，甚至把改革当成是难以避免的一种祸害。事实上，改革的目的是挽救满清的政权和满族的政治地位；改革的内容使满、汉矛盾日益扩大。

推行新教育制度，废科举八股文，使大量的士大夫阶层敌视政府。新式现代学校引进西方知识给年轻一代，他们受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所熏陶。海外的留学生，特别是在日本的情况更是严重。他们组织或加入革命团体，并且认为要救中国，必须打倒满清；知识分子对满清政权之离心，对清政府是极之危险的。

后继清朝的中华民国的主流历史观认为，清末新政多为清廷在辛丑和约后，因为反清情绪高涨及革命党开始座大，为了收揽人心的缘故，而推行的敷衍政策。不少政令有慈禧太后本人后谕不用切实执行。

。。。。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在北京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内驾崩（今考证被砒霜毒死），享年三十七岁。经慈禧皇太后下诏，命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其长子溥仪继承大清王朝皇位，年号“宣统”，慈禧被尊为太皇太后。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慈禧皇太后崩逝于北京中南海仪鸾殿的后殿福昌殿内，享寿七十三岁，结束了长达四十七年的统治。

定东陵明楼

宣统元年十月四日（1909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灵柩从北京紫禁城被迁至河北省遵化市清东陵内的菩陀峪定东陵安葬，其牌位被请入北京太庙供奉。定徽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简称孝钦显皇后，谥号共22字，谥号长度超过清朝开国皇后孝慈、本朝孝德、孝贞两位正宫皇后，为清代及中国历代皇后之最。

身后之事

慈禧的陵寝菩陀峪定东陵，营建工程历时十三年，直到她死前才告结束。耗银227万两，金碧辉煌、极尽奢华。

建筑材料的贵重、工艺的精湛、装饰的奢华等方面均居于清朝皇后陵寝的首位。即使是与清朝诸帝陵相比，某些帝陵也要比她逊色很多。她的随葬品之奢华也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慈禧的随葬品分为两部分：生前置放于墓中金井里的珍宝与下葬时的随葬珍品，许多都是极其罕见的旷世奇宝，价格和价值也根本无法估量。

。。。。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灭亡。

____

孙中山、国民党、中华民国

+++
+++
+++
+++
+++++++++++++++++++++++++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孙中山（选摘）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字逸仙，后化名中山樵。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明德、载之、号日新。中华民国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中华人民共和国尊其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生于大清帝国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翠亨村，成长于翠亨村、檀香山及英属香港，祖籍广东东莞、客家人，中国近代政治家与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办人，亦是三民主义的提出者和倡导者。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以革命推行民主与政治经济等各种制度现代化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亦是辛亥革命的

发起者与领导者。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1894年11月24日，孙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兴中会发动乙未广州起义。1905年，在日本东京组成中国同盟会，孙被推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并提出三民主义学说。1911年12月29日，被十七省代表在南京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未经过南北政府一致同意），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9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永久保留其于党内的“总理”职衔。

家族背景

孙祖先系出金陵，其远祖固，宋代进士。元末大乱，玄孙常德乃迁至广东南雄珠玑巷，不久沿着广东北部珠江流域之北江南下，最后定居于广东省东莞县之圆头山乡，是为来粤之一始祖，称一世祖。二世祖贵华移居同县濒珠江东岸之长沙乡。至明代，五世祖礼赞已嫌长沙乡人多，耕地不足，无法谋生，就横渡珠江往西岸，到达香山县之涌口村定居。到十一世祖瑞英，涌口村又患人满，乃于清代乾隆时期西移，找寻原始土地开垦以谋生，结果到达当今翠亨村边缘之迳仔蓢开基。根据孙故居《孙氏家谱》所载，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都在东莞上沙乡居住，五世礼赞公才从上沙迁走，先辈族谱仍以上沙作为“故乡”。
孙高祖父孙殿朝（1745年－1793年），高祖母林氏；曾祖父孙恒辉（1767年－1801年），曾祖母程氏；祖父孙敬贤（1789年－1850年），祖母黄氏（1792年－1869年）。父亲孙达成（1813年9月26日－1888年3月23日），母亲杨氏（1828年－1910年），长兄孙德彰（1854年－1915年），二姊孙金星（1857年－1860年），三兄孙德佑（1860年－1866年），四姊孙妙茜（1863年－1955年），妹孙秋绮（1871年9月3日—1912年4月18日）。溯自

常德至广东，孙是为第十八代。

孙的祖先务农为生，曾祖父孙恒辉家有田产十余亩，当时属小康之家，22岁时生孙敬贤，但于孙敬贤14岁即过世。

祖父孙敬贤依寡母为生，笃信堪舆，醉心术士们的风水之说，又常游山玩水，以致家道中落。孙敬贤有三个儿子， 依序是孙达成（1813年－1888年，孙的父亲）、孙学成（1826年－1864年）、孙观成（1831年－1867年）。

孙家到孙达成时代，所有祖先遗留下来之耕地已所剩无多，他在翠亨村无法谋生，1830年他跑到澳门一所鞋店当学徒。1854年孙达成32岁返回翠亨村成亲，与位于翠亨村东北约4公里、广府人聚居之崖口乡隔田村杨胜辉家女儿结婚。婚后，在家乡翠亨村依靠耕作养家糊口。孙达成既种水稻也种番薯，但一家大小平常都是吃番薯，又为村人补鞋为副业，待1866年孙出生，孙达成还必须在晚上打更帮补，白天种地晚上打更，日夜不得休息。

二叔父孙学成年轻时，与同乡到美国加州淘金谋生，至34岁（1860年）才回乡耕作，可惜38岁 (1864年) 即因病过世。三叔父孙观成则于年轻时，前往上海做工，至29岁（1860年）才回乡，耕田为生。1864年春，孙达成兄弟三人曾共同批耕其先祖孙瑞英遗留在逕仔萠一带山上荒田，种植果树。孙观成因家境艰难，再次到上海谋生，后(1867年)在上海附近船上病死，享年37岁。

早年经历

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孙在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翠亨村诞生；乳名帝象，上村塾读书时取名文，成亲时取字德明。父亲孙达成在澳门一家鞋店当学徒，32岁才与家乡的杨胜辉的女儿结婚。孙是家中排行第五的孩子，上面有二兄（孙德彰、孙德佑）及二姊（孙金星、孙妙茜），其中二兄孙德佑及长姊孙金星均在幼年过世，下面有一个妹妹孙秋绮。孙家里贫穷，孙出生时，父亲已经53岁，母亲38岁，长兄孙眉与孙相

差12岁。1869年10月9日，祖母黄氏去世；由于家穷，乃兄孙眉到邻乡南蓢地主程名桂家当长工。
1871年9月3日，妹秋绮生；由于家计实在无法维持，孙眉赴檀香山当华工。
1872年，孙入翠亨村私塾，接受国学启蒙教育。孙说过："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孙曾问母亲："人死了怎么样？"他母亲说："种种事情都完了！死完结了一切，文。"孙肯定地说："但是我死之后不要我的生命就此完结！"孙眉与母舅杨文纳前往檀香山，最初他在农场打工，后来向檀香山政府领地，自己在茂宜开垦经营农场(现为茂宜岛中山公园 Sun Yat Sen Park)，事业有成。1876年，孙眉在檀香山做工汇款回家，家境慢慢好转，孙得以进入村塾读书；第一位老师是位瘾君子，烟瘾发作时就旷课；由于老师烟瘾频频发作，孙也没法好好读书。1877年6月9日，孙眉从檀香山回到翠亨村结婚，在家住3个月。7月15日，孙眉在翠亨村成亲。9月22日，孙眉再度赴檀香山，孙拟随兄赴檀，未果。

首往夏威夷

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评述孙第一次出洋一事，称是孙"生平转变之重大关键"。1879年5月21日，孙随母坐驳艇到澳门坐英轮"格兰诺去"号（S. S. Grannoch）赴檀香山，孙回忆道："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879年孙母亲前往檀香山探望长子孙眉，孙眉较孙年长12岁，1871年即离乡背井，到夏威夷闯荡。6月，孙到檀香山茂宜岛茄荷蕾埠(今名卡互陆伊或卡胡卢伊)孙眉开设的商店当店员。后入盘罗河学校习算术等科。9月，孙到一所由英国圣公会主教韦礼士主持之教会学校意奥兰尼书院当寄宿生，采全英语授课。意奥兰尼学校，是英国圣公会毕斯浦（Espiscopal Bishop）与威尔士夫人共同于1862年创立，1872年韦

礼士牧师继任校长，翌年迁移校址于白地斯街（Bates Street），扩建房舍。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每天祷告，每周日必须作礼拜，孙开始认识基督教仪轨、圣歌，以及阅读《圣经》。孙在内修读英语、英国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学、生理学、拉丁文与绘图”等科目。

孙在意奥兰尼书院读三年书，学习英语，在1883年7月颁奖典礼上得到文法二等奖。1882年7月27日，孙毕业于夏威夷伊奥拉尼书院。孙英文文法这一科考第二名，获夏威夷王国国王卡拉卡瓦在毕业典礼上亲颁一本中国书籍作为奖品，出色的英文水平为孙之后的革命活动助力甚多。孙眉认为年轻人应该先完成教育。1883年，火奴鲁鲁华裔知识分子何宽、李昌等组织中西扩论会。1883年1月15日，孙与其他教会学校子弟进入美国公理会创办之奥阿厚书院就读，继续学习，特别是基础医学和法律。孙继续学业（相当于大学预科）。6月30日，奥阿厚书院学年结束，孙坐船回到孙眉在离岛所开之牧场。7月初，入学不超过三个月，由于孙加入基督教意向不减，又经常劝说在夏威夷工作的华侨工人不要膜拜关圣帝君神像，兄长忧其触犯众怒，二怕双亲斥责，遂断绝资助，将17岁的孙送回翠亨村家乡。孙在1883年夏天从夏威夷回到中国，当他坐远洋船从火奴鲁鲁到香港后，孙即上岸转坐船由中国内河返回翠亨村。孙坐轮船到香港转坐淇澳岛之帆船回乡，抗议清朝官吏向该船乘客勒索。7月底，孙回到翠亨村。秋，孙即与同村青年陆皓东结成好朋友，并经常共同谈论时政之腐败，直到深夜。8月中，孙与同乡友人陆皓东一起“捣毁偶像”，破坏翠亨村村中的北帝庙神像，不为乡人所容，经崖口、淇澳逃离家乡前往香港。陆皓东与孙是同乡，在上海接受教育。

入香港拔萃书室及转学中央书院

1883年3月31日，美国纲纪慎会喜嘉理牧师在香港登陆。8月18日，喜嘉里牧师收留孙在其香港中环之传道所寄宿。秋，孙赴香港入读英国圣公会主

办的拔萃书室（当时英文称为 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拔萃收容所暨孤儿院）为日校走读生。10月29日，孙在喜嘉理牧师宿舍重逢檀香山传教士、曾任教于奥阿厚书院之芙兰·谛文（Frank Damon）及其父母。是年冬，孙与陆皓东一同到基督教公理会位于港岛必列者士街的布道所，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牧师于1884年5月4日为他主持洗礼加入教会（陆则于1884年10月19日受洗）；在其所属教会存留之受洗名单中，陆皓东署名“中桂”（名单中排第四），孙署名“日新”（名单中排第二）。喜嘉里牧师与孙情谊真挚，欣赏孙对宗教热忱；孙追随他四处宣教。

1884年4月15日，孙转学香港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这是一所中学，学生多半是各国中产阶级子弟，课程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得知孙皈依基督后，孙眉把他召回夏威夷，试图借由切断弟弟所有奥援。11月，孙奉孙眉急召赴檀香山，交还家产，芙兰·谛文为孙筹募费用。孙在中央书院读书两年半期间，受洗成为基督徒、第一次婚姻、与孙眉激烈冲突。1885年5月，芙兰·谛文为孙筹募盘缠，自檀香山回到香港复课。几个月后，在基督教友人帮助下得以于1886年返回香港，由于孙在夏威夷长待几个月，其中学生涯结束，孙并未拿到中央书院毕业文凭。
1886年7月，孙未毕业就离开中央书院。邵元冲说：“总理自言，幼时旅港肄业，所习多专于英文，嗣而治汉文，不得合用之本，见校中藏有华英文合璧四书，读而大爱之，遂反复精读，即假以汉文之教本，且得因此而窥治中国儒教之哲理。又英译本释义显豁，无汉学注疏之繁琐晦涩，领解较易。总理既目识心通，由是而对中国文化，备致钦崇，极深研几，以造成毕生学术之基础。”

首次结婚

1885年5月26日，孙奉父命回乡与同县外壆村（今珠海市外沙村）卢慕贞成亲。卢慕贞自幼缠足，尽心操持家务，照顾公婆和儿女。出生于累世积善

的书香门第之家，父亲卢耀显曾至美国檀香山经商致富。二人婚后生了一子二女，即长子孙科、长女孙娫与次女孙婉；由于孙终日在外奔波，所以和元配聚少离多。1915年9月1日，孙提出与卢慕贞离婚，卢表示："孙先生为革命奔走海外，到处流浪，身心为之交瘁，既然现有人愿意照料他的生活，我愿意成全其美，与先生离婚"。

从医与革命

1886年9月，孙持喜嘉理博士介绍信，进入由（美国）长老教会海外基督使团嘉约翰（John Kerr）博士主持之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科学校习医（即广州岭南大学的医学院，1949年后，广州岭南大学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开始鼓吹革命。10月，孙认识英国伦敦传道会宣教师区凤墀，区凤墀为其改名逸仙。孙与基督徒同学郑士良结为知己。郑士良是上海富商之子，曾就读于广州德国教会学校，结交不少广东会党人士。

1887年10月1日，西医书院教务长孟生医生在香港大会堂宣布该院成立。10月3日，孙在香港华人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即现今为香港大学医学院）正式上课，第一课是康德黎医生讲授之解剖学。学堂隶属于伦敦传道会，由闻名香港之菁英代表何启出资筹办，该校教务长是苏格兰名医康德黎。孙曾回忆："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方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

就读香港西医书院五年间，孙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当时在香港只陈少白、尢列、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与陈、尢、杨三人常住香港，听夕往还，谈革命之言论，怀革命之思想，研究革命之问题。孙对达尔文之进化论发生兴趣。杨鹤龄家先在澳门做生意有成，在港岛成立杨耀记商店，"尝在店内独辟一

楼，为友朋聚集谈话之所。……孙、陈、尢、杨四人每日在杨耀记高谈造反复满，兴高采烈，时人咸以四大寇称之。”四大寇聚谈之杨耀记，“同志郑士良、陆皓东等来往广州、上海过港时，亦常下榻其间，故该店可称革命党人最初之政谈俱乐部。”孙、陈少白、尢列、杨鹤龄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为“四大寇”，为革命言论之时代。在《孙中山学说》第一章，可以看到孙在大学时代就潜心研究“知难行易”学说，为破除“知易行难”之陈腐有害观念。

1887年冬孙父达成公病笃，孙回乡伺奉汤药，孙眉闻讯亦自檀香山归，兄弟芥蒂尽释。1888年3月24日，孙父达成公在翠亨村病逝，享年76岁，孙眉对孙加倍爱护备至，凡所需学费，均允源源供给。

1890年1月，孙介绍陈少白入读香港西医书院。在香港读书时，孙与杨鹤龄、陈少白、尢列倡导者革命，时人称为“四大寇”。陈少白在〈四大寇名称之由来〉称：“每遇休暇，四人辄聚杨室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又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目之为寇，而四人之志，犹洪秀全也，因笑自谓我侪四人，其亦清廷之大寇乎，其名由是起，盖有慨乎言之也。时孙先生等尚在香港医学堂肄业，而时人亦以称之，实则纵谈之四大寇，固非尽从事于真正之革命也。而乙未年广州之役，杨与尤皆不与焉”。同年孙上书郑藻如，建议禁烟及改良农业和教育等。12月30日，孙陪康德黎夫妇往广州痳疯村研究痳疯病。

1891年3月27日，孙与40多名香港道济会堂年轻教友组织教友少年会。10月20日，子孙科在翠亨村诞生。

1892年7月，孙以首届成绩第一名毕业于西医书院。并获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9月22日，在恩师康德黎医生带领下，与同期毕业之江英华同赴广州。9月23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引见两广总督李瀚章，李命填写三代履历，孙拂袖而去。9月24日，在康德黎医生带领下，孙与江英华同回香港。毕业后，孙在澳门镜湖医院当医师。1892年12月18日，与澳门镜湖医

院签订〈揭本生息赠药单〉，贷款2,000银元开设中西药局。
1893年春，迁设药局于广州，改名东西药局。1893年7月，孙在澳门议事亭前地十六A号开设“孙医馆”。7月29日，其澳门中西药局开业。孙行医于澳门、广州。
孙用口号“天命无常”，宣传反对忠君：“暴君肆虐，罪恶滔天。信任奸邪，滥施淫毒，应天顺人，除彼独夫。凡我同胞，毋稍瞻顾！”据云“（孙）先生在港曾接纳三点会首领，并亲自切实调查其实力，约定时间在茶楼饮茶，先生入时，凡起立者即会员。先生如约前往，至十余处，每处茶客起立者百数十人，喜出望外。实则其头目事先邀集工人充数，为一骗局”。

兴中会

1894年1月，孙藉广州城外南关之圣教书楼悬壶、西关之冼基设东西药局。同月，孙在翠亨村写就〈上李鸿章书〉，主张“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并决定亲赴天津面呈给直隶总督李鸿章。

6月1日，前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致盛宙怀函：“荔孙世丈大人赐览：久违矩训，驰系实深。侄卸前山篆回省，值台旌已先期遄发，未获面别，殊深怅疚。兹恳者：香山县医士孙生名文号逸仙，人极纯谨，精熟欧洲掌故；政治、语言、文字皆精通，并善中西医术，知者甚多，妒者亦复不少。现拟远游京师，然后作欧洲之游。久仰令兄观察公德望，欲求一见，知侄与世丈处，既有年谊世好，又蒙青照有素，特嘱函恳赏赐书于令兄观察公前先容，感激之情，不啻身受者矣。侄赋闲省寓，毫无善状，幸上下人口平安，堪以告慰。省中新政，谅已早有风闻。兹不多赘。匆匆泐布，敬请崇安，唯照不庄。兴里侄恒顿首。廿八日。”

6月中，弃医，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李鸿章[27]:206。孙拿魏恒之信，启程

前往上海，并与上海电报局领班生陆皓东结伴同行[25]:525。6月13日，盛宙怀鉴于魏恒情面而接见孙，并致函其堂兄盛宣怀："敬禀者：顷有沪堂教习唐心存兄之同窗孙逸仙兄，系广东香山县人，精熟欧洲医理，并由广东前山同知魏直牧函托求转吾哥俯赐吹植。附呈原件，（尚）祈阅。....〞

在得到盛宙怀推荐信后，孙在上海巧遇郑观应，结果郑观应也为孙谒见李鸿章之事写推荐信："杏翁仁兄方伯大人阁下敬肃者：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俾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专肃，敬请勋绥，唯祈 钧鉴不备 教小弟制郑观应顿首。 再肃者：孙逸仙医生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而后返国，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并拟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垦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俾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给游学执照，以利遄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也。肃此，再叩勋绥不备。 教小弟名心又肃。"

王韬有一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信介绍孙到天津，孙就到天津去见文案；军书旁午，文案把孙大文章送到李鸿章，不知是否见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以后再见，孙知道没有办法，回到上海。提出革新政治主张，被拒绝。旋游历北京、武汉，观察形势。7月25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拒绝与孙面谈，请愿书后来刊载于在1894年9、10月号之上海《万国公报》。孙和陆皓东离开天津，在香港短暂逗留后，孙于夏末乘船前往夏威夷。10月，孙自上海经日本赴檀香山。

1894年11月24日，孙在檀香山欧胡岛募款，在檀香山成立中国有史以来第

一个现代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卑涉银行（Bishop Bank）华籍经理何宽住宅里，召集侨社人士李昌、刘祥、程蔚南、邓荫南、郑金、黄亮、黄华恢、锺木贤、许直臣、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郑照、刘寿、锺宇（工宇）、曹采、刘卓、宋居仁、陈南、夏百子、侯艾泉等二十四人。提出"振兴中华"口号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政纲。后来在香港，誓词于1895年改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永和泰商号经理刘祥、卑涉银行（Bank of Bishop and Co.,Ltd.）华人经理何宽为首任正副主席，黄华恢为司库，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据〈兴中会会员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数簿〉，从1894年11月24日至1895年9月2日，先后共有112人加入兴中会。

第一次广州起义

1895年1月，孙与邓荫南等同志返回香港筹谋革命。兴中会香港总会设立于1895年2月18日，纠集孙故交与同窗，其中包括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1892年3月13日，香港辅仁文社成立，举杨衢云为会长，谢缵泰为秘书；孙在领导权之争上面临杨衢云挑战，杨之抱负和自信与孙旗鼓相当。
2月21日，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成立兴中会，以"乾亨行"做掩护。"乾亨"名号是黄咏商所订，黄父名胜，任香港议政局议员，与大律师何启有戚谊，何介绍黄与孙相识，黄由是入会。同日香港兴中会与香港辅仁文社合并，仍称兴中会，会长（总办）一职未决。3月1日，孙拜会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请其援助起义，未果。3月16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并采用陆皓东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孙从事革命之秋，教会惧其波及，宣言把孙驱逐出堂。3月18日，《德臣西报》发表社论，指出革命党准备成立君主立宪。5月30日，谢缵泰在英文《德臣西报》致光绪皇帝公开信，促请宪政改革。
新组织"会长"人事案，延宕直至10月10日，是日孙、杨和其各人马对峙，剑拔弩张，经过妥协，"会长"职位给杨衢云，孙则获得广州起义现场指挥

权。与会者利用传统宗教信仰为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兴中会选举会长（称总办，时称“伯理玺天德”，音译自英文“President”），杨衢云志在必得，孙退让，杨当选。
孙利用官方许可，在10月初设立“农学会”。10月初，香港警方获线报，谓有三合会份子招募壮勇赴广州。朱贵全偕兄朱某及邱四声言招募壮勇，每名月给粮银10元。朱贵全之兄招得400苦力，自己先行他往，壮勇由朱贵全带领。孙于汕头及西江沿岸募集两军，同时向广州进逼。两军期于1895年10月某日，一由西南，一由东北，同时向广州进发。10月25日，朱湘假其弟朱淇之名向缉捕委员李家焯自首；革命党人原定当天从香港乘夜轮去广州，因募勇不足，未能成行。
乙未广州起义定1895年10月26日重阳节举行。可是因为事先泄密，接济未至而起义失败。原定起义主力之所谓“敢死队三千人”没从香港开到广州。清晨6时，在广州各路人马首领纷纷来到起义总部王家祠讨口令待命，孙人马已聚集在广州码头等著迎接来自香港之船只、点收军火并与佣兵盟友会面，当天早上8时许，孙方接杨衢云电报说：“货不能来”，当时通用有线电报很慢，两天收到已经很好。晨8时后，决定取消起义，遣散埋伏水上及附近准备响应之会党。孙覆电杨衢云曰：“货不要来，以待后命。”黄昏，陈少白乘“泰安”夜航返香港，孙留广州善后。缉捕委员李家焯拟逮捕孙，向两广总督谭锺麟请示；谭锺麟以孙为教会中人，着李家焯不可鲁莽从事。晚，孙与区凤墀宣教师连袂赴河南王煜初牧师儿子王宠光婚宴；李家焯探勇掩至婚宴，仍不敢动手，反被孙奚落一番。10月27日，孙在河南宣教师区凤墀福音堂与来自香港及广州本土教众主日崇拜；礼成，孙扮女装在教众掩护下避过探勇坐自备小汽船赴唐家湾转乘轿子到澳门。李家焯突然掩至双门底王家农学会拿获陆皓东、程怀、程次3人。大约400人连同军火，已在10月27日登上“保安号”（SS. Powan），“保安号”在10月28日清晨被县令带令驻防军逮个正著。不料会员部署略定，忽有密电驰至，谓西南、东北两军中途被阻。两军既不得进，则应援之势已孤，即起事之谋已败。
出于万全考量，孙决定延迟整个行动，并解散雇用人马。孙坐轿设法逸逃

澳门，再从澳门前往香港。据《中山市小榄镇志》记载，孙于10月27日夜晚避匿广州以南的小榄镇，得到熟人麦寅威、何作权、麦端甫等的协助，10月28晚，取水路由小榄前往澳门。10月29日，孙自澳门坐船抵达香港。11月，孙断然改装偕陈少白等赴日本，旋组织兴中会分会于横滨。孙与陈少白、郑士良同坐“广岛丸”于11月2日由香港出发驶往日本。11月7日，陆皓东等为首多数成员被捕处刑，孙则受到通缉。陆皓东即便被严刑拷打，也拒不供出同谋名单，他在赴义前称：“……吾方以外患为之日迫，欲治其标；孙中山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而不可尽杀。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11月12日，孙在神户上岸，随行遇有郑士良与陈少白。翌日当地报纸新闻标题：“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到达日本”。孙利用蛰伏日本期间，彻底改变外型：剪掉辫子、不再薙发，并脱下中式长袍换穿欧式西服。

从1895年建立香港兴中会，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6年间，孙发动十次武装起义中，有六次是香港兴中会和同盟会香港分会，以香港为基地秘密发动。香港既是指挥和策划中心，又是经费筹集与转汇中心、军火购制与转运中心，海内外革命同志联络与招募中心，也是每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避难场所。孙动员秘密会党，并重新利用兴中会以及香港的革命根据地。孙把陈少白留在东京，派郑士良返回香港，旋即启程前往夏威夷。1896年1月，孙再赴檀香山。孙眉安排寡母，连同孙妻小四人，前往他居住之茂宜岛，就近照料他们生活。孙与母亲、长子孙科以及一双女儿重逢。3月4日，香港政府认为孙在港从事反清活动，威胁香港安定和秩序，于是签发驱遂令，禁止孙氏5年内踏足香港境内。6月，自檀香山赴美国。香港政府下令驱逐孙、杨衢云、陈少白出境，5年内禁止在香港居留。9月，自美国赴英国。

伦敦蒙难、完成三民主义体系

1896年9月23日孙从纽约坐船往英国。晚9时50分到达伦敦圣班司车站（St Pancras），再雇马车到达斯屈朗街胥旅社（Haxells Hotel, Strand）投宿，已近翌日子夜。孙收到昔日恩师康德黎邀请，于1896年9月30日抵达伦敦。10月1日早，孙就离开旅社，前往波兰区覃文省街46号，晤见康氏伉俪。10月11日，孙被满清驻英国公使龚照瑗诱捕。根据历史学权威学者黄宇和阐述，孙最初于满清驻伦敦使馆外游荡，并计划争取领使馆内华人支持革命，1896年10月10日，孙终得领馆内相熟朋友批准，于第二天容许孙进入满清使馆里巡视。翌日，使馆工作人员得悉孙将要前来，并设置埋伏，将孙拘捕。行动计划是逮捕孙，将他秘密遣送回国，接受法律制裁。孙得机会说服公使馆内一名英国仆人柯尔，将自己比作遭土耳其人迫害的亚美尼亚基督徒，称中国皇帝也要杀中国基督徒，孙给柯尔20英镑现金，并允诺事后再给他一千英镑，从而获得其协助，将便条交给康德黎，上头写着：“予于前星期日，被二华人始则施以诱骗，继则复骤加强暴，将予幽禁于中国使馆中。一、二日后，使馆将特雇一船，解予回国，回国后必被斩首，奈何？”10月22日，《环球报》（The Globe）登载康德黎长篇访问特刊。经康德黎奔走媒体后，英国外交部认为公法上清廷无权在英国领土上拘捕孙，使得此事成为国际事件。孙12天始脱险，撰《伦敦蒙难记》。孙向报纸投稿，召开多次记者会，接受多次访问，并赢得并遍支持。11月，孙在伦敦应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家翟理斯邀请，撰写《伦敦蒙难记》。1897年，孙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并考察欧洲政治，完成三民主义思想体系。

创中西学校、化名中山樵

1897年7月1日，孙自伦敦经加拿大，8月16日抵达日本横滨，旋创中西学

校。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遣宫崎寅藏、平山周迎接孙。引至东京相会，一见如故，抵掌谈天下事，大为快慰。平山周某次带孙至东京数寄屋桥外的旅馆“对鹤馆”住宿要登记姓名时，认为写日本式名字较安全，平山周想起日前经过日比谷“中山”侯爵邸，于是帮孙中山填“中山”的姓，孙自己则写上名字为“樵”，于是孙开始使用“中山樵”的化名，孙中山因此得名。更因犬养毅之介绍，广交日本朝野贤豪。被纳入犬养毅羽翼后，孙定居东京，由宫崎寅藏、平山周为伴，身份为宫崎和平山中文教师。透过他们，孙再结识头山满、进步党党魁大限重信、黑龙会山田良政等人。11月，孙在日本与宫崎寅藏笔谈记录，孙曾有“仆常持一都四京（五大镇）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广州（南京）、顺天（北京）”。12月，命陈少白成立兴中会分会于台北。
1897年8月16日，孙从英国取道加拿大到达日本横滨的时候，横滨华侨温炳臣有一名15岁女仆浅田春，曾上小学、中学，又上私立英文学校。快要毕业时，父亲突然去世，被迫出来做工，成为温炳臣小女佣。日本静冈县清水町人，懂中文及英文。孙到来后，温炳臣让她照顾孙中山。是年孙31岁。日本当局也让她随时报告孙之行止；她1901年以患病为由，回到静冈老家。

奔走建立革命组织

杨衢云辗转往来于东南亚、南非后，于1898年春天前往东京与孙会合。
1898年春夏，孙来往于日本东京、长崎、神户、马关、横滨等地，结识菲律宾起义军代表马里亚诺·彭西。秋冬，与亡命日本之梁启超会谈联合反清，未成。1899年春夏，孙继续在日本作革命联络策动，并为菲律宾起义军购运军械。10月11日，兴中会、洪门、哥老会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公推孙为总会长。12月，孙命陈少白创办《中国日报》于香港。报纸经费由日本人提供，报纸开办之初，先是得到何启大力襄助，尔后香港富商之子李纪堂做靠山。据《英国殖民地部档案》编号129卷339，香港总督梅含

理曾于1913年给英国殖民地大臣报告，提及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和韦玉曾协助革命党人："无可争辩的证据显示，远在革命爆发之前，这两位先生都已得到革命党人的信任。革命党的会议经常在韦玉先生家里举行……在革命前的好几个月，他听任自己的住宅被用为密谋反对清廷的会议场所，而且参与了密谋者的机密……在革命前好几个月内，何启亦参与革命党人的机密，实际上充当他们的顾问，指导他们的活动程度，以免违反香港法律条文的规定。"

第二次起义：惠州起义

孙一面重启香港之革命根据地，一面联络并扩大秘密会党之人脉。1900年，中国发生庚子拳乱，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孙将网络拓展工作部分托付给日籍顾问和同志，部分托付给湖南改革派毕永年。陈少白邀请广东三合会一位大老黄福赴香港，他在陈少白接受"白扇"头衔之仪式中担任主持。1899年11月李鸿章接任两广总督，想北京混乱失序之际另起一个独立政府。孙借此机会联系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行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李鸿章也答应与其会见。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不过是清廷陷阱。在刘学询召唤下，孙于1900年6月8日搭船启程，随行者还有日本顾问，日本顾问抵达香港后便开始替孙行事，与刘学询协商，可是不久后李鸿章决定放弃分离主义念头，奉朝廷之命回北京协调庚子条约，于1900年7月17日赶赴上海。1900年6月，孙主动求见法国驻越北大使哈尔蒙德（Jules Harmond），6月21日孙抵达西贡，携带哈尔蒙德大使给法属印度支那总督韬美（Paul Dourmer）之信。同年夏，孙先是抵达香港（并未上岸），然后再到安南、新加坡、上海。1900年9月，孙与日本友人及原香港兴中会核心人物先赴香港，但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故孙命郑士良等人在广东惠州三洲田（今深圳市盐田区三洲田村）一带发动起义（史称惠州起义）。朝廷军队在沙湾遭大败，起义队伍直抵镇隆，北距惠州仅20公里。10月17日，郑士良人马接获孙下达新指示，转而挥兵厦门，他们在陌

生之境长途行军遭到清兵追击，10月23日日本慑于俄国反弹，已放弃在厦门建立据点之念头，并撤退先前承诺之援助，郑士良和三合会各龙头只得逃逸香港，丢下各自人马，任他门归巢返乡。由于未能按计划与新安、虎门义军会合，该地义军被迫解散。四战四捷后，义军枪支弹药补给中断，郑士良急电孙氏，孙氏在台湾致电宫崎寅藏速送枪弹，由于采购枪械事物的中村弥六从中谋取暴利，所购全是废枪，起义失败告终。郑士良左右手史坚如在广州攻击两广总督，10月28日广州发生爆炸案，两广总督脱逃，史坚如在11月9日遭斩首。杨衢云在教室中被击毙；郑士良于用餐后暴毙。孙返回日本。

1902年，宫崎滔天出版孙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1903年中文译本问世。同年春，孙受章炳麟之邀，出席“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孙在日本和章炳麟谈论时又曾涉及革命发难以及成功后建都地点，孙以为“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视其规模远近而已”，孙并且说明：“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尚滨海之建都者，必遏远武昌。夫武昌扬云于大江，东趋宾山（江苏省），四日而极，足以转输矣，外鉴诸邻国，柏林无海，江户则曰海堧尔；内海虽咸，亦犹大江也……江沔之在上游，其通达等是矣，何必傅海！夫北望襄樊以镇抚河雒。铁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长城，其斥候至穷朔者，金陵之绌，武昌之赢也”。孙抵达越南，在华侨中建立革命组织，在河内结交法国官员。从1902年12月至1903年5月，孙停留河内，结交某些法国政治、外交、军事人士。

1903年6月，孙抵达横滨。同年夏，孙与15岁的大月薰订立婚约，并应孙要求，转到公立英和女子学校读书。1903年7月，两人举行婚礼，1905年8月大月熏怀上孙孩子。后生一女宫川富美子。1903年夏，孙在日本青山秘密创办一所军事学校，训练遭日本军事机构排除之中国学生。被吸收约15名粤籍学员，青山军事学校运作不超过4个月。

夏威夷出生证明

孙于1903年9月26日启程前往夏威夷。为求工作方便，孙扬弃先前立场，加入三合会。1904年1月11日，孙决定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为规避《排华法案》，孙预先取得伪造文件。取得该证时亲友们做出了孙在夏威夷出生的证词。3月4日，孙亲到夏威夷司法巡回处宣誓说自己是在夏威夷出生："本人孙逸仙，先经宣誓后，兹作证称：凭我所知和所信，我乃于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柯湖岛衣华（Ewa）镇之位问奴（Waimanu）地方诞生。我是一名医生，现在茂宜（Maui）岛的姑刺（Kula）地方行医，我家居住在姑刺。我父亲孙达成于一八七四年前往中国，约八年后在那里逝世。本人作此誓词，旨在证明我的身份；并提供我出生于夏威夷的进一步证据，所附照片为本人最近肖像。孙逸仙（签名）以上证词于一九零四年三月九日我在场时签字和宣誓。夏威夷疆省第一司法巡回处公证人凯特・盖利（签名）（加盖公章）"。3月14日，孙凭着誓词，拿到出生证明："他自己的宣誓以及证人所提供的证据，显示他是在纪元后1870年11月24日出生于夏威夷岛。"孙再据此领到夏威夷总督颁发之美国岛居人民所持护照，然后才加入洪门；洪门为他"特别开台戏"，"由主盟员某大佬封总理为洪棍。洪门军职，例分洪棍、纸扇、草鞋三级。洪棍，即元帅之别名也"。3月31日，孙带着地方堂口给旧金山三合会之介绍信，启程前往美国。

1904年4月6日，孙从檀香山抵达旧金山，为阻止孙入境，保皇党已闻讯而促请清朝驻该市总领事转告美国海关：指控孙所持乃假护照。1904年4月6日，孙上岸后，被美国官员扣留并审问，他写下《自述证言》。《自述证言》中称：自己于1870年出生在夏威夷伊娃，三四岁时被父母带回中国。1904年4月16日，旧金山移民局作出"拒绝孙中山入境"的决定。孙被拘留在码头木屋，等候原船下一次到达旧金山时，拨回檀岛；孙忽睹被禁乡人中所阅《中西日报》有"伍盘照"之名字，乃草一函，求卖报西童带往。移民局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孙曾经在1896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入境美国旧金山。华裔报人伍盘照得悉孙乃洪门中人，即转求旧金山致公堂帮助，该堂为全美反地洪门分堂之总部，总部大佬黄三德等人与伍盘照同访致公堂

顾问律师，由其向移民局声明即向首都华盛顿上诉，并把致公堂某物业向保单公司具保500元，担保孙外出候判。1904年4月26日，孙委托华盛顿的拉斯顿与席顿律师事务所（Ralston & Siddons），向美国移民局提起上诉。最后孙被批准入境。1904年4月28日美国“商务及劳工部”作出覆议决定：准许孙入境美国，理由是早在1896年的时候，夏威夷尚非美国属地，是夏威夷共和国时期，孙不可能拿夏威夷发的美国护照，所以1900年4月30日生效的“美国移民新法案”，自动赋予孙“美国公民”的身份，取得“夏威夷护照”，或者说“美国殖民地护照”，又称“疆省护照”。所以准许。6月孙动身巡回全美十多个城市。9月底孙抵达纽约。

1904年冬，孙携朱和中赴德国柏林，访问清国籍华裔留德学生。在宾步程的带动下，王发科、王相楚等留学生加入兴中会。在柏林逗留数日后，孙与朱和中赴法国巴黎，留法学生唐豸、胡瑛、汤芗铭、向国华等十多人应邀入兴中会。孙在巴黎住在利倭尼街的瓦克拉旅馆。一天，汤芗铭、向国华、王发科、王相楚四人结伴来找孙去附近的咖啡馆喝咖啡，王发科、王相楚二人中途离席，到瓦克拉旅馆盗走孙的行箧中的党人名单及入盟书、法国殖民大臣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的信函。此为王发科、王相楚、汤芗铭、向国华四人合伙设计。得手后，四人到清国驻法国公使馆告密，公使孙宝琦训斥四人称：“你们加入革命党，是叛清朝；今来自首，又叛革命党。且陷害同学，人格何在！”孙宝琦收阅这四人盗取的文件后称，“今后你们要好好念书，安分守己，不要胡闹。”留法学生夏监仲是孙宝琦的亲戚，得知消息后赶到使馆向孙宝琦疏通。孙宝琦乃将入盟者的宣誓书烧掉，将其余文件交给夏坚仲，夏坚仲通过邮局将文件寄还孙中山。但是，孙宝琦从法国殖民大臣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的信函中得知孙的安南起义计划后，即赴法国外交部交涉，导致孙的起义计划未能实现。1905年2月，孙抵达巴黎。同年5月中旬，孙以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姿态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与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进行会谈，提出接纳他的兴中会为第二国际成员的请求，王德威尔德、胡斯曼等人认为当时落后的中国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未予批准。

组建同盟会

1905年7月19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宫崎寅藏和杨度等人介绍认识了黄兴，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7月30日，在日本极端民族主义之黑龙会总部举行大型会议，有70人出席，会中决议成立新组织，并奉孙为领导，新组织名为“中国同盟会”。8月13日，孙在东京向留学生作公开演说，大为轰动；演说会场是东京富士见楼（麴町区饭田河岸），会场能容纳千人。大会由宋教仁主持，有逾700名学生云集在大厅内，还有许多学生不得其门而入，簇拥在门外，聆听孙首度在东京公开发表演说。届时爆满，后来者犹络绎不绝，门外拥挤不通；警吏令封门，诸人在外不得入，甚为喧哗；又开门听其进场。
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牵线下，结合孙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上海蔡元培、章炳麟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是在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之宅邸，在场300人聆听孙宣读新组织章程。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其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次年发表“军政府宣言”，复将此誓词列为革命建国之“四纲”。孙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孙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地位形同副总理。
中国同盟会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民报》是在1905年11月26日创刊，并于1908年10月10日出版第二十四期后遭日本当局下令封禁。
同盟会宣言开宗明义，呼吁需要一场“国民革命”，由“一国之人”着手进行，且应分两阶段展开：第一阶段是驱逐满人，第二阶段是恢复中国主权；满人乃关外之东夷，他们征服中国、奴役汉人，让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唯有驱逐满人，才有可能“光复中华”，“中国者，中国

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同盟会创立时发表之宣言，是革命意识形态即三民主义之雏形，尔后又藉黄兴、章炳麟之助，孙在1906年秋天进一步修订，即所谓《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与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并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道程序。宣言主要方针是在《民报》上发展出来，文章由不同作者执笔，观点具个人色彩，有时还彼此矛盾，确实构成三民主义教义主体，一般认为表达孙之政治思想。
同盟会其实一直是革命团体间一个极为松散之联盟，其中某些革命团体多年后变得公开与孙为敌。孙之门徒以排满种族主义做为现代民族主义之基础，全然将民主等同共和体制，诸如此类。他们处理大多数问题，都是从同盟会敌视梁启超之观点来分析。

第三至九次起义

1905年10月，自日本经西贡往马赛、巴黎。1906年4月，孙出席同盟会在新加坡成立分会。
1907年2月，要做为同盟会象征旗帜设计，孙满意青天白日旗，黄兴则想要有中国古风、象征平均地权政策之“井”字旗。根据宋教仁所言，孙态度令黄非常不满：“盖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一个月后，日本当局受满清政府施压，决定驱逐孙离境。为表达善意，日方除发布驱逐令之外，还以外交辞令表达歉意，并馈赠孙大笔款项。日本政府送其路费6,000元，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送其10,000元。孙收款后，留2,000元作《民报》经费。孙自3月离开东京。合计日本政府与右派人士共赠款2.3万日元，相当于现今1千万美金。
1907年3月至1908年1月，孙先抵越南河内，继续策划革命起义，1907年5月，孙命余丑发动潮州黄冈起义，历六日而败，是为第三次起义。
6月，孙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历十余日而败，是为第四次起义。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徐锡麟在安徽安庆起义，是为安庆起义，失败殉

难。
1907年9月1日，粤西靠近广西与越北之市镇防城起义，起义军由秘密会党首领王和顺起义于钦州，是为第五次起义。
10月，孙私自委托宫崎滔天在东京帮他做财务处理，洽商购买军火，形式上把同盟会其他领袖排除在军事机密外。12月，孙亲赴广西，指挥黄明堂发动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是为第六次起义。
在法国外交部压力下，孙于1908年3月被逐出越南。南下南洋之后，在胡汉民、汪兆铭等支持下，孙在新加坡晚晴园另成立同盟会总部，后搬迁到槟城。
1908年，同盟会陶成章在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发表《孙中山罪状》。指责孙"谎骗营私"，在汇丰银行有巨额存款，贪污两万银元的革命经费，有"残贼同志"、 "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三种十二项"罪状"，要求"开除孙中山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陶成章在1912年被陈其美命令部下蒋介石暗杀。1909年11月，章炳麟猛烈反击伪《民报》，呼吁海外华人不要捐资给孙；陶成章谴责乾纲独断，再度要求同盟会开除孙。
1908年3月27日，黄兴由法属印度支那率革命军进攻钦州，发动钦廉上思之役，是为第七次起义。4月，黄明堂发动云南河口起义，是为第八次起义。
1908年10月，《民报》遭日本发出禁令。11月，孙在泰国期间访问美国驻泰国公使馆，面见美国公使汉密尔顿·金（Minister Hamilton King），要求美国政府给他颁发一本"美国本土护照"。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向汉密尔顿·金公使下发这样的决定：孙没有资格登记为美国公民或申请美国护照，理由如下："美国公民享有权利，但也有责任和义务，他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而本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有友好关系"。
1910年2月，倪映典发动广州新军起义，是为第九次起义。3月，孙抵檀香山，改组兴中会为中国同盟会檀香山分会。

第十次起义：黄花岗起义

1911年4月8日，温生才暗杀广州副都统孚琦。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赵声、黄兴等人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一度占领两广总督衙门，之后黄兴负伤。由于起义军和政府军力量悬殊，黄花岗起义很快失败，大批革命党被捕牺牲。是役战死者为57人，被捕后就义者29人。共为86人。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是为第十次起义。

武昌起义

1911年5月，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四川民众纷起抗议，成立“保路同志会”，派代表到北京请愿，还举行罢市、罢工和罢课，四川总督赵尔丰强硬镇压，引起激烈反抗，清廷急调湖北新军到四川镇压，造成湖北守备空虚，革命党人乘机于10月起义。1911年8月，“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武昌起义前夕，湖北革命团体一同集结在文学社（湖北新军革命团体）与共进会旗帜下，文学社多招募自驻扎武昌之新军军官和士兵，共进会则是同盟会异议组织地方分支。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武昌驻军乱起，找上守备统领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经过一夜血战，终于在第二天早晨攻占总督衙门，革命军于是占领武昌。
辛亥革命发生之际孙正在美国进行演说募款之旅，美国时间10月9日下榻犹他州小镇奥格登的Hotel Marion。10月10日下榻丹佛（或译典华）的布朗皇宫饭店(Brown Palace Hotel)，该饭店并存有孙当时的入住记录。根据孙自述：“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其文曰：‘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时予在典华，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覆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起后觉饥，先至饭堂用膳，道经回廊报馆，便购一报携入饭堂阅看。坐下一展报纸，则

见电报一段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覆电，已为之冰释矣。乃拟电致克强，申说覆电延迟之由，及予以后之行踪。”

起义后几周之间，革命席卷华中、华南，各省纷纷宣布脱离中央。自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被迫回籍养病，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平乱，但其所率之军多为袁世凯所训练，不受节制，清廷至此不得已再起用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节制诸军。

10月14日，伦敦《每日纪事报》刊出〈孙逸仙讲述他第一次起事反抗中国皇朝之故事〉：“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借着《圣经》以及我们所理解的欧美教育作为手段，向我们痛苦的国人传达一个信息：公正的法律会为他们带来幸福，文明会为他们带来欢慰。”孙10月20日抵达伦敦，先与康德黎夫妇叙旧。10月31日，湖北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刊有用孙名义发布之《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布告全国同胞书：“往年本总统以民族主义，提倡我中华全部，遂至捐弃家人，沈沦异域，投艰蹈险，虽屡濒于死，而大声疾呼之气不少衰；然当时之应而和者，只会党一部分，余则犹尚酣睡沈醉而未醒。曾不几时，民族主义之进步，日速一日，今则统中国皆国民矣；我鄂军代表竟首举义旗矣；我各省同胞竟同声响附，殆无不认革命为现今必要之举动矣。同胞！同胞！何幸而文明若此也？此必我黄帝列圣在天之灵，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兴汉之奇功，盖可以决满虏(注四)之必无噍类矣。虽然，本总统窃有不能已于言者，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事不图终，曷克有济？倘行事或虎头鼠尾，而存心复狼顾狐疑，或生猜忌之私，自相鱼肉；或萌退缩之志，坐失事机，则后祸之来，何堪设想？所以曩者欲图大事，而往往功败于垂成者，其遗误大都如是也。今特布告我大汉同胞，共鉴前车，牢持来轸，再接再厉。全始全终；勿畏葸，勿偷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诿，纵使百战百胜而勿骄，即令小败小伤而勿馁。凡我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效诸葛一生惟谨慎之行，守吕端大事不糊涂之旨，运筹宜决而密，用兵贵速而神，自能垂手燕云，复仇报国；直抵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使异族帖耳俯首。此固本总统中心之所切切，而群策群力，实所望于同胞。”11月11日，孙抵

伦敦，就武昌起义成功接受《滨海杂志》采访，至11月20日离开。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

建立民国

1904年底，孙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受到清政府全力追缉影响，自1907年起孙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1909年5月，孙自新加坡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7月，孙抵布鲁塞尔，马君武前往迎接。8月，孙自布鲁塞尔抵达英国伦敦。11月，孙自英国抵美国纽约。

另一方面，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1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1911年2月，孙在加拿大温哥华设立"洪门筹饷局"为革命筹款。5月3日，孙在美国芝加哥召集会议，商讨起义善后及再图大举等问题。7月，孙到美国委陌林埠。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人在美国进行募款活动而不在中国。11月2日，孙从纽约出发。11月10日，在国外得悉"武昌已经为革命军占领"消息后，孙抵伦敦开展外交活动。孙在伦敦草拟《告世界书》。游说英法美德银行团代表终止贷款给清政府，并委托维加炮厂经理道森与英国外交大臣会谈，要求英国政府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政府援助清政府，取消英属各地放逐令以便取道回国，得到英国政府同意。此后，四国银行代表团同意停止给清政府借款。11月23日，孙会晤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Stabislas Simon）。孙要求"重掌握海关及其税收""取消厘金"，给中国革命政府贷款，但遭到拒绝。孙还到法国参议院拜访了参议员、前外长华盛和众议院的一些议员，希望法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并与前总理乔治·克列孟梭诚挚会晤，访问了法国在野人士。得到西方国家"皆极表同情于我"的印象。

临时大总统

1911年11月24日，孙从法国马赛启程，乘“狄凡哈号”邮轮，经停马来亚槟城、新加坡、香港。袁世凯率领大军入北京组阁，并迫载澧退归藩邸，继又迫载涛交出禁卫军，清室军政大权尽握袁手中，袁立命冯国璋全力攻汉阳。

12月14日，各省咨议局代表云集南京，共计44人，分别代表17个省分。孙于12月21日抵达香港稍事逗留。12月25日，孙到达上海。孙与《大陆报》主笔谈话称：“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孙向英国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12月26日，孙与黄兴等在宝昌路408号（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行馆召开中国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在南北和谈进行之际，12月29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结果孙以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上10时，在南京总统府举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宣誓就任。是年1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国会）。但当时的《纽约时报》报导对这次选举的代表的合法性提出疑问。

“大总统誓辞”如下：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
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
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
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
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中山

当时满清政权并未终结。1月3日，袁世凯指使手下冯国璋、段祺瑞等48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共和制和南京临时政府，拥护君主立宪制，并以军事实力向临时政府施压。受到此事影响，南京方面内部主战情绪空前高

涨，临时政府于是接受孙的用兵主张。1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决定组建北伐军海陆军，孙宣布自任总指挥，黄兴任北伐军陆军参谋长，林述庆任北伐军津浦路总司令，孙岳为北伐军淮阳县总司令，柏文蔚为第一军军长，蓝天蔚为第二军军长，并成立海军舰队。在总统府府设北伐大本营，实际由黄兴主持。大本营的机构直到3月下旬取消。首战，北伐军在津浦路一线告捷，粤军于蚌埠、固镇、宿州一线大败清军，张勋军望风而逃，徐州不战而下。同时，安徽、河南前线及奋勇军也传来捷报。1月16日，海军先锋进抵烟台，沪军占领登州。北京为之震动。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袁世凯感到恐慌。英国、日本、美国、德国派军舰在长江示威，并阻止民军在秦皇岛登陆。日本向蒙古、东北增兵。由于军费匮乏，粮草、饷械奇缺。时值严冬，北伐军御寒衣物不足，冻死者众多，军队士气大受影响。而六路大军只在名义上受临时政府指挥，实际上各自为战，进军受阻。与此同时，临时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举步维艰。尽管孙仍然坚持主张北伐，但是临时政府内部上譬如张謇、汤寿潜、程德全等开始出现主张停战议和的声音，其他人认为可以把大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换取清帝退位。袁世凯上台后用《临时约法》对其限制，袁必不敢胡作非为。汪精卫认为孙不愿议和是因为贪恋总统之位，黄兴扬言要剖腹自杀。虽然该议和主张仍遭到了地方军政府及群众团体的激烈反对，孙最终依然选择妥协。曾访问过孙之记者提到“他真诚、慎思的外表”，以及“安静、沉稳的举止”。

2月12日，清廷下诏宣统帝逊位，诏书文本由南京方面草拟，再传给袁世凯。期间，袁世凯曾遭炸弹暗杀，但行动失败，1月18日，孙以提出《五条要约》方式向袁世凯摊牌。孙不愿延长内战，双方遂派代表在上海议和，孙提出：一、清帝退位；二、袁绝对赞同共和；三、孙自清帝退位后辞职；四、由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五、袁被选后，当宣誓遵守《临时约法》，袁乃嗾使段祺瑞等电清廷实行共和。经过反复修改又于1月22日以公诸报端的方式将南北双方幕后谈判全部曝光，令袁世凯极其尴尬和不满，也让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尽失颜面。2月13日，袁世凯通电共和，根据南方独立各省及部分革命党人自始至终的意愿，孙提出辞职咨文，准备将

总统一职让位给袁世凯。2月15日，孙祭明孝陵时向文武官员讲话。同日孙宣布辞去总统职位。

临时约法

1912年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8日，以孙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由临时参议院通过颁布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取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约法》确定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临时政府参议院之组织与职权，并规定《约法》施行后10个月内成立国会。行政权由总统与内阁分享，且阁员须由国会通过任命。内阁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组成，法院为司法机关。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25日，袁世凯任命之内阁总理唐绍仪抵南京组织新内阁。3月11日《临时约法》公布实施。参议院为防袁野心，特设“责任内阁制”，以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并设国务会议以行使职权，但袁不能容，唐被迫辞职，以陆徵祥代之。3月29日，孙出席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卫戍总督、各军师旅司令官举行饯别宴会。1914年5月，临时约法遭罢废，新法除去所有行政权约束，并无限期延长总统任期。

解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4月1日，孙在南京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把总统宝座让给袁世凯。孙辞职后不再过问政治，“决心尽瘁社会上事业”，开始着手社会革命。4月3日，孙离开南京，到全国各地参观并宣传民生主义。4日，在接受《文汇报》记者提问时，孙说：“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尝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社会革命比政治革命愈属重大，且非兵力所能援助，必须以和平手段从事”。6日，参观江南制造局。4月9日，孙应鄂军都督黎元洪之邀抵武汉，与廖仲恺、胡汉民等由上海经南京前往，武昌市因此万人

空巷。孙在武汉与辛亥革命首义战士和湖北同盟会会员见面，10日参观楚望台，并出席湖北军政界代表300人参加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讲，阐述官吏与军人的职责，并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强调“功不必自我成，名不为自我居”。4月20日，孙抵达福州，参观马尾船政局。25日抵达广州，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四万万同胞皆应受教育，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孙在其广东之行中说：“吾国乃社会主义之民国，欲行社会主义。吾等皆是真诚的社会主义领袖。”5月15日，前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地致祭文。5月27日，孙抵翠亨村，与夫人和大哥团聚。参观途中，孙愈加认为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发展实业，而建筑铁路是“发展中国财源的第一要策”。6月，唐绍仪内阁垮台。6月中旬，孙回到上海与黄兴商量，草拟一份修筑铁路的计划。袁世凯邀请南方领袖到北京与他会晤，孙于8月24日抵达首都。9月25日，双方达成共识，公布一则联合声明，提出建立中央集权之政府，去军事化，开放外国资本，促成政党和解，稳定政局。

国民党理事长

1912年8月，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及国民公党，改组成国民党，推举孙任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实际党务由宋教仁主持。孙担任总理，黄兴为协理。8月25日，孙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孙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即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1913年11月，国民党残存势力被解散。

中国铁路督办

1912年9月10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将拟筑之路先与各国商人商议借款招股事宜”。袁世凯任命孙为铁路督办，每月可支领经费3万元。孙自己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希望透过开放外

资，尽快完成建设中国铁路，自认为有相当详细之规划。在北京与袁世凯会面后，乘火车前往张家口，视察京张铁路。1912年10月，孙委托王宠惠与英商签定广州至重庆及兰州的铁路线，袁横加阻挠，不予批准。

讨袁护法

1913年2月11日，孙赴日本考察，藉以筹措外资兴建铁路。2月13日抵达日本后，孙受到热情接待。2月至6月，袁世凯提供巨额，诱使国民党员另组政团，有国事维持会、政友会、超然议员社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3月4日晚，孙在东京设宴答谢日本各界人士，牧野外相等内阁阁员应邀出席。3月11日，孙与宋嘉树、戴季陶等参观大阪《每日新闻》社。3月14日，孙与戴季陶、马君武、宋嘉树、何天炯等出席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正支部长吴锦堂在寓所所设午餐会。
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后重伤不治。3月22日，孙在长崎获悉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消息。
1913年3月23日，孙参观长崎三菱造船所后，下午即乘船返国。孙自从3月25日返回上海后，便极力主张公开与北京政府决裂，并以武力对抗袁世凯。同月，孙与黄兴等在上海横滨正金银行商讨集资讨袁。孙力主兴师讨袁，但黄兴认为兵力不足，主张循法律途径解决。袁竟不经国会通过，擅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镑之善后大借款，名义用于平乱。孙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是为二次革命。袁罢免反对善后大借款之三都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致引起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因势单力薄，在两个月内被各个击破。7月8日，李烈钧占领湖口要隘，宣布独立，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黄兴7月15日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8月2日，孙由上海乘德国船舶潜逃至福州。反袁失败后，孙乔装化名逃亡，经台湾基隆乘坐日本货船“信浓丸”号，1913年8月7日到达日本门司区。孙动身前往日本，于8月8日上岸。9月初，袁世凯已弭平所有叛乱。10月15日，袁以北京总检

查名义通缉孙及二次革命首要。在日本内阁默许下，孙经门司、神户，最后从横滨进入东京。

组建中华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于1913年底开始筹建。1914年1月，孙准许陈其美东北之行。7月，孙在日本召集国民党员，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中华革命党”宣布“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规定入党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党员人数最多时只500人左右。每个人都要发誓，“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每个党员之地位取决于入党时间：凡在革命开始前之前入党者，即为“首义党员”，日后为“元勋公民”，将被赋予“特权”；凡在革命开始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之前入党者，即为“协助党员”，日后成为“有功公民”，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革命胜利之后始入党者，即为“普通党员”，日后为“先进公民”，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孙提案遭到革命党人强力抵抗，特别是黄兴。部分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俱未有加入。7月8日，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孙选任总理。7月，蒋介石赴东北策动讨袁军事时，孙对蒋表示，“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护朝鲜的独立，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你要将这个意思告诉日本将领”。后在东北时，蒋将孙的话表达予“一位日本联队长”：“听了我的话大为不满，面红耳赤而去。第二天就请我离开东北。”1月29日，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上呈日本政府一份关于解决中国问题之备忘录，他在文中提议从袁世凯手中救出中国，然后与中国结盟，将中国置于日本保护下；他推荐支持两个有助推翻袁世凯之团体：以肃亲王为核心之北方君主主义者，和南方革命党人孙。

中华革命党在各地组织活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而屡遭挫折；1919年10月，孙又把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

1915年孙与宋庆龄于日本东京结婚

孙与卢慕贞分居多年，协议离婚。1915年10月25日，孙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

护国之役

袁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乃组织“公民团”，胁迫议员选己为正式总统，解散国会，设立“约法会议”，废止《临时约法》。1915年，袁世凯怂恿筹组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1月18日，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求，事关山东、南满和内蒙古东部权利让渡，和日本军事和政治顾问任用。3月14日，孙致书日本外务省大臣，向日本政府承诺优于二十一条要求之权利让渡。11月，陈其美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月试图破坏黄浦江之中国军舰。袁进行“国体投票”，要求各区、各省之国民代表，投票赞成改行君主政体，又指使参议议员上书拥戴袁为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明年为“洪宪”元年；前云南都督蔡锷潜离北京，绕道回云南，于12月底联同李烈钧、云南都督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向四川、贵州、广西三路出兵。12月25日，云南护国军诉请其他各省响应讨袁。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袁部属如段祺瑞、冯国璋、陈宧、汤芗铭、陈树藩等相继反袁。4月9日，孙、宋庆龄等在日本友人田中昂寓所举行小型声讨袁世凯集会（又称“帝制取销一笑会”）。4月27日，孙为讨袁大计，离日返国。5月1日，孙抵达上海公共租界。5月9日，孙发表《讨袁宣言》，号召推翻袁世凯。5月18日，袁世凯买凶刺杀陈其美。6月6日，袁世凯逝世。7月17日，孙在上海张园举行茶话会，与各界人士研讨袁死后之形势和建设方针。10月31日，黄兴逝世。

张勋复辟

总统府内务总长孙洪伊为黎元洪信任，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则为段祺瑞之门人，二人各为其主，遇事冲突，造成府、院之争。1917年5月11日，段祺瑞派出“请愿者”包围国会。6月，徐州张勋率军5,000人北上，强迫黎元洪解散国会。7月1日，张勋在北京重新拥立清废帝溥仪，历时12天，史称张勋复辟。皖系军阀段祺瑞乘机纠集旧部，组织“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军败退，溥仪再度宣布退位。段祺瑞起兵驱逐张勋后，控制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黎元洪去职，由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命。

第一次护法运动

段祺瑞违反临时约法，通过对德宣战案，举借日债，企图扩张势力；孙以段违背宪法，乃自上海赴广东，倡导护法，各省亦多响应。1917年7月6日，孙等南下掀起护法运动。孙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组织军政府。时任广东省省长朱庆澜邀孙赴粤，并派程璧光之独立海军载孙、唐绍仪、汪兆铭、伍廷芳等人和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7月17日，孙抵达广州。7月21日，海军总司令指挥麾下15艘军舰驶离上海，开赴广州，当时广州已聚集130位国会代表，约占总数三分之一。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9月10日，孙正式就任。9月13日，广州军政府对德宣战。蒋介石撰上对北洋军作战计划及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
孙号召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誓师北伐。由于南方军阀本无诚意护法，故不久即酝酿议和。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旧桂、滇系军人控制，孙实力有限，甚至“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孙曾尝试发动兵变而未果。1918年5月，军政府改组，实权掌握在军阀手中。军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领导南方与西南各省。

孙见事不可为，惟有黯然离去。孙抵达上海后，与先到之宋庆龄住进华侨捐赠之莫利哀路29号寓所（今香山路7号、上海孙故居）。1918年至1919年，孙闭门谢客，撰写文稿，决心改变现状。宋庆龄随时帮助他收集有价值的书和报纸杂志，协助查阅资料，著书立说。作为秘书，宋庆龄还负责协助起草电函稿件，翻译英文，并加紧学习德文、俄文，准备联系苏联方面。

1919年，孙完成《实业计划》绪言（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钜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然而消纳机器之市场，又正战后贸易之要著也。造巨礮之机器厂，可以改制蒸汽辘压，以治中国之道路；制装甲自动车之厂，可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变成平和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此种开辟利源之办法，如不令官吏从中舞弊，则中外利益均霑，中国人民必欢迎之。"

继续革命

成立中国国民党

1919年10月10日，孙改组中华革命党，扩大吸收党员，成立中国国民党。

1920年，陈炯明奉孙之命率领粤军从福建返广东，打败盘踞在广东之桂系军阀，重建广东根据地。同年秋，孙试图与湖南自治派之赵恒惕谈判结盟，并透过湖南，争取和四川、云南结盟。11月9日颁布之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中国国民党以实施三民主义、创立五权宪法为目的。11月28日，孙设法返回广州。

第二次护法运动

1921年初，旧国会在广州重开，因不足法定人数，故称国会非常会议，推

举孙为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孙设法号召旧国会225名议员，于4月7日在广州集会，推选总统。4月2日，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改总裁制为总统制。4月29日广州政府外交部长接受《北华捷报》专访，即明白表示："任何人要和我方达成协议，必须同意由他（孙）担任临时大总统，以待召开国会、正常选举。我们没有其他条件。"5月，孙宣布就职，辖区仅有广东，实权在陈炯明之手。第二次护法运动开始。7月24日，孙与宋庆龄在广州出席"出征军人慰劳会"。10月，广州非常国会批准孙北伐计划。

1922年4月，孙不满广东省政府不支持北伐，决定罢黜陈炯明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位。5月，直奉战争奉系遭直系击败。6月2日，徐世昌在压力下退让，宣布辞职。直系恢复约法和国会。在粤国会议员纷纷北上。孙就任非常大总统，积极策划北伐，陈炯明志在割据，多方阻挠。陈炯明主张停战，实行联省自治，而孙主张继续北伐，最终产生激烈冲突。1922年夏，孙自桂回粤，免陈炯明职。6月16日，叶举炮打孙寓所。陈炯明兵变，宋庆龄不愿与孙同行，认为"目标太大，容易被叛军发现"，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对孙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我请求你先走吧！"陈炯明发动六一六事变，围攻总统府悬赏捕杀大总统，叛军将总统府焚毁，府中所藏孙心爱的大量藏书和未经发表的著述亦被焚毁，孙与卫兵登上永丰舰与之作战，后被困黄埔，叛军不断炮击，孙及部属给养困难，孤立无援，处境极为艰难。6月29日，蒋介石在料理后事之后同汪精卫坐外国轮船冒死赶来救援，日夜陪伴左右并出谋划策，孙大为感动振奋。在永丰舰经过车歪炮台前往白鹅潭时，两岸叛军集中炮火进行攻击。孙在甲板上镇定指挥，吩咐士兵节约子弹并描准射击。由于炮火密集，士兵卫士多人倒毙，经其他人苦劝，孙才回到舰艇舱内。英国只肯派一艘炮艇供孙调遣，孙因而得以在8月9日离开珠江，安抵香港，再转往上海。8月离开广州往上海。9月至12月，孙在上海寓所3次召集在上海各省中国国民党负责人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张继、杨庶堪讨论改组中国国民党问题。孙和吴佩孚谈判，盼望能回到北京；孙同时与张作霖秘密交涉，从张作霖得到若干经费。

联俄容共

1921年12月，孙在桂林接见过共产国际官方代表马林。孙对俄国革命及列宁本人表示赞赏，很想多了解俄国新政权之成就，特别是对新经济政策相当好奇。1922年1月为反制华盛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之远东劳动者大会上，共产国际首领季诺维也夫大肆抨击中国国民党之资产阶级作风，以及孙寻求美国援助之执拗。1922年4月27日，孙对共产国际派到广州之达林说："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8月，苏联政府秘密通过马林与孙联系；马林和李大钊与孙多次会晤，讨论振兴中国国民党之问题。11月至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综论东方问题》，强调中国共产党先天体质不良，主张暂与中国国民党及若干地方领导人妥协，并提议组成统一战线。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唯一之伙伴，并指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内部运作，同时要保有组织和活动自主。1月17日至1月26日，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到上海与孙会谈，到月底发表《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确立孙"联俄"政策，主要内容有：

1. 苏联愿援助中国完成统一大业；
2. 苏联愿抛弃沙俄对华之不平等条约，另行开始中苏交涉；
3. 中东铁路问题由中苏协商，暂仍维持现状；
4. 苏联无意使外蒙脱离中国，苏军也不必立时撤退。

孙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完全同

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孙接受与莫斯科同盟，但有两大保留：一、中国不会转向共产主义，俄国将支持中国（孙）之国家统一及独立奋斗；二、越飞重申俄国放弃沙皇时代依条约在华所得之一切特权。

1月26日，孙通电各大军阀，重申其自愿裁军之计划，另外再提议委请列强出任第三方代表团；代表团负责监督裁军，也负责筹募、运作用于国家经济及政治改造之国际基金。

孙引入苏联金援改造中国国民党、建立党军的政策。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声明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但苏联愿意援助中国完成统一及取得完全之独立。孙越宣言俄方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主权，承诺不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孙接受临时协议，把中东铁路委由苏联管理，并准许苏联军队占领外蒙古。与共产国际合作后，苏俄方面给予孙大量军火和银钱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帮助孙创立党军北伐。孙派遣参谋长蒋介石率领代表团访苏，考察政治和军事，又聘用苏联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协助改组中国国民党。1923年8月16日，孙派遣蒋访问苏联，向革命成功推翻俄罗斯临时政府的苏联学习建立革命军队的经验。探查完后蒋向孙报备说共产党的可怕程度、绝不可信任，孙相信后开始对共产党留意。9月，苏共中央挑选鲍罗廷出任孙之政治顾问，负责执行与中国国民党之统一战线策略。苏联新特使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10月9日至10月17日之间，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五度私下会谈，会中他表明改组政策即是渗透政策：“在报上，我讲的是国民党，但对我们而言，我讲其实是最终共产党影响力的增加……绝不能忘记，我们实际在做的工作（投入稳定国民党的），就是为了稳定共产党，这个目标应该要永久记住。”10月13日，孙批准鲍罗廷提出之改组方案：订定新党章、在广州和上海组建核心小组，再到全国各地成立地方党部，最后召开党之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变革，并推选一组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18日，孙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名义，委任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组织训练员。10月25日，孙指派9位同志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一人具有共产党员身份。10月底，

滇、桂系部队作战失利向广州撤退，陈炯明军一路尾追到广州城外。鲍罗廷在11月13日临时中执会痛批中国国民党领导人未能动员群众，称："以农民为主广东民众对前线战争依然持消极态度！"鲍罗廷组织两支志愿队参加城防工作：赶赴前线者约有500人，大部分由共产党员训练。11月18日夜，军事情势逆转，陈炯明部仓惶撤退。11月25日，孙在〈在广州大本营国民党员的演说〉称："吾党与他（鲍罗廷）等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等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为战，今后应该结合团体而战，为有纪律的奋斗；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党的训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望各同志牺牲自己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11月29日，邓泽如等11人联名上书孙，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改组中国国民党，他们指责中国共产党帮助孙确定反军阀之纲领，使中国国民党遭受"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孙说："你们如果反对国共合作，我就解散国民党，我自己参加共产党去。"邓泽如等说"俄人为这订定制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说政纲是他自己请鲍罗廷所写，又告诉邓泽如"切不可疑神疑鬼"，"以陈独秀为首之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陈独秀等）如不服从吾党，吾必弃之"。12月29日，孙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到广州作孙顾问，以苏联共产党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孙愿意容纳于中国国民党内，一来是为了争取苏联援助，二来是为集中力量，壮大国民革命声势，他曾当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面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够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

召开。孙召开全代会，在1月20日上午之开幕演说上，他强调党改组之必要，以及将党变成革命、建国工具之目标。孙力排中国国民党内反共势力干扰，坚持“联俄容共”，但是国民党上层自大会一开始就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意见不一，争论激烈。意见分三派，一派主张联共，一派主张容共，还有一派主张分共。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及改组以后，不断有人表示反对，有当面发难、联名上书、集会抗议、会场上抗议等。冯自由、刘成禺、胡毅生、李石曾、戴季陶等公开表示反对国民党改组。孙于是表示：“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甚至孙的儿子孙科因为发表了反苏反共的言论，不支持改组，被孙亲自把名字从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单中划掉。大会主席团由胡汉民、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组成，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大会；大会确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但须服膺三民主义及遵守党纲党纪；与会代表百多人，包括2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大会后鲍罗廷离开广州好几个月。从春天起，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农民部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制订、推行中国国民党之农村政策：农民部当家是秘书彭湃，由中共农民委员会和鲍罗廷在幕后操控。在廖仲恺倡仪下，5月1日大型庆祝会于广州筹开，孙在会中演讲，再度呼吁大家为民族解放奋斗，而把阶级斗争之主题摆到次要地位。

中共党员威胁拒绝统一战线即是与苏联绝裂，但孙不肯在鲍罗廷回来前解决争端。几经急电催促，鲍罗廷在6月20日回到广州。6月25日，鲍罗廷与温和派反对领袖会谈时，承认共产党的确构成“党（国民党）内有党”，但他暗示是取得苏援代价：“国民党已经死了、埋了……新成员，如具有团体精神共产党员，透过为老同志灌输竞争活力，昭示著新国民党诞生……国民党的中央组织仍然松散，命令也得不到全体党员遵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期待共产党放弃他们自己的组织。”上海、北京同志函电涌至，抗议共产党干预、操纵，尤其是他们力促通过中苏条约之宣传；张继和汪精卫在

广州公开发表反共演说，并发起要求驱逐危险盟友之请愿连署。7月15日，沙面全体华工罢工。8月3日，孙在广州大学演讲民生主义时批评马克思主义，驳斥马克思主义之剩余价值说，也摒弃阶级斗争之重要角色。孙在8月10日第二次演讲，表明他所说的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他说："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发明出来的，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8月21日，孙〈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演说〉，对讲习所学员发出警告，无法在中国发动阶级斗争，反之应该要用平和方法，以合作为诉求："所以大家此时去宣传，一定要很谨慎……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方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同年秋，农民协会和地方民团间之冲突已演变成激战。

8月23日，中执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共党员在中国国民党内之特别责任，解除张继、谢持控诉他们派系活动之罪名。同年，苏联支持外蒙古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未从外蒙古撤军。孙认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民生主义已包括共产主义在内。1925年2月，鲍罗廷决定派广州政府军增援农民协会对抗地方民团。

扫荡军阀

1922年底，孙策动驻广西之滇军、桂军及驻西江之部分粤军赶走陈炯明，夺回广州。1923年1月16日，拥护孙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和倒戈粤军合组西路讨贼军击败陈炯明部，陈炯明退守东江。2月，孙回广东，再任大元帅，3月正式成立大元帅府。3月2日，孙以大元帅名义，特任杨庶堪为大本营秘书长，朱培德为大本营参军长兼大本营护军司令。当时陈炯明占据东江一带及潮州、汕头等地，与孙成相持之局。4月20日，孙督师北伐讨贼，与参谋长蒋介石从广州火车北上。8月14日，为纪念广州蒙难一周年，孙与宋庆龄同该舰官兵重登永丰舰。

1924年1月1日，孙与宋庆龄在广州大元帅府举行庆祝中华民国成立12周年暨授勋典礼。3月18日，孙署名公告〈关于实行党纪的命令〉，提醒党员遵守党纪：党员“应由所在地之最高党部直接组织，并指挥之”、“不得假借名义，自由行动”。孙在鲍罗廷和党内领导人陪同下，于6月16日主持开学典礼。6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学，第一期有学员600多人，孙兼任军校总理，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苏联派出多名军官作顾问，并安排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军校就读或任教。6月16日，孙在黄埔军校开学礼演说称：“中国革命迟迟不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真正革命武装队伍。为了早日完成革命的使命，我们才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使革命与民众力量相结合，这就是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主旨。”军校参照苏联红军制度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之方针，学生除学习军事外，还要学习革命理论，以提高政治觉悟。

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孙试图重新发动北伐。9月18日，孙发表《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原夫反革命之发生，实继承专制时代之思想，对内牺牲民众之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保持其过去时代之地位。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续不绝，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始终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恶势力，以北京为巢窟，而流毒于各省。……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

中国国民党内部出现批评、抗议，孙科辞去广州市长，廖仲恺放弃广东省省长，蒋介石也拒绝让黄埔师生参加北伐，只派一连兵到韶关保卫孙。9月4日，孙在广州组建北伐讨贼军，以谭延恺为总司令，联合卢永祥、张作霖、段祺瑞，“共抗直系”，准备北伐。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指示于右任、焦易堂、徐谦等秘密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系，对其做争取工

作。孙送给冯玉祥6,000本《三民主义》、1,000本《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冯玉祥将这些书发给其官兵阅读学习。10月下旬直系第三军军长冯玉祥，率军自长城前线回师占领北京，软禁总统曹锟，冯玉祥部和胡景翼、孙岳部组成国民军。10月9日，孙写信给蒋："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所长，则两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则必两无所成。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故当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带水以敷衍也。此覆。再：明日果有罢市之事，则必当火速将黄埔所有械弹运韶，再图办法。如无罢市，则先运我货前来，商械当必照所定条件分交各户可也。若兄烦于保管，可运至兵工厂或河南行营暂存俱可。即候毅安 孙中山十月九日"。10月10日，广州发生商团事变。孙于10月12日决定镇压商团，同时又决定不返回广州。10月14日，孙从韶关调兵遣将："令警卫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飞机队、甲车队、兵工厂卫队、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学生，统归蒋司令指挥"。10月15日，孙回师广州击溃商团武装。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0月30日，孙因而舍弃在韶关建立之总部，返回广州。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分别致电孙，请他北上共商国是。11月3日，孙〈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批评黄埔军校学生抗议者缺乏纪律，"殊不知革命的目的"。11月4日，为孙举行饯行大会。11月，孙应邀北上讨论国是，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等作斗争。孙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和平统一，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实行民治。11月

17日，孙自北京抵达上海，与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见各界欢迎代表。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宣称“外崇国信”，承认一切不平条约继续有效。11月24日，孙与宋庆龄抵达日本神户。针对孙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段祺瑞宣布召开善后会议，只限各省首领、各省区长官、有功勋及特殊资望者，不包括人民代表。11月25日，孙在神户与前来拜访之头山满长谈。11月28日，在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12月4日，孙抵天津，受到盛大欢迎，因劳累并受风寒，身体感觉不适。年底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恽代英等也担任要职。12月31日，孙扶病至北京，发表《入京宣言》，及对欢迎民众之书面谈话。然后孙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治疗。1925年1月，孙坚持速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段祺瑞却主张召开善后会议。

逝世

1925年1月1日，孙抵达北京后病情发作，入协和医院住院治疗。1月26日，协和医院进行手术，证实孙罹患肝癌末期。张学良说孙病重时，在天津见过一回，他对唐德刚说：“他的病，你知道怎么来的？他就是因为见我父亲以后病的，冷的。他本来有病，见我父亲的天很冷，大概在屋子里很热，感冒了；他病发了。”孙对张学良说：“现在国家的责任就在你们这些年轻人身上，而且，尤其是你们东北的年轻人，介乎这日、俄两大之间，你们很难应付。”
1925年2月，善后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共两党均激烈反对，4月善后会议结束，一无所成。2月18日孙自协和医院出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在内忧外患中，孙扶病入京，苦无成果，终于病情恶化。孙改以中医治疗，先后经由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共同诊视。1925年2月26日，停止服用中药，改回用西医治疗。此期间汤尔和与汪精卫对中西医治疗爆发争论，汤尔和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对中医治疗加以指责。孙在顾维钧家里签署《国事遗嘱》。3月11日，孙在遗嘱上签

名，稍休后说几句话勉励各同志："……生死本不足念，但所抱定的主义，还没有完全实现，总是遗憾。希望你们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成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我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孙呼吸愈来愈困难，精神疲倦，在重复说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医生因病人说话太多，就请孙入睡。3月11日晚上6时半，孙手脚变冷，已不能再出声说话，医生说：已没有脉搏，请大家注意逝世时间；第二天上午3时，孙又醒来一次。3月12日9时30分，孙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同日12时30分，孙遗体移至协和医院进行防腐。

孙临终前一日希望办基督教仪式葬礼，时值非基督教运动高涨。他嘱咐国民党各领袖，勿因宋庆龄的基督徒身份而歧视她。众人在商议仪式时产生极大争议，有人认为革命领袖不应受宗教利用。宋庆龄和孙科不顾中国国民党人之强烈反对，坚持在北京协和医院用基督教仪式为孙举行私人丧礼之后，才让中国国民党中央在北京举行公开丧礼。汪精卫调解，尊重孙中山遗愿。孙的确实死因，外界普遍认为是肝癌，近年根据协和医院存档的病理检查报告，认为孙原发胆囊癌，癌细胞转移到肝脏并救治无效。3月13日，《南华早报》在社论中说："他（孙）属于人类极为少数的几个人，他们为了一个理念，敢于挑战几乎一切。当最后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是属于天国的人。"3月15日大殓，3月19日移灵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供各界瞻仰致敬。沿路护送民众有12万人，3月20日开吊，民众前去吊祭更有几十万人。4月2日出殡，由中央公园出发到北京西郊三十里之香山碧云寺；还有30万民众把马路填塞满满，直到北京西直门；还有2万多人步行直跟到香山碧云寺。孙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

遗嘱

1925年3月11日，孙签字于汪精卫执笔的《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上。据《家事遗嘱》原件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

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孙中山三月十一日补签。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笔记者汪精卫。证明者宋子文 邹鲁 邵元冲 孔祥熙 吴敬恒 何香凝 孙科 戴季陶 戴恩赛。”孙弥留之际提到国事的遗言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5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接受先生遗嘱。

挽联
孙先生逝世后，多人致赠哀悼孙先生挽联： 宋哲元：“开中国新纪元，其事千古，其名千古；与卢梭相辉映，泰东一人，泰西一人。” 蔡元培：“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于右任：“综四十年胼手胝足之工，直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历程中揖让征诛，举同尘土；流九万里志士劳民之泪，始知其来也有因，其生也有自，瞑目后精神肝胆，犹照人寰。” 杨度：“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邵力子：“举世崇拜，举世仇恨，看清崇拜或仇恨是些什么人，愈见先生伟大；毕生革命，毕生治学，倘把革命与治学分成两件事，便非吾党精神” 陈炯明：“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义，全凭一寸赤心知” 北京大学台湾同学会：“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 熊克武：“与民国性命相依，讨贼成功身速死；失吾党创造先觉，枕戈待旦泪频挥”

遗体
孙生前曾说，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领袖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他病故的第二天，国民党便与苏联政府联系，希望帮助为孙中山作遗体防腐处理和订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但那时苏联人认为，列宁是不可比拟的领袖人物，其他人不可能再享受这种殊荣。因此未能提供

防腐技术，但同意提供水晶棺。当时苏联政府赠送的水晶棺，现保存在北京碧云寺的中山纪念堂，供人瞻仰。孙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馆。苏联用火车运来的水晶棺到北京后，发现孙遗体因初期防腐技术处理不好，遗体皮肤开始变黑，已不能长期保存生前的状态，使用水晶棺已无意义。同时专家认为苏联的水晶棺仅适用于气候寒冷干燥的北方，在炎热潮湿的中国南方，遗体最多只能保存20年，所以最终未能使用水晶棺。孙的遗体最早安置在北京碧云寺内。四年后，南京的陵墓完工。

1929年6月1日，孙遗体从北京迁葬南京中山陵。中山陵的墓室室内是一座半球形，中央是直径约4.3米的大理石坑，深1.6米，大理石坑四周围着一圈精致的白色大理石栏杆。石坑的正中棺椁上安放着就是孙中山身着中山装的汉白玉卧像，卧像与其真人比例大小一样，由捷克雕塑家高畦雕刻。

思想与信仰

三民主义

孙中山手迹；“天下为公”是他重要的政治理念之一。

孙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将中国道统和西洋欧美各家学说综合整理而来，但是也有少部分见解是其所独创。

三民主义

孙论“三民主义”信仰。

“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何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因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政经军哲

“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广兴福利，大有为式的“万能政府”。

人民之权又称为政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

政府之能又称为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曾说“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甲午战争以前，孙之政治主张类似洋务派，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革新。失败后，认识到扶清抗洋行不通。只有改革制度，才能成功救中国，于是走上革命道路。

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人生哲学：“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孙中山认为，项羽失败最简单原因，就是项羽专靠武力，刘邦入关之后，便约法三章，事事总是宽宏大量，以得民心为主。

在哲学上，提出“知难行易”说，批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保守思想。

天下为公。

孙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

高风亮节，亲笔写下“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孙是模范爱国者、世界主义之现代化推动者；孙之备受推崇，原因是诉诸外国资本之大型经济发展计划之倡导者。

宗教

孙出生在一个信奉中国传统宗教的家庭，主要信仰是佛教、道教，幼名“帝象”，“帝”字乃亲人为其请求“北帝”（真武玄天上帝）神护佑之意。后来孙就读西方教会学校，14岁时在夏威夷读书曾接触基督教西方传教士，逐渐接受基督教，并且因为信仰缘故不惜放弃在檀香山学习。在香港拔萃书室开始信奉基督，并于1884年间（并非如一些史料所说之1883年）与陆皓东先后在美国公理会香港纲纪慎会堂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

孙晚年指出宗教“迷信”的弊端，1923年的公开演讲中说“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因为“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研究屡次不错，始认定为知识。”，孙说：“就人类的来源讲，基督教说世界人类是上帝六日造成的。近来科学中的进化论家说，人类是由极单简的动物，慢慢变成复杂的动物，以至于猩猩，更进而成人”。“依进化的道理推测起来，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既成人形，当从人形更进化而人于神圣。是故欲造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还有人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步到了极点。”
在政治上，主张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宫崎滔天所著《孙逸仙传》记载了孙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的回顾：“余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余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余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
1924年，时值全国非基督教运动高涨，孙也曾在《九七国耻纪念宣言》中，抨击西方“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有人从其言论中提出孙信基督教或不信基督教的各种说法。

其最后一任妻子宋庆龄1966年对爱泼斯坦写信说："孙中山明确地告诉我，他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受了误导"）"，宋庆龄还指"孙中山要求举办基督仪式葬礼"为谣言。宋庆龄认为，孙"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教义和他自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来说，社会革命就是把基督教义付诸实施。"

然而其元配夫人说:"孙中山过身前一日云:'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 且孙脱险后写信曰︰

"弟被诱擒于伦敦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船已赁运，惟候机宜，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为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惟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

孙论宗教和民族的关系：

"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拉伯和犹太两国，已经亡许久，但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至今还是存在。他们国家虽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就是因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犹太人，散在各国的极多，世界上极有名的学问家，像马克斯、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在像现在英美各国的资本势力，也是被犹太人操纵。犹太民族的天资是很聪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虽流离迁徙于各国，犹能维持其民族于长久。阿拉伯人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也是因为他们有穆罕默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误，事实上是印度教）极深的民族，像印度，国家虽然亡到英国，种族还是永远不能消灭。"

家庭

父：孙达成

兄：孙眉

妻：

元配妻子：卢慕贞（1867年7月30日－1952年9月7日），1885年结婚，1915年离婚。1907年孙眉破产，被迫举家迁往香港九龙牛池湾耕种，母亲杨太夫人、卢慕贞及两女儿同行，留下孙科一人在檀岛继续求学。1910年7月19日，孙母杨太夫人在香港九龙病逝；事后卢慕贞偕同两女儿赴槟榔屿与孙团聚，同年12月孙即被驱逐出境再次赴欧洲。育有一子二女。1915年9月1日，卢慕贞同意离婚："孙先生为革命奔走海外，到处流浪，身心为之交瘁，既然现有人愿意照料他的生活，我愿意成全其美，与先生离婚。"离婚后到澳门蛰居，1952年9月7日在澳门逝世，享年86岁。

长子：孙科（1891年10月20日—1973年9月20日）

长孙：孙治平（1913年11月15日－2005年4月6日）

曾孙：孙国雄（孙治平与谢秀琳之子）

玄孙：孙伟仁

次孙：孙治强（1915年1月27日－2001年7月4日）

曾孙：孙国元（孙治强与林伦可之子）

曾孙：孙国升（孙治强与林伦可之子）

曾孙：孙嘉琳（孙治强与刘肇云之女）

曾孙：孙国瑜（孙治强与刘肇云之女）

长孙女：孙穗英（1922年1月16日生）

次孙女：孙穗华（1925年3月18日生）

庶孙女：孙穗芳（孙科私生女，1935年3月19日生）

庶孙女：孙穗芬（孙科私生女，1938年8月6日－2011年1月29日）

长女：孙娫（1894年3月31日—1913年3月25日）

次女：孙婉（1896年11月12日—1979年6月3日）

外孙：王弘之（孙婉与王伯秋之子）

外孙：戴永丰（孙婉与戴恩赛之子）

外孙女：王蕙（孙婉与王伯秋之女）
外孙女：戴成功（孙婉与戴恩赛之女）
侧室：陈粹芬（1873年－1960年），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香港屯门区，原名香菱，又名瑞芬，贫，父母早亡，1891年认识孙。为孙革命时的伴侣。二人在屯门青山红楼租屋同居，曾与卢慕贞和孙科同在广州一地。孙与陈未有过正式婚礼。1905年孙接陈粹芬前往日本横滨居住。1907年3月4日，孙应日本政府要求，自行离去，带着陈粹芬往南洋；继而赴安南河内。“镇南关之役”随军到前线作战。12月3日，孙亲赴率黄兴、胡汉民、池亨吉等赴镇南关，陈粹芬送行。“时总理行馆偶乏仆役，各同志内衣咸由总理亲属陈四姑亲自洗涤。”孙之兄长孙眉和孙之原配卢氏皆视陈为孙之妾。1911年离开孙，回到香港，与卢慕贞以姊妹相称，孙家将陈以妾之身份收入族谱；1915年到南洋隐居马来半岛，领养一女婴孙容，后改为苏仲英（后为孙中山侄孙孙治干夫人），后回香港居住，1960年10月21日逝世。陈说过：“我跟中山反清，建立中华民国，我的救国救民愿望已经达到。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并非中山弃我，他待我不薄，也不负我”；1925年3月12日孙逝世，陈又说：“我虽然与中山分离，但心还是相通的，他在北京病危期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他在空中飞翔”。陈身故后亦下葬于孙家之家族墓园之内。
继室：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1981年5月29日），祖籍海南省文昌市（原广东省文昌县）,无子女。1915年10月7日，孙派朱卓文从东京启程赴上海去见宋庆龄，出示孙电文及孙与卢慕贞之协议离婚书。10月25日孙与其在日本东京结婚，向同志声言：“我爱我国，我爱我妻。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所支配。”宋从父亲与孙之交谈中，“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阴谋推翻它。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因为他们被其狡猾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阴险毒辣的宣传所欺骗。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孙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
日本籍妻子：大月薰（1887年9月16日－1970年），1902年同居，1904年7

月在横滨浅间神社结婚。1905年8月，大月熏怀上孙之孩子。日本共同社报道，孙和此少女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宫川富美子；女儿出生后，孙离开日本，就再没有相见，据说仍有书信往来。先后嫁给静冈银行总裁弟弟三轮秀司及栃木县足利市东光寺住持实方元心，1929年诞下儿子实方元信。
女：宫川富美子（1906年5月12日－1990年5月6日），1911年往横滨宫川梅吉家当养女，1956年大月薰对女儿说："富美的读音就是汉字的文（日语"富美"发音与"文"字训读相同），取名富美子，就是表明你是孙中山的女儿。"
外孙：宫川东一（1928年4月7日－）
外孙：宫川弘（1934年5月28日－）
曾孙：宫川祥子（1969年生）
妾：浅田春（1882年－1902年），孙日本妾侍。1897年8月16日，孙到达日本横滨，横滨华侨温炳臣接待，女仆浅田春照顾孙；日本警察用她配合监视孙，她向孙道明原委后，约1901年以患病为由回到静冈老家，与孙失去联系。

纪念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赞扬孙"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或"中国国父"。

中华民国接收台湾后，台湾各地也常见为了纪念孙"中山路"、"中山公园"、"中山堂"等名称的街道或纪念建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为纪念孙百年冥诞命而名为"中山博物院"，亦于高雄市西子湾复校国立中山大学。
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依然尊孙中山为国父，并于主要公家机关及各级学校悬挂其遗像。台湾民主化后，已无硬性规定，但不少的地方及公园仍有其铜像。

中华民国现今通行的新台币，拾圆、伍拾圆硬币及壹佰圆纸钞铸印有孙中山的肖像，中央银行亦会发行孙中山纪念币。

由于孙晚年对中国共产党采取联合政策，以及在他过世之后、其遗孀宋庆龄更是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支持，故孙亦为自1949年之后、在中国主流舆论中仍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先常见街道名称“中正路”大多被改，而“中山路”和“中山公园”等常见名称却多保留至今。现今中国共产党官方对孙评价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1989年1月26日，中国于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建立中国南极中山站，该站是中国的第二个南极科学考察站。站中设有“孙中山先生纪念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前悬挂的就是孙中山的巨幅画像，自1950年起，天安门广场逢劳动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孙中山的巨幅画像被树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前方，或一并出现在国庆游行队伍中。
中国共产党称孙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在孙140周年诞辰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指出，在孙组织领导和革命精神感召下，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结束在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孙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历史性功劳，复兴中华民族，并盛赞他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著作

孙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国父全集》等。
书籍：《三民主义》（1924年十六讲版）、《革命方略》、《五权宪法》、《中国革命史》（1923年）、《中国存亡问题》（1917年）、《建

国大纲》、《建国方略》、《民权初步》（1917年）、《孙中山学说》（1919年）（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一）、《实业计划》（1920年）（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

论文：〈中国法制改革〉(1897年)、〈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1912年）、〈三民主义〉（1919年文言论文版）、〈八年十月十日〉、〈中国问题真解决〉、〈支那保全割和论〉、〈中国第二步〉、〈农功〉、〈我的回忆〉、〈自传〉、〈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中国之现状与未来〉、〈驳保皇报〉、〈民报发刊词〉、〈论据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平时开口便错〉、〈对外宣言搞〉、〈钱币革命〉、〈平白的话〉、〈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内政方针〉、〈发扬民治说帖〉（1923年）。

其他：《伦敦蒙难记》（1912年2月）、《赤十字会急救第一法》（译著）最早出版的孙集录有胡汉民所编的《总理全集》、黄季陆所编的《总理全集》、1958年国防研究院编的《国父全书》、与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50年编的《总理全集》12册（后正名“国父全集”并由于右任题字），后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将孙著作、宣言、演说、电文……等加以整理并由蒋介石题“国父全集”四字，最早于1965年国父百年诞辰出版《国父全集》三册，后于1973年再次以前一版为基础补充近二分之一出版《国父全集》6册，1985年出版《国父全集》补遗，1988年由秦孝仪为首组织“国父全集编辑委员会”将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现存资料、中国大陆的《孙中山全集》与公私立机关经考证为孙中山思想的资料，以1973年出版《国父全集》和1985年出版《国父全集》补遗为基础全数整理编列为《国父全集》十二册，并于1989年11月24日由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大陆则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由中华书局于1981年到1986年分别发行的《孙中山全集》，全十一册。而从2009年开始，由中国大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尚明轩主编，并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2015年由人民

出版社以16卷本的新编撰《孙中山全集》问世。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孙中山一生的反思

功绩

在两千多年的、自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孙中山有着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因为，正是在他的努力推动之下，中国结束了秦始皇以来的封建帝王的王朝历史。至少，从此在名义上，专制主义王朝这个概念成了一个在亿万中国人心中的贬义词。在千古以来的中国里，孙中山成为了打破专制主义封建王朝的第一人。从此以后，亿万主流中国人都认识到，民主共和的社会制度是好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那些少数君王贵族的天下。天下为公。

孙中山的成功过程，绝非是简单的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数十年中，在他的一生的生命中，不断地、艰苦地、百折不回地奋斗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败、挫折、背叛、甚至生命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显明了他的惊人的韧性、魄力、斗志、持之以恒、愈挫愈勇的伟大品格。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在失败中气馁，也没有被腐朽的社会环境和潮流所裹挟，而是一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谦卑、真诚、清廉、正直的品性。

贡献

孙中山被中华民国政府称为“国父”。的确如此；虽然，孙中山从未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中、在全中国疆域范围内、成为一个掌握实权的真正总统【自从满清政府灭亡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事实上的军阀割据、一盘散沙的状态；直到蒋介石政府完成了全国统一以后，这种局面才彻底改变】，但

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化主义的、没有君主的中国政治体系，正是在孙中山的努力奋斗与缔造之下才得以产生。他是当之无愧的、现代化中国的“国父”。而且，满清王朝的覆灭，并没有在全中国范围内导致大规模生灵涂炭的战争；这也是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过程中绝无仅有的。中国历史中，自从秦朝以后的所有朝代，大约平均每两三百年，当新的朝代挑战、更新旧的朝代的时候，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与人口灭杀；三分之一的人口甚至更多，就会死于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灾祸中。可是，辛亥革命的过程，却是一个整体上非常和平的过程。这与孙中山本人的无私精神、正直与正义的精神，有着莫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孙中山愿意与清廷的袁世凯妥协、甚至让出自己的大总统职位，才使得清廷在未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肯主动地退位、结束满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十余年中，又发生了很多类似于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等等丑恶政治事件；这些事件都是由于许多中国军阀政客的政治野心、私心、内心的罪恶无耻，所导致的。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一直坚韧地推动着所谓“护法运动”【即，反对专制独裁，保护国家的宪政、宪法机制，促使总统等国家领导人遵守宪法架构，尊重国会立法机构和机制，促使政治统治体系处于法治合约的机制之下】。孙中山的一生中，都一直主张“天下为公”，而不是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主义理念。孙中山是真诚、诚实的，因为他是这样宣称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孙中山一生的努力、奋斗、政治斗争，都真的是为了国家民族，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与利益。这一点，正是他与后来的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等许许多多中国领导人在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也正是他的人格魅力伟大之处。他为后来的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中国领导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几乎无法逾越的道德榜样。

榜样

孙中山是一名年轻时就受洗的基督徒。他在年轻的时候，曾在基督信仰方面，表现出非常敬虔、真诚的态度。但是，当他年岁长大以后、尤其是在他深度涉入政治斗争、革命、起义、以及1911年后的更为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局面以后，我们看见，他不再在言语行为中、常表现出他对于耶稣基督的真诚信仰与信靠。我们不知道他的内心真实光景究竟如何【只有那全知全能、无限智慧圣洁公义的上帝，才能够审判世人；因为他是鉴察世人内心的神；他也必将审判每一个世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我们看见，在政治斗争与革命过程中，他开始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甚至为了达到目的而常常不择手段——哪怕是用撒谎、诡计、等等罪恶的方式和手段。我们看见，为了得到美国护照、以便于他的国际旅行更为方便，他甚至愿意为了自己的出生证明而编造谎言、作虚假宣誓、撒谎、签署虚假法律文件、等等。

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若人凭着自己的意思行事，那么，我们就能够看见，每一个世人在内心深处都是背离、悖逆那公义圣洁之上帝的。

在孙中山的晚年、尤其是去世之前，他说道："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

虽然，我们在孙中山后半生中的许多言论中，看到他在关于基督教信仰方面的许多错误认识、言论、想法，但是，我们期望相信，他那起初的信心没有失去；在他的内心中，仍然是一个谦卑地承认自己为罪人的、愿意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真诚基督徒【尽管，我们知道，那终极审判

的权柄，必在那无限全能、全知、公义、圣洁的主的手中】。

事实上，正是孙中山的这种自从年轻时代就有的基督徒信仰，才使得他的后半生与中国许多的政客军阀都不一样。虽然，他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妥协、让步、不得不进行许多算计、做许多谬误之事，但是，当我们把他与袁世凯、段祺瑞、陈炯明、汪精卫、以及后来的蒋介石【蒋介石虽然也是一名基督徒，但他是在年岁长大以后、在与宋美龄正式结婚之后，才正式受洗成为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虽然，我们绝非是要论断说，蒋介石肯定是一个虚假、或虚伪的基督徒，但是，明显的是，他与孙中山的个人品格在很多方面不同，有着不同的优缺点；对此，我们将会在本书后文中进一步讲述】、乃至更后来的那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们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在孙中山的身上，无可置疑地，鲜明地看见少有的执著、无私、真挚、正直、正义等等美好的品格特点【当然，孙中山的身上也有着很多不可否认的缺点与谬误】。孙中山的那些优点，正是与孙中山的基督徒信仰有着深切的关系；而孙中山的那些缺点与谬误，则正是与孙中山远离基督徒信仰的表现有着深切的关系。

【引述 圣经 为首的就应当做众人的仆人；天下为公】

选自马太福音20章

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儿子前来见耶稣。她跪在耶稣面前求他。

耶稣问她："你想要什么？"她说："求你下令，使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耶稣回答："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

他对他们说："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我父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

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就向他们兄弟二人生气。

耶稣把他们叫过来，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

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要作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作你们的奴仆。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许多人的赎价。"

民望

虽然孙中山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从世俗政治角度而言，他有着瑕不掩瑜的伟大正直品格。他所成就的伟大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他是现代化中国之父。正是由于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高尚品格，因此，孙中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在1910年代以后的中国人心中，有着极其崇高的威望。自从1949年以后，直至今天的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孙中山先生是台海两岸唯一的受到全民尊崇的近现代伟大政治人物。当1925年孙中山与世长辞的时候，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全中国人民都为此而陷入巨大悲痛之中。孙中山的一生，在中国历史的积极进步意义上，永久性地刻下了浓重的一笔，为中国人民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信仰与人生

在孙中山后半生中关于基督徒信仰的一些言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要的错误、缺陷、谬误。总的来说，在孙中山的心中，民族主义如此重要，以至于他甚至想要把宗教信仰用来当作工具【或者，当他觉得宗教信仰不能为民族主义服务、或是与民族主义矛盾的时候，他就想要贬低宗教信仰】；而且，他试图把所谓的科学主义置于上帝的启示之上、置于人所应当有的对于造物主的信仰之上；【在孙中山的时代，人们或许还没有认识到达尔文主义的深刻缺陷，以及科学与信仰之间的深刻关系；事实上，正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中，才能诞生出现代科学思想方法体系；——这个宇宙的最不可思议之处，就是在于它是可以思议的；换言之，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理逻辑规律，正是因为，它是出于那样一位无限智慧大能之上帝的创造；并且，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无所不及的管理与全能的权柄之下；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

圣经告诉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子民，第一，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上帝，第二，并要爱人如己。人与人之间的爱、正义、公平、公义，只有首先建基于人对于上帝之爱的基础上。若人的心中离弃了敬虔真挚的信仰，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纯粹的厉害关系、利用关系，而不可能有真诚的公义圣洁之爱。

【引述 圣经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弥迦书6章

你们当听耶和华所说的话：“你要起来，向大山争辩，让小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

大山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争辩。大地永久的根基啊！你们要听，因为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争辩，和以色列争论。

我的子民啊，我向你作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叫你厌烦呢？你可以回答我。

我曾经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把你从为奴之家赎出来；我也差派了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

我的民哪！你们要追念，摩押王巴勒图谋过什么，比珥的儿子巴兰又答应了他什么，以及你们从什亭到吉甲所发生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的 神面前叩拜，当献上什么呢？我朝见他的时候，当献上燔祭，当献上一岁的牛犊吗？

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为我的过犯，我可以献上我的长子吗？为我的罪恶，献上我亲生的孩子吗？

世人哪！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 神同行。

听啊！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敬畏你的名就是智慧；支派和城里的会众啊！你们要听。

我怎能忘记恶人家中的不义之财，和那些可咒诅的小升斗呢？

用不义的天平，和袋中诈骗的法码的人，我怎能算他为清洁呢？

城里的财主充满了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假话；他们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

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生病，因你的罪恶，使你荒凉。

你要吃，却吃不饱；因你的腹中常有疾病。你要怀孕，却不能生下来；你生下来的，我都要交给刀剑。

你要撒种，却不得收割，你要榨橄榄油，却不得油抹身；你要榨葡萄汁，却不得酒喝。

你跟随了暗利的规例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了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你”原文作“她”）的居民被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

。。。。

原配夫人

（引述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A7%E6%85%95%E8%B2%9E

卢慕贞（1867年7月30日－1952年9月7日），广东香山外堂村人，孙中山元配夫人。

生平

卢慕贞出生于累世积善的书香门第之家，父亲卢耀显曾至美国檀香山经商致富。卢慕贞与一般传统中国女性一样裹小脚，自小勤快、擅女红，以孝敬长辈而闻名乡里，其与孙中山的婚事亦属媒妁之言。1885年5月26日，卢慕贞18岁时，与孙中山在翠亨村结婚，并诞下三名子女—孙科、孙娫及孙婉。由于孙中山需为革命到处奔波，两人共处时间很少。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1912年2月15日，卢慕贞携两女孙娫、孙婉、侄女孙顺霞搭乘英国〝亚舍号〞邮船自南洋槟榔屿到上海，受到沪军都督陈其美等人的热烈欢迎，被誉为〝中华民国国母〞，下榻沧州别墅。2月20日，卢慕贞母女在邓泽如和孙科的护送下抵达南京，与孙中山团聚。

卢慕贞并无受过西方先进教育，在思想上与孙中山有很大的距离。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遭袁世凯之北洋政府通缉逃亡日本，翌年（ 1914年 ）孙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讨袁，遭黄兴等党内人士反对，一时之间失去了革命意识的团结力量；在孙的低潮期，英文秘书宋霭龄也要回国结婚而辞去秘书之职，而宋霭龄的父亲宋嘉澍牧师，是向来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友人，又从上海派自己另一位21岁女儿宋庆龄来日本担任孙的英文秘

书，与孙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两人相约成婚；宋庆龄回上海与父母谈及与孙的婚事，不料宋嘉澍夫妇以两人年龄差距太大（ 相差27岁 ）而极力反对，扬言女儿若与孙成婚，将断绝父女关系与孙的朋友关系，并且从此不再支持孙的革命事业。宋庆龄迫于无奈以及与孙的无悔爱情，遂决定连夜私奔返回日本，自行与孙结婚。

卢慕贞无心当第一夫人，亦感未能辅助孙中山主理国事。在宋庆龄婚事问题上，尽管她接受丈夫纳妾，但这样与革命理念中的一夫一妻制相悖，孙受到不少压力。加以宋家为基督徒，不可能接受此种做法。孙于是决定跟无感情基础的卢慕贞离婚。1915年4月14日，卢慕贞于美国夏威夷成为基督徒。9月，孙派人接卢慕贞到日本商谈离婚事宜，双方离婚协定后，卢慕贞回到澳门。同年10月25日下午，49岁的孙中山与22岁的宋庆龄在梅屋庄吉家举行婚礼。

卢慕贞晚年定居于澳门文第士街一号(现在是澳门国父纪念馆)，信仰虔诚，热心帮助贫困。1933年，被澳门浸信教会按立为该会第一任会佐。

她因血压高转为糖尿病，治疗时突患上流感，高烧不退昏迷，1952年9月7日凌晨1时35分于家中逝世，安葬于澳门旧西洋坟场，后于1973年迁葬于氹仔孝思永远墓园。2005年，再迁葬于中山市。

。。。。

宋庆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BA%86%E9%BE%84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1981年5月29日），尊称宋先生，曾用名宋庆林、宋庆琳，罗马拼音Soong Ching-ling，曾用英文名Rosamond，广东省文昌县（现属海南省文昌市）人，成长于上海及美国，20世纪中国政治人

物、社会活动家，是中国革命家、中国国民党总理及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在中国的第二任正式妻子。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曾经担任国家副主席和代理国家主席，1981年获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在国共内战时期，她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的政策，反对中国国民党〝清党〞。抗战爆发后，宋庆龄通电支持国共合作，并和宋家姐妹以〝团结合作〞的面貌示人，并筹建中国福利会，积极投身社会福利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职务，并曾两次代理国家元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国家元首，亦位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列。1981年5月，她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国家名誉主席称号，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这一荣誉称号的人士。同月末，她因病于北京逝世。

荣衔
孙中山去世后，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孙中山先生尊称为国父，以表尊崇〞。因而共产党人士尊称其遗孀宋庆龄为〝中华民国国母〞。而在国府退往台湾后，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并未对中华民国国母有正式定论，台湾民间则另有其他的〝国母〞说法，如其妹宋美龄因抗日时期赴美演说作出贡献或者孙中山原配卢慕贞等皆曾被民间人士誉为〝中华民国国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宋庆龄曾经代理国家元首的职务，1981年5月，在她弥留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为至今唯一拥有〝国家名誉主席〞称号的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宋庆龄被中共尊称为〝（宋）庆龄先生〞、〝孙夫人〞；被总理周恩来誉为〝国之瑰宝〞（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正式题字；有同名纪录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评价为〝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虽然部分官方媒体和民间部分人士称宋庆龄为〝国母〞，但实际上，宋庆龄虽然获得了以上众多尊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从未授予她〝国母〞的称号。现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皆不使用〝国父〞、〝国母〞等词。

生平

早年生涯

宋庆龄籍贯广东省文昌县（现属海南省文昌市）。宋庆龄出生于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93年1月27日）。关于出生地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东有恒路628号C（今东余杭路530号）；另一种观点认为出生在川沙厅城。父亲是监理会传教士及富商宋嘉澍，母亲倪桂珍。宋庆龄洋名是Rosamond。7岁时，她入读上海中西女塾。

宋庆龄在上海中西女塾（今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后，1907年14岁时赴美国留学。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外语，其后考入历史悠久、位于乔治亚州的卫斯理安学院获得文学系学士学位。就学期间，曾先后在校刊发表《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之影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等文。1913年6月毕业，8月29日到达日本横滨。8月30日到达东京。1914年底与父母回上海。

结婚与婚后生活

1915年10月，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

1914年，在日本接替大姐宋霭龄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与孙相恋。虽然孙是宋家20年的朋友，宋庆龄和孙的婚事遭到其父宋嘉澍等人极力反对，因为孙比她年长27岁，已婚有一个妻子卢慕贞，还有一儿两女。只有当时还在美国读书的宋美龄对二姐表示支持。宋庆龄被软禁在上海家中，从窗口逃出后，奔赴日本。孙中山离婚后，两人于1915年10月25日在东京结婚，宋嘉澍赶到日本，但未能及时阻止婚礼。

婚后，继续担任秘书工作。二人在1916年5月结束流亡后，由日本回上海。并于1917年7月离沪赴穗，南下参加护法运动。1918年8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宋庆龄随孙中山由广州回到上海，协助其著书立说，总结经验。

并代其起草电文，处理公务。
1920年11月，粤军攻克广州，宋随孙中山离沪赴穗，再次组织护法军政府。并于1921年夏，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任会长，并亲临广西梧州前线慰问战士。12月，为支持北伐，又率红十字会员抵桂林。1922年5月，她偕红十字会会员多人，随孙中山从广州到韶关督师。6月，陈炯明叛变事件中，宋庆龄坚持让孙中山先走，称"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宋庆龄在逃亡过程中不幸流产，后终身未再有孕。同月，离穗返沪，用英文写出《广州脱险》一文。
1922年8月，她陪同孙中山与李大钊会晤、参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越飞的会谈，这次会谈确立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2月，随孙中山离沪赴穗，重建大元帅府。
1924年11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由广州赴北京，经上海取道日本北上，与冯玉祥举行会谈。次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2月，由沪赴穗。
孙中山病故后，宋庆龄于1926年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先期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紧急召开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临时的领导核心五人委员会，包括宋庆龄、陈友仁、蒋作宾、吴玉章和鲍罗廷，左派控制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1927年1月3日，示威工人占领汉口英租界后，宋庆龄说服陈友仁和鲍罗廷，武汉国民政府迅速收回汉口英租界，而让法租界和日租界暂时保持原状。4月，当时中国国民党中，蒋介石一系的南京阵营在上海发动"清党"。在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宋庆龄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坚持"联俄容共"的政策，反对"清党"，并坚决反对其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7月份，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声称"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走上歧途"，从此与蒋介石一系决裂，7月15日，汪精卫也发动"清党"，8月份，宋庆龄和陈友仁赴苏联莫斯科，以后又旅居欧洲多年。
1928年3月，离开苏联前往德国柏林。1929年5月，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的国葬仪式。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1931年8月因母亲去世，宋庆龄回到上海。
早于1933年5月初，宋庆龄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发展秘密加入共产国际。据廖承志回忆，宋庆龄曾代表共产国际与他秘密接头，调查叛徒名单，并且说〝尽管过了将近五十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共产国际代表评价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
抗战时期
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爆发，宋庆龄到真如、吴淞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将士。同月，与杨杏佛、何香凝等创办〝国民伤兵医院〞，亲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7月，组成〝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8月，被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推选为名誉主席。12月，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了大批革命者和爱国志士。
1933年年初，帮助越南的胡志明与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恢复了胡与越共的联系。2月，在上海寓所与鲁迅、蔡元培等欢迎来华访问的英国作家萧伯纳。9月，在上海组织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反战大会，发表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并被推选为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主席。
1934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上签名，呼吁发起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8月，与何香凝等千人发起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任主席。
1936年5月，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执行委员。12月，西安事变爆发，宋庆龄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7年7月，在上海寓所会见赴庐山与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人。11月，她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表明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12月，从上海赴香港。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宋庆龄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国共再次合作后，她也没有重新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宋氏三姐妹再度联合，在重庆期间，宋美龄与宋庆龄之间有一条特殊电话专

线〝2080〞。宋氏三姐妹曾多次共同出现在公众面前，以〝团结合作〞的面貌示人。

1938年3月，发表《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一文。6月，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疗救济和儿童福利工作。1939年3月，在香港的国际妇女节集会上，发表题为《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的演说。11月，发表《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

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宋庆龄就此事件通电谴责国民政府。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1945年9月，在重庆同正与蒋介石进行和平会谈的毛泽东会见。12月，离重庆回到上海。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

1946年7月，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194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加聘宋庆龄、胡毅生、刘哲、魏怀、陈其采、许崇智、陈树人、陈策、张钫、尧乐博士、迪鲁瓦、萧萱、李根源为政府顾问。4月23日，宋庆龄受聘为世界妇女公民协会名誉主席。9月，发表声明，否认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的竞选。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即将结束之际，宋庆龄留在了中国大陆，没有和宋美龄、蒋介石等一起去台湾。当年6月，中共中央委托邓颖超，带上毛泽东、周恩来之信专程至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9月，她应中共中央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宋庆龄作为国家副元首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2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简称"救总"）主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950年代，宋庆龄曾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成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出任正国级职务的女性，位列国家主要领导人，但宋庆龄在政治方面并不活跃，而主要活跃在妇幼卫生、文化教育领域。并继续筹办基金会，为世界各地妇女和儿童的福利筹集资金。

1950年4月，宋庆龄当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8月，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继续担任该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1年9月，在北京接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并将10万卢布的奖金全部献出，交给中国福利会作为创办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之用。1952年初，创办《中国建设》杂志。10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当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12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4月，被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954年9月，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成为政治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12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1月，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8月，出席纪念廖仲恺先生逝世3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12月，她以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身份访问印度。1956年1月，宋庆龄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廖承志到访缅甸和巴基斯坦。8月，又到访印度尼西亚。

1957年9月，当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1月，国家主席毛泽

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到访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
1958年6月，参加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与董必武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再次成为国家副元首，在官方报道顺序中排名第三，仅位列在党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
1961年5月，在其上海寓所会见毛泽东。9月，任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3年4月，从上海移居北京，此后定居于后海北河沿46号官邸。
1964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她与董必武两人再次当选为国家副主席。1964年2月，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部长陈毅到访锡兰，并举行大范围会谈。
10月，任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6年11月12日，在北京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讲话。同月，新华社受权发布消息：《宋庆龄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8年10月，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免职及开除出党，她与另一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代理国家主席的职务。
1972年1月，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参加原外交部长陈毅的追悼会。9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何香凝的追悼会并致悼词。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国家主席职务被正式废止，她改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
1976年1月，参加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追悼会；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宋庆龄以副委员长身份代理委员长职务，名义上成为中国国家元首，并参加朱德的追悼会；9月，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1977年9月，参加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仪式。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青指使下，上海的造反派指宋家是资产阶级，故把

宋庆龄父母的坟墓毁坏，并对宋庆龄进行迫害，令宋庆龄的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在周恩来提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一个"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主要包括高级民主人士和国务院组成部门主要领导，宋庆龄被列为点名保护的第一位。

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代委员长宋庆龄主持会议，并作开幕讲话。其后，她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当选为委员长。6月，参加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大会。9月，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并当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979年6月，宋庆龄副委员长接见美国知名妇女访华团、美国夏威夷各界访华团。10月，以国家副元首身份在北京寓所宴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

1980年1月，参加全国政协举行的元旦茶话会。3月，主持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大会并致词。同月，参加全国妇联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70周年举行的联欢会，并致祝词。5月，参加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追悼会。10月，任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1981年2月，宋庆龄的贴身仆人李燕娥去世，宋庆龄悲痛万分，为其立碑安葬于宋氏墓地。

1981年5月8日，宋庆龄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发表讲话。

1981年5月，宋庆龄因患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冠心病病危。5月15日晨，前来探望的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受中央委派，提及宋庆龄曾于1957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事，询问陷入昏迷的宋庆龄是否愿意再次申请入党，重复三遍得到宋庆龄的肯定。同来探望的彭真当即转告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下午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同时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授予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的决定》。

逝世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宋庆龄讣告暨国葬公告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在其北京寓所病逝，享年88岁。20时40分，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公告，宣布为宋庆龄举行国葬。

5月30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

"……经国览：孙夫人逝世，香港及此间谣诼纷纷四起。月前，廖承志已倩托陈香梅函报：孙夫人病危。廖得彼方最高层同意，请余赴北平。陈并告：令侃希得一覆音，余闻后置之不理。今日又据无线电报告，谓：匪方请台北人士参加丧礼，一切旅行费用由彼方承担，并参加丧礼人员座机得在平降落。再者，此间美方报导者大放厥辞，谓：此乃二方面协商之大好机会。话中有话，无非替此间解决难题也，不阐而明匪方统战用心之深邃及巧妙、恶毒，值得随时注意。《纽约时报》报导我发言人PATRICK CHUNG，谓：不知余是否会去北平。此人究竟何许人耶？难道其尚不知余五十余年之坚定立场耶？发言人其模棱两可之答复，对余个人人格丝毫无损，但对国内国外之视听，将有相当之影响也。他人不谙，以为手足之情或可改辙易帜。日本蹂躏我国土生灵，为之涂炭千百万余。今共匪为我同血同种，其任性陷害残杀我同胞，其凶狠千百倍于日虏！余一向詈诋共匪为人面兽心，试问此种貔狲可与交往耶？骨肉虽亲，大道为重，我等做人做事须对得起上帝、国家、民族，及总理主义、父亲在天之灵，其他均无论矣！母字，五月三十日。"

1981年6月1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大人五月三十日电谕，对母亲大义凛然精神至受感动！大人一贯与匪不共戴天之高尚人格，坚毅意志，不但为国人之所共仰，亦实世人之所共知，共信。匪宣布大姨病重病逝消息，目的即在制

造假象，扩大统战。曾切嘱党政方面对此务必严正慎重处理，按政府在台北之发言人为新闻局之宋楚瑜、外交部之刘达人，并无如《纽约时报》所称之PATRICK CHUNG，显见此一报导不惟决无根据，而且别有用心，除继续彻底追查外，谨先请大人释念。再，匪方于逝世消息发出后，并曾以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名义来电，内称：‵蒋经国先生，及阁家沉痛奉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于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九日廿点十八分，在北京逝世，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莫大损失，也是亲属们的莫大损失，为此我们向她的亲属表示沉痛的哀悼！′此种诡诈邪恶，自当置之不理。又半个月来，匪军在海峡方面颇有蠢蠢欲动迹象，上周并首次有军舰五艘编队通过海峡，此自不可不提高警觉，小心处理，加强防务。天时已入炎夏，又有大姨噩耗，务恳母亲千万保重！肃叩福安。儿经国跪禀，六月一日″

1981年6月3日，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6月4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上海市万国公墓（后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隆重举行宋庆龄同志骨灰安葬仪式，遵照她的遗言，骨灰安葬在她父母墓地的东侧。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以表纪念：‶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个人生活

家族

宋氏三姊妹

宋庆龄有一姊、一妹和三个弟弟。姐姐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妹妹宋美龄嫁于蒋介石，而弟弟宋子文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后宋氏姐弟各奔东西：

宋霭龄（1889年7月15日－1973年10月18日），移居美国。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1981年5月29日），留在上海，后移居北京，终

葬于上海。

宋子文（1894年12月4日－1971年4月26日），移居美国旧金山。

宋美龄（1898年3月4日－2003年10月23日），移居台湾，蒋介石去世后移居美国纽约。

宋子良（1899年－1987年5月11日），移居纽约。

宋子安（1906年－1969年2月25日），移居香港。

宗教信仰

宋庆龄青少年时期深切地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宋家宗教氛围浓厚，母亲每日举行家庭祈祷，送子女到主日学，并要求他们去教堂听道。宋庆龄童年常跟随母亲不求回报外出救济穷人，体悟基督教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博爱"。

宋庆龄婚前一直被教导不可怀疑上帝的绝对权威，与孙中山结婚后，看到了另一个"耶稣基督"。宋庆龄认为，孙中山"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教义和他自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来说，社会革命就是把基督教义付诸实施。"基督教教义中提倡的平等与博爱，成为他们进行革命的武器。随着年龄、阅历和科学文化的提高，宋庆龄愈益淡化宗教观念而强化国家、民族及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

宋庆龄从1950年代开始有否认基督教的无神论主义言论，这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有关。1966年，宋庆龄致函友人爱泼斯坦，在信中否认孙中山是虔诚的基督徒，明确表示她和孙中山俩人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宋庆龄回忆道："孙中山明确地告诉我，他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受了误导"）"。但基督教教义的部分精神深深地留存于宋庆龄心中。1978年，宋庆龄致函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坦言："在我头脑中，还残留着《圣经》的博爱思想。"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1982年8月17日）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

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

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朒（注〝朒〞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２９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１９６６年开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２，０００万人，波及遭殃者至６亿人。云南盛内蒙古等地，有７２７，０００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３４，０００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１２０００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图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叠闻：〝走后门〞之为也牲牲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

抑有思及终生为蟒螯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顺祝安谧

民国７１年８月１７日

宋美龄

宋美龄致邓颖超公开信（1984年2月16日）

颖超先生大鉴：

数年前〝四人帮〞倒垮前后，闻先生曾几遭险厄，甚至受忧受逼，将至自殉边缘，幸率无恙，论先生在共党中之党龄如此资深，尚时陷朝不保夕之境地，令人恻然不已。近阅报载，先生在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十周年纪念会中曾作一次演说，追念在我总理中山先生主持下，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兹将当时决策之来源为先生之道之。

按当时国家处境危殆，外则有世界列强企图恣意瓜分中国，加之个帝国主义籍不平等条约之各种特权，不断榨取我人力、物力、资源，以填其欲壑，国内则有大小军阀猖獗，生灵涂炭，民生雕敝。我总理深感于此，乃为中国在国际上享有平等待遇，呼吁世界助我自助，亦即是求取消束缚我

国之平等条约，但世界列强犹如聋哑，不加理会，此时仅新起之苏联政权，别具新裁，予我革命基地之广东以有限之械弹，得一箭双雕之收获，当时，苏联政权被各国歧视，地位极为孤立，其予我一臂之助，既可博得全世界受压迫众生之好感，并又可以之炫耀于列强之前，显示苏俄政权乃是由正义之政权，且在广大之中国，顺理成章，树立一将来征服世界不绝之兵源，亦即充当炮灰之资源，假此机会肆意吸收训练基地骨干分子。以贯彻由苏俄所控制之全世界苏维埃帝国蓝图之推行措施。名利双收，莫过于此。再者，当时大会所通过之"容共"政策，旨在联合国内一切反军阀反帝国主义之力量，其实，共产党之力量，证之于当时所谓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到会者仅十二人耳。其首脑人物当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董必武及毛泽东等，事实上，中国国民党乃是中国共产党之保姆。

盖若非仰赖当时国民党之掩护、育养，其便能成为后日之党耶？且如陈公博、周佛海等终亦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而摒弃之，由共产主义信徒而摇身一变竟成为后日之汉奸，此亦是共产党头儿、脑儿对主义信仰之最大讽刺。……后日之叶剑英、彭德怀、贺龙、林彪以及过去小军阀朱德，曾任广东时代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及党中宣部代部长之毛泽东等人无一不宣誓效忠国民党，而后背叛誓言，成为反国民党之一群。……此试与中外综理国家万机之政治家总拥有静穆之修养与磊落之风格相提并论，乃适成强烈对照，谅先生定必默许余言。

回忆前在重庆抗战时期，曾与大姊孔夫人数度与先生聚首交谈，征询先生对当时抗战问题及国家前途之展望，余二人均认为先生认解超群，娓娓道来，理解精透，所谈及之问题均无过于偏颇之处，实我当时女界有数人才，迄今思之，先生谈话所代表者，言皆由衷之欤？姑不究其内容真伪，犹记曾告家姐，若颖超能为国家民族效一己之力，必脱颖而出，甚至超颖而出也。又何必沉湎于被泰半理智之犹太人所不齿之德国犹太马克思理论所蛊惑耶？固然，１９２０年时代马列理论曾在俄国得手，凭籍许多因素

侥幸成功，此实于当时一般知识份子沉醉于〝时髦心理〞，令马列学说弥漫于知识阶层，大多自认为马列信徒或马列崇拜者，尤其在法国，几乎造成任何人不能诵说几句马列教条，则必目为白痴或非知识份子之风气。只要是马列教条，即不求甚解，〝囫囵吞枣 〞犹如天诏，（近日时代杂志亦有叙述法国知识份子之盲从风气）。加之，法国左派理论家沙特不时以辩证法及逻辑语汇，撰写似是而非之文学莠言惑众（近年已逐渐经阿宏驳斥其矫伪，至于体无完肤）……

洎闻先生所言，谓中国共产党人是〝言必信，行必果〞，此乃指所谓〝文化大革命〞 对同胞之信诺耶？抑指先生几遭不幸而言耶？据所闻知，大陆人民名共产党为破产党即家破人亡之谓也。故对共产党之言行，大陆稚子亦不予置信、龄近闻电大陆探亲返自由世界者云，其亲戚窃告，〝台湾人民固然反共，但更反共者，乃大陆手无武器所遭殃之人民也。〞……近三十余年来，共产党政权已早知无法再可侵蚀金马台澎之复兴基地，乃重袭统战故伎。以恶言毁谤为张本，或以蜜语骗诈为武器，企达成〝三度合作〞。

殊不知第一次我总理宽大容共，遂使原不过五十余人之共产党徒，经中国国民党繈褓鞠育后造成骚扰动乱，凡十四年。及再次容共，乃当中日战争国家存亡关头，先总裁不究既往，诚恕相待，原望其回心转意，以抵击外侮为重，岂知共党以怨报德，趁火打劫，铸成大陆的沉沦，二次惨痛，殷鉴昭昭，一而再之为已甚，其可三乎？

再者，先生以前若为国民党党员，当以同志相称，若以相对立场或友谊，亦当以周夫人或邓女士称呼，恐嫌此乃BOURGEOIS布尔乔亚阶级之称谓，然共产党惯例连名带姓相称，恕龄碍于中国人之庭训，对任何人都以礼貌相待，此中我国文化之所熏陶若，谅不已怪。先生高寿已登耄耋，当已无所恐惧，若言出肺腑，则请规劝大陆迷途诸君，〝学习中山先生之榜样〞，再次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复使大陆民众，犹如台湾同胞，享有安宁、富

裕、康乐，有希望有前途之生活，不然，则将如李自成、张邦昌及跪于杭州岳坟前之秦桧夫妇铁人，永受万世唾骂，须知今日真正之中国乃在台湾，邯郸学步，犹为晚焉，维希三思之，即此顺颂。

蒋宋美龄谨启

。。。。。。。。。。。。。。。。。。。。。。。。。。。。。。。。
。。。。。。。。。。。。。。。。。。。。。。。。。。。。。。。。
。。。。。。。。。。。。。。。。。。。。。。。。。。

关于孙中山、宋庆龄、宋美龄、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等等之思想的反思与对比；反省；诚实；良善

如果把中国的二十世纪分成两半来进行分析和深入思考的话，那么，刚好是，国民党主导时间与共产党统治时间各占大约一半。国民党人在1911年以前，在孙中山的领导和激励下，进行了英勇的、可歌可泣的伟大革命工作。在1911年至1949年期间，国民党人在中国占据着统治和主导性的地位。——虽然，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在一战与二战的国际大环境下，饱经风霜，尤其是饱受日本铁蹄之害；虽然，在国民党统治的政府架构中，存在着大量的腐朽败坏、贪污、强盗之事；但是，——中国基本上是有着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基督教会、福音传播等工作，在中国得到自由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方面，人民享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经济自由、文化自由等等。虽然历经战火纷飞，但是，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

相比之下，在1949年以后的共产党统治时期，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等，受到了全面的桎梏、压迫、甚至致命性的打击与破坏。若不是19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若不是1980年代至今的、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大力合作与协助，那么，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就会一直在所有的政经方面处于全人类发展的末端。

我们并不是说，在共产党的学说和理想中，没有好的、积极的一面。事实上，正是那种"均贫富、人人平等、消灭阶级压迫"的理想主义，使得孙中山、宋庆龄等一大批中国理想主义人士，在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共产党刚开始成立的婴儿时期，就在苏联的大力鼓吹与各种政经援助下【此时，苏联本身由于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非人道统治，而正受到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孤立；因此，它急需在世界上、诸如亚洲中国这样的地区、寻找盟国朋友来壮大自己的发展力量】，积极推动"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样的政策，并容许甚至鼓励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发展。这个阶段，直到后来孙中山逝世、蒋介石掌权、大力剿灭"共匪"之前，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在二十世纪初这样的善待共产党的过程中，我们能看见，孙中山是诚实良善的、有着一腔热忱的情感、真心地期望"平等、繁荣"临到中国。宋庆龄在早期也是真诚的；但是，我们却无法说，到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宋庆龄的态度仍是诚实的。当她亲眼目睹耳闻中国共产党的残暴统治与愚昧落后文化的时候，她的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呢？遗憾的是，我们对此已经无从知晓；因为在1949年以后，如果一个人真诚地发表任何反对意见，那么，这样的人就会遭遇极大的迫害；所以，所有的人在1949年以后，唯一的安全选择就只剩下了"大唱赞歌"。

——在1980年代的宋美龄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公开信中，正是极其痛切地指出了这一点，指出了共产党人给中国所带来的巨大的、无可辩驳的灾难与迫害。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这些看似如此动人、辉煌的精神内容，却在实践过程中、在现实世界中，会导致如此巨大的灾难、甚至于在二十世纪给全人类数以十亿计的人民带来巨大的逼迫、痛苦、患难呢？对此，我们将会在本书后文中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与讨论。在这里，我们仅仅是简单地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共产党人忽视、或是故意地无视了极其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所有世人的心中，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罪，都在灵魂和内心深处，深深地背离了上帝、那无限公义圣洁的伟大造物主、那道德法则的基石、那人类的生命之主。

人与人之间相爱的真正基础，是人对于上帝的敬畏与热爱。这正如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所教导我们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第一，应当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地爱主我们的上帝，第二是应当爱人如己。

+++
+++
+++
+++
+++++++++++++++++++++++++

【引述 圣经 罗马书1-3章】

罗马书.

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

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

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或译："以大能显明他是　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

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作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

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

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

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

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　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
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
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
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
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

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
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
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
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罗马书.
2.
你这判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都没有办法推诿。你在什么事上判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所作的，正是你所判断的事。
我们知道，　神必照着真理审判行这些事的人。
你这个人，你判断行这些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你以为能逃脱　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　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的吗？
可是你一直硬着心肠，不肯悔改，为自己积蓄　神的忿怒，就是他彰显公义审判的那天所要发的忿怒。
神必照各人所作的报应各人：
以永生报答那些耐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
却以震怒和愤恨报应那些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而顺从不义的人；
把患难和愁苦加给所有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却把荣耀、尊贵与平安赐给所有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因为　神并不偏待人。
凡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不按律法而灭亡；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
因为在　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得称为义。
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

是自己的律法；

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作控告、或作辩护。

这也要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在 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各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

你身为犹太人，倚靠律法，仗着 神夸口，

而且明白他的旨意，又从律法得了教导，能够辨别什么是好的，

自信是瞎子的向导，在黑暗中的人的光，

愚昧人的导师，小孩子的教师，在律法上得了整套的知识和真理；

你既然教导别人，难道不教导自己吗？你传讲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吗？

你说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吗？你憎恶偶像，自己却劫掠庙宇吗？

你既然以律法夸口，自己却因犯律法而羞辱 神吗？

正如经上所说的：〝 神的名，因你们的缘故在列邦中被亵渎。〞

你若遵行律法，割礼固然有益处；但你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不是割礼了。

这样，没有受割礼的人，如果遵守律法所规定的，他虽然没有受过割礼，不也算是受过割礼的吗？

那本来没有受割礼却遵守律法的人，就要审判你这有仪文和割礼而犯律法的人。

因为表面上作犹太人的并不是犹太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礼也不是割礼。

唯有在内心作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仪文。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 神来的。

罗马书.

3.

这样说来，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

从各方面来说，的确很多。最重要的，是 神的圣言已经托付了他们。

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 神的信实无效吗？

绝不可能！　神总是诚实的，人却是虚谎的，正如经上所记："你在话语上，显为公义；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
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　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降怒的　神是不义的吗？
绝对不是！如果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但是　神的诚实，如果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
为什么不说："我们去作恶以成善吧！"（有人毁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话。）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
就是　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
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赎罪祭"原文作"蔽罪所"），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
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什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
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
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　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
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

——————————————————————————————————————

民主与科学

在1911年前后，中国曾经很流行"德先生""赛先生"这样的名词。这两个词

来自英文单词民主与科学的译音。在晚清、民国初年的许许多多革命志士、理想主义人士、社会精英的心中，德先生与赛先生被看作是中华民族奋起的必经之路。

但是，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却忽视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的良知、道德、信仰、以及人生价值观念等等的巨大重要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论民主》 基督教信仰与民主的关系】

怎样建立民主

如上所述，民主制度不仅是一个极其深刻、意义重大、涵义复杂的社会政治治理体系，而且，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极其困难、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甚至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够达成的事情。尽管如此，民主制度是一件非常值得花费巨大的代价和心志去努力达成的事情；因为，正确的民主制度、正确的民主道路，将会随之带来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政治治理体系，将会给一个国家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幸福与繁荣。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建立起民主制度，怎样实行民主制度呢？我们应当怎样设计出一条从实际出发、从大局着眼、紧贴道德与信仰原则、紧贴现实政治情况的、中国现代民主主义革命的真实路线图呢？我们又应当怎样借鉴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实践经验，并结合普通中国人思想文化观念实际情况，来提出一条实现民主、符合民主道路原则的路线原则地图呢？

这也将是本书后文中所思索的重点。在这里，我们先给出一些鸟瞰性质的、简略的思考要点。

——————————————————

第一，首先，我们必须清醒而现实地认识到，民主革命的正确目标，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实现。正如，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包含着许多极其艰巨的任务，都需要极其巨大的代价、极其辛勤的努力、甚至舍生忘死、甘洒热血的精神；同样，民主革命的事业更是如此。我们必须完整、深刻、全面地认识到，民主事业的极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才有可能取得民主事业的成功。

民主制度，要远远地比"人民当家作主"、"一人一票"等等简单口号更加深刻、更加复杂。那些简单的口号，在很多时候不仅无益于民主制度的真实实现，反而会因其过度简化真实世界的问题，而在实践中容易导致民主制度的失败，并进而使得许多人以此为借口、推翻民主、实行专制、甚至挂羊头卖狗肉等等。

那么，民主制度的目标内涵，具体章程、法则、规律、条例、组织、架构等等，在一般原则的层面上而言，到底应当包括什么内容呢？为什么要包含那些内容呢？对此，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仔细的筹划。

——————————————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民主制度与道德和信仰之间的深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一种法律、规章层面上的关系，而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

在国家层面上、政治层面上，民主制度与宗教信仰之间，尤其是与基督教

信仰之间，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原则？很多人挂在口头上的、所谓的政教分离原则，究竟是什么意思？所谓的政教分离原则，与道德信仰作为民主制度的基石的"表里"原则，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换言之，众所周知、无可否认的是，民主制度需要建基于世人心中的道德的信仰；然而，民主制度则是关乎法治、自由等；那么，在国家政治层面，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推动、鼓励、支持道德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发展，并反过来，民主制度从道德信仰的发展中深受益处呢？政治与信仰之间，怎样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呢？是通过法律、政策等强行的手段吗？还是通过鼓励、允许、支持等柔性的手段呢？为什么？这些原则又怎样在具体行动和事务中体现出来呢？

更深一步说，虽然，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民主制度是诞生于、来源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但是，一般性而言，在世上一个民主自由制度的国家中，应当怎样面对、处理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事务呢？其中的原则、原因、机理是在于什么？

在本书后文，我们还会进一步讨论、深思，为什么说，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对于民主制度有着重大的、积极的、推动性的意义。

————————————

第三，实现民主制度的渐进性。

我们不要设想、或是期待，民主制度是一件一夜之间就能够一蹴而就地建立起来的事情。因此，我们在思考建立民主制度的路线图原则的时候，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渐进性”原则的重大意义。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更何况，建立民主制度这样的伟大事业，更是何其艰难、又更将何其收获巨大、深刻改变无数人的生活、生命与心灵。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殚精竭虑地来面对这件事情。

在考虑具体的渐进措施与路线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清醒地、智慧地取得共识，使大家都明白，渐进性的原则在关于建立民主制度过程中的一般性意义上，是多么重要。

一方面，建立民主制度过程的渐进原则，绝非是原地踏步、口是心非、甚至推搪阻塞、挂羊头卖狗肉。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诚实客观、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认识到，渐进性原则与过程，是一定不可或缺的，否则，急功近利就一定会给建立民主的过程带来巨大的损害，甚至使历史开倒车，导致民主的梦想变得更加遥远。

为了凝聚共识、保持耐力、长久稳定地前进，必须应当有一个公开的、实际的、深思熟虑的渐进原则路线图，以及具体的、可操作的、诚实的方法步骤。

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本书后文中深入思索。而且，我们也将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思考渐进性原则。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哪里、怎样去寻求那终极的真理与正义？作为基督徒，我们又应当怎样以敬虔的信仰原则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为民主自由正义事业添砖加瓦？自由的本质是什么？正义的本质是什么？渐进性原则的本质与信仰根基是什么？民主是革命，而不是改良，但却是渐进性的革命；——为什么？我们又应当怎样去渐进而行？

____

第四，政治治理的可操作性。

如前文所述，所谓民主，是自由、圣洁之民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

我们如果深思这件事情，就立刻会意识到以下问题。

A。我们怎么判定人民是否真正是自由的、有着起码的道德品德？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起码的道德品德？谁来判定？谁来制定标准？难道，就像那些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专制政权国家中，给人民中每一个成员所制定的道德档案吗？显然，这不仅是荒谬的、行不通的（在实际操作中，一定会被人为操弄、并成为腐败与权力滥用的滋生之地），而且是罪恶的、残酷的、不公的。（为什么是荒谬、行不通、甚至是罪恶、残酷、不公的？）

但是，难道在民主社会中，就对关乎人的道德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吗？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或是任何人类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中），人们并不应当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任意而行。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思想一个深刻而本质的问题：人是什么？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人的思想与心灵中，所追求的、所渴望的是什么？在人的生命本质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罪性吗？什么是罪？罪的表现是什么？什么是自义？我们又应当怎样面对罪？怎样处理罪性？怎样除去罪污？怎样防止人心灵中的罪性在外在言语行为上的表现，以及给社会与他人所带来的伤害？

同时，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关乎道德领域的事务上，法律规章制度是重要的，但却是不足的。原因很简单，在法律规章层面，世人无法真正地去、也不应当去制定那些“诛心”的法律。“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那么，究竟什么是凯撒的？什么是上帝的？

什么是自由？

B。怎样实行选举制、代议制？怎样了解民意？怎样取得共识？

所谓人民自我治理的政治组织形式，必须要解决几个关键性的问题。统治者怎样产生？统治者的权力包括哪些？统治者的权力怎样分配？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应当基于什么原则？为什么？

究其本质而言，到底什么是人民的"自我治理"？这与专制主义的治理有什么实质性上的异同？怎样避免和防止多数暴政？多数暴政的定义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多数暴政？

怎样了解民意？什么是民意？民意一定是公平、公正、正义的吗？怎样确保民意是公平、公正的？当民意不公正、不公平、不正义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

民意的特征、优点、缺点、规律、本质、等等，是什么？所谓民意，就是每一个个人的心思意念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集合反映。然而，如果说，人的生命在本质上是背离上帝、背离道德法则、充满罪性和罪行的，那么，我们又怎能相信民意、依靠民意呢？

什么是人民？人民是伟大的吗？什么是人性？人性是光辉的吗？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等政治伦理哲学观念中的优点、缺点、盲点、正确之处、缺失之处、值得肯定之处、以及谬误之处、等等是什么？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在一个充斥着各行各业、喧嚣嘈杂、利益纷争的社会中，在处于各种不同社会条件环境、不同人生光景之中的大千世界中的世人中间，在一个庞大的、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我们可能在人民中间取得共识吗？我们怎样取得共识？我们怎样在长期的年月中，在漫长而繁杂的事务之中，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在人民之中不断地取得共识、不断地前进和进步、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众志成城？

C。怎样实现公平与制衡的原则？何谓平衡的原则？以参议院与众议院为例（或，上议院与国民代表大会）。

所谓立法、司法、执法等权力的三权分立政治结构，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具有极其重大而深刻意义的认知：即，在世人的生命本质之中，并非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在人的心灵与灵魂深处，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遍及的、本质性的、根深蒂固的罪性。

这个浩大的宇宙世界，是来自于那无限全能、智慧、圣洁、公义的造物主的创造。我们每一个世人的生命，也更是来自于他、那伟大的上天、上帝、造物主、永生之神。我们都是被他所造的，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万物之中是独特的、高贵的、珍贵的，因为在人的里面，有着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有生命、道德、爱的能力。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唯有是在上帝、上天那里，才能够得到满足、得到实现。在人的里面，有着一颗指向永远的灵魂。

然而，世人的生命却在本质中背离了他。世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属世之利、以被造之物为自己心灵的归依，却不寻求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但是，人却背离那上帝所放置在世人良知之中的道德法则，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上的世人，没有一个未曾说过谎言，未曾做过违背良知的事情，未曾在内心中有不当的愤怒，未曾在内心中没有犯过奸淫。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人做事可以不用受到惩罚，不必

承担任何责任、任何后果，那么，我们就会深为震惊地看见，在世人心中，隐藏着多么普遍的、多么丑恶的罪恶与污秽。

从严格意义上说，现代民主制度，不是建基于“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不切实际的、甚至自高自大的主观幻想之中，而是建基于这样的谦卑认知：——人类自身是充满罪性与缺陷的。

上述原因，是民主制度中权力分立、平衡、制衡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仅仅在概念上讨论权力分立与制衡是容易的，但在实际实行中却是困难、甚至危险的。这是因为，正如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一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在权力分开、制衡的民主架构中，最常见的弊病，就是那些政客们彼此的吵闹与互相掣肘，而缺乏团结、妥协、宽容、同心同德的精神。关于民主制度中的重要妥协特征，以及其相应的重要文化土壤条件，我们将会在本书后面章节中讨论。

在具体操作与体制设计中，民主制度里面的权力制衡以及权力集中、责权利对应机制等等，会表现在很多方面、表现在政府的很多组成部分中。在权力制衡体系背后，最重要的考量就是，怎样既能够达成尽量多的公平、稳定、制约、平衡，又同时尽量地避免政府机构之间的内耗、敌意、互斗。为了使民主制度能够顺利运行，就必须尽量同时兼顾两个相互矛盾的方向，即，稳定与效率；平衡与专注；公正筹划、集思广议，与果断执行力；等等。

比如，在这其中，立法机构的两个组成部分——成员任职期较长（即，每名成员的重新竞选时间的间隔较长）的上议院或参议院，与成员任职期较短（即，每名成员的重新竞选时间较频繁）的众议院之间的平衡与协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这种两院制度，能够避免国家权力过度地倾斜于某些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区，从而使得国家能够尽量均衡而公正的发展，并使得国家发展在整体的层面上更加健康有序。这是因为，参议院的成员选举产生，倾向于以地理省份为单位，而众议院的成员选举产生，则倾向于以人口分布为单位。这样，在权力分配、社会资源分配等等方面，那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就不会被人口稠密的地区所挤压。

这种参众两院制度的设计，也是基于这样一个深层的隐含原因，即，始终保持这样一种谦卑的认知，即，在世人心灵的深处，遍及着自私之罪，因此，人的决策应当通过适当的制衡来加以协调，避免权力与资源的不公正分布。（否则，逐渐地，大都市地区的人口就会以人多势众的优势，而欺负小地方、地广人稀地区之人的发展；久而久之，人口就会越来越向大都市集中，最后使得全国人人都辛苦不堪）。

关于这些权力均衡的具体事项，我们也会在后文深入探讨。

D。民主与自由。

民主与自由两者虽然本质内涵截然不同，但是却彼此互为补充，缺一不

可。若没有民主，自由也必终将失去。我们在世上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会看到这样的事例。另一方面，没有自由的民主则往往是虚假的、形式主义的民主，或是很容易演变成乌烟瘴气的多数暴政。

那么，在一个民主政治体系里面，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以及相应的一般性原则，来尽力保障自由呢？从政治意义而言，自由的内涵、外延、范畴等等，又是什么呢？

自由的本质是在于，人的思想、心灵、灵魂、信仰等等的珍贵价值。正是因为人是有着这些宝贵的属性和能力，所以，人才有言论、集会、结社、就业、迁徙等等的自由。然而，自由本身并非是没有方向的，也并非是没有限度的。自由的限度，就是在于，不能对他人造成切实的伤害；而且，自由的限度也包括，不应当超越道德的底线。关于道德底线的定义，不应当被扩大化，而是要以人良知中的是非之心、以那来自于上帝放置在普世之人心中的道德法则为准。

E。法治、平等、公义，与民主。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为什么要实现民主"这个问题，那么，最好的回答就是来自于圣经中的这样一句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上面圣经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圣洁属神的社会中的重要原则是在于，

应当有公正、正义、平等，并应当有恩典、慈爱、怜悯、良善；在人的心里应当充满谦卑，在爱中要常以为亏欠，而不是自高、自大、自傲、自以为义；最后，最重要的是，在人的心中，应当有敬虔的信仰；世人应当有对于那创造宇宙天地之主、创造世人生命之主、那伟大的上帝、上天有真诚的敬拜、倚靠之心。

从上可见，真诚的、对于造物主的信仰，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民主制度的诞生的重要前提条件，而且，也是使得一个美好的民主制度能够得到成功发展的文化土壤背后的重要动机和动力。

如果离开了对于造物主、上天的敬虔信仰，那么，平等、公义、公正等等概念，就失去了根基和基础。如果离开了那敬虔的信仰，那么，所谓民主制度就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久而久之，就必将陷入乌烟瘴气的喧嚣吵闹之中，并最后一定会被专制者、阴谋家所推翻。

____

第五，组织架构的可经营性。

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实行高效公正的民主制度，最大的挑战，不仅在于怎样满足政治治理的可操作性的要求，而且还在于，怎样建立起一个稳定可长久持续的、可经营的组织架构体系。

这样的组织架构体系，不仅仅在于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机制以制衡、保持公正、防止世人心中之罪所带来的伤害与混乱，而且，更加要针对从各级地方政府到联邦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构的多样化特点、特征、需求和适应性。

在一个幅员辽阔国家所推行的民主制度，即，“自由圣洁之民所进行的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必须要考虑到地方的省、市、县、乡、镇、村等不同的自我管理特点。

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一个最大区别是在于，后者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在金字塔权力架构中，所有人都是向上级负责，直到金字塔的顶端。而在民主制度权力架构中，内部权力之间的关系则要远远地复杂得多、微妙得多。

A。首先，一般性而言，所有的各级政府首长都是由本地人民选举产生，而不是被上级政府任命。因而，每一级政府成员都是向下负责，而不是向上负责。换言之，村长不是镇长的下级，镇长不是县长的下级，县长不是市长的下级，市长不是省长的下级，省长不是国家主席的下级。因为每一级官员首长都是被辖地的人民所选举产生的。

那么，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又怎么能保持整个国家，或是每一个省市县等等，仍然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生机勃勃的机体呢？在各村、各镇、各县、各市、各省之间，怎么能保持协调关系，而不是互相争竞、好勇斗

狠、一盘散沙呢？

换言之，究其本质而言，所谓"人民的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应当怎样保持人民之间和谐融洽、彼此互助合作的关系呢？

在这里，我们再次地看见了世人心中之信仰与谦卑的重要性。

B。在民主制度内部的复杂组织架构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尽量清晰地定义各个政府组织部门之间的权力界限以及重合部分关系等等。例如，整个联邦国家体系内的司法权、执法权、立法权，以及各省市县不同层级内，各级地方的司法权、执法权、立法权等等，应当如何进行不同的区隔与联接。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各省市县等范围内，应当分别有不同的章程、宪章等，以作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级政府组织结构与运作的指导方针和原则。

这些不同层级的宪法、章程、宪章、政府组织架构运作指导原则等等，以及，其本身如何产生、如何修订、如何制定产生与修订的程序等等，都是关乎整个民主制度成败的关键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得好，那么，就会建立起一个公正稳定高效的、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反之，如果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好，那么，整个民主制度就会失败，就会落入一盘散沙、纷争不断、互相扯皮的状态，并会不断地被野心家、革命家、暴民运动所搅扰、推翻、打断。

再一次地，在建立民主制度革命的这整个过程中，必须要非常谨慎地采取渐进性原则，并有清晰的路线图、规划设计图纸，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这些清晰的路线图、规划设计图纸包括，民主制度建立的程序、步骤、时间表，以及，在每一个程序、步骤、时间表中，相应的选举机制、成立机制、权力组织架构定义等等。

对于一个从未有过真正民主制度的文明体系、国家社会来说，这样的关于建立民主制度的清晰路线图、规划设计图纸等等的好处和重要性在于，它们使得整个国家社会的人民对于民主制度的渐进性建立过程有方向感、目标感，并且会不断地凝聚和增强人民内部心灵之中的共识与民主认同感。

同时，这样的时间表、路线图不应当过于漫长，而最好应当尽量在一代人之内（例如，十年至二十年内）就可以完成。否则，如果时间表过长，路线图过于遥远，那么，就可能会催生专制主义的土壤，并且会把所谓的民主梦想变成谎言、变成挂羊头卖狗肉，从而使得真正的民主制度并无法得到建立。

关于这样的民主建设路线图应当包括哪些内容，我们会在本书后文继续讨论。

——————————————————

第六，执行力的集中性与长期法治规划的分散性。

正如前文所述，民主制度的两个最大敌人就是专制主义与无政府散漫主义。专制主义者们偏颇地强调权力与执行力的集中性，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却故意忽视、无视、蔑视国家社会人民的平等、公正、公义。无政府主义者们偏颇地强调权力的分散性、去中心化，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却故意忽视、无视、蔑视，一个国家社会中、人民内部之间的协调合作、统一行动的必需性。

无论是专制主义思想还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如果得不到谨慎的处理、平衡、妥善考虑、回应，那么，它们最后都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彻底失败，并把整个国家社会带入灾难祸患的深渊之中。

一方面，在专制主义社会中，由于统治者不具有合法道德性、公义性，因而，统治者们往往是陷入恶性循环中，往往是以强制、挤压、逼迫的手段来统治社会，并会以各种各样的谎言来欺骗人民、钳制人民。这种统治，终将给国家与社会带来灾难，并最终导致革命、战争、生灵涂炭、心灵荼毒、等等。

另一方面，在无政府主义者所带来的喧嚣混乱之中，国家社会失去秩序与法制，整个社会处于一盘散沙之中。在各个省市县乡镇等等之间，充满了互斗；在社会不同阶层、团体、职业、以及持有不同理念的人群之间，也充满了互斗、内耗、不和谐。这样的局面，必然导致社会中有一些人会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替天行道”、“主持正义”，最后，野心家们、无耻下作的政党集团、打家劫舍的流氓无产者们夺取权力，劣胜优汰，从而进入

下一个专制主义社会的循环。

就这样，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道路就像是一个钟摆一样，不断地、持续地在专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来回变换交替、不断死循环。在这样的败坏动荡、充满谎言的国家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智慧、敬虔、道德、谨慎、渐进的、现代民主主义革命过程，那么，民主制度就永远也不会实现。

从反方面来说，具体而言就是，是否能够保持政府权力执行力的集中性与长期法制规划的分散性之间的正确平衡，是决定民主制度成败的重要关键因素之一。

所谓权力执行力的集中性是指，政府行政长官（例如总统、总理、省长、市长、县长等等）以及其相应的政府内阁、组织部门、执法部门、检察机关、等等下辖部门，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权威，在治理政事的过程中，政令统一、有力、集中、有效、集结迅速；而不是拖沓敷衍、人浮于事、怨声载道、等等。

所谓长期法制规划的分散性是指，在关于国家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长期性本质问题层面，决策机制不应当是由少数人、精英阶层、寡头政治、少数统治者集团来完成，而必须是以恰当的、分散性质的、甚至去中心化的组织决策机制来完成。这样的过程，往往是由参众两院的协调和协作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体现在联邦国家层面、以及各省市县区级的立法工作的程序设置等等。

所谓立法工作是指，由人民定期选举产生的各级参众两院的成员们，在国家层级、以及各省市县等级别，制定关于各地长远发展规划方面的民事、政事、经济、刑事、教育、医疗、移民等影响人民与社会发展状态的非短期的、非急迫的、但却是长期性的、本质性的、重大性的、深远性的问题的法律、规章、措施等等。

这样的立法性质的工作，由于是“非短期”的、“非急迫”的问题，因此，可以进行相对而言缓慢的思筹以及激烈的反复辩论过程。同时，由于所面对的问题是深远长期、影响广泛的重要本质性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涉及尽可能多的社会动员，使得尽可能多的声音、思想与建议过程参与进来。这也是为什么立法权与执法权应当分开的一个重要原因。前者倾向于处理长期深刻本质问题，后者倾向于处理雷厉风行的问题、以及探索性、尝试性、试错性、表面性的问题。

而以各级法院所代表的司法权体系，则兼具集中性与分散性的原则。一方面，联邦各级法院、乃至各省市县的法院、以及国家最高法院，应当具有超然性、超脱性，冷静地处理各样法律争讼案件，原原本本地根据既定的立法，来裁定案件是否吻合还是违反了某项既有法律。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民事、刑事案件中，以来自于民间成员的、具有审定案件权力的陪审团，对于案件进行裁定。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前者具有权力的集中性原则，后者则具有权力的分散性原则。两者都是为了满足于共同的目的，即，“行公义、好怜悯”。在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应当由选举产生。在联邦各级法院的法官，应当由联邦民选长官（总统、总理等）任命与民选参议院成员认证，以及某些复合方式产生。

———————————————

第七，再思基督教信仰对于民主制度的巨大有益作用；以及，应当怎样发挥、促进、体现这些有益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看见，民主制度的致命弱点，与民主制度的明显优势，都与基督教信仰的文明体系与文化土壤有着重要的、直接的、对应性的关系。

我们绝非是说，一个民主制度的政体必须要与基督教信仰完全结合，甚至进行所谓的"政教合一"。我们也绝非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信仰，就根本无法进行民主。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述，任何稍微对历史留心的人都会无可否认，现代民主制度是诞生于基督教信仰的文明体系与文化土壤中；现代世界的民主制度的大发展，也是在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的大力推动下所导致的结果；包括台湾、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是在西方的保护和支持下才得以建立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摆正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要深刻地反思、认识到，基督教信仰，就其

内在教义而言，相比于世上的其他宗教信仰体系而言，为什么是正确的、是真理性的信仰？为什么耶稣基督福音是真理、是真实的？——这涉及到许多关于基督教信仰护教学方面的书籍与思考，本书就不在这里赘述。读者可以参考《基督教之大众证据》《基督教信仰的证据》等等书籍。

更进一步说，我们必须要深刻地反思、认识到，基督教信仰，就其内在教义为而言，相比于世上的其他宗教信仰体系或是道德伦理体系而言，对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具有什么样的、独特的、深刻的、甚至从长远来说不可或缺的有益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有益作用，并非是时刻不可缺少的作用。例如，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政体虽然不是在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印度、台湾、日本、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某些非洲国家、个别中东国家等，但是，它们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实行民主制度。

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强调，那些国家往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而导致的民主制度，例如整个印度曾经被英国统治了上百年；台湾是在二战以后美国的特殊保护之下；日本是在西方的军事力量胁迫之下建立的民主；等等。

换言之，对于民主制度而言，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虽然不是时刻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就长期性、主流性、原发性、等等而言，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宗教信仰体系与道德思想伦理体系之中，基督教信仰具有着极其独特的地位，对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保持有着极其特有的、强烈的、大有功效的有益作用。

至于，这些有益作用都有哪些，以及，这些有益作用与基督教信仰自身的内在教义有什么深刻的关系，等等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只有当我们深刻明白了这些有益作用具体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有益的作用，我们才能够知道，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在现实世界中、在实践活动中，摆正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制度政治事务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本书后文中，会继续对上述问题深入探讨。在这里，我们仅仅是提出一些鸟瞰式的思路。简单地说，基督教信仰的内在教义包含了以下重要内容要点。

1.所有人都是被上天、上帝所造的。他是我们的天父。世人的生命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所造的。世人生命的本质与心灵和灵魂中的真实光景是什么。2.什么是罪。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4.谁是那位伟大的永生真神、上天、上帝、造物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5.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6.圣经是上帝的全备、无误、权威的启示、话语和旨意。7.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8.上帝是爱；他是圣洁、公义、慈爱、恩典的；他是全知、全在、全能、全备的；他有着无限的智慧；他有着完美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他是至善至美的。9.耶稣基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天父的独生爱子，是神的儿子，是我们世人的救赎主；他道成肉身、降身为人、来到世上；他死在十字架上，并第三日复活，成就了那无限美好的救恩，使一切

相信和接受他恩典的、谦卑承认己罪、悔改己罪的人，都能够得到上帝的饶恕、赦免、救赎，得到那无限美好幸福的永生，进入那无限美好的天上国度。等等。

上述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有着什么内在的、深刻的关系呢？上述基督教信仰教义，对于现代民主制度有什么巨大的有益作用呢？简单地说，这些重要的有益作用包括以下方面。

【1】基督教信仰教义使得民主制度不是建基于人类自高自大、自傲自义的乌托邦空想主义，而是建基于这样一种谦卑的认知：人内心之中有着深刻的内在缺陷、罪；人需要从罪中悔改、寻求真理、归向真神；人需要有敬虔的、超越生死的、执著的、以上天为人之心灵归依的真挚信仰。

【2】在世人良知之中，关于是非、真假、善恶、诚实、虚谎欺骗等等的道德法则与道德标准，不仅在人的心灵中应当有着重要的权威，而且必须以上帝自己为道德的终极根基。上帝是无限完美、圣洁公义的；他更是鉴察世人生命与道德的终极审判者。如本书前文所述，道德基础，正是民主制度的重要软肋所在，也正是决定民主制度成败的关键点之一。关于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却实际上非常复杂而深邃。（主要难点在于：——在民主制度社会中，怎么可能针对道德事务进行立法、强制、或是采取某种要求性的措施呢？如果真的那样，岂不成了专制主义社会了吗？或是变成空洞的口号了吗？道德与法律、政治之间的本质关系，究竟在于什么？）我们在本书后文会继续深入思考。

【3】基督教信仰教义指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在于爱。爱的本质是在于，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处之道应当是，憎恨罪、爱罪人。这样的根基，是在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之中。上帝正是以这样的爱来对待我们；他以怜恤、慈爱、恩典的心对待我们，但是，他恨恶我们生命之中的罪；甚至，他愿意为我们的罪而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以把我们从罪中挽回。人与人之间彼此饶恕的根基，正是在于人首先得到了上帝的饶恕与赦免。

马太福音18章

21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22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23因此，天国好象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帐，24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六千万银币的人来。25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26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27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28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一百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29那和他一同作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30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31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32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33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象我怜悯你一样吗？'34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35如果你们各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

【4】基督教信仰教义指出，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应当努力、谦卑、勤勉、热忱、专诚地把各样事情做好，但是，人不应当以这个世界上的受造

之物为自己心灵的归依，而是应当单单地倚靠那创造天地与世人生命的主。正是因此，唯有因此，人才能够在各样世事中既有执著热忱的态度（而不是像佛教徒那样出世、厌世、看破红尘、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反对生命的执著），又有谦卑的心，并能够彼此之间求同存异、谋求妥协。这种既努力坚持真理、又努力谋求妥协的精神，正是民主制度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生命线所在。

【5】基督教信仰教义对于个人崇拜、对于崇拜人间领袖的偶像化思想倾向，有着内在性的反对。人与人之间在本质上是平等的，都是被造之物。我们彼此本应当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本是天父的儿女。

马太福音23章

1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2“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3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行和谨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作。4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5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要作给人看：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做大了，衣服的繸子做长了；6他们喜欢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7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8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9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10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傅，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傅，就是基督。11你们中间最大的，必作你们的仆人。12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

马太福音20章

20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儿子前来见耶稣。她跪在耶

稣面前求他。21耶稣问她："你想要甚么？"她说："求你下令，使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22耶稣回答："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甚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23他对他们说："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我父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24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就向他们兄弟二人生气。25耶稣把他们叫过来，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26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要作你们的仆役；27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作你们的奴仆。28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许多人的赎价。"

【6】基督教信仰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倾向，也有着内在的反对。

罗马书13章

1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应当服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　神来的；掌权的都是　神设立的。2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反对　神所设立的；反对的人必自招刑罚。3执政的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你想不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就会得到称赞；4因为他是　神的仆役，是对你有益的。但如果你作恶，就应当惧怕；因为他佩剑，不是没有作用的。他是神的仆役，是向作恶的人施行刑罚的。5所以你们必须服从，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6因此，你们也当纳税，因为他们是　神的差役，专责处理这事的。7你们要向各人清还所欠的；应当纳税的，就要给他纳税；应当进贡的，就给他进贡；应当敬畏的，就敬畏他；应当尊敬的，就尊敬他。

爱是成全律法的

8不要欠人的债；但在彼此相爱的事上，要觉得是欠了人的债。爱别人的，

就成全了律法。9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10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是成全律法的。

总要披戴基督

11还有，你们知道这是甚么时期了，现在正是你们应该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加接近了。12黑夜已深，白昼近了，所以我们要除掉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武器。13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好象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放荡纵欲，不可纷争嫉妒。14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7】类似于上述的各项要点，我们还能够举出很多。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要点本身，并非是彼此孤立的、或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而是有着内在的机理、原因、体系；它们互相都是融会贯通的，都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在本质层面上紧紧相连。这些要点，都与圣经整体所显明的基督教信仰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息息相关。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会在后面章节进一步总结归纳。

社会的目的、国家的目的、人生的目的

正如本书一开始所说的，所谓正确的民主制度，并非是人生、社会、人类的终极真理，而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圣洁之民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虽然我们可以说，民主可以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好的一种组织形式，但是，这绝非意味着，民主就是人类社会所应有的、终极的、完美的样式。

最关键之处是在于，人类【——如果，人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具有自由、圣洁的属性（请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圣洁，并非是意味着完美，而是意味着真诚、诚实、而没有诡诈）】虽然可以通过民主来进行自我管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人类的心灵、生命与灵魂，就不需要君王。

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人在心灵中有了真正的君王【对于基督教信仰而言，对于基督徒而言，这君王就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军之耶和华，那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的造物主、上天、上帝；（——事实上，对于普世之人也都应当是如此；然而，关于基督徒应当如何在民主政体中对待那些非基督徒人士、与他们相处，则绝不应当是歧视、蔑视、打压等等态度；对此，我们会在后文中深刻反思）】，所以，人才不应当以地上的世人为君王。反之，当人不寻求那造物主的荣耀、不愿意真心归向那上天的无上权柄，那么，人就必然会臣服在世上那些所谓伟人们的脚下，对他们顶礼膜拜，而无法真正地进行民主制度中的自我管理，从而沦落入专制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灾难之中。（这并不是说，在人群、社会中就不可以有领袖；而关键是在于，众人怎样看待他们中间的领袖；在尊敬、崇拜、敬拜、敬畏之间，在服从、顺从、五体投地之间，有着微妙的、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区别）。

从终极层面而言，社会的目的是什么？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国家是为了人而存在，还是人为了国家而存在？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却实际上很难回答，因为答案绝非是非此即彼的选项。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思考，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在于什么？人为了什么而活着？人又为了什么而死亡？人生中真正的幸福、利益、福祉在于什么？

只有在这些问题上找到正确的、符合真理的、真实的答案，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社会的目的与国家的目的和价值。而那些答案，都是建基于正确的、符合真理的、真实的信仰基础之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 科学的作用与局限】

第一章

背景介绍

——

圣经 传道书7章29节：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圣经 哥林多前书9章26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

本书的内容概要与目的

本书的主旨是想要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以及思想层面的反思与思辨，来探寻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科学的意义与起源是什么；为什么现代科学发源于欧洲，而不是中国等其他地区？

为此，我们将要追寻那些现代科学开创者们的思想与书籍，看一看当年，在他们的头脑中曾经在想些什么；看一看他们是受到了哪些前人的影响，得到了哪些方面的什么启迪；看一看他们对于未来的憧憬是什么，梦想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动力是什么。我们可以打开他们的陈年旧作，看一看其中所讲述的——他们的世界观、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方法论观念等等是什么。我们可以重温他们探索宇宙自然世界、发现科学的旅程，并从中得到深刻的教益与感悟。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的言论、著作、思想、方法、成就，与中国古代思想家、技术家、哲学家的言论、著作、思想、方法、成就相比较，看一看他们的异同是什么，看一看中国思想家的优点是什么，缺失是什么，成果是什么，遗憾是什么，以及他们与西方思想家的这些异同表现在哪些方面，在今天的影响是什么，等等。

———————————————————————————————————————

本书所想要说明的历史事实

——本书所想要说明的，是这样一个深刻的事实：现代科学的起源，是出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内在因果关系。

很多世人常常误以为，现代科学之所以得到开启与发展，是由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欧洲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和影响。但是，这样的想法是偏颇的、片面的、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一个简单的反驳是，在非洲、在南美，在南亚、印度，在东亚、中国、日本等地，并没有什么成体系的所谓宗教信仰的“束缚”；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那些地方被开启、独立发展起来呢？换言之，在那些地区，科学发展的真正阻碍，是来自于什么呢？一般性而言，在古代世人心中的世界观、信仰观、人生观里面，有着哪些正面或是负面的影响因素？

而且，更进一步说，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开启与发展，恰恰是在马丁路德基督教宗教改革以后，是在圣经被广泛地翻译、传播、大量印刷发行以后呢？在基督教改革、圣经的广泛传播，与现代科学的开启之间，有着什么内在的联系呢？现代科学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开启，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与基督教所产生的文化土壤之间，与基督教信仰中所包含的世界观之间，有着什么内在性的联系？这种内在性的联系，是一种必然的关系，还是一种偶然的关系？

公元一世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死后第三日复活、成就那美好救赎恩典，正如圣经旧约在那之前的将近一千八百年中的无数预言。从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以后，基督教信仰临到欧洲、临到世界，至今已经两千年了。今天我们的公元纪年，就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时间为坐标原点。耶稣基督从三十岁开始公开传道，到三十三岁半被钉十字架、成就了那美好的救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在三年半时间中所成就的伟大事工，胜过了这世上无数伟人的事业，胜过了这世上无数思想家的哲学，胜过了这世上无数开疆拓土的君王们所建立起来的王国。

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信仰所产生的文化土壤，能够直接地导致现代科学思想的开启和建立，那么，为什么一直到公元十六世纪，而不是在之前更早的时间点，现代科学的曙光才开始显现、并开始爆炸性地大规模发展呢？固然，这与过去两千年中的生产力发展进程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更深一步说，从思想的角度而言，在现代科学的开启与发展背后，还有着什么更重要的深层次原因？单凭物质性的生产力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或促成现代科学思想的建立与发展；事实上，正是由于现代科学思想的开启和建立，才导致了现代生产力、工程、科技水平的爆炸性的发展。那么，在现代科学思想体系的开启、建立和发展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至关重要性的导致原因呢？这也正是本书试图努力探讨和思索的问题。

——————————————————————————————

科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简述

在现代社会，很多世人心中流行着的一个常见误解是，在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矛盾性的张力关系。人们经常误以为，科学正是证伪了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却总是想要阻碍科学的发展。甚至，在当今时代，很多世人以为，宗教信仰是迷信的、愚昧的、违反理性的，而科学则是昌明的、智慧的、理性的，等等。

然而，世人往往不知道、或故意无视的是，几乎所有的现代科学开启者们、思想家们，无论是牛顿、开普勒、培根、波义耳，还是笛卡尔、莱布尼兹、

哥白尼、伽利略、法拉第、麦克斯韦、普朗克、等等数不胜数的伟大科学家们、科学思想巨人们，都是基督徒，甚至是非常敬虔而真挚的基督徒。直到今天，在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中间，基督徒们也都占了绝大多数。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方面，的确，在世上许多宗教信仰中，充满了许多荒谬、愚昧、迷信、光怪陆离、野蛮甚至愚蠢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在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与科学之间，却有着深刻的、看似难解难分的关系。因而，我们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是，现代科学的诞生，究竟是由于因宗教信仰而导致的原因，还是由于克服了、胜过了宗教信仰的原因？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地思考两个方面的题目。第一个题目是，现代科学的意义与起源究竟在于什么？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涵义、定义是什么？科学的内涵、外延、作用、影响、局限、积极意义分别是什么？第二个题目是，当我们说到"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到底何谓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的内涵、外延、作用、影响等等是什么？在宗教信仰的比较中，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或是错误的？究竟什么是信仰的真理？

在本书中，我们着重于思考上述第一个题目，但也会涉及到上述第二个题目。关于后者，在一些关于基督教信仰护教学书籍中（例如《基督教之大众证据》等书籍）有更加深入的探讨和介绍。

———————————————————————————————————————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简述

所谓基督教信仰是指，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基准的、以耶稣基督救恩为中心的信仰。众所周知，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的基督教信仰体系，是世上（至少在名义上）信众最多的宗教信仰体系。虽然基督教信仰在历史上以欧洲为主要文化土壤，但是，就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言，它是一个普世性的宗教信仰系统。今天，在非洲至少有一半人、将近六亿人是基督徒；在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欧洲，大多数人也都是基督徒；在亚洲，基督徒的数量也早已经达到数亿人以上。在世上七十亿人口中，基督徒的数量有二十三亿。在这个世上，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自称为基督徒。

今天，圣经是世上最畅销的书籍，是印刷量、发行量、传播量最大的书籍，是被翻译成世上人类语言最多的书籍。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极其深刻、巨大、深远的影响。为了简单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仅仅以几件现代人所习以为常的事情为例：一夫一妻的婚姻法律制度，教育男女学生的公立学校系统，以及照护医治普罗大众的公共医院系统；这些都是由基督教信仰体系而导致、建立、推动、确立的。

那些把基督教信仰体系当作是迷信、当作是过时的东西、当作是落后思想的人们，显然往往是由于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调查、分析和了解。事实上，基督教信仰正是现代文明的根基而发源所在。

基督教信仰体系对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法律、哲学体系等等的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无远弗届的关系。今后，我们会在其他的书籍中，对于那些话题试图进行仔细的阐述。而在本书中，我们则聚焦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从大量的历史事实而言，为什么说，正是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导致了现代科学思想的启动、产生和建立？

固然，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上，科学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的、甚至缓慢的、水滴石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每一个国家、民族、文明，都对其有所重要的贡献。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指南针、火药等重要的技术；阿拉伯人、中东人在数学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古希腊人、罗马人在数学、物理、逻辑哲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毋庸置疑，现代科学思想体系正是建立在那些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础之上的。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现代科学体系与古代科学技术之间，有着清晰明显的区别。前者是系统化的，而后者往往是零散的、支离破碎、停滞不前的。前者虽然是后者的继承者，但却在量与质上产生了飞跃，上升到了体系化的世界观层面，并给人类社会的面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革命，给现代工程、技术、生产力状况带来了与古代技术相比绝不可同日而语的境界。从某种程度看，在现代科学来临以前，相对于近现代的人类物质生活面貌而言，人类在从前几千年中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面貌基本上是变化很小的。而现代科学的来临，不仅对全人类各个国家、民族、文化、文明体系在思想上带来了巨大的撞击，而且，给世上无数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物质上的造福，深刻地改变了世人的生活方式与物质生产力面貌。

因此，本书中所聚焦讨论的问题，即：现代科学的意义与起源、以及现代科学的开启历史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深刻关系，非常值得世人注意思想、深入思考。

而本书全部内容中想要说明的论点正是：——现代科学的开启与建立，正是以圣经为直接根基的基督教信仰中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体系，所直接导致的结果。这正是为什么，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当圣经被翻译、印刷、广泛传播以后，现代科学得以诞生、开启，并得到爆炸性的发展。

————————————————————————————————————

简述基督教信仰与世上其他宗教信仰体系的异同

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许许多多、林林总总的宗教信仰，但是，成体系的、有强大理论背景支撑的、有系统化经书正典的、有悠久历史与渊源的、在世界人口中占据可观主流地位的、以超自然思想和教义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中，只有三个宗教信仰体系（也许可以再加上印度教，但印度教往往缺乏统一的教义与经典和历史文字传统、礼仪典章等等），即，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以可兰经为核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以及以一系列佛经为核心的佛教信仰体系。

除此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小规模的、零散的、局限于某个较小地域范围的、或是历史短暂的、所谓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信仰以及各种偶像迷信风俗等等。

在这些各种各样宗教信仰中，有着一定的共性，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深刻而广泛的、本质性的不同。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在于，不论一个宗教信仰多么看似博大精深、历史源远流长，或是看似多么肤浅、零散、支离破碎，这些宗教信仰都在试图回答一些关乎以下某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我们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了什么而活着？我们死了以后要去哪里？我们的生命来自何处？我们的世界本源是什么？世界的本质与价值意义是什么？道德的本质和本源，以及正确的内容应当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信仰中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应当是什么？

尽管世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与上述问题有关，且都想要给出超自然的回答与教义，并且，它们在很多重要内容上都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多数宗教信仰中的教义都认为，人的生命应当是良善而圣洁的；善将要得到奖赏与祝福，而恶则将要受到惩罚和咒诅）；但是，世上的宗教信仰在教义层面，却更有着天壤之别的内容。例如，在中国南方、港台等地，或是南亚等地区，有许多"拜拜"的传统；他们敬拜妈祖、观音、关公等传说中的、神话性质的人物，甚至敬拜一些动物、牲畜，祈求他们、她们或它们，来保佑自己的娶妻生子、家人平安、升官发财等等诸如此类各样的属世之事、属世之利。然而同时，在佛教的经典书籍中，则反对把神佛当作是具体的音、声、相；甚至佛教教义自身常常会陷入矛盾状态，一方面反对实相，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教义为核心，另一方面则建筑各种各样的庙宇、制作各样雕塑，来敬拜那些长着卷发与垂耳的、酷似印度人的各样佛像。

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与佛教信仰体系三者之间，前两者都属于一神主义，而佛教则属于泛神主义思想。换言之，基督教信仰体系与伊斯兰教信仰体系都认为，在这个世界之上，有那样一位无限全能的、全知的、全在的造物主在掌管、主宰；这位造物主、上天、上帝、真主，应当是世人所敬拜的对象与信仰的核心。而佛教则认为，在这个世界之上，并没有那样一位无限全能的、全知的、全在的造物主在掌管、主宰；而是，这个世界是由因果、因缘所驱动的（即，这个世界并非是被那样一位无限伟大的、能看、能听、能言的创造生命之主所创造和管理的）；不但如此，人生和世界究其本质而言，其终极的真实性都是应当被否定的，是虚无的、虚空的、虚乏的、虚浮的；人生在本质上是苦的；并且，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与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虽然它们都认为这个世界之上有着那样一位无限全能、全知全在的造物主；但是，它们两者对这样一位上天的认识却非常不同。在伊斯兰教看来，那位造物主是无限地高高在上的；世人只能远远地对他顶礼膜拜，却不能近身来到他的面前；而只能通过穆罕默德这位真主的先知来明晓真主的旨意和话语；世人必须要通过顺服，必须要通过遵守真主的诫命，才能够成为一个圣徒。在伊斯兰教中，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繁文缛节；人们必须要遵守那些各样的规定，以及每日按时祈祷等等，才能够被称为合格的穆斯林。简言之，伊斯兰教信仰体系是一种因行为称义的信仰；人必须在真主面前俯伏敬拜、五体投地、遵守许多繁文缛节，才能够得到真主的悦纳。这种因行为称义的信仰有两点问题。第一点是，一个真正内心诚实而谦卑的人，一定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知道，自己绝非是毫无瑕疵的；任何人的内心深处都知道自己的贪欲、撒谎、奸淫、自私、不恰当的怒气、自我中心等等根深蒂固的、本质性的毛

病与罪错；在这世上，任何一个被造之人在造物主面前，都无法说自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即，一个内心真正谦卑诚实的人，一定会在内心深处知道，人无法以自己的行为在上天面前称义。第二点是，一个因行为称义的信仰，一定往往会导致人心中愈演愈烈的自傲、自大、自义之心；因为，既然是以行为称义，那么，信徒们就会在彼此之间、或是与其他世人之间，进行某种"行为意义上"的比较，因而，（尤其是那些看似信仰敬虔的人们）有意无意地会认为，自己比别的人更加高尚、圣洁、敬虔。

基督教信仰体系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它是所谓"因信称义"的信仰；即，人应当、且只能够以信心，才能来到神的面前。人只有凭着那来自于上帝自己的救赎恩典，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这救赎恩典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且死后第三日复活，为我们成就了永生的救恩；凡是真心相信和接受基督救恩、真心承认和悔改己罪的人，就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无限美好的永生，进入那无限幸福美好的、属天的上帝国度。

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信仰诞生于公元一世纪（耶稣基督与公元元年左右降生于世；三十岁开始传道、三十三岁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日复活；圣经新约随后很快诞生）；伊斯兰教信仰诞生于六百年之后的公元七世纪；而它们两者都与更早之前的、犹太人的旧约圣经有着紧密而直接的关系（然而，伊斯兰教的可兰经虽然时常提到圣经旧约的摩西五经，也提到圣经新约中的耶稣，但显然，穆罕默德并没有真正完全了解圣经新旧约全书的内容，而是产生了许多一知半解的误解，以及许多支离破碎的扭曲式理解；例如，穆罕默德完全没有明白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预表与涵义）。圣经旧约是在从大约公元前十五世纪到大约公元前四世纪的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跨度中、由数十位先知笔者们所写成的、包含39本书籍的书集。圣经旧约的内容具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圣经旧约的核心主旨就是，上帝以犹太人民

族为百姓、为记者，以大量的历史、文字与预言向世人表明了，将要有那样一位造福全人类的救赎主来到世上，成就那无限美好的救赎恩典，建立那属天的、永远的、圣洁的、上帝的国度。整本圣经（圣经被称为新旧约全书；它包含着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圣经旧约与圣经新约；前者是对后者的预言和预表；后者是对前者的实现与成就）的主旨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科学的来源

在十六世纪以前，虽然人类中间也曾有许多重要的、基础性的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但是，这些古代科学技术发明都仅仅是零散的、零星的、个别的、支离破碎的事件，而不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层面的、大规模的、爆炸性的科学革命与发展。

并且，在十六世纪以前，世人往往沉浸在主观臆想的世界观体系中，而并不真正地重视任何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工作与思想。（至于为什么会如此，我们也会在本书的后面进行深入的讨论。）

起源于十七世纪的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分水岭是，在现代科学背后有一整套深思熟虑的科学思想与方法论。这些深刻的科学思想与方法论，以及哲学层面的思考与思辨，是来自于何处的呢？

我们在本书中将要阐释，这些科学思想与方法论方面的深思熟虑，以及哲学方面的思考与思辨，正是因着圣经的深刻影响而导致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那些现代科学开创者们的生平著作，回顾那些现代科学之父们的苦苦思索，就能够清晰地、轻易地看见这个结论。在本书的后面，我们会向读者详细地阐述有关方面的内容。从这个结论中，我们会深刻地认识到，若没有基督教信仰，若没有圣经的广泛印刷、发行与传播，那么，就不会有现代科学在思想层面的开启与革命。

简单地说，现代科学的开启，正是被这样一群笃信宇宙世界是出于那样一位无限大能而智慧的造物主之手所创造的基督徒思想家们所推动的。正是由于他们在信仰上的、对于上帝的坚定信靠，才使得他们坚信，这个宇宙世界虽然看似纷繁复杂，但是，在世界之上，却一定有着简洁美丽的、井井有条的秩序；并且，这样的规律与秩序一定是普遍的、一致的、遍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狂躁不羁地变化的。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这样一种系统化地建立知识、并对于知识进行组织和分类的方式；这种方式所得到的知识，是可以被检测的、是可以理性地解释的、是能够对于宇宙自然事物进行预测的。

正如一位著名科学家所说的："这个世界最不可思议之处，就是在于，它是可以思议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以科学性的、系统性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这个自然世界，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是出于造物主的无限大能的、智慧的设计与创造，而不是像一个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的垃圾堆一样。

———

科学的局限

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广泛影响早已经深入人心。科学系统观念的开启与发展，带来了技术与工程的不断更新与革命，并进而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每一个角落。今天，每一个早晨吃牛奶面包、坐地铁汽车出门、穿西服革履在高楼大厦上班的人，每一个在宜人的田野别墅生活的人，每一个享受着现代化科学技术果实的人，都应当深深地感谢科学，尤其深深地感谢那些现代科学的开启者们，因为若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现代化的富足生活与环境条件。

但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究其本质而言，科学并非是万能的，也不可能回答所有领域内的所有问题。在本质层面上，科学有着自身固有的一些局限。例如，这些局限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并不能研究那些在本质上属于一次性的事件。在本质层面上，由于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可重复、可检测、可分析、可观察、可测量的现象和事件，那么对于那些在这个世界上就其本质是属于一次性的事件，科学就无能为力。例如，关于这个世界的终极性起源，神迹，以及这个世界的终极性结局、归宿，科学是无法做出任何可验证的、可检测的分析与判断的。这并非是因为科学家的能力有限，而是因为科学就其根本定义而言，无法触

及到那些在本质上属于一次性领域的问题。

第二，科学并不能回答关于（终极）意义的问题。就其深刻涵义而言，所谓（终极）意义就是指，一件事情的终极性目的与价值。在实用层面上，科学可以描述一个现象、事件、对象等等的机理、运作过程和机制，但是，科学却无法指出那个现象、事件、对象等等的本质性意义、终极性目的与价值。举一个不是非常恰当的简单例子，例如，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麦克风，那么，说话的声音就会被麦克风转变为计算机系统能够读取的数字信号；这些数字信号可以在计算机系统屏幕上显示出语音的波形图，看起来就有点类似于心电图那样的图形；并且，计算机系统可以根据固有的算法，把所说的语言转变成文字，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等等。然而，就其本质而言，麦克风记录的那些语音波形图的背后，仅仅是一连串冰冷的数字、符号、数值；而在那语言中所包含的深刻爱情、涵义、价值、意义、信仰、等等，却是科学所无法触及的。无论一个科学多么复杂、多么先进、多么高深，它都无法面对关于终极意义这样的问题。

第三，科学无法回答那些在这个世界上无法看见、或是无法以可见的方式来验证、重演、展现的一般性问题。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关乎信仰领域的问题，是超越生死的问题，是在本质上属于超自然性质的问题；例如，人的生命来自于何处，死亡是否就是人生命的终点，永生是什么，等等。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些关乎信仰领域的问题，虽然是科学无法研究、无法展现、无法验证、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却并非是人无法用理性思考、无法知道真假的问题。在关乎超自然性质的问题上，虽然我们的思想与理性在本质上是有限的，但是，当上帝的启示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的良知就能够在上帝的启示面前，谦卑而诚实地明晓、认识到上帝所启示和显明的真理。关于信仰的真理、信仰的真实性问题等等，我们建议读者可以查考许多基督教信仰的护

教学书籍，例如《基督教的证据》《基督教之大众证据》等书籍；本书就不在这里过多地赘述。

第四，科学无法回答关于永远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称为美好，又将永生（永远）放在人的心中。”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人们虽然没有看见过“永远”，但是，在所有人的心中，都知道、明白关于“永远”这样的概念。在人类所有的语言和文字中，都有像“永远”这样的词汇。这正如中国诗人李白所写的名句：“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可是，关于“永远”的事情，却是科学所无法研究的。在科学的领域内，既无法测量、分析、观察“永远”，也无法对之进行展现、实验、操作、掌控等等工作。

类似于上述的科学局限性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就不在这里深入展开详谈。例如，科学无法回答关于“我”的问题——“我”是谁？“我”是什么？我们的自我认知究竟来自于哪里？我们的自由意志究竟是什么样的能力？我们真的能够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决定是否举手、是否抬足吗？亦或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举手抬足等等行为，仅仅是一些分子、原子在死板的物理定律作用下、电磁场力等物理力的作用下，而进行的一些没有自由、没有选择、我们所无法掌控的过程的结果？我们生命的本质意义在于什么？——还有：世界的本源（导因、意义、方向、目标等）是什么？道德的本源是什么？价值的基准在于什么？信仰的真理在于什么？——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科学所无法直接回答的问题。

我们怎么知道客观世界是真实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看见、听见、触摸到、闻到、感受到的一切事情，不是我们的感官系统在欺骗我们？我们怎么

知道我们所体会和经历的一切，不是像庄周梦蝶那样、仅仅是一场春秋大梦而已？庄子做梦变成了蝴蝶，一觉醒来，以至于不知道哪一个世界是真实的、哪一个是虚幻的；不知道自己的此世生命，是否仅仅是蝴蝶做梦变成了自己的梦境而已。

事实上，我们如果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去思想科学的本质，就会立刻认识到，科学必须建立在一些重要的、极其深刻的、隐含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些前提假设包括：——我们必须相信和承认，这个世界有着内在性的、普遍的、一致的、连续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换言之，这个世界不是杂乱无章的，不是躁乱地、毫无规律可循地变化的，而是秩序的、明确的、可理解的、可以用理性来认知的。例如，为什么位于一个地点位置的分子或原子，要和另外一个遥远距离之外的地点位置的分子或原子，遵循同样的规律、甚至通过遥远的空间而彼此互相之间具有力的作用与反作用？对于这样的问题的本质性回答，只可能是，这个浩大的世界是出于那位无限大能的造物主的创造，并且，这世界随时随刻地在造物主的掌管之下。如果离开了这样的假设前提、深刻信仰，那么，人就无法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本书后文所将要阐明的，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够被开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现代科学开启者们、那些敬虔的基督徒思想家们，在现代科学体系被真正开启之前，就已经深刻地、深思熟虑地认识到，科学能够研究什么，科学不能够研究什么，科学的目的是什么，科学的局限在哪里，等等。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若想要做好一件事情，往往应当首先（相对而言）清楚地知道，该事情的方向、目标、界限、局限等等；这样，在开始做事情的时

候，才能够知道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在什么领域和范围内专心致志，并知道进退、行止；这样，才能够真正把那件事情做好。现代科学的开启，正是如此。在十七世纪之前的数千年中，在人类的历史上，无数哲人、思想家、文士们，试图思考我们的人生与这个世界；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往往沉浸于那些主观臆想的论题、形而上的玄学中；他们试图以臆想的概念，去思索生命的本质、心灵的归依；然而，他们并不能凭"智慧"认识神；他们所作的，只是费尽心力失去了神。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些现代科学之父们，正如同人类历史上那些第一个发明了车轮、门轴、窗户的人；他们虽然是不完美的，他们的知识也不是毫无瑕疵的；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是真正深邃的；他们就如同是聪明的建筑师，搭起了一个宏大的框架，使后人可以在他们的基础上添砖加瓦，盖起科学的大厦。他们思想的深邃之处正是在于，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自身的诸般能力（包括理性、智慧、认知、价值、意义等等）的局限在哪里；这正如弗兰西斯·培根在1595年的著作中所说的：——"人若不像是小孩子，就不能进入天国；同样，人若不在心思意念上像小孩子，就不能认识这个世界。"——这句话，正是出于培根在圣经中所受到的启发。

对于现代科学之所以被开启的深刻原因，我们会在本书后文中继续深入讨论。

科学的影响

今天，科学在现代人生活中的影响如此深入而广泛，以至于无人能够否认。大到航天飞机、人造卫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小到每一个人手中的手机和汽车遥控钥匙，以及餐桌上的各样丰富食物与各种材料的用具等等，这些在我们生活中数不胜数的东西，都在展现着科学的力量。

对于现代人来说，科学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在物质生活方面。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影响深刻地体现、反映在人的思想层面上。正是因着科学，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能够认识到，那些古老的、各种各样的光怪陆离的迷信、偶像（即，世人常常把那些人手所雕刻的金像、石像、木像等等看作是有灵气的、人所应当五体投地敬拜乞求的对象）、臆想、愚昧观念等等是错误的。

____

一个例子

例如，在今天的世界里，不论是在哪一个国家、文化、民族中，所有的初中生都要学习牛顿运动定律。

1687年，牛顿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部开启现代科学体系之里程碑的著作中，牛顿陈述了几个重要的基本运动定律。这被后人称为牛顿三大运动定律。

牛顿第一定律是指，任何物体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在这个著名的惯性定律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深刻的世界观：即，这个物质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死”的；它并没有原发性的本质能力；换言之，那种万物有灵的世界观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推论说，人生命的盼望、价值、终极意义，不在这个世界里面，而是在那属天的、属灵的、永恒的上帝国度之中。】

牛顿第二定律是指，任何物体在受到外力作用下，其加速度与所受的外力成数学意义上的正比关系。【在这个著名的加速度定律背后，同样隐含着这样一种深刻的世界观：这个世界的本质与人的心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关系；在这个世界的本质之中，包含着重要的、只有人才能够明白和掌握的数学性质与原理；换言之，在造物主与人之间，有着一种极其深刻而特殊的关系：——理性、数理、逻辑等等，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才能够有的能力。】

牛顿第三定律是指，任何物体在受到作用力的同时，也会以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反作用于施力方。【在这个著名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里面，隐含着这样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是地位均等的被造之物；并没有什么地点、物体，具有与其他地点、物体不同的特殊性和特殊地位；换言之，在造物主之下的自然世界中，一切事物、东西都是来自于那造物主的创造与智慧设计，因而都是彼此在本质层面上平等的。】

（引述百度百科）——牛顿三大定律：牛顿运动定律包括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和牛顿第三运动定律三条定律，由艾萨克·牛顿在1687年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总结提出。其中，第一定律说明了力的含义：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第二定律指出了力的作用效果：

力使物体获得加速度；第三定律揭示出力的本质：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牛顿运动定律中的各定律互相独立，且内在逻辑符合自洽一致性。其适用范围是经典力学范围，适用条件是质点、惯性参考系以及宏观、低速运动问题。牛顿运动定律阐释了牛顿力学的完整体系，阐述了经典力学中基本的运动规律，在各领域上应用广泛。

———————————————————

科学的影响，打破了世上的那些偶像假神、愚昧迷信，打破了世上的那些盲目的宗教信仰体系，促使人以理性、诚实和认真谦卑的态度，深思自己的信仰。无论是那些在日本靖国神社门前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升学、娶妻、生子的日本百姓，还是印度庙里那些向偶像与牲畜跪拜的印度教徒，亦或是那些闭关灵修、想要大彻大悟的佛教徒，亦或是在非洲原始宗教中敬拜各样被造之物的愚昧迷信者，如果他们是内心诚实的，那么，在科学的影响面前，他们都不得不在内心深处反思自己的所谓信仰，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真理。

科学的影响，打破了古代各样人类传统中偶像的风俗、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以及迷信愚昧的、怪力乱神的、所谓“到处拜拜的”、民间宗教信仰传统。从根本上说，科学的影响，在人们的思想层面带来了两个可能的后果。第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人们误以为，在这个世界之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灵，也根本就没有什么造物主；一切物质现象、事件、过程，都仅仅是在物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而已。第二个可能的后果就是，人们摒弃那些怪力乱神的偶像、自然神主义、泛神主义、多神主义，而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之上，有、且仅有一位神（否则，世界就不会如此秩序、和谐、并且有着无远弗届的规律），就是那无限大能的、超乎一切之上的、圣洁公义的永生之神；人生的

真正意义与盼望，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够真正寻找到。

在上述两个后果中，前者是肤浅的、盲目的，是没有经过深思、没有谦卑思索的结果。（一个简单的反驳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的认知、意识、“自我”，来自于何处？我们的自由意志来自于何处？） 后者是任何一个诚实而谦卑的人，都必会得出的结论。在本书的后文中，在关乎现代科学之意义与起源的讨论中，我们将要继续深入思考这个话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严复与天演论

以下引述关于严复及其著名译作《天演论》的相关文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下）》 关于严复思想的历史回顾】

中国近现代的科技思想观念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发展观念被赋予了强烈的富国强兵、“落后就要挨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色彩。

从晚清时代开始，大批留学生回国以后，把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与思想带回了中国。然而同时，许多西方思想中的糟泊也被带回中国，被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误认为，或是被曲解为是真理。这些误解，影响了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已经超过一百年。

其中最为典型代表的，就是严复先生。当年，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在晚清引起巨大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给当时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带来巨大冲击。该书虽然以生物进化论为内容，但却讲述了一个看似非常有道理，并看似非常具有时代契合意义的概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二十世纪初，这个概念对于那些忧国忧民的中国“有识之士们”影响如此深刻，以至于，像胡适之（即后来的中华民国的著名政界、知识界人士胡适）这样的人，专门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适之”，以表明“适者生存”的思想精髓。

严复先生译作思想中所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影响了过去一百多年中、很多代中国人心中最深刻的思想意识，甚至直到今日。例如，就

在严复译作出版以后不久，孙中山先生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此呼吁中华民族推翻满清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因为，民主政治是世界的潮流，中国人如果不急起直追，赶上这个潮流，就会被世界甩在后面。

几十年后，毛泽东先生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是基于这样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权即真理、用实力说话”等等中国大众所共同拥有的潜意识思维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有另一句著名的话：“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并且，中国共产党建国所依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建基于这样的“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类历史，正如人从猿不断由低向高进化一样，不断地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由低向高发展。那个曾经在西欧大陆上空飘荡的幽灵（正如《共产党宣言》中第一句话所说的），却在东欧俄罗斯、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等地开花结果了。

我们将在本书后文、第十二章中简要地涉及西方现代思想学术界的现状，也将会简单地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中的糟泊及其影响。在这里，让我们继续聚焦于中国在近现代的主流思想观念。

严复所翻译、提出的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对于现代中国人的影响如此之深刻、如此之广泛、如此之深远，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中国人的言谈中，在媒体舆论中，处处看到它的影子。例如，中国人在教育子

女方面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很多中国人对于许多事物的看法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以实力说话”；等等等等。

【关于达尔文进化论，我们以后将在其它书籍中专门讨论和反思。在这里，我们仅仅是简单地指出一个事实：——不论达尔文进化论看似多么高深、多么有道理，但是，直到今日，却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无论是实验室证据，还是考古学证据，化石证据等等，能够证明生物物种之间的进化。】

严复所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是舶来品，虽然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特殊的国家政治局面背景，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个思想之所以在中国受到如此巨大的欢迎，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的确与中国古代所谓“天人合一”思想是不矛盾、甚至是很契合的。

在中国古人看来，人生的哲理就是在于，人应当效法自然世界、应当与天地之理合一。所以，现代中国人认为，既然，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进化、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丛林法则所主导的世界，那么，每一个世人就也应当如此，不断地努力奋进、拼搏奋斗、争取成为人生的赢家。

____

固然，人应当勤勉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努力地做好各样所应当做的事情，努力地秉公行义、以恩慈待人，努力地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等等。但是，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所谓道理，真的是真理吗？难道，这就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真正动力吗？让我们接下来，继续深入回顾和反思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观念背后的深层次、本源性问题。

严复的《天演论》与《原强》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乳名体乾，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愈壄老人，福建福州府侯官县（民国初年与闽县合并为闽侯县，今福州市）人，祖籍河南固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曾为复旦大学校长，京师大学堂校长，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严复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著作。他的译著在当时影响巨大，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维基百科）

接下来，我们简单介绍严复所写的两个著名段落。

一句话是出自严复的长篇议论性文章《原强》，总结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状态：“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

另一段话则更为著名，是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原著《天演论》之导言的开篇

段落：——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列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上述文字的大致意思是：——赫胥黎坐在室内，眺望窗外的山坡草地，联想到，在这些草原上，在两千年前凯撒大帝来到英伦之前，是怎样的情境；在那草木之中，虽然看似平静，但却充满着惊心动魄的斗争，充满着弱肉强食的生死之战；这些灌木丛林，不仅要互相争夺土地和生存空间、彼此争雄，而且要与严寒酷暑的天气相争，与四面吹来的海风搏斗，承受鸟兽的践啄与蚁蝝的啮伤；如此“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如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有谁会在乎它们呢？有谁会关心它们呢？有谁会诘问它们呢？

____

上述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的文字，就是以严复为代表的、一大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第一代中国留学生所带回给中国人的“西方思想”。

在过去一百年中，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把这样的思想视为至宝，更把中国古代文人哲士的所谓“天人合一”观念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从此，——中国人把达尔文进化论看作是金科玉律，是不可动摇的科学真理；把人生看作是竞技场，是你争我夺的赛马场；把世界民族之林看作是彼此争雄、互相别苗头、互相争风吃醋、互相为己国争光、互相不服气的、丛林法则所主导的世界；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列强争霸、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把真理看作是强权的丫鬟，把输赢看作是人生的至理，把“活着”看作是人生的最大目的。甚至，思想深刻的诗人会这样写下万般无奈、深深悲哀、流传广泛的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

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在现代中国人的主流思想中，一定对于这样的话语非常陌生：——

圣经—诗篇
8:3 我 观 看 你 指 头 所 造 的 天 ， 并 你 所 陈 设 的 月 亮 星 宿 ，
8:4 便 说 ， 人 算 什 么 ， 你 竟 顾 念 他 。 世 人 算 什 么 ， 你

竟 眷 顾 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七世纪满清入关、统治中国以后，就一直把山海关以外的中国东北地区视为禁地、看作是满族人自己的龙脉之地，严加把守，禁止长城以南的汉族人迁徙到东北。这种局面，一直到十九世纪、清朝开始衰落的时候，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十九世纪，山东、华北等地发生了黄河改道、洪涝旱灾等大规模自然灾害，数以百万计的当地人民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因而，轰轰烈烈的"闯关东"开始了。许多山东人迁移到土地肥沃、面积广大的东北大平原地区务农谋生。所以，今天的许多中国东北人（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的祖先，都是山东人或华北人。

1900年，中国华北等北方地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随后进入北京，拯救和保护驻京的外交使团。在这个过程中，英法等军队经由渤海湾、从海上在天津港登陆、向北京进发。而俄罗斯军队则经由中国东北地区向北京进发。1901年以后，当中国社会从1900年的义和团无法无天、杀人放火的暴乱中逐渐恢复平静、恢复法律秩序的状态以后，八国联军中、除了俄罗斯军队以外的其他国家部队，都很快从中国领土中撤走了。

然而，俄罗斯军队却厚颜无耻地在中国东北赖着不走【这正如：——大约半个世纪以后，在二战结束的时候，英美联军很快从西欧各国撤走、恢复了当地各国的民主自由选举制度，但是，苏联红军在东欧各国打败纳粹军队以后、厚颜无耻地赖着不走一样；从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将近五

十年漫长历史时期中，苏联的铁拳统治给无数东欧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苦难与灾害】。1900年以后，俄罗斯实质上占领着中国东北广大地区、统治着当地广大人民，做着许多欺压、迫害、剥削等等不公不义之事。

此时，日本作为一个刚刚经历了明治维新、试图“全盘西化”的“现代化国家”，在朝鲜半岛、乃至中国东北地区都有很多私利的诉求。所以，日本政府向慈禧太后所领导的晚清政府“自告奋勇”，“帮助”中国把俄罗斯从东北清除出去。慈禧太后的晚清政府厚颜无耻地在这场发生于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过程中“保持中立”。

+++

+++

+++

+++++++++++++++++++++++++++++++++

+++

+++

+++

+++++++++++++++++++++++++++++++++

（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4%BF%84%E6%88%98%E4%BA%89

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日语：日露戦争；俄语：**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是大日本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为争夺在朝鲜半岛和满洲地区的势力范围的战争。主战场位于辽东半岛，以及朝鲜半岛一带海域。

日俄战争中，俄罗斯帝国遭遇连场败仗，最终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斡旋下，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战争结束。俄罗斯帝国在日俄战争失败后，损失了用作维持其帝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国内自此动荡不安，爆发一连串革命事件。俄军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是1905年爆发的血腥星期日革命事件最直接的导火线。

日俄战争有不少总体战的特点，双方皆大规模动员军队，以及其所需的庞大补给，该场战争形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场预演。许多技术创新都首次用于日俄战争，如速射炮、机枪和射击准度更高的卡宾枪都在日俄战争中首次被大规模使用。1889年研制成功的苦味酸（下濑火药）亦被投入日俄战争，在1905年对马海峡海战的诸多记录中，都记载了下濑火药的极佳表现。

日俄战争是近代史上，亚洲国家打败欧洲国家的第一个主要战事，欧洲从此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改观，日本的国际地位提升，也让国内军国主义的力量上升，大日本帝国成为与欧美各国无异的新帝国主义国家。

历史背景

俄国扩张

俄罗斯帝国作为当时世界主要强国，一直扩张版图。自十七世纪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力行改革，并击败其劲敌瑞典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欧洲衰弱的列强并渐渐走向近代化，迁都圣彼得堡，并开始扩张到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到了1890年代，帝国已经将其国土延伸至中亚，国土由西面的俄属波兰开始一直到东面堪察加半岛。俄皇尼古拉二世在位时，俄罗斯政治中的

第一位是远东的“大亚洲计划”。在与德皇威廉二世皇帝会晤时尼古拉直言不讳地说，他认为加强俄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是他的统治任务。随着西伯利亚铁路及海参崴港口的建造，俄国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远东的控制。由于海参崴只能在夏季运作，俄罗斯帝国一直在寻求一个太平洋不冻港供其舰队使用。

在华势力范围的争夺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马关条约》签定，日本取得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获得了辽东半岛的主权。此事严重威胁到俄国意欲侵占中国东北而取得远东不冻港的战略意图，于是联合德国和法国出面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即三国干涉还辽。日本最终与清政府签订《辽南条约》归还辽东半岛。

1896年6月3日，中俄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条约中将中国东北不少权益拱手让予俄方，以寻求俄国的“保护”以抗衡日本，使国门大开，俄军此后能长驱直入北京。如达成租借旅顺港协议，1897年12月，一支俄国舰队出现在旅顺港。此举同时解决了沙俄海军需要不冻港的需求，并在当地修筑防御工事，及部署舰队。条约亦约定，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一条铁路至海参崴，便于俄国运输军队。在1897至1903年间，俄国与清政府在东北建造了一条由哈尔滨通过沈阳到旅顺港的东清铁路。东清铁路由清政府及俄国共同拥有，这不仅是一条铁路，还包括铁路沿线区域的管辖权，管理权由双方分担，这条使用俄国轨距的铁路由驻东北俄军保护下建造。铁路公司总部设于俄建新城市哈尔滨。

俄国亦开始扩展至朝鲜半岛。在1898年，俄国已经取得图们江及鸭绿江附近的矿场及森林，此举引致日本的不安。因应俄国威胁，伊藤博文提出与俄国修好，并代表日本政府与俄国谈判，他认为日本并未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去对抗俄国，所以他提议俄国控制中国东北以换取日本控制朝鲜半岛。俄国拒绝了伊藤博文，并进一步要求以朝鲜半岛39度设立两国间的中立缓

冲区。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组成联军，日俄两国都有派兵参与八国联军。其中俄国以保护领事及在华资产为由，在八国联军之外，另以20万大军非法侵入满洲。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任俄军总司令，国防部长兼陆军大臣亚历克塞·库罗帕特金为总参谋长，以保护俄国修筑的中东铁路为名，出动18万军队，从瑷珲、满洲里、珲春、三江口、旅顺等地，分六路进入东北，烧杀抢掠，遭遇当地清军抵抗。10月1日，俄军攻占省城奉天。从旅顺乘4艘军舰出发北进的俄军亦在当天于山海关登陆，4日占领锦州，切断关内外联系。6日，各路俄军在铁岭会师。至此，东北三省全境落入俄军控制。俄军入侵东北后在通化、海龙一带遭到抵抗。当时，俄国派遣了177,000余士兵至东北保护铁路。在义和团运动过后，仍有十万俄军驻守东北。虽然向外保证在危机过后就会撤出，但实际上增强了在东北的部署。到了1903年仍然未有撤军时间表。

对于俄国侵吞满洲的企图，日、英、德等国均出面干涉要求俄国从东北撤军，美国和法国也表示反对。俄国因慑于列强干涉，于1902年4月，俄清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中确定俄军将分三个阶段撤兵满洲，以六个月为一阶段。然而，俄国只在第一期履行约定撤兵，于1903年4月第二阶段撤兵期限时违反约定，更于1903年4月18日告知清廷外务部另提《七项撤军新条件》，其中有“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变相侵吞满洲的条款，并重新出兵占领沈阳。其后，俄国沙皇设置“亚东大都督”，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远东总督统治满洲。
在接到《七项撤军新条件》的第二天，清廷外务部官员将俄国《七项撤军新条件》的内容透露给日本驻华外交官。日本与俄国进行交涉，要求俄军撤退，但遭俄方拒绝。1903年日俄谈判破裂。1904年2月6日日本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并宣布断绝日俄外交关系。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在未宣战的情况下攻击停泊在旅顺港的俄罗斯旅顺舰队。2月9日俄国对日宣战。2

月10日，日本政府亦正式对俄罗斯政府宣战，日俄战争爆发。

开战时双方的军事部署

战前准备

俄国因为一直将军事重点放在欧洲，因此在远东地区只有正规军9万8千余人，太平洋舰队共有60余作战船舰。而日军共有37万5千名陆军，配备专用适合东北战场的山炮，日本海军战舰共达80艘。

日军部署

海军第一舰队与第二舰队负责封锁驻扎在旅顺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而第三舰队则前往对马海峡确保制海权。在确保制海权后，陆军第一军登陆朝鲜半岛并负责驱除半岛上的俄军，第二军则前往辽东半岛建立桥头堡以孤立旅顺。之后，再与后续的第三军、第四军合流，于中国的满洲地区共同扫荡俄军主力。在原定的计划中，也包含对俄领海参崴的攻击。同时，日本海军也预计在歼灭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后，波罗的海舰队将会从欧洲前来增援。在此役中，日本海军首次被提高到与陆军同等的地位（以往多以支援陆军的任务为主）。

俄军部署

俄军预测日本将于朝鲜半岛南部登陆，于是在鸭绿江附近集结大量俄军以迎击北上的日军。如果在鸭绿江未能阻挡日军的攻势，则顺次撤退至哈尔滨以诱敌深入，等待日军补给线延长后再一举消灭。至于太平洋舰队则以避免与日本主力决战为主，以等待波罗的海舰队增援。

战争经过

开战

1903年日俄谈判破裂。1904年2月6日日本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并宣布断绝日俄外交关系。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在未宣战的情况下攻击停泊在旅顺港的俄罗斯旅顺舰队。日军的攻击只损伤俄军几只舰艇，并没有为俄罗斯舰队带来重大的损失。在同一天，由第二舰队瓜生战队护卫的陆军先遣部队第12师团在朝鲜的仁川登陆。瓜生战队于翌日（2月9日），在仁川

港外遭遇两艘俄罗斯巡洋舰，成功击退对方并让对方自沉。

1904年2月9日俄国对日宣战。2月10日，日本政府亦正式对俄罗斯政府宣战，日俄战争爆发。然后于2月23日，日本政府再与大韩帝国签订协议书，以确保日军在朝鲜的补给线不会受到干扰。

开战时，日方主力舰队如下：

联合舰队

司令官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参谋长加藤友三郎海军少将。

第一舰队

司令官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兼任），旗舰“三笠”

第一战队：（司令官三须宗太郎海军中将），旗舰“日进”，战舰（三笠，敷岛，富士，朝日），装甲巡洋舰（春日，日进），通报舰（龙田）。

第三战队：（司令官出羽重远海军少将），旗舰“笠置”（舰长山屋他人海军大佐），巡洋舰（笠置，千岁，高砂，吉野号防护巡洋舰）。

第二舰队

司令官上村彦之丞海军中将，旗舰“出云”

第二战队：（司令官岛村速雄海军少将），旗舰“磐手”，装甲巡防舰（出云，吾妻，常磐，八云，浅间（舰长八代六郎海军大佐），磐手），通报舰（千早）。

第四战队：（司令官瓜生外吉海军中将），旗舰“浪速”，巡洋舰（浪速，高千穗，明石，对马），其后日本海战前5月24日巡洋舰“音羽”（舰长有马良橘海军中佐）归队。

第三舰队

司令官片冈七郎海军中将，旗舰“严岛”

第五战队：（司令官武富邦鼎海军少将），旗舰“桥立”，巡洋舰（严岛，松岛，桥立），装甲巡防舰（镇远），通报舰：（八重山）。

第六战队：（司令官东乡正道海军少将），旗舰“须磨”，巡洋舰（须磨，和泉，千代田，秋津洲）。

第七战队：（司令官东乡正道海军少将），旗舰“扶桑”，装甲巡防舰（扶

桑），炮舰（高雄，筑紫，鸟海，摩耶，宇治）
俄罗斯旅顺舰队按照原定的计划，在开战后一直待机于旅顺港，以避免与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决战。有见及此，联合舰队从开战后直到5月期间，故意在旅顺港的出入口炸沉几艘废弃的商船与军舰以封锁港口，但行动最后没有成功达到预定目标，是为旅顺口闭塞作战。在作战过程中，于4月13日，联合舰队使用港口铺设的水雷成功炸沉一艘旅顺舰队的战舰，使旅顺舰队的司令官战死。然后于5月15日，轮到联合舰队的战舰“八岛”和“初濑”被俄罗斯旅顺舰队的水雷击沉。

另一方面，驻扎在海参崴的俄罗斯舰队，乘日军联合舰队主力集中在旅顺之机，不断的威胁日军的海上航线的安全。为了应对海参崴舰队的威胁，日本海军把原先驻防日本海的第三舰队撤回，改而派出由上村彦之丞中将率领的第二舰队前往应对。但结果第二舰队不仅没有捕捉到海参崴舰队的主力，反而于4月25日被俄军击沉一艘运输补给舰“金州丸”。此时被俄军俘虏的海军少佐，于战后被日军免官。

另一方面，由黑木为桢大将率领的日本陆军第一军按照原定计划登陆朝鲜半岛后，于4月30日-5月1日期间在安东（现在的丹东市）近郊的鸭绿江边击破了俄军，是为鸭绿江会战。之后由奥保巩大将率领的第二军也按原定计划在辽东半岛的盐大澳登陆，并于5月26日攻陷了位于旅顺半岛末端南山地区的俄军阵地（南山战役）。南山阵地与旅顺要塞一样，是俄军历年经营非常坚固的基地，为了攻陷该阵地，日军第二军的死伤者合计超过4,000人。巨大的牺牲人数震惊当时位于东京的日军大本营。而第二军在顺势占领大连后，留下第1师团驻守，余军则北上直指辽阳。6月14日，于得利寺击退南下支援旅顺的俄军（得利寺会战），再于7月23日在大石桥取得胜利（大石桥会战）。

至于海军，之前虽然按原定计划在旅顺口实行港外奇袭和旅顺口闭塞作战，企图歼灭驻防旅顺港的俄国舰队，但效果不佳，旅顺舰队仍然保存相当的战力，对日军的海上运输继续造成威胁。一直至3月上旬前，日本陆军一直认为只需要监视驻防旅顺的俄军而不用发起攻击，但于3月14日，发现

还有部分俄军战力处于北上的2个军后方，有可能对日军做成威胁，于是便决定抽调两个师团以准备攻击旅顺要塞。此时，海军方仍然坚持“海军单独对付旅顺舰队”的观点，并继续单独进行对旅顺港的闭塞作战。在3月27日，海军进行第二次闭塞作战，结果仍不佳。进入4月，海军起初仍然徒劳的坚持“独自对付旅顺舰队”的主张，拒绝和陆军协同作战。为此，4月6日大山岩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参谋次长和伊集院五郎军令部次长的协商决议中，首次出现“陆军将应海军要求攻克旅顺口”的字样。在协议后，海军的策略修正为封锁作战，并在旅顺口外布设水雷，但仍然未能彻底封锁旅顺舰队。

两军于旅顺持续僵持至5月后，日军得知俄军波罗的海舰队将马上前来增援。若与尚完整的旅顺舰队会合，俄国海军在远东的实力将会是日本联合舰队的两倍。在紧迫的情势下，日本海军唯有改变策略，重新要求陆军参与对旅顺要塞的攻击。因为之前的耽误，致使本来以攻击要塞为主要任务的第三军的编成时间延迟，一直等到5月29日才发布第三军的战斗序列。第三军的战斗序列由东京大本营编成，以曾经参加过甲午战争的乃木希典作为司令官。

于6月30日，日本陆军把指挥权由东京大本营移交到满洲军总司令部，至此，满洲军之组织如下：

满洲军 总司令官大山岩元帅陆军大将，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陆军大将。

第一军 司令官黑木为桢陆军大将。

近卫师团（师团长浅田信兴陆军中将），第2师团（师团长西宽二郎陆军大将，后换为西岛助义陆军中将），第12师团（师团长井上光陆军中将），兵站部后备步兵十二大队，同骑兵（支队长秋山好古陆军少将）、炮兵各一中队，并同工兵若干。

与第一军随行观战武官团之各国武官计有25位。

第二军 司令官奥保巩陆军大将。

第3师团，第4师团（师团长冢本胜嘉陆军中将），第6师团（师团长大久保春野陆军中将），后备步兵第11旅团，骑兵第1旅团，野战炮兵一旅团，兵

站部后备步兵二大队，工兵一中队。另总司令部付总予备第8师团（师团长立见尚文陆军中将）。

第三军 司令官乃木希典陆军大将。

第1师团（师团长松村务本陆军中将），第9师团（师团长大岛久直陆军中将），第11师团，后备步兵第1旅团，同第4旅团，野战炮兵第2旅团，攻城特殊步队（攻城炮兵司令官丰岛阳藏陆军少将，并兼第3军炮兵部长），（并包含由第1军转属的野战重炮兵）。尔后再加入第7师团（师团长大迫尚敏陆军中将，原团部驻防地日本旭川，1904年11月20日由大连登陆并入第3军），后加入骑兵第2旅团。

第四军 司令官野津道贯陆军大将。

第5师团（师团长木越安纲陆军中将），第10师团（原师团长为川村景明陆军大将，后调为鸭绿江军司令官，师团长换为安东贞美陆军中将），后备步兵第10旅团，兵站部后备步兵二大队，同工兵一中队，后加入后备第3旅团，及后备第11旅团。（独立第10师团，于1904年5月19日在辽东半岛大孤山登陆，尔后扩编成第四军。）

鸭绿江军 司令官川村景明陆军大将。

第11师团（师团长鲛岛重雄陆军中将），后备第1师团（师团长阪井重季陆军中将），后备第16旅团。

于6月8日，第三军司令部到达大连，然后与之前从原第二军中抽出的两个团（第一、第十一师团）合流。合流后的新军团在6月26日到达旅顺的外部。6月30日，大本营向陆军发布开始旅顺会战的指令。然后在7月12日，山县有朋参谋总长对伊东祐亨海军军令部长发出攻占旅顺基地，消灭或驱逐敌舰队的命令。8月7日，日军海军陆战重炮队开始炮轰旅顺港内的俄军军舰，使旅顺舰队出现损伤。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损失，旅顺舰队总督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列克塞耶夫决定在8月10日往海参崴方向突围，但在突破时却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的攻击，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不得不退回旅顺港内(黄海海战)。在此役后，旅顺舰队几乎完全失去战斗力。与此同时，海参崴的俄军舰队虽然仍然在日本海威胁日本的补给线路，但于8月14日，被

日本海军第二舰队于蔚山冲发现并发生战斗，海参崴舰队多艘军舰被击沈后丧失继续干扰日本补给线的能力，是为“蔚山海战”。

虽然在黄海海战后，俄军旅顺舰队已经丧失出击的能力，但在日军不能确认俄军的军力情况，还是在8月19日发动第一次旅顺总攻击，掀开旅顺会战的序幕。在第一次攻击后，日军死伤者超过15,000人，但还是未能攻下当时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要塞。另一方面在8月末，由野津道贯大将率领的第四军和日军第一军、第二军，逐渐向辽阳逼近，并在8月24日-9月4日期间开始辽阳会战。日军第二军从南边往辽阳的俄军阵地正面攻击，而第一军则从阵地东边的山地迂回到俄军背后进行夹击。此场战役以俄军全军撤退，日本占领辽阳而结束。从辽阳撤退的俄军在10月9日-10月20日的沙河会战中，在辽阳与奉天（现在的沈阳）之间的沙河尝试对日军反攻但最后失败。

10月15日，俄军的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率领由波罗的海舰队改编而成的俄军第二太平洋舰队，从利耶帕亚出发前往旅顺支援（旅顺被日军攻陷后改往海参崴）。

旅顺会战

陆军第三军在在第一次总攻击后，仍然持续的对旅顺要塞发动攻击。在8月到10月期间，日军从大弧山不断的向旅顺港发动观测射击，加上于早前黄海海战中海军的打击，使俄军旅顺舰队几乎陷入全灭状态。但由于日军一直未能确认港内情况，致使后来的作战出现混乱。

在浴血奋战突破旅顺要塞东北的防卫线后，第三军占领在旅顺要塞背后的望台山，使旅顺全港暴露在日军的俯瞰下，也达成海军请求的目标。之后第三军分别于9月19日和10月26日分两阶段发动第二次总攻击。此次攻击是为了占领盘龙山，大顶子山周围的阵地，以确保第一次总攻时已经占据的突出阵地不会被俄军孤立。这次总攻在203高地以外地区基本达成作战目标，但位于中央最关键的203高地却遭到俄军激烈的反抗没有成功。虽然这次攻击中，日军也成功攻下差不多能俯瞰全旅顺港的海鼠山，但由于还是未能观测到旅顺舰队主力所位处的海域，所以海军再度对陆军发出攻击203

高地的请求。海军的请求得到大本营的认可，但第三军却在主攻目标方面与满洲军司令部出现分歧，一直直到大本营取得天皇敕许后才开始行动。由11月26日开始的第三次总攻击在日军进入阵地战的情况下陷入苦战。乃木希典在战斗途中决定暂停攻击要塞的东北边，该而进攻203高地。在得知情况陷入胶着状态后，大山巌元帅命令儿玉源太郎满洲军総参谋长前往前线协助指挥，并加入乃木部队于203高地的战斗。

203高地争夺战是典型的攻山头战役。战斗先由日军第7师团与第1师团残存部队主攻，之后的战术由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定案日军28个联队使用舟波性的攻击，每隔15分钟部队发起一次冲锋。当时俄国守军的武器上有两个优势：日军所没有的手榴弹与马克沁重型机枪，该战役中日军伤亡有近半亦由马克沁机枪造成。而俄军方面在辽东地区的总司令官是施特塞尔中将（在肯德拉切夫中将12月15日战死于东鸡冠山北堡垒后继任），旅顺要塞司令官是史密鲁诺夫中将，旅顺港司令官为古雷葛勒维其少将。旅顺地区全部俄国守军约42,000名，大炮640门，军营52处。在203高地争夺战中日军战死5,052名，且日军战场指挥官乃木希典的次子乃木保典少尉于11月30日战死于此役中的203高地西北坡（在战死之地竖有一个碑“乃木保典君战死之所”）。而乃木希典的长子乃木胜典中尉在参与第2军（由辽东半岛盐大澳登陆）南山战役中身受重伤，5月27日傍晚5点30分伤重不治死于金州陆军野战医院。（此役日军死伤4387名并获胜。在金州俄守军1个师约1万7千名、火炮131门，在南山（扇子山）的俄守军为西伯利亚第5团约4,000多名，此役俄军伤亡约1,100名并败走撤退）

日军在1904年12月5日拂晓发起攻击。先由炮兵重炮（当时从日本东京及大坂190门海岸防卫用的大口径直径28cm的霰弹重炮中紧急运来18门支援旅顺第3军，一发炮弹有300kg重）轰击建立在山顶的俄军阵地，在轰击的掩护中步兵第27联队集成第三中队冲锋占领203高地西南山顶，接着步兵第28联队集成第一中队肉博冲锋占领203高地东北山顶，傍晚再由集成步兵第25联队攻占203高地中央山顶。根据日军战场记录显示，当日军攻下203高地的西南山顶、东北山顶以及中央山顶时，山顶俄军阵地里几无一人存活，俄

军可以说是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在经过一轮激动战斗后，日军终于在12月5日攻占203高地。12月5日傍晚，日军炮兵在203高地的山腰使用重炮炮轰旅顺市区内的俄军要塞，并歼灭港口中从退守旅顺港的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该舰队司令官斯捷潘·马卡罗夫海军中将已于1904年4月13日战死，海军士气低落）残馀的舰只十馀艘。之后第11师团攻占东鸡冠山的俄军永久堡垒东鸡冠山北堡垒，12月28日第9师团再占领二龙山的俄军永久堡垒二龙山堡垒，31日第1师团攻占松树山堡垒。

第三军在随后继续追击旅顺地区附近的残余俄军，在1905年1月1日突破了东北方面的防卫线占领虎头山望台堡。虎头山望台堡战役为旅顺攻围战的最后一场战斗。在203高地被日军占领的时候，旅顺舰队的俄军水兵因为舰队早以失去战斗力，所以已经提前上岸投入到要塞保卫战。203高地的消耗战耗尽俄军的预备队，正面堡垒的陷落使得俄军士气低落不堪，俄军指挥部里主战派将领失去支持，于是在当日下午4时半，决定向日军投降。1905年1月2日下午1点，俄军参谋长雷伊斯与德西建史诺维其上校在原清朝北洋水师营的农舍，等候日军第3军参谋长伊地知幸介交涉受降条件。1月5日乃木大将，及其参谋长伊地知，与旅顺俄军辽东地区总司令官施特塞尔中将，及其参谋长雷伊斯，在北洋水师营的农舍签定旅顺俄军投降书。1月14日在水师营的东边由乃木希典主持战没者招魂祭，并朗读祭文。

此后乃木希典率领第三军前往沙河，两军持续对阵，俄军在新任的格列宾堡大将领导下，在1月25日开始往黑沟台（日军最左翼）继续反攻。这次反攻曾经一度让日军陷入苦战，在秋山好古少将、立见尚文中将的奋战下才脱险（黑沟台战役）。

奉天会战

在奉天会战前，以辽阳西北的二公台为起点，日军满洲军总司令部在奉天由西往东（至抚顺）布置第3军，第2军，第4军，第1军，及鸭绿江军组成的包围战线，日本军共25万名。俄国方面，远东军总司令官亚历克塞·库

罗帕特金大将（俄国远东地区总督为阿雷库塞也夫大将）率领的37万名俄国陆军（当时俄国全国陆军约300万）。

1905年2月20日，日军总司令部在烟台对各军司令官发下奉天会战的作战命令，而各军除再作师团部队调整外，并加入后备军，组织辖下第3师团（师团长大岛义昌中将），后备第1旅团，后备第13旅团，及后备第14旅团。2月21日起，日军右翼开始对俄军攻击。3月1日，日军左翼的第二军和第三军从侧面迂回到俄军背后准备包围奉天。此时俄军投入预备队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向乃木希典指挥的第三军发起猛攻，使第三军接近崩溃。虽然如此，第三军在面对俄军正面攻击下，还是挡下俄军的攻势，成功切断哈尔滨与奉天间的铁道联系，给俄军造成决定性的打击。3月9日，俄军统帅亚历克塞·库罗帕特金下令全军往铁岭与哈尔滨撤退。日军于3月10日占领奉天。

此战后，日本政府透过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向俄方提出和平交涉。但由于俄方仍然在期待波罗的海舰队到达后可以扭转战局，所以拒绝日本的提议。两军在此役后都已经消耗甚大，没有能力进行进一步的攻击或反击，一直到战争结束前在四平附近对峙。

按奉天会战后统计，俄国军战死8,705名（或有一说：俄军的阵亡人数超过2万名），负伤51,388名，被俘21,791名，失踪7,539名。而日军战死16,553名，负伤53,475名，被俘2088名（其中陆海军1574与21人，主要担任铁道队和邮船船员的陆海军属95与此142人，被俄军逮捕的商船船员159人，摄影班9人）。

对马海峡海战

俄军波罗的海舰队（第二太平洋舰队）在经历7个月的航行后，终于在1905年5月到达日本近海，并于5月27日与日本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发生冲突。仅两天内，日本联合舰队便以压倒的优势击败俄军舰队，俘虏对方司令并让对方几乎全军覆没，而日本联合舰队仅损失3只水雷艇，也是近代海战史

上少有的胜利。在此战后，日本完全掌握制海权，而海军几乎全毁的俄罗斯政府也开始面对现实，准备开始与日本进行停战谈判。

桦太会战

在与俄军谈判期间，日本为了使讲和谈判有利进行，先行于7月进攻俄国的库页岛并占领全岛。在缔结朴资茅斯条约后，北纬50度线以北的部分库页岛返还俄国，以南则割让成为日本领土。

战果

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签定《朴茨茅斯和约》

俄国在对日本的战斗中接连失败后，国内民众对沙皇管治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再加上经济发展停滞和蔓延在国民间的厌战气氛，群众的不满情绪终于在1905年1月22日(儒略历1月9日)的血腥星期日爆发。在不稳定的局势下，日本乘机派遣间谍到俄国国内煽动布尔什维克人进行革命活动，使俄国要继续进行战争变得非常困难。

同时，日本虽然在这次战争中取得大部分战斗的胜利，但由于在这场长达19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支出17亿円的军费（几乎所有军费都是透过战时国债获得），使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在日本国内总共109万的可动员兵力中，常备兵力便接近20万，使得国内的各种产业严重缺乏生产人手，同时也使经济陷入低迷的状态。所以在讲和的提议被提出后，日方也没有拒绝并同意与俄方开始展开谈判。

透过美国作为中间人协调交涉后，日俄双方于1905年8月10日在美国的朴次茅斯附近开始停战谈判，并在9月5日达成和平协议。

影响

大日本帝国

战后，日本取得对南满的控制及稳固对朝鲜的统治。关东州租借地以及东清铁路长春以南段均由日本控制，关东军在内满洲开始驻扎。然而，《朴

资茅斯条约》与日本国民的期望有落差，最终爆发日比谷纵火事件。随着俄国的势力退出了远东政治舞台，远东局势得以缓和，日本政府为舒缓受战争影响恶化的财政，于1925年实行裁军计划。

大韩帝国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与韩国签定第一次日韩协约，韩国任用日本政府推荐的财政及外交顾问。1905年日本与俄国议和后，俄国承认日本政府对韩国的指导及监督权，日本随即与韩国签定第2次日韩协约，将韩国的外交权移转给日本，使韩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设立统监府。1909年签定第三次日韩协约，取得韩国内政权并解散韩国军队，并于1910年被日本并吞。

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帝国在日俄战争失败后，损失了用作维持其帝国的强大军事力量，自此一蹶不振，国内动荡不安，爆发一连串革命事件。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革命，俄军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是革命最直接的导火线，人民将战败归咎于罗曼诺夫王朝。

1917年，俄国相继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沙皇统治被推翻，苏维埃政权建立。

大清帝国

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俄国那样一个专制大国，给清廷上下以很大震动。“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夏清贻亦提出“日胜何喜，俄败何欣（ 《何日醒》/《快猛醒》）”之观点。朝野上下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联系在一起，认为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于是，不数月间，立宪之议遍及全国，盖过革命派之议流。加上日本于明治十五年曾派员赴欧洲考察宪政。清廷遂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上书指出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建议进行“立宪”。但是，他们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

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慈禧太后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开展“立宪运动”。

慈禧太后对于这场在自己本土上的战争表示中立，而日、俄两国都在战争时期肆意杀害被己方单方面认为是间谍的中国平民，激起了当时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怒。

1905年12月22日，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主要内容为：清政府同意按日俄《朴资茅斯条约》第五款及第六款，让日本继承俄国在此一切权利，同意将俄国在旅顺、大连的租借权、长春至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财产和煤矿转让给日本。而清政府受到刺激后建立东三省。日俄战争6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权结束，中华民国成立。关东军仍驻扎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内。

鲁迅弃医从文

1906年著名作家鲁迅在医专课堂上观看老师播放的日俄战争幻灯片，里面有中国人给沙俄当坐探，被日军逮捕以间谍罪枪毙砍头，大量本地中国人围观。鲁迅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决定弃医从文。

国际影响

其他国家

对马海峡海战战前，列强都认为，在波罗的海舰队抵达远东后形势便会变得对俄军有利，而最后几乎全军覆没的结果却使诸国震惊。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俄属波兰与芬兰大公国等长期受俄国海军威胁或被俄国吞并的的国家，在得知日军胜利的消息后感到非常振奋，波兰甚至爆发反俄的民族主义运动。俄罗斯帝国的衰败大大鼓舞了受到俄罗斯帝国威胁的波斯人民。

历史意义

日俄战争结果日本胜利，一个东方的新兴国家击溃了当时一个西方的主要强国，日本开始被视为世界上一个新的强权。

日俄战争的结果显现出20世纪的政治与战争的数项特点，许多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都首次用于日俄战争，如速射炮、机枪和射击准度更高的卡宾枪都在日俄战争中首次被大规模使用。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战事，都证实战争在新技术的引领下，已与1870年代普法战争的模式大相径庭。大多数的军队指挥官预期使用这些新武器系统将在现场及战术层面上主导战场。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这些新技术的进步永远改变了人类发动战争的能力。日俄战争也是东亚地区两个现代化国家武力之间首度的大规模冲突。

武器的进步带来巨大的伤亡，日俄两国都未预料到新型战争造成的结果，亦无资源去抵消其损失。因为巨大的伤亡，不同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红十字会）出现并在得到战后关注。这些国际组织的出现可以视为国际社会通过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磨合，这个缓慢的过程主导了20世纪。

不少学者争论日俄战争是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演”。赞同者认为该战争已有多少后者总体战的特点，如双方皆大规模动员军队进入战场。这场战争需要极其庞大的经济支援，包括装备、军火和补给都大到需要本土以及外国支援。日俄战争的结果亦显示国家领袖需关注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国内反应。一些学者认为日俄战争结果显示沙俄政府的腐败无能，因此进一步推动反对罗曼诺夫王朝的革命运动。

+++

+++

+++

+++++++++++++++++++++++++++++++++

++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对于中国东北、尤其是所谓"南满"（即吉林与辽宁地区）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与控制。这种局面，导致了三十年后的中日全面战争，以及中国共产党由于抗日战争过程【国民党停止剿灭中共】、而从将要灭亡的边缘起死回生、壮大、并进而在国共内战中占领国民党、赢得中国政权。

____

慈禧太后

一生的评价：——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慈禧是一位非常罕见的、身居高位、权势熏天的女性，但是，就政治人物而言，有很多像慈禧太后这样的人。他们既精明、狡诈、诡计多端、聪明过人、令人畏惧、让许多当世之人又尊敬又害怕；又极其愚昧顽梗、无耻到极点、罪恶到极点、奸佞到极点。慈禧的一生，就是贯穿着这样的两极化特征：精明而愚蠢。像慈禧这样的罪恶而奸佞的政治人物，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中国社会在这样的人统治下的时候，往往无能为力；而只有等到这样的人死亡以后，社会才有可能发生变化。慈禧的漫长统治，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慈禧统治之下，小人当道；晚清政府从上至下，充满了许多不公不义之

事，充满了各种奸佞之辈，充满了许多腐败、堕落、奸猾、愚蠢之事。朝廷中的最高层权力，长期被所谓“后党”把持；那些人中很多是像满族大臣荣禄、端郡王载漪、刚毅、等等这样的不学无术、精明狡诈、心狠手辣、阿谀奉承、顽固保守之人。虽然，慈禧允许、甚至主导了所谓洋务运动等变法革命，但是，慈禧所作一切之事的动机，都只是为了一己之私，所以，她只允许李鸿章等人在枪炮船舰技术、军事、贸易、铁路、电报、邮局、等方面所进行的一些极其有限的“洋务运动”，却严厉禁止政治体制、思想理念、政经架构、等国事重要方面的改革与更新【这一点，与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所谓改革开放运动，在本质上具有着很多相似的特征】。因此，慈禧时代的洋务运动，不但是彻底失败的、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且，还间接激化了中国民间与外国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中国社会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更严重地激化了中国社会的仇外情绪。慈禧在中国所作的各种祸害之事，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是，直至今天，在中国的政坛上，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仍然弥漫着仇外、自傲、愚昧、思想桎梏、不公不义、等等特征。

利欲熏心：——历史显明了，慈禧太后这样的政治人物所作的一切事情的动机与出发点，都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权力与利益。尽管，有时，他们也会做一些看似主持公道（例如平反民间冤案）、变法革新（例如推进洋务运动）、维护公众利益（例如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事情等等，但是，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背后真正动机，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利益而已。当面临真正的危机的时候，当面临牺牲他们一己之私、牺牲权力利益的时候，他们内心的真实光景，就会清晰地显露出来。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中，在过去180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像慈禧这样的——权势熏天、利欲熏心，既聪明过人、又愚昧顽梗，既精明狡诈、又愚蠢透顶，既冠冕堂皇、又自私自利的——高级政治人物。在未来的中国政坛上，我们也仍然会看到这样的人物层出不穷。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引述 培根 圣思录】

圣经 诗篇53篇

诗篇.

53.

大卫的训诲诗，交给诗班长，调用“麻拉”。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 神。”

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的不义；没有一个行善的。

神从天上察看世人，要看看有明慧的没有，有寻求 神的没有，

他们各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作恶的都是无知的吗？他们吞吃我的子民好像吃饭一样，并不求告 神。

他们在无可惊惧的时候，必大大震惊；因为 神把那些扎营攻击你的人的骨头击散了；他们蒙羞受辱，因为 神弃绝了他们。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 神给他子民带来复兴的时候（“ 神给他子民带来复兴的时候”或译：“ 神把他被掳的子民带回来的时候”），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圣经 诗篇14篇

诗篇.

14.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 神。”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行善的。（本节在《马索拉抄本》包括细字标题）

耶和华从天上察看世人，要看看有明慧的没有，有寻求 神的没有。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所有作恶的都是无知的吗？他们吞吃我的子民好像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
他们必大大震惊，因为 神在义人的群体中。
你们要使困苦人的计划失败，但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给他子民带来复兴的时候（〝耶和华给他子民带来复兴的时候〞或译：〝耶和华把他被掳的子民带回来的时候〞），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

【引述 培根 圣思录 相关文字】

诗篇14篇1节：愚 顽 人 心 里 说 ， 没 有 神 。

第一，请注意，圣经在这里说的是，〝愚顽人在心里说〞，而不是〝愚顽人在心里想〞。换言之，即使是愚顽人，也并不在心底深处、在良知深处，真的坚定地认为，这世上没有神。他只是在自己败坏的内心中，在自己腐烂、罪恶、堕落的心思意念中，拼命地、竭力地试图要自己说服自己，让自己误以为，在这个世界之上真的没有上帝。

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他的心灵与头脑就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他的良知与心灵就好像是分裂的；因此——与其说他是在心里"认为"没有神，不如说是他在心里自欺欺人地"说"：没有神。

第二，另外，我们也应当注意，圣经在这里所说的是，"愚顽人在心里说"，而不是"愚顽人在嘴上说"。换言之，他并非是十分自信的，而且，他似乎也不情愿让别人知道自己心里的这种想法；因为他自己在良知中也可能知道，在公开的场合下否认上帝，否认信仰的巨大价值，是一件很糟糕、会被人鄙视的事情。

第三，圣经在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个否认上帝的人，是一个"愚顽人"。的确如此。这样的人，不仅看不到那些属灵的、属天的、关乎道德与隽永意义之事，看不到那些超越生死、指向永恒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人甚至没有属世的智慧。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研究、分析那些无神论者们的思想，就会发现，他们的言论思想都往往是轻浮的、嘲讽的、傲慢的、无知的、虚浮的。在他们的言语行为与思想之中，没有深刻的智慧，更没有道德的隽永价值。

在社会、政治、经济等事务中，如果我们观察和思考那些政治家、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们的言行，就会发现，那些真正智慧的、伟大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等等，一定在内心深处有着深挚的敬虔信仰以及对于上帝的意旨安排的深深信靠。相反，那些凭靠己力、凭借世人、自以为义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等等，则是愚顽、虚伪的；他们并不能成就什么伟大的事业。

——

光绪皇帝

光绪的一生，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一方面，他作为一国之君主，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在经济、科技、体制、政治等等方面的巨大差距，看到了中国内部各种腐朽落后的方面，因而想要励精图治、奋力改革、效法先进、全面变革。另一方面，他却生活在慈禧太后的屋檐下，手脚被捆绑，满腔的雄心壮志无处施展。甚至最后，在慈禧太后临死之前的一天，他可怜地被人用砒霜害死。

光绪本人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是中国文明体制的悲剧，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中央集权制度的悲剧，是一个没有敬虔信仰的、人们内心深处没有敬畏的、社会文化体系的悲剧。

++

【圣经 那以耶和华为神的民是有福的】

诗篇.

33.

义人哪！你们要靠着耶和华欢呼；正直人赞美主是合宜的。

你们要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

你们要向他唱新歌，在欢呼声中巧妙地弹奏。

因为耶和华的话是正直的，他的一切作为都是诚实的。

耶和华喜爱公义和公正，全地充满耶和华的慈爱。

诸天借着耶和华的话而造，天上的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

他把海水聚集成垒（“成垒”或译：“在皮袋里”），把深海安放在库房中。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耶和华破坏列国的谋略，使万民的计划挫败。

耶和华的谋略永远立定，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

以耶和华为 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耶和华拣选作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全人类。

从自己的住处，他察看地上所有的居民。

他是那创造众人的心，了解他们一切作为的。

君王不是因兵多得胜，勇士不是因力大得救。

想靠马得胜是枉然的；马虽然力大，也不能救人。

耶和华的眼睛看顾敬畏他的人，和那些仰望他慈爱的人；

要搭救他们的性命脱离死亡，使他们在饥荒中可以存活。

我们的心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

我们的心因他欢乐，因为我们倚靠他的圣名。

耶和华啊！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慈爱。

+++
+++
+++

【圣经 敬畏神，是人智慧的开端】

箴言.

9.

智慧建造自己的房屋，凿成七根柱子。

它宰杀牲口，调配美酒，摆设筵席。

它差派几个使女出去，自己又在城里的高处呼喊：

“谁是愚蒙人，可以到这里来！”又对无知的人说：

“你们都来，吃我的饼，喝我调配的酒。

愚蒙人哪！你们要丢弃愚蒙，就可以存活，并且要走在智慧的道路上。”

纠正好讥笑人的，必自招耻辱；责备恶人的，必遭受羞辱。

你不要责备好讥笑人的，免得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

教导智慧人，他就越有智慧；指教义人，他就增加学问。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因为借着我，你的日子就必增多，你一生的年岁也必加添。

如果你有智慧，你的智慧必使你得益；如果你讥笑人，你就必独自担当一切后果。

愚昧的妇人喧哗不停，她是愚蒙，一无所知。

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向过路的人呼叫，就是向往前直行的人呼叫：

“谁是愚蒙人，可以到这里来！”又对无知的人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在暗中吃的饼是美味的。”

人却不知道她那里充满阴魂，她的客人是在阴间的深处。

++
++
++

【引述 圣思录】

6.《我们都是罪人》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3:10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3:11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3:12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3:13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3:14 满口是咒骂苦毒。3:15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3:16 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3:17 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3:18 他们眼中不怕神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3:20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第一部分】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在罪恶之下。我们自己的心思里面，是谗言，嫉妒争竞，虚谎自高；我们对待他人的心态里，总是含着骄傲自义；我们在面对他人的恶时，常常沉默不言，避之不及，没有勇气去在那些看起来事不关己的事情上，为了正义挺身而出。我们生活的一个箴言就是，少管闲事。

我们的舌头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污言秽语、咒骂苦毒和花言巧语。

（1）

世人之间的差别，常常其实微不足道。

我们彼此相看的时候，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真是相差万里----无论是在地位上，才能上，财富上，成功上，所处环境上，起跑线上，成就上，道德品质上，业绩上，性格上，体质上，外表上，等等等等。我们常常以为，在这世上，有的人轻如鸿毛，有的人重于泰山。

或许，的确如此。然而，要看我们说话的参照系是什么。

就好象我们看世上的亭台楼宇，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低不同，风貌万千。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地上的角度看，而是从天上看，从永恒看，从那无限、极远的光辉之处看，那么，这些楼阁亭台的彼此之间的差别，就可以说真地是微乎其微了。

同样，若我们从神的角度看，人心之中的尔虞我诈、迷魅魍魉、彼此勾陷，大概也的确是彼此类似。不同的，是量；相同的，是质。

（2）

神的律法是什么？律法的总纲第一是爱主你的神，第二是爱人如己。这写在圣经的十诫当中，也写在世人的良心里面。

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里面，都知道，那满天的繁星、浩渺的大地的背后，那繁杂的世事、波澜壮阔而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背后，有一位无限大能的造物主、“老天爷”。他是独一无二的，是自有永有的。他是全备而充足的。他能听、能看。他公义、慈爱------虽然，我们看不见他，因己罪而不认识他；但是，他从来离我们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他。

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里面，也都知道，我们应当敬畏、遵从这位宇宙天地的造

物主；因为，他是良善的源头，是一切生命的赐予者，是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归宿与基点。阳光雨露，出于他。苦难中的甘霖，也是来自他。

我们也知道，这世界中的一切事情，善恶一定有报。这并非科学所研究的物理定则和规律，而是，超自然中的赏善罚恶，来自于那位超自然的上帝本身。

我们的良心更知道，应当以善待人，爱人，就如同爱自己一样。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己所欲，施于人。

我们渴望怜悯和同情，因此我们要怜悯和同情他人。我们渴望理解和关怀，因此我们要努力理解和关怀他人。我们期望别人对我们耐心忍耐，原谅我们的错，饶恕我们的过犯；因此，我们要对别人耐心忍耐，原谅别人的错，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憎恨、厌恶别人的罪恶、不义、不公、虚谎；因此，我们自己不应当罪恶、不义、不公，并要诚实。我们愿意别人为帮助我们而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也当为帮助别人而牺牲自己。

这，就是人生的真谛。

【第二部分】

平安的路是什么？

也许，有的人在财富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亲情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哲理中找到顿悟和平安。有的人在工作和事业的自我实现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人与人之间的武力与威胁对峙中，找到和平与平安。有的人在健康和长寿之道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清心寡欲的生活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一生一世、山盟海誓、相濡以沫的爱情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放下"的心境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知足常乐的平凡人生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天下可笑之人"的智慧中找到平安。

以上这些，无论好或不好，却都没有触及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

们自己生命中的罪（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自私、自我、自利、不公、不义、虚谎、懦弱、不怜悯、不宽容-----无论是从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正如被通缉的逃犯无论逃到哪里、逃了多久，都终将不得不面对法庭的审判）怎么办？我们怎样才能挣脱罪的网罗，洗清我们的罪责，逃脱罪的惩罚，躲避死亡的咒诅，改变我们被罪恶所玷污、所充满的生命？

无论我们自己怎样觉得-----问题是，对善恶的裁决和审判，对罪的惩罚，对善的奖赏，权柄并不在我们手中。

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是永恒中的审判。

12.《人的义与神的义》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10:3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10:4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10:5 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10:6 惟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10:7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10:8 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10:9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10:10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10:11 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第一部分】

人的义

如果说，有人认为世上的宗教都是彼此相似、劝人向善，那么，这样的人实在是谬大矣。

因为，究竟什么是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人人皆知；但实际上，却深奥无比。

（1）

比如，善意的谎言，是善吗？为了良好的目的，而采取手段上的变通，算是善吗？如果算是善，那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善吗？目的之善，手段之恶，其中的界限在哪里呢？这样的界限又是由谁来定的呢？这样的裁判者，他的权力的来源和凭据又是什么呢？

还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又比如，如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善的话，那么，人也应当“己所欲，施于人”吗？这样，人应当怎样对待那些遇见的一切世人，以及未曾遇见的所有世人呢？

人是否就应该变卖自己的一切，施舍给别人；否则就算为恶呢？如果不算为恶，那么，冷漠与怜恤、博爱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呢？又是由谁来决定这样的区别呢？

而且，“己所不欲”的事情，一定就是错的事情吗？“己所欲”的事情，一定就是对的吗？这对错又是由谁决定的呢？这样的裁判者，他的权力的来源和凭据又是什么呢？

再比如，“善”就是对人友好、满足对方的要求和心愿吗？对方的要求和心愿，可能是不合理、不公平的。那么，谁又来决定什么是公正的、公平的、合理的呢？这样的裁判者，他的权力的来源和凭据又是什么呢？

人们常说，“公道自在人心”。那么，是否公众认为对的事情，就是对的呢？

人云亦云、从众的心理，就是正确的吗？那么，“众口铄金”、“法不责众”等等，就是对的吗？道德的审判，是否就可以通过投票、民主的形式来完成呢？（尚且不说，这里还需假设，人们能够、并且愿意努力地去仔细查明真相和事实）。

谁能保证，私利的影响，血气的愚拙，迷信的虚妄，不会蒙蔽亿万人的眼睛呢？难道很多罪行，不就是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吗？难道战争的基础、乃至打群架、群体闹事的原因，不就常常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哥们义气、族群主义、以及私利和血气所驱动的吗？我们难道不是常常地、义愤填膺地，把自己当成正义化身，以恶报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吗？这样的仇恨、鄙睨、血泪、暴力、凶杀，不就是人类的历史吗？

可是，难道我们在恶的面前，就只能退避三舍、苟延残喘、胆怯懦弱、趋利避害吗？

在报复与懦弱无为之间，在“霹雳手段”与“菩萨心肠”之间，其中的“度”，又该怎样掌握呢？

更重要的是，谁来决定这样的标准是正确与否呢？这样裁决的人，他的权柄的来源和凭据是什么呢？

（2）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怎样看待生死、以及意义呢？

我们相信善人死后会有好报，恶人死后会有惩罚。但是，对究竟什么是“善”，以及究竟怎样才是足够的“善”、才能达到满意的标准，其实我们并没有把握。

如果我们内心诚实，我们也一定会心里承认，我们完全没有权柄，来裁决这

些关乎生死、意义、死后结局之事。那些事情，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和认知之外。

若没有神的启示，凭我们自己的私意猜测和臆想，我们也更不知道-----死后的奖赏，究竟是什么、有多么美好，以及奖赏的条件是什么；死后的惩罚，究竟是什么、有多么严重，以及惩罚的条件是什么。

所以，是不是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呢？还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呢？亦或是，“心诚则灵”呢？

（3）

如果连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不确定，或是凭着人的标准去妄自揣测，那么，我们的所谓宗教信仰，就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呓语而已。

这样的凭着人的标准的妄自揣测，以及在宗教信仰中 **依据** 、**强调** 任何“人的义”、“人的智慧彻悟”、“人的修行”-----无论那是关公、妈祖、观音、罗汉、圣徒、清真、蒋公、还是毛公；无论是怎样的至圣先师；无论是人的彻悟，还是缘分、菩提；无论是人的行为、饮食、言语的戒律规条；无论是人的修炼、修行，自我灵修，还是修身养性-----这些，或许看似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道理和优点，但是，这样的宗教信仰的人，却实际上是、并终将是遗害无穷的无神论者-----

因为，他们（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整体）必终极地是以自己为自己的神；以自己的认知和智慧为权威和主宰；以自己的领悟和判断本身，作为判断的凭据和权柄的来源。

他们在内心深处，潜在性地，把自己与那宇宙天地的造物主看为平等。他们用自己的义，自己的好行为，自己的牺牲，自己的优点，自己的刻苦修行，自己对他人的无私表现，自己的智慧、大彻大悟，自己的坚忍，自己的容让、博大胸怀，自己的清洁、圣洁，等等等等，来当作基石，当作根本，当作可以凭据的、努力追求的目标和基础。

【第二部分】

神的义

敬畏神，是人智慧的开端。

神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他的权柄遍及全地，他的能力胜过一切，他是独一无二的，是自有永有的，是全备的，是无限的。

他创造了天地，那么，他自己岂不在天地之上？他的能力，岂不远远胜过天地？

他创造了海洋和其中匍匐的巨浪，那么，他自己的能力岂不远远胜过风暴和大海？

他创造了大地，那么，他的大能与智慧岂不远远胜过全地之中的一切？

他是有位格的。

他既造了人的耳，那么，他自己岂不能听见？

他既造了人的眼睛，那么，他自己岂不能看见？

他既造了人的口，那么，他自己岂不能说话？

他造了人的头脑，他自己岂不能思想、岂没有自己的意志和旨意？

他造了人的心灵，他自己岂没有感受、喜悦、忿怒、判断、选择、憎恨、厌恶？

他造了一切世人，把生命赐给他们。

他的圣洁、公义、慈爱，岂不远远地胜过世上一切的世人？

然而，在神那里，不会有我们人身上的罪、软弱、污秽、疾病、虚谎、朝三暮四。

人，作为全地之上最独特的受造之物，有着心灵和理解的能力，能够明晓神的旨意和法则。他们是按着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

但是----可叹，他们生活在罪中，活在血气、虚谎、诡诈和自义之中；他们离弃了他们的造物主，离弃了神的恩典与恩惠。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天空的飞鸟知道来去的定期，燕子、斑鸠、白鹤也守候着当来的时令。然而-----人却不知道敬畏神、遵从神。

【第三部分】

信主的道，在我们的口里和心里

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为我们的罪责以及应受的永远惩罚，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清了罪债-----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他三日后复活，使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复活-----

把我们从罪中挽回，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

与神和好，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永远的幸福。

这是神的应许，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盼望。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是神的恩典，赐给那谦卑、悔改的罪人。

这是叫人无以自夸的恩典-----

因为，人若想要来到那无限之神的面前，

从根本性上说，人所能靠的，必不是人的优点，

而是神的恩典与饶恕；

靠的是人的信，

而不是人的立功和功德。

这样的信心与信靠，

必是完全的委身和倚靠；

必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热爱和敬拜；

必是在心灵和诚实之中，

敬拜与遵从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

16.《我们应当怎样来到神的面前》

（赛40：3-5）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第一部分】

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填满一切山洼，削平大小山岗；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我们怎样能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为什么与神相隔绝？为什么看不见他？为什么摸不到他，听不见他，不能认识他？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知道有"上天"，也都知道"永远"，然而，为什么我们却还总是要在心里向自己推诿，说，"凡是我作的事，我心里的污秽，都不会被发现、不会被审判，-----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

（1）

愚顽人在心里说："没有神"。

（1.A）

这是人心中一种一般性的、根本性的、广泛性的判断。这样的判断，代表了一种理念，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以及道德审判，没有绝对的、无上的、神圣的、圣洁的、超自然的权威和能力。

所以，尽管在人世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则、制度、秩序、规章，以及针对这些规章制度的奖惩措施；也尽管在人世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舆论环境以及道德法庭的风言风语；

但是，从终极性的角度讲，只要我们的恶，不被发现，或是能够逃避人间法律的审判，那么，我们就可以一无所虑。其它方面的顾虑，比如在人背后的风言风语，或是在史书中的记载与评论，相对而言，只要对我们的切身利益没有什么损害，我们都可以轻视、笑骂由人。

"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

有着这样想法的人，是一个愚顽人。

在他的心里，如同沙漠地，其中充满了坑坑洼洼、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崎崎岖岖的山洼、山岗和山坡。

在他的心灵里面，是荒芜与枯萎，是苦毒与咒诅，是猥琐与阴暗，是心骄气

傲与自以为义，是狂妄自大与胆小懦弱，是狐疑多端与心智麻木。

他看不见诸天述说、苍穹传扬着的神的荣耀与伟大。

他不晓得创造宇宙天地之神的法则、祝福、咒诅、恩慈、严厉与公义。

他不思想人生的奥妙、意义与真谛。

他在这个世界上舍本逐末，追逐那些转瞬即逝、朝荣夕枯的荣华与利益，为自己的私利、虚荣和骄傲而辛勤奔忙。

这样的人组成的人群与社会，是彼此争斗、妒嫉、仇恨、践踏、怀疑、坑害、欺骗、睚眦必报、哄笑、贬低讽刺、怒目相视、冷漠相待。他们彼此伤害。

他们在其中，不但不知道伤痛、哀伤，不知道饥渴慕义，反而沉浸在罪恶与虚荣之中，沉浸在罪与淫欲的欢愉之中。他们仿佛待宰的猪狗牲畜，为自己引颈受屠而庆祝。他们在死亡的前夜狂欢着，说，“我们痛快地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

（1.B）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这不是他在殿堂庙宇里大声宣讲的话，也不是他在街市上与人谈论时，理直气壮的话语；而是，他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所说的话，就好像在试图说服自己。

他们不但不愿意明目张胆地，把这样的话和判断，公然说出来，

而且，他们还要为自己编排出许许多多冠冕堂皇的说法，作出伪善的样子，伪装出自己是一个很有“信仰”的人。

他们把这世界的荣华当作自己的信仰，

把人自己的智慧当作追求的对象，

他们以自己为自己的神。

他们不但不承认人的渺小，不承认在人心之中普遍的罪，反而藐视悔改之道，

把“人类”“人民”“人的智慧”“人的劳动”等等等等这样的概念，举得很高，看为伟大，当作自己的神，当作自己的信仰，当作自己生命的价值与归宿。

他们说：我们的梦想，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

凡事都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吧，让我们自强不息。

（1.C）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可是，他们还要为自己编排出很多关于超自然世界的种种理论体系，

用自己的虚谎，代替神的真实。

虽然，他们在心里说：宇宙天地中，没有那位无限的、无上的、绝对的、全能的、全知的、独一的权威和主宰，

但是-----

他们以己度人，用自己的模样和属性，来揣度神。

他们不晓得神是全备的、自有永有的，

反而以为他和人一样，是不足的、亏欠的、有缺陷的、局部的、需要帮助的、限制在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内的。

所以，他们为自己编排出很多神，比如------

土地爷，灶王爷，财神爷，缪斯，阿波罗，丘比特，宙斯，玉皇大帝，太白

金星，太上老君，命运之神，福禄之神，

还用五彩的玉、铜、金、银、石为它们造出各种偶像，象人的模样，

以为它们象人一样，也很看重那些金玉良材，并且-----

需要各司其职，各管一摊，各当一面，有君臣、文武、百官，有等级、阶位，而且还会彼此争竞，争风吃醋。

甚至-----

他们还以为自己通过修行和修炼，凭着自己的功德，也可以成为仙，成为神。

（2）

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填满一切山洼，削平大小山岗；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当主耶稣的救恩与圣灵临到人心的时候，在人的心里，必充满了谦卑悔改、为罪而忧伤痛悔的心情。

认识永生神，必从人的悔改之道、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恩典与医治开始。

施洗约翰在耶稣以前来了，传悔改的洗礼。他在人心之中，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

今天我们也是如此-----

当圣灵来到我们心里，使我们的心灵变得柔软、变得谦卑的时候，

当我们祈求、寻找、叩门，当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

神的救恩，离我们就不远了。

主是我们灵魂里的医生，只有承认自己灵魂生病、愿意接受神的医治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医治。

神是我们的救主，把救恩给一切愿意接受他救恩的人。然而，只有承认自己是罪人，只有承认自己若不悔改、就必将承受神永远的审判惩罚，只有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救恩-----只有***愿意***接受神救恩的人-----

才能够得到神的救赎之恩典。

（3）

我们怎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的心中，主的道路被预备、修直，

当我们灵魂的沙漠地里，大小山岗被削平，一切山洼被填满，高高低低、崎崎岖岖的改为平坦的平原，

当我们谦卑悔改，恳切呼求，

当我们仰望上天，渴盼恩典，

当我们清心温柔，饥渴慕义，

那么，我们就能够预备好，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中，来到神的面前。

在神那里，是无限的美好与能力，是浩瀚的广袤与美丽，是永远的国度与幸福。

愿我们每个人，能够得到、归向、享受、热爱我们的神！

【第二部分】

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

的。

主的荣耀，在他创世以先、所预先定好的那日，在他审判全地的那日，必将降临到全地上。

全地的人，无论是在东西南北，无论是在田间犁地，还是在嫁娶宴乐，到那日，都将看见神的荣耀，以极大的威严和威势降临。

全地的人，无论是男女老幼，都将立刻知道，谁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在那日，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神的荣耀。

在那日，那些在过去年代中、历世历代的已经死去的人们，也都要在神的大能之下复活，并与全地的一切世人接受神的审判。

他们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手中所作的每一件事，心中的每个心思意念，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交出来。

他们心中的每个秘密，都要在那鉴察人心的神面前敞开。

那些浸淫在罪中的人，

那些心中骄傲的人，

那些凭自己的智慧自高的人，

那些作自己肉体、血气、肚腹之奴仆的人，

那些被贪欲和雄心所占满的人，

那些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这必死之世界中的人，

那些背离、离弃那造他之主、神的人，

那些藐视神恩典、轻看神救恩的人，

那些不愿接受神救恩、以为自己不会有罪责和罪债的罪人们，

那些内心充满诡诈，以为自己可以欺哄神的人-----

有祸了！

++
++
+++

【引述 关于论语的联想 序言 道德的基础是什么】

1.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2. 在自然信仰中，即，一般性的敬畏上天的信仰中，人们能够从上帝所创造的物质世界中，从上帝所创造的世人生命中，从上帝所掌管的、放置于世人良知之中的道德律法与道德世界中，一般性地看见，真诚的、敬虔的信仰之人，应当怎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一般性的原则。一个人如果真诚认真地去思想这些事情，那么，就能够明白、说出一些端倪，就能够看见一些真知灼见。

3.但是，说在口里、写在纸上，是容易的，但真正地做出来、实现出来、体现在实际的生命中，却是难的。事实上，只有在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信靠之中，只有在上帝圣灵的大能之中，人才能够真正地践行出那些信仰的

原则，活出真正敬虔的生命，得到那来自上帝的圣洁生命，与神同在，进入那无限美好的、永远的属天国度。虽然论语在中国的影响如此深刻、广泛、久远，但是，论语中的许多内容，却总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不是体现在实际生命里。事实上，很多时候恰恰相反，儒教中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成为虚伪、虚浮、爱慕功名的人，而不是真正有敬虔信仰的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论语中，作者虽然道出了信仰所应当具有的一些重要生命品质，但却缺失了信仰的真正内核与源头，即，上天自己的启示、话语、旨意、作为、救赎、恩典、公义、圣洁。

4. 真品与赝品之间的关系：没有七分钱的假币；赝品一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某些方面、看起来与真品很相像。赝品的存在，并不能证明，世上不存在真品。

5. 赝品的定义：只有其形，却无其质；只有其外表、结论、表象、结果等方面的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但却无其机理、内在的动机、实质、原因等等。

6. 中国人愿意聆听论语中的道理，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论语中怎样讲述仁、大道、正义；如果，我们愿意思想其中的道理，那么，难道我们不应当追问，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仁、大道、正义吗？难道，我们不应当在心里因而有一个饥渴慕义的盼望与求索之心吗？

7. 这本反思与联想之书，也可以看作是与孔子之间的一场心灵的、谦卑而诚实的对话。

8. 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1）一方面，神的普遍启示，显明在这个世界、宇宙和人类社会之中。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事

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世人若认真、诚实地思想人生，就会能够明晓关乎道义、良善、人生价值等等事情；然而可叹的是，世人却沉浸在罪中无法自拔，所看见的，只有属世的利益和得失。（2）另一方面，神的特殊启示，尤其是关于救赎恩典的特殊启示，显明在圣经之中。圣经是上帝全备的话语、旨意和启示，讲述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恩典，讲述了什么是真诚的、真正的信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9. 一方面，因为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者佐证并支持着后者；后者拓展和大大深化了前者），所以，其实在论语重要原则与圣经真理之间，在很多方面，有着重要的重合、不矛盾、一致之处。而另一方面，在圣经中，更包含着论语所没有的、远远地超过了论语内容的教义。这些教义，对于人的幸福、救恩、生命，等等，至关重要。

10. 同时，论语总也包含一些内容，是圣经所没有、或是与圣经相矛盾的原则、教义。这些原则、教义包括：对于信仰的看法，对于生死的看法，等等；我们的良知，以及历史的见证，都告诉了我们，这些部分，正是显明了论语之局限性、甚至致命错误性的主要要点所在。

11. 论语，就像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画出了一些美好的果树、果实，让我们看见了一些美好的品德和品质；但是，在这幅图画中却有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些果树、果实并不是纯粹的。其中夹杂着一些不好的、甚至有毒的果子。第二个问题是，在那些美好果树、果实的背后，其实质、根源、本质是什么，却不得而知；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许多深层次道理被本末倒置，因而常常会舍本逐末，甚至有些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

12.论语中讲述的很多美好做人道理，相信绝大多数世人，包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懂。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很难把这些品德，实践在我们真实的生活、生命之中呢？关键的原因在于，我们不认识神，不明白他的旨意、话语、计划、作为，不愿意寻求他、倚靠他、以他为我们生命的归依。

只有上帝圣灵的能力，才能使我们真正地明白神的救恩；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并在死后第三日复活，成就了那永远的救恩。凡相信他、接受他救恩的人，就必能得救；这是因信称义的恩典；凡在基督里面得生命的人，就真的进入了那永生，再也没有死亡。
这样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敬虔的信仰。

例如，一个没有敬虔信仰、敬虔精神支柱的人，怎么会真的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呢？一个真的有了敬虔信仰的人，怎么会不宽以待人（上帝以赦罪之恩对待我们，我们岂不应当对他人恩慈、宽恕吗）、严于律己呢（上帝因着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而赦免了我们的罪，那么，我们还有脸面再活在罪中吗）？

可见，信仰——真诚的、敬虔的、真正的、真理的信仰，是我们为人处世道德品质的根本所在。

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忽视了这一点，那么，任何人来谈为人处世的道德品质，其实都不过是舍本逐末而已。这样的没有根基的所谓品德，也必将会逐渐败落、一事无成。如果人的动机和出发点错了，如果人凭着本性，以自己为中心、为依归，那么，所谓美德，究其终极层面而言，不过是功利主义的手段而已。当试炼、苦难来临时，其真实的面目就一定会显露出来。

13. 在基督教信仰临到欧洲之前，柏拉图在著作中对门徒们说道：你们要

耐心地等待，神必把他的启示，向世人显明；柏拉图的思想，虽然是不完美的，但是他诚实谦卑地思考，认识到上帝、那宇宙天地造物之主，必定是无限的、永恒的、全能的、全知的；他也认识到，人的灵魂必定是不朽的，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

正如柏拉图的著作一样，论语的内容，其实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圣经的背书；因为，论语所描述的很多内容，正是一个敬虔信仰之人所应当具有的生命品格。然而，论语所没有指出的，却恰恰是，那些生命品格背后的根基、基石是什么。如果失去了根基，那么，这些内容就都不过是纸上谈兵、空谈而已。

+++
+++
+++

——————————————————————

宣统皇帝（溥仪）与隆裕太后

在清朝和平退位的过程中，当时主掌清朝政局的、隆裕太后（在名义上）、以及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在实权上）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固然，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迫于形势、迫于袁世凯的政治军事压力、万般无奈之下所作的选择，但是，他们没有在历史不可阻挡的洪流面前、在明晰可见的政治局势面前，做垂死的挣扎、负隅顽抗，——这为辛亥革命的

（几乎）不流血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无数中国人的性命因此而得以存留。无数中国人的和平宁静的生活因此而得以受到保护。

____

清朝统治政权的和平退位【中国历史上所罕有】

在中国历史上，像清朝统治政权的、这种全国性主要政权体系的、基本上是和平退位的过程，可以说非常罕见、绝无仅有。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平均几乎每三百年就会经历一次极其惨烈的改朝换代的过程。在每一个朝代统治期间，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当苛捐杂税、腐败堕落、民不聊生达到顶点的时候，就会发生叛乱、战争、生灵涂炭的改朝换代过程。秦朝末年、汉朝末年、唐朝末年、宋朝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无不如此。即使在清朝统治期间，也发生了很多血腥的民变，例如白莲教、捻军、太平天国等。在每一次改朝换代、或是民乱时代，整个中国社会就会经历巨大的动荡，发生大规模人口灭杀（甚至整个国家社会中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可能会被屠杀、或死于战乱）。仅仅是一个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就导致了上千万人口丧生。当曾国藩军队攻陷洪秀全的南京时，整个南京城都被曾国藩的湘军屠城。

然而，清朝的灭亡却是一个例外；1911年至1912年清朝退位的整个过程，相对于中国历史上那些可怕的改朝换代过程而言，是一次非常和平的、几乎没有流血的过程。全体中国百姓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和平地、兵不血刃地从大清朝国民变成了中华民国的国民，而根本没有经历什么大规模生灵涂

炭的、惨烈的、全国性战争。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重要因素。

首先，最重要的原因，应当归因于孙中山本人、以及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人群体的伟大政治胸怀与政治视野。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改朝换代、推翻旧朝代、建立新王权的政治野心家、枭雄们不同，孙中山先生深受西方文明、尤其是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的间接影响；孙中山先生、以及他所领导的、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党人群体，所诉求的，是中华民族的兴旺，是中国的现代化主义政治道路，是数以亿计的中国百姓的福祉；而不是什么一己之私。正是因此，孙中山作为在南京的临时大总统，愿意与在北京的袁世凯谈判、妥协，愿意把国家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只要，袁世凯愿意合作、推翻满清王朝、并遵守宪政国家体制。孙中山的品格与信仰、政治影响，对于辛亥革命的和平胜利，对于清朝政府的和平退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孙中山是像白莲教、捻军、或是李自成、张献忠那样的草莽之寇，如果孙中山所追求的是他个人的权力宝座，那么，——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临时政府就很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举措和表现，并必然会像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洪秀全那样，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血战到底、给全中国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与生灵涂炭。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和平胜利成果【虽然，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满清灭亡后，中国在大约十年时间中处于北洋军阀的混乱局势，但是，这仅仅是一些相对而言的零星的、小规模的军阀战斗，而不是全国范围内的、牵扯成千上万人的血雨腥风、生灵涂炭】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当时的国际大气候。1911年的中国，已经处于英美德法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影响之下。

虽然，这些国家在中国有很多租借地、有很多商业利益；而且，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野心勃勃地想要继续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但是，正因如此，那些西方国家互相之间也产生了一种彼此制衡的局面，尤其是英美德法各国都希望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能有一个法律秩序的环境，而不是内部大规模战争、彼此杀戮；从而能够与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贸易活动。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动荡历史、1910年代的中国国内局势，使得很多有识之士都看见，中国虽然有着几千年的古老文明与历史，但是，中国已经来到了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转捩点。虽然，中国的历史非常古老，但是，几千年以来，自从秦始皇以后，中国一直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轻君贵、频繁改朝换代、充满杀戮和生灵涂炭的循环中打转。现在，中国所面对的，是实行民主宪政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发达科学技术的西方文明。因此，在1910年代的中国内部有一股强大的民意，尤其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们都盼望，中国能够实现像君主立宪那样的民主选举、参政议政的体制，而不是把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些封建朝廷的个人手中。在当时的中国，“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第四个重要因素，是袁世凯凭借着高超而狡诈的政治手腕，兵不血刃地除去了北京满清皇室的有效武装护卫力量，并成功逼使清王朝愿意主动宣告退位。第五个重要因素，是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溥仪父亲）以及皇太后隆裕太后（光绪的皇后；一位相貌偏丑、但却内心正直良善的满族妇女），在袁世凯的逼迫下，愿意低头妥协、放弃王权、同意接受清朝结束的政治决定。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德先生”“赛先生”中的民主

【引述 《论民主》】

我们必须反复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民主本身，并非是绝对的、终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更不是解决人类社会与政治经济中任何问题的万灵

药。

在这一点上，一百多年前当满清灭亡、民国政府成立的时候，当后来的五四运动很快爆发的时期，甚至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或许都对于民主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深深的误解。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许多开明知识分子、许多拥抱西方文明的人士们，以极其渴慕的心态，期望把德先生（即民主）与赛先生（即科学）引进到中国来，希望——使近代史上多灾多难的中国得到拯救，使许多贫穷落后、精神愚昧的中国亿万百姓能够得到救助、更新，使中华民族能够真正走上民主富强自由之路。但是，过去一百年的中国近当代史显明了，当年那些知识分子们的梦想，今天并没有完全实现。固然，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而言，科学教育的普及早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人们的心灵与信仰却仿佛仍然是空的。今天的中国人，似乎离民主、自由、和平仍然很远。即使有一天，假如在中国大陆实现了民主制度，可是，人们是否会在民主体制下和平相处、互相尊重，而不是互相争斗、剑拔弩张、苦毒暴戾——这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

因此，我们在谈论民主之目的、途径、方式、等等之前，首先应当谨慎、认真、深入地思考，究竟什么是民主，民主意味着什么。既然我们已经着急了一百年了，那么，就让我们再多有一些耐心，来冷静、客观、深入地思考一下：我们所追求的、梦想的目标，所谓民主，究竟是什么。

民主的一个核心精髓，也是一个核心难度性的挑战在于，人们怎样能够和平而智慧地处理彼此之间的不同意见。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社会很快就会跌入吵吵闹闹、混乱不堪、甚至失序的无政府状态。事实上，在社会政治中，民主所面临的两大敌人，正是这两个极端败坏的社会政治形式：专横暴力的专制主义，与混乱无序的无政府主义。

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人是这个宇宙自然世界中最为复杂、微妙、珍贵的存在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事情之一。在人与人之间，有一件似乎存在着内在本质性矛盾的事情，就是，我们既应当坚持正义，又应当宽容待人、并愿意常常妥协。换言之，我们既要有公义，又应当有恩典。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应当坚持己见；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我们则要愿意常常妥协、后退。常常地，在坚持与妥协之间，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不仅取决于我们所面对之事情的性质本身，也取决于社会中其他相关人士们对于此事的意见。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既要学会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又要不失灵活性，时刻准备放手、时刻准备妥协、让步。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统一的、一成不变的公式，来决定什么情况下应当坚持，什么情况下应当妥协；因为世上的万事之中，都存在着长期、短期、全局、局部、主流、支流、大环境、小气候、大目标、小阻碍等等数不胜数的变量与因素，决定了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每一件具体的世事。

================

民主的关键，绝不仅仅是什么简单的所谓“人民当家作主”；而是，民主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庞大的、由许许多多个体之人所组成的复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究竟怎样能够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在各样的事情上最大程度地达成一致意见。换言之，民主的核心涵义是在于，由数量巨大的个体之人所组成的人民，究竟怎样才能够自己治理好自己。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在人民自我治理的这种过程中，若想要达成顺利的民主进程与民主制度，人民至少需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大多数人民中间，人们应当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异同，并且愿意重视公共利益的重要性。

第二，在大多数人民中间，应当有起码的是非、公义、平等、诚实、和平、仁爱、等基本的道德法则与道德品质。

第三，在大多数人民中间，人们应当愿意以诚实谦卑、实事求是的心，寻求事实真相，寻求真理。

第四，在大多数人民中间，人们的生活、生命、心灵应当是基本上自由的，而不是如同奴隶一般，眼睛被蒙蔽，耳朵被堵上，嘴巴被捂住，既无

法知道世事真相，也无法发声。

===========

我们如果深思以上条件，就会认识到，上面的四个条件虽然看似简单、基本，但却实际上非常复杂、深邃，而且很难量化、测量、验证、校准。

不过，至少，正如上面所引述的所多玛、俄摩拉那样的情况所显明的，我们无可置疑地知道，民主本身，并非是没有前提条件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强调指出：所谓民主应当是，自由、圣洁之民所进行的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

这并不是说，民主社会中的人民，就非得要完美、毫无瑕疵不可。事实上也绝非如此。在这个地上世界中，在人间社会中，不可能有完美的国度，也不可能有完美的、毫无任何缺点的百姓。从本质上说，只有上帝的国度才是那完美的、能够持续到永远的国度；上帝之国是属乎天上、而不是属乎地上的。上帝的国度要在那属他的百姓中间建立起来；上帝的百姓要有着成圣的生命；上帝的国度是指向永恒、永生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地上之国与上帝之国之间，就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世上的法律，还是世人的心灵；无论是情感、理性、灵魂，还是关乎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之中的真理；在地上之国与上帝之国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绝不可忽视的关系。敬畏上天，是人智慧的开端。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你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

我们若要深刻而全面完整地回答“民主是什么”这个问题，那么，就必须要深刻而全面完整地明白，地上之国与上帝之国之间的关系。

另外，关于上面所列出的、民主社会中人民所应当具有的“四个条件”，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是否有这样的条件和特点呢？我们又能够做什么事情，来加强或改善那些特点呢？难道，是通过行政命令和威逼等手段吗？那不岂是又成了专制主义政府了吗？那么，是非、对错、好坏、善恶、等等，到底又是由谁来决定呢？我们又怎样避免所谓“多数暴政”的暴民主义政治呢？

我们若要对民主有深刻的理解，就必须要从反面来思想这个问题，即，民主的障碍、敌人、反对力量，在于什么？是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民主的失败？这些障碍、阻拦、因素背后的机理，又在于什么？民主与人性、民情、社情、国情，与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信仰观、等等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深刻而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将会深入地思考上面的这些问题。

================

为什么要进行民主

民主的目的，绝非仅仅是为了人们在物质经济文化生活等等事务上的安宁昌盛，或仅仅是为了社会政治与权力更替的稳定等等，而是，为了正义、公义、平等、自由等等道德与心灵领域的重要原因。圣经告诉我们：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从本质层面上说，所谓民主政治制度，必须与道德价值深深相联。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是以信仰为根基、以对于上帝的敬拜与信靠为中心，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被上帝所祝福的。

===============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在地上进行所谓的“神权统治”，或是，“唯我独尊”地把基督教信仰立为所谓的“国教”。

这样说的人，显然是根本不了解基督教信仰，不了解圣经。

===

马太福音22章15-22节：

15法利赛人就去商量，怎样找耶稣的话柄来陷害他。16他们派了自己的门徒和希律党的人一同去问耶稣："老师，我们知道你为人诚实，照着真理把神的道教导人，不顾忌任何人，因为你不徇情面。17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呢？"18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虚伪的人，为甚么试探我呢？19拿纳税的钱币给我看看。"他们就拿了一个银币给他。20耶稣问他们："这是谁的像，谁的名号？"21他们回答："凯撒的。"他就对他们说："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　神的应当归给　神。"22他们听了，十分惊奇，就离开他走了。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15-22节

基督常常受到许多罪人的反对；他们常常愚妄地想要把基督陷于网罗之中；对于基督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悲伤、忿怒、苦难的事情。这里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用关于向该撒纳税的问题，来攻击、试探基督。

I。他们的计谋与试探。迄此为止，在圣殿这里都是一些掌管权力的人来向基督问话；那些祭司长老们看重自己的权柄，更胜于看重神的道；所以，他们从权柄的角度，来质疑基督（马太福音21章23节）；而现在，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攻击基督。这世上最好的人、最智慧良善的人，不论多么勤勉、多么有智慧、多么无辜、多么诚实正直，仍然无法躲避罪人的诘难，或是口舌的纷争。我们在这里看见，基督的敌人是多么不知疲倦地来反对和抵抗基督以及基督的国度！

1.他们一同商议。诗篇2篇2节预言了，世上的掌权者们一同商议，怎样来对抗神；从前，他们也是这样迫害神的先知。来，让我们用计谋陷害耶利米。见（耶利米书18章18节）（耶利米书20章10节）。人们在罪中的谋划与商议越多，他们的罪恶就愈加深重。那些谋划罪恶的人有祸了（弥迦书2章1节）。人在罪恶中的谋划越多，所行出来的事情也就越罪恶。

2.他们谋划商议的目的，是试图要用基督所说的话来陷害他。他们看见基督讲了很多话语，于是希望，用计策趁着基督不注意的时候，引诱他说出一些不经意的话来，好以此来陷害他。这就是撒旦的古老计谋，使人在言语中犯罪，或是在言语中勾陷人；以赛亚书29章21节："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屈枉义人。"这些犹太人，把以色列人中最伟大的教师，当作是麻烦制造者；他们就是这样以恶谋来对待义人（诗篇37篇12、13节）。

这些基督的敌人，可能通过两种途径来陷害基督、除掉基督——或是借用法律，或是借用暴力。如果用法律的话，他们没有什么办法能使基督顶撞

民事政府部门；因为，犹太人自己没有处死人的权力（约翰福音18章31节）；而掌管权力的罗马人则不在意那些关乎言辞和名目上的问题（使徒行传18章15节）。如果通过暴力的话，他们没有什么办法使百姓憎恨基督；那些百姓、或暴民，总是他们煽动暴力的工具——但百姓都以基督为先知，所以，这些基督的敌人们也无法煽动百姓来与基督对立。现在（正如那古蛇比田间的百兽都更加狡猾），他们的计谋是，把基督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使他不得不在百姓与罗马政府之间做一个选择；这样，他们就可以抓住基督的把柄，以此来对付他。

II。他们问基督的问题（16、17节）。他们在私下的场合商议了计谋，就立刻要来实施了。

1.他们所打发的人。他们没有自己前来诘问基督，免得基督会怀疑他们的动机；而是，差遣他们的门徒们前来，这样，可以让他们假装是来向基督虚心求教、学习的样子。恶人总是不会缺少作恶的器具。法利赛人有他们的那些门徒们在随时待命，奉差遣去做各样的恶事、狡猾诡诈的事情。

另外，法利赛人还打发门徒们与犹太人中的希律党人一同前来。这些希律党人，是在犹太人中间、那些热衷地效忠于罗马政府及其代理人希律的人们。他们总是在一个劲地劝人们效忠政府，向罗马人纳税。虽然希律党人主张纳税，法利赛人反对纳税，然而此时，他们两者却结合在一起，来诘问基督，并要以此勾陷基督。希律得到罗马人的授权，向犹太人收税；希律党人则帮助希律，劝服犹太人纳税。而另一个方面，法利赛人却狂热地想要追求犹太人的自由，因此尽可能地煽动犹太人对罗马政府不满，使他们厌烦罗马人的统治，而挣脱罗马人的轭。现在，如果基督主张向罗马人

纳税，那么，法利赛人就可以借此煽动百姓，使犹太人憎恨基督；如果基督主张犹太人应当拒绝向罗马人纳税，那么，希律党人就可以借机撺掇希律政府来迫害基督。那些反对基督、反对基督国度的罪人们，虽然他们彼此为敌，但是，他们却能够彼此联合统一起来，一同与基督作对。见（诗篇83篇3、5、7、8节）。如果，这些基督的敌人彼此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基督；那么，我们岂不更应该联合起来，捍卫福音吗？

2.他们在问基督问题之前，所说的话。他们假意地称赞基督（16节）：——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通常，那些最诡诈的计谋，往往用最假意的外表包装着。如果他们是真地想来请教基督，带着真诚的目的，那么，他们求问时所说的话，不可能比这里所说的话更好听的了。仇恨，常常用欺谎来伪装；奸恶的心，常常伴随着火热的嘴（箴言26章23节）。正如犹大，一面亲吻，一面却在背叛；约押，一边亲吻，一边杀人。

（1）他们所说的关于基督的话，是正确的——不管他们自己是否知道这一点；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都知道，这里的话的的确确是真的。

【1】基督是一位信实的老师；他所教导的内容，都是诚实的，是关于神的道路与真理。基督自己是诚实的；他是阿们，是信实的见证者；他自己就是真理。基督的教义，是神的道路，是神所要求我们的道路，是我们职分的道路，是通向我们幸福的道路。那道路，就是真理；基督把正确的道路指给我们——那是我们应当走的道路。基督是智慧的老师；他知道神的方式与法则；他是信实的老师，没有欺谎，会完全把事实告诉我们，把神的

道路诚实地告诉我们。箴言8章6-9节。这是那良善的、伟大的教师的品格；他所教导的内容，唯有真理，完全的真理，除了真理、没有任何其他别的。他不会掩盖真理、扭曲真理、伸缩真理，或是为了好恶、恣意、或是对任何人的情感，而在任何程度上改变那些真理。

【2】基督是一位勇气的指责者。在基督的讲道中，他不在意任何人的情面；他不看重人的脸面，不畏惧人的恼怒，也不在意人的私情；他不看重人的身份高低和地位，也不在意人的私意。在基督的福音中，在基督所警告的神终极审判中，他也不看人的情面；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不因任何人而改变他的教训，也不因任何人的情面而偏离他的真理、作为、工作；他也不会畏惧任何人。箴言30章30节。在他指责人的时候，他是公正的，并没有偏向；以赛亚书11章4节。

（2）虽然这些法利赛人的门徒们和希律党人所说的关于基督的话语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目的，却仅仅是虚情假意的溜须拍马和蓄意勾陷与陷害。他们嘴上称基督为夫子，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把基督当作是罪犯和恶人；他们假装尊敬基督，但实际上内心里却想要迫害他；他们不仅藐视基督的智慧，而且更藐视基督作为神的全知与全能——基督已经显出许多清晰的证据，显明了他的神性。他们以为，自己能够用这些假装的态度来欺骗基督；他们以为，基督不能够看透他们这些把戏。罪人在这世上最大的愚妄，就是以为没有神；任何以为能够欺骗基督的人都是愚妄的；基督能够鉴察人的内心最深处（启示录2章23节）。那想要欺哄神的人，不过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加拉太书6章7节）。

3.他们提的问题。请 告 诉 我 们 ， 你 的 意 见 如 何 。 纳 税 给

该撒，可以不可以。这个问题还包含着一个意思是，该撒有权利向犹太人收税吗？这个时候，犹太人的国家已经被罗马人的刀剑征服，有一百年之久了；以色列和别的国家一样，伏在罗马帝国的轭下，成为罗马帝国中的一个省；因此，罗马人向他们征税。这已经清晰地显明，圭已经离开了犹大（创世纪49章10节）；因此，他们若知道这时代的记号，就会知道，这已经是细罗要来到的时间。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向该撒纳税，是否是一件合理、应当的事情；还是，他们应当坚持守护自己作为犹太人国家应有的自由，拒绝服从罗马帝国？他们的怀疑理由是，作为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不应当受人的拘束和捆绑（约翰福音8章33节）。神曾给他们律法，在他们中间，不可立一个外人；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不应该顺服于任何君王、国家、当权者的统治——如果那掌权者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宗教？这是一个犹太人古时就有的错误，是出于他们心中的骄傲和自高；这错误曾经导致了他们的亡国和败坏。当年，耶利米曾经奉神的名告诉犹太人，应当伏在巴比伦王的轭下；可是，他们的顽梗刚硬却导致了他们的毁灭（耶利米书27章12、13节）；而现在，他们又在同一块石头上面跌倒；就是这件事情，短短几十年之后，就引致了他们国家最终毁灭于罗马帝国的手中。他们错误地理解神给他们的吩咐，也错误地理解了神给他们的权益；他们以神的名义，与神在给他们的环境条件中的意旨安排相争——他们本应当顺服于神惩罚的杖下，接受神对他们罪恶的惩罚。

可是，他们阴谋想要用这个问题来勾陷基督；不管基督的回答是怎样的，他们都可以——或是煽动犹太人百姓，或是罗马政府，来反对基督。他们一定在洋洋得意地想，他们肯定赢定了；就像当年法老一样，以为把以色列陷在了网罗之中。

III。基督的智慧，冲破了这些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的网罗。

1.基督看出他们的阴谋（18节）；他看出了他们的罪恶。如果我们识破了罪的引诱，那么，我们的胜利就成功了一半；我们最大的危险，是那只藏在绿草地中的毒蛇的口中谎言。现在，基督质问他们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虚伪的人，为什么要试探我？”无论虚伪之人多么狡猾，基督都能识破他们的诡计；基督能够看透任何假冒之人的内心真实光景与罪恶，并且，能够把他们的罪清晰地指明出来。我们常常会被人欺骗，并容易上当；别人对我们说奉承的话、好听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了儆醒和警惕；但是，没有什么人，能够哄骗得了基督。那鉴察人心的，能够按着虚伪之人的本来面目称呼他们。正如列王记上14章6节。虚伪之人，想要试探基督；他们是在试探基督的认识能力，看基督能否识破他们的伪装；他们也是在试探基督的圣洁与诚实，看基督是否愿意接受像他们所言所行的这些事情；不过，他们的试探失败了；正如，从前撒旦对基督的试探根本没有得逞，现在，他们的试探在基督福音的光与爱面前，更不能够得逞！那些想要试探基督的人，一定会看到，基督的眼睛能够穿透人心，他的眼目纯洁而没有罪；那些罪恶掩盖恶意的虚伪者，那些虚情假意的人们，在基督眼前无可逃遁。

2.基督没有陷入他们所设的网罗。基督已经指出了他们的假冒为善以及恶意；他们的问题不配得到回答，而只配得到指责；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完全而深刻的回答，并且指出了这个回答的背后原因；这个回答，给历世历代的教会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治理原则。因而，基督冲破了他们的网罗，也避免了冒犯。

（1）基督要求他们承认、并顺服于该撒的权柄（19、20节）。当我们面对挑刺、挑衅之人的时候，我们应当给出我们说话的理由，这样，就可以使我们说话的效果更有说服力。从而，真理的证据能够堵住反对者的口。基督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看起来，基督自己的身上没有任何钱；他为了我们的缘故而倒空了自己，成为贫穷；他鄙视世界的财富，因此也教导我们不可过于看重这世上的金钱；基督的身上没有金银，那么，我们岂能贪图那些厚厚的尘土呢？罗马人要求犹太人用他们制作的银钱上税；这银钱此时在犹太人中间流通；因此被称为税银；基督没有指出具体的币值，显明他的心根本不在意这些金银；他的心思意念总是聚焦在那天上更美的事情、神的国度、以及其中的丰富与公义；——所以，我们的心也应当如此。他们拿来一个税银，上面有罗马皇帝的像和印。在钱币上面刻上掌权者的记号，这通常是那些在上执政掌权者的权力之一；因而，全国使用这些钱币的人们，也是在以此承认并顺服于执政掌权者的权力与治理。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的宪法规定，虽然我们的钱币上面是国王的像和印，但我们的财产却是真正属于我们的；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基督问他们，钱上的像是谁的？他们承认是该撒的；因而，他们也就承认他们之前曾经说过的“我们不受任何人的拘束”不过是一句谎言；也因而，他们确认了之后他们将要说的话语“除了该撒，我们没有别的王”。

（2）从这里，基督得出结论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21节）；这里强调的，不是向该撒纳税，而是，“归给”他。既然税银是该撒制作的，就应当归给该撒；在这件事情上，权柄是属于该撒的。现在来跟该撒争议是否应该纳税，已经太晚了；你们已经成了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省；这样的关系

已经建立，因此，你们就应当尽这样的职分。谁的物，应当归给谁；对人，应当尽需要尽的职分。

【1】这里，基督并没有冒犯罗马政府。基督的荣耀和教义显出，他并不干预这样的事情，因为基督的国度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在这里，基督也给一切牧师传道人建立了一个榜样；那些从事圣洁之事的人们，不应当缠绕在这些世俗的事情当中，也不应当陷入其中的纷争，而是要把这些事情留给有恰当职分的人们去处理。传道人们要心系于当作的事情，讨主的喜悦，而不是要缠绕于此生的世俗之中；否则，他们就会失去圣灵的指引，失去神意旨安排的呵护。基督没有在这里讨论该撒的称号，而是强调，应当和平地顺服于那执政掌权者的权柄。罗马的执政掌权者，不应当在此感到受冒犯；事实上，反而应该感谢基督，因为基督的教导在犹太人中间强化了罗马政府所应得的权益——犹太人百姓以基督为先知。但那些控告基督的人，却是出于彻头彻尾的谎言；他们诬告基督，说他禁止百姓向该撒纳税（路加福音23章2节）。而对于百姓来说，法利赛人也不能向他们煽动，使他们起来反对基督；因为基督所说的，不过是他们已经一直在做的事情，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真理固然不需要虚谎的掩盖，但有时，我们需要特别小心的谨慎处理，免得带来错误和冒犯。

【2】基督的敌人在这里受到指责。（第一），其中有些人想要让基督说，给该撒纳税是不合理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有借口省下自己的钱。许多人为了避免自己所当作的事情，就总是会竭力试图辩论说，那事情是否应该去做。（第二），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把神的物归给神；因而，基督在这里指责他们；他们原来所要争论的，是民事上的自由，但是，他们却罔顾自己所失去的信仰的生命与大能；所以，他们应该在心里更看重的，是

要把那本属于神的，归给神。

【3】基督这里也是在教导门徒们，以及历世历代的教会们，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基督徒的信仰，并非是民事政府的敌人，而是朋友。基督的国度并不与地上的执政掌权的政府、国家冲突，也不是要干预民事的纳税；地上的国度，只有靠着基督，才能有和平的统治。

（第二），臣民的职分，就是顺服于在上执政掌权的；遵守国家的法律。地上的政府，应当有职责来管理公共的财物与福祉，保护国家的臣民，维护和平，所以，政府应当在公共的财产中有分。因而，我们有纳税的义务，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与此有关的（罗马书13章6节）。无疑，欺骗政府是比欺骗个人更大的罪。尽管人间的法律和宪法决定了，究竟什么是属于该撒的物，但基督教导我们说，凡当属该撒的物，就应当归给该撒。

（第三），当我们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把神的物归给神。若我们的钱包是属乎该撒，那么，我们的良知和心灵就是属神的；神对我们说，我儿，你要把你的心给我。神所要的，是我们生命中最深处的核心本质，是我们心灵中最高的位置所在；我们必须要本应当属于神，归给神；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产业，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都应当归给神。当该撒的命令与神的命令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遵从神，而不是遵从人。

最后，法利赛人门徒们和希律党人的反应，是非常惊奇；——他们就都离开基督走了（22节）。他们敬佩基督的智慧，能够识破、看透他们精心设计的网罗与计谋；基督现在是，也将要是，一切世人所惊奇的；不仅神百姓对基督的作为大为震惊而惊奇，那些基督的敌人们也会对基督的作为大大震惊而惊奇。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他们对基督的智慧非常惊奇，所以就跟随他；不，事实正好相反；他们虽然惊奇，但是却不顺服、更不愿意跟随。许多人的眼中，看基督为可惊奇的；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跟随基督的引领，也不愿意顺服于基督的大能。他们走自己的路，离开耶稣走了；他们就像是一些垂头丧气的败兵之将，满面羞惭地撤退了。他们的计谋被打败，就只好撤退了。人若想要与基督争论，那就是毫无用处的。

==

继续讲述为什么要实行民主

一方面，民主政治必须应当具有深刻的、深切的道德内涵，否则，任何没有信仰根基、没有道德意义的、所谓的民主，就一定会渐渐滑向——自由散漫、混乱失序、骄奢淫逸、喧嚣躁乱的状态之中，并最终一定会进入溃败、甚至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的局面。

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深切的道德内涵，不应当是通过强力、强迫、压制、勉为其难、差强人意的方式来体现和实现；更不应当是以虚伪的形式主义、口号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的方式来体现和实现。

正是以上两个方面在本质层面上决定了，建立、健全和发展民主政治的道路，必定将会是一个极其艰辛、漫长的过程，需要巨大的耐心、韧性、决心、毅力，甚至需要很多代人的时间、过程、心志、努力。并且，不但如此，若要保持正确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民主制度，也同样需要整个国家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一同彼此心意合一地、居安思危地、谨守于敬虔的信仰与道德之中，否则，民主的成果也将会前功尽弃。

民主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长久、缓慢、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乃至生命与鲜血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虽然漫长、虽然需要巨大的代价、花费、忍耐与耐心，但却都是极其值得的；因为，民主制度如果得到正确的实现与运行，那么，它就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它就将带给人间正义、平等、自由、繁荣、幸福，并使得普罗大众能够更加深切地明白道德、真理、信仰等等许多关乎生命、心灵与灵魂的事情。

这一点，正是民主所应有的真正目的所在。这个目的，绝非通过强迫的方式来实现，也不能通过统治者、或是被统治者中的个别人的一厢情愿的方式来实现，而是必须通过人们巨大的耐心和毅力，通过无数人、甚至许多代人的艰辛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我们可以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来说明这样的过程。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的过程，很像是一个揉面的过程。众所周知，在做馒头、花卷、面包等面食过程中，需要在干面粉中加水、牛奶等，然后揉面、发酵、等等。

在揉面的过程中，需要很有耐心的、力量适中的、精心而均匀的、不断搅拌、翻搅等动作；这样，面团才会逐渐被揉得均匀圆润；做出来的面食才是柔软可口、味道好吃的。

换言之，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发展，绝非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漫长的、耗尽心血、耗费巨大代价的过程。

____

建立一个暴君制度、或是一般性的专制主义制度是容易的，只要一夜之间、或是短短的几十年内，就可以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建立起来。因为，这样的制度是以压迫人民为手段和目的；所以，只要用强力、武力、不管三七二十一、不分青红皂白，对人民一律通通压制、禁声，对异议人士抓捕、监禁、甚至杀害，从而杀一儆百，让全天下人变成万马齐喑，就行了。这样，整个国家就变成了一言堂的天下；人民就变成了像是机器人一样的奴隶，他们的思想、头脑、心灵就变得一文不值；国家就变成了机器；统治者就变成了舵手、或是工程师。从治理方法上来说，这样的专制制度是容易的，并不需要耗费什么脑筋，更不需要耗费什么心情、耐心、耐力、心志等等去做。

建立一个自由散漫的、“多数暴力”的、暴民政治的、或是荒淫糜乱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体制制度，也是容易的，也可以在一夜之间、或是短短的几十年内，就能够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建立起来。只要在国家社会中，通过大规模而快速的煽动，通过暴民中间的鼓噪和喧嚣，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

动，那么，暴民政治或是无政府主义就会很快在国家社会中占为上风，甚至统治国家、左右国家大局与走势。

或者，建立一个骄奢淫逸的、世俗主义的、奢靡之风的拜金主义国家政治体系也是容易的，也可以在一夜之间、或是短短的几十年内，就能够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建立起来。只要在国家社会中，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和鼓动，让人民都投身于发财、赚钱、辛勤经营的活动，把人民都变成世俗主义的经济动物，那么，这种拜金主义人生哲学、伦理、以经济动物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理念，很快就会在国家社会中占上风，并统治国家、用金钱和属世之利牢牢地拴住人民，使人民成为被精神枷锁所捆束的、钱财的奴隶。

———————————————

从本质层面上说，上述各种国家政治机制，无论是专制主义、暴民政治、无政府主义、还是拜金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其实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一些拆毁性、破坏性、负面性的力量，而不是建树性、创造性、正面性的积极健康力量。

简言之，它们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都是消极性质的。它们给人类所带来的，是许许多多的不公、不义、不平等、凶残、暴戾、散乱、醉生梦死、荒淫、压榨、压制、洗脑、灌输、欺骗、谎言、丧失诚信、礼崩乐坏、等等负面后果。

它们或许会在一些短平快的经济目标上、或是某些具体的国家政治目标上，在短时间内、暂时地取得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从长远看来，它们却都无法给人类带来任何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幸福安宁的局面。

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它们不像是一个长跑健将，——长久地、不急不徐地、持之以恒地、几个世纪如一日地、坚韧不拔地，沿着正确而健康积极的轨道和路线图，不断地向前奋进，向着固定的正确目标不断努力、不断前行；而是，————它们像是一些无头无脑的苍蝇或是疯子一样，疾速地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踉踉跄跄、东跑西颠、一会蹦高、一会摔跤、很快就满目苍夷、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全身是伤。这样，几个世纪以后，甚至几千年以后，它们仍然是使人类社会原地踏步、无法前进，甚至给人类带来无数的苦难、战争、生灵涂炭、心灵荼毒。这正是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中的绝大部分内容。

更进一步说，最重要的、最核心、最本质的是，它们都蔑视、忽视、无视、否定、甚至践踏世人的心灵、思想、灵魂的珍贵价值。这正是它们的根本错误根源所在。在它们的眼里，国家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人，只是像一个巨大机器中的一颗小小螺丝钉一样，或仅仅是像一栋巨大楼房中的一块砖头或瓦片一样。在它们的眼里，人的生命仅仅是需要像一个螺丝钉、砖头、瓦片一样、或是像猪一样活着。

在它们的体制中，或是，推崇集体主义；或是推崇享乐主义、或是推崇拜金主义，等等。在它们看来，人生的价值，就仅仅是为了爱国主义、为了社会集体而活着。它们说："没有国、哪来家，没有祖国、哪来个人"。或者，在它们看来，人生的价值，就仅仅是像经济动物一样，追求发财、赚

钱、功成名就、等等。或者，在它们眼中，人生的价值就是纵情享乐，或是好勇斗狠等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

人是什么？人是有着思想、心灵、情感、智慧、灵魂、信仰的，有着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信仰观的存在体。人的真正价值，究其根本而言，不是在于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寿命情况、性别、高矮、胖瘦、相貌美丑、皮肤颜色、头发长短、等等，而是在于人生的内在与本质的内容。人与世间万物不同之处，与一切牲畜飞鸟昆虫等等的根本不同之处，不是在于力量、肌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等，而正是在于人的理性、思想、智慧、情感、心灵与灵魂。正是因此，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取得巨大的发展，以及作出无数科学技术的发明，并深刻地改造和利用这个自然的世界，使之更加美好、整洁、舒适、等等。

在人的生命本质中，一个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关乎道德的性质。我们不会审判一把菜刀或一支手枪，给它们判定杀人罪；而是会审判使用菜刀或手枪的人，给他们判定杀人罪；因为菜刀和手枪本身是无知无觉的，并不具有任何道德的属性。

自由是道德的必需；只有当一个人拥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他才具有道德的意义。正是在人里面的自我认知和自由意志，才使他成为一个人。

换言之，在这个宇宙世间，人的最独特之处就是在于，人是有着“人格”或称为“位格”的存在体；即，在人的里面，有着自我认知、自由意志、以及智慧、思想、理性、情感等等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是独特的，是在这个默然无言的、无知无觉的、甚至荒芜的宇宙世间万物本身之中所没有的。这样的能力，只能是来自于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造物主、上天、上帝。

在这个世界之上，有那样一位无限全能的、全知、全在、全备的造物主。

对于上天、上帝、造物主这样的概念，其实在每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世人心中，都存在着。例如，在中国老百姓心中，都会知道“老天爷”、“天”、“上天”、“青天”、“上苍”这样的概念和词语。在汉语里面，“天”这个词汇，虽然也是指物理性的天空，但是，在“上天”“青天”“苍天”“老天爷”这些词语中，却总是清晰地指向那位能听、能看、并且是公义圣洁、赏善罚恶、主持公道、无远弗届的超然存在者。

事实上，类似于“上天”“上帝”【上帝这个词本身，是出于中国最古老的古书之中，用以专指上天、那全能的宇宙天地之主】这样的词汇，存在于世上人类之中的任何一种语言、方言里面。我们如果深思细想这个现象，就应当非常震惊、讶异，因为在这个世上，并没有哪一个世人见过那位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天、上帝、永生之神。

正如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

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称为美好，又将永生（永远）放在人的心里。

在佛教、道教等泛神主义者的眼中，究其终极意义而言，这个世界之上并没有那样一位全能的创造者、掌管者（所谓佛祖，只是那样一位觉悟者、智慧者、引领者）；这个世界，仅仅是被那样一种没有"位格"的因果、轮回、规律、"道"等等"掌管"着。它们并没有看到，那位永生之神、上天，不仅是超然于世界之上的，而且更是我们世人的天父。

上帝不仅是创造宇宙、掌管宇宙的超然者，而且，他更是创造我们每一个世人生命的主。上帝有着"位格性"，即，他不但是无限全能、全知、全在的、智慧的，他不但创造了一切、掌管着一切，而且，——他更是能听、能看、能言的；他有着完美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他有着无限完美、至为良善的、公义圣洁、慈爱恩典的道德品质。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父；他把那美好而甜蜜的生命赐给我们。他创造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他所创造的光明；他创造了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声音；他创造了我们的口，使我们能够说话；他更创造了我们的心灵与灵魂，使我们能够有思想、情感、智慧、理性与爱。我们每一个世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我们本当是他的儿女。

自由不仅是道德的必需，更是爱的必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有着"位格"的存在者，才有爱的性质和能力。我们每一个世人，正是因着我们里面

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因此，我们才不仅有道德的能力，更有爱的能力。正是因着爱，我们的生命才成其为生命。上帝是爱与良善的源头。上帝是爱。

【引述 哥林多前书13章 爱的真谛】

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 1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2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3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5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6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7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9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10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11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12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象主完全知道我一样。13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____

民主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说到民主制度，人们往往会想起美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度之一、但却是现代社会中最早的民主制国家。实际上，今天的现代世界中之所以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民主政治制度，与美国和英国等国在过去一百年来、尤其是二战以后的榜样和影响力，有着很大程度的关系。

说到美国，人们往往会想到基督教信仰，因为，在美国的早年那批开拓者、建国者中间，很多都是清教徒、信仰虔诚的基督徒们。可以说，今日的美国，正是被当年那样一大批追求信仰纯洁、信仰自由的清教徒们、虔诚基督徒们所建立起来的。直至今天，在美国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在美国政府各级官员就职、法官就职等等仪式上，他们都是以手按圣经宣誓而就职。

显然，任何对于历史稍微留心的人都无可否认，现代民主制度正是从基督教信仰国家发源而来的；现代民主制度不仅诞生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中，而且，现代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蔓延、传播和发展，也与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有着直接而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多数的中国人其实对于美国所谓的基督教信仰立国，存在着很多的误解。这是因为，很多中国人并不明白：——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之间到底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及什么是真正的政教分离的本质含义；以及，为什么在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中才会有“政教分离”这样的提法。【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政教分离”的这个提法，仅仅是出于五百年前的基督

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以后；尤其地，这是出现于英国清教徒运动以后】。

由于上述误解、不解，人们常常会对于基督教信仰与民主的关系有两种不正确的心态反应。

一种是，一味地排斥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的关系，甚至反对基督教信仰。持有这样观点的人们认为：————民主制度与基督教信仰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或是必不可少的关系；民主制度可以、也应当完全摆脱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应当"敬鬼神而远之"，与基督教信仰体系保持越远越好的距离。他们认为：——现代民主制度，最好应当是彻底的世俗化主义，而不要与宗教信仰发生任何瓜葛。

另一种是，认为应当"以基督教立国"，即，把基督教信仰当作成所谓的"国教"，并在此基础上来推行民主制度。

显然，上述两种态度与立场都是偏颇的、不正确的、不恰当的。关于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内涵、外延等等，我们将会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进一步深入讨论。在这里，我们仅仅简单地做一些一般性的陈述；简言之就是：——（1）基督教信仰是因信称义的信仰，是建基于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信仰，而不是建基于逼迫、强迫、勉强人意的基础之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世人的恩典与救赎，是要人甘心乐意地、由衷地、而不是被迫地、相信与接受。（2）正是因此，所谓政教分离，只有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才是有其真实意义的。在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中，政教合一是本质性的内在教义关系。在许多佛教小国中，也存在着强

烈的政教合一的色彩。而流行于中国的大乘佛教，则强调悟道、出世、消极、四大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等等，不仅与政治毫无瓜葛，而且甚至反对一切执著的人生态度；因此，其本身并不存在政教分离的问题。（3）基督的国度不是属乎地上，而是属乎天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们应当消极遁世、不问政治、不问世事等等。相反，基督徒们应当以热忱敬虔的心，在这个世界上、在世人面前，以自己的生命见证出上帝的恩典与慈爱。简单而言就是，“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

关于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深刻、极其重要、具有核心性意义的问题。对此，我们在本书后面专门章节中深入思考。

+++

+++

+++

+++

+++

+++

+++

+++

+++

+++

+++

+++

+++

++
+++
++
++
+++

——

袁世凯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代史中，袁世凯是一个枭雄级别的政治人物。正是在他的权力运作之下，满清灭亡。然而，后来的历史发展事实显明了，袁世凯所追求和看重的，固然也包括国家大事，但他内心真正最为关心的，是他自己的一己之私。

在近现代180年的中国史中，孙中山、袁世凯、慈禧分别代表了三种政治人物、或是三种政治势力。第一种（以孙中山为代表）是以开放、开明的心态看待西方文明，愿意引领中国效法西方文明的先进政治制度与理念，愿意推动中国真正地走向民主、自由、平等、富强之路。第二种（以袁世凯为代表）是处于开明派与拒西派之间的中间势力。这种人往往精明油滑、见风使舵、辗转腾挪、注重实际。第三种（以慈禧为代表）则倾向于顽固、保守、敌视西方。在这三种人中，都有着各自的缺点、谬误、缺陷，但相对而言，第一种人往往更加无私、胸怀远大、诚实；而第二种人与第三种人则更为看重自己的得失，心怀狡诈、自私自利。遗憾的是，在近现

代180年中国史中，第二种人、尤其是第三种人往往在中国内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占据多数、占优势，而第一种人却往往处于下风、居于少数派、常常失败。然而，正如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历史对比一样，历史将要纪念那些正直伟岸的人，并将唾弃那些心灵自私丑陋之人。

____

中国的知识分子

清末民初的保守知识分子，是那些抱残守缺、仍然埋头于故纸堆、四书五经中的那些老夫子们。而清末民初的那些“先进”知识分子，则是像严复、蔡元培、李大钊等这样的，把西方的无神论主义、进化哲学、弱肉强食、物竞天择、或是摒弃宗教信仰、等等西方左派观念奉为圭臬的那些所谓留洋的、或“开明派”知识分子们。在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孙中山的心中，仍然根深蒂固地存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下）》】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另一方面，大批的、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虽然折服于以严复为代表的、大批中国留学生们【这些中国留洋学生，以及受到他们影响的、新学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大中城市里院校的毕业生们，包括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等等无数从事政治、干革命、深深改变了中国近现代代史的政治家们、军事家们】从西方所引进介绍的斗争哲学、进化论思想、等等“现代人类科学文明与先进思想”；——但是，在

过去的一百年中，他们却从未放弃过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八个字出自晚清洋务运动时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容：—— 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 、武备 、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百度百科）

在过去的一百八十多年中，在大批的、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家国梦想中，其实在道德意义上，他们从未真正重视、了解和尊敬过西方文明。

之所以如此，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但却非常复杂的深刻原因。在这些原因中，往往好坏参杂；有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肯定；有的则有深刻的错误，需要清楚地指出。

———————————————

中国自身文化的生命力

第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深刻思想传承的、以儒释道为主体的、复杂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的思想文明体系。

中国的历史与欧洲的历史非常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强烈中央集权色彩的国家，是一个坚定而稳固的思想文明政治体系。欧洲则是一个不断分分合合、吵吵闹闹的众多小国所组成的大家庭。中国历史上称外国人为"夷人"，正如古罗马帝国称北方民族为"蛮族"一样。在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后，直到近现代以前，其实就没有真正的、平等的外交政治，因为中国的那些邻国、外国，在政治经济影响上，在人民文明与富裕程度上，都是中国人眼中所谓的蕞尔小国。自古以来，华夏汉族自视为中央帝国，而外族都是前来朝拜、万国来朝的、偏远地区的、尚未完全开化的百姓而已。

中国有着光辉的思想文字历史，有着像《论语》《老子》《周易》《诗经》那样古老的、深邃的、明哲的人生哲学思考与历史文化传承。这些古代文字所代表的深刻思想，所表达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孝敬、忠诚、诚实、顺服、忍耐、坚韧等等精神，对于社会、家国、人间道德社会的纲常秩序等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显然的、无可置疑的重大意义。这些古代文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对于人生思考的重要助益，在人类历史上，绝不亚于古希腊罗马的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托勒密等哲学家的思想，甚至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它们的重要意义、深远价值、重大教益，就人类整体历史而言，仅仅次于圣经本身。

中文是一种表意文字，而不是像西方文字那样是字母拼写文字。在幅员辽

阔的中国境内，虽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绵延辗转数千里，虽然有许许多多的方言，甚至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县市、隔着大山的不同村落，都有自己的口音方言，但是，却“书同文、车同轨”。相比之下，西方的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等，由于都是以字母拼写为形式，因此逐渐地，各自发展成为独立、平等的语言、邦国、文化体系。

中文的表意文字，相比于西方的拼写文字，虽然对于孩童来说更加艰深难学，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导致高文盲率，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导致文字出版和印刷自动化更加困难复杂，但是，却是一个重要的、意义重大的文化和政治纽带。这个纽带使得整个大中华主义成为一种不可分割的、不可断开的思想文化整体，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力极强的文化传承体系。

———————————————

力量与真理

第二，虽然，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曾经有过大量的碰撞、摩擦、互动过程，以至于今天的中国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与变化；但是，其实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从未进行过真理层面的、坦诚的、直接的冲突与对话。

虽然，中国在近现代史中，曾经多次是西方军事的手下败将，甚至曾经是西方文明的“学生”、日本的手下败将，但是，恰恰因此，那些复杂的中国

近现代政治军事历史，没有导致中国人在道德意义上尊敬、重视西方文明，反而是，更加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们、乃至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忧国忧民、同仇敌忾的心态。

历史上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中日之战、以及一系列的被迫开放国门的条约，甚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的八年抗日战争，等等复杂的近现代历史，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内心伤痛、满怀屈辱。

这些复杂的、许多因素缠绕其中的、饱受屈辱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一方面让中国人对于当年的清朝政府、民国政府、腐败官员、糊涂政治决策等等痛恨得咬牙切齿，另一方面更让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以及深受西方文明影响、明治维新之后"以西方为师"的日本，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态。

今天，在普通中国人心中，尤其是在那些见识过外面世界、内心诚实而开放的普通中国人心中，人们对于西方文明的复杂心态，包含着互相矛盾的、很难调和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人们认识到，西方文明思想体系是璀璨的、是博大精深的，是对全人类有重大贡献与巨大影响的，是文明的。看起来，西方文明中包含着很多好的"哲学"，很多好的思想、内容、政治体制、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科学、等等。因此，许多功成名就的家庭都梦想着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常青藤大学去留学、接受深造，等等。

第二个方面是，人们不可能忘记那些屈辱的近代历史，不可能忘记那些窝囊的战役、羞辱的条款，更不可能忘记，中国的大门正是被洋人的枪炮所打开的。换言之，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从道德意义层面而言，中国文明从未曾真正地被西方文明打败过。那曾经打败中国的，仅仅是枪炮与科技而已。这正如，在五胡乱华的时代，或是华夏文明败于蒙古成吉思汗、忽必烈，以及败于满清八旗军队的时代，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非是因为蛮夷人有更高的文明、有更温良恭谦让的仁爱，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更加野蛮而已。

虽然，在现代中国人的文化氛围里，人们常常在表面上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每一个中国人在良心深处中都知道，其实，强权、力量、武力，绝不简简单单地等于真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都认为，中国文明在近现代历史中从未曾被真理打败过，而仅仅是被强权、力量、武力打败过。这样的历史，既绝不能够说明中国文明不好，也绝不能够说明西方文明好。恰恰相反，对于许多重视民族主义、有强烈家国梦想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正说明了中国文明好，西方文明不好。

在这里，我们不必去分析所谓鸦片战争的复杂来龙去脉，也不必去探讨八国联军侵华的起源，而仅仅是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可的历史文化层面上，探索为什么中国人至今对西方怀有敌意或蔑视，以及，这样的心态正确在何处，错误在何处。让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

——————————————————

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泊”

第三，当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当思考如何吸收西方先进科技与文明体制的时候，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取其精华、去其糟泊”。但是，普通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思想家们，却从未曾认真地想到过、反思过、辩论过，在西方思想文明体系中，究竟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泊、以及为什么。更进一步说，甚至，中国人很少去认真思想，所谓西方思想文明体系，到底是什么。

中国人常常大而化之地以为，所谓西方文明的精华，就是那些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发明等等。一些内心开放的中国人，还会把民主自由、宪政、法律、经济等等方面的内容，也看作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但一般而言，这就仅此而已了。

而关于西方文明的糟泊，中国人则常常误以为是，自由散漫、贪生怕死、贪图享受、个人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吃苦，或者从更深层意义说，也包括西方历史上曾经有的宗教专制、封建愚昧等等。在这方面，很多现代中国年轻人追随、仰慕西方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个人解放，甚至性解放、性自由等等。

简言之，中国人很少去深刻地、公道地、客观地研究，西方文明究竟是什么，其中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主要构成要素是什么，等等。甚至，中国人

大多数虽然都听说过、知道，基督教信仰对于西方文明的核心意义，但是，却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容了解极少、乃至不知所云。

这固然是由于，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动态有机体，而绝非是一个单纯的、静态的、内容一致的铁板一块；但也是因为，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历史的局限、现实政治环境、思想环境的局限性等等原因，从而导致了，那种对于西方文明的全面认知，还没有、或很少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隔阂状态，不仅是在中国大陆如此，即使在资讯自由流通的香港和台湾，也往往是如此。例如，我们从现代著名文化人南怀瑾的著作中，就能够看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文化人对于西方的了解和认知，仍然有着很多主观臆断；这些主观臆想，与实际的西方现状、文明状况等等，有着很大差异。

____

中国古代文明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错

第四，在过去一百八十年中，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互动、来往等等过程中，中国人其实并不真的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有什么错。

当清朝灭亡以后，很快就爆发了五四文化运动。五四文化运动直接催生了现代中国白话文书面语言的正式诞生与系统性普及。五四运动期间，一个重要的主旨就是，要砸烂孔家店，反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精髓，反对以

孔子论语为核心代表的儒家思想。清末民初，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孔的情绪，是因为人们实在痛恨和反感清朝末年的官吏腐败、政治专制、政策愚蠢的局面。人们常常把这些专制弊端归因于孔子的儒家思想。

但是，这种反孔子、反传统的情绪是肤浅的、也是短暂的；很快，到了1920年代以后，社会上就重新兴起了对于曾国藩等传统儒士著作以及整个儒释道中华思想传统的重视。从根本上说，很多中国人并不觉得，在近现代史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是由于中国古代文明传统的系统性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也的确如此。

人们在切身生活感受上，仍然感受到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即使是那些把儿女送到海外留学的父母们，也不希望儿女因抛弃了传统价值，而失去了顺服、听话、孝敬、尊老爱幼等等品德。

人们在国家凝聚力上，仍然深刻地、警惕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等的重要性。

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们更加迫切地感到应当加强和强调传统价值思想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不愿意在西方文明面前，抱以重视和尊敬的态度；反而是，有意无意地贬低西方文明的重要地位，而特别地强调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伟大意义。

____

凭什么因为需要尊敬别人的技术、需要学习那些技术，所以就要尊敬和学习别人的思想体系呢？

第五，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中国需要认真、勤奋、扎实、痛下决心地尊敬和学习别人的科学技术。这一点，很少有中国人会怀疑。但是，很不显然的却是，凭什么因为要尊敬别人的技术，所以就也要尊敬别人的思想体系呢？

这正如，汉人在历史上曾经要学习胡人的骑马射箭技术，但是，汉人却从来没有必要学习胡人的什么思想体系。事实上，华夏民族的思想体系，论语的仁义礼智信，道德经的深邃，要远远地胜过胡人的思想文化传统。

换言之，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技术与思想体系之间，并不一定有什么必然联系。学习和效法先进的技术，绝不等于要学习和效法别人的思想体系。这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常识来说，都显然是正确的思路。正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很深刻，至今在中国人心中仍然刻下深深的烙印；——尽管，我们今天或许很少直接用这八个字来表达我们对待西方时的想法与政策方针。

对于一个普通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来说，显然，技术与科学是一回事，文化哲学思想体系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两件事之间并不一定非得有必然的联

系不可。不但如此，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上，常常是那些不文明、野蛮的民族和国家，才往往长于技术，尤其是那些杀人放火的军事技术；而那些文明程度更高的民族和国家，则看起来，往往是和平的、是与世无争的；——至少，在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眼中，就常常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虽然，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们看到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因此都认识到、都同意，需要认真而勤奋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这绝不等于说，主流中国知识分子们就因此而重视和尊敬西方文明，——尤其是关乎道德意义上的文明而言。

——————————————————

凭什么一定要服气

第六，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国虽然经历了许多失败、羞辱、挫折、失落，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说，我们凭什么就要因此而在心灵里投降、就要因此而在西方文明面前俯身膜拜、就要因此而服气呢？

难道，中国人的心灵与精神中，没有坚强的脊梁吗？我们岂能有奶就是娘呢？我们固然可以接受和学习别人先进的技术、科学、甚至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管理经验等等，但是，难道我们接受西方，就等于要

摒弃文明老祖宗的光辉而璀璨的文明礼制、思想传统吗？

如果说，当面对西方的时候，我们不但不应当摒弃我们自己的文明思想体系传统，反而应当更加坚持和发扬那些古老的文明与悠久的思想、品德、信仰；——那么，这难道不就正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在西方文明面前卑躬屈膝，也不需要在道德意义上重视他们、尊敬他们。

____

技术体系与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

第七，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中，虽然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们都认识到科学技术的深远而伟大的意义，但是，却很少有人认识到、也很少有人同意、甚至很少有人会想到有这种可能性，即：——那些科学技术与西方思想体系本身之间有着什么深刻的根源性关系。

人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因此，若有人说，在科学与西方文明思想体系之间，甚至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根源性的关系，那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匪夷所思、令人难以同意的说法。

所以，当人们说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类的、对待西方文明体系所

应当采取的策略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会点头称是。但是，当听说“现代科学的开启与爆炸性发展，与西方思想文明体系，尤其是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有着深刻的本源性关系”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会立刻声色俱厉地反驳说道：——中国古代也曾经有非常璀璨的科学技术历史，并且，在西方历史上，宗教信仰正是压制科学技术诞生的重大阻碍因素。

——————————————————————

不卑不亢，亦或是应当俯视还是仰视？

第八，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常常是有两种极端态度，而很少有中肯的、平衡的、不卑不亢、实事求是的、公道公平的态度。这两种极端态度分别是，主流的、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对西方文明抱着俯视的态度；而少部分中国人则抱着崇洋媚外、甚至试图要全盘西化的态度。

一般而言，那些越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思想体系熟悉并深感骄傲的人们，就越会以鄙视的态度、俯视的心态，去面对西方文明，甚至根本不愿意静下心来去了解一下，所谓西方文明，到底是什么。

反之，那些越是想要崇拜武力、喜欢时髦、看重力量、喜好外在物质的人们，则就越会以仰视的心态，去看待西方文明，而把自己的中华文化看得一无是处。

上述两种立场，其实都不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明哲的心态。他们两者，也其实并不真的懂得，所谓西方文明，到底是在说什么。

直至今日，许多中国人都肤浅地把所谓西方文明看作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骑士精神、资本主义、个体主义、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百花齐放、自由烂漫等等的代名词。很多人喜欢西方的那些故作高深的哲学，还有的人喜欢西方的竞争与创新，更多的人则仅仅是把西方看作是物质经济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已。

至于圣经、基督教信仰，很多中国人或是对此完全无视、忽视，或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信息资源去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外延、历史，与欧洲国家历史的演化有着什么深刻而内在的关系。还有的人，则简单地把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划上等号，大而化之地把西方文明体系看为是铁板一块，大而化之地用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所熟悉的那种念经敲木鱼的宗教观念，去看待和揣摩基督教信仰，甚至鄙夷地把基督教信仰看作仅仅是洋教而已，等等。

——————————————————

涉及到现实民主政治与权力斗争

第九，在过去大约一百八十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们不重视、不尊重、不了解西方文明体系内涵的另一个非常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漫长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经历着自古以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局。动荡的政治现实与权力斗争，阻碍了知识分子们深刻思考历史、反思文明的客观环境条件。

过去的一百八十年的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满清政府、民国政府、以及中共政府。在专制政权的环境下，政治宣传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维护本政权的生存与稳定性，为此，许多政治宣传内容就是有意识地进行反西方的信息灌输。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政治宣传对人思想的毒害影响至深，使人无法认识到历史、事实与世界的真相。

———————————————————

麦子与稗子

第十，在西方世界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好坏参杂的情况。

马太福音

13:24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13:25 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

子里，就走了。

13:26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

13:27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阿，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

13:28 主人说，这是仇敌作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13:29 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13:30 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13:36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13:37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13: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13:39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13:40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13: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

13:42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13:43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中的内容 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不能划等号】】】

虽然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影响如此广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简单地当成了基督教信仰本身，或者，如果我们简单地仅仅把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划等号，那么，我们就犯下了严重的、望文生义、不认真负责、偏离事实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近三百年来，虽然有很多好的事情，比如现代科技革命的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民主自由制度、法治、自由经济、平等贸易、社会大分工协作、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无数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发明，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也有很多坏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神论主义、进化论哲学、性解放、放荡主义、离婚泛滥、家庭破碎、甚至同性恋等等，也都是来自西方。

显然，如果我们刨根问底、认真查考、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明白，西方世界绝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人也绝非全都是纯洁无辜的、敬虔谦卑的圣徒。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

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有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事实上，即使我们撇开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哲学史等历史领域的角度不谈，单单从宗教信仰、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西方文明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甚至分裂的、内部景况；——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了，西方文明体系绝非简单地、直接地等于基督教信仰本身。

基督教会的简史

在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教会历史中，在大约公元15世纪以前，基督教会一直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由来

东方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是从大约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归依基督教信仰以后，把罗马帝国从罗马迁都至当时的拜占庭市开始的。拜占庭市位于欧洲与亚洲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节点。它后来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这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基督教信仰为国教的帝国，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拜占庭帝国；她从公元四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十五世纪，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没有改朝换代的重要国度之一。公元八世纪左右，这个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基督教国家，开始不断地把信仰传播到后来称为俄罗斯等、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各个国家。俄罗斯这些国家曾经在很长时期一直处于农奴制度状态（俄罗斯的农奴制度一直到后来十七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效法西方工业革命等等的时候，才开始被完全消除）；然而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基督教信仰已经逐渐把社会文明和人道关怀制度带给俄罗斯等的广袤土地。

西方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在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以后，延续和保持了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注：耶稣基督于大约公元元年左右降生，于公元三十三年左右被钉十字架）、使徒彼得时代以后建立的教宗制度。在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的上千年历史中，以罗马教宗制度为核心、以拉丁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西方众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拜占庭帝王为政权中心、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东方众教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在公元一千年以前，东西方教会基本上是兄弟般的关系。他们——都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共同的信仰根基与中心教义的基础；都相信和承认，圣经、也只有圣经，是上帝的全备话语、是上帝亲自的、超自然的启示与默示；都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都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

典。

但是，在公元一千年之前，在东西方教会之间，也一直存在着既合作、又有纷争的状态。两者在各自教会权威、教义细节等等方面都有很多争议、互相对对方不服气。这种状态持续到公元一千年，终于矛盾完全爆发，互相之间彻底决裂，互相否认对方的信仰合法性。

中世纪

公元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被后来称为土耳其人的突厥民族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是源于突厥人的伊斯兰信仰。从此，拜占庭帝国正式覆灭。然而，东方教会，此时已经自称为东正教，逐渐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迁移、直至后来以莫斯科为其中心，继续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会体系分庭抗礼。大约在同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体系（自称为天主教系统），于公元十五世纪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一种近现代文化革命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从大约公元四、五世纪至十五、十六世纪的一千年，被后世称为的所谓“中世纪”，其实并非人们所常常误以为的、专制主义压迫的黑暗时代。事实上，任何诚实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尽管在这期间发生了几次针对中东的十字军东征、回击伊斯兰的进攻和劫掠，但是，总体而言，在这大约一千年的漫长历史年代中，整个欧洲，包括西方教会影响下的西欧，和东方教会影响下的东欧，在政治与军事上，基本上是处于和平时期，几乎很少有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有兵荒马乱、生灵涂炭、改朝换代的时期。在许多乡间、市镇、经贸中心，人民安居乐业，许多地方治安良好、常常夜不闭户。

在中世纪的长达一千年中，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与罗马为中心

的西方教会，各有特色、短长、优缺点。

东方教会所处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帝王及其家族笃信基督教信仰。东方教会分成各个教区，众教区的各级牧者、长老等等围绕着拜占庭帝王，彼此和谐，处于互相和平、长达几乎一千年的安稳状态中。事实上，拜占庭帝国这个名称，是后世的历史学家给起的；当时的人们从未曾这样称呼。他们这个国家，一直自称为“基督之国”、或“东罗马帝国”。

而在西方教会，随着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时代在公元四世纪、公元五世纪的解体与破败，罗马教宗体系饱经风霜、生死存亡、无数的患难、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一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以及他的《上帝之城》。这本书讲述了，根据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所谓上帝的国度、上帝之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长达上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中，西欧从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但是，却有一个统一的教会体系，就是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体系。

我们会在其他文字中，继续深入讨论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历史之间的比较，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短长、利弊、得失；并从中反思，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以及，基督教信仰与世上国度、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文明体系之间的深刻关系，应当是怎样的。

中世纪与近现代之间的分水岭

公元十五世纪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式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近现代历史的开始。此时，一方面，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的突厥人攻陷，因而，整个欧洲大陆与东方地区之间的贸易枢纽、中枢节点被强行隔断。从此，西欧各国开始大兴海上贸易，从而使得曾经位于西欧文明边缘地带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成为海上强国，纷纷在经济政治上依次

崛起。

另一方面，从公元十五世纪，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邦为中心，因着一个开始于美第奇家族的长达约两百年左右的统治，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艺术文化运动，以及，与此同时的、罗马天主教体系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美第奇家族供养了许多后来极为著名的艺术家，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人。这些艺术家回归基督教信仰临到欧洲之前的时期的希腊艺术风格，以绘画和雕塑人体为美、为荣。美第奇家族积极地涉足政治与宗教领域，甚至有的家族成员自己成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皇。美第奇家族的奢靡与腐败之风，加重了罗马天主教本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的弊病。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谬误

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当圣经新旧约全书被从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翻译成罗马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以后，罗马教宗系统就开始逐渐把圣经束之高阁，使普通人无法轻易接触到、阅读到圣经。在公元十六世纪以前的长达一千年中，西欧各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只能从教会的神职人员那里聆听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没有机会自己去阅读圣经、上帝的话语。

在教义方面，天主教系统添加了许多圣经本身没有、甚至是圣经明文反对的内容，例如，不恰当地高举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地位，甚至称之为圣母、上帝之母，以及，把历世历代的许多基督教使徒们、圣徒们当作偶像崇拜、向他们顶礼膜拜、祈祷、祈求庇佑（在这些方面，东正教与天主教存在着同样的谬误，即，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圣经本身的教义和教导，而在后世添加了一些违背、偏离圣经内容的教导、信条）。而且，天主教还在后世自行添加了一些伪经、次经，以及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敬拜的玫

瑰经，等等。

好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纷争与分裂状态，虽然是一件很不好、极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这种状态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可信地保证了，圣经新旧约全书本身，一直被精心地、忠实地保存着，直至后世，因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互相监督、有力督责的效果。

并且，尽管天主教与东正教中存在许多谬误和偏差，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他们的主流信仰、主干教义、主要信条，例如"使徒信经"等对于基督教信仰教义的总结，是正确的。所以，在天主教与东正教里面的信众，如果真心地、真诚地、热忱地寻求和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良善的、真诚的基督徒——尽管，我们应当诚实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圣经的广泛翻译传播，以及近现代时代的开始

公元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君士坦丁堡被突厥人攻占、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方教会保存的希腊文的圣经原典以及许多其他希腊文写成的著名基督教历史文献和著作，被教会人士抢救、传播到西方教会体系。这些希腊文的文献以及圣经原典，开始让西欧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罗马教会的圣经拉丁语译本，在一些重要教义方面的词汇概念上，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失误或偏差。

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许多历史意义影响深远的事情。我们仅举以下三件极其重要而著名的事情为例。

第一件事情是，金属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大规模、迅速地、廉价地印刷、

传播纸质书籍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第二件事情是，罗马教宗的教义上的谬误，以及财物方面的奢侈腐败作风，终于激起了教会各级神职人员以及普通基督徒们的反抗。以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代表，一大批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教廷、传播圣经、传播真正纯正的福音与基督教信仰教义。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为德语，极大地推动了圣经在社会中的普及化、广泛传播。

第三件事情是，英国的丁道尔开始把圣经翻译成英语。这些圣经翻译运动本身，直接导致了现代德语书面语、现代英语书面语等等的诞生，因为在那之前，西欧的书面语言只有一种，就是拉丁语。

圣经的广泛传播，使得欧洲的无数普通人开始真正地、详尽地明白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原则、精髓；这些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革新、更正了欧洲各国人民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方面的许多认识与观念。这样的革新与更正，直接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开启；以及，现代民主自由政治运动、法律、经济等等许多方面的变革，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

这些事情，推动了、构成了过去五百年来的欧洲近现代史，并进而，对于全世界的文明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影响作用。今天，每一个出门坐火车汽车飞机、早上吃牛奶面包、上班穿西服革履、住在高楼大厦或四季温暖如春之庭院别墅里的人，都要感谢培根、牛顿、波义耳等现代科学的开启者们，更要感谢那些舍生忘死地传播圣经、传播基督福音的敬虔基督徒们。

基督教会简史的总结与反思

从上面的简史中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降生以来两千年的历史中，每当人们贴近圣经、寻求圣经、明白圣经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展现出热忱、敬虔、谦卑、真挚、积极的信仰，他们的生命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与国家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也发生极其巨大的改变；上帝的祝福就极大地、温暖地、令人震撼地临到他们。

反之，当人们沉浸在自己的罪性与私欲中，沉浸在彼此的纷争中，当人们没有真诚地、认真地、热忱地寻求上帝的话语、信仰的真理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生命就显出冷漠、消极、惰怠的样式，他们的道德就不断滑坡，他们整个社会与国家就充满了许多动荡、败坏之事。

从基督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反思。

一，上帝的国度，虽然表现在地上的教会中，但是，从终极的意义与层面而言，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地上的任何地方，而是属灵的、属乎天上、那永远的国度与家乡。

二，然而，这并不是说，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地上就没有：——确定的、明晰的、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见证。事实上，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道主义、人的生命与自由被极其重视，到艺术文化、经济与科学的大发展等等，——在无数的层面上，现代人类文明都被深深地刻下了基督教信仰的烙印。（读者可以阅读《基督教的果实》《基督教信仰之大众证据》《基督教信仰之证据的反思》等系列书籍，进一步查考这些方面的事实与信息。）

三，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之间，是无法划等号的。前者固然在极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后者中包含着许多其他方面的成分与因素，甚至包含了无数的糟泊、不义、败坏、奢侈、贪婪、淫乱，等等。

那些感叹"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没有全部改变欧洲人、使全体西方人都成为基督教圣徒，或是为什么没有彻底消灭那些罪恶的恶人"的人们，并不明白：——上帝是公义、圣洁、慈爱与恩典的，他的终极道德审判必将来到，他的终极惩罚是永远的；然而，他以恩典与慈爱，给世人悔改己罪的时间与机会，使他们真心地、真诚地、而不是被强迫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上帝的无限公义与权柄，到那终极的审判日，必将昭然地显明在一切世人的眼前。

四，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对于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不太了解、不求甚解的人，常常把这两者看为同等呢？

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世人并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福音的真正涵义：——"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人在世上应当勤勉而敬虔地生活、工作，但是却不应当把心系于这个世界，以这个世界、或其中任何被造之物为心灵的归依"；尤其是不了解基督教信仰、与世上之国关系的教义：——"基督的国度属乎天上，而不属乎地上；真诚、谦卑的基督徒应当在这个世上作盐、作光，把基督的爱带给世人，见证福音的真实，见证耶稣基督伟大、圣洁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温柔的福音，是圣洁的福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烛火他不吹灭。"

另一方面是由于，世人因着自己生命中的罪性，因着自己的心系于这世上的国度与荣华，所以，常常误以为，神的作为和果效，是要终极地显示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中。他们把世上的荣华璀璨、建筑物的宏伟绚丽、人群的华盖云集，错误地当成了天国里的永远荣耀。他们总是以为，非得要通过外在的、表面光鲜的"荣光"，来看待那些属灵的、属天的、属乎道德的事情。

五，基督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影响最大，特点也最独特的宗教信仰。它虽然指出，我们不应当以这个被造的世界或是其中任何被造之物、被造之人为我们心灵的依归，而是要单单地敬拜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它不是像佛教那样抱着虚无、万事皆空、不垢不净、不生不灭、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诸相皆虚妄的态度，以否定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世事。它告诉我们，应当积极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谦卑、温柔、真诚、和平的心，以勤勉、专诚的工作，去面对一切事情、一切世人。

它虽然指出，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的造物主、生命之主、永生之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上帝是我们道德律法的颁布者、是圣洁公义而全能的终极道德审判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谦卑地降身为人，生在马槽里，生在律法下，取了奴仆的样式，甚至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使一切相信他、接受他救恩的人，得到永生，得以进入那永远的天国、得享那永远的幸福与美好。

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用火与剑传教、荼毒、劫掠，而是用谦卑、慈爱、怜恤与和平的方式，把福音向世界分享。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推行、奉行政教合一的教义与制度，更不是要在地上建立起什么伟大的、属世的国家；它不是要以严刑峻法来统治臣民，更不是要让整个社会万马齐喑、丧失活力与创造力。在圣经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清楚地说道："我的国属乎天上，而不是属乎地上"。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基督教信仰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良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

——————————————————

人的罪

第十一，毋庸置疑的是，在每一个世人的生命本质之中、在心灵深处，都充满了骄傲自义、自私自利等等各样的罪性与罪行。因此，当人所属的原有思想观念体系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就会倾向于，本能性地抗拒、排斥、反抗。

在人的心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往往就是自以为义；即，人总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处的境况、所属的团队是好的、正义的，包括自己的家庭、社群、祖国、思想传统等等。当人遭遇失败、挫折、落于下风的时候，往往会怨天尤人，而很少会反思自己；甚至，人常常会迁怒于外界各样的因素；以仇恨、苦毒、猥琐、自私、自义、心骄气傲的心理去看待世界。很少有人愿意接受挫折和失败。很少有人愿意面对痛苦的反思与深省。

——————————————————

地上的国与神的国

第十二，当人的心背离上天、上帝、那宇宙天地造物之主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心灵与灵魂系于这个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并且，世人常常会有一种深刻的误解，就是认为，上帝的圣洁国度和地上的国一样，充满外在的虚浮样式。

因此，这就往往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常常会把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政治混为一谈；而且，会把西方政治中的某些缺陷、不完美、不好的地方当作借口，对基督教信仰嗤之以鼻；并且，不但如此，反过来也对西方文明抱着蔑视的态度。

==
==
==
==
==
==
==
==
=================================

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过去一百八十年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一直是被很多中国人所认同的、与西方人打交道的原则和战略战术。直至今天在许

多中国人心中也是如此。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仍然没有去认真、谦卑、诚实地去思想，西方人的长技究竟在于什么，其背后的原因、起源在于什么。

不但如此，直至今天，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仍然莫须有地、不实事求是地、不认真考察地、主观臆想地认为，在西方世界，存在着一股反对中国人的强大势力。【值得指出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在西方人反对中国人的历史中，固然有许多错误和弊端，但是，西方人往往并非是——因为对方是中国人而反对中国人，而是因为针对对方各样的错误言行而反对。】

因而，一百八十年以来，虽然屡败屡战，但是，中国人的战略出发点、战略原则、战略目标，从骨子里就一直是想要怎样制夷，——怎样打败、制服、压过那些西方来的“野蛮人”。

如果，中国人不深刻地、不真诚而诚实地面对客观事实（尽管客观事实或许非常复杂），那么，即使《大学》中所说的心诚、格物、致知，也必将令中国人羞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留学生

在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们后来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经济建设、工程科技、教育科学、政治管理、等等数不胜数的重要方面。

以下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的简史。

（选自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B9%E9%97%B3

容闳（英语：Yung Wing，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本名达萌，号纯甫，学名闳，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之学生，亦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后又创设幼童留美计划，世人称他为中国留学生先驱。1876年，美国耶鲁大学授予容闳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扬他对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文化交流重大贡献。
容闳年轻时便曾与太平天国打交道；洋务自强运动期间，容闳向曾国藩进言，若要船坚炮利，必先造“制器之器”。后来又连续参加了戊戌维新、君

主立宪运动、与兴中会革命等，在满清最后六十年之中，从太平天国开始，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每一个最重要的运动里都能发现他的身影。
容闳在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时期发生的自立军起义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此事件在激发中国人政治思想转变上有关键作用，是革命历史之思想转变临界点、转捩点之一，容闳此时始感保皇主张业已过时，使他周围许多维新党人同受启廸。他自己也从此开始，真正与孙文革命事业产生联系，最终在多年奋斗后，亲眼见证了中国革命成果，在有生之年看到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西学东渐记
一般人对容闳生平的了解，绝大部分是来自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容闳用英文写作此回忆录，题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于1909年在美国出版。
自传从1828年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开始，内容一一细数这位“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的初蒙教育、求学经历，学成归国后，从事经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受阻；讲到他如何进入南京，曾与太平天国的洪仁玕讨论如何将西方科学引进中国，寄妄于太平天国能够重建一个“新政”失败；又叙述他如何在自强运动中入曾国藩幕，派往美国购买机器，建成江南制造局，得到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支持，终能以公费选送幼童赴美留学；出任留美学生监督时任大清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副公使；参与“戊戌变法”。全书共二十二章，容闳仅在最后一章中轻描淡写地提到1897年的维新变法和戊戌政变，并在述及他因为参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计划而遭清廷通缉后，一语带过1900年曾在上海召开过中国议会，自传便戛然而止。

中国走向近代的过程，跟中国人留学西方分不开。1898年容闳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上海租界。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主持之“中国议会”，被推为会长，遭清政府通缉，出逃香港，再度赴美，1910年他曾邀孙文赴美商谈，表示支持革命。一个自始至终热爱中国的人，却不得不“远托异

国”，埋骨海角天涯，这是他个人之不幸，也是他所在时代之不幸。

幼年

1835年，经父亲朋友介绍给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由郭夫人负责教导。1839年中英交恶，学校解散郭夫人因此离开澳门，容闳于是回乡，而不久父亲逝世，容闳于是与哥姐工作帮补家用。同年美国教育家勃朗牧师抵达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容闳经郭士立夫人的朋友引荐下于1841年重新复课，当时的学生有唐杰、李根、周运（Chow Wan）、黄宽、黄胜和容闳。1842年，由于香港割让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1847年，勃朗牧师返回美国，离开时带同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其后只有容闳一人留在美国升学，黄胜因病返港，而黄宽则于1849年转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容闳赴美后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就读，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1852年，容闳入籍美国。1854年获文学士毕业，其后返回中国。

洋务自强运动

容闳曾经进入南京，与太平天国的洪仁玕会面，提出以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治国七策”，洪秀全则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最后容闳拒绝赐封离开。他后来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其后，自营商业，旋即投入师夷自强运动。

美国留学计划

1870年，容闳倡议派幼童前往泰西肄业之计划，获其好友丁日昌赞同，并且得到曾国藩、李鸿章支持，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幼童出洋时平均年龄只有12岁，容闳亦被任命为留美学生监督及清政府驻美副公使。但随后数年，驻美公使陈兰彬不断地要求撤回学生，与容闳争论不休，李鸿章从中调停。

然而1881年，留学之事出现变数。李鸿章本欲该批学生进入军校就读，但美国政府当时只允许日本人就读军校，而拒该批学生于外，陈兰彬故主张全撤留学生。再加上留美幼童习染西洋风气，甚至归信基督教和剪辫，令保守的清朝官僚十分不满，上奏批评要求撤回。最终朝廷准奏，召回幼童。除了部分因病和擅自留美不归者外，其余均召回国授予职务。

虽然这次留学运动未能完满成功，但这一批留学生返国后对于中国现代化均有贡献。当中最著名者为外交官唐绍仪、刘玉麟、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香港行政局首任华人官守议员周寿臣等。

戊戌维新

从1862年开始，容闳便亲身投入了洋务自强运动，要将西方的知识引进中国。虽说其努力全遭到愚昧却有效的腐败官僚系统的排挤与掣肘，让他处处碰壁，但他仍屡挫屡起，热心不减。但在1881年，清朝官吏的无知、无能、与无用竟使容闳主办的小留学生运动在施行十年后流产，终于让容闳看清了仅以科学西化来救国之困难。在产生无力感之余决心将注意力开始放在政治改革上，希望能从根本做起，真正有效地改变中国的前途。但类似的挫折接连而来，迫使他稍后在居留美国的妻子重病之际，于1883年失意地回美国照顾她，并在1886年妻子过世后继续在美独自教养两个幼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容闳因不忍心隔洋看着祖国灭亡，应召远赴伦敦向外国商借军费，虽所谋因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踌躇不决而失败，1895年他仍再次回到中国，并于定居上海之次年上奏朝廷让他在中国设立国家银行，结果还是好事多磨，因盛宣怀居中破坏而不了了之。

甲午战争开打不久即决胜负，虽然中国的大败让容闳对救国几乎彻底绝望，但也同时让他有机会在1895年认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三个同样口操粤语，又在救国认知上产生共识的老同乡之遇合，总算又为容闳在政治改革的抱负带来了另一契机。

长期居住于美国，英文造诣极高的容闳，对西方民主政治与国际情势见识极深，维新党人因此对他十分倚重，而在临老之年报国有门，容闳也对维新运动中的各种大小改革，积极参与。“保国会”成立当日，容闳亲自到

场，当时他已经快满七十岁了，比康有为还年长三十岁，比梁启超则整整大了四十五岁，而他也老骥伏枥，竭尽心力，连下榻之处都成了党人聚集商议之地，俨然是维新派幕后的总参谋长。
不料慈禧对光绪帝维新大不满意，在9月19日傍晚，突然一声不响地从颐和园搬回大内，并囚光绪于瀛台，自己重掌大权。这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开锣一百日便被强制下档。当时官府在京城里到处捕抓维新党人，容闳、康有为、梁启超、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他们一同商讨如何请美国公使、英国公使、及日本公使等来营救党人，保护皇帝。康有为离京后，搭乘英国商船到上海，后改乘英国军舰到香港，再由孙文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等陪伴东渡日本；而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伊藤博文也帮助梁启超脱逃，让他乘火车到天津，再搭日本军舰到日本。容闳自己则先藏匿于上海租界数月，再于1899年辗转逃往香港。

容闳之坟墓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文请容闳归国。但1912年4月21日，容闳于美国去世。

================

中国留美幼童指中国历史上首批官派留学生。早年容闳曾留学美国，成为首名就读耶鲁学院之中国人。1870年，容闳倡议派幼童前往泰西肄业之计划，获其好友丁日昌赞同，并且得到曾国藩、李鸿章支持，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幼童出洋时平均年龄只有12岁，容闳亦被任命为留美学生监督及清政府驻美副公使。但随后数年，驻美公使陈兰彬不断地要求撤回学生，与容闳争论不休，李鸿章从中调停。

然而1881年，留学之事出现变数。李鸿章本欲该批学生进入军校就读，但美国政府当时只允许日本人就读军校，而拒该批学生于外，陈兰彬故主张全撤留学生。再加上留美幼童习染西洋风气，甚至归信基督教和剪辫，令保守的清朝官僚十分不满，上奏批评要求撤回。最终朝廷准奏，召回幼童。除了部分因病和擅自留美不归者外，其余均召回国授予职务。
虽然这次留学运动未能完满成功，但这一批留学生返国后对于中国现代化均有贡献。当中最著名者为外交官唐绍仪、刘玉麟、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香港行政局首任华人官守议员周寿臣等。

第一批幼童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出发，跨越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登陆。他们乘坐刚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从此开始了他们预定长达十五年的留学生涯。
幼童们被分配到54户美国家庭生活，其中康乃狄克州34户，麻省20户。他们以惊人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成为各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所得优异成绩令美国人惊叹不已，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入读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6名进入伦斯勒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
洋化（现代化）
幼童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过美国式生活，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幼童不愿再穿长袍马褂，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甚至不少幼童更将脑后长辫剪掉。一些幼童受宗教文化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幼童学习西方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崭新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了启蒙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使他们渐渐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失去了兴趣，不太遵守烦琐之专制礼节，进而认同个人权利、自由、民主等先进理念。他们与美国女孩子暗暗约会，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等，凡此种种新变化都被清政府保守官僚视为大逆不道，不可容忍，一场围绕留美幼童之中西文化冲突无可避免。
遭召回
1881年，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全部学生被召回国。当

时，耶鲁大学的22位留学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二人顺利完成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

此群中国历史上首批官派留美学生回国后即遭到社会谴责，当时1881年9月29日《申报》写到：
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遣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性情则多乖戾，禀赋则多鲁钝，闻此辈在美有与谈及国家大事及一切艰巨之任皆昏昏欲睡，则其将来造就又何足观。

建树晚清
留美学生回国后参与了中国最早的矿冶、铁路、电报建设，活跃在此等新兴产业。一部分人又历经了1884年清法海战和1894年清日甲午海战，甚至为国捐躯。直到20世纪初，这些当年的留美幼童纷纷成为朝廷重臣，在外交领域，更是当仁不让地代表大清国，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詹天佑：著名铁路工程师，运用折返线原理修建京张铁路。还曾经在福建水师任职，参加了清法马江海战。
唐绍仪：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促成南北议和，参与《拉萨条约》，与英国签定《中英续订藏印条约》。
梁诚：驻美国公使，向美国交涉返还1500万美元庚子赔款。
唐国安：清华大学首任校长
蔡绍基：北洋大学校长
邝荣光：中国第一批矿冶工程师，曾发现湘潭煤矿。
沈寿昌：大清北洋水师济远舰大副，在丰岛海战中指挥军舰与日本海军作战，并英勇战死。
周寿臣：晚清重要官僚，二十世纪前期香港政商界著名人物。

容星桥：参加了辛亥革命，协助建立民国。
方伯梁：清政府京张铁路电讯工程师，山海关路矿大学堂校长（即唐山铁道学院和西南交大前身），奉天农工商司副司长（奉劝道副道台）。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https://www.sohu.com/a/247569054_100203158

如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少年走出国门，前往世界各地留学。眠眠本人也是在美国读完硕士，又继续在北美生活多年。我深感广大身在海外的华人，热爱自己的祖国，无不心系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因为，早在160多年前，就有一个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他就是被誉为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念hong），中国的第一个“海归”。

01

容闳1828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无钱供他上学。7岁那年，他的父亲把他送到澳门附设于伦敦妇女会的马礼逊纪念学校读书，因为这个学校学杂费是全免的。学校的校长是一名德国传教士的夫人。

后来，美国教育家勃朗牧师来到澳门，接手马礼逊学校。1847年初勃朗回美国时，带了容闳等3个中国学生同去，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城学校就

读，这是一所大学预备学校。

三年后，容闳在慈善组织的资助下进入耶鲁大学。大学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

就这样，容闳成为耶鲁大学历史上第一个中国毕业生。

另一位中国学生黄宽则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成为中国最早毕业于英国大学的留学生。后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作为优秀的外科医师，是中国最早担任西医教学的教师之一，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人才。还有一位名叫黄胜，一年后因病回国，后来在香港报馆任职并成为著名华侨领袖。1873年后随第二批幼童赴美，并到中国公使馆做过译员。

1855年，容闳怀着报效祖国的愿望回国了。可是回国之初他并没有得到重用，尽管他有着美国顶级大学的文凭，然而，当时封建制度下的中国，认的只是科举功名。受到冷遇的容闳开始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任书记员，后来又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任译员。

第二年他前往上海，谋得海关翻译处的职务。可是当他听说，凡是中国翻译绝不可能有升迁至总税务司的希望，便毅然辞职而去。后来又进入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

不过他最为关心和憧憬的事情却是实现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让更多的青少年出国留学，接受西方先进的理念和科学技术，从而推动实现国家的近代化。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

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

02

容闳最初是把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运动上的。在香港的时候，容闳曾经结识了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

洪仁玕自幼喜读经史、天文历数，和洪秀全一样，也是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来以教村塾为生。金田起义时他恰好不在当地，他追踪寻找起义军没有成功，一年后逃亡到香港。在香港他学习天文知识和西方文化，成为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以发展资本主义来改造中国。1859年洪仁玕自香港到达天京（南京），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为干王，还曾经总理天朝朝政。他根据自己对世界大势、西方文明的了解，写了一部《资政新篇》，书中主张接受西方文明，走西方强国富民之路。

同为西方文明的接受者，容闳了解洪仁玕思想开明，觉得他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国家的构想。

1860年11月，容闳专程冒险前往天京，访问太平天国。在与洪仁玕见面晤谈中，容闳提出了7条建议：创办武备学校，培养有才干的陆军军官；创办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组织文官政府，以有才智和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建立银行体系，厘定度量衡标准；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教育体系；建立实业学校体系。

容闳真诚地表示，建议如被采纳，愿为太平天国效力。洪仁玕对容闳的建议非常赞赏，觉得与自己在《资政新篇》中的思想不谋而合，两人对7条内容做了认真的讨论。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洪秀全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经过前几年的天京之变内讧，天国早已丧失了元气，洪秀全也已经全无进取之

心。

几天后，洪仁玕表示这些建议虽然意义深远，但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无法实施。他能给容闳带来的只是一方洪秀全授予的刻着“义”字的四等爵位的官印，洪仁玕极力挽留容闳，希望他能留在天京与他们共创大业。然而，容闳通过自己数十天的观察，也已经发现了太平天国的一些弊端。认为洪秀全只是利用西方的基督教来号召穷苦百姓为他推翻满清王朝，根本没有可能接受建立一个平民政权的主张。太平天国即便能成功，也只是“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一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未敢信其必成”。

他认为干王比其他诸王甚至洪秀全本人更有见识，却是孤掌难鸣。容闳感谢干王洪仁玕对自己的器重，却婉拒了洪仁玕让自己留下当官的好意，随后离开了天京。在天京碰壁的现实，让容闳感到报国无门。他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以施行自己抱负的地方。尽管当茶商可以获利颇丰，但他依然期待一展宏图。

03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批有识之士逐渐明白了落后就会挨打的道理，开始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口号，然而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兴趣。

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和北京，烧毁万园之园圆明园，朝野震惊。以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认识到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技术的意义，开始将“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付诸实践，推行起洋务运动。这也让容闳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1863年，容闳收到曾国藩令人接连发来的五封信，邀他去安庆。信中介绍

了曾国藩想创办近代工厂的想法，要容闳为自己创设机器厂出力。曾国藩思贤若渴的举动使容闳大为感动， 9月他来到安庆，成为了曾国藩的幕僚。两年前，曾国藩与徐寿、华蘅芳和李善兰等人谋划，在安庆创建了军械所，试制枪炮和船只。

曾国藩召容闳入幕，主要是要他创办机器造枪厂，制造外国最先进的来复枪，解决急需。容闳却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武器，而是整个经济体系落后，没有基础性工业，国家就不能真正富强。

他向曾国藩提出自己的建议，就是第一步要向国外购买“制器之器”来设厂制造机器。他向曾国藩等人介绍目前中国需要建立通用的和基础性的机器厂，它们本身能够再生产出许多同类性质的机器厂。而这些通用性的机器厂又能够生产出特种机器来制造国家需要的枪炮、发动机、农业机械和钟表等具体产品。

他进一步向曾国藩解释，如果中国拥有了许多这样精良的机器厂，必要时就能够使这些机器厂分工合作，提高效率。应该说，容闳的这些理念在当时都是具有超前意识的。曾国藩听懂了容闳的意思，他也是从善如流，对首先应办“机器母厂”的建议大为欣赏。他给容闳签发任命，授予五品军功头衔，派他全权负责创设“制造机器”的新式机器制造局，并出洋到美国置办机器。

1865年，容闳在美国采购的机器设备运回了上海。江苏巡抚李鸿章将这些机器与上海原有的设备合并，在如今虹口区沿江一带组建江南制造总局，又称江南铁厂。这座中国最早的一批工厂之一，也就是现在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容闳协助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丁日昌拟定出管理和经营章程。

起初，江南制造局主要是制造枪炮军械，同时也修造轮船。后来经过发

展，又分成了5个分厂：制造枪炮的军火工厂，制造和修理船舶的船厂，炼钢厂，火药厂和机器制造厂。同时还设立了翻译馆印刷出版外国书籍，设立工艺学堂培养机械工程师和技工。

于是，江南制造总局成为中国最大的军工厂。

后来江南制造局搬迁到高昌庙，更是发展成为拥有13个分厂，2500多间厂房，3500多人员，600多台工作母机的大型企业。终于实现了容闳当初向曾国藩建议的要有“机器母厂”的规划。江南制造局成立3年后，1868年徐寿主持设计制造出第一艘轮船。除了蒸汽机是从外国购置，船体和锅炉都是由中国自己制造。这艘60多米长，9米宽的轮船动力达到近400马力。

这年9月，轮船从上海开到南京，两江总督曾国藩欣喜异常，将其命名为“恬吉号”。并且邀请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一同登船，从下关码头开到安徽马鞍山采石矶，来回180里。曾国藩意犹未尽，兴奋不已地写道“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

而1866年在南京中华门外设立的金陵制造局（南京晨光集团前身）。几年后也已经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前膛炮、炮弹以及炮车和枪弹。曾国藩成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容闳在中国军工近代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和抱负。

04

然而，容闳最为热衷的是从事教育，推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实现教育救国。随着兴办军工企业的成功，他开始希望争取曾国藩对自己推动中国幼童出洋留学的主张给予支持。

1867年，在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支持下，容闳提出4条建议：组织轮船公司，不允许外国人做股东；政府选派120名优秀幼童出洋留学，分为4批，每批30人；政府开采矿产；禁止任何教会或派别的传教士干涉中国司法。

在这里容闳采取了一个策略，他真正关心的其实是第2条派遣幼童留学。因为其它几条被采纳实施的难度很大，如果被驳回，那么留学生的建议就很可能被批准。而当时在中国官场，批复下面的要求往往习惯地要驳回一部分。

这个最终由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并且得到洋务运动首脑、恭亲王大力支持的上奏，又拖了4年之后，终于获得朝廷正式批准。为了实现这件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容闳孜孜不倦地努力了17年。第二年初，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成立，翰林出身的原刑部主事陈兰彬任正委员，容闳担任副委员，负责选派优秀幼童留学，并监督留学计划的实施。容闳本人也具体负责幼童们在美国的教育。按照计划，每年挑选30名12岁左右的学生赴美留学，分4年共120名。但在当时的中国，人们还是认为只有科举才是正途，出洋留学被视作异端，竟然没人感兴趣。

据说，当时在上海好不容易才凑足了第一批30名官派赴美留学生，这与如今的出国留学热潮确实有着天壤之别。1872年9月，第一批中国幼童留学生来到美国旧金山，受到美国民众的极大关注。随后几年间，4批幼童陆续抵达大洋彼岸求学。我们熟知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就分别是其中第二、三批留美的。后来随着曾国藩离世，李鸿章独力难支。留学一事遭到朝中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看不惯留学生们穿着和举止的西方化，斥责他们“适异忘本，目无师长，难期成才，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有的学生剪掉了辫子，更是让他们痛心疾首。

1881年，虽然李鸿章和容闳进行了申辩和力争，朝廷最后还是决定撤回这些留美学生。近百名仍在不同阶段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们分三批被迫离开那些著名的大学，回到国内。容闳殚精竭虑促成的中国学生出洋留学，教育兴国的事业中途夭折。这些中途回国的留学生们大多没有毕业，取得文凭。可是即便如此，他们接受的先进教育让他们有了新的思维和更广阔的视野，掌握了更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据统计，这批留美生中后来有30人从事工矿、铁路和电报业，其中产生了9个工矿负责人，6个工程师，3个铁路局长。有5人从事教育事业，出了清华大学校长和北洋大学校长。有24人从事外交行政事业，其中12人做到领事、代办以上职务，有国务总理、外交部长、副部长以及驻外大使。有20人进入海军，其中14人成为海军将领。还有7人从事商业。

留美幼童们都成为不同行业的翘楚，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容闳主张西学东渐，科教兴国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容闳本人一如既往地心存爱国情怀。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为祖国的命运担忧，随即从美国回到国内。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各种兴国方案，其中包括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等重要的建议。

后来他还作为核心人物，积极参与了戊戌年的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容闳冒险逃出北京，进入上海租界躲避追捕。晚年，他又与孙中山通信频繁，支持民主革命。

人们评价容闳：他所做的一切，饱含着他对祖国最真挚最强烈的爱。他一生顺乎历史潮流，与时俱进，为西学东渐、富强国家而不懈奋斗，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876年耶鲁大学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如今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的肖像并排，一同受学生们瞻

仰。容闳诞辰170周年时，耶鲁大学所在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宣布，将9月22日公订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

==============

庚子赔款留美学生

现代科教文开拓者

胡适，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后来成为学术界大师，影响了一批学人如梁启超、顾颉刚、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后的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为人们所肯定。

赵元任、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中国现代音乐学先驱，他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像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胡明复、数学家。也是中国以攻读数学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周仁，钢铁专家，是中国最早进行特殊钢和合金铸铁研究和生产者之一。

秉志、动物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是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系和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的创办人。

过探先、我国早期的农林科技人才，创办国立东南大学农科、金陵大学农林科。

姜立夫、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创始人。曾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对中国现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从事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研究。

孙学悟，我国第一个化工科研机构，开创了中国无机应用化学、有机应用化学及细菌化学的研究。

金岳霖、中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被誉为"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叶企孙、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龚祖同、龚祖同，光学家。中国光学玻璃、纤维光学与高速摄影的创始人，中国应用光学的开拓者之一。

顾功叙、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和中国地震学会的理事长。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

赵九章、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地球物理科学的开拓者。

陈省身，现代微分几何之父。

钱学森、中国航天之父 中国导弹之父 火箭之王 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

童第周，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奠基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

汪德昭，大气电学家、水声学专家，中国水声事业的奠基人。

像还有马大猷、 杨振宁，钱令希，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侯德榜、张青莲等等。后来也都成为各自学科的佼佼者。

——

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等等的前哨思想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成立。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尤其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存在着一股强烈的反传统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运动在后来的1919年五四运动中爆发出来；许多人提出了所谓“打倒孔家店”等反对儒教的口号。从1919年至今的一百年中，以论语为核心的、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受到了剧烈的冲击；虽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仍然有很多人推崇儒教；但是，由于科举制度取消、由于中国在科教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剧烈的现代化改革，所以，与中国古代历史相比，儒教思想在中国的地位早已经大不如前。这间接导致了，原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处于亚文化地位的佛教思想，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二十一世纪初，在台湾香港等地、以及中国大陆（尤其是在民间的很多所谓“社会精英”人士中间），勃然兴起。【关于从一个基督徒的视角反思儒家以及佛教思想，详情请见《关于论语的联想》《从金刚经说起》】。

基督教信仰在中国

+++
+++
+++
+++
+++++++++++++++++++++++++

http://cclw.net/gospel/new/zgjhlsjy/htm/chapter10.html

第四章 风雨民国

一、宣教高潮与教会复兴

在20世纪初期的20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动荡和变革：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辛亥革命、中国民国诞生、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运动。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为基督教提供了新的社会环境，使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沉重打击的基督教重新崛起。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中，基督教传教事业有了迅速发展，堪称"黄金时代"。

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掀起了又一次灵性大复兴运动，美国社会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宣教高潮。1888年，兴起了"学生志愿海外传

教运动″，口号是″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世界″。抱着″为基督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和火热的奉献精神，许多青年学生纷纷表示愿意献身于宣教事业，前往海外宣教，许多著名的宣教士如司徒雷登、赖德烈等都是受此运动影响来华的。据统计，从1888年到1919年，美国共有8140名学生志愿者被派往海外，其中来华者就有2524人，约占总数的1/3。与此同时，美国各基督教差会也大量派宣教士来华，美国的长老会、圣公会、监理会、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

据统计，基督教来华差会1900年有61个，1906年增至67个，1919年就猛增到130个，另外还有36个基督教团体独立经营的各种事业。其中最具实力的是内地会。20年内差会增加了1倍多。

外国宣教士1900年为1500人，1905年增至3445人，1914年是5400人，1919年为6636人，20年间增加4倍多。大部分宣教士集中于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济南等中心城市。传教活动呈现从沿海向内陆，中心城市向四周乡村辐射的形势。

1920年，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开设了693个传教点，1037个布道机构。

1900年时全国信徒有8万人，1906年增至17万，6年间增长1倍，为信徒发展最快时期。到1914年有信徒25万，1918年为35万，1920年达36万，14年间又翻了一番。从1900年到1920年间，中国信徒总数增长了4.5倍。中国信徒集中于沿海城市和乡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奉天7个沿海省份的基督徒，占总数的71%。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学校中信徒数量有较大的增长，1907-1920年间，全国信徒人数增长105%，而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增长322%，同时期教会学校教师人数增长374%。1920年青年会曾对133所教会学校进行统计，学生中信徒约占49%，加上那些信仰基督尚未加入教会的学生，总数可能超过50%。再加上为数不少的毕业生，数量就更可

观了。这使基督徒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当时全国平均每75人中仅有学生1人，而基督教团体中平均每3人就有学生1人，能识字读经的信徒已大有人在，尤其在苏、粤、鲁、直四省，教会学校学生最多，信徒的增加极快。

此外，基督徒的社会地位也随着教育大幅度提高。因清末新政，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有了更为宽广的就业机会，收入也大为改善。各行各业都有基督徒美好的见证，最引人注目的是孙中山先生和他不少的革命同志如陆皓东、陈少白等都是基督徒；民国政府国会议员中基督徒达60余人；1912年广东省政府的任职人员中，基督徒占65%；当时驻德公使颜惠庆、农林总长陈振先、海军次长李和、参政院次长王正廷等均为基督徒。

在中国基督徒质和量都大为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神职人员队伍开始形成，尤其是1907年以后，按立的中国神职人员逐渐增多。1906年按立的中国牧师为345人，到1919年增加到1065人，增长了3倍。为培养传教人才，差会在各地开办了许多神学院和圣经学校，到1920年，全国有神学院13所，男子圣经学校48所，女子圣经学校52所。中国教会的上层领袖大部分都毕业于大学水平的神学院校。1907年传教士百年大会时，经教会选派的500名代表中，没有一个中国人；但到了1913年基督教全国大会时，115名代表中中国人占了1/3，到1919年中华归主会议时，中国代表已占半数，中国教会领袖已成熟壮大起来，成为基督教事业中必不可少的力量。

民国以后，中国民众对外国人不再感到陌生，尤其是英语好的大中学生可以直接与外国人对话，中国教牧人员的布道更容易被群众理解，达到良好的效果。1907年的百年大会成立了″福音委员会″，三年后在汉口召开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制定了庞大的城乡宣教计划，鼓励开布道会、奋兴会，呼吁所有的基督教组织共同传播福音。学界的宣教工作主要由青年会组织进行，1911年后青年会数次邀请穆德、艾迪等美国著名奋兴布道家来华举行大规模布道会，每次出席者都达数千人以上。演说的对象绝大多数

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注意从科学和哲学问题入手，学术性较强。他们还针对当时中国青年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和救国问题进行宣讲，指出拯救中国的理想之道在于耶稣基督的能力。

中国传道人中著名的布道家为丁立美牧师。丁立美原籍山东，毕业于狄考文创办的登州文会馆，1900年被按立为牧师。他有雄辩的口才，他的祈祷扣人心弦，很有吸引力，他在山东、北京、天津、通州等地布道，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信主。

这段时期在中国教会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布道会、奋兴会，掀起了广泛的复兴运动。具体而言，有教堂布道、乡村布道、街头布道、学校布道、露天布道大会等；还有布道周、主日布道、新春布道、圣诞布道等；有个人布道、家庭布道、文字布道等；还有面向特殊群体，如军队、人力车夫、监狱犯人等的布道。

1913年，冯玉祥将军在崇文门堂参加了穆德举行的布道会，对耶稣的人格和伟大的牺牲精神留下了良好印象，会后即报名参加圣经班，受洗成为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将军"，他自己经常亲自证道，悔罪认错，他手下的不少将领也受影响而信主。他的部队中有随军牧师，驻军开奋兴大会，信主士兵达1万人以上。他的部队军纪严明，军中提倡博爱、牺牲、团结，有"模范军队"的美誉。

除重视向学生知识分子布道之外，一些教会着重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传教，以各种奋兴会和培灵会来挑旺他们的灵火，许多人在聚会中痛哭悔罪，请求赦免，接受基督作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些人悔改后更加热心地向他人宣教，带领周围的人信主，很有果效。

这一时期中国教会大复兴，还表现在对中国基督教的现状和国情作了

详尽的调查。1910年，英国爱丁堡举行"普世宣教会议"，将全球宣教事业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讨论和研究了宣教组织的协调与合作等8个问题，并提出了要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个传教区进行调查的建议。1913年，穆德来华发起召开了全国基督教第一次大会，提出各差会要对中国基督教现状和有关中国的国情作周密的调查研究，以便对中国的传教事业形成清楚和明确的计划，为此设立"中华续行委员会"。从当年开始，各差会的传教士就开始分门别类地收集各种与宣教有关的资料，并提供了详尽的报告。1918年，开始普遍的调查工作，内容包括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绘制各省详细地图、行政区的划分、气象状况、方言区域、全国人口、交通、经济变迁、基督教以外其他宗教的分布状况、各差会近20年以来的宣教历史、各差会在华分布及力量比较、差会未到区域，教会医院、学校、出版事业，天主教、东正教在华活动状况等。调查历时3年，取得许多珍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最后成果于1922年出版，书名为"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直译为《基督占领中国》，中文名译作《中华归主》。

受此调查的鼓舞，为了使中国福音化，1919年底"中华续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发起"中华归主运动"。该运动旨在联络全国教会，"使基督教在个人与国家之上，得最明确之信用"，为此，大会提出提高信徒文化水平，发动全国信徒投入事奉行列，造就及搜罗优秀同工，实践远方布道，改良社会，栽培信徒灵命等任务。此外，还决定继续展开全国性布道运动，并成立了"中华归主运动委员会"，出版会刊《中华归主运动》。各地教会纷纷响应，积极推进当地的"归主"事业，号召每个信徒家庭举行祈祷会，在本家族中布道等。

然而，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国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反帝爱国情绪高涨，中华归主运动受到由此引发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巨大冲击，归于沉寂。

二、非基督教运动

1922年，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把批判基督教运动推向高潮，掀起了一场历时6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一时间基督教成了众矢之的，受到社会的公开谴责和攻击，运动的重心在于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教会教育，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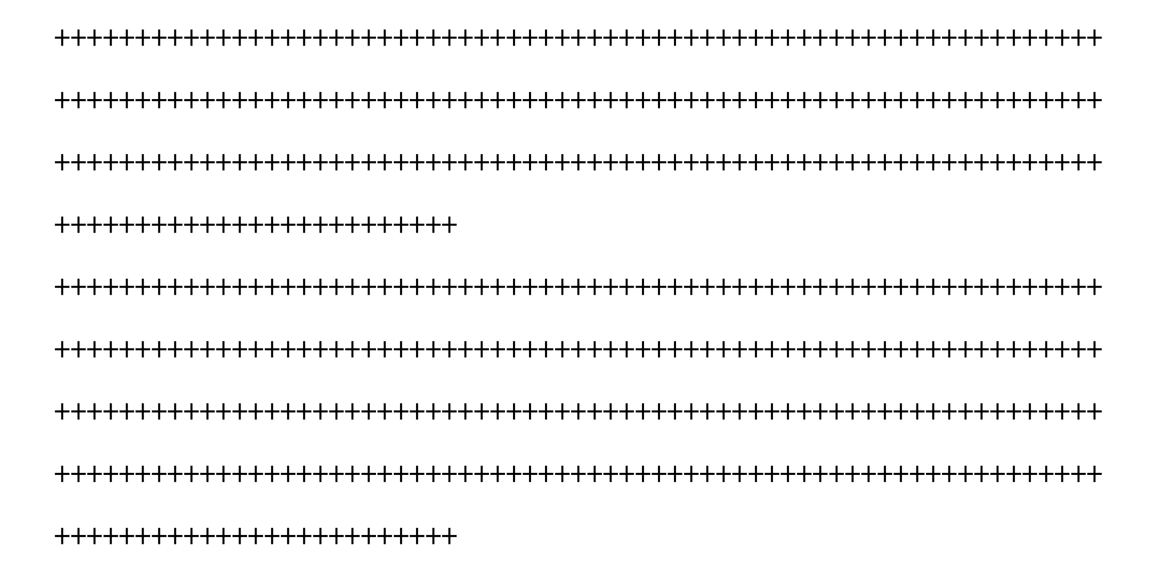
在举国上下口诛笔伐的一边倒的浪潮中，令人欣慰的是还能听到些许不同的声音，北京大学的5位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及马裕藻在1922年3月31日，发表《信仰自由宣言》，以坚持信仰自由原则来反对非基运动。

20世纪的知识分子和国共两党的反教倾向，完全不同于19世纪由官绅发动和领导的排教风潮。与19世纪的众多旧式士大夫相比，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非基运动中走在前沿的众多知识分子，是代表着出自国内外新式学校的另一辈新式人物。他们承袭了上一世纪反教者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但所使用的反教理念和思想武器，已不再是传统的夏夷之别和人禽之辨。在民族主义的内核之外，包裹着来自西方的思想和理念，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和理性主义、实验主义都成为批判宗教的有力的工具。尽管规模浩大，但反教者们尽量保持了克制，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在非基运动中虽有教堂被攻击、骚扰的现象发生，但就程度而言绝非庚子事变所能比拟。

对基督教进行批判的人们概无例外地受到民族主义思想和情绪的支配，这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信奉国家主义的青年党，能够在非基运动的旗帜下走到一起来的原因。正如学者指

出的：″从前的反对基督教，象征着一个古老文明决心抗御有毁灭它危险的外来势力，20世纪的反对基督教，则表现在一个年轻的国家急于寻找新的自尊的基础。排外主义仍延续了下来，但是它是在新环境中延续下来的，而这个环境与其说形成于畏惧，不如说形成了愤怒；与其说形成于旧式仇外情绪，不如说形成于现代的民族主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自 《福临中华——中国教会历史十讲》(梁家麟)

http://31team.org/page七、全面西化下的基督教（1900-1920）

七、全面西化下的基督教（1900-1920）

踏入第二十世纪，中国无论在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和遭遇，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未曾讨论此时期传教事工的种种发展前，让我们先了解中国的巨变与教会的关系。以下且将此二十年分为两个阶段：革命时期及新文化运动时期，而以五四运动作结束，以方便讨论。

革命时期：基督徒的积极参政

主后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对中国造成致命的打击，不惟国家需要赔偿巨额款项(分五十年摊还，并以政府三项主要税收的其中两项：盐税和关税来作抵押)，国家政府的无能愚昧亦彻底的暴露无遗。在八国联军陷京时，满

清政权本已有倒台的可能，幸得一些边疆大吏力保，方使清室继续维持统治，但亡国的危机已昭然若揭，慈禧太后及满清大吏都了解到当前的急务是要振奋图存。与此同时，由于义和团事件闯下了弥天大祸，朝廷中的保守派或被追究责任而惩处，或已失去了发言的地位；因此，此时期西化改革就成了朝中上下一致的共同目标，起码再没有人敢持异议了。主后1901年，清室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变法，并设置督办政务处，策划政制改革。主后1903年，命袁世凯训练北洋新军，其他各省均置新陆军。主后1903年及1905年，两次颁布教育改革方案，废除沿用千年的科举考试，各省改办新式学堂。此外，还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渐次推出。

虽然清廷的宪政改革已为时太晚，并且由于资源及各方面的条件的不许可，很多改革建议结果都未能兑现。即或如此，我们仍不能武断地指清廷的改革是毫无诚意的。事实上，一些已实现的方案对中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亦然。例如自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学堂成了求取知识及社会晋升的重要媒介和阶梯，传教学校作为中国最早设立的新式学堂，遂大受欢迎；毕业生的出路亦大为增加，不少成为新置洋务机构的雇员。

此时期除了清廷致力于改革图存外，民间的改革呼声亦高唱入云。改革的建议主要有二：一是由康有为等所鼓吹的君主立宪，是为「立宪派」；一是孙中山等革命党派所推动的革命运动，是为「革命派」。他们各有不同的救国主张，拥有不同的支持者，例如立宪派在海外的华侨中势力颇大，甚至是盖过革命派的；但是，在民间年轻的知识分子及留学生中间，革命思潮却占了压倒性的地位，极多青年人抱持着一坚定的信念：非推翻腐败的满清政权中国无法自救。从主后1900至1910此十年间，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起义事件此起彼落，不绝如缕。终于在主后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满清帝国，建立共和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运动期间，基督徒及传教学校学生积极支持及投身于运动的行列里，对革命事业贡献甚大。其荦荦大者如孙中山、陆皓东、区凤墀、尹文楷、王宠惠、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关景良、左斗山、王质甫、史坚如、毛文敏、刘锦州等人，都是在兴中会时期，于广州及香港曾为革命事业出过大力而又较著名者。而实际参与革命的基督徒人数，较上列的还要多出许多，据史扶邻(HaroldZ. Schiffrin)统计，单在惠州之役中，基督徒的参加者便占百分之三十。其他地区亦有类似的情况。

基督徒为何大量投身革命事业呢？据史扶邻的解释，这是由于他们原来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不高，只有透过革命、推翻现存的既得利益阶层，才能获得晋升。这个说法不一定全没可能，但笔者更有理由相信，基督徒积极参与革命，主要是受到在华的传教士所影响。晚清部分传教士，将他们母国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寄寓在中国之上，鼓吹并支持变革的进行。他们的思想，透过个别接触及传教学校的课授，传递了给中国信徒。此外，中国信徒及传道人透过西学教育，迳自产生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兴趣及认识，因而萌生革命思潮，亦在所多有。第三，传教学校很多时亦成了革命思想酝酿及宣传之地；在第二十世纪，传教学校是首先提倡剪辫易服的地方，新思潮在那里广泛传播；一些有志于革命的青年且结社以互相砥砺，激发壮志豪情。因此，基督徒及传教学校学生的思想常较一般人为前卫，他们积极投身革命，是很自然的事。

不管参与革命的动机为何，基督徒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教徒这个身份是列在中外签订的保护传教章程的受保护范围内，倘若他们受到中国官吏任何不公平的待遇，都会引来外国领事的干预，进而演变为中外冲突，这是地方官员所惧怕的。例如早在主后1895年广州起义尚未爆发前，两广总督谭锺麟已得到有关孙中山行动的密告，但由于孙是基督徒，故在未有确实证据前，谭亦不敢妄行将之拘捕。

这里并不是说凡基督徒皆可免去中国法律的约束。但是传统中国的司法制度，往往给与执法者在法律条文以外更大的权力和空间，他们可以刑求、株连，或以自由心证入人以罪。基督徒的「特权」正是免却了此等法外的权力。在传教士及外国领事的监督下，中国官吏被迫只能按着明文法、甚至采纳西方对刑法的观念(于搜集了足够证据后才能控告涉嫌犯)来办理，这样便受到很大的掣肘，也为基督徒革命者提供了很大的安全和方便。

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基督教救国

主后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各省纷纷成立革命政府，委派代表到南京缔订临时约法，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由于基督徒参与革命的人众多，因此很自然地在新成立的政府里，基督徒参政的比例也相当不小。以广东都督府为例，高级的官员如民政司长钱树芬、教育司长锺荣光、实业司长关景燊、卫生司长李树芬、交通司长容星桥、高等审判厅长伍藉磐等皆为基督徒；据统计主后1912年基督徒及传教学校毕业生竟占广东全省各级政府官员人数的65%。至于在南京全国政府方面，虽然在数字上比不上广东，但基督徒之充任要职的也有农林总长陈振先、海军部次长李和、参议院次长王正廷、政事堂参议林长民、交通部会计司长王景春、外交司长曹复赓等；国会议员中亦有数十人。以当时基督徒占全国人口不到四千分一的情况而论，基督徒的参政比例便相当可观了。

不过由于军阀弄政、中央政府的权力，很快为袁世凯所夺去。基督徒参政并未为政局带来任何积极的作用。但是政府与教会之间，仍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新政府对基督教表示友善，可以从以下两件事例之中看出：其一是在1912

年4月13日，南京各教会分开为国公祈大礼拜，总统及外交总长合派顾维钧为代表到会，并宣布大总统对为国祈祷此举的欢迎。后由陆子欣(征祥)总长提议、大总统认可，国务院通电全国基督教各公会，同于1913年4月27日特别为国祈祷。当时京中各西教士，亦通电欧美各教会，于同日学行特别聚会，为中华民国祈祷。

其二是在民国成立后，有人企图鼓吹将孔教定为国教。经基督徒发起签名运动请愿，以及后来由信奉基督教的司法司长徐谦领导的「信教自由会」的奔走下，终于在主后1917年，国会维持「人民有信仰宗教自由」的宪法。

这两件事例都属于全国性质的。在各省方面，地方士绅对基督教的态度也有明显的改善，特别是对传教士所办的慈惠工作大力的支持。他们主动地将麻疯病者、盲人、被释放的女童仆婢等转介至教会的麻疯病院、瞽目院及女童院内。不少政府官员亦捐款支持传教学校、医院以及男、女青年会的工作。比较特别的是广东的警察厅长陈景华，他木人不是基督徒，却邀请教会派人向监犯传教，作为道德改良的一部分。

可以说，教会在民国初年，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是备受尊重的。

基督教在此时期备受国人欢迎，除了上述所说政教关系良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基督教曾被国人视为救国的其中一条出路。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辛亥革命后的一些变化谈起。

前面提过，在第二十世纪初，不少革命青年都有一个信念：非推翻满清政权中国无法自救。这个信念推动了他们积极投身革命，甚至为之而牺牲一切。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是否就有自救之途呢？事实似乎恰好相反。在内政上，拥有北洋军队的袁世凯胁持清帝溥仪，夺得了中华民国总

统的位置，然后逐渐剪除革命派的势力，实行独裁统治。主后1915年袁且企图称帝，可惜不久便事败死去。袁世凯逝世后，其部下的北洋军将领互争权力和地盘，造成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和割据。至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2年易名国民党)分裂。主后1917年孙重组中华革命党，加强党内控制，并联合南方的军阀组成广东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对峙。国家陷在分裂及内战的状态下。在外交上，日本自主后1904年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后，已成为东方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并取代了欧美的地位而积极要侵略中国。主后1915年，日本要求中国签署廿一条条款，欲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国，袁世凯为向日本大量借款，竟予应允。此事在数年后被揭发，成了五四运动其中一个促成的原因。

在内政与外交同这困境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乃被迫思想为何政治革命不能带来国家的更生。他们的结论是：中国首要的问题是大部分的国民都在无知与沉睡中，他们并不了解国家的形势，也不知道要承担国民的责任；在大多数人都没有觉醒的时候，任何政治的革命的成果都只会为少数有野心的官僚政客所夺取。故此当前的急务不在政治革命，而在于要唤醒沉睡的国人(特别是青年)。这些知识分子进一步的相信，导致国人在沉睡中的是传统文化加诸他们身上的桎梏捆锁，若不打倒旧的传统，国人将无觉醒的可能。在这个信念推动下，他们乃开始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从政治革命的战场退却下来，转而从事更治本和彻底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前为「青年杂志」)及由蔡元培出掌的北京大学。

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且饥渴地要从西方引入各种思想和学说，以寻找救国的途径。这种文化潮流对基督教的传播有极大的好处。首先，在第十九世纪，基督教常被指为与传统文化相冲突而被排斥，儒家道统是福音在华传播的一大阻力，但如今这个阻力已为中国人迳自除去。其次，中国人既已怀疑了自身文化的时代性和有效性，对

外来文化的抗拒感自大为减少；甚至在传统文化被挪去后，腾出来的空间更需要别种文化来填补，故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即意味着要全盘西化。而基督教作为西洋的宗教，也受到中国人热烈的欢迎。正如第十九世纪基督教因被指为「洋教」而受排拒，在第二十世纪初基督教也因是「洋教」而受到欢迎。

基督教作为「洋教」而受到欢迎，这有两重意义：其一是指中国人认为基督教与西洋文化是同根而生的东西，此即第十九世纪传教士所抱持的西洋文化即基督教文化的看法。其二是指基督教与当时中国人对西洋文化所有的期望一样，渴望基督教能够指引出中国一条救国的出路和方案。关于这两重意义，我们在青年会的发展里都看得到。

基督教青年会自第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后，在此时期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从主后1895年成立至1920年廿五年间，已在全国卅一个主要城市建立起市会，共有四万多会员，此外又在一些较细小的城市开始了初步的工作。至于学校工作方面，青年会在规模较大的传教大、中学校建立校会，在主后1920年也有会员近二万人。青年会的工作，除开办商业和技术性的正规及短期课程外，主要是替青年提供各项的活动，如各种球类、游泳等，很多西方流行的运动都是由青年会介绍到中国来的。在芸芸众活动中，最具影响力的莫如各类型的公开演讲会了。演讲会定期举行，每邀请国内外的知名人士担任讲者，讲述有关西学及社会性的问题，极受民众欢迎。对开启民智，传播新知有很大的贡献。

青年会在一十年代受到欢迎，正好反映到当时期社会各阶层对西学以至西洋文化、生活、社会习惯等方面的兴趣；青年会透过传播新知、提供新式的活动来传播基督教，自亦收到良好的效果，通常该会会在某项活动完成后便鼓励参加者去查经班了解基督教信仰。在主后1920年参加查经班的人数达二万四千多人，其中有二千多人在当年一年内信主，成绩可谓骄人。

中国人以基督教与西洋文化为同根而生的东西，故基督教作为「洋教」而受欢迎。这是前面说的第一重意义。

青年会在此时期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提出的「人格救国」口号。正当中国人自觉传统中国的道德精神堕落，急欲作全面的革新时，青年会提出了以基督的博爱、公义、和平的精神来做为国人的心理建设，从而产生推动社会改革的动力，乃恰好切合了中国的需求。事实上，的确有中国人认同基督教人格救国这个方向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个非基督徒且对教会诸多不满的知识分子陈独秀，在一十年代末期便曾发表文章，建议国人学习耶稣的人格及精神。此外，青年会举办的公开演讲会，不少也是围绕着人格救国这个主题而发挥的，并且深受欢迎。其中最为哄动的是北美洲基督教青年会东亚巡回干事艾迪博士(GeorgeS．Eddy)在主后1915及1918年两度来华，在北京、保定、武昌、长沙、苏州、杭州、福州、厦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开布道会。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且下令所有学校放假，让学生赴会听讲，故情况极为热烈。据估计单在主后1915年的一次听讲者已逾十二万人，第二次更接近二十万。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热潮呢？或许可以从艾迪通常讲的主题：「中国之缺点」、「解决中国所有困难之秘诀」等得到解释。第二十世纪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社会各方面都陷入危机中，加上传统价值的动摇，中国人亟亟渴望寻求新的出路和指引，而基督教曾是他们探窥是否可以成为出路的其中一个考虑。这是前面说的第二重意义。

政教关系良好、基督教深受国人欢迎，视其为救国的可能出路，皆对此时期的传教工作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质与量的增长

撇开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不谈，单就传教事业的发展来看，我们也得到一

幅极其乐观的图画。

首先在传教资源方面，美国在第十九世纪末的大奋兴运动(TheGreatRevivalism)及学生志愿运动，继续大量的差派传教士来华(故此时期的美国已凌越英国，成为差遣最多传教士来华的国家)；此外，义和团事件这个自有更正教向海外传教历史以来最严重的迫害的发生，使中国成了全球瞩目的传教险地，如此也吸引了无数有受苦心志的基督徒前来，立志要在最困难的地方传扬福音(所以，中国在第二十世纪也是全球最大的传教工场)。在华的传教士人数，由第二十世纪始的不足三千人激增至主后1920年的近七千人。

在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方面，自义和团事件结束后，民教冲突陡地减少，大规模的教案甚少发生；加上民国成立后，采宗教自由政策，传教工作再无重大的政治障碍。因此，此阶段为中国教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信徒人数有大幅增长，由主后1900年的95，943人(另一记载为112，808人)激增至主后1920年的366，527人，增长达四倍之多。

各种传教工作在此时期都有充足的发展。直接布道事工，除前面提过艾迪两度来华作全国性巡回布道外，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EdinburghMissionaryConference)的主席穆德(JohnR．Mott)亦于主后1913年来华，向知识分子传道，有六千人签名表示愿意继续追求。本地也有一些出色的游行布道家如丁立美、古约翰等，他们在直接布道上产生了重要的效果。主后1909年先由山东广文大学发起，其后各传教大学相继成立的中华学生立志传道团，对推动中国青年投身布道事工起了很大的作用。

教育工作无论在质与量皆有惊人的进步。特别自科举制度废除、新教育建立后，传教教育已经完全切合中国的需要，再无脱节的情况；并且作为西

洋教育的前驱者，传教学校在设施和课程上较诸绝大部分的官办学校为佳，尤其是英文科目(因有传教士任教)，其他学校根本无法比拟。故此争取入学的人数非常多，学生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也大为提高，已不复是第十九世纪中叶的贫民学校了。不仅如此，传教学校亦摆脱了从前慈惠机构的形像，学生需要缴付学费，才得接受教育；并且由于投考人数远超学位数目，故甚至可以收取更高的费用致令学校的经济能自给自足。在二十年代，不少有规模的传教学校所收的学费为一般官立学校的四至五居，能够入读的都是家境良好的学生，这样造成传教学校竟然由贫民学校演变成贵族学校。

除了贵族化外，传教教育亦趋向高等化。这是因为自从中国政府开始兴办新式教育后，西洋教育已非传教学校的专利。传教士发现，从数量上传教学校必然远远不如官办学校；中国政府虽然贫穷，但以一国之力来办学，则不逾三、两年间便在数字上超过起步早半个世纪的传教学校了。若要保持传教教育的竞争力，必须集中资源，在教育的质素上积极改善之。其次，传教士很早已预见到，当中国积极地吸收西洋文化的时候，特别是不少出洋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将所学的知识带回来后，会使到中国人发现，原来西洋文化并不等于基督教文化，甚至第十八、九世纪西方知识的主流是无神论呢。为了避免基督教再也不能在知识界中产生影响力，他们乃主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传教大学在此时期纷纷设立，如圣约翰、文华、金陵、汇文、东吴、广文、岭南、华西协和……等，在主后1920年时共十四间。

由于传教教育广受欢迎，社会需求甚大，直接鼓励了教育事业的迅速拓展，其增长的速度已超逾教会的实际需要。事实上，此时期传教教育已有脱离传教范畴的趋势：一方面负责学校的传教士绝大部分皆是专职的，他们多不兼顾直接传教事务。如前所说，教育的专业化促使教育在传教以外有了自足性的意义，而在第二十世纪教育的意义甚至已盖过了传教。虽然

学校仍致力于福音工作，但学校的发展却完全无须考虑要配合整体的传教事业。学生大都来自非信徒家庭，甚至当时以农民为主的基督徒家庭亦未必都能承担学校的高昂学费(所以学校不再以栽培信徒子女为己任)；学校的课程设计完全不是为了配合神学教育的需要，而学生在毕业后绝大多数都不从事传教工作(故学校也不是要栽培传教事业的人才)；更且，学校的经费亦多是自给自足的，毋须差会或教会津贴；即或有欠缺，不少学校也会自行筹措。如此，传教教育虽仍有传教的功能，却与整个传教事业无必然的关系，可以说已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

即从数字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脱节的现象。前面提过在主后1920年时中国教会约有信徒卅六万，但与此同时各级传教学校竟招收了逾二十万的学生。且不说这个单薄脆弱的信徒群体无法在人力及金钱上供应教育事业的需要，甚至连所能提供的学生也只能占一个不太高的百分比。至于学校训练出来的人才，也远远超离了教会的需要。

医疗工作的扩展虽没教育事业的可观，却也令人鼓舞。主后1920年，据统计全国共有传教医院347间，诊所473间，分布在各大城市及重要的传教根据地内，每年诊治的人数逾三百万人次。如同传教教育一样，医疗服务也朝着自足的方向演变，在一十年代末期，透过收取诊金及自行筹募，已有三成左右的医疗机构毋须差会直接津贴。有关医疗工作的两个组织值得在这里一提：其一是中华基督教博医会(ChinaMedicalMis－sionaryAssociation)，成立于主后1890年，除出版刊物以提供医疗教育知识外，又从事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医疗事业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二是罗氏医社(ChinaMedicalBoard)，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拨款支持成立，目的旨在培育医生及护士等人才。它一方面资助不少现有的医学教育机构，另一方面又在主后1919年开办北京协和医学院，这学校在日后成了中国最出色的医学院。医学教育及妇女教育，是传教教育对中国的两大贡献。

文字工作在此阶段非常蓬勃，出版机构相当多，最主要的有广学会、圣教书会、美华书馆、中国主日学协会、基督教青年会组合的编辑部等。

至于慈惠及服务性事工，以至种种改良风俗的运动如劝戒咽酒嫖赌、不早婚、不纳妾、不买奴婢……等，这里都不多说了。

第二十世纪传教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中华续行委办会(ChinaContinuationCommittee)的成立，基督教全国性的联合工作最早可以推到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举行的两次大会(1877年及1890年)；主后1907年，为庆祝更正教来华百周年纪念，在上海举行了百年纪念大会(ChinaCentenaryMis－sionaryConference)。这三次皆是传教士会议，因在此时期教会仍几全在传教士的控制和管理之下，故中国信徒出席会议者极少；主后1890年只有两人，1907年有五人。主后1910年，全球的世界宣教大会(TheWorldMissionaryConference)在爱丁堡召开。会议通过一项方案，便是致力协助各传教工场的国家成立基督教的全国性组织：续行委办会。主后1913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的主席穆德来华，除主持巡回布道外，又推动召开基督教全国大会；会议顺利进行，参加中外信徒为1比2，共120人。结果议决成立中华基督教续行委办会；会址设在上海，委派中国籍的诚静怡牧师为总干事。续行委办会的工作，除推动合一外，亦进行许多调查研究事工，特别是在主后1914年开始出版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至为重要。

中华续行委办会的成立象征着超宗派的合作的成就，而宗派合一运动则是模式不同但影响同样重要的发展。事缘第十九世纪当基督教传入中国时，同一宗派但属于不同地区的教会都派遣了传教士来华，形成差会及教会的名目五花八门，互相重叠。以长老宗为例，便有美北长老会、美南长老会、加拿大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英国长老会、纽西兰长老会、根本论

长老会(CumberlandPresbyterianMission)……等。有时可能同一个中国城市有数个长老会差会在工作，彼此互不隶属，非常混乱。为了改善此种情况，一些宗派乃思量进行合一运动，同一宗派的各教会都隶属于同一个中央组织，不过不同的差会仍可以专门负责其所建立的教会，只要在行政及策略上尊重中央组织便可。主后1905年，长老宗各教会完成合一，成立中国基督圣教长老会(PresbyterianChurchofChina)。主后1912年，圣公宗组成中华圣公会(HolyCatholicChurchofChina)。主后1917年，信义宗大部分教会，组成中华信义会(LutheranChurchofChina)。

信徒社会地位的晋升

如前所云，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唯一接触得到的福音对象都是贫苦大众；并且主要是利用慈惠工作来吸引他们信主。如此形成中国教会的组成分子几纯粹是低下阶层的人。基督教在社会上备受轻视，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不少加入教会的信徒，目的都是要在传教事业里谋得一份生计，以图糊口；他们受雇于传教士手下，充当传道助手之职。这些人不惟在社会一般人眼中受到鄙视，即在传教事业中，地位也很低微；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有限，多仅是以学徒制的形式来接受圣经及神学的知识，无法独当一面，只能永远屈居副手。其中受按立的也很少。

传道助手的收入微薄，生活清苦，唯一的福利是可以将子女送到传教学校，接受免费的教育。不过在第十九世纪，传教教育与中国社会的需要不相符合，毕业生大都只能投身传教事业，他们是与传统社会脱节的群体，其所受的训练既未被认可，社会地位亦没有改善。不过起码在教会里的情况已有所好转，由于第二代的传道人曾受过中等教育及正规的神学训练，他们一般都能独立地承担一个堂会或教导的工作，并且不少亦已获得牧职，在信徒心中的地位也增加了。甚至有少数的本地传道人，凭着他们所

学的西洋知识，积极参与社会上一些风俗改革、或鼓吹西化的运动里。

及至清朝末年，因着中国急欲西化图强，大量渴求西学人才，尤其是能兼通中外语言的，传教学校的毕业生因之而增加了各方面的出路，他们的重要性亦因而提高。此外，自清末起中国政府已开办新式学堂，但此时期一般国人仍热衷于科举考试，对西学的兴趣不大；反而基督徒子弟自少接受传教学校的西学训练，加上父母较为开通，故报考官校的人非常多，他们在毕业后也在政府里担任一定的职务和角色。更有少数的情况是，基督徒子弟在传教学校毕业后，倘传教士认为他是可造之材，便保送他出洋深造，返国后自然亦成为不可多得的西学人才。无论是那一种情况，我们都发现基督徒凭借他们拥有的西学知识，在社会上争取了愈来愈高的地位。

基督徒凭借西学知识而获得社会地位的晋升，在不少第三代的基督徒家庭都是明显可见的；并且这绝对不是个别子弟资质优异、际遇奇佳所造成的个别情况，因为在好一些例子里，可以看到的是全族冒升的现象。例如王元深家族、关元昌家族等，他们的第一或第二代只是家境困贫的传道人或基督徒，但迨至第二十世纪初的一代，几乎所有家族成员都获得相当重要的工作岗位。虽然严格地说，在清政府的官阶秩住中，他们任的官职多只是中层的技术官员，并不能算太高；但是苦与他们的前代相比较，则社会地位明显地是大幅上升了。必须留意的是，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因习西学而获得如医学、法律、矿务等方面的知识，投身在清末陆续兴办的洋务事业中，而非借营商致富等其他途径来提升其社会地位。

这些拥有西洋知识的人，自踏入民国以后，更晋身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成为显要人物。前面已提过民初政府基督徒任职的很多，但其实在社会各环节，都可以看到基督徒的活动。他们当中不少是习西医和法律的，在这两个专业中占的比例相当大；此外也有一些积极投身与西方有关的商务里，例如百货业、保险、银行、影相、西药坊等。在学术机构任教的也

属不少。

中国基督徒凭借西洋知识，在清末民初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是第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现象。

信徒社会地位的改善，对基督教在国人心目中的形像自然大有改善，影响力亦相对增加了；如青年会等基督教组织，在社会及国家事务上积极参与和发言，他们的言论亦获得了相当的重视。基督徒也不再是处于社会边缘之上，与社会主流脱节的群体了。

但是在二十年代以后，一方面社会转趋动态、阶层流动的情况复杂而多样化了；另一方面传教学校也不再专为培育信徒子弟而服务，甚至教育本身都已与传教事业脱节。故此这条社会晋升的途径虽然仍存在，却已没前面说的那样明显了。

更且，有基督徒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并不表示以低下阶层的人为主要的传教对象这个传教策略有变。故此，中国教会占了九成以上的成员，还是贫苦大众，慈惠工作仍是传教的主要方式，这直至主后1949年仍没多大改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自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98%89%E6%BE%8D

宋嘉澍（1861年10月17日－1918年5月4日），字耀如，另有洋名查理

（Charles），广东省海南岛文昌人，本姓韩，过继宋姓，晚清传教士、富商及革命家，鼎力支持辛亥革命的大金主；民国著名的宋氏家族的家祖，子女有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

生平

1863年2月或1861年10月17日，宋嘉澍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古路园村（现文昌市昌洒镇宋氏祖居），原名韩教准，乳名阿虎，家中并有一兄韩政准及一弟韩致准。其生父韩鸿翼是一位崇尚儒家哲学的商人，为人宽厚，热心公益事业，因经营慈善事业而耗尽家财，导致家道中落。宋嘉澍是北宋三朝宰相韩琦的二十九代孙，韩琦的六世孙南宋廉州太守韩显卿举家迁至海南，为海南韩氏始祖。

1875年，在逼切的家庭经济压力之下，韩鸿翼将当时12岁的韩教准过继给富有但无嗣的宋姓舅父，随其姓宋，改名嘉澍，并远赴美洲古巴。养父对他关怀备至，为他聘请了一位英语教师，宋嘉澍在学习英语的同时，通晓美国革命史的英语教师也教导了林肯等人的民主革命思想，宋嘉澍因此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发起推翻腐败满清的民主革命。

1877年，宋嘉澍前往美国波士顿，在丝茶店当学徒。期间，结识了一些在美国留学的好朋友，他们纷纷劝宋嘉澍去学校读书。由于养父坚决反对，宋嘉澍找机会偷偷地跑进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的一艘政府缉私船上，也许是船长佩服他的胆量，或是喜欢他追求独立创业、追求自由的勇气，船长不但没有处罚他，还热情地帮助他，让他在船上做杂役。之后，宋嘉澍随船长到了美国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结识了当地教堂的牧师。

1880年11月7日，宋嘉澍接受了基督洗礼，领受教名查理·钟斯·宋（Charles Jones Soong），人们习惯称之宋查理。

1881年4月，宋嘉澍被穆尔上校与李考德牧师送往北卡州三一学院（现在杜克大学前身）读书，由美国南方首富兼杜克大学创办人之一的朱利安·卡尔 支付学费。当其于圣三一学院毕业时，美国掀起迫害华人的恶浪，唐人街被烧，大批华工惨遭杀害，宋耀如对此十分愤慨，他认为，要从根本上

改变海外华人受人欺凌的状况，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必须在千百万人心中点燃民主革命的火炬，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

1882年，宋嘉澍进入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神学院，于1885年底，完成了神学学位。

1886年1月，宋嘉澍返回中国上海，任美南监理会传道，在苏州、上海等地传教，并于教会学校执教，胡适即为其学生之一。由于受到美国传教士的排挤和歧视，宋嘉澍一气之下开始转而经营工商业，从国外贩卖机器到上海，又开办上海福丰面粉厂任经理。1887年，宋嘉澍在上海创办美华印书馆，印行中文本《圣经》。1887年夏，宋嘉澍与倪桂珍结婚。婚后两人育有三子三女。1892年，宋嘉澍彻底辞去传教士工作，参与创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1894年，宋嘉澍结识孙中山、陆皓东等人，倾家捐输钜万，几次濒临破产的地步。宋嘉澍在传教同时，暗中印行革命刊物及小册子。中华民国成立后，宋嘉澍曾随孙中山访问日本，二次革命后，由于家里在夜间遭到枪击，宋嘉澍全家避居日本。

1915年10月26日，女儿宋庆龄离家私奔，在东京由日本律师和田瑞作证，同孙中山结婚。宋闻之大怒，不能谅解，宋嘉澍夫妇追到日本，据日本人士回忆：宋嘉澍在大门口叫喊："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孙中山出来后，宋突然往地上一跪，磕了几个头说："我不懂事的女儿就拜托你了，请千万多关照！"之后转头就走。

逝世

1918年5月3日，宋嘉澍因患肾病不治，在上海逝世，年仅54岁。

家族

宋嘉澍与妻子倪桂珍育有子女六人，依次为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其女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三人，及其子宋子文均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人物，为当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让我们对比以下圣经中所记述的耶稣基督的话语，并反思中国历史上许多基督徒的属灵成长、以及缺点、缺陷，和许多事情的是是非非。

【引述 圣经 马太福音5-7章 登山宝训】

马太福音.

5.

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

人点了灯，不会放在量器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

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

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

“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

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人若说弟兄是‘拉加’，必被公议会审判；人若说弟兄是‘摩利’，必难逃地狱的火。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

就当在坛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供物。

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抓你去见法官，法官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监里。

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决不能从那里出来。

“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不可奸淫。’

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

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

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

“又有这样的吩咐：‘人若休妻，就应当给她休书。’

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因她不贞，就是促使她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

“你们又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约，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

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　神的宝座；

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　神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它是大君王的京城；

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

有人要告你，想拿你的衬衫，就连外套也让他拿去。

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两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也不可拒绝。
“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
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
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马太福音.
6.
"你们小心，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让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
因此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到处张扬，好像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作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好使你的施舍是在隐密中行的。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
"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他们喜欢在会堂和路口站着祈祷，好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但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里去，关上门，向在隐密中的父祈祷。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
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重复无意义的话，像教外人一样，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
你们不可像他们，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
所以你们要这样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有些后期抄本在此有“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一句）
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
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那样愁眉苦脸，他们装成难看的样子，叫人看出他们在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可是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
不要叫人看出你在禁食，只让在隐密中的父看见。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
“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侵蚀，也有贼挖洞来偷。
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
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都明亮；
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
“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事　神，又服事金钱。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
你们看天空的飞鸟：它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难道你们不比它们更宝贵吗？
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
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不劳苦，也不纺织。
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
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　神尚且这样妆扮它们；小信的人哪，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马太福音.
7.
"不可判断人，免得你们被判断。
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也必照样被衡量。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
伪君子啊！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才可以看得清楚，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
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免得它们用脚把珍珠践踏，又转过来猛噬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儿子向他要饼，反给他石头；
要鱼，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
"你们当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但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提防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当中，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里怎能摘到葡萄？蒺藜里怎能摘到

无花果呢？
照样，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中。
因此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过许多神迹吗？′
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
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自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95%99%E4%BC%A0%E6%95%99%E5%A3%AB%E4%B8%8E%E8%BF%91%E4%BB%A3%E4%B8%AD%E5%9B%BD%EF%BC%881807-1953%EF%BC%89

1900-1925年被称为是基督教的"黄金时期"。1920年代中国兴起了非基督教运动，但此时期的圣经销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称："1925年，圣经在华销量高达374万本，比1924年增加了100万本。"传教士在此阶段也创建了医院，如夏葛女子医学院，著名毕业生有周理信（1890-1979）和黄婉卿。此外，还建立了湖州医院，当时已有了化验室，X光室，和护士学校。柏格理在苗族当中做了很多宣教工作。在傈僳族中，英国传教士富能仁传道三十多年，对当地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到1990年代，傈僳族有90% 是基督徒。

=============

（选自以下网文）

http://production.lifejiezou.com/article/sheng-jing-de-shi-jie-zhi-zui-zhi-duo-shao

导语

圣经，这部有着最多世界记录的神圣之书，它在人类历史上所获得的荣耀是极其特殊的。历史上，有多少人曾激烈地反对圣经和它所传递的信息，但是却没有一人可以阻挡真理的脚步。因为圣经所记载的，并非是人间的学问，而是上帝亲启的生命之书、智慧之书。古往今来，多少人的生命因它而改变，多少人的人生因它而不同。

圣经既是如此伟大和独特的经典，它在历史上开创的"世界之最"，就更值得我们钦佩和谦卑学习了！

1　最早的书

圣经中最早的一卷书，是旧约的《约伯记》，它成书于约公元3600多年前。是世界上最早的书。

2　销量最高的书

圣经是人类历史中，销量最高的一本书。根据世界联合圣经公会的统计，圣经自出版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40亿本，目前，全世界的圣经，仍以年销量约3000万左右的速度递进。在中国，基督教协会以每年大约200万册的速度刊行圣经，仍不能满足要求（虽然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圣经的获得并不如西方国家般便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献能与之相比。

3　西方最早印刷的书

当欧洲在十五世纪第一次用活字印刷术时，第一本印行的书就是《圣经》，所印行的圣经被称为"哥登堡圣经"。

4　　翻译最多的书

圣经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翻译版本最多的书；至2007年底，整本圣经已被翻译成438种语言，部分被翻译的圣经则覆盖2000多个语种。世界上98％的人可以找到一种他们流利掌握的语言所对应的圣经。

5、　　第一部太空书

圣经是第一部被带到太空和月球的书。1969年，最早登月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艾德林，在将美国国旗插上月球的同时，也把圣经带到了太空和月球。

6、　　写作背景最复杂的书

圣经有四十多位记录者，上至君王和首相，下至亡国的俘虏和囚犯，又有专业者如医生、律师、诗人、学者、士官、税吏，以及普通平民百姓如渔夫、农人、牧人、工人等，这些人地位不同，环境也各异，其记录完成于皇宫、监狱、荒岛、旷野及普通民居。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所传递的核心信息竟如此一致。

7、　　写作时间跨度最大的一部书

圣经是写作的时间跨度最大的一部书，从旧约圣经开始的公元前1440年到新约圣经集成的公元397年，时间跨度约1600年，而其前后一致，互为表里，可谓天衣无缝。

8、　　涉及内容最丰富的书

圣经共66卷，1189章，三万多节，约九十三万五千多字，其中包含历史、诗歌、故事、预言、格言、传记、书信、寓言、比喻、辩论、游记、律法、礼仪、戏剧、哲学、地质、神学、文学、医学、科学、商业、天文、地理、军事、生理、数学、物理、环保、道德律、优生学、心理学、考古学、劳工权益、信息科技、谜语等包罗万有的内容。在同一主题下能完成如此庞大复杂的内容构架，且和谐统一，浑然一体。

9、　预言最多的一部书

圣经是世界上预言最多的一部书。全本圣经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是预言。经统计，旧约预言约1239个，新约578，共1817个预言。涉及到预言的经文达8352句之多。圣经预言大部分已完全兑现，而涉及末世的许多预言，因时候未到，尚未应验。

10、　最深奥的书

世界各地的神学院，主要使命之一就是研究圣经，入学的人要有大学程度才可入学，甚至有些人尽毕生光阴研究这本圣经（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倾注半生的心力，研究圣经，仍无法参透。因许多圣经的奥秘被封印，一些启示只有随着末世代的临到，才逐步解开。）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里，有无数的著作去注释圣经，亦难尽窥其奥。

11、　最浅显的书

圣经里有封印的奥秘，但其主旨却是再浅显不过。不论未受教育的文盲村妇、荒山土人，或孩童稚子，都能明白圣经的真意。有学问的人阅读，不能尽窥它的奥秘，没有学问的人阅读，亦能明白神的心意。圣经是一本"时

不分古今，地不分南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奇妙天书。

12、 读者群最大的一部书

圣经是人类历史上跨越读者群最大的一部书，从学龄前儿童到百岁老人都在奉读他；从赤贫如洗到富可敌国都在查阅他；无论是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考古学家，还是总统、工程师、商人、家庭主妇、学生、军人，都在诵读它。

13、 受责难和质疑最多的一部书

圣经上是世界上受最多层次研究的一本书，从来没有一部书，被世界上如此众多的，不同领域的学者所探索研究过。同时，圣经也是世界上最多争议的一部书，它得到世界上最多人的赞美；也受到最多人的攻击。他的每一句每个章节都被人背诵于心，奉为经典。每一个词都被无数人研究，斟酌，思量，攻击，毁谤，赞美。

14、 普及性最高的书

圣经是全世界普及性最高的一部书，这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和地区能买到的一部书。圣经也是世界上被人们相互赠送最多的一部书。它同还是世界上被反复阅读，重复阅读最多的书。

15、 内容被引用最多的书

圣经是世界上内容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书；许多我们所知的人类的重大事件和转折中，都流淌着圣经的话语，许多伟大作家的作品中，也多次引用圣经的经文。

16、　变动最少的古书

如前面已提及的，圣经是流传千年，变动最少的一部书。

17、　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部书

新旧约圣经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广义基督宗教（正教（国内称东正教）、大公教会（国内称天主教）、新教（国内称基督教））的正源典籍（事实上确实存在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典籍比新教圣经典籍的66卷多几卷的分歧，但这三大主流都承认这66卷是圣灵感动人所写出的神的话语，具有绝对权威和正确性）。

〝旧约圣经〞也是伊斯兰教（回教）信奉的主要经典之一（另一经典是古兰经），犹太教也以〝旧约圣经〞为典籍，另外他们还信奉〝塔木德经〞。

截止2000年，全球信奉广义基督教的人口约20.5亿，占世界人口的33%，伊斯兰教的人口约为12.4亿，约占总人口的20%；犹太教的人数约为0.14亿。也就是说，基督教新旧约圣经影响了世界53%以上的人口的世界观和行为。

圣经及其基督教义对西方社会的制度、文化、价值观、文化观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基督教关于人要〝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这两大诫命对整个社会文明和价值取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结语
圣经的神奇之处和其对人类的影响，上面所述只不过是管中一斑，有待进一步补充和整理。但这部人类史上最神奇的书，经过几千年智者考查，质疑，追究，推敲仍屹立不倒，这说明圣经是上帝的话，它是上帝赐给人类

伟大而独特的礼物。亲爱的读者朋友，今天就拿起圣经，来阅读吧！

++
++
++
++
++++++++++++++++++++++++

____

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态度

在清末民初年代，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并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主旨、内容与教义体系，都包含什么。他们秉承了康熙年代天主教礼仪之争、以及明末清初时期的沈榷（十七世纪初推动南京教案的明朝官员）、徐昌治（十七世纪初《圣朝破邪集》的主要编者）、杨光先（十七世纪中叶《不得已》《避邪论》《摘谬十论》等书籍的作者）等儒生和佛教人士对于基督教信仰体系的片面理解与负面看法。

而清末民初的那些急于改革的高层人士与知识分子们，则对西方文明采用“拿来主义”的立场和方式；囿于时代的限制，他们并没有认真地去省思，西方文明体系的内容是什么、内核是什么、以及其与基督教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到底在于什么。基本上，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本身，对于圣经本

身，完全是处于不知所云的状态。

而清末民初的很多基督徒背景的知识分子或社会精英、政治人士，包括孙中山本人，都往往是以功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与基督教信仰所影响下的文明体系。即，他们希望，把宗教信仰用来当做是救国、民族救亡的工具和手段。或者，他们完全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评判宗教信仰、判断基督教信仰等等是否有着正面的价值。而当他们错误地认为，基督教信仰对于民族救亡并不一定有着什么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帮助的时候，他们就往往会敬而远之。

换言之，从明末清初的利玛窦时代，一直到清末民初的1911年代，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或是高层知识分子精英、社会精英们，其实并没有、或是很少有人，用谦卑的、敬畏上天、寻求信仰真理的态度与心灵，来认真地求索和查考，基督教信仰的内容与主旨究竟是什么。

反而，他们常常囫囵吞枣地把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体系本身当做是一回事，甚至错误地把基督教信仰当作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在这种观念中，既包含着很多诚实的错误理念，也包含着很多故意的谎言与心灵之中的诡辩，以及对于整体事实的无视】。

在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范围内，无论是那些支持基督教信仰的人，还是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都往往是从外在的、功利主义的角度【即，看其是否有利于中国人自己的属世之利益】，来看待基督教信仰；而往往并没有在内心中有真正敬虔的、谦卑的、诚实的、认真的、饥渴慕义的心灵与态

度。

这种状态使得：——中国人作为数千年中华璀璨文明的承载者，当“面对”基督文明体系与思想的“挑战”的时候，——就会以一种自义、自傲的状态和心灵，来进行应对。他们往往出于自尊、自义、自傲的态度和心灵，而错误地把基督文明体系看作是中国文明体系的敌人，看作是中国人的敌人，而并没有去认真诚实地省思，基督教信仰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其中的真理是否是正确的，其中的教义和教导究竟是什么，等等。【其实，正是这样的原因，导致公元一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四世纪的三百多年中，罗马帝国政府逼迫基督教信仰；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导致1900年义和团暴乱事件，以及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领域中兴起的所谓“非基督教运动”。对此，本书后文将会在讲述1911年-1937年的历史中进行追溯与回顾】。

我们并不是说，中华文明本身就是罪恶的、或其中根本没有任何不好的内容；而是想要指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心诚、格物、致知”等等，我们真的做到了吗？我们真的想要努力去做到吗？我们真的愿意想要为此而去努力吗？还是，那些东西，仅仅是我们在口头上、书本中、纸面上，随便地说一说、写一写、而并非是要当真的事情？

我们真的有诚实吗？我们真的有饥渴慕义的心吗？我们真的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志吗？我们真的愿意以一颗谦卑诚实的心灵与灵魂，来寻求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之中的真理吗？我们真的有对于上天的敬畏与寻求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圣经 罗马书1-3章】

罗马书.

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

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

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或译："以大能显明他是　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

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作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

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

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

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

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　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

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

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

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

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

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
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
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罗马书.
2.
你这判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都没有办法推诿。你在什么事上判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所作的，正是你所判断的事。
我们知道，　神必照着真理审判行这些事的人。
你这个人，你判断行这些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你以为能逃脱　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　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的吗？
可是你一直硬着心肠，不肯悔改，为自己积蓄　神的忿怒，就是他彰显公义审判的那天所要发的忿怒。
神必照各人所作的报应各人：
以永生报答那些耐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
却以震怒和愤恨报应那些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而顺从不义的人；
把患难和愁苦加给所有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却把荣耀、尊贵与平安赐给所有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因为　神并不偏待人。
凡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不按律法而灭亡；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
因为在　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得称为义。
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作控告、或作辩护。

这也要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在　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各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

你身为犹太人，倚靠律法，仗着　神夸口，

而且明白他的旨意，又从律法得了教导，能够辨别什么是好的，

自信是瞎子的向导，在黑暗中的人的光，

愚昧人的导师，小孩子的教师，在律法上得了整套的知识和真理；

你既然教导别人，难道不教导自己吗？你传讲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吗？

你说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吗？你憎恶偶像，自己却劫掠庙宇吗？

你既然以律法夸口，自己却因犯律法而羞辱　神吗？

正如经上所说的："　神的名，因你们的缘故在列邦中被亵渎。"

你若遵行律法，割礼固然有益处；但你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不是割礼了。

这样，没有受割礼的人，如果遵守律法所规定的，他虽然没有受过割礼，不也算是受过割礼的吗？

那本来没有受割礼却遵守律法的人，就要审判你这有仪文和割礼而犯律法的人。

因为表面上作犹太人的并不是犹太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礼也不是割礼。

唯有在内心作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仪文。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　神来的。

罗马书.

3.

这样说来，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

从各方面来说，的确很多。最重要的，是　神的圣言已经托付了他们。

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　神的信实无效吗？

绝不可能！　神总是诚实的，人却是虚谎的，正如经上所记："你在话语

上，显为公义；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
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　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降怒的　神是不义的吗？
绝对不是！如果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但是　神的诚实，如果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
为什么不说："我们去作恶以成善吧！"（有人毁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话。）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
就是　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
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赎罪祭"原文作"蔽罪所"），是凭着他的血，借

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
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什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
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
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　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
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

此时的西方（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

++
++
++

++
++
++

++
++

+++

++

++

+++

【引述 《美国故事》】

二战以前

____

十九世纪，欧洲的辉煌

从十六世纪初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把西欧各国从罗马天主教廷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德国、荷兰、英国、北欧各国等地，都掀起了以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理、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敬虔基督徒们所领导的基督教更正运动。他们高举“五大唯独”的口号，即，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反对罗马天主教廷与教皇的权威与专制，大力地印刷、出版、传播圣经，把圣经翻译成各国语言。这些基督教改革运动，在许多方面深深地影响了西欧各国；同时，罗马天主教廷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和改革，因此，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部欧洲国家也逐渐开始了现代化改革的历程。

十六世纪的基督教改革运动所导致的两个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在十七世纪中，现代民主主义与现代科学思想体系的诞生。现代民主主义之政治、经济、法律思想的诞生，以约翰·洛克（《论政府》）、卢梭（《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国富论》）等人的思想和著作为代表【这些思想，都与圣经的广泛传播，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思想与文化土壤有着深刻的关系；详情请见《论民主》】。现代科学思想体系的诞生，则以弗兰西斯·培根的科学思想哲学著作，以及牛顿与波义耳的著作所导致的现代物理学与现代化学的诞生为代表【现代科学思想体系的诞生，也与圣经的广泛传播，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思想与文化土壤有着深刻的关系；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同时，从十七世纪初叶开始的英国清教徒运动，导致了大批清教徒们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离开英国、移居到北美的新英格兰地区，为十八世纪美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十七世纪开始，现代科学思想体系诞生以后，导致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爆炸性发展。现代民主主义思想的诞生所导致的政治性改革，席卷了欧洲大陆，使得欧洲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深刻的现代化变革。

这些变革，导致了整个欧洲在短短两三百年间，即，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三百年中，就崛起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和文明的地区。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告别了自从四世纪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的、将近一千两百年的中世纪时代，告别了田园牧歌式的中世纪生活，也告别了中世纪的、恬淡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生活观念，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奋发向上、勤奋工作、大变革与大复兴的时代。

在这个轰轰烈烈的过程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好坏参杂；其中的精华与糟泊，都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方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例如，在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内部纷争，导致了长达几乎四十年的、法国内部的宗教战争。在法国，在效忠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徒与那些想要进行基督教改革的新教教徒们之间，以及法国内部各个地区以及各个阶级之间的各种政治势力的争斗，导致整个法国内战中数百万人丧生。后来，1789年至1799年的法国革命，推翻了君主政权，然而，却使国家陷入了更加混乱、淫荡、不敬虔的状态之中。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在欧洲四处出击，与俄罗斯等国开战，曾经一度占领了欧洲许多国家民族的领土，给欧洲各国带来了许多血雨腥风和灾难，也为后来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从欧洲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1562年至1598年的法国内战、宗教战争【战争一开始时候的触发点，是由于基督教改革人士过于激进，从而间接导致了一位良善的、很有名望的法国人士被暗杀】，——最终的结局是，法国的天主教势力得到了彻底的胜利。这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法国基督教更正运动人士被杀害；更多的人则离开法国，到其他欧洲国家避难。后来，其中很多人移民到北美大陆，进入到今天的美国以及加拿大东海岸等广大地区。而在法国本土，天主教继续统治着人们的心灵与信仰，继续封闭着圣经、使普通人无法阅读圣经，继续垄断着教会组织体系结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才有所改变。

与此同时，发源于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之城邦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法国发扬光大。从那个时期开始，法国诞生了许多人文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这些人高举人性伟大光辉的旗帜，甚至高举无神主义的大旗，主张离弃基督教信仰，拥抱——人文主义思想、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无神主义、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思想等等等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日，使得法国成为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思想发源地，成为西方许许多多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们所向往的"圣地"。所谓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是指，他们在信仰上并没有对于上帝、对于圣经、对于耶稣基督的真挚信仰，而是片面地强调人性之可贵与尊严，并进而推崇人本主义、包容主义、放纵主义、等等。在基督教信仰中，包含着重要的两个方面，即，憎恨罪、爱罪人。然而，这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们仅仅是强调爱罪人，但却严重地忽视了公义、圣洁、以及对于罪恶的恨恶。在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中，他们往往主张用乌托邦思想、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人性光辉之思想等等作为口号来集结革命力量；但是，在政治现实中，他们的行为与思想所导致的，却常常是专制主义政权的后果。遗憾的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留学生们所接触到的、所引进中国的所谓西方"先进思想"，正是这一类以法国思想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想体系中的糟泊与放荡元素；例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以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到法国进行所谓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参与共产国际运动的那一代人，带回给中国的，正是那种反传统、反基督教信仰、高举所谓乌托邦思想大旗的人士们的思想。

以此同时，德国、奥地利等日耳曼国家政治体系在各国政治斗争与变革的同时，其学术界迎来了以黑格尔、叔本华、费尔巴哈、尼采、马克思等等一大批思想家人士们为代表的，自然神主义哲学【即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以后就撒手不管了，而是通过自然规律法则来统治世界；上帝与人间世界之间，并没有紧密的互动和联系】、泛神主义哲学【即认为，神就是

世界，世界就是神；神仅仅是一种没有"位格"的、无知无觉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言的，一种规律、因果、道、等等而已】、辩证法哲学、实证主义思想、甚至无神主义思想、物质主义思想等等。同时，在德国等文化体系范围内，涌现出一大批主张所谓对圣经进行高等批判的人物们；他们从各个角度，拼命地试图质疑、挑战、歪曲圣经的内容，试图解构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马丁路德在德国所掀起的基督教改革运动，虽然使许多德国敬虔的基督徒们真正地明白了圣经、真正地认识了基督救恩，但是，在整个德国范围内，却并没有使得德国人普遍地具有敬虔信仰的面貌。反而，在政治斗争的大潮下，德国人普遍的信仰面貌，变得更加远离上帝、远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这种状况，更进一步地促进了德国民族的自高自傲、好勇斗狠、民族自大主义，并导致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经贸发展的激烈竞争，以至于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势力集团所引发的、牵扯到德国与俄罗斯之间长期争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此，我们会在下文进一步详细记述。

但是，我们必须公道地指出，虽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在欧洲有那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总的来说，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三百多年时间里，是欧洲各国的黄金时期；现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与爆炸性发展，不仅给欧洲各国带来了生活上的巨大变化、经济上带来了巨大财富，而且，使得欧洲各国中产阶级得到了巨大发展，使得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总的来说变得更加丰富、健康、积极、向上。

到十九世纪末，整个欧洲洋溢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弥漫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境内的一种强烈乐观主义情绪。无论是知识分子们、还是普通的劳工阶层，都坚信，人类已经进入了奋发向上、和平繁荣、天下一家的光明轨道。在欧洲，不论是哪一个国家民族，不论是哪一个政治思想派别，不论

是持什么样的政治主张、思想哲学，人们都普遍地、乐观地相信，明天会更美好；他们都认为，在人类面前，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欧洲各国大兴土木、大修铁路、等等，使得普通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各个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得到巨大的发展。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德裔丈夫的推动下，在欧洲各国的积极响应下，人类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开始举办。法国建起了高大雄伟的、前所未有的、耸入云霄的、金属结构的埃菲尔铁塔；这一切科学技术的成就，更让世人觉得，——人类已经几乎可以无所不能；天下大同的世上天堂，马上就要来到。

____

十九世纪，英国的辉煌

在过去五百年以来，在欧洲各国相继兴起的历史与兴衰过程中，英国的历史最为独特，也最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仔细思考。

在十六世纪以前，英国还是欧洲各国中的一个“小不点”。她并没有广阔的国土，也没有众多的人口，而基本上是一个处于偏远岛国的、人口稀少的、以放牧和剪羊毛为经济支柱的落后农业国家。那时，英国同西欧、北欧内陆的很多国家一样，是罗马教廷统治下的君主政权体制。君主的统治权威，来源于罗马教皇的支持和授予。在天主教体系下，罗马教皇被看作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罗马教皇的旨意，被看作是与圣经有着同样的权威性。那时，在中世纪一千二百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内，英国同欧洲许多国

家一样，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在英国境内，实际上有四个政治势力集团所掌控的地区，即，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此时，法国、西班牙、以及罗马附近的、今天意大利境内的各个城邦，是欧洲境内比较强大的国家；而在北方，则是德国、奥地利、荷兰、瑞士等城邦政体系统，以及丹麦、瑞典、芬兰等小规模的邦国系统。

欧洲历史与中国等其他地区历史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在欧洲整个中世纪上千年历史中，除了十字军东征的谬误以及几次严重的瘟疫以外，欧洲、尤其是西欧各国基本上是和平安宁的。在欧洲各国历史上，尤其是在中世纪时期，基本上没有很多严重的、频繁的、改朝换代、大规模战乱、生灵涂炭的局面。因此，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君主政体中，都是所谓万世一系的，即，在君主延续政权的血脉传承过程中，虽然也会时时有争议，但是基本上不涉及大规模的战争和改朝换代、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杀戮。换言之，今天很多国家的欧洲君主，包括英国的君主，就都是一千多年以前那些国家地区的君主的直系后裔。

【相比之下，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三百年左右就会发生至少一场重大的改朝换代，并因而导致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战争，甚至导致生灵涂炭、极多数量的人口被杀害。据不完全统计，自从秦始皇时代以后，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发生了十四次大规模人口灭杀的时代。在每一次大规模人口灭杀过程中，整个中国的人口剧减；在很多地区，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人口都被屠杀净尽。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人口灭杀过程中，即，在明末清初的时代，陕西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率领陕西农民部队杀入四川，大规模屠杀了四川当地人，导致成都八十万人口最后被杀到只剩下八户人。整个四川地区的人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被基本杀光，以至于清朝初年产生了“湖广填四川”，即，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一些人口迁移到

四川定居。因而，今天的四川人的祖先，其实并非是古代四川人，而是古代的湖广人。同样，在江浙一带，当清朝满族八旗军队来到的时候，也发生了著名的、多次的屠杀事件。在清朝初年，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所有人都要面临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选择；即，每一个中国成年男子都要决定，是否要像满族人那样剃掉前脑的头发；如果不剃头，就要被砍头。在明末清初因战乱而死的中国人，达到数千万、甚至上亿人的数量。而这仅仅是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灭杀的最后一次。在前面的十二次中，例如，在秦汉交替的时代，或是五代十国的时代，或是晚唐时代、北宋南宋过渡时代、宋末元初时代、元末明初时代、等等，都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数量的灭杀。】

在十六世纪以前，英格兰的君主虽然是万世一系的（直到今天的英国君主政权也是如此），但是，英国本身，并非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恰恰相反，是一个非常贫穷、封闭、落后的国家。在当时的英国境内，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是天主教体系中的神职人员或是修道士人员；他们往往不参加生产劳动和经济活动，而常常是好逸恶劳、甚至好吃懒做、有着各种各样的腐败之事。他们拥有数量巨大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出租给那些贫苦的普通英国百姓耕种。这些英国农民要把土地出产中的很大一部分上交给这些天主教人员，而自己只能以剩下的部分来维持自己家庭的生活。同时，那些英国贵族们、庄园主们也是如此，拥有数量巨大的土地，并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

这种局面，自从十六世纪中叶的英王亨利八世执政期间开始，发生了逐渐的、但却是深刻的改变。英王亨利八世毅然决然地与罗马天主教廷划清了界限，把英国境内原有的天主教体系改变为所谓英国国教教会体系，而英国国王则成为这个英国国教教会体系的元首。更重要的是，以丁道尔英语

圣经翻译为基础的官方英语圣经，开始正式出版发行。圣经的广泛传播，深刻地改变了许多英国人的思想、精神面貌和信仰状态，使许多英国人开始真正地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恩典，是多么奇妙美好、多么大有能力。这催生了十六世纪末开始的、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将近一百年的英国清教徒运动。清教徒运动直接导致了以五月花号天路者们为代表的、为引领的，成千上万清教徒们迁移到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运动。在英国本土，清教徒运动直接导致了十七世纪上半叶的威斯敏斯特大会与威斯敏斯特信条的通过，更直接导致了十七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光荣革命的胜利。所谓光荣革命，是一个基本上没有流血的、和平的过渡过程，使得英国正式进入了君主立宪框架下的民主政治体制。【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一百年后的法国革命有着天壤之别的巨大不同。后者导致了法国君主政体的灭亡，标志着法国进入了现代时代中的政治大动荡的时代。从法国革命开始至今的三百年中，法国政府经历了至少十五次的改朝换代，一直到二战以后，在美国等领导下，法国政治局面在总算基本上稳定下来。但是，直至今天，法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系统中，仍然充满着许多危机四伏的局面。对此，我们将会在本书下册有所提及和讨论。相比之下，美国的独立战争与法国革命大约发生于同一个时代，而美国的政体从那时起就一直延续至今，仍然是在使用着同一部宪法。事实上，在法国革命的一百年前，在十六世纪末的、惨烈的法国宗教内战中，就已经埋藏了很多后来的危机线索。】

今天，很多当代政治学者把现代民主主义的发源点，看作是十三世纪英国通过的大宪章。从民主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角度而言，十三世纪的英国大宪章的确有很重要的积极正面意义。但是，大宪章本身，仅仅是英国少数贵族阶级与英国国王之间的一个和平协议；其实质是，英国国王必须要尊重各地贵族的合理相应权益。固然，英国大宪章为后来的英国民主制度变革奠定了良好的先例基础，但是，我们必须在这里清晰地指出的是，从十三

世纪到十六世纪的四百年中，英国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面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整个英国仍然是处于贫穷落后、内部不断有纷争的状态。这种局面，直到十六世纪以后，直到英国脱离了天主教，直到英语圣经在英国广泛普及、清教徒运动大幅度展开以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自从英国光荣革命胜利以后，英国开始全面地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在各个方面而言，英国进入了全面飞速发展、腾飞的黄金时期。甚至，英国的这些发展，不仅对其本国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作用，更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引领作用。

在科学技术方面，在圣经的直接影响下【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自从——培根的《圣思录》于1597年发表、《大变革与大复兴》于1620年发表、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于1687年发表、以及波义耳《怀疑派的化学家》于同时期发表、英国皇家科学院于十七世纪末成立、人类的现代物理学与现代化学得以开启，——英国的许多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们，与欧洲大陆的那些现代科学开启者们一起，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科学技术给人类所带来的，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

自从现代科学革命开启以后，英国在欧洲诸国内，科学技术率先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快速的发展。这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与经济贸易的大幅度、飞跃式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变革，促进了社会中大量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促进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发展与成熟。

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思想领域与社会实践领域的建树方面，英国也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比如约翰洛克的民主政治思想，促进了美国的成立和发展，更促进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中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发展【详情请见《论民主》】。

经过了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将近三百年的发展以后，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已经处于黄金的巅峰时期，成为了世上最富有的国家。在十九世纪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内，都是维多利亚女王担任英国的最高名誉元首。英国从一个贫穷弱小、一穷二白的偏远国家，崛起成为了所谓“日不落帝国”。英国政治军事权力所掌控的疆土范围，甚至超过了古代时期的罗马帝国的疆域。英国的海军驰骋天下，所向披靡；大英帝国的海军学院，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著名的军事院校。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等等，都成为世界各国留学生前往深造的目的地。

到十九世纪末，英国达到了最辉煌的时代。然而同时，在光鲜的外表之下，在英国体制内外，也存在着许多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一方面，英国的强盛引起了世上许多国家的艳羡和竞争。

尤其是，德国民族在统一以后，对英国很不服气，拼命地想要努力急起直追。在制造业、航海业、科技行业、经贸方面，德国都处处想要与英国争一个长短。

远方的、尚处于农奴时代的俄罗斯，一面在进行着现代化改革，一面始终以东正教的中心自居。许多俄国人虽然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与天主教体系内的许多天主教人士们一样，其实并不真的明白基督教信仰的实质，并不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与十字架救恩；在他们的心中并没有真诚的、热忱的、饥渴慕义的信仰。而是，他们仅仅是把基督教信仰当成了表面的、传统仪式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这就是俄罗斯等许多欧洲国家内所常常表现出的信仰虚伪主义现象。在俄罗斯体系与德国、普鲁士体系之间，也常常存在着许多矛盾、互相不服气的事情。

笃信基督教改革思想的英国，与被天主教牢牢控制的法国之间，也一直处于争竞甚至常常战争的状态。在世界范围内，英国有许多友邦，也有许多敌人。在欧洲各个国家之间，总地来说，既有着合作交流，又有着许多争竞；这些矛盾，在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不断地爆发出来。

另一方面，在英国体系内部，也有许多暗流涌动。在学术界，各种各样的思潮不断涌起；在这些思潮中，与法国思想界一样，有许多不敬虔的、离弃基督教信仰的成分，例如大卫休谟的怀疑主义、罗素的无神主义倾向、等等。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达尔文进化主义思想，不但给英国带来的巨大冲击性影响，更给后世的全世界人的思想与世界观、价值观、“物竞天择”观念、等等带来了深刻了影响作用。

以上种种十九世纪的事情，后来将会在二十世纪继续发酵，其影响力甚至

在今天的二十一世纪，仍然能够清晰可见、甚至愈演愈烈。我们在本书后文中将要进一步深入分析讨论。

____

为什么今天英语是世界各国之间最广泛普遍使用的语言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外交界、航空界、航海界、宇航界、国际工程界、国际文化与艺术界、医学界、等等，毋庸置疑，英语是最广泛普遍使用的语言。

这既是由于英国在过去从十六世纪以来的腾飞过程中对于世界的科学、技术、经济、贸易、航海、航空等方面的贡献，也是由于美国在过去两百年来对于世界的影响。尤其是，我们在下文中将要更详细地讲述美国在二十世纪中对于整个世界的广泛影响。这些事情，都从各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奠定了英语的影响力地位。

____

十九世纪中，一些暗流涌动的隐患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整个欧洲来说，虽然十九世纪是一个黄金时代，但是，其中却也暗藏了许多危机。这些危机主要是围绕着几个欧洲大国民族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与竞争关系而产生的。在这些矛盾竞争关系中，有的是不义的一方，有的是正义的一方；但更多的时候，则是竞争各方都包含着义、也包含着不义的复杂政治局面。在这些事情中，各种各样人的心思意念也都显明了出来。那些敬虔信仰的人们，在复杂政治环境中仍然显出了行公义、好怜悯、公义恩慈的品格。而那些以此世的各样属世利益与民族国家本身为自己心灵的终极归依的人们，则显明了他们内心的罪恶、不公、不义、欺谎、贪婪、好勇斗狠、胆怯懦弱、吝啬、等等。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中涌动着的最大的危机与暗流，就是背离基督教信仰的国家自大主义、民族自大主义、物质主义、存在主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进化论主义，以及与文艺复兴密切相关的人性主义、放荡主义，等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直接导致了二十世纪从德国开始蔓延的法西斯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思潮，则在法国、德国等左翼知识分子圈子内盛行了数十年以后，最后，终于在二十世纪初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成功地夺取了俄罗斯国家政权。

____

二十世纪初叶的世界

在经历了十九世纪弥漫于欧洲的强烈乐观主义之后，世界进入了二十世

纪。此时在中国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反抗清廷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运动。孙中山宣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中国的那些民主革命党人看来，只要中国人赶走了满族人、推翻了清朝统治、只要实现了民主，那么，——中国就能够赶上世界的潮流了。这种想法固然不错，但却大大简化了现实世界中问题的复杂性。

二十世纪一开始不久，欧洲、乃至全世界，就被卷入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史无前例的、超乎所有人预料之外、却又似乎是所有人预料之中的战争，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

____

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危机、挑战、阴影、经济动荡、萧条之前的社会经济政治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1900-1910的十年时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

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依次崛起、成为海上大国；全球贸易在他们的推动下，蓬勃发展。法国与德国等国家，在十九世纪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德国与意大利分别完成了各自的统一，经济与科技都在飞速发展。总体而言，十九世纪对于欧洲人而言是一个黄金世纪；欧洲经济科技发生了巨大的飞跃性的变化与发展；欧洲人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欧洲人普遍充满了乐观与自信的情绪。

然而，十九世纪中，欧洲也孕育着许多复杂而危机性的因素。以法国、德国为首的思想文化界，产生出越来越多的背离基督教信仰的思想、主义与文化。社会越来越世俗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神论主义等等越来越盛行；人们的心中越来越背离对于上帝的敬畏与真挚信仰。在经济运作体系中，劳资关系也常常变得越来越紧张。随着德国体系的崛起，日耳曼民族的自傲与顽梗、崇尚武力、等等越来越明显。德国与英法等国之间的经济发展矛盾越来越根深蒂固、剑拔弩张。

上述因素在1900-1910年代继续发酵、恶化，并很快导致了后来的经济危机、萧条、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布尔什维克在一战过程中成功地在俄罗斯夺取政权；这又导致了后来的二十世纪

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东欧、中国等许多国家肆虐，使得数以十亿计的人民遭受惨重的身心荼毒，甚至直到今日。

____

泰迪罗斯福等美国总统

1900-1910年代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美国在十九世纪中也如同欧洲一样，由于科学技术的爆炸性发展，而经历了经济生产的巨大腾飞。甚至，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更远远地超过了欧洲。到190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

然而，美国在十九世纪的飞速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许多深刻性的问题。十九世纪下半叶，有数以千万计的欧洲移民，从爱尔兰、意大利、德国等地来到美国，寻求更好的经济环境与生活条件。这些人中间很多是贫苦饥饿的人群，来到美国以后从事的工作往往是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工作，例如煤矿、冶金、制造业工厂、建筑行业、等等。

1900年代前后，美国许多行业的劳资关系都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垄断资本行业的发展越来越膨胀，资本家的权力越来越无所不及；另一方面，劳动工人的利益不断受到压榨，新移民群体对于社会的矛盾与不满越来越明显。罢工事件在各行各业中都时常发生，甚至已经发展到严重影响国计民生的程度。

在此期间，狄奥多·罗斯福总统（被人们昵称为“泰迪”）起到了重要的正面意义的作用。泰迪罗斯福总统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限制托拉斯、垄断资本的势力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扶助劳工的社会平等发展措施。这些措施大大地增加了美国整个国家社会的公义、平等程度，为后来整个二十世纪的发展、继续腾飞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于美国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就是泰迪罗斯福总统以及后来二战期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____

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

1860年代的南北战争以后，美国进入了一个更加飞速整合、发展、经济腾飞的阶段。同时，数以百万计、甚至达到上千万人总数级别的、大量的欧洲移民，为了躲避欧洲本国的饥荒、战乱、动荡，而来到北美新大陆，寻求一个崭新的生活。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方面，美国社会构成与文化思想在经历着深刻的、动荡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在美国社会深深扎根、蓬勃发展；属灵大复兴运动在美国不断地、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关于美国的属灵大复兴运动的历史，请见下文。

————————————————————————————————————

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来自哪里，以及他们的文化思想背景；他们的信仰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的那些来华宣教士中间，来自美国与英国的传教士占了绝大多数。这些英美基督徒宣教士们（以及他们的亲人、家人儿女）的信仰背景，与发生于十九世纪的英美属灵大复兴运动的历史背景，有着深刻的关系。

下文引述本书作者的《美国故事》中的部分相关文字，介绍美国属灵复兴运动的简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美国历史上的四次属灵复兴运动

————————————

第一次属灵大复兴

从1730年代至1740年代的二十年间开始，在美国新英格兰、中部、南部，以及英国本土许多地区，都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属灵大复兴运动。这次伟大的属灵复兴运动，永久性地、深刻性地影响了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时代以来

的宗教改革运动。许多敬虔的基督徒们以及牧者们、传道人们都大声呼吁，应当更新我们的生命，应当以热忱、敬献、诚挚的心，来对待我们的信仰。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标志着在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跨越宗派的、普世性、福音派的基督徒运动的兴起。

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与一百年前、十七世纪的清教徒运动、敬虔主义、长老会教会运动等等有着直接的、深刻的关系。乔治·怀特菲尔德、约翰·卫斯理、约拿单·爱德华兹等著名的牧者们，深刻地、广泛地、清晰地、振聋发聩地向世人讲述，悔改、得救、复兴的福音。这样的直接来源于圣经、建基于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福音信息，是跨越基督教宗派的，是普世性的、救赎性的、福音性的；其中包含着上帝的伟大大能与慈爱恩典，彰显了上帝的公义与圣洁。

在属灵大复兴运动中，牧者们强调圣灵的伟大工作，清晰地指出人应当悔改自己的罪、倚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并要在世上过重生的、圣洁的、公义的生活。人的得救，不是仅仅在于头脑中的“知识”或是“教义”，而是在于心灵中、灵魂中、生命深处的彻底悔改与重生。那得到上帝救赎恩典的人，是真正有福的；这样的人，会确据地得到永生，进入上帝的圣洁美好、无限幸福的国度。

属灵大复兴运动在当时的美国南方，更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黑人人口。在黑人奴隶以及自由黑人的人口中，基督徒的数量极其大量地增加。

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导致了许多普世福音派、基督徒教会、福音传播组织

的诞生，例如，1792年成立的浸信会布道会组织。

。。。。

在18世纪早期、美国十三个州前身的地区，教会组织形式很不一样。在新英格兰，主要是以清教徒们当年所建立起来的会众主义教会为主。在纽约州、宾西法尼亚州、新泽西州、马里兰州、等中部地区，则主要包括贵格教派、荷兰改革宗、英国国教教会、长老会、路德宗、会众主义教会、浸信会、等。在弗吉尼亚、南北卡莱罗纳州、乔治亚州等南部地区，则主要是英国国教教会、以及一些浸信会、贵格教派、长老会。在南方，教会成员数量相比于人口数量较少，欧洲传来的所谓理性人文主义把一些人引向了无神主义、自然神主义、等等。而在北方的新英格兰地区，教会敬拜有时落入了僵化与形式主义，很少有人真正地、切身地经历和体会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与奇妙恩典。

因此，受到新英格兰清教主义、苏格兰与爱尔兰长老会主义、以及欧洲敬虔主义影响的基督徒牧者们，开始呼吁广大的基督徒们，应当在信仰和敬虔上复兴。上述三种传统的混合影响，使得基督教改革运动中的普世福音派们更加强调属灵的复兴、圣灵的大能、悔改罪人对于上帝之爱的切身经历。在1710年代与1720年代，在新英格兰的会众主义教会中，属灵的复兴运动就已经非常频繁和明显。不过，这种早期的属灵复兴运动主要集中于各个当地的地区，而没有被印刷媒体所广泛报道记述。第一次被纸质媒体广泛记述报道的属灵复兴运动，是1727年发生地震以后的那一次。渐渐地，发自于新英格兰各地的属灵复兴运动，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区域中，甚至受到了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注意。

从1720年代、1730年代起，中部地区长老教会在WILLIAM TENNENT牧师的带领下，也开始出现了许多属灵复兴的聚会。他建立起了一间神学院，名为LOG学院，专门训练大约20多位长老教会的属灵牧者；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三个儿子以及SAMUEL BLAIR。GILBERT TENNENT牧师在新泽西讲道的时候，结识了荷兰改革宗的THEODORUS JACOBUS FRELINGHUYSEN 牧师。后者是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中的一位重要的晨星。FRELINGHUYSEN牧师是一位敬虔主义者；他相信，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当切身地经历悔改、认信、重生，并在这个世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在RARITAN VALLEY所领导的属灵复兴，是纽约、新泽西等地的伟大属灵运动的预演。在FRELINGHUYSEN牧师的影响下，TENNENT牧师相信，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应当真实地经历悔改与认信，并得到蒙恩得救的确据把握。

到1729年，TENNET牧师已经在NEW BRUNSWICK与曼哈顿旁的STATEN ISLAND长老教会中看到属灵复兴的迹象。大约同时期，TENNET牧师的两个兄弟，WILLIAM与JOHN在新泽西FREEHOLD牧会的时候，也都在那里看到了属灵复兴的迹象。

最具影响力的，是1734年-1735年发生在北安普敦的伟大属灵复兴运动。在这里，属灵复兴运动的领导者是会众主义教会的牧者约拿单·爱德华兹。1734年，爱德华兹牧师在这里进行了题为“唯独因信称义”的系列讲道。这系列的讲道，在当地的会众中激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尤其是，许多市镇中的年轻人中，反响尤其热烈。

爱德华兹给波士顿的牧师BENJAMIN COLMAN写信，讲述他在这属灵复兴运动中的经历。他在信中对COLMAN牧师写道："这些市镇中从未有过如此丰盛的爱，也从未有过如此为罪的忧伤痛悔....我迄今为止的一生中，从未像过去半年一样，见过如此多的基督徒们、以如此恩慈圣洁的心灵去爱仇敌。"

最终，爱德华兹所掀起的这场属灵复兴运动传播到了新英格兰地区麻萨诸塞西部的25个市镇，以及康涅狄格的中部，一直持续到1737年。

在那个时代，有许多会众主义教会牧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错误地秉承一些理性主义思想以及亚米念主义思想【即认为，人不能全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救，而是也需要自己的行为才能得到上帝的救赎】。但是，爱德华兹牧师坚定地秉持传统的加尔文主义教义【即，人只有单单地凭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够得到救赎】。爱德华兹深刻地明白，一个真正的、被上帝所拣选的基督徒、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必须应当真实地经历属灵中的悔改、重生，从灵魂的本当死亡状态，进入上帝所赐恩典的、属灵喜乐之中。基督徒们或许有多个、逐渐的、悔改重生的过程，但是爱德华兹深知，在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罪人心灵之中，一定有确据的、确定的、重生的时刻，尽管那个时刻本身，世人并不一定能够清楚地知道。

北安普敦的属灵复兴运动，表现出一些迹象，被有些批评者称为过分狂热，但被一些支持者称为是圣灵作工的记号。在教会敬拜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会变得非常情绪激动；一些人声称看见了异象，或是有一些神奇的经历。爱德华兹牧师非常谨慎小心地为这些事情辩护，——只要这些事情所指向的，是上帝自己的荣耀，是人们对于上帝的俯伏敬拜，而不是人们的自我荣耀。在整个十八世纪的许多属灵复兴运动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和

经历出现。爱德华兹牧师书写了一本书，题目叫做《信实的讲述》，来记录北安普敦的属灵复兴运动。著名的福音派基督徒JOUHN GUYSE与ISAAC WATTS在英国出版和发行了这本书籍。该书的出版，使得爱德华兹立刻在英国变得非常著名，并极大地增加了他在英国的影响力，也对于英国的属灵复兴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信实的讲述》这本书成为了许多牧者和基督徒们的榜样；在很多地方，属灵复兴运动都跟随着书中所记述的方式来进行。

乔治·怀特菲尔德于1738年首次从英国来到北美，在佐治亚布道。他在那里成立了“伯赛大”孤儿院。之后他又回到了英国。1739年11月，他返回北美。他的第一站是费城。他首先在位于费城的英国国教教会“基督教会”那里布道。后来，他就在费城法院大楼外的台阶上，在户外对着数量极多的听众们布道。然后，他去到许多当地的长老会教会中，对会众们讲道。

之后，他离开费城，来到纽约市；后来又去了中部，即今天的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宾西法尼亚州等地；后来又去到弗吉尼亚等南部地方。他不但在英国移民的教会中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而且，在许多荷兰移民与德国移民的教会中，也得到了热烈的反响与欢迎。路德会的一位牧者，HENRY MUHLENBERG讲述道，有一位德国移民妇女，听了怀特菲尔德的讲道以后说，虽然她听不懂怀特菲尔德所讲的英语，但是，在怀特菲尔德的布道会中，她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教导和造就。

1740年，怀特菲尔德开始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进行巡回讲道。他先是于1740年9月14日到达了罗德岛的NEWPORT，在当地的英国国教教会中进行了几场布道。然后，他来到了麻萨诸塞的波士顿，在那里待了一个礼拜。在

波士顿，他在当时还是属于英国国教教会的国王教堂中，与会众一起进行祷告；并在波士顿的几个教会中进行了讲道。9月20日，怀特菲尔德在波士顿第一教会中进行了布道；并在教会建筑外，对那些闻讯而来、但却由于教会建筑容纳空间不够、而不得不待在外面的、8000会众，进行了户外布道。第二天，他更在户外对15000会众进行了布道。礼拜二，他在波士顿第二教会进行了布道。礼拜三，他在哈佛大学进行了布道。

之后，他又去了新英格兰很多地区，甚至到了偏远的、新罕布什尔的PORTSMOUTH。10月12日，他返回波士顿，对那里的30000会众进行了布道，然后又继续在新英格兰地区进行巡回布道。

然后，在约拿单·爱德华兹牧师的邀请下，怀特菲尔德来到了北安普敦。他在那里进行了两场布道。旁听的爱德华兹牧师如此感动，以至于当场哭泣。

接下来，怀特菲尔德来到了康涅狄格的NEW HAVEN，在耶鲁大学进行布道。从那里，他沿着海岸线南下，沿途在各地布道。10月29日，他到达纽约市。在曼哈顿旁的STATEN ISLAND，怀特菲尔德遇到了GILBERT TENNENT牧师，并邀请他去波士顿讲道，把那里的属灵复兴运动持续下去。TENNENT牧师接受了邀请，于12月来到波士顿，并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巡回布道。他的足迹遍布了麻萨诸塞州、罗德岛、康涅狄格等地。如同怀特菲尔德一样，TENNENT牧师的讲道，吸引了极大数量的会众前来聆听。在这些布道会上，有许多人悔改、归主。

从1740年一直到1743年，新英格兰地区的众教会都经历了奇妙而伟大的属灵复兴运动；会众们的宗教情感变得极为热忱，牧师的讲道常常得到极其热烈的回应；人们常常深刻地悔改己罪、禁食、祷告、甚至常常哭泣。人们开始非常重视和强调祷告，并且非常重视属灵书籍的阅读。清教徒们当年的清教主义的理想，又再一次在新英格兰众教会中成为现实、得到复兴。据估计，当时新英格兰地区的会众主义教会的众教会中，成员数量增加了20000人到50000人。

从1745年开始，属灵复兴运动开始从新英格兰地区向南方地区，包括南方的乡下、以及许许多多的黑人奴隶社区扩散，一直持续到1750年代、1760年代。

这次属灵复兴运动导致了许多教育机构的建立。1746年，长老会教会建立了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育机构。1754年，在ELEAZAR WHEELOCK的推动下，建立了后来成为达特茅斯学院的教育机构。在下一个世纪中，耶鲁大学在美国普世福音传播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在美国历史上的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并非是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的历史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属灵复兴。不过，这是第一次，人们具有了普世福音的共识；人们共同认识到救赎恩典的教义的重要性；人们在布道中，不断地强调着福音恩典与罪人悔改的重要性。在属灵复兴运动中，牧者们强调，得到救赎的道路；一个人只有真心地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并在生活中真诚而热忱地践行出这信仰，才显明了救赎恩典在人生命中的大能与真实性。

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中的著名牧者人物，包括乔治·怀特菲尔德、约拿单·爱德华兹、吉尔伯特·TENNENT、约拿单·狄更斯、SAMUEL·戴维斯等。他们都是温和派的普世福音牧者，教导加尔文主义的敬虔形式，深受一百年前的清教主义传统影响；对他们而言，宗教信仰绝非仅仅是头脑中的教义和知识，而更是心灵与生命中的真实光景。他们强调，——人应当悔改、认信、承认己罪，认识上帝的律法，明白恩典的道路；人应当悔改罪、离弃罪、进入圣灵的光照之中、进入对于耶稣基督救恩的信靠之中；并因此，人得到救赎恩典的确据。

在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中，许多妇女受到了深刻的感染和影响。HANNAH HEATON（1721-1794）是康涅狄格的NORTH HAVEN的一位农夫妻子。在她的日记与回忆录中，我们能够读到她的属灵经历、以及每日生活。PHILLIS WHEATLEY是第一位在北美发表著作的黑人女诗人。她在童年时期，被从非洲带到了北美。在这里，她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在她的著作中，处处显明了她深挚的基督徒信仰；在诗作中，她描述了自己从异教之地来到北美、在这里认识了基督教信仰的生命经历；她写作了一首长诗，名叫《从非洲到北美》。她受到了北美属灵大复兴运动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受到了怀特菲尔德牧师布道的深刻影响。当怀特菲尔德去世的时候，她专门写作了一首诗，纪念怀特菲尔德，称他为“没有偏见的救赎者”。

OSBORN是罗德岛的一位学校老师。从她的书作中，我们可以瞥见，在属灵大复兴运动的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事务所受到的巨大影响。她的书作包括，一本1743年回忆录，一些日记与书信，以及她匿名发表的一本书籍《真实基督教信仰的本质、确定性与证据》。

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导致北美人民深刻地改变了对于上帝的认知，对于自己生命与信仰的认知，以及对于周围世界和世人的认知。在弗吉尼亚、南卡莱罗纳、北卡莱罗纳、佐治亚等南方许多地区，那些来自纽约等地、以及北方新英格兰地区的浸信会牧者们，以及卫理公会的牧者们，使得许许多多的白人与黑人都成为悔改、认信、真挚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真诚基督徒们。其中很多黑人在悔改信主、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都是奴隶的身份。也有很多人是自由的身份。在许多白人教会，白人基督徒们开始——真心地欢迎黑人也加入他们的教会；并认真地看待黑人们的真诚基督教信仰。在很多教会中，黑人甚至被选举为执事、训导者、甚至牧者。

对于黑人奴隶来说，基督徒牧者们讲道信息中的、关于属灵上的平等的福音信息，尤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北美黑人的人口中，原来的来自非洲的传统偶像迷信风俗逐渐衰落，而数量巨大的黑人们开始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信仰、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在南方的福音派教会牧者与领袖们中间，他们不得不比北方的教会领袖们要更加频繁地面对奴隶制的棘手问题。【注：因为在北方并没有合法的奴隶制，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基本上没有任何奴隶；而在弗吉尼亚等南方，奴隶制却是合法的】。尽管如此，南方的福音派教会领袖们坚持劝导奴隶主们，要他们给自己的奴隶们提供应有的教育，使他们能够识字、能够阅读和学习圣经。因此，南方许多的黑人奴隶最终得到了少量的文化教育。

在怀特菲尔德的讲道中，他不断地强调，在福音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

的。他更强调地指出，这种平等性的属灵含义。他和许多属灵复兴运动中的牧者们一样，都坚信，当一个黑人奴隶悔改、信主、成为真诚的基督徒以后，那么，在天国中，他就和任何其他基督徒一样，同为上帝的儿女、得救的子民。怀特菲尔德在黑人奴隶中有巨大的影响力，被许多黑人所深刻地记念。

SAMUEL·戴维斯是长老会教会的一位牧师，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第四任校长。他在黑人中也受到了巨大的欢迎；常常对数量极多的黑人布道，使许许多多的黑人悔改、信主、成为真挚的基督徒。在弗吉尼亚，他被称为是第一个使众多黑人成为基督徒的人。戴维斯牧师在1757年书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讲到了在旅途中所碰到的、一个成为了基督徒的黑人奴隶的敬虔情感。他记述到，那位黑人奴隶说："我是一个可怜的奴隶，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来；在这里，我从来没想到过自己可能会得到自由；当我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时候，我不知道任何关于耶稣的事情；我从来都是稀里糊涂地活着，从没有去想自己死后会怎么样；但是，我现在看到了一个永远也不会死亡的生命；先生，现在我想请你告诉我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以及我对于上帝的职分；因为我再也不想像以前那样稀里糊涂地生活了。"

戴维斯牧师在著作中写道，在这场伟大的属灵复兴运动中，他曾经遇见过许多这样的黑人，看见当他们悔改信主以后，心灵与生命中所表现出的巨大信仰与情感。戴维斯牧师相信，黑人如果得到足够的文化教育，就也能和白人一样，成为极其敬虔的基督徒。因此，他在南方大力地推动奴隶主们，要求他们给自己的奴隶们提供足够的文化教育，使他们也能够读书识字，这样，黑人奴隶们就能够明白圣经中的教导和话语。

在属灵大复兴运动中的敬虔深挚的敬拜活动，吸引了许许多多的黑人们。当这些黑人们悔改信主、成为真诚基督徒以后，在他们中间，就开始涌现出一些黑人领袖。这导致了，在北美南方首次开始出现了、主要由黑人会众所组成的黑人教会。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在南方的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已经成立了第一批黑人教会。仅在弗吉尼亚的PETERSBURG市，就有两间黑人教会成立了。

第二次属灵大复兴

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属灵复兴，持续的时间大约是从1790年至1840年。这次属灵复兴运动也与上次一样，因着牧者们大有能力的讲道、与教会中的会众们的属灵光景的复兴，引起了许多改革运动与社会变革。属灵复兴运动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进入教会，悔改信主、成为基督徒。卫理公会的众教会常常差派牧者们前往偏远的西部大开发前线，在各地巡回讲道。第二次属灵复兴运动，引致了很多社会变革以及对于救赎恩典的重视。首先，在1790年代的肯塔基州以及田纳西州，在长老会众教会中、卫理公会众教会中、以及浸信会的众教会中，人们的宗教情感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当时，人们处于极大的、快速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社会政治变动环境中；人们在教会中所经历的复兴运动，给他们的生命与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与幸福。这场属灵复兴运动，与以前一样，也导致了一些大学、学院、神学院、以及布道差传会的成立。

这场属灵复兴运动更深刻地改变了许多普通人的生活与心灵；它让人们在内心深处与上帝产生了紧密的联接关系。卫理公会、浸信会等教会团体的成员人数得到了巨大的增长。州与州之间、各地之间的纽带得到了显著的增强。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印第安纳州、以及俄亥俄州南部、等等、甚至加拿大等地，都掀起了强烈的属灵复兴运动。在很多地方，常常会举行户外的福音营会。这些福音布道活动，不分种族、不分阶级。在浸信会与卫理公会所组织的许多大型布道活动中，有很多农场主、普通百姓、以及黑人奴隶们，同时悔改信主、成为真挚的基督徒。在西部大开发前线，由于人口密度很稀疏，所以一个县里面的很多人都是在这样的户外大型福音营会中，彼此第一次见面、认识。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户外营会中第一次走进教会组织，参加敬虔地敬拜上帝的活动。这样的户外福音营会，常常会连续持续数天的时间，并由许多牧者们进行很多场的讲道。在这些营会中，常常会有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听众。人们在一起敬拜上帝、唱诵圣诗、聆听讲道。营会中的讲道，常常是以人的罪、悔改罪、归向基督为中心。当营会结束以后，人们返回到各自的居住地；这往往会导致各地的小规模的、许多地方教会的成立；教会的数量，在许多地方增长迅速。

1800年6月，肯塔基州的LOGAN县长老教会举办了第一次非正式福音营会。不久以后，JAMES MCGREADY牧师在三个地点都举行了类似的营会。又一年以后，1801年8月，在肯塔基州的BOURBON县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福音营会。领会牧师是BARTON STONE（1772-1844）。这次营会往往被看作是北美所举行的第一次大型福音营会活动。许多浸信会、卫理公会的牧者们也前来进行了讲道。该次福音营会连续举行了六天之久；共吸引了至少20000会众前来参加。在STONE牧师以及ALEXANDER CAMPBELL牧师（1788-1866）等人的推动下，这一类大型福音营会活动的模式很快就传遍了各地，并极大

地促进了教会人数的大幅增加，尤其是促进了卫理公会与浸信会教会的增长。1800年所开始的属灵复兴运动也促进了肯塔基州的长老教会以及其他非宗派教会数量的增加。这些属灵复兴运动也导致了许多妇女与许多年轻人都悔改、信主、成为基督徒、进入教会。

19世纪上半叶的这次属灵大复兴运动，后来也导致了19世纪晚期的社会福音运动。牧者们在教会中教导人们，不仅应当悔改自己的罪，而且更要致力于社会道德光景的改善，尽力地除去各种各样形式的罪。很多人因此成为了社会福音运动的领袖。会众主义者们建立起许多布道协会；在西北方的开发前线，也进行了许多福音布道活动。他们深刻地影响了城市和乡村文化中的很多方面的内容。这些活动促进了社会网络的形成、媒体行业的建立、以及许多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成立。出版行业、教育行业等等，都以基督徒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核心。这其中包括了，1816年所成立的美国圣经协会，以及许多其他的基督徒协会组织。很多妇女自愿地参加到这些志愿服务活动中来。在纽约州西北部的开发前线地区，妇女福音协会与母亲协会成立起来，促进了很多人认识福音、悔改归主。许多人也投入到了社会慈善事业与公义事业的活动中。这导致了后来很多的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包括废奴运动、戒酒运动，以及监狱改造运动，还有照顾残疾人以及精神病人、等等。这些福音派人士们深信，——基督福音，应当使每一个人都为社会的公义与平等、福祉等等，尽力地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南方的浸信会与卫理公会的牧者们，对奴隶主们、也对奴隶们讲道。当FRANCIS ASBURY牧师在南方各地四处巡回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名叫HARRY的黑人自由人，是给ASBURY牧师驾驶马车的车夫。HARRY虽然不识字，但却能够熟练地、一字不差地背诵圣经中的绝大部分段落；他受到了许多白人听

众们以及黑人听众们的如此热烈的欢迎和反响，以至于，ASBURY牧师安排他在教会的讲台上，对会众们讲道。1784年，HARRY在特拉华州的CHAPELTOWN市，在托马斯教堂讲道；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位黑人站在教会的讲坛上，对白人听众们讲道。HERRY甚至被BENJAMIN RUSH牧师和THOMAS COKE主教称为是北美最伟大的演讲家。

十九世纪早期，独立的黑人教会组织团体开始相继成立。在南方的各个城市，以黑人会众为主的教会达到了数百个。从南卡莱罗纳州的CHARLSTON到弗吉尼亚的RICHMOND和PETERSBURG，都有许多黑人教会成立起来。在弗吉尼亚、肯塔基州等地，也都相继成立了相应的浸信会教会组织团体。在黑人教会中兴起的属灵复兴运动，也促进了黑人奴隶们对于人身自由的努力争取。黑人教会的浸信会组织团体，一直保持着相对于白人教会组织团体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在这场属灵复兴运动中，尤其是在南方，有数量极多的妇女们悔改归主。在美国南方各州的人口中，人们不是像北方的新英格兰地区等那样，是来自于清教徒们的后代以及所传承的文化传统；而是，他们中间很多人是来自于爱尔兰、苏格兰、等地的移民后代，或是来自于英国国教教会的文化传统背景。在南方的家庭中，丈夫、男人们经常会有大男子主义习惯；他们要求妻子们绝对服从自己，甚至，迫使妇女们要屈服于自己、胜过顺服于上帝。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与境况下，众教会中的属灵复兴运动，给妇女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支持和鼓励；使得她们走出家门，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彼此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提供情感方面与生活上的建议与支持和鼓励。这些妇女们在教会活动中积极参与、贡献绵薄之力，热忱真挚地作出信仰的见证与分享，并为他人提供热情无私的帮助。许多教会领袖，例如CHARLES FINNEY牧师，认识到，在众教会的属灵复兴布道活动开

始之前，教会中的妇女成员们所参加的、热忱的、公共祷告聚会，常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性作用。妇女们对于孩童们的信仰和精神状态，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属灵复兴、布道活动期间，母亲们常常是整个家庭中的道德与属灵基础，更是在教会中的教育儿童主日学等活动的重要师资力量。1830年代，在北方各州，广泛地成立了许多妇女们所组成的祷告协会、道德更新组织、等等。她们在很多事情上，体现出了基督教信仰中的谦卑与饶恕的精神。

这第二次属灵大复兴运动，对于十九世纪的美国政治也产生了许多广泛深远的正面影响。

第三次属灵复兴运动

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属灵大复兴运动，发生于大约1855年至1930年代。仅在1857年至1859年间，在纽约市，每天就有超过10000人聚集在一起祷告。在整个国家的许多其他大城市和小乡村中，也有许多这样的公共祷告聚会。

在此前不久所成立的基督教青年会，在这次属灵复兴运动中、尤其是在像费城或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地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督教青年会常年以来，一直专注于基督徒牧者的训练工作，并努力使年轻人、尤其是那些

贫穷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们，能够在健康的环境下成长与发展，在大城市环境中积极健康地生活与工作。

费城的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一个公共祷告聚会活动，每天都吸引至少300人前来参加祷告聚会。祷告会每天中午开始，但不到上午11点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前来。有时，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营会福音活动，需要搭建起能够容纳1200人的帐篷。

芝加哥的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面向普通民众的、重要的、训练性质的、学校组织。DWIGHT·穆迪先生曾经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福音事奉和讲道的机会。

1858年开始的大规模属灵复兴运动，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北美的所有大专院校。除了有许许多多人悔改归主以外，更有不计其数的、大专院校的大学生们，自告奋勇地踊跃报名，参加前赴世界各地的福音传播活动。

历史学家EDWIN ORR写道：

“属灵复兴运动的影响，在整个国家的各个角落都能够感受得到。它首先在全国的各大城市中广泛漫延，然后传播到许许多多的小城市、乡村、市镇。它充满了所有的大学、学院、中学；它影响了几乎所有的课堂。对许多人来说，它就像是五旬节初熟的果实被放大了成千上万倍一样；......悔改归主的人数，很快就增加到每个礼拜50000人以上.......”

____

第四次属灵复兴运动

美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属灵复兴运动，发生于1960年代至1980年代。不过，历史学家们往往对此没有统一的一致意见，而不是像前三次的属灵大复兴运动那样，比较有共识。

这里，我们专门记述一下在第四次属灵复兴运动中比较著名的葛培理先生。

威廉·富兰克林·葛培理先生，出生于北卡莱罗纳州的一户农家，是苏格兰人与爱尔兰人的后代。他生于1918年11月7日，逝世于2018年2月21日，是著名的美国福音派布道家，是美南浸信会的按立牧师。他的妻子路得，1920年生于中国江苏，并在中国长大，因为她的父母是在华的长老教会的传教士。

从1940年代，葛培理先生就开始享有国际声誉；他后来被称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领袖。1960-1980年代，他常常举办室内或室外的大型布道聚会活动，并通过电台与电视台的转播，把福音传播到千家万户；直到21世纪，他当年的许多讲道还在不断地被重播。在他六十多年的电视布道

生涯中，他每年都会举行福音布道，从1947年一直到2005年退休。从1950年至1954年，他也曾经主持一个基督徒福音电台节目。他强烈地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努力地促进种族融合；并曾经于1957年邀请马丁路德金在纽约市的一次奋兴聚会活动中一同讲道。他在一生中影响了许许多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无数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使人们认识到圣经与今日之世界之间的深刻关系。他在一生中，曾经在185个国家或地区中，对超过2亿1千万人讲道。从杜鲁门总统到奥巴马总统，他都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他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总统、以及约翰逊总统之间保持了亲密的关系。在他的大型布道活动中，有超过300万人悔改归主、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至2008年为止，聆听过葛培理的电视与电台布道广播的人，据估计超过了22亿人。仅在1996年的一次电视布道活动中，就有20亿人收听收看。

====================================

诗篇33篇

1义人哪！你们要靠着耶和华欢呼；

正直人赞美主是合宜的。

2你们要弹琴称谢耶和华，

用十弦瑟歌颂他。

3你们要向他唱新歌，

在欢呼声中巧妙地弹奏。

4因为耶和华的话是正直的，

他的一切作为都是诚实的。

5耶和华喜爱公义和公正，

全地充满耶和华的慈爱。

6诸天借着耶和华的话而造，

天上的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

7他把海水聚集成垒，

把深海安放在库房中。

8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9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立，就立。

10耶和华破坏列国的谋略，

使万民的计划挫败。

11耶和华的谋略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

12以耶和华为 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耶和华拣选作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13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他看见全人类。

14从自己的住处，

他察看地上所有的居民。

15他是那创造众人的心，

了解他们一切作为的。

16君王不是因兵多得胜，

勇士不是因力大得救。

17想靠马得胜是枉然的；

马虽然力大，也不能救人。

18耶和华的眼睛看顾敬畏他的人，

和那些仰望他慈爱的人；

19要搭救他们的性命脱离死亡，

使他们在饥荒中可以存活。

20我们的心等候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

21我们的心因他欢乐，

因为我们倚靠他的圣名。

22耶和华啊！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

向我们施慈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

满清的灭亡，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具有着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从此以后，中国永久性地告别了皇家王朝的时代，而进入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现代化道路。虽然，今天，中国在这条通往现代化的政治

道路上走了已经一百多年、仍然还没有真正地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政治制度【中国距离一个成熟稳定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还非常、非常遥远】；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血雨腥风、颠簸与倒退；但是，民主、共和、平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的理念与思想，早已经成为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共识和梦想。

（选自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B0%91%E4%B8%BB%E7%BE%A9

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又称“孙学”（Sunology）、“国父思想”、“总理遗教”，是由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提出，为国民党的基本理论，在中华民国宪法前言以“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称呼，并被纳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内容（“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即民族、民权（民选）和民生。

孙中山表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此纲领在历年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多次对三民主义所作的表述，皆有所改变和发展。而国民党领导人与党员、学者，对三民主义也有不同的解读。

历史

三民主义，是随着孙中山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推展而产生，并且因为中国时局变化而有所增补。三民主义的雏形，是由于孙中山在经历伦敦蒙难一事

之后，利用滞英期间，拜访大英图书馆研读相关书籍，并且参访英国当地建筑、知名人士学者、展览、文化风俗，而有所启发。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尔后，《民报》发刊，孙中山为其著发刊时，认为欧陆列强的发达，为民族、民权、民生循序实践而成。而中国要跟进，则需吸收宣扬最进步理想的知识于人心并且实行，这就是民报的职责。同年12月香港《民国日报》代售《民报》广告，该报社社长、革命党员冯自由，认为广告上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为冗长不便，则以“三民主义”代称。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理念是于1906年12月2日在日本东京民报一周年纪念会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为题的演讲，内容提及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雏形，但当时三民主义是以“三大主义”称呼。1924年1月至8月，鉴于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极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自序》），孙中山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三民主义十六讲，每周演讲一次，为三民主义提供最后的见解。

要点

民族主义

初期包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二是追求中国人民政治自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
后来孙中山主张以提倡国内各族团结一致，在平等基础上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满族不再是要被驱逐的对象，而是要团结的对象。所有的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民族国家，并且恢复中国民族固有道德，去恢复中国民族固有能力，然后结成家族，联成宗族，才能治理中国，才能恢复中国民族精神与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济弱扶倾，成一个大同之治。

民权主义

孙中山主张用“人民来做皇帝”，并引用三国演义中的阿斗与诸葛亮来形容

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活动制度之流弊。孙中山并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所提倡八德中强调“忠民”之美德，为民国强盛之基础。在此思想前提之下，孙中山主张人民必定要有直接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支配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管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五权宪法之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服务人民，人民则拥有政权支配政府。

孙中山认为西方代议民主中的国会权力太大，是一种国会独裁或议会专制，所以提出将监察权从国会中分立出来、成为五权政府的一个独立分支，并提出中央政府五院（其中的立法院就相当于西方国家行使立法权的国会）对代表人民行使民权的国民大会负责。进而提出权能区分，以形成有能政府，为人民谋福利，同时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管理政府。“治权”的对称，孙中山提倡人民管理国事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在中央层级，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

民生主义

孙文给民生主义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他在1924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开宗明意地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演讲从实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增长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谈起，进而阐述西欧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并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政策确定为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还要发展国家资本，振兴实业，第一是交通事业，第二是矿业，第三是工业。要用国家的力量振兴工业。接着，孙中山谈到吃饭问题，并强调这是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人不够饭吃最大的原因是农业不进步，其次是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在目前来说，应该赶快用政府和法律的力量解放农民，否则民生问题就没法解决。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以养民为目标，中国的粮食才能很充足。关于穿衣问题，孙中山认为人类生活的程度可分为需要、安适和奢侈三级。目前解决民生问题，是要解决需要问

题，使四万万人都丰衣足食。孙提出，由于当年中国的社会实业经济程度尚不发达，中国祇可“师马克思之意”，而绝不可“用马克思之法”。而中国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外国的目标相同。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

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中最早具体成形的思想，孙文并坚持将之列入中国同盟会誓词当中。孙文平均地权的主张主要受到两个人的启发：其中涨价归公主张是承袭约翰·密尔。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五卷第二章第28节中就提到对土地价格的增值加以课税，因为地价上升是由地主改良及社会改良所致。扣除地主自行改良所增值的部分后，应该归还给社会。而孙文照价征税的主张则是源自于亨利·乔治。后者主张应以地价税（地租）作为政府单一收入，而停止征收其他杂税。孙文曾指出“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并曾在多次演讲与民生主义第二讲中提倡以地价税作为政府主要税收。亨利乔治的主张发展迄今，一直受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推崇与支持。而英国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其房地产持有税占政府整体税收的比例，亦高居OECD国家之冠。

1953年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七届三中全会，总裁蒋中正发表历史重要文献“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完成三民主义体系。此外、在民生主义中提到的人民的六大基本需求“食、衣、住、行、育、乐”现已成为中文圈中泛指生活所需一切的代名词。

十六讲及其演化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1922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后在俄国十月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于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孙中山指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他从1月到同年8月，在广州高等师范学院，透过演讲的方式，每星期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三民主义，作了16次讲演（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未完成，原计划讲六讲）），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歌词的第一句便是"三民主义"。

孙中山1925年1月1日抵北京后即病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对三民主义之阐述从此划上休止符。

虽然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但国民党内对于三民主义的阐扬与实践，仍有国民党员实行。戴传贤以"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开出三民主义理论研究第一响。胡汉民则以"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一书，研究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关系。蒋中正则以"国父遗教概要"阐述对三民主义体系的认识，"中国之命运"阐扬对于三民主义在清末革命影响、到中国对日抗战及其以后国策上的发挥，"中国经济学说"阐扬其对于民生主义的认识。并于1953年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试图为三民主义作补充总结。陈立夫则撰写"唯生论"，将孙文学说与民生史观做中国哲学讲读。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

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也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改组成立以来，所一直奉行的中心思想。
后历经多次战争，三民主义在1946年被“制宪国民大会”列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规范了中华民国的宪政基础。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据此彰显三民主义主权在民的中华民国宪法实施至今。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

孙中山所著《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20日）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伙矣。婍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复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

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沈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

++

从上文可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命党人在清末民初年代，对于中国

的前途、命运、道路、历史、等等深刻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反思。这种反思与探索，代表了整个二十世纪中的中国人在政治道路方面的思想角度。

他们正确地看到了民主制度的价值，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到民主制度的背后，社会人心、文化信仰的极其重要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下文继续反思这个问题。

——

德先生与赛先生

在清末民初的许多中国人眼中看来，民主与科学，就是医治中国的两剂良药；他们认为，只要中国实行了民主与科学，那么，中国就会兴旺发达起来。但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以及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斩钉截铁地向我们显明了，"民主与科学"所涉及的，其实只是一些表面现象、或是一些表层的问题。

在这里，引述本书作者所著的《论民主》一书中关于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
+++
+++
+++
+++
+++++++++++++++++

+++
+++
+++
+++
+++
+++
+++
+++
+++
+++
++++++++++++++++++++++++++++++++++

民主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我们从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历史中，会清楚地看见，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不仅发源于欧洲，而且，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般性而言，在西方各国中间，如果，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得越广泛，人民的基督教信仰越真挚而热忱，那么，在这个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就越容易建立起来，并且，民主制度在这样的国家中

就发展得越快、越稳定；反之，当一个国家中的基督教信仰越来越不受到人们重视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混乱喧嚣、内耗内斗；甚至，当这个国家中大多数人民都离弃了敬虔信仰的时候，也就必然会导致，民主制度终将引向彻底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并最终被专制主义野心家所推翻、篡权。

其中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民主制度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人民群众内部之间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复杂过程。在这样的复杂过程中，在一个社会中，尤其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世界主要国家中，必然会存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利益冲突、不同的观点角度、不同的意识理念等等。那么，在这些不同的、甚至激烈的力量角力过程中，怎样能够达到和平安祥的、团结一心的、众志成城、稳定牢固的政治结果呢？

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民主制度若要成功【而不是逐渐滑向无政府主义以及专制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和面对以下这样的一般性困境：——在民主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过程中，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必然会有很多人口成分、很多政治力量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甚至，政策方向是被很多人所彻底反对的。【——尽管，当然，政策方向之所以被决定下来，是因为社会中超过半数的政治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那些在某个政策决策上意见少于半数的人群；但是，由于社会政策决策有许许多多的方面，因此，这些在每一个政策决策上意见少于半数的人群，加在一起，人数就反而会占据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例如，有的人反对某些医疗方面的政策决策，而另外有些人则反对某些教育方面的政策决策；虽然那些人在每一项具体政策决策上都少于半数，但他们在不同政策决策相关方面上相应的人数加在一起，却超过了社会人口中的大多数。】

于是，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怎样避免扯皮、庸碌无为、无法决策？怎样避免决策结果导致国家动荡、不稳定、怨声载道？

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我”是民主社会中的一个成员，那么，当面对某个不符合“我”利益、违背“我”意识形态的、然而却是民主程序下所制定的决策结果的时候【例如，民主决策的某个政策结果是：——减少某个地区的、面向某类职业的教育经费，增加某种医疗的收费，针对某种行业加税，增加某些方面的军费，甚至是堕胎，毒品合法化等等】，——在“我”的内心中，怎样还能有和平安宁的心情呢？“我”怎样还能够平静地、和平地遵守那些既定的民主秩序和政策法律结果【即，和平地等到下一次投票的时候再去表达意见；甚至，——“我”心里明知道自己是少数派，无论再投多少次票也没用，根本不可能改变某种政策决策结果】，而不是心怀怨言、鼓噪喧嚣、甚至图谋用非法手段推翻既定政策法律结果呢？

本书必须在这里清晰地、大声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正是民主制度本身的生死成败之关键所在。

如果在社会中的千千万万个“我”，在各种不同的民主决策结果面前，都忿忿不平地面对上述困境【例如，有的人是在医疗决策结果上，非常不满；有的人是在教育政策决策结果上，充满愤怒；等等】；那么，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就一定没有和平、平安和幸福；在这样的人民之中，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失败。

请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各种具体政策决策结果本身，就公义、平等、公正而言，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人们心中的各种怨言、不满、甚至愤怒本身，并不一定是没有道理的，并不一定是不对、不合理的。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关键问题是，虽然有这样许多的、甚至看似很严重的不合理之处，虽然有这样许多的、看似合理的不满之处，但是，——民主制度本身怎样才能够，保持稳定、和平、长治久安，而不是被动辄轻易推翻、政权总是处于动荡更替的无序混乱之中？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民主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有限性，如果我们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上述问题，应当怎样面对上述困境，那么，——我们国家社会中的民主制度就必然不会成功，就必然会跌入无政府主义混乱之中，并必然最终被专制主义所取代；我们就必然无法挣脱专制主义的欺骗、愚民、诡计、邪恶、与枷锁。

____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在各样的复杂政治角力过程中，在人民群众中间，如果没有一种深挚真诚的、敬虔热忱的、谦卑虚己的、以对于造物主上帝之敬拜为中心的信仰，——来调和、引领、协调民主决策过程，并在民主过程中起到根基性的作用，——那么，从几个世纪以上的长远眼光来看，所谓民主制度就一定会面临失败，跌入无政府主义混乱，并被专制主义取代。

基督教信仰对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成功，具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当人们以那属天的国度为心灵的归依，以造物主上帝自己为心灵归依的时候，那么，——就会在生命品格中有以下重要特征。一方面，这样的人会积极热心地投身于公共事务的讨论、投票、决策过程之中，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冷眼旁观。另一方面，当民主决策的结果是违背自己的愿望和观念的时候，这样的人并不会要死要活，以为自己是绝望的；——因为，他内心的倚靠，从终极的、根本的层面而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天上，在那上帝永恒的国度里。

最重要的是，在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信仰中，人们不会把自己当作是世界的中心，更不会颐指气使地把自己当作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甚至要“替天行道”、唯我独尊等等；而是，在内心深处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心灵深处一定是真正谦卑的，因为他的心灵之锚，他的一切盼望与期待，究其根本层面而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那永恒的天上国度里。正是因此，他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既勤勉地生活、一丝不苟地努力去做好一切所当行之事，以热忱的心灵和情感，去面对一切世事和世人；但同时，他并不以这个世界为依归，而是把心灵的眼目单单地瞩目于那天上的国度，就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盼望所在。这一点，正是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中马丁路德、加尔文以及无数英国清教徒们、和过去漫长历史中一代又一代无数敬虔基督徒们的深挚信仰和坚定信念。这种信仰和信念用一句简单的英文总结就是：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意思就是，勤勉热诚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以这个世界为归依。

正是这样的以圣经为核心、为根基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导致了现代民主主义革命的诞生。正是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能够使得民主制度在一

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稳定地、平安地、和平地持续下去，并使得其中的人民看见世事真理、享有幸福。

正是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使得无数人们以敬虔的心去顺服“在上掌权者”、顺服于世上的法律体系、政权秩序、决策过程；使得人民群众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无论决策结果是否如己所愿，都能够和平地彼此相处。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基督徒们在关于各项公共政策事务的协商与决议过程中，会主动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会为了公共的利益而努力地献计献策；但是，若自己的一些主张和意见建议没有得到全体社会的采纳，那么，基督徒们的心里仍然是有平安的，因为他们在心灵深处的盼望与归依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
+++

【【【引述 圣思录 顺服在上掌权者】】】

《顺服掌权者》：
凡 人 所 当 得 的 ， 就 给 他 。 当 得 粮 的 ， 给 他 纳 粮 。 当 得 税 的 ， 给 他 上 税 。 当 惧 怕 的 ， 惧 怕 他 。 当 恭 敬 的 ， 恭 敬 他 （罗13）
【第一部分】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人。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因 为 他 是 神 的 用 人 ， 是 与 你 有 益 的 。 你

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13:5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13:6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13: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3: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1）正义是什么？正义的源头在哪里呢？正义是来自这个世界的吗？我们又应当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寻求正义呢？在这个世上能够得到完全的、真正的正义吗？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2）这世上有多少罪恶，是在伸张正义的借口之下发生的。有多少人，看见不平，拍案而起；但是，他们却不过是在用一种罪恶来代替另一种不义。

许多人，想要伸张正义，但是他们的心中，却不过是在自以为义。

许多人，口中喊着替天行道（这话本身就是对神的亵渎），心里面热乎乎地热血沸腾；但是，他们心中，却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狂傲之心。他们内心的罪恶和污秽，遮盖在光辉理想的旗帜之下。

（3）敬畏耶和华，是人智慧的开端。

在人们口中，无论是哪种所谓的正义，无论是哪种情境；如果，在人的心中没有对永生真神的敬畏，没有对神的圣洁、公义、主权、主宰、创造、救恩、恩慈的敬畏，没有人内心中发自心底的真正谦卑，没有摒弃自己心

中的固执、愚顽、刚硬，那么，在人们中间的任何所谓“正义”都是枉然。
人们所谓的革命，造反，战争，斗争，等等，都不过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的野心、贪婪、罪恶、欺谎、虚空、狡诈、诡计、虚荣、负气、情仇、自义所充斥着、包裹着、裹胁着、淘汰之下的恶性循环。
那么，又该怎样呢？敬畏耶和华，是人智慧的开端。顺服在上掌权者。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退后，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使自己的生活圣洁；以爱对待人；祈求神，不乞求人；敬畏神；对掌权者应当恭敬而惧怕，但是，不要在灵里畏惧人；倚靠神，而不要倚靠人；活出基督的圣洁生命与爱，作基督救恩的见证；以彻底地的谦卑和爱，来对待所有的人，包括在上掌权者。
【第二部分】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3: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这是人应当如何在世上立足、与人相处的一个基本原则。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第三部分】13:11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13: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13:13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13: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我们真正的正义和公义，应该到哪里去寻求？是在那些“在上掌权者”那里吗？也是，也不是。关键是，我们的源头、归宿和倚靠，应该是在何处。
我们应当以这世界为我们的源头、归宿和倚靠吗？不，决不是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

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11:13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1:14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11:15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11: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们在这世上，都是作寄居、作客旅的。这世界不是我们最终的家。坟墓更绝不是我们的归宿。以这世界为家的人，想要在这世上找到终极的公正；可是，他们无论是贫是富，无论是渺小还是伟大，都只能是品尝到真正的失望、眼泪、痛苦、无奈、疾病、衰残和死亡的滋味。在这世界中寻找正义的归宿的人，必然要空手失望而回。更何况：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又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

我们更应当警醒自己，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13:13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13: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只有当有了倚靠神的信、圣洁的生命、基督的救恩时，才能够在这世上真正地见证出神的爱、公义和圣洁。

+++

在这世上的主要宗教信仰中，除了以圣经为中心、核心根基的基督教信仰

体系之外，还有以可兰经为中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以及以系列佛经为中心的佛教信仰体系。此外，还有具有一般泛神主义特征的印度教信仰。

那么，除了基督教信仰以外，其它的那些宗教信仰体系，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为什么现代民主主义制度没有原发性地起源于它们所产生的文化土壤中，而是在来自西方外力的影响下，才开始实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呢？【甚至，在今天的中东世界，在许多强烈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民主之路仍然非常遥远。】

在伊斯兰教信仰中，虽然也是对于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天的敬拜，但是，却有着强烈的政教合一、排他主义的色彩。在伊斯兰教中，是典型的"因行为称义"的教义，即，一个人的信仰是否敬虔，要通过外在的许许多多繁文缛节的规条，例如禁食、每日定时祈祷、不吃猪肉、等等无数的规矩，来体现。一个人是否算作是真主阿拉面前可被接纳的信徒，要看其行为是否满足那些繁文缛节的规条，甚至是否愿意成为一名圣战士，等等。伊斯兰教的重要主旨，是在地上按照可兰经的律法规条建立起伊斯兰国。伊斯兰教教义的核心是在于，人必须在行为上遵从和顺服阿拉、以及其最大先知穆罕默德的话语。这种"因行为称义"的教义，会两个严重的致命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在内心和良知中真正是诚实的，就一定无法否认自己心中的罪性，无法否认自己所曾经说过的谎话、自己心中曾经的不义的愤怒以及嫉妒、自己对于他人所属之物的贪恋、自己所曾经做过的错事，等等。任何一个百分之一百诚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无法"因行为称义"的。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因行为称义"的教义，一定会导致人在内心中自高、自傲、自义，并会论断他人、俾倪他人，从而导致和加剧——而不是消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上述“因行为称义”的特征，在其他宗教信仰体系中，例如佛教和印度教中，也很普遍，但在伊斯兰教中尤其明显。事实上，伊斯兰教所导致的文化土壤，从其当年所开始建立时的火与剑的时期，一直到今天，都始终常常贯穿着戾气、冲突、矛盾；以伊斯兰教为主的社会中，往往是专制主义、或是万马齐喑、而没有生机勃勃、热忱、勤勉而自由的状态。

佛教信仰的教义，与印度教特征一样，都是属于泛神主义宗教信仰体系。在这样的宗教体系中，并没有【——甚至直接否认——】：在这个世界之上的那样一位无限全能、全知、至善至美、公义圣洁、慈爱恩典的造物主、上天、上帝、永生真神。因此，佛教信仰与印度教信仰都具有泛神主义的一般特征，即，它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是悲观的；在它们的眼中，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虚无、虚空、虚浮、虚幻的，人生的本质是苦的；通向幸福的道路，就是出世，就是看穿世事与人生的虚无，放下执着，以“舍得”的人生态度，来面对一切。换言之，它们看不到这个世界的浩大、瑰丽、奇妙、精确、秩序、等等，是出于上帝的无限智慧、设计、和伟大创造；它们更看不到在人的生命与心灵中，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在它们看来，世界就如同荒芜、默然、没有生气的沙漠、旷野、荒地；人生就如同荒诞而荒谬的一场戏。在它们的体系中，看不到道德法则的绝对意义、隽永价值与永恒根基，看不到生命的本质含义与指向永远的真正价值在于什么。它们更看不到“罪”的本质根源所在，以及怎样除去罪的根本途径【罪，不仅在于外在的言语行为，更在于人内心的自傲自义，在于人对于造物主、上天的背离，在于对良知中道德法则的悖逆】。它们所看见的世事人生，是空的、苦的，但它们看不见罪的本质。它们的敬拜体系中充满了人手所造的金、银、石、木的偶像。它们的教义中有许多关于超自然世界的烦冗的、人为臆想的“知识”，充满了人对于自己悟道与修行过程的倚靠和自傲之

心，但却看不见“义”的本质和源泉所在。

在一个佛教或印度教所影响下而产生的文化土壤中，人们往往在心中、在关乎世事上没有执着、认真、奋进、殚精竭虑的态度，而是凡事看空、放下、舍得、反对执著。在这样的土壤中，人们并没有对于道德之罪的同仇敌忾的心理，并没有对于世事人生的热忱、对于公义的执著向往和锲而不舍的追求。当在西方外力作用影响下【甚至是在西方外力的胁迫下（如日本等地），或是保护下（如台湾、韩国、泰国等地）与促进下（如缅甸印度等地）】，它们的文化土壤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实行民主制度，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来，它们一定很难于发挥持之以恒的奋进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执著态度。

在中国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中，贯穿着下级服从上级等等三纲五常的伦理。在这种伦理体系下，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拥有极高的人身权威。儒家思想中强调，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以此世为中心的国家社会秩序伦常观念。然而，这种文化土壤所导致的是，人们在人身依附上、社会权势与权力分配上，在生命与人格上，都围绕着权力分配、追逐权力、争夺权力、依附权力等等生活方式为中心。在这种思想伦理体系中，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究其本质而言，人与人不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分成两类，所谓君子和小人。甚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儒家思想的这种文化土壤的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民主制度的今天，在中国却仍然没有开始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甚至，今天的中国距离一个稳定、成熟、现代、先进、发达的民主制度，还非常非常遥远。即使有一天，中国开始在表面上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很有可能会如同70年前一样，是虚假的挂羊头卖狗肉，或是如同100年前一样，是动荡混乱、喧嚣躁乱、纷争不

断的局面。

++

____

反帝、反封建、等等；三座大山；中华民族在反对什么

在中国共产党多年的政治宣传中，三座大山是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与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中国政权的一个主要口号就是，要彻底地推翻这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铁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新民主主义”，不过是“民主集中制”的代名词；而所谓“民主集中制”，不过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代名词。【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很少有像1949年以后的时期这样，国家统治机器拥有着如此巨大的、几乎是无远弗界的权力，统治着亿万人民生命中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在漫长的七十多年历史中，全体中国百姓如同奴隶一样生活在铁拳统治之下、生活在金字塔式多层级国家权力框架之下，言论、思想、经济、生活、等等都处于严重的桎梏和管控状态之中。】

在中共关于反对三座大山的政治宣传中，的确包含着一些合理的、能够符合人良知的内容与事实。例如，诸如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列强国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中国自身历史中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集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伤害；横行于中国的各种官僚买办集团中，充满了许多不公不义之事。

但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政经发展历史，清晰地向我们显明了，反对三座大山的确是正确的；——但是，这远非是真理的全部。

因为，这样的立场，并没有看到西方文明中良好优秀的成分、以及原因；——没有看到现代经济与民主制度的精髓、机理、根源、本质、法则、等等深刻层面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立场，并没有看到——普遍地存在于任何世人心中、生命中、灵魂深处的罪；以及，信仰的真理究竟应当是什么。

+++

【引述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下）》

虽然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影响如此广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简单地当成了基督教信仰本身，或者，如果我们简单地仅仅把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划等号，那么，我们就犯下了严重的、望文生义、不认真负责、偏离事实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近三百年来，虽然有很多好的事情，比如现代科技革命的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民主自由制度、法治、自由经济、平等贸易、社会大分工协作、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无数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发明，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也有很多坏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神论主义、进化论哲学、性解放、放荡主义、离婚泛滥、家庭破碎、甚至同性恋等等，也都是来自西方。

显然，如果我们刨根问底、认真查考、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明白，西方世界绝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人也绝非全都是纯洁无辜的、敬虔谦卑的圣徒。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

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有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事实上，即使我们撇开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哲学史等历史领域的角度不谈，单单从宗教信仰、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西方文明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甚至分裂的、内部景况；——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了，西方文明体系绝非简单地、直接地等于基督教信仰本身。

++

——————————————————————————————————————

什么是民主，民主的长处与局限

民主的机制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以及原则，例如君主立宪制、（立法、行政、法院）三权分立、选举制度、任期制度等等。但究其实质，民主的精髓就是在于，人民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长处是，杜绝寡头政治、防止独裁专制、反对少数暴政、等等。

然而，请注意，所谓民主政治制度，并非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详情请见《论民主》】。这是因为，民主制度本身，其实并不能保证民主决策的结果就一定是公义、平等、正义的。多数暴政、不公不义、欺压之事、逼迫之事、甚至战争等等，仍然会在民主制度的国家中不断地发生，甚至成为主导国家政治局面的主要因素。

在人类历史的实践中，无论是法国大革命的喧嚣、混乱、暴戾，还是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德国所谓民主，或是沙俄统治下的所谓君主立宪改革，或是现代俄罗斯政治体系中的、苏联解体以后的、普京统治下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都清晰地显明了，民主政治制度本身，绝非是解决人类社会一切政治问题的万灵药。

事实上，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罗马共和国、以及希腊城邦政体】，在许许多多的国家政治实践中，所谓民主政治实践，最后往往都会通向喧嚣混乱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万马齐喑的专制主义。

关乎民主政治之成功的生死攸关的因素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够彼此尊敬、公义地相互对待，是否能够彼此包容、恩慈、正义地相处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的公义、圣洁、恩慈的关系，必须首先建基于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于上天的敬畏、信仰、寻求与倚靠。

【引述 圣经 弥迦书6章】

弥迦书.
6.
你们当听耶和华所说的话："你要起来，向大山争辩，让小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
大山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争辩。大地永久的根基啊！你们要听，因为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争辩，和以色列争论。
我的子民啊，我向你作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叫你厌烦呢？你可以回答我。
我曾经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把你从为奴之家赎出来；我也差派了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
我的民哪！你们要追念，摩押王巴勒图谋过什么，比珥的儿子巴兰又答应了他什么，以及你们从什亭到吉甲所发生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的　神面前叩拜，当献上什么呢？我朝见他的时候，当献上燔祭，当献上一岁的牛犊吗？

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为我的过犯，我可以献上我的长子吗？为我的罪恶，献上我亲生的孩子吗？

世人哪！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　神同行。

听啊！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敬畏你的名就是智慧；支派和城里的会众啊！你们要听。

我怎能忘记恶人家中的不义之财，和那些可咒诅的小升斗呢？

用不义的天平，和袋中诈骗的法码的人，我怎能算他为清洁呢？

城里的财主充满了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假话；他们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

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生病，因你的罪恶，使你荒凉。

你要吃，却吃不饱；因你的腹中常有疾病。你要怀孕，却不能生下来；你生下来的，我都要交给刀剑。

你要撒种，却不得收割，你要榨橄榄油，却不得油抹身；你要榨葡萄汁，却不得酒喝。

你跟随了暗利的规例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了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你”原文作“她”）的居民被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

____

什么是科学，科学的长处与局限

++

+++
+++
+++
+++
+++
+++
+++
+++
+++
+++
+++
+++
+++
+++
+++

【引述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上）》】

科学的来源

在十六世纪以前，虽然人类中间也曾有许多重要的、基础性的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但是，这些古代科学技术发明都仅仅是零散的、零星的、个别的、支离破碎的事件，而不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层面的、大规模的、爆炸性的科学革命与发展。

并且，在十六世纪以前，世人往往沉浸在主观臆想的世界观体系中，而并不真正地重视任何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工作与思想。（至于为什么会如此，我们也会在本书的后面进行深入的讨论。）

起源于十七世纪的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分水岭是，在现代科学背后有一整套深思熟虑的科学思想与方法论。这些深刻的科学思想与方法论，以及哲学层面的思考与思辨，是来自于何处的呢？

我们在本书中将要阐释，这些科学思想与方法论方面的深思熟虑，以及哲学方面的思考与思辨，正是因着圣经的深刻影响而导致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那些现代科学开创者们的生平著作，回顾那些现代科学之父们的苦苦思索，就能够清晰地、轻易地看见这个结论。在本书的后面，我们会向读者详细地阐述有关方面的内容。从这个结论中，我们会深刻地认识到，若没有基督教信仰，若没有圣经的广泛印刷、发行与传播，那么，就不会有现代科学在思想层面的开启与革命。

简单地说，现代科学的开启，正是被这样一群笃信宇宙世界是出于那样一位无限大能而智慧的造物主之手所创造的基督徒思想家们所推动的。正是由于他们在信仰上的、对于上帝的坚定信靠，才使得他们坚信，这个宇宙世界虽然看似纷繁复杂，但是，在世界之上，却一定有着简洁美丽的、井井有条的秩序；并且，这样的规律与秩序一定是普遍的、一致的、遍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狂躁不羁地变化的。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这样一种系统化地建立知识、并对于知识进行组织和分类的方式；这种方式所得到的知识，是可以被检测的、是可以理性地解释的、是能够对于宇宙自然事物进行预测的。

正如一位著名科学家所说的："这个世界最不可思议之处，就是在于，它是可以思议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以科学性的、系统性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这个自然世界，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是出于造物主的无限大能的、智慧的设计与创造，而不是像一个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的垃圾堆一样。

科学的局限

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广泛影响早已经深入人心。科学系统观念的开启与发展，带来了技术与工程的不断更新与革命，并进而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每一个角落。今天，每一个早晨吃牛奶面包、坐地铁汽车出门、穿西服革履在高楼大厦上班的人，每一个在宜人的田野别墅生活的人，每一个享受着现代化科学技术果实的人，都应当深深地感谢科学，尤其深深地感谢那些现代科学的开启者们，因为若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现代化的富足生活与环境条件。

但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究其本质而言，科学并非是万能的，也不可能回答所有领域内的所有问题。在本质层面上，科学有着自身固有的一些局限。例如，这些局限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并不能研究那些在本质上属于一次性的事件。在本质层面上，由于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可重复、可检测、可分析、可观察、可测量的现象和事件，那么对于那些在这个世界上就其本质是属于一次性的事件，科学就无能为力。例如，关于这个世界的终极性起源，神迹，以及这个世界的终极性结局、归宿，科学是无法做出任何可验证的、可检测的分析与判断的。这并非是因为科学家的能力有限，而是因为科学就其根本定义而言，无法触及到那些在本质上属于一次性领域的问题。

第二，科学并不能回答关于（终极）意义的问题。就其深刻涵义而言，所谓（终极）意义就是指，一件事情的终极性目的与价值。在实用层面上，科学可以描述一个现象、事件、对象等等的机理、运作过程和机制，但是，科学却无法指出那个现象、事件、对象等等的本质性意义、终极性目的与价值。举一个不是非常恰当的简单例子，例如，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麦克风，那么，说话的声音就会被麦克风转变为计算机系统能够读取的数字信号；这些数字信号可以在计算机系统屏幕上显示出语音的波形图，看起来就有点类似于心电图那样的图形；并且，计算机系统可以根据固有的算法，把所说的语言转变成文字，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等等。然而，就其本质而言，麦克风记录的那些语音波形图的背后，仅仅是一连串冰冷的数字、符号、数值；而在那语言中所包含的深刻爱情、涵义、价值、意义、信仰、等等，却是科学所无法触及的。无论一个科学多么复杂、多么先进、多么高深，它都无法面对关于终极意义这样的问题。

第三，科学无法回答那些在这个世界上无法看见、或是无法以可见的方式来验证、重演、展现的一般性问题。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关乎信仰领域的

问题，是超越生死的问题，是在本质上属于超自然性质的问题；例如，人的生命来自于何处，死亡是否就是人生命的终点，永生是什么，等等。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些关乎信仰领域的问题，虽然是科学无法研究、无法展现、无法验证、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却并非是人无法用理性思考、无法知道真假的问题。在关乎超自然性质的问题上，虽然我们的思想与理性在本质上是有限的，但是，当上帝的启示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的良知就能够在上帝的启示面前，谦卑而诚实地明晓、认识到上帝所启示和显明的真理。关于信仰的真理、信仰的真实性问题等等，我们建议读者可以查考许多基督教信仰的护教学书籍，例如《基督教的证据》《基督教之大众证据》等书籍；本书就不在这里过多地赘述。

第四，科学无法回答关于永远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称为美好，又将永生（永远）放在人的心中。"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人们虽然没有看见过"永远"，但是，在所有人的心中，都知道、明白关于"永远"这样的概念。在人类所有的语言和文字中，都有像"永远"这样的词汇。这正如中国诗人李白所写的名句："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可是，关于"永远"的事情，却是科学所无法研究的。在科学的领域内，既无法测量、分析、观察"永远"，也无法对之进行展现、实验、操作、掌控等等工作。

类似于上述的科学局限性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就不在这里深入展开详谈。例如，科学无法回答关于"我"的问题——"我"是谁？"我"是什么？我们的自我认知究竟来自于哪里？我们的自由意志究竟是什么样的能力？我们真的能够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决定是否举手、是否抬足吗？亦或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举手抬足等等行为，仅仅是一些分子、原子在死板的物理定律作用下、电磁场力等物理力的作用下，而进行的一些没有自由、

没有选择、我们所无法掌控的过程的结果？我们生命的本质意义在于什么？——还有：世界的本源（导因、意义、方向、目标等）是什么？道德的本源是什么？价值的基准在于什么？信仰的真理在于什么？——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科学所无法直接回答的问题。

我们怎么知道客观世界是真实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看见、听见、触摸到、闻到、感受到的一切事情，不是我们的感官系统在欺骗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体会和经历的一切，不是像庄周梦蝶那样、仅仅是一场春秋大梦而已？庄子做梦变成了蝴蝶，一觉醒来，以至于不知道哪一个世界是真实的、哪一个是虚幻的；不知道自己的此世生命，是否仅仅是蝴蝶做梦变成了自己的梦境而已。

事实上，我们如果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去思想科学的本质，就会立刻认识到，科学必须建立在一些重要的、极其深刻的、隐含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些前提假设包括：——我们必须相信和承认，这个世界有着内在性的、普遍的、一致的、连续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换言之，这个世界不是杂乱无章的，不是躁乱地、毫无规律可循地变化的，而是秩序的、明确的、可理解的、可以用理性来认知的。例如，为什么位于一个地点位置的分子或原子，要和另外一个遥远距离之外的地点位置的分子或原子，遵循同样的规律、甚至通过遥远的空间而彼此互相之间具有力的作用与反作用？对于这样的问题的本质性回答，只可能是，这个浩大的世界是出于那位无限大能的造物主的创造，并且，这世界随时随刻地在造物主的掌管之下。如果离开了这样的假设前提、深刻信仰，那么，人就无法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本书后文所将要阐明的，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够被开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现代科学开启者们、那些敬虔的基督徒思想家们，在现代科学体系被真正开启之前，就已经深刻地、深思熟虑地认识到，科学能够研究什么，科学不能够研究什么，科学的目的是什么，科学的局限在哪里，等等。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若想要做好一件事情，往往应当首先（相对而言）清楚地知道，该事情的方向、目标、界限、局限等等；这样，在开始做事情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在什么领域和范围内专心致志，并知道进退、行止；这样，才能够真正把那件事情做好。现代科学的开启，正是如此。在十七世纪之前的数千年中，在人类的历史上，无数哲人、思想家、文士们，试图思考我们的人生与这个世界；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往往沉浸于那些主观臆想的论题、形而上的玄学中；他们试图以臆想的概念，去思索生命的本质、心灵的归依；然而，他们并不能凭“智慧”认识神；他们所作的，只是费尽心力失去了神。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些现代科学之父们，正如同人类历史上那些第一个发明了车轮、门轴、窗户的人；他们虽然是不完美的，他们的知识也不是毫无瑕疵的；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是真正深邃的；他们就如同是聪明的建筑师，搭起了一个宏大的框架，使后人可以在他们的基础上添砖加瓦，盖起科学的大厦。他们思想的深邃之处正是在于，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自身的诸般能力（包括理性、智慧、认知、价值、意义等等）的局限在哪里；这正如弗兰西斯•培根在1595年的著作中所说的：——“人若不像是小孩子，就不能进入天国；同样，人若不在心思意念上像小孩子，就不能认识这个世界。”——这句话，正是出于培根在圣经中所受到的启发。

对于现代科学之所以被开启的深刻原因，我们会在本书后文中继续深入讨

论。

科学的影响

今天，科学在现代人生活中的影响如此深入而广泛，以至于无人能够否认。大到航天飞机、人造卫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小到每一个人手中的手机和汽车遥控钥匙，以及餐桌上的各样丰富食物与各种材料的用具等等，这些在我们生活中数不胜数的东西，都在展现着科学的力量。

对于现代人来说，科学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在物质生活方面。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影响深刻地体现、反映在人的思想层面上。正是因着科学，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能够认识到，那些古老的、各种各样的光怪陆离的迷信、偶像（即，世人常常把那些人手所雕刻的金像、石像、木像等等看作是有灵气的、人所应当五体投地敬拜乞求的对象）、臆想、愚昧观念等等是错误的。

____

一个例子

例如，在今天的世界里，不论是在哪一个国家、文化、民族中，所有的初中生都要学习牛顿运动定律。

1687年，牛顿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部开启现代科学体系之里程碑的著作中，牛顿陈述了几个重要的基本运动定律。这被后人称为牛顿三大运动定律。

牛顿第一定律是指，任何物体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在这个著名的惯性定律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深刻的世界观：即，这个物质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死”的；它并没有原发性的本质能力；换言之，那种万物有灵的世界观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推论说，人生命的盼望、价值、终极意义，不在这个世界里面，而是在那属天的、属灵的、永恒的上帝国度之中。】

牛顿第二定律是指，任何物体在受到外力作用下，其加速度与所受的外力成数学意义上的正比关系。【在这个著名的加速度定律背后，同样隐含着这样一种深刻的世界观：这个世界的本质与人的心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关系；在这个世界的本质之中，包含着重要的、只有人才能够明白和掌握的数学性质与原理；换言之，在造物主与人之间，有着一种极其深刻而特殊的关系：——理性、数理、逻辑等等，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才能够有的能力。】

牛顿第三定律是指，任何物体在受到作用力的同时，也会以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反作用于施力方。【在这个著名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里面，隐含着这样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是地位均等的被造之物；并没有什么地点、物体，具有与其他地点、物体不同的特殊性和特

殊地位；换言之，在造物主之下的自然世界中，一切事物、人、东西都是来自于那造物主的创造与智慧设计，因而都是彼此在本质层面上平等的。】

（引述百度百科）——牛顿三大定律：牛顿运动定律包括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和牛顿第三运动定律三条定律，由艾萨克·牛顿在1687年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总结提出。其中，第一定律说明了力的含义：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第二定律指出了力的作用效果：力使物体获得加速度；第三定律揭示出力的本质：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牛顿运动定律中的各定律互相独立，且内在逻辑符合自洽一致性。其适用范围是经典力学范围，适用条件是质点、惯性参考系以及宏观、低速运动问题。牛顿运动定律阐释了牛顿力学的完整体系，阐述了经典力学中基本的运动规律，在各领域上应用广泛。

____

科学的影响，打破了世上的那些偶像假神、愚昧迷信，打破了世上的那些盲目的宗教信仰体系，促使人以理性、诚实和认真谦卑的态度，深思自己的信仰。无论是那些在日本靖国神社门前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升学、娶妻、生子的日本百姓，还是印度庙里那些向偶像与牲畜跪拜的印度教徒，亦或是那些闭关灵修、想要大彻大悟的佛教徒，亦或是在非洲原始宗教中敬拜各样被造之物的愚昧迷信者，如果他们是内心诚实的，那么，在科学的影响面前，他们都不得不在内心深处反思自己的所谓信仰，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真理。

科学的影响，打破了古代各样人类传统中偶像的风俗、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以及迷信愚昧的、怪力乱神的、所谓“到处拜拜的”、民间宗教信仰传统。从根本上说，科学的影响，在人们的思想层面带来了两个可能的后果。第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人们误以为，在这个世界之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灵，也根本就没有什么造物主；一切物质现象、事件、过程，都仅仅是在物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而已。第二个可能的后果就是，人们摒弃那些怪力乱神的偶像、自然神主义、泛神主义、多神主义，而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之上，有、且仅有一位神（否则，世界就不会如此秩序、和谐、并且有着无远弗届的规律），就是那无限大能的、超乎一切之上的、圣洁公义的永生之神；人生的真正意义与盼望，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够真正寻找到。

在上述两个后果中，前者是肤浅的、盲目的，是没有经过深思、没有谦卑思索的结果。（一个简单的反驳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的认知、意识、“自我”，来自于何处？我们的自由意志来自于何处？） 后者是任何一个诚实而谦卑的人，都必会得出的结论。在本书的后文中，在关乎现代科学之意义与起源的讨论中，我们将要继续深入思考这个话题。

++
++

++
++

++
++

++

+++

+++

+++

+++

+++

+++

+++

+++

+++

____

真正的信仰应当是什么；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民主、科学、人生、等等之间的关系

【引述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序言】

信仰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认识、热爱、敬畏我们的造物主、神，并在我们一切的事情、行动和交谈中以热忱的情感仰望他，遵守他的诫命（传12：13）；无疑地，这才是一个人的全部意义；这是一个人的全部价值所在。在《传道书》中的许多讲述之后，得出的最后结论，就在于此；所以，我也把这个原则当作是整件事情的根本基础。一般性地，这是对一切人类所必需的；这世上如果没有信仰，那么，人的荣耀也就无处得以保守；人类社会的秩序也根本无法得以保持。具体地，对我们每一个人来

说，我们也必需要有敬虔的信仰；否则，我们就无以回应我们受造的目的所在，无以回应我们造物主对我们的恩惠，我们的内心也不会安稳轻省，更永远也不会有幸福。一个人，被造物主赐予了心灵和理解的能力，能够明晓、服事、享受自己的造物主；但是，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眼目和心中却全然忘记了神，那么，他就是日光之下的一只最可鄙、最可悲的动物。

【引述 圣经 约翰福音 耶稣基督的话语】

上帝之国

约翰福音18章36-38节：

36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作战，使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不过，我的国不是这世上的。"37于是彼拉多问他："那么，你是王吗？"耶稣说："我是王，你已经说了。我要为真理作见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38彼拉多问他："真理是甚么？"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基督在接下来的回答中，对彼拉多的前一个问题，即"你是王吗"作了更完全和直接的回答，解释在什么意义上他是王，但不是在任何方面危及罗马政府的王，不是一位世俗的王，因为他的利益不是用世俗的方法支持，约

18:36。请留意，

[1.] 对基督的国的本质与构成的叙述：它不属这世界。这是用否定的说法纠正当前人对它的错误看法；但这隐含了肯定的事，它是天国， 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基督是一位君王，有一个国，但这国它不属这世界。第一，它不是从这世界兴起；人的国从海里从地中上来（但7:3；启13:1,11）；但圣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启21:2。他的国不是通过继承，选举或征服而立，而是藉着神旨意和计划直接和特别任命。第二，它的本质不是属世界的；它是在一个在人心里的国（路17:21），建立在他们心里和良心里（罗14:17），它的财富是属灵的，它的能力是属灵的，它一切的荣耀在于内。基督国中的国务大臣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林前2:12,。第三，守卫和支持它的不是这世上的；它的兵器是属灵的，它不需要、也不使用世俗的势力来维持和扩展，也不是用与列王和各省有害的方法治国；它丝毫不干预君王的特权或他们臣民的财产；它不是为了改变在世俗之事方面任何国家的建制，除了罪和撒但的国以外，不与任何国作对。第四，它的趋势和目的不是这世上的。基督不追求，也不容他的门徒追求地上的尊贵人的排场和权柄。第五，它的臣民虽然在这世上，却不属世界；他们从世界中蒙召被拣选，从另一个世界生，往另一个世界去；他们既不是这世界的学生，也不是它的宠儿，既不受这世界智慧的规管，也不因这世界的财富致富。

[2.] 提出基督的国属灵本质的一个证据。如果他要反抗政府，他就会用他们自己的武器反对他们，就会按同样性质以暴制暴；但是他没有走这条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我的国被他们败坏。"但是，第一，跟从他的人没有提出要争战；没有暴动，没有拯救他的企图，虽然此时城里满了加利利人，他的朋友和同乡，一般他们都有武装；但在这重大时刻他门徒和平的表现足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第二，他没有命令他们争战；并且他禁止他们争战，这证明他既不依靠世界的帮助（因他本可以传召十二营天使为他服务，这表明他的国是从上头来的），也不惧怕世界的拦阻，因为他非常愿意被交给犹太人，因为他知道，他的国要是推进和建立，任何世上的国

就会如何被毁；所以他正当地得出结论，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在这世界，但不属这世界。

(5.）他回答彼拉多进一步的提问，就更直接加以回答，约18:37，我们在当中看到，[1.] 彼拉多直截了当的问题："这样，你是王吗？你说你有一个国；到底你是谁，你是王吗？对这样的宣告，你有什么说法？你自己解释吧。"[2.] 作为对此的回答，我们的主耶稣在本丢彼拉多面前作美好见证（提前6:13）："你说我是王，就是，按你说的，我是王；因为我来给真理作见证。"第一，他承认自己是王，但不是按照彼拉多所指的意思。弥赛亚是按照王，弥赛亚王的身份受人期待；所以，他向该亚法承认了他是基督，就不会面对彼拉多，不承认他是王，免得他似乎自己前后不一。请注意，虽然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但即使这样，他仍有充分根据宣告拥有王的尊荣与权柄。第二，他解释自己的话，表明他如何是王，就是他来给真理作见证；他通过真理的大能在人心中作王。如果他要宣告自己是世上的王，他就会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作万民的王，征服诸王，占有诸国；"不是的，他来作见证，见证创造世界的神，见证反对败坏世界的罪，通过他见证的道，他建立并维护他的国。圣经预言他要作万民的见证，并且作为这样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赛 55:4。基督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世界诚实少见（赛59:15，Qui nescit dissimulare, nescit regnare — 人不能作假，就不知如何作王），而是属于真理永远作王的那世界。基督到世上来的使命，他在世上的工作，就是给真理作见证。 1. 启示真理，向世人显明关于神、他的旨意和他对人的美意，约1:18；约17:26，而没有他给真理见证，人是不可能认识这一切的。2. 证实真理，罗15:8。通过他行的神迹，他为信仰的真理，神的启示、神的完全和护理的真理，以及他的应许和约的真理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通过如此行、他是王，建立起一个国度。(1.）基督的国的根基和权柄，精义和特征，是真理，属神的真理。当他说，"我是真理"，他实际上是在说，我是王。他用真理那说服人的证据征服；他用真理命令的权柄统治，为真理，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诗 45:4。他要用他的真理信实审判万

民，诗96:13。真理是他国的权杖；他以慈绳吸引人，以向我们启示，因对他的爱被我们接受的真理吸引人；就这样他将人心意夺回顺服。他到世上来乃是光，就像日头用光线作王一样作王。(2.) 这国的臣民是属真理的人。被神的恩典从说谎人的父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所有被改变来领受真理，服从真理的权柄和影响的人，都要听基督的声音，要成为他的臣民，要相信他，真正忠心于他。每一个对真信仰有任何真认识的人，都要接受基督教信仰，他们属于他的国度；使用真理的大能，他要使他们甘心，诗90:3。所有爱真理的人，都要听基督的声音，因为除了在基督里，哪里都找不到更伟大、更美好、更确实和更甜美的诸般真理，真理和恩典由他而来，因着听基督的声音，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约壹 3:19。

(6.) 彼拉多为此向他提了一个好问题，但不等回答，约18:38。他说，"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这话，又出来。

[1.] 肯定这是一个好问题，是向一位无人比他更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发问。真理是那颗重价的珠子，人的悟性愿意并追求要得到它；因为不得到它，或至少那被认为是真理的，悟性就不能歇息。当我们查考圣经，领受神话语的事奉，这查考一定要这样询问，真理是什么呢？并带着这祈求，求你带领我进入你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 但是很多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在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中坚忍到底，或者没有足够的谦卑和真诚，在找到真理的时候领受，提后3:7。就这样，许多人面对他们自己的良心，问良心这些不可缺的问题，"我是谁？""我做了什么？"但却不花时间寻求答案。

[2.] 不肯定彼拉多问这个问题有何目的。第一，也许他说这话，就像一个开始对基督有好感，带着某种敬意看他的人那样，为要学习，希望了解在信仰和学问方面他可以进一步有的新观念，自称可以有怎样的进步。但虽然他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新的道理，就像希律希望从他那里看见一些神迹一样，但在他门口祭司们的暴徒的喧嚷和大怒，让他不得不突然中止这谈话。第二，一些人认为他是作为一名审判官说这话，进一步查问现在被带到他面前的这案情："让我看看这神秘的事，告诉我它有什么真理在其

中，这件事真实的情况。”第三，其他人认为他是讥笑着说这番话，是一个嘲笑的人：“你说到真理；你能说什么是真理吗，或者给我一个真理的定义？”就这样他取笑永远的福音，大祭司仇恨和逼迫，基督现在为此作见证和受苦的那伟大真理；他就好像喜欢讥笑所有信仰的无信仰之人那样，对双方发出嘲笑；所以基督不回答他。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但是，虽然基督不愿告诉彼拉多真理是什么，他却已经告诉了他的门徒，并且通过他们告诉了我们，约14：6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7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

++

关于“真正的信仰应当是什么；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民主、科学、人生、等等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在本书后文中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

1900-1911中国的经济发展、民生、普通百姓的生活光景

在1900年至1911年期间，一方面，中国的政治领域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史无前例的变革、满清乃至中国几千年皇家王朝历史的消亡；另一方面，对于无数中国普通百姓而言，尤其是对于中国沿海地区的百姓而言，由于经

济的蓬勃发展，生活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动荡、经历着大时代的激烈冲刷。从火柴、飞梭、印染、廉价纺织布匹、钟表、农业种子、化肥、水泥、到电报，数不胜数的西方科技如同潮水一般涌入中国，并开始进入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许多新的行业开始诞生，许多旧的行业逐渐消亡；无数普通人的生活都经历了巨大的起伏跌宕。然而，总体来说，整体社会经济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那些贯穿古代时期的、无数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状态，随着社会整体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无可置疑地逐渐减少。当然，与此同时，社会中因着许许多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与制度问题，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不平等的现象仍然随处可见，仍然是中国社会的痼疾。

——————————————————————————

西方在华租界的发展历史与利益争竞；糟泊与精华；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泥沙俱下

在1840年以前，中国政府一直是处于泱泱大国、中央帝国的心态之中。几千年来，在中国统治者眼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中国统治者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所优先考虑的因素，是自身政权的稳定、权威、权势，而不是黎民百姓的经济、贸易、物质生活水平发展等等【尽管，在四书五经的儒家思想中，也包含着勤政爱民这样的正统内容；但是，儒家非常强调君权与父权的重要性】。在1840年以前，中国政府严厉禁止任何外国人在中国居住，而且使用严格的一口通商【即，任何外贸都只能通过广州的公行进行】制度；中国政府对待贸易的态度，是严厉打压、防范、控制，而不是鼓励、促进、发展。——这种局面，也成

为了间接导致后来租界的产生与发展的因素之一。

（选自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F%E7%95%8C

概述

中国的租界制度以最早建立的上海租界为蓝本，并影响到其他租界。租界最主要的特点是内部自治管理，并不由租借国派遣总督，而是成立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担任市政、税务、警务、工务、交通、卫生、公用事业、教育、宣传等职能，兼有西方城市议会和市政厅的双重职能。
租界按照开辟和管理状况，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一国单独开辟并专管，称为“专管租界”，另一类由多国开辟和共管，称为“公共租界”。由于公共租界内的行政权分属租借各国，治权划分可能存在分歧，利于他人在租界之中进行不正当甚至是违法活动。
成因
1845年11月29日，中国上海出现了第一块租界。由于与被割让的领土不同，租界在名义上其领土仍属出租国，并且自身不具备治外法权的属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内文列明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南京条约《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即《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或称《虎门条约》）规定“……中华地方官应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

作为地方官苏松太道宫慕久依约和英国管事官签订《土地章程》。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文如下："……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旧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中还有厦门鼓浪屿租界，天津美租界（后并入英租界）、比利时租界、意大利租界、广州沙面租界等都存在中国当局主动出让外国作为租界使用的情况。就如1843年在广州，英国本想租用地块是十三行对岸河南的数十亩田地，清廷当局并无异议，然而地方乡绅"会齐四十八乡，集约二千余人"大肆反对征地，英方并无付诸暴力，同意放弃选择，所以后来直到1859年7月才正式与法国共同由清廷政府处租获沙面。

中华民国二次革命时期，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为解决革命党人在法租界进行对抗政府的活动，于1914年4月7日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一份条约如下：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可见由于内部政治等因素，中方政府不止一次自愿甚至是主动划割租界予外国，并非单纯所谓外强威逼而已。而深层次上，有认为租界是外资严重不信任资金投放地司法状况而产生的。

管治

20世纪30年代上海法租界的巡捕，其成员多来自越南，也包括不少中国人。

制度架构

租界的行政自治权限制了租让国在其区域内行使行政权，部分租界甚至还有立法权限（《中国人权发展纪录》，第一章第5节）。租界的领土主权所有国将租界视为外国管辖下的领土，不敢轻易干涉租界内部事务，更别提军队、警察开驻，因此难以对租界内的行为进行司法活动，要从租界引渡犯罪的非租界使用国公民一般就会很困难。这个特点也往往令租界成为一

些异议份子或战争时期平民的避难场所。

不过翻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又有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在1850年代，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是会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日大约有20起刑事案件，但是上海县衙门借口不识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者往往会再潜入租界继续犯罪，为此西人很不满上海衙门的审理手法。

与近代各国在北京设立的东交民巷使馆界不同的地方在于，租界是许可外国人（不仅是外交人员）进行任意不违反国籍所属国法律的活动。换言之就是租界内的活动可能有违反租借地所在国法律的行为。同等性质的还有“居留地”。

管治机构与相关队伍

在1876年以前与中国有关的所有租界条约中，外国人居留地都只有土地的租赁使用权，而没有占有权。太平天国时期，其将领李秀成曾率兵攻至上海近郊，由于太平天国早先的政治领袖杨秀清曾公开要求外国不要插手干涉太平天国的活动，被外国人解读为不支持本国势力在中国的存在，因而他们在租界组织了“洋枪队”，协同巡捕维护租界安全。原来租界没有中国人居住，由于富商逃难而入，导致租界当局借口人满为患，扩大地界；借口维护华洋杂居现象后的治安，设立员警和法庭；这些原本只属于国家机关的行政机构不断发展，并最终形成“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的中文译名）。

后来，工部局成为一个拥有军队、警员、监狱和法庭的租界行政机构，又有征税、审判、管理市政设施、教育、卫生等各项权力，成为租界事实上的政府。这套制度在上海完善后，被推广到其他口岸。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使之合法化。

中国公共租界出现了近代历史上具有警察意义的公务员——“巡捕”。巡捕的组成不仅包括租界使用国公民，印度人、越南人、中国人也有担任巡捕的纪录。巡捕以租界使用国的法律为基准，加上部分中国籍巡捕存在有针对本国公民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故而经常被当地人称为“汉奸”、“走狗”

等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称呼。

影响

租界一般分布在沿海、沿河等通商口岸或便于贸易活动的城市中，换言之就是外国资本主义能够进行经济活动的地点。由于租界的特点，外国人多愿意在租界投资办厂或从事贸易活动，此外也建立教堂进行传教、开办具有本国特点的学校、医院、坟墓等附属设施。因而租界的经济文化繁荣程度往往远高于其周围的地区，依照城市发展的方式，自然而然的成为该城市的商业中心，并以租界为中心向外慢慢扩张，为城市留下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浓厚的外国特色。并成为拉动城市部分相关行业发展的契机。对于相当多曾经是通商口岸的城市而言，其城市的几何中心一般都有租界的影子，可见租界对部分城市区位因素的影响。

租界的法治清明亦直接促进大清施行司法改革。当年西人向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满清政府启动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酷刑，并初步建立大清国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框架。

历史

现在租界由于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及作用，被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特有的。历史上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印度、伊朗均有租界的存在。中国上海第一块租界也于1845年11月29日由宫慕久以道台名义和告示形式公布《上海租地章程》后出现。

在中国设立的租界

历史上中国租界内的商务活动为拉动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刺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传播近代民主、科学文化，提供宗教信仰和政治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部分租界内共公设施完善，治安相对平稳，为部分政治流亡者提供庇护，如鲁迅就曾在租界生活过，并影响了他的政治观念。其《且介亭杂文》的"且介"二字就来自于"租界"两字。租界繁荣的经济发展，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中国上游阶层，在那里定居，消费。上海正因其繁荣的租界，被时人称为"十里洋场"，并很快成为中国各地租界的代名词。

1845年11月15日，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签定《上海租地章程》，成为中国第一个合法租界。这份章程是上海道台主动向英国领事提议，将黄埔江河滩上无人居住的土地，租借给英国，让英国侨民居住。

各国在华租界数目

中国自1845年英国从《上海租界章程规定》中取得第一块租界，至1902年奥匈帝国设立天津租界，曾出现过25个专管租界和2个公共租界。后经合并，至清末，中国共有22个专管租界和2个公共租界。

各国在华租界分布：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7处，后减为6处：

上海英租界（后与上海美租界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

厦门英租界

天津英租界

镇江英租界

汉口英租界

九江英租界

广州英租界

另有未建成5处：

营口英租界

江宁英租界

宜昌英租界

芜湖英租界

温州英租界

大日本帝国　5处：

苏州日租界

杭州日租界

天津日租界

汉口日租界

重庆日租界

另有未建成4处：

沙市日租界

福州日租界

厦门日租界

营口日租界

法兰西共和国　4处：

上海法租界

天津法租界

广州法租界

汉口法租界

另有未建成2处：

烟台法租界

江宁法租界

美利坚合众国　2处，后减为0处

上海美租界（后与上海英租界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

天津美租界（先归还清政府，后并入英租界）

另有未建成1处：

温州美租界

德意志帝国　2处：

汉口德租界

天津德租界

俄罗斯帝国　2处：

汉口俄租界

天津俄租界

意大利王国　1处：

天津意租界

奥匈帝国　1处：

天津奥租界

比利时殖民帝国　1处：

天津比租界

公共租界　2处：

上海公共租界（由英美租界合并而成）

鼓浪屿公共地界（英、美、德、法、西、日、丹麦、荷兰、瑞典-挪威联合王国）

以下是部分租界收回的时间表：

1917年，中国参加欧战协约国，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收回了汉口德租界、天津德租界和天津奥租界。

1924年，苏联宣布放弃原俄国在华租界（天津和汉口）。

1927年1月3日，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

1927年1月10日，国民政府收回九江英租界。

1929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收回镇江英租界。

1930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收回厦门英租界。

1931年1月15日，国民政府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

1943年3月30日，日本将杭州、苏州、汉口、天津四处日本租界交给汪精卫政权。应汪精卫政府要求，日方向法国维希政府施压，迫使法国放弃在华租界。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收回所有的在华租界，自此租界的历史基本上在中国宣告结束，除却新界要等到1997年才得以收回。